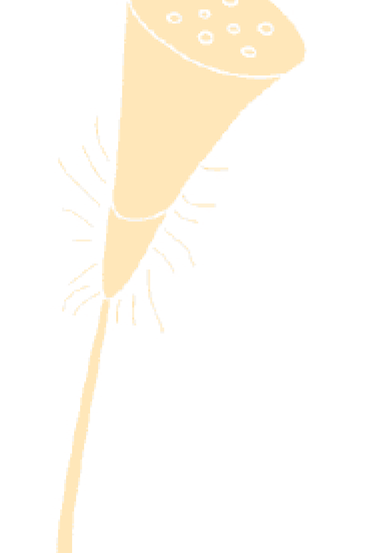
清谭杂俎

——新闻与社会的交响

李　彬　著



清華大學出版社

清谭杂俎

——新闻与社会的交响

李　彬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不同侧面讨论了新闻与社会的一系列命题，涉及理论、实践、研究、学习、读书、思考、文化修养、批判思维等。既含严肃思索，又兼文笔轻快，学术性与思想性相融合，从而感悟别样的专业意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谭杂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李彬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4
ISBN 978-7-302-24774-6

Ⅰ.①清…　Ⅱ.①李…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6178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装 订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230　　**印　张**：31　　**字　　数**：488 千字
版　　次：2011 年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月第1 次印刷
印　　数：1～　000
定　　价：　.00 元

产品编号：

献给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目录



十载道情

骊歌声咽

演说奏鸣

著述心弦

飞鸿回旋

学堂余韵



学问八佾

屐履清音





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作家

格 非

我与李彬先生的交往始于2001年的初秋。那时,我刚从上海华东师大调入清华,因担任本科生的班主任,被安排去京郊的昌平参加为期两天的培训。我和李彬是同屋,午休时见面寒暄,我才知道他也刚从外校调入,而且我们两家居然住在西南小区的同一幢住宅楼内。他虽治新闻传播专门之学,但也淹通文史,于经史、辞章、小说多有涉猎,故而虽是新识,却有重遇旧友的亲切。本来我们约好晚上畅叙一番,但下午的会刚一结束,我就因事提前返校,我们的再度见面被推迟到了几个月之后。

一天晚上,李彬忽然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能否来家中喝酒聊天。我当时正在家中枯坐,一闻此言,当然喜出望外。原先在上海时,朋友间亦有携酒登门,期在必醉的习惯,可是当晚李彬带来的却是两瓶啤酒,我就猜测他其实意不在酒,在乎言谈之乐也。李彬先生果然博识多闻,谈锋所及,皆有会心之论。约两周后,我依礼回访,他让我见识了他的音乐唱片收藏,并一起聆听了《红色娘子军》的片段。由于我们都是音乐爱好者,那晚的话题几乎全部与音乐有关。他喜欢欧洲古典音乐,也不排斥中国传统音乐及现代民歌。在即将面世的这本学术随笔中,李彬先生亦有专文谈及赏乐之快,且每组文章均用音乐术语标题。他的《中外雅乐排行榜》,将古曲《阳关三叠》和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分别置于中外音乐的榜首,亦可见其音乐见识独断于一心的雅人深致。

从那往后,我们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不仅在学校的各类场合频繁见面,他也邀请我去新闻与传播学院讲课,而我系学生中欲弃暗投明,改入他的门墙者,亦年年有之。

李彬先生形容俊朗,言语清赏,俨然儒者风范。他读书之多、写作之勤更是令我望尘莫及。他曾多次打电话给我,告知新书出版的讯息;

而每每承蒙他惠赠大作，都让我感愧不已，相形之下，颇有光阴虚度之感。钱穆先生有言，古之圣贤尚且珍惜寸阴，我辈凡人更当惜取分阴。李彬先生在繁重的管理和教学工作之余，仍能佳作迭出，惜时之功，自不待言。即如收入这本随笔集的诸多妙文，都是于出差、会议、考察的途中写成。有一次，我亲眼见他在会议茶叙的间隙，不肯白白浪费掉短短的十分钟，埋头誊抄、奋笔疾书的一幕。虽时隔多年，此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都说“读其文，想见其为人”，我则是“见其人，想读其文”。沏上一杯清茶，品味《新闻与社会的交响》，听李彬谈人生，谈社会，谈读书，谈学问，忆及我们昔日交往的点点滴滴，亦能废忧忘倦。

是为序。

2008 年 9 月 22 日

十載道情



清 华 十 年

李白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笔者云：生不用封万户侯，悠游清华上层楼。

悠游清华，倏忽十年。十年前，正为后半生何去何从犹疑不决，徘徊于荷塘未名之间，纠结于西湖东湖之际，锲而不舍的学长刘建明教授一句话言犹在耳，并促成自己的决断："你不来清华，将来非后悔不可！"如今退休的刘老师，也是自己学术人生的恩师，犹记二十年前在美丽的厦门大学，一个曙光穿越浓荫的清晨，同样是他的一句话促使自己考博，从而决定随后的学术人生。因此，我信赖他，来到清华，同时说了一句话，并惦记至今："十年后是清华百年校庆，希望届时能够写篇小文，聊表寸心。"

当时觉得那一刻还很遥远，没想到弹指间已经来临，而十年水木生涯——清华的精神、自己的感悟、点点滴滴的修为、苟日新、日日新的教学相长，一切的一切又不知从何说起了。业界学界都敬佩的范敬宜院长是新闻大家，曾任国家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2002 年出任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简称新闻学院）首任院长。我多次听老人家谈到，清华岁月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十年的清华岁月，那么我也愿说这是迄今最快乐的一段人生，甚至像我的一篇文章标题所言——如有来生，还上清华。

清 华 精 神

怀念中学时代，曾经痴迷无线电，不管书本上的无线电知识，密密麻麻的线路图，还是埋地线、架天线、组装收音机、扩音机、各种自动化控制的小玩意儿，无不觉得神奇有趣，乐此不疲，痴迷劲儿估计同当下小青年上网吧、打游戏什么的差不多，动不动就是一整夜，不知东方之

既白。

大约 1975 年，买到一套两本的专业书，关于集成电路的大部头。如今，集成电路恐怕仍属无线电的尖端领域，而当年那个没受多少正规教育的“知识青年”，一边接受“再教育”，一边捧读这种高科技，可见兴趣之浓了。而这套书的作者给自己留下更加难忘的印象，那是平生第一次知道清华大学，因为书的署名是“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专业”。当时，那个懵懂少年，还痴想着将来上清华，圆无线电梦呢。

三十年后来京求学，投师方汉奇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三年苦读，一朝得闲，东游西逛地摸进清华园。园子太大，晕头转向，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分不清东南西北，搞不懂子丑寅卯。转来转去，稀里糊涂，蓦然发现一处庭院深深的四合院，掩映于浓荫，偏处于一隅，一副安详幽静而深不可测的样子。走近细看，门楣上悬挂着一幅“清华园”匾额，原来无意间闯到首脑机关，清华的“中南海”。其时，天色已晚，暮霭四起，四野无人，悄无声息，而内心却漾起层层涟漪，仿佛李清照写到的情景：“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个突如其来的第一印象，从此就成为心目中清华及其精神的象征——浩浩汤汤而波澜不惊。

说到清华精神，自有经典概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传统等。而所有这些对我而言，首先凝聚于那个傍晚时分乍相识的清华印象。后来成为清华人，感悟和理解愈发鲜明。一次，有朋自远方来，先参观新闻学院，后去清华“国宾馆”用餐，她的感觉与评价也是如此：外表波澜不惊，内里气象万千。

2001 年 5 月 18 日，是自己来清华人事处报到的日子。办完一应手续后，突然有阵说不出的悸动与感动，想一想当年那个不知天高地厚，想上清华的少年小子，如今终于成为清华人了！山与山不会相遇，人与人总会相逢，山不转水转，如今终于转进清华园。后来发现，人事处就在那座清华园四合院一侧，那次误入藕花深处的地方。而四合院的背面，就是闻名于世的水木清华，荷叶田田，水清澹澹，朱自清先生雕像端坐水畔。荷塘边，有亭翼然临于池上者，闻亭也。走下闻亭，即见闻一多先生塑像，旁书先生名句：诗人的天职就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四合院对面是甲所，这个貌不惊人、名不显赫的地方原为老清华校长的宅邸，如今是新清华的“钓鱼台”“国宾馆”。甲所与“清华

园”南北相望，间隔不到半个足球场，浓荫密布，曲径通幽，春暖花开时节，一片芬芳馥郁，令人流连逡巡。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不知留下几多历史风物，召唤着几许沧桑记忆。其间有世事，有人情，有明月，有风云，有魂牵梦萦，有一往情深。特别是，有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一脉静水深流的学统，以及民族兴亡的波涌浪翻中，浩浩然汇成的既沉郁顿挫又清新刚健的清华精神。

复兴清华文科的先驱，原党委副书记兼人文学院院长和新闻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的胡显章教授，对清华精神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主编百年校庆图书《清华精神巡礼》即为一例。十年来，我从他的言传身教里，也具体感领了这种精神，亦即《清华校歌》寄寓的情怀与境界：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
莘莘学子来远方，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
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
服膺守善心无违，海能卑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孰介绍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
水木清华众秀钟，万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无穷。

所谓肴核仁义，闻道日肥，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等，不正体现了古来仁人志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之风。

来清华不久，就有幸聆听了校友朱镕基总理的一场演讲。当时，他准备辞去兼任十七年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同时为全校师生作一次道别演讲。那天的演讲在新落成的综合体育馆举行，大约一月前，这里举行了校庆九十周年庆典，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委员长李鹏、总理朱镕基、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等领导人悉数到场，据说规格比照北大百年校庆。

早就听说朱镕基口才很好，那天演讲不带片纸，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一句废话，纵横捭阖，侃侃而谈，台上台下，高潮迭起。这是我听过的最

有水平、也最精彩的演讲。演讲后，校长王大中院士致辞，竟为之哽咽，难以为继。朱镕基屡屡说过，“清华不仅是一个为学的地方，还是教人为人的地方”。他特别提及读书时，电机系主任、他的老师张明涛教授的叮咛：

> 为人要比为学更重要。为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哲人已逝，言犹在耳。清华就是教我们“为学”，又教我们“为人”的地方，它以严谨的学风和革命的传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献身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有骨气的中国人”。饮水思源，终生难忘。

确实，做有骨气的中国人犹如空气一般弥漫于清华园，渗透于清华人的精神血脉，形成一种浸浸然的清华精神。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到朱自清、闻一多等志士仁人，从两弹一星元勋的“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语）”，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新时代清华人，时时处处无不弥漫着这种浓浓的精神气息。

就在朱自清笔下的荷塘畔，有处不动声色而惊心动魄的景观——清华先烈碑，上面镌刻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捐躯的清华英烈姓名及其事迹。其中有位沈崇诲校友，抗战时投笔从戎，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一次空战中，弹尽油干，他与战友驾驶战机，毅然直冲日舰，视死如归一如当年邓世昌。站在碑前，遥想当年，内心怎不触动，又怎不肃然起敬：风萧萧兮易水寒……

1984 年，朱镕基出任经管学院院长时，我也成为一名高校教师，2001 年，他辞去院长之际，我又恰好来到清华。更巧的是，朱镕基曾在我向往的电机系读书，而电机系所在的电机馆又是如今新闻学院的院馆。这座位于清华核心区的建筑，已经列为文物保护范围。楼高三层，坐东朝西，面对着清华大草坪。大草坪相当于清华的天安门广场，周边环绕着惯看秋月春风的历史名物。草坪南边，矗立着那座古雅清隽的清华园牌坊，俗称二校门，其实是老清华大门，也是游客必到之处。进入二校门，迎面是大草坪，前有著名的日晷，上刻“行胜于言”，也是游客喜欢留影的地方。草坪西南角有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及陈寅恪先生铭文，东南角是水利系，十三陵水库、三峡工程等一系列水利设施均与此有关，总书记胡锦涛当年也在这里读书。草坪西边是科学馆，东边是清华学堂，北边为中西合璧的大礼堂，礼堂后面有图书馆——钱锺书曾经横扫馆内藏书，23 岁大学生曹禺坐在这里写下话剧《雷雨》。科学馆、

清华学堂、大礼堂和图书馆，号称清华四大建筑，差不多都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以四大建筑和二校门为标志的地带，既是老清华也是新清华的核心区。如果把这个核心区比作四合院，那么西厢房的位置有甲所、清华园、水木清华等，新闻学院所在的电机馆则相当于东厢房。自己的办公室在学院三楼的西边，时或凭窗，凝神伫望，近看草坪，远眺西山，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不管初来乍到，还是时常光顾，面对清华的幅员辽阔，地大物博，都不免感到晕乎，如陷孔明八卦阵，我也常为指示学院方位而犯难。大致说来，围绕核心区，有东西南北四部。东部称为白区，因为建筑色调多以白灰色为主，包括建筑学院、美术学院、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其中尤以气势巍峨的主楼最引人注目。主楼仿照莫斯科大学，大开大合，器宇轩昂，许多重要的外事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如英国布莱尔首相、美国小布什总统的演讲等。主楼以及白区正对着清华的主校门，出了主校门是一片厚重而时尚的建筑群——清华科技园。尤其让人晕头转向的是，主校门通称东门，而所谓东门却是坐北朝南，实际位置在清华东南角。与之相对的西部称为红区，因为建筑色调基本都是红褐色，包括理学院、医学院、人文学院等。不同色调其实也体现了不同的时代风尚和精神气质，内向的红区近似共和国前三十年，埋头苦干，沉郁顿挫，外向的白区相当于后三十年，白日放歌，清新刚健。除此之外，北区主要是学生区，南区主要是生活区。

环绕核心区及其东西南北四区，清华还有一系列的门——小东门、东门、南门、西南门、西门、西北门、北门等，就像老北京一样。其中，东门、南门和西门最重要。东门虽是主门，但清华的主要门户却在西门，因为西门临近交通主干道中关村大街，近旁是圆明园和北京大学，南去有人民大学，西去有颐和园、中央党校等。

而熟悉清华阵势的人一般都走南门，因为南来北往最方便。2010年校庆之际，清华公布了十条校园道路的命名，其中两条十字交叉的主干道定为清华路（东西路）和学堂路（南北路），学堂路的南部终点即在南门。百年校庆之际，难免兴土木，动工程，修旧如旧地修缮一批历史文物外，还新建一些标志性建筑，特别是“新清华学堂”。这座多功能学堂不仅可以举行大型活动，而且能在不同的场馆，开办不同规模的研讨会、报告会、文艺演出等。新清华学堂位于两条主干道交叉的十字路口，具体说在路口的东北角，就像新闻学院在“老清华学堂”的东北角。

执教台湾第一新闻学府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李瞻老先生，是华人学界的一位硕儒耆宿，在回忆录《大时代见证：万里孤鸿》里也写到对清华的观感："翌日由李彬教授陪同参观清华校园。清华幅员辽阔、环境优美、建筑宏伟、藏书丰富、人才济济，杰出校友遍布全球，实为一流学府。"那是2002年学院成立时，邀请老先生出席庆典，其间陪他老两口游览清华园，没想到还有幸被记下一笔。老先生寥寥数笔，即勾勒了清华风物及精神，令人叹赏。当时我们聊起许多旧事，甚感快意。老先生对老长官孙立人将军的敬重，尤其令人感动。他曾做过孙将军的少校秘书，而一代名将孙立人也是清华校友，毕业于土木系，曾率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对日作战，战功卓著，中外闻名。

朱镕基那天演讲的最后，也谈到清华精神，并概括为四个字——追求完美。他说，清华人就是扫大街，也一定扫得最干净。这句话给我留下鲜明印象，成为日后清华生涯的座右铭。



桃李芬芳

清华十年，特别欣慰的是结识了一批批出类拔萃的学生，真是藏龙卧虎，名不虚传。我曾在一封邮件里写道："套用孟夫子的'三乐'，现在我的'乐趣'就是读书、教书、写书，而三乐最终无不落实在学生身上。"以教书为业的人，遇到如此出色的弟子，自有今夕何夕、此乐何及的畅快淋漓。在清华，才更深切理解教学相长的意味。其间，与其说给学生传授了什么学问，不如说与学生一起探讨，一起思索，一起成长。夫子曰，四十不惑，确为至理名言。来清华时，刚刚四十出头，回想起来，正是这十来年间，自己学术思想才逐渐清明起来，而这种变化大多来自与学子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当时，学校已经批准成立新闻学院，拟于2002年校庆之际即四月下旬正式建院。恰好，为了提供更加自由的成长空间，清华于2001年推行本科生转系制度，而试点就在新闻学院的前身传播系。结果从全校二年级学生中招收了一个新闻学转系班，三十五位同学来自十六个专业，最是符合新闻教育的多学科背景。按照清华习惯的班级称谓，这个班叫做新闻9班或9字班，意谓数九之年入学的班级。翌年，又继续招收一届转系班，即新闻0班或0字班。随着转系制度的全面铺开，以及学院规模日益扩大，转系班遂成历史，转系生则插入相应建制班。如

今看来，两个转系班人才济济，八仙过海，无论从事新闻实践，还是学术研究，抑或其他行业，往往表现出色，成为后来学子的典范。新闻9班班长邢广利原学化工，由于酷爱摄影，遂转入新闻专业。他后来说，当他在教学楼无意间看到教务处的转系通知时，兴奋不已，竟至将通知取下来，揣入怀里。在读期间，他常常北上南下，行万里路，观天下事，拍摄了许多照片，还在清华举办个人影展。毕业时放弃读研，进入新华社，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参加了不少重要的报道活动。国民党连战主席访问大陆，他一直全程陪同，得到连主席的特别称赞。他任9班班长期间，将“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作为“班训”。近几年，从奥运火炬到国庆阅兵，从海地地震到玉树地震，从“7·5”事件到南非世界杯，确实是有新闻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2010年，荣获新华社年度“十佳记者编辑”称号。我辞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系主任来清华任教时，适逢新闻9班刚刚组建，便请缨担任班主任。故有朋友戏言，从系主任到班主任。而在自己心目中，这个班主任胜过其他任何名衔，因为这是清华历史上第一个新闻专业本科班。

班主任做了两年，学生就各奔东西了。往事历历，殷殷于怀，想来有三点欣慰不已。一是同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学子朝夕相处，亦师亦友，并一同为年轻的学院开创了“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样板。当时，研究生周勇担任9班辅导员，承担了大量日常的、细致的学生工作和班级工作。我们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共同见证了9班的成长，如今他已是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了。犹记“9·11”事件当晚，他与邢广利等班干部在我家开会，研究生刘鉴强打来电话：“李老师，快看凤凰卫视，重大新闻……”于是，班会中断看新闻，直到凌晨一两点，由于突然停电，才不得不散去。同一年，对中国人来说，最难忘的还是申奥成功。剑外忽传收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那个激情四射的夏季，那个红旗如潮的夜晚，深深印在中国人的心底。导演谢晋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在清华举行首映式与座谈会。我带领9班同学出席座谈会，并与谢晋一同合影留念。如今，这张珍贵照片就摆在办公室。

再一点当时不觉得，后来才逐渐显现其意义。9班成立后，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开班教育，其间邀请三位新闻前辈，对同学进行专业启蒙，第一讲请的就是范敬宜。当时，谁也没想到他将成为新闻学院首任院长，当然他自己也不会想到。那时候，他从《人民日报》总编辑的位置退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请他来的那

天，天气很热，讲课的第二教学楼没电扇，没空调，后任党委书记的王建华老师找来一台电扇，放在讲台边，老人家就站着一气讲了两三个小时。说实话，后来没少听他讲话，但感觉都没有这一次神采飞扬，一气呵成。他说是因为台下的孩子们聚精会神，求知若渴，给他以触动和激发。当老师的都懂得，这确是一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当日旁听的研究生刘鉴强，本来只是慕名而来，想着随便听听，结果刚听个开头，就按捺不住激动之情，向身边的同学借来纸笔，边听边记，后来整理成文，刊发于《新闻记者》杂志。讲座有个问答互动环节，最后一个问题是才貌双全的陆娅楠提的：如果有来生，您最想做什么？这位后来被学生称作"范爷爷"的一代报人答道：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新闻记者》刊发刘鉴强的文章时，就用这句话作为标题。从此，如有来生，还做记者，便成为一届届清华新闻学子的座右铭。刘鉴强与陆娅楠后来都成为矢志不渝的新闻人，娅楠放弃各种诱惑，选择了《人民日报》，曾任《南方周末》调查记者的刘鉴强，已用一部颇受好评的《天珠——藏人传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践行了自己的新闻理想。

由于这次讲座的效应，主持学院筹建工作的王建华同志便推动有关方面，将范老列为院长候选人，而这个选择在新闻学院跨越式发展中得到验证。按照不同系统的统计，全国高校的新闻传播教学点(而非误以为的专业或院系)已近一千。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由于实力雄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由于历史悠久、北京广播学院即中国传媒大学由于独具一格，而一直稳居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科前三甲。清华新闻学院经过几年建设，2009 年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位居其后，名列第四。数字是冷冰冰的，亲历者才知道其中有多少点点滴滴的修为，多少孜孜矻矻的努力，多少细细密密的工作。所有进展中，最重要的一是方向，二是协调，新闻学院能有今天的局面，正得力于范院长把握方向和协调阴阳。此外，他也像普通教师一样，开设了多门本科生、研究生的专业课，并逐字逐句批改作业，写下批语，他指导的研究生大多进入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所以，每当听到"你们院长是不是挂挂名"云云，我都不免郁闷。我理解，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而确有现实依据。可惜，这种所来有自的想当然，同范院长实不相干。所以，每次不厌其详解释后，我往往用两句话概括：他既是称职的院长，又是敬业的老师。

最后一点，是推动创办学生报纸《清新时报》——创刊于 2002 年记

者节。此前,我们曾在全校征集报名,学生点子五花八门,乱花迷人,有严肃的,也有调侃的,如察世俗清华统纪传什么的,戏仿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后来,法学院本科生周恒宇的"清新时报",使我眼睛一亮,觉得非它莫属了。报名确定后,便请素有诗书画三绝的范院长题写报名。即使此时,依然有不同意见,认为报名不甚理想。一次,有老师在学院拉着我说,《清新时报》如何如何,我只好回答来不及了,因为已请院长题写报名,准备开印了。报纸出版后,学院刚好举办了一个座谈会,记得请到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征教授、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等,他们看到《清新时报》都给予好评。现任新华社音视频部副主任的陆小华,还对报名发表了一通意见,认为包含如此这般的几层寓意等。若说寓意,我没有他想得那么丰富,当时只想到两层,一层隐含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一层暗示青春年华,清新刚健。还有个小插曲,我建议英文报名用 TSINGHUA TIME,班长邢广利去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才知道 TSINGHUA 一语已经注册,不能随便使用。于是,只好改用拼音 QINGHUA TIME 了。

虽然只是学生报纸,但在清华园,《清新时报》却成为学生老师都喜欢的主流媒体。不少学子都在这里得到锻炼,为日后发展打下专业基础,有些骨干更成为学弟学妹津津乐道的佼佼者,包括温家宝总理复信表扬的李强、毕业时去西藏做村官的邹圣兰、本科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故事片《不准郁闷》的导演康雯萱、本科毕业进入新华社的周劼人,以及尚在攻读的袁梦晨、李燕茜等,他们都曾担任《清新时报》的社长或总编辑。报名的"始作俑者"周恒宇毕业后,保送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后来又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0 年考入最高人民法院。

聂耳《毕业歌》唱道: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2003 年夏天,新闻 9 班毕业之际,禁不住别情依依,我写下一篇小文《9 班画像》,刊于《清新时报》第 5 期,下面不妨摘录几段:

［**题记**］　新闻 9 班,为我院第一个本科班。全班三十五位转系生,选自清华十六个专业,可谓钟灵毓秀,俊采星驰。今当毕业之际,谬仿《酒中八仙歌》,为 9 班同学逐一画像。信笔涂鸦,东拉西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邢广利：有新闻处即有君

初，君以9班首任班长，倡言“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今乃为新华社记者，自是有新闻处即有君。

王茜：人小鬼大

君为我班之“幺妹”，将读研究生，还做中学状，对月伤心，见花落泪，时不时弄首“现代诗”，让人一头雾水，找不着北。

陆娅楠：心比天高

才貌双全，品学兼优，大事小事，力争上游，当得起前总理朱镕基公期许的清华精神——追求完美。

傅署安：绣口一吐就半个清华

君尝为《人民日报》撰《清华园》一文，情意浓郁，文辞幽美，颇得朱自清先生之神韵。诗人余光中有佳句“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寻李白》），君锦心绣口，亦可当之。

周森：好女儿上天堂，好男儿走四方

坊间书商攒书曰——《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君当远行，万里投荒，大丈夫四海为家，好男儿纵横天下！

冯洲：“马友友”

京城高校无敌手，直逼大师马友友。冯洲一把大贝司，闭月羞花水倒流。

……

2004年即新闻9班毕业翌年的教师节，我荣获清华大学优秀班主任一等奖，不久又忝列研究生投票评选的“良师益友”。这些年虽然获得种种荣誉，而只有这两个奖状一直摆在办公室，不为别的，只为无法忘却的美好记忆，借用新闻9班王茜（美国普渡大学传播系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传播系教师）在一封邮件里的道白：“在嘈杂中还渴望一种宁静，在浮躁中还固守一份执著，在人情世故中还难忘一片天真。”

如切如磋

清华十年，无论是开设的十余门课程，还是出版的十余部著作，大多来自师生之间的如切如磋，直接间接都在因应学生的疑难、辩难、驳难。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这些疑难、辩难、驳难，没

有来自学生的源头活水，自己的学术思想就如一潭死水了。尤其是清华学子无愧半国英才，佼佼者更是身手不凡，若想得到他们的颔首认可实属不易。诗人周涛在名篇《伊犁秋天的札记》里曾经感叹："在诗的领域里，我的对手太强了，他们以惊人的洞察力和才气及对现实的直觉把握向我摆出了一个又一个阵势，尽是些我前所未见的棋局。"与之相似，学生也向我摆出了一个个前所未见的棋局，让人既手痒，又头疼。为此，不得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丝毫不能马虎，一点不敢懈怠。

一次，参加上海大学举办的新闻学院"院长论坛"，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李良荣教授，对当下重科研而轻教学之风深感忧虑。我也颇有同感，发言时予以呼应。同时，我也指出，清华一向将教书育人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教学一向十分重视，并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从而使教师不得不重教学，不得不将教学作为"第一学术责任"。以自己清华十年、年年讲授的基础课中国新闻传播史为例，如今虽然已经一步步建成清华大学精品课、北京市精品课和国家精品课，可开课之初却遭遇教学生涯的第一次滑铁卢。

按照清华要求，每次课程结束，学生都要对任课教师进行评估，最后给出一个总分和十个单项成绩，如教学态度、教学方法等。一般说来，总分八十五分以下就有问题了，十个单项的评价挺有意思的，要么"哭脸"，要么"笑脸"，笑脸越多，表明越受欢迎，反之亦然。要命的是，诸如此类的评价不是"一种"改进教学的参考，而往往是决定教师身家性命的"唯一"根据。所以，如此评价机制也屡遭诟病，常见的批评是败坏追求真知与真理的学术真谛，迫使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不得不迎合学生，不得不讨好学生。为此，我在不同场合也谈到：这种机制是最大的"善政"，也是最大的"恶政"。善政在于确实能够有效地监控教学，加强教学，促进教学；而恶政在于败坏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氛围，不免将老师和学生都驱入功利之途。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将学生评价仅仅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之一"而非"唯一"，并同教师身家性命"脱钩"。如此一来，恶政顿消，善政立显。

我的教学滑铁卢，也同这套机制有关。2001 年秋季学期，第一次开讲中国新闻史。关于这个始料未及的学术转向，我在《中国新闻社会史》的后记里还写下一笔：

2001 年，笔者调入清华大学后，师友见面总爱随口问个问题：

“你在清华上什么课?”对此,自己常常觉得口将言而嗫嚅,仿佛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因为,按照以往的教学科研情况,顺理成章的课程自然应属传播研究领域。然而,由于清华正在筹建新闻与传播学院,师资、课程、教材等都在陆续完善之中,比如新闻传播史的师资就付之阙如,而自己以前又讲过外国新闻史,于是就将中国、外国,本科生、研究生的新闻传播史课程全部承接下来,而传播研究方面的课程反倒日渐稀少。对于这种情况,不仅本人始料未及,估计同道也难以理解。于是,面对“上什么课”之类的问题,只好每每王顾左右。

特别是中国新闻传播史对自己来说尤属全新领域,虽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先生门下受业,完成一篇习作性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学位论文,但对近代以来的情况还是比较生疏。所以,起初开课不免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当时心想,反正是临时任务,不久即可卸任。没想到,这一上居然就上到现在,而且各种层次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算下来已讲了近十轮。更出乎意料的是,现在不仅上出“瘾”来,而且学术兴趣与科研方向都发生转向——从理论到历史,从外国到中国。

不过,第一次开课,情况并不理想。自以为尽心尽力,学生的评价却事与愿违,记得还有“哭脸”。虽然当时有点不解,可后来反省,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同清华学子的期待确实不无距离。2010 年,我在接受清华大学研究生通讯社社长曾维康同学采访时(后以《“新新闻史”的一次尝试——与李彬教授漫谈〈中国新闻社会史〉》为题,刊发于《今传媒》杂志),还谈到这段经历:

> 刚开始时,我用的就是那种挺传统的教学方法,但是清华的学生不买账。举一个例子。那是我第一次上中国新闻史这门课。期末考试时,有位同学正经的卷子没怎么答,却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质疑我们学这些、记这些陈糠子烂谷子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说得很激愤。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就力图做了一些改动和尝试。

经过反思与调整,后来就渐入佳境了。有一年在学校做的毕业生调查中,中国新闻传播史还名列全校“50 门好课程”之一,同李希光教授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并为新闻学院榜上有名的两门课程,而这两门课

程如今也成为新闻学院的两门国家精品课。

正是在中国新闻史一课上，发现了名动一时的李强同学及其《乡村八记》。李强属于新闻3字班，即2003年入学。2004年秋季学期，我为他们讲授中国新闻史。我的新闻史课程同一般讲法有所不同，常务副院长胡显章教授在《新闻战线》发表文章还谈道：

> 李彬教授在课堂上，除了传授专业知识，总是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天下，引导学生将自己的理想与成材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同时，还十分注意引导学生学习老报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把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与专业相关的著作列为必读书，而且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曹锦清教授的《黄河边的中国》等也列入其中，要求学生写出读书笔记，并在课上讲评和讨论。这对学生起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李强所在的新闻3班，也是一个优秀班级，他们毕业时曾经自编、自导、自演了故事片《不准郁闷》，在清华园上映引起热议，首映式不得不连放两场。李强，山西人氏，为人敦厚，性行淑均。在课上，不显山，不露水。课程结束后适逢寒假，人人忙着回家过节，而他告诉我想去做点乡村调查。利用假期开展社会调查，是清华学生的例行功课，所以我也没有十分在意，记得只是提了一点原则性意见以及注意事项。春季开学后，又有我的外国新闻史课程，第一次课上请大家随便谈谈寒假见闻，李强同学说了说自己的调研活动，并说正在撰写报告。此时，我依然没有上心。差不多半月后的一天晚上，收到他的邮件，附有《乡村八记》一文：

> 李老师：
>
> 您好！在您的鼓励下，《乡村八记》这篇调查报告终于写完了，近一个月来絮絮叨叨，竟划拉了三万多字，连我自己都觉得惊奇。
>
> 回想上个学期以来，李老师的教导给了我太大的影响，可以说，我的大学生活是从上个学期开始的，这次寒假的实践，都缘于李老师大力推崇的《黄河边的中国》，李老师说那是几十年才能遇到的好书，读过之后，果觉如此，于是这个实践的想法就出炉了。
>
> ……

打开《乡村八记》，说真的，惊喜莫名！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城市长大的学生，对父老乡亲有如此情怀，对三农问题又有如此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而且，文章条分缕析，语言凝练厚实，不像大二学生的手笔。越看越兴奋，一口气看完，禁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当即回信：

李强：

你好！

看了你的报告，非常兴奋，激动不已！没想到，你有这样大的进步，又有这样多的收获，实在让人欣喜莫名。我常常说，江山代有才人出，看到你的东西，我又想起这句话。你的报告写得太好了，大大超乎我的预期。这才是大二的学生啊，再大一些岂不更了得。我觉得，有你这样的后生，中国就永远充满希望。孺子可教，后生可畏，信然，欣然！

你的报告，我已转发胡（显章）老师和王（建华）书记，同时也会给院长（范敬宜）一份打印稿，他们一定会像我一样欣喜的。

2005-03-16

果然，他们同样是一口气看完，同样喜形于色，拍案称奇，就连其评语第一句都如出一辙：

我怀着惊异的心情，用了整整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李强同学这篇农村调查报告，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范敬宜）

我一口气读完李强同学这份洋溢着乡土气息的、内容详实、文笔流畅、颇有见地的乡村考察报告，不禁拍手为之叫好！（胡显章）

范院长一边写了一千来字评语，一边逐字逐句修改一些技术性差错，如错别字、标点符号等。后来的故事由于媒体报道而无须赘言了：先是范院长将《乡村八记》呈送温家宝总理，没想到温总理亲笔复信，接着《人民日报》刊发温总理复信以及《乡村八记》第一记《二姨家的收支明细账》，之后各家媒体围绕这个话题形成一个报道热潮。2007 年，李强本科毕业，保送研究生，师从范敬宜。2009 年研究生毕业，成为《人民日报》记者。如今，温总理复信中的一段话，已经镌刻在新闻学院门厅：

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

自诩一介书生，不免自命清高，对高科技、多功能一类玩意儿始终不屑一顾。虽然来清华之后，不知不觉换了多部笔记本、多部手机等，可心里头还是一副君子不器，超然物外。就像平时不屑名牌，从来搞不清楚（当然还是不屑于搞清楚）李宁耐克之别（觉得不都是一个钩儿嘛），可阴差阳错貌似满身都是名牌，无怪乎受到学生揶揄。不管怎么说，为了关注学生、理解学生以及引导学生，一度热衷于网络、BBS 等，算一名乐此不疲的潜水员、灌水员。当然，不是为了寻开心，而同样是在履行“第一学术责任”。一般来说，并不发言，而只是时不时地扔颗集束炸弹、高爆炸弹、重磅炸弹，即有分量、有水平、有趣味的文章，在学生不亦乐乎的话题中炸响。说实话，这里有点恶作剧的心态，事实上网络不是课堂，正襟危坐反而效果不佳。我将此类传道授业解惑视为偷袭。偷袭不同于正面交火，排兵布阵，不同于课堂上的高谈阔论，面谈时的周武郑王，而是化整为零，到学生后方去，开展游击战、持久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今天端掉个据点，明天干掉个炮楼，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黄埔一期”一弟子在新华社实习期间，为《瞭望》周刊采写了一篇报道，其中还写到我的这番“恶作剧”：

老师们也应当参与到学生的网络生活中，只有亲身参与了，了解了，才能更有效地引导学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彬教授就常常在“水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版上贴一些“议程设置”的文章，他笑称这是“打入敌人内部”。“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同学们最真实的思想状态，就要走到他们当中去。而 BBS 不仅是一个了解学生的窗口，也是一个教育学生的重要‘战场’。以学生们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引导他们通过自己的分析认识问题，是很有效的。”李彬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我们的院版上，我军已占据了绝对优势！”李彬转贴在 BBS 上的文章确实常常引起同学们的讨论，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常法迪说，“李老师博览群书，他贴过来的文章都是经过筛选的精华。我们有空就会看看，挺能开阔眼界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学着他贴一些自己觉得很受启发的文章和同学们分享。”（左娅《清华校园逛网络》）

眼下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张杨同学，才思敏捷，

意气纵横，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让人总是不由想起当年那些博雅清通之士。范敬宜院长对他也很欣赏，第一次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时还特意聘他为助教，而当时他已保送其他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一日，子夜时分，我们在网络学堂谈起新闻自由等专业话题，你来我往，兴味盎然，最后居然有万言之多。

教学相长

粗略算来，清华十年，已经开了十来门课程，包括本科生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生的“媒介与社会研究”、“新闻与传播前沿讲座”，博士生的“新闻传播的理论、历史与方法”，以及同范老等合开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中的文化”。伴随这些课程，往往会触发相应的著述，如《全球新闻传播史》、《名记者清华演讲选》、《媒介二十五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拓展读本》等。其间，除了《传播学引论（增补版）》、《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译著《关键概念：文化与传播研究辞典》（约翰·费斯克等）延续既往的研究，其他大抵都是清华十年教学相长的成果，这里最费心思、最看重的还是2009年的两部新作——《中国新闻社会史（第二版）》和《新闻与社会的交响》。

无论《中国新闻社会史（第二版）》，还是《新闻与社会的交响》，均属无心插柳之作。前者如今已是清华、北京市和国家精品课“中国新闻传播史”的配套教材，连续出版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有赖于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的策划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郁金豹先生的美意。记得2005年，戴元光教授来京，约请我与李希光教授等聚谈，策划一套前沿性、原创性的丛书，并请每人撰写一部，主题不限，形式不拘。戴元光教授是我多年的学界师友，他的约请不敢不从。其实，当时刚刚出版了《全球新闻传播史》（几经修订而获评北京市高等学校精品教材和国家精品教材），本想休整一下，甚至不无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念。可戴元光教授一声令下，内心一边踌躇，一边又蠢蠢欲动。恰巧坊间有几部课堂实录问世，清华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北大洪子诚教授的当代文学史等尤为出色，给人灵感和启发。心想，何不也用这种方式，将中国新闻史课堂讲述记录下来，整理成书。于是，2005年秋季学期就开工，每次课前精心准备，再分别请一组学生记录整理。学生的记录和整理至关重要，生怕有点什么闪失，课前的内容、课上的灵感就随风飘去，无

迹可求了。谢天谢地，从始至终没有出现大纰漏，只有一组留学生丢失部分录音，遗憾归遗憾，还算无大碍。书稿的毛坯房完工后，2006 年便开始精装修。紧赶慢赶，总算赶在预定的 2007 年元旦交稿，这就是当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中国新闻社会史》。

这一版问世，年轻学人，特别是一些博士生每每称誉，时有重写新闻史的过誉之辞，让我受宠若惊，倍感鼓舞，觉得自己的一点创新之举不无意义。正因如此，后来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也是新闻学院研究生纪海虹建议，能不能围绕中国新闻史的精品课建设，在此基础上增补、修订，再出一部图文本，同时配以一部中国新闻史文选，这个建议让我动心。清华十年，除新华版《传播学引论（增补版）》、复旦版《符号透视》、交大版《社会史》，几乎所有著述都有赖清华出版社，而纪编辑功莫大焉。她不仅有出色的专业眼光，而且有良好的图书出版感觉。前有《全球史》，后有《社会史》，如果不是她的锲而不舍和独到创意，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品。遵从她的动议，《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和《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赶在 2008 年秋季学期如期出版。两部新作又耗费一番心血，甘苦一言难尽，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也付出大量辛劳，包括查找图片，搜集、遴选、校对名篇等。没有他们的齐心协力，一年之内完成《社会史》第二版及其文选几乎是不可能的。

许是受追求完美的影响，还没等顾上欣赏第二版，新的不满、新的想法、新的思考又汩汩涌出，精益求精的意念与攀爬高峰的意志就像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在清华出版社对这种不情之请宽宏大量，虽然插图本刚刚问世，还是应允我的提议——翌年就出修订本。这就是新中国六十年前夕问世的“第三版”，实际名为插图本《中国新闻社会史（第二版）》。这一版内容更为丰富，论述、分析也更为周全，同时采用双色印刷，版式、图片等也更加美观。至此，《中国新闻社会史》的三部曲总算告一段落。虽然还不满意，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李漫博士写了一篇思虑渊深、情辞幽远的思想性书评，针对三部曲的心路历程及学术脉络展开会心的阐发，与其说是对拙著的评点，不如说借题发挥，见微知著地论述了中国与世界、学术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等宏大命题，这里不妨著录一段，管窥蠡测，略见一斑：

> 再政治化的方式分两种，一种也许可以用施特劳斯所说的“显白的教诲(exoteric teaching)”比喻，施特劳斯常常引用伏尔泰的

一句话："勇者的天命就是将他的所思所想自由地表白出来"(Le partage du brave homme est d' expliquer librement ses pensées.)，这种直白的表达是坚决而明确的，如阳光一样烛照人心。另一种也许可以用歌德所说的"音韵袅袅(der Nachklang)"比喻，歌德有咏月诗曰："你洒入丛林与河谷/ 静默而迷朦的清晖/而我的灵魂/化为清光把你追随。"(Füllest wieder Busch und Tal/ Still mit Nebelglanz/Lösest endlich auch einmal/Meine Seele ganz)这种让人不知不觉的温和，如月光一样润泽灵魂。两种方式本书似乎都有所采用，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这种如歌德月光般静默温和、照物无声的方式体现出来。

李漫博士也是我在清华相遇的非常倜傥之人。下面是我平生写的第一封推荐书，由此可知大概：

李漫，江苏盐城人，1974 年生。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硕士，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将于 2010 年 7 月毕业。

懂得英语、法语、德语，由于撰写博士论文蒙元时期的传播，又研习了元朝的八思巴文。曾公派留学，以研究生身份在德国交流一年。

专业虽属新闻传播学，但视野开阔，学养深厚，既博览西学典籍，熟谙其渊源流变，又通晓中国文化，通鉴、十三经、二十四史等多所披览。

不仅为学专一，有博大清通之象，而且为人端正，温良恭俭，有古仁人士大夫之风。

为此，特予推荐。

2010 年 3 月于清华园

他给我的毕业留念，都带有浓郁的文化气息：一方自刻篆章，上书"风德雨恩"，意谓"君子之德风也，老师之恩雨也"。

至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更是寄慨良深，看似闲云野鹤，仿佛闲庭散步，其实包蕴着心有灵犀、心有戚戚的灵感，怅望千秋、寻寻觅觅的思绪，长歌当哭、远望当归的感怀。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多为自己的心声直言，文体也更率性洒脱。学者顾农与陈学勇在《博览群书》上发表《关于轻性论文、学术随笔的通信》，看后颇有同感。按照顾农的分析，

常说的鲁迅杂文可以细分为杂感、随笔和轻性论文。鲁迅的轻性论文，是相对引经据典的学院派论文而言的。顾农认为，学院派论文看着可能有学问，却未必有思想，也未必有意思。而轻性论文举重若轻，“写此种文章必须胸有成竹，对所论的问题有深刻的观察和透彻的把握，思维活跃，发表有意思的分析和评论，而且还要讲究一点文采”（顾农）。学院论文固然不易，而轻性论文更难，因为需要义理、考据、辞章，“作轻性论文或学术随笔，义理之外尚需辞章”（陈学勇）。陈平原在国家图书馆做学术报告《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也谈及读书治学的性灵话题：

> 过度的专业化，导致不少学者“身在曹营心在汉”，整天“为赋新诗强说愁”，制造无数只在填表时才有用的文化垃圾。如此“生产强迫症”，对人对己，都是一种戕害。某种意义上，我欣赏“爱美的”人文学者，就因其完全沉湎其中，更有可能兼及思想性、趣味性与批判性。

《新闻与社会的交响》自然不能同鲁迅先生大作相提并论，也无法企及顾农、陈学勇所论水准，但从文体类型看又大率如此，而为文初衷也是希望于峨冠博带的学院派论文之外，另辟一路清辞丽句的杂感、学术随笔与轻性论文，即所谓“兼及思想性、趣味性与批判性”的、“爱美的”学问。一次，江南某新闻学院院长一见面即问道，近来可有辞章问世，对“交响”一书谬加推崇，俨然新闻学独此一家。我忙不迭更正：实不敢当，折杀我也。不过，这也表明同道中人有同好焉。事实上，正是诸如此类的认可，包括青年学生与学者的谬许激励着我、促迫着我，又完善、补充、修订了这一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里权且著录一封博士生邮件吧：

> 李老师：
>
> 在二零零九年的最后一天给您写信，感慨万端。
>
> 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您给我们上课，送了我一生中最不寻常的新年礼物——您的大作《新闻与社会的交响》。
>
> 这个礼物的气质与您的气质如此和谐，让我在这个俗世也能有片刻的超越。
>
> 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因为欲罢不能。从书中受益颇多，而对您也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

今天，我又把书拿出来，细细地翻，仍是感慨。

真的感谢您送了我们如此与众不同的礼物，我也很奢望每年都能收到这样的礼物，是不是有点贪？

记得您在书中说"原来有一盘 CD，就是钢琴协奏曲《黄河》和用钢琴演奏的《梁祝》，结果有次上课给弄丢了，一直耿耿于怀。"

我给您买了一盘新的，是我送您的新年礼物，但我更希望有一天也能以书相赠，为了这个心愿，我会努力。

谢谢您，祝老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文化自觉

来到清华，正当盛年。如今想来，孔子所谓四十不惑，应该理解为四五十岁之间更合情理。也就是说，人的不惑应该在四十与五十之间逐步完成，正如三十而立完成于三十与四十之间。若一到三十就成家立业、一进四十就不再困惑，那么，既有违人生规律和认识规律，也轻视了夫子的智慧与思想。这番解读或误读，也是基于自己的体验，因为恰恰是在过去十年，才觉得一步步迈向不惑之境，对世事人生的认识才一点点清朗起来。

四十不惑，一方面固然同阅历、经验有关，不到特定火候不可能明白一些人生道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即为一例，《红楼梦》说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也含有这层意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世事变化，让人逐渐明白了一些过去忽略的大关节、大脉络、大道理，就像同芝加哥大学博士生张杨通信时写的："如今，伴随精神苏醒、思想解放、文化自觉，对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理论等问题，越来越觉得拨云去雾，豁然开朗，其间也得益于我们师生的如琢如磨，以及你的不断启发与见教——道之所在，师之所存。"

关于文化自觉，本书时有论列，这里只强调一点：清华校友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固属文化自觉经典定义，而此外文化自觉还蕴含着一个古老而伟大文明的胸襟与境界，并在思想日渐逼仄、思路日渐褊狭、思维日渐枯竭的时代与世道，激活文明的想象力、人类的想象力，从而寻求更多元、更自然、更有意义、更可持续的文明形态和生存方式。想象力——正是文化自觉的要义。这方面，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春风为想象力注入生机，领风气之先的学科及

学者又为此做出典范，他们由此超越数百年钳制人类想象力的精神牢笼与思想藩篱，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思想与现实，回归自然，回归伟大，回归古典的高贵与尊严。春草绿色，春水绿波。这些先知先觉的高远灵魂同古往今来的伟大经典，终于为人敞开了全新的视野，全新的境界。

这个过程犹如坚冰融化，燕子飞来，春风又绿江南岸，草色遥看近却无，于是思想感领的新春气息日深日浓，不知不觉已然今是而昨非。这一切，离不开清华园，离不开这个曾经孕育“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的文化沃壤，离不开清华“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的精神传统。同时，也得益于业界和学界一批年轻有为的才俊，他们视野开阔，思想鲜活，历史观与新闻观每每超越前辈之人，不仅站在新的世纪，而且站在新的思想制高点，同当年胡适的文化心态判然相别：“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清华十年，我曾多次主持讲座课程，邀请了不少一线记者，他们的讲座或热情奔放，或娓娓道来，给学生以新鲜的教益，也给我以别有洞天的感悟。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各路新闻人在清华的演讲不下百场。遗憾的是，其中大多数未能留下记录，致使他们的经验和思想虽然消融于学子的心胸，但也消逝于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时空。好在我们记录整理并编辑出版了部分演讲，可大致领略其风采，包括《媒介二十五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此过程中，优秀新闻作品也常常给我如沐春风的体悟。不妨列举一二：《人民日报》记者王慧敏的《热血铸边关——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军民戍边纪实》、新华社记者张严平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记优秀共产党员、木里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北京日报》李砚洪的《赤脚医生——20 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中国青年报》欧耶的《新教条主义的光荣孤立》、《科学时报》王中宇的《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观察生态问题的另类视角》等。这些作品同世界任何新闻佳作相比都毫不逊色，有时在历史观、价值观、新闻观上还略胜一筹。他们以新闻人的敏锐和良知，透过生动的故事和细节，或展现了历史的

静水深流，或回荡着时代的涛声巨浪，或折射出人间的悲欢离合。

以《科学时报》2010年刊发的《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观察生态问题的另类视角》为例，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深邃，见识之高远，写作之完美，不亚于林林总总的学术著述。这篇收入《新华文摘》的大作，有调查，有分析，有事实，有理论，读来既有新闻作品的清通流利，又有学术思想的厚重深刻。尤其令人欣赏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探求意识，跳出束缚人类数百年的思想魔障，破解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话语。作者从2010年西南大旱谈到“一分天灾，九分人祸”；从先民的“刀耕火种”谈到生态与社会的平衡；从改造自然谈到顺应自然；从所谓“蒙昧”“落后”的原住民谈到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思维”；从少数民族的村寨布局谈到天地人和的文明理念；从政治制度谈到文化习俗；从“历史主义VS道德主义”的伪命题谈到人类历史的前途命运等，洋洋洒洒近两万言，真是大开眼界。比如刀耕火种：

“适应”——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正因为“刀耕火种”适应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系统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内与其寄生的生态系统相安无事。近几十年来，这个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从稳定走向“急剧衰落”，主流学者们却将其归咎于刀耕火种，实在是因果错位。

再如，报道最后对当下主流学界的批评鞭辟入里，酣畅淋漓：

我们的主流学界辩护道：“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称这是黑格尔的名言。其实，这既不是黑格尔的原话，也不是他的原意，对此张汝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见张汝伦《历史主义与现代性》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但我们的主流学界却据此虚构出了“历史主义VS道德主义”的伪命题。在他们的“历史主义”中，将追逐私利和个人欲望最大满足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将人的自然欲望与伤天害理、为非作歹混为一谈。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中，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是利益和实力。只有利益能产生内在的驱动，只有实力能实现或阻止这种驱动。超越这框架的思考一概被斥为不切实际的“道德主义”。这就是主流文化之所以强势的根源。

用这样的思维框架观察，历代王朝为建都城将一片片原始森林砍成秃山是合理的，对此发出微词的梁鸿则是心怀叵测，必须全

国通缉；用武力向中国推销鸦片的英国舰队、打进北京城的八国联军是现实而合理的，林则徐、义和团则是昧于现实，迂腐愚昧；大日本皇军侵占大半个中国是现代战胜传统、先进战胜落后，美国佬向日本人头上扔原子弹则更是如此；资本家的血汗工厂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因为它提高了要素的利用效率，贪官们聚敛钱财，里通外国，安排外逃则是理性经济人的合理选择，对此表示不满者不过是在竞争中失败的“愤青”……这一切都是历史进步的必然，反对这一切就是对抗历史的必然性，就是阻碍历史的进步，就违背了“发展”这个“硬道理”。

这样的强势文化在自己的内部造就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分化，积累起尖锐而无可化解的社会矛盾；在其外部，使生态环境迅速、大幅度恶化，威胁着人类的持续生存。不过这一点也不会让进取斗士们有丝毫的不安，他们的先哲早就教导过：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我们应追随“恶”这个“历史发展的动力”，直到走向人类灭亡；还是应跳出主流文化的思维框架，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子孙们的未来？我们看到，一批学者（他们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一些高校），一直在持续地关注、研究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问题。但社会公众对此知之甚少。西南大旱将这个问题从学者的头脑里提到了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虽然文坛学界犹如画苑音坛，难免趋炎附势，对权威顶礼膜拜，对后进不屑一顾。但有道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新生的气息、青春的思想似自然界的新陈代谢，终将吹绿天涯。这些年，时常接触新闻传播学的后起之秀，他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每每令人刮目相看，啧啧称奇。犹记新中国六十年大庆之际，在京郊回复一位博士邮件的欣悦之情：

这两天在京郊一处“山庄”开会。房屋凉台对着一片田野平畴，远处有山峦蜿蜒，凌晨之际，时闻鸡鸣，狗吠，鸟啼，颇似“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意境。写完复信，站到凉台，呼吸清秋的气息，眺望清朗的天空，适逢一轮朝阳悄然升起，橘黄色的阳光为大地抹上温暖的、油画般动人的色彩。此情此景，不禁油然想起八十年前，毛泽东在井冈山写下的那段激荡人心、富有诗意和预见的名

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王维佳博士的新作《中国党报向何处去》，更以深邃的历史意识与思想洞见，揭示了新闻媒介乱象丛生的深层问题及其内在根源，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让人感到新时代的气息正如春潮滚滚，绵绵涌来。比如，他抽丝剥茧地指出，当下的党报改革要么局限于开源节流的经营环节，希图媒介市场做大做强，要么着眼于改造话语形式，打入“主流市场”，影响“主流人群”，成为有分量的“政经大报”。而在他看来，这些思路不过是舍本逐末的雕虫小技，结果往往南辕北辙，因为：

中国的党报完全是伴随着中国人民以独特的路径建立民族国家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产生的，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一种现代政治理念和民主方式如何得以传播的问题，它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也紧紧依附着这个现代民族国家走向富强的政治沟通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党报的产生和存续实际上完全依附着“民族国家”、“发展”、“独立自主”、“基层民主”、“现代化”这些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一旦这些现代性叙事被拆解、被嘲弄、被放弃，那么党报也就全无立足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如今党报所面临的左右为难的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并非直接来自“读者需要”的变化，更不是来自新媒体的挑战，现代性在中国今日之文化政治中所遭遇的深刻危机才是党报发展困境的根本所在。

基于这种基本认识和判断，王维佳博士在梳理与回溯党报历史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揭示了群众路线等办报理念与新闻传统，并从全球化的视角审时度势地提出新的发展思路：

中国的党报依托并且服务于一个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整合底层力量，构建文化主体意识，传播独特民主想象，并带领国家走向富强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行动。它曾经是传播领域中进步的和先进的力量，决不能因为党报发展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就“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今天党报管理者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仅仅保留党报这一国家宣传体系的空壳，将视野束缚在主管领导满意和都市中产

阶级的文化政治世界当中，还是重新发扬群众路线的传统，将党和人民的利益真正统一起来，从全体国民利益而不是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角度来报道和讨论那些重要的现实问题，重新让宪法中的领导阶层，我们国家大多数人民的代表以有尊严的方式走入传播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让党报成为国家协调发展并促进民主进步的有力传播手段。

英年早逝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以一部《社会学的想象力》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围绕学术研究的想象力，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僵化教条与苍白乏味进行了深切洞明的剖析与批判，同时也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19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深入卷入西方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学术的创造与知识的生产也日益受制于技术性的规范，从而越来越失去想象力、生命力与创造力。以貌似兴盛的新闻传播学为例，甘惜分、王中、方汉奇、宁树藩等先生代表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和自然畅达的文风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张冠李戴莫名其妙的舶来话语，以及“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故作高深。尤其是以科学、客观、价值中立面目盛行的实证研究，用一堆唬人数字和八股格式，将活生生的实践、活生生的世界和活生生的历史肢解得零七碎八，然后得出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劳什子竟成主流、正宗，鹊巢鸠占地排斥一切非我族类的学术传统，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日益成为一花独放一家独鸣。

比如，在这种潮流下，灵性、才情、文采等都仿佛来路不明的孤魂野鬼，统统被打入另册。也许新闻传播学界一向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故将一切无法纳入条分缕析并立竿见影的东西，如思想、洞见、悟性、才情、个性等一并归入所谓文采。当年协办《国际新闻界》时，希望秉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属于形式，百家属于内容，不管什么观点，不管什么形式，只要言之成理，言之有物，无不乐意采纳。而如今，学术似乎越来越模式化，美其名曰规范化——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言。结果是，每年发表盈箱累箧的文字，山积海纳的成果，而对学界业界真有意义的却不知几何。令人不解的是，如此繁荣昌盛何以唯独不能为特立独行的东西留下空间。这种局面，同当年“文革”之定于一尊不仅如出一辙，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当年的一尊毕竟还有思想争鸣和观点交锋，并为改革开放乃至中国道路留下值得反思的、

正面负面的遗产，而如今的一尊则往往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如量化的、实证的、符合科学理性的、遵循学术规范的、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的东西。这路研究有其价值，但并非唯一的价值，甚至不是主要的价值，尽管有人喜欢将其视为悠悠万世唯此唯大的价值。2007 年，在一次中外博士生论坛上，针对这股愈演愈烈的学风与文风，我特别提及学术的想象力：

博士生是一支学术的生力军，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学者，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学术的希望。开设这个学术论坛，也是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一方面探讨学术、碰撞思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为了激发想象力。因为，想象力是推进学术的原动力，没有想象力就不可能有学术的长足进展。

巧的是，昨天中国发射了第一颗探月卫星，名为"嫦娥一号"。嫦娥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美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和梦想，她在民间传说里毅然飞向月球。从此，嫦娥就成为中国文化里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象征，一个追逐理想、梦想与幻想的标志。围绕她的故事，产生许多美丽动人的诗章。比如，中国伟大的抒情诗人李商隐就写过一首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爱情诗歌《嫦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表达了类似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般通彻心扉的感情，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探求太空奥妙的无限想象力。

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博士生能够在各位尊敬的教授引导下，展开嫦娥奔月似的想象力，"让思想冲破牢笼"，在这个学术论坛上纵情翱翔。

以上这些话题——清华精神、桃李芬芳、如切如磋、教学相长和文化自觉，大致囊括了本书涉及的领域。不妨说，这部《清谭杂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基本上围绕这些话题而展开，无论大弦嘈嘈如急雨，还是小弦切切如私语，多属其思想变奏与精神交响。犹如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仿佛漫不经意，似乎随心所欲，而将主题甚至主题词兜兜转转，一再牵出，曲水流觞，自然而然。或者说，这些思想变奏与精神交响类似赵汀阳的"无立场方法论"：

无立场地去看问题就是游移地从每个立场去看问题，如水一般地从一个立场流变到另一个立场。在某种意义上，无立场可以

说是从老子的“水的方法论”中化出来的(老子最爱用水的暗喻)。也许读者会发现,在本书中,我的立场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问题上为不同的立场辩护,于是在各种观点之间形成自相矛盾。人类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反而是奇怪的,因此,每种道理本身必须是无矛盾的,各种道理之间又必须是互相矛盾的,这正是我要达到的思想效果。(《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导言)

但愿这些嘈嘈切切错杂弹的变奏与交响,也能弹拨出一点仙乐风飘耳暂明的意境。

骊歌声咽



将军一去　大树飘零

——纪念新闻教育家范敬宜①

在中国当代新闻界，范敬宜不仅是声誉卓著的新闻工作者，而且也是卓有建树的新闻教育家。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期间，他就涉足新闻教育，并培养了出类拔萃的新闻人才。2002年4月，出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以来，他更在新闻教育领域孜孜矻矻，用心耕耘，开辟了一片新天地，造就了一批风华正茂的新闻后备军。

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八年多时间里，范敬宜为清华的新闻传播学科确立了坚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奠定了"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基石，为新清华、新百年的新闻教育做出首屈一指的贡献，使年轻的学院短短几年即以跨越式发展跻身一流。与此同时，他还以普通教师的身份开新课、办讲座、批作业、带学生，呕心沥血，一丝不苟，在他心里，新闻学科、新闻教育、新闻研究等归根结底都在于培养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输送新鲜而健康的血液。在新闻教育方面，他不仅为清华的新闻传播学科铸就了精神与灵魂，而且也为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在近百年的中国新闻教育史上，以一流新闻人而献身新闻教育的大家代为不绝，包括五四时期的中共秘密党员、一代名记者邵飘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创立者、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和《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安岗，台湾世新大学的奠基人、一代报人成舍我等。范敬宜当之无愧地名列其中，在新闻教育的星空中熠熠生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八年，他除了确立学院的大政方针，把握

① 刊于《中国记者》2011年第1期。

办学的政治方向，主持重大的学科建设，还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多门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包括新闻评论、记者素养、新闻中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每次开课，他都认真地、一字一句地撰写讲稿，即使多次讲授的课程，每次开讲前依然不断修订、补充，讲稿周边往往写下密密麻麻的增订内容。对每位学生的作业，他同样认真地、一字一句地批阅，直到因病离开讲台。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辛苦劬劳，他为清华新闻学院师生及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留下一笔珍贵的遗产。总括起来，他对新闻教育的突出贡献，他给清华师生的深刻印象集中于两点。

其一，他大力倡导"面向主流"的办学方针和教育理念。在他看来，面向主流包括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的三个层次，一是面向主流媒体，二是面向主流领域，三是面向主流的价值观。这一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思想，是同他一贯坚持的媒体社会责任意识息息相通的，而这种意识既源于他一生的新闻实践——从《东北日报》到《辽宁日报》、从《经济日报》到《人民日报》，又源于费正清所言"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既源于一百多年来中国新闻人的优秀传统——从梁启超、邵飘萍、张季鸾到范长江、邓拓、穆青，从斯诺到他所尊敬的前辈和同事爱泼斯坦，又源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如其先祖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与情怀。

也就是在这种意识下，2005 年他将大二学生李强同学的社会调查报告《乡村八记》送给温家宝总理。温总理亲笔回信："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这也正是范敬宜新闻人生的精彩写照。如今，这段话已镌刻于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门廊，同范敬宜"如有来生，还做记者"的名言一道，成为莘莘学子的座右铭。

同样是在这种意识下，2005 年，他在全国数百家新闻院系率先开设了面向全体学生的课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聘请国内外一流新闻人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生动活泼地讲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这门如今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精品课的讲台上，他亲自为每届新生开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还主持了原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和现任总编辑何平、曾任"两会"新闻发言人吴建民等同志的讲座，对培育学生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产生了良好的效应。2007 年，在他的推动下，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

教育改革研究中心成立，他又出任首任中心主任。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对新闻学子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新闻观影响甚大，厥功至伟。

其二，他特别重视和一直强调新闻人的文化素养。2007 年，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届“文化讲坛”上，他专门论述了媒体浮躁与文化缺失问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他谈道：“我们的经济腾飞了，而文化却没有腾飞，荷包鼓了，而心灵却饥渴了。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要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兴和复位来实现这样的转变，媒体的责任非常重大，而转变的关键有赖于媒体本身的文化意识的提升。”这种强烈的文化意识既同他追求的中国道路、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若合一契，又应和着当今文化自觉的时代潮流，在全球化时代更是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味。至于如何加强文化修养、丰富文化底蕴，他特别强调的一是多读好书，二是懂点艺术，就像他所推崇的那些有文化的新闻大家：

> 从近百年的中国新闻史来看，凡是杰出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王韬、章太炎、梁启超、张季鸾，一直到毛泽东、瞿秋白、邹韬奋、恽逸群、胡乔木、乔冠华，等等，这些人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学养丰厚、才华横溢的文化人，政治品质和文化修养在他们的身上和笔下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们的作品尽管时过境迁，但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有味道，有的甚至百读不厌。

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文化修养、文化积累、文化底蕴等犹如五谷杂粮，只有广泛吸收才能健康成长，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仅靠“维生素片”。为此，他还专门开设了一门“新闻中的文化”课程。这是面向全校新生的研讨课（限选 15 人），迄今为止已经讲授六轮，受业学生将近百人。虽然由于健康原因，他的其他课程后来陆续停开，但“新闻中的文化”一直坚持至今。这门课上，他为学生讲诗词、书画、文化传统、新闻经典，讲物艺相通的道理，春风化雨，娓娓道来。2010 年春季学期，是他最后一次上“新闻中的文化”。4 月 12 日，16 位有幸选修这门课的同学聆听了他一生的最后一课。依据当时旁听此课的一位博士后追忆：

> 那天下午范老早早就来到学院（课程是三点二十开始，他大约两点四十左右就到了）。后来发现范老亲自准备了非常详细、长达数十页的提纲！完全是手写的！……当天的课程也很精彩！同学

们都亲切地喊他范爷爷！就在他要进入教室门口的一刹那，还有一位路过的外系女同学，一下子认出了范老，并快步走上前来，亲切地喊他范爷爷，还就学业等聊了几句！

就在那次“文化讲坛”上，他用自谦的“歪诗”概括了他对新闻与文化的追求：

生命之树长青，
文脉之源永恒。
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

百年清华，名师如云。将军一去，大树飘零。2010年11月13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范敬宜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清华新闻学院的师生无不哀痛，全国新闻教育界无不悲悼。被范敬宜执弟子礼的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第一时间发来短信——“哲人其萎”，表达了海内外同仁的共同心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高钢教授来信致意：“范院长对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将铭记我们的心中，也一定会铭刻在历史上。”就在他逝世前几天，清华大学刚刚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推荐他为“中国新闻教育贡献人物”。病榻上的范敬宜专门打电话给老伴，开心地说自己“得了一个新闻教育奖”。在他一生的诸多名衔里，这个奖项既是对他在新闻教育方面实至名归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代新闻大家的最后礼遇。



骊歌一曲意难分[①]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送别》

知道老范快走了，可没想到走得这么突然。除了天伦之爱，除了亲友之情，他也是带着对清华学子的深情挂念，带着对新闻事业的终生眷恋走的。

十天前，刚去北京医院看过他，道别的情景依稀就在眼前。音容宛在，而今已是天人永隔了。

当时，老范坚持让护理人员搀扶着站起来，送我们到病房门口。我一步一回头，望着他熟悉的身影，一直站在门前，依依不舍的样子。哪曾想，这一别竟成永诀！

老范，是熟知范敬宜的各界人士往常对他的习称，也是不同一般的尊称。他喜欢这个称呼，“就叫我老范好了”。他总是对人说。

由于职业习惯，我称他“范老师”，正式场合用“范院长”。范院长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自2002年春天履任，迄今已经八年有余。清华的新闻学子爱叫他“范爷爷”，《人民日报》驻澳门记者站站长傅旭写过一篇报道，题为《清华有个范爷爷》。

八年多来，他像当年在新闻战线一样，兢兢业业履行院长的职责，短短几年就使清华新闻传播学科跻身一流。2009年，教育部权威机构对全国高校学科进行评估，清华大学名列新闻传播学前三甲。

① 刊于《新闻记者》2010年第12期。标题选自范敬宜七律《告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老范慈眉善目，人缘一向很好，用一句有失尊敬的话说，“引车卖浆者流”也引他为好友。他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时，逢到下雨天，街边修自行车的师傅就打电话给他：“老范，下雨了，你带伞了吗？”

作为部级干部，老范配有专车，可他喜欢打车。他一些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就是在出租车上，同司机师傅闲聊得来的。以至于有时不免让人生疑：“如此鲜活的报道是真的吗？”

一次，他从清华打车回家，同司机聊了一路。到门口时，司机望着“部长楼”，困惑地看看身边的老范，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你原来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儿。”老范提起此事就开心不已：“人民群众的语言多么生动！”

老范生前极尽荣光。六十年国庆时，他又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一起阅兵。而他随身带的钱包里，终年夹着的一张照片却是当年“落难”时，同辽西父老乡亲的合影。2008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范敬宜文集》第一卷，他选用的照片也有这张。

难以想象，如此平易和蔼的老头儿，却是出身名门，家学渊源。1931 年，老范生于苏州吴县，是范仲淹的第二十八世嫡孙。父亲在上海交大读书时，与邹韬奋同班。母亲也是书香门第，曾师从章太炎、吴梅，工诗词，擅音律。外祖父为晚清举人，是新式学堂苏州草桥中学，即今天苏州一中的首任校长。后来的文学家叶圣陶、俞平伯，历史学家顾颉刚，画家吴湖帆等，都是这所名校的第一期学生。2005 年，《中华儿女》杂志发表文章《新闻大家——范敬宜》，开篇写道：

> 范敬宜，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他满怀才情、半生坎坷：幼年失怙，由母亲、姑母一起抚养长大；他自幼体弱多病，不能正常上学，却以一年的小学学历，神奇般考上大学（先入国学重镇“无锡国专”，1951 年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引者注），并达到了诗、书、画三绝的佳境；他 20 岁大学毕业瞒着家里只身前往东北，与夫人相遇并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26 岁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下放到最贫困的山区，直到 49 岁时才回到热爱的新闻行业……

此后故事，渐为人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先从《辽宁日报》副总编辑调任国家外文局局长，后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和《人民日报》总编辑。

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散文家梁衡，2008 年写了一篇《饱学与忧心——读范敬宜》，将他同两位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一位是其先祖范仲淹，一位是新中国初期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

> 年前我在刊物上读到他的《重修望海楼记》，大喜。其结尾处的六个排比，气势之宏，忧怀天下之切，令人过目难忘，真正是一个《岳阳楼记》的现代版。当世之人，我还少见可与并驾之笔。现抄于后："望其澎湃奔腾之势，则感世界潮流之变，而思何以应之；望其浩瀚广袤之状，则感孕育万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纳百川之广，则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望其神秘莫测之深，则感宇宙无尽之藏，而思何以宝之；望其波澜不惊之静，则感一碧万顷之美，而思何以致之；望其咆哮震怒之威，则感裂岸决堤之险，而思何以安之。"没有一生坎坷、满腹诗书，一腔忧心，何能有这样的文字？
>
> 人民日报十多位总编，自邓拓之后，其才学堪与其比者唯老范一人；范仲淹倡"先忧后乐"已千年，我身边亲历亲见，能躬行其道，又发之为文的新闻高官，唯老范一人。我只有用《岳阳楼记》的最后一句话来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老范半生坎坷，历经磨难，可他从不将自己的得失荣辱挂在嘴边，而总以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自我砥砺。新中国五十周年华诞前夕，他在《人民日报》发文《岳阳楼记我心中的灯》：

> 这篇千古名文，就像一盏明灯陪伴我走过了大半生崎岖不平的生活道路。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发生了根本变化。走出逆境，跨入顺境，好事接踵而至，难免喜形于色。当我被任命为《经济日报》总编辑时，马上写信向上海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报喜，信中自谦地说："多年荒疏，深恐难负重托"，本以为能使高堂高兴一番，不料母亲的回信却是："我觉得你是'其言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我劝你一句话：位高坠重，君可休矣！"一瓢冷水，把我浇得好心凉。冷静下来想想，母亲的话还是老祖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要我宠辱不惊，不要在顺境里冲昏头脑，忘乎所以。这番话，我至今难忘。

也许，正是这种超越自身，放眼天下的情怀，使他无论身处何地，总是保有平和、冲淡的心境。虽说当年曾由锦衣玉食跌进粗茶淡饭，从钟鸣鼎食落入茅屋草棚，可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好，用他自己的话说，连感冒都很少得。

谁料2007年，一场大病突如其来，若不是发病那天他的司机恰好在场，说不定当时就走了。去医院看他，老范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时候体弱多病，家人请算命先生卜过一卦，结果说了两点看来还都应验了。一是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向北发展”，一是说他76岁时会有一劫，也就是2007年。

此后，老范的身体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仿佛同医院结了缘似的，一会儿住院，一会儿出院，今年5月更是查出绝症！这个凶信，我是在他走前一个月才知道的，当时还在保密，包括他本人。骤闻此讯，心中愁云惨淡，一直郁结不散。

我2001年调入清华，就同老范打交道，学院成立后更辅佐他八年多。2001年，学校批准成立新闻学院，2002年校庆之际正式建院。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加自由的成长空间，清华也恰从2001年推行本科生转系制度，而试点就在新闻学院的前身人文学院传播系。于是从全校二年级学生中招收了一个新闻学转系班，三十五位同学，来自十六个专业，最是符合新闻教育的多学科背景。我来清华任教，适逢清华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本科班组建，便请缨担任了班主任。

这个“黄埔一期”成立后，进行了一周的开班教育，邀请三位名家，对学生进行专业启蒙，第一讲就是老范。他来那天异常炎热，教室没电扇，没空调，党委书记王建华教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台小电扇，放在讲台边，老范就站着一气讲了两三个小时。说实话，我后来没少听他讲话，但感觉好像都没有那天那么神采飞扬，一气呵成。了解老范的人知道，他的文章可入经典，而他平时不善言辞。

当日旁听的研究生刘鉴强，本是慕名而来，只想随便听听，结果听个开头，就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向身边同学借来纸笔，边听边记，后来整理成文，刊发于《新闻记者》杂志。讲座后有问答环节，出身英语专业的陆娅楠问道：范老师，如果有来生，您最想做什么呢？老范沉吟片刻：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最想当记者、干新闻。《新闻记者》刊发刘鉴强的文章时，就用这句话作标题——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从此，这句话便成为一届届清华新闻学子的座右铭。

这场“如有来生，还做记者”的讲座，在清华校内网上好评如潮。正在物色院长人选的校方，由此开始同他接触，从而玉成此事。在一篇《纪念新闻教育家范敬宜》的文章里，我对老范的清华八年做了如下概括：

> 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八年多时间里，范敬宜为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确立了坚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奠定了“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基石，为新清华、新百年的新闻教育做出首屈一指的贡献，使年轻的学院短短几年即以跨越式发展跻身一流。与此同时，他还以普通教师的身份开新课、办讲座、批作业、带学生，呕心沥血，一丝不苟，在他心里，新闻学科、新闻教育、新闻研究等归根结底都在于培养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输送新鲜而健康的血液。在新闻教育方面，他不仅为清华的新闻传播学科铸就了精神与灵魂，而且也为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
> 在近百年的中国新闻教育史上，以一流新闻人而献身新闻教育的大家代为不绝，包括五四时期的中共秘密党员、一代名记者邵飘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创立者、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和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安岗，台湾世新大学的奠基人、一代报人成舍我等。范敬宜当之无愧地名列其中，在新闻教育的星空中熠熠生辉。
>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八年，他除了确立学院的大政方针，把握办学的政治方向，主持重大的学科建设，还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多门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包括新闻评论、记者素养、新闻中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每次开课，他都认真地、一字一句地撰写讲稿，即使多次讲授的课程，每次开讲前依然不断修订、补充，讲稿周边往往写下密密麻麻的增订内容。对每位学生的作业，他同样认真地、一字一句地批阅，直到因病离开讲台。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辛苦劬劳，他为清华新闻学院师生及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留下一笔珍贵的遗产。

清华的遗产凝聚在一些经典的话语里，包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等。同样，老范留给清华新闻学院的遗产也集中在他的一些名言中：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学

习如吃饭，得靠五谷杂粮，不能只吃维生素片；不要只盯着眼前巴掌大的地盘，而要放眼960万平方公里……

如今，聘请名流做院长似乎相沿成风。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听到类似探问：“老范在清华怎么样？是不是也挂个名，平时不怎么来？”

每次听到这种议论，我都忍不住为老范一辩。他不仅是名副其实的院长，审时度势，燮理阴阳，而且是难得的老师，教书育人，全心全意。他对每门课、每堂课都全力以赴，用心备课，认真授课，还一篇篇批改作业。说实话，我们这些多年的教书匠，有时都自愧不如。

一次，我劝他，你年事已高，需要应对的事又很多，学院给你配了助教，批改作业一类的事情就让助教去做吧。要知道，老范的助教里，包括现任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周庆安博士、《经济日报》副刊部文化新闻编辑室副主任乔申颖等，水平绰绰有余。不过，他当时讲了一段她母亲的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时时引以为训。

老范的母亲是一位教师。小时候，他记忆最深的情景之一，就是每晚母亲桌前的灯光与母亲备课、批改作业的身影。一天晚上，母亲又是挑灯熬夜，弄得很晚。他已睡了几觉，醒来看到母亲还在伏案工作，就唤母亲早点休息。说了一遍，母亲没有反应，再说一遍，还没反应。不知说到几遍时，母亲突然站起身来，走到床前，把他的被子一下掀了个精光，呵斥道：催什么！明天学生还等着我的批语呢！

老范走了，学生将他的批语晒到网上，珍贵可比“文物”。看到他点评的作业照片，不少人惊叹：一行行清秀、雅洁的行楷，标注着对学生作业的意见，也体现着为人师表的用心。学生说道：“真是‘总编辑手记’啊。”

老范对学生的关心、爱心、热心，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点点滴滴，一言难尽。2005年春天，当我将大二学生李强的《乡村八记》交给他时，他的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 我怀着惊异的心情，用了整整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李强同学这篇农村调查报告，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老范一边写了千字评语，一边逐字逐句修改一些差错。后来的故事由于媒体报道广为人知：先是老范将《乡村八记》送给温家宝总理，温总理为此亲笔复信，接着《人民日报》刊发温总理复信，以及《乡村八记》第一记《二姨家的收支明细账》，各家媒体围绕这个话题而形成一个

报道热潮。2007 年，李强师从老范，攻读研究生，2009 年毕业，成为《人民日报》记者。如今，温总理复信中的一段话，已经镌刻在清华新闻学院的门厅：

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

而这，也正是老范新闻人生的精彩写照。

老范既是痴心不改的新闻人，又是家学渊源的文化人，诗、书、画均称擅场。2009 年国庆六十周年期间，我给老范打电话，想见见他，聊聊天。他欣然应允，约在他家附近的清香林茶社，那是他接待各路人士的固定“据点”。

一见面，他就掏出一卷赠我的书法作品，打开一看，喜出望外，原来是我向他索求的范仲淹《岳阳楼记》。此事在他健康时提过，已经过去几年，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我早不抱希望，也不忍再问。没想到今日竟有如此收获。细看落款，居然是头天晚上刚写的，似乎心有灵犀一般。《岳阳楼记》自是千古名文，书法也属当世一绝。最令人击节叹赏的，还有老范的题跋：

先祖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陲为良将，在庙堂为贤相，在文坛为大家，所撰《岳阳楼记》光昭日月，传诵千古，诚可谓不朽之人，不朽之文。

今年重阳时节，登高望远之后，我又细细欣赏了一番这幅佳作，再次叹服：诚可谓不朽之文，不朽之人，不朽之跋呀。

半个月后，去医院看他，也谈起字与跋。老范去世后，他的得意门生姜琳告诉我：“范老师给许多人写过这幅字，而给你的最用心。”我推测，说不定也是老人家平生最后一幅《岳阳楼记》的手迹呢。

那天，在北京医院宁静、宽敞的病房里，我们聊的最多的还是学生。自从今年毕业典礼后，我还是第一次见他。除了消瘦、虚弱一点，感觉变化不大。他双腿盘坐病床，聊了一个多小时。其间曾想告辞，让他休息，他还不让走，“再说一会儿，再说一会儿”。那样子，就像憨态可掬的孩子。

我知道，老范最挂念的是学生，最想听的是学生的事情。于是就挖空心思地想，谁谁谁又受了什么表彰，谁谁谁又怎么样了，听到这些事

情，他总是很高兴。我还拿起他床头的《人民日报》，随手一翻，就有几位清华学子采写的报道：陆娅楠、左娅、曹树林、廖正军……其间，陆娅楠正巧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问他晚上想吃什么，下班后给他做了送来。老范提起来喜滋滋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道别时，他站起身，走了几步，让我们看看他的状况，说就是这个样子了，便又坐回床上。想到他的病情吉凶难卜，我强忍着泪水，握住老范手臂，叮嘱他多多保重，有机会再来看他。后来读到梁衡的一篇悼文，那种生离死别的情状真是心有戚戚：

> 从医院里看范敬宜同志回来，第三天就收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们是很熟的曾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但那天去看他时，却几乎是相对无言。过去常说的话题，如写作，如社会上的事，如新闻业务，都已无力再谈；而病情，相照不宣，又谁也不愿提及，不敢提及。我极难过，生离死别，竟是这个样子。又怕他累，说了一点不着边际的话，就赶快退了出来。

老范除了担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还兼任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另外，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兼职教授。他在武汉大学带的研究生王慧敏，已是《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社长。

烟台大学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同援建的，故设有“两校名师讲堂”。2003 年和 2005 年，老范曾两次登临这个系列讲座。他兼任名誉院长的人文学院有新闻系，每年记者节都举行“记者周”活动。

今年记者周期间，我应邀前往那里，在“两校名师讲堂”做了两场报告。其间有学生问到“为什么现在没有名记者”。我回答说：是不是名记者，先得看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在我看来，当代不乏了不起的新闻人，如我们的院长、贵院的名誉院长范敬宜等。然后，我简单谈了老范的一生。而谁知翌日，老范竟驾鹤仙逝。

15 日，烟大新闻学教授谭诚训在记者周闭幕后来信：

> 今晚我们新闻系举行记者节闭幕式，一开始我们即播放学生们临时制作的范敬宜先生的纪录片，片中还完整地播放范先生给我们讲座时用古音吟唱的《岳阳楼记》。齐老师带着范先生给她的题诗动情地回忆了她与先生的交往。齐老师告诉同学，她讲话站立的地方就是当年范先生给烟大新闻学子讲座的地方。学生们还

朗诵诗歌深情缅怀范先生。范先生去世这两天我心中总感隐隐作痛，清华人特别是贵院师生的悲痛之情更是可想而知。

看似偶然又诡异的是，我下榻烟大的13日凌晨一点多，突闻手机铃响，是学院门卫打来的，报告“清华学堂失火”，而且火势即将殃及新闻学院院馆。我的震惊，难以名状。清华学堂啊！那可是清华人的圣殿。

13日上午烟大师友陪我去威海卫的刘公岛。想起学堂，心情郁郁。岛上有家影院，循环播放甲午海战的片子，我们进去时已接近尾声。随着刺目的落日余晖，映照尸身漂浮、舰体横斜的海面，低沉凄楚的画外音缓缓吟出光绪的题词——今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仿佛一语成谶，这句话后来被我用于学院吊唁灵堂的留言。

13日下午两点多乘班机回京，刚一落地，就接到电话，请马上赶回学院开会，一瞬间还以为事关学堂，谁知竟听到“范院长中午去世”的噩耗！路上，不断接到学生、同事、师友的电话、短信：

得知范爷爷去世的消息，很是悲伤……老师想必更加伤心，请老师节哀。

李老师，惊闻范爷爷走了，是真的么？看到清华学堂失火，扼腕叹息，难道真是祸不单行？

李老师，刚刚得知范爷爷去世的噩耗，很难过。唉，真是多事之秋啊！

大楼浴火，大师也走了……

这不是院长过世了，就是自己家的爷爷过世了，自己家的家人啊！怎么能不难过呢？

从网上得知范爷爷去世的消息，又适逢学堂被烧，实在是让人一时难以接受。我远不算跟范爷爷最亲近的学生，但是我们这些学生中又有谁跟他不亲近呢？

李老师，通过您昨天的讲座，我们认识了范敬宜老先生，今天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身边的同学都很难过，因为国家又失去了一个大师……

第一场冬雪中惊闻范老去世，天地苍茫，深深怀念。

刚刚从手机报上看到消息，范敬宜老仙逝，深感沉痛。范老博学多才，为人宽厚，乃大家风范。我虽与他不熟络，但心怀敬意。范老的逝世是当今中国新闻教育的一大损失。

……

由于在圣约翰大学听过其授课而一直被老范执弟子礼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教授，第一时间发来短信“哲人其萎”，言简意赅，情真意切！几乎与此同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代表宋超院长来电致意；武汉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石一彬教授询问丧事安排……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高钢教授来信：“范院长对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将铭记我们的心中，也一定会铭刻在历史上。”

清华新闻学院师生络绎吊唁，熊澄宇教授给老师群发邮件：

> 孔子的仁爱
> 墨子的坚忍
> 老子的深邃
> 庄子的豁达
> 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者，范老是也。

2009年学院毕业的新华社记者周劼人，采写了新华社通稿《网悼“范爷爷”：大学生敬爱什么样的高校“官员”》。事后说道：

> 一晚上，真的是边写边哭，无法继续。
>
> 写到凌晨6点，初稿出来，睡到8点继续写。中途真的想放弃了，因为不断补充采访的时候，师兄师姐电话打着打着，他们就泣不成声，或是一片沉默。从来没在这样的状态中写过稿子。

老范在新闻评论课上讲过，他欣赏司马迁那些“太史公曰”，寥寥几笔，形神毕现，如对飞将军李广的评价就堪称新闻评论的典范。如今想来，这段传颂千古的评语，不也同样适用于老范本人嘛：

>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史记·李将军列传》）

老范在讲新闻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时，爱引成都武侯祠的那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的新闻人生功德圆满，犹如诸葛武侯的三分天下，定鼎蜀中。而他在新闻教育领域的追求却似未竟之业，好比

六出祁山，一统中原。每念及此，怎不黯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老范走了，走得突然，也走得安然。中国士大夫向来尊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入世则天下苍生、国计民瘼，出世则一切放下、顺生知命。脍炙人口的《敬宜笔记》有篇《曰归曰归曰未归》，著录了其外公晚年的一首《水调歌头》，那种乐天知命、幽默豁达的情怀令人过目难忘。当时还曾就此同老范切磋，如今想来字里行间同样体现了他达者知命的人生境界，如此一想，也就多少释然了：

日者谓余岁数当尽，然耶否耶，姑拈此解以当话别。天地有情，江山不老，息壤在彼，觉岸匪遥。证无生于佛法，还我本来；效祈死之祝宗，则吾岂敢。

修短本前定，
底欲苦留连。
十洲三岛假耳，
甚处有真仙？
报道先生归去，
不待杏花春雨，
撒手便人天。
睡美得佳趣，
何况是长眠！

别妻儿，
辞戚友，
莫迟延。
百年草草如客，
及此话离筵。
若论文章政事，
交卷一张白纸，
只索付云烟。
为问后来者，
大梦觉谁先？

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巽叟戏笔

主流话题：追忆范敬宜院长[①]

2002年春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成立，院长范敬宜就代表学院提出“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理念，在业界学界别开生面，先声夺人。如今，这句话已成清华新闻传播的标志，获得各方嘉许，对学院跨越式发展产生首屈一指的影响。2010年毕业典礼开始前，在他的办公室聊天，又谈及这个话题。他一如既往地谦称，学院工作都靠你们在支撑着，自己没有做什么，我说：你不仅为学院付出点点滴滴的心血，而且更在战略性、方向性上确立了意义深远的大政方针。

我与范敬宜相识于清华园，也相知于清华园，可谓忘年之交，相见恨晚。我们的价值观与新闻观每每相通，包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所以，许多时候，许多事情，我们心有灵犀，若合一契，特别是“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理念。对这一办学理念及其内涵，我作为他的助手，有幸参与、推动并见证了其孕育发展的全过程。

2001年暮春时节，我刚刚调入清华，曾不止一次听闻“入主流”的提法。这是学校筹建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新闻传播学科的指导思路，明确宣示这方面同其他学科一样，不会剑走偏锋，不会在“边缘”“特色”地带打游击，而势将进入学科的主战场，并作出自己的更大贡献。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不久接任党委书记的陈希同志（日前调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以及党委副书记兼人文学院院长的胡显章教授，对“入主流”的建院思想多有阐述。对此，我印象深刻并表认同。我理解，所谓主流，既关乎学界，又涉及业界，既涵盖专业领域，又应和时代潮流，而唯有与时代和专业的主流融为一体，才无愧清华的传统、清华的定位、

① 刊于《中国出版》2010年第12期。

清华的令誉。

不久,由于范敬宜在清华第一个新闻学本科班的演讲引起关注(《新闻记者》以"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刊发),陈希、胡显章与王建华三人前往拜访,名义上是征求他对筹建学院的意见,实际上是物色和考察院长的人选,故也算一次三(人)顾茅庐。正是在这次把谈甚欢的"草庐对"里,他的一席话使三位负责筹建学院的领导确认院长非他莫属了。根据后来的不同转述,当时范敬宜主要谈了如下意思:清华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高校,不办新闻教育则已,要办就得培养未来中国新闻界的主力军,而非一般化人才。其间以及之后,他多次用"高手"一词表达他的这个心意。

其实,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一流的新闻院系无不希望并努力造就"高手",那些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新闻学府更是如此,如新闻教育的"三巨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1929 年成立、目前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直将"两典一笔"作为传家宝,注重经典与古典的研读,强调文笔的训练。我在其他院校担任行政职务时,同样希望造就一些不世之才,即当年老领导项德生教授说的:政治素质再硬一些、文化底蕴再厚一些、专业能力再强一些、报道水平再高一些。所以,我对范敬宜的高手之论由衷赞同,并落实于具体的教学及管理工作之中。

2002 年 4 月 21 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如期成立,范敬宜教授从校长王大中院士手中接过首任院长的聘书。此前我曾受命,为他起草一份大会致辞。致辞一气呵成,请他过目,而他的意见竟是一字不改,照单全收,只在最后一段添加了几句关于个人的文字,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 杜甫在他的诗里说过,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我正是以古稀之年出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这使我既感到不胜光荣,又感到几分忐忑,同时倍感责任重大,深恐有负重托。许多朋友都知道,我五十年的新闻生涯是在坎坷和曲折中度过的,因此我特别珍惜今天时代给予我的机遇,赋予我的责任。二十年前,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是我命运发生转机的时刻,我写过一首述怀的诗,最后两句是:"自怜去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

华年二十去如飞，我没有想到即将偃旗息鼓的时候，又面临一个新的“战场”，一场新的挑战。此时此刻，似乎什么话都难以表达我的万般心曲，想来想去，惟有用先祖范仲淹的名句来激励自己以及全院师生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谢谢大家！

学院成立，我以院长助理协助本科教学事宜。当时，各种工作头绪繁杂，我爱说草创之际，百废待兴。一次，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德高望重的丁淦林先生听我这么说，随口插一句：贵院都是好事嘛，何废之有啊。我恍然而悟，从此改口百业待兴。百业之中，首屈一指的当然是人才培养问题，特别是作为基础的本科教学。如何体现清华的“入主流”，如何贯彻老范的“高手说”，如何在古今中外新闻教育的历史上开拓清华道路，诸如此类问题无不现实而急迫地摆在眼前。为此，由常务副院长胡显章教授和党委书记王建华教授组织，学院几次召开工作会议，全体老师一同研讨，审时度势，细致入微，围绕办学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达成共识，并形成学院的第一个本科培养方案。这个方案从 2003 年入学的新闻 3 班，即《乡村八记》作者李强同学所在的班级开始实施，已经惠及 8 届学子。

大学教育，本科为主，本科教育，方案为先。所以，这个培养方案一出来，学生也挺关注。某日，学生媒体《清新时报》的记者前来采访，希望我谈谈这个方案的基本思路与内在理念，我也想借机将学院的办学方针宣示一下。于是，聊了一下午，晚上又聚餐细谈。不过，稿子出来后不甚理想，有点拘泥于技术环节，而对教育思想与专业理念关注不够。这也难怪，毕竟是学生记者，对新闻教育及新闻学科难免隔膜。不得已只得自己操刀，以自问自答形式重起炉灶。稿子完成后，又为题目犯难，后来突然灵机一动，想起“面向主流，培育高手”一语，可将学校的“入主流”与老范的“高手说”融为一体。这篇《面向“主流” 培育“高手”——我院本科教改掠影》，刊发于《清新时报》2003 年第五期。从此，“面向主流，培养高手”逐渐成为一句熟语。这里最初用的是“培育”，因为清华以育人为本，人才以培育为主。后来，阴错阳差，演为“培养”。好在培育、培养差不多，也无关紧要了。

2003 年记者节期间，《清新时报》刊出老范的一首七绝《贺清新时报创刊一周年》：

报龄虽短源流长，一纸风行播墨香。
水木清华多俊秀，相期高手出蝉堂。

2005年第9期《新闻战线》，以配发编者按以及作者照片的罕见编排，突出刊发了胡显章常务副院长的一篇文章《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对清华新闻教育及人才培养做了系统阐述，又为“面向主流，培养高手”注入“素质为本，实践为用”的内涵，从而使这个口号或理念更加全面、准确、科学。清华自来注重通识教育，梅贻琦校长早就说过“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而如今清华本科教育更是明确提出“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至于新闻教育的实践性以及知行合一等理念，无不重视实践在化育人才过程中的意义。从此，“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思想与教育理念就算正式成形。

概括地讲，这个十六字方针主要包含四个关键词——素质、实践、主流和高手。关于素质、实践、高手等一般没有异议，而对何谓主流则有不尽相同的理解。范敬宜院长曾在一次开学典礼上说道，最初讲的主流主要指主流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省市级党报媒体等。后来，将主流的范围扩展为主流岗位，凡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及其岗位都在所说主流之列，包括下基层，做村官等。再后来，认识又进一步深入，从具象的层面拓展到抽象的领域，又形成主流意识的共识。换句话说，现在说的面向主流，首先着眼于主流意识，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新闻观等；其次是主流岗位，包括携笔从戎、投身西部等一切报效国家的选择均属此类；最后才是主流媒体，涉及中央与地方所有关乎国计民生的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网站等。

由于这一正确的办学理念，清华的新闻传播学科得到跨越式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均获得广泛关注或好评。特别是一批清华新闻人，开始活跃于中外媒体，成为一支朝气蓬勃的后备军，有些学生都已获得中国新闻奖。这里，不妨说说三位在校女生的故事。第一位是2000级的刘蓁，她的实习作品《黄河第一大坝50年纷争》被《新华文摘》转载，在我印象中算是第一篇入选中国第一刊的本科生文稿。第二位是2005级的周劼人，她在中国青年报的实习作品《寂静钱钟书》，入选福建省2009年高考语文阅读题。第三位是2007级的

李燕茜，2010 年 6 月，她以《清新时报》总编辑和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执行主席身份，出席多伦多 G20 峰会，受到胡锦涛接见，交谈约二十分钟。此外，一批新闻学子也进入不同的主流岗位，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良好素质而得到认可。2010 年，“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05 级的贾娜同学获此殊荣。2007 年，贾娜应征入伍，携笔从戎，成为清华园第一位入伍的女大学生。在东海舰队两年的军旅生涯里，她以优异表现荣立三等功，《解放军报》为此发表报道《清华学子的海军梦》。如今，她已成为新闻学院的一名国防生，希望毕业后重返部队。

为了培育学生的主流意识，范敬宜院长亲自挂帅，在全国新闻院系率先开设了面向全体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以他在业界和政界的资望，邀集各路人士如南振中、赵启正、吴建民、何平等，以自己的新闻经历与鲜活经验，畅谈人生观、价值观和新闻观，对学生的思想意识和专业意识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西子湖畔的新潮女生周劼人，入学时的目标只是过小日子挣大钱。而经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相关专业教育，毕业时脱胎换骨，判若两人，并以出色成绩顺利进入新华社。2009 年，她代表毕业生在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言，表达了自己以及许多清华新闻学子的共同心声：

> 作为清华新闻人，我们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印记？有人说，是扎实的学识涵养，是过硬的专业技能，是丰富的实践经验，等等。而在我看来，学院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还是一种“精气神儿”。
>
> 正如范爷爷和我的老师常常提到的，这种“精气神儿”是对社会和人民的责任，是对历史与时代的担承，是中国新闻人永远的“光荣与梦想”。
>
> 今年五四青年节，温总理与我们座谈时再次提起当初回复范爷爷的信里谈到的意思：“一个青年对社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一个新闻工作者对社会也要有强烈的责任感。我认为这种责任感的来源，就在于对国家的深刻了解和对人民深深的爱。没有这两条，责任感的基础就是不牢固的。”
>
> 大学时代过去了，我们也终于明白，正是这种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深刻体察和深切关怀，才是我们身上永恒的标签，也是学院几年栽培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2007年,清华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范敬宜院长兼任中心主任。同年,我们一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汇集了我们这门课上的精彩演讲。与此同时,还出版了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拓展读本》。一位山东大学的学生在图书馆无意间看到本书,翻阅之后发来邮件:

《十五讲》彻底改变了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看法。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估计又是陈词滥调”,但经过一线记者现身说法,学者的严密表述,在我面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突然有了鲜活的面孔。刚刚读完《拓展读本》中甘阳的《新时代的“通三统”》,受益匪浅。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成功有过思索,这篇文章以开阔的历史角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角度。我是一直带着会心的微笑读完这篇文章,这里有一种久违的思考的乐趣。

真的希望你们能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个系列进行下去,我想这一定代表了很多关心中国现实,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热爱新闻事业的读者的心声。

本来还想在范院长的领导下,继续拓展这个“主流话题”。就像这篇文字原是本书前言“清华十年”的最后一部分,同清华精神、桃李芬芳、如切如磋、教学相长、文化自觉等相并列,而“清华十年”写于2010年暑假期间,计划同新版“清潭杂俎”一起作为百年校庆的一点心意。谁料,这一切竟在2010年11月13日13点42分戛然而止: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新闻宣传战线和新闻教育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中国当代著名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11月13日13时42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79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讣告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段历史仿佛就此终结,正如古调吟诵的《岳阳楼记》已成绝唱。许多人说,范敬宜是本大书,合上后才知内涵有多么丰厚,可惜再没有机会翻开了。

学院请我草拟一副挽联,神思恍惚之际,勉强凑了一句——今生无

悔做记者，来世有缘聚清华。贵州施秉县有座北关头桥，上刻一副桥联，也许更能寄托哀思：

> 说一声去也，送别桥头，叹万里长驱，过桥便入天涯路；
> 盼今日归哉，迎来道左，喜故人见面，握手还疑梦里逢。
> ……



范敬宜与作文章[①]

2005 年 4 月 28 日，针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二学生李强的农村调查报告《乡村八记》，温家宝总理复信范敬宜院长：

敬宜同志：

三月卅日的信及所附李强《乡村八记》早已收到，迟复为歉。《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你的几封信都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鼓励，深为感谢。专此奉复。敬颂教安。

温总理信里所言新闻工作的原则意见，不妨说也是范敬宜新闻人生的精彩写照。“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责任心及其由来——“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等，用于范敬宜身上无不丝丝入扣，若合一契。

近年来，沉渣泛起的党八股、洋八股有愈演愈烈之势。习近平 2010 年 5 月在《求是》杂志撰文，专门论述文风问题，强调克服不良文风，倡导优良文风。本文即围绕范敬宜作文章的话题略述一二，也望对新闻界文风有所启发。

我与范敬宜共事八年，耳濡目染，受益良多。不止一人谈到，他像一本耐人咀嚼的书，可以汲取点点滴滴的精神养料，包括“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一日，临睡前翻书，拿起新得的《敬宜笔记》。这是他从人

① 刊于《新闻与写作》2011 年第 1 期

民日报总编辑卸任后，为《新民晚报》“夜光杯”专栏写的文章，篇幅不长，不过千言。当时已是午夜时分，本想翻几篇“闲文”倒头而睡，哪曾想越看越上瘾，竟至一夜未眠。后来我对他说：你可把我“害惨了”！他的这等“大手笔，小文章”，不仅意蕴丰赡，但觉春风杨柳万千条，而且文辞隽永，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范敬宜常被视为“才子”，这个评价或印象固然不错，但并不全面。才子者，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文采风流，锦心绣口也。范敬宜固然不乏这等才情，但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特别是“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人生阅历，以及后来参知国务、政治修养日渐纯熟等，其人其文已非才子所能涵盖了。他在为我书写的《岳阳楼记》后面，有这样一段题跋：

> 先祖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陲为良将，在庙堂为贤相，在文坛为大家，所撰《岳阳楼记》光昭日月，传诵千古，诚可谓不朽之人，不朽之文。

这既是对其先祖范仲淹及《岳阳楼记》的望风追慕，也是对自己胸襟怀抱的自然抒发。这等胸怀与境界便使他的文章除了骚人墨客的才华，更富有朴素实在而博大深沉的社会政治蕴涵，诚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盖棺定论——江南才子不书生。

就文字而言，他的当行本领自然在于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此外他对其他文体也能从容驾驭，尤其晚年更臻化境，可谓“庾信文章老更成”。2007 年，他的一篇《重修望海楼记》，被同属记者出身的文坛大家梁衡称为现代版《岳阳楼记》，文后那组排句也可谓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 望其澎湃奔腾之势，则感世界潮流之变，而思何以应之；望其浩瀚广袤之状，则感孕育万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纳百川之广，则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望其神秘莫测之深，则感宇宙无尽之藏，而思何以宝之；望其波澜不惊之静，则感一碧万顷之美，而思何以致之；望其咆哮震怒之威，则感裂岸决堤之险，而思何以安之。

2005 年，他为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的文集作序《新闻岂无学 典范在咫尺》，典雅高古，气势恢宏，寥寥八百字既书写了中国新闻史的风云画卷，又勾勒了李庄的新闻人生，学界中人也不禁拍案称奇，叹为

观止：

吾闻夫：有非常之时势，必有非常之人物；有非常之人物，乃有非常之文章。证之近代华夏报史，其言信然。溯自鸦片战争以降，国运衰微，人心思变，报业遂因时而兴。于焉嵚崎卓荦之士，风起云涌，灿若群星。其前，有王韬、梁启超、章太炎、邵飘萍、瞿秋白、张季鸾、邹韬奋等为之先驱，怀救国忧民之心，挟横扫千军之笔，雄辞伟论，振聋发聩。其后，有范长江、胡乔木、恽逸群、邓拓、吴冷西、乔冠华、刘白羽、华山、穆青等为之后继，崛起于寇深祸亟、民族危亡之际。或驰骋于抗日救国、民族解放之疆场，或纵横于环境险恶、血雨腥风之敌后，铁骨贞怀，不愧一代英杰。至若乱世能横戈立马，以笔代枪；盛世能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以其文、其声感召万众者，不可胜计，其间卓然特立者，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等前辈是也。

公少怀大志，敏悟好学，且虚怀若谷，恂恂然有古君子之风。丁丑事变，华北沦陷，半壁江山沦于水深火热之中。公奋起投笔从戎，随我军转战太行，为战地记者中倚马之才。定鼎之初，朝战爆发，公领命前方，不避艰危，为率团入朝采访第一人，出生入死，佳作迭出而名噪一时。公倾力参与《人民日报》之创建、兴革、发展，凡半世纪，建树卓著，道德文章皆为世所重。尤可贵者，数十年间虽事务冗繁，犹笔耕不辍，常殷殷告诫后学曰：吾辈勿忘终身红蓝两笔并用。即离休之后，犹每日黎明即起，俯仰平生，心追手录，时有警世之作，未尝有一日闲居，其勤奋过人有如此者。（《人民日报》2005 年 4 月 8 日）

以我的粗浅了解，范敬宜的文字有三点尤为突出，并由浅入深形成三个层面。

其一，朴实无华而蕴含深厚的文风。

范敬宜的文字，看起来总是那么平易近人，而且意味深长，犹如醇香宜人的陈年老窖。用季羡林评价《敬宜笔记》的话说，“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可以称之为‘四真之境’”。

朴实无华而蕴含深厚的文风并非天生，而是经过人生的锤炼、岁月的淘洗及写作上的步步推敲形成的。早年，他在《东北日报》刚做记者

时，还不免骋才使气。一次，报社派他采访国际知名的舞蹈艺术家乌兰诺娃，回来后他才思泉涌，挥笔写了一篇花团锦簇的报道。没想到，一位老同志看后说了句："涂粉太厚，未必是美。"这八个字让他铭记在心，终身难忘。

他曾屡屡深情地谈道，当年从根据地走来的一批老革命，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作风踏实，文风质朴，使他受到不同于书斋教育的熏染。听他谈及这些往事，我就不由想起新闻史上的里程碑——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由此形成的实事求是作风以及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风，确属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弥足珍贵的一笔遗产。改革开放以来，浸淫欧风美雨之际，我们是不是也将一些优良传统弃如敝屣呢？当年青年范敬宜曾经受惠于此，如今的新闻人也应该可以从中获益吧。

至少，范敬宜在清华倡导面向主流的教育理念时，也将这样的传统与精神注入新闻教育，从而使新闻学子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同时，还更深切、更自觉地传习优良传统，包括朴实、鲜活、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风。李强同学的《乡村八记》固然是个典型，2010 年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的 10 位研究生，参加"延安新闻夏令营"活动，同样写出一批"记事真切、细致、生动"的佳作，如彭茜同学的《"苹果大王"王忠富》，研究生毕业的刘鉴强更以一部厚重的《天珠——藏人传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进一步践行了这种优良传统。

其二，辩证的认识论、方法论。

文风总是同学风、作风相联系的。没有实事求是的学风、作风，也就难有朴素真切的文风。范敬宜的文风、文笔等层面之下，是实事求是的学风、作风，其中最突出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当属辩证的认识论、方法论。他的名言——"人不求全，求全则天下无可用之才；文不求同，求同则天下无可读之章"，即为一例。他的成名作《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则是这种认识论、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原经济日报记者詹国枢在《恩师老范》一文里记述的小故事，或许更能直接说明这一点：

次年初冬(1991 年夏的一天——按《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发表于 1991 年 8 月 15 日而非冬季)，老范来到工交部，交下一紧急任务，立即动手，写一述评，专论如何搞活国有企业！

小詹得令，未敢怠慢，奋笔疾书，又得一文，取名《如何把企业搞死》。意即无死哪得有生，国有企业生得太多，却无一能死，则国企难以搞活矣。交至老范案头。老范看毕，沉吟片刻道，文章很好，题目不行，下午来吧，另取一名，不但要好，还得要巧，让人们过目难忘，让文章一炮打响。下午，老范打来电话，小詹推门，但见《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一行范式秀丽行书，已然置于案头。次日头版头条，隆重推出，果然一炮而红，轰动一时。(《青年记者》2010年第13期)

显然，“如何把企业搞死”既有新闻的噱头，又不违当时的精神，可惜难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经过范敬宜修改的标题顿觉画龙点睛，而这等佳构归根结底还在于辩证的认识论、方法论。他曾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谈道：“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不大考虑新闻艺术处理的效果。通病就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只知道大开大合，不知道以小胜大；只知道浓墨重彩写英雄，不知道轻描淡写也可以写英雄；只知道浓眉大眼是美，不懂得眉清目秀也是一种美；只知道响鼓重锤，不懂得点到为止；只知道大雨倾盆，不知道润物无声。”(《如果有来世，还是做记者——范敬宜谈新闻记者的修养》)

他还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堂上，屡次同清华学子谈及早年的一段经历。当初大学毕业，分到《东北日报》工作，领导找新人谈话，提到“立场、观点、方法”。他听到这里觉得很新鲜，请重复一下，然后郑重其事地记下来。当时，他连“立场、观点、方法”的次序都搞不清楚，被人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等到多年后执掌中央媒体时，他已对辩证的认识论、方法论了然于胸、炉火纯青了。即使如此，他依然经常琢磨“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

199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人过六十学说话》：“人到晚年，万事休歇，不免俯仰平生，总结得失，这时忽然感悟：尽管在报海里沉浮了几十年，其实还没有怎么学会说话。”这里所说的“不会说话”，主要是指不会说群众能听懂、能接受、能入耳入脑入心的话。俗话说“一句话，千样说”，同样的一句话，可以把人说乐了，也可以把人说恼了。在说话问题上，好心不一定就有好报，这里有学问，有艺术。毛主席常说：语言是不好学的，要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

习。作为新闻工作者,要随时随地注意学习群众的语言艺术。比如,有一次我从郑州乘火车回北京,一路上憋着没有抽烟,等到车过丰台,列车员开始打扫车厢,我才问一位女列车员:“同志,现在可以抽烟了吗?”她态度非常和蔼地说:“什么时候都可以抽,不过要劳您多走几步,到两节车厢之间去。”我一听就笑了,明明还是不允许在车厢里抽烟,可是说得委婉动听,去掉一“不”字,效果比生硬的“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抽”要好得多。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其三,博大幽远的人生境界。

除了文字表达及其风格,除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方法论,写作及文风更进一步说来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古人云,文如其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范敬宜文字的第三个层面,其实也在这种境界。没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襟抱与胸怀,也难以进入出神入化而超凡脱俗的境界。2006 年,范敬宜为其忘年交爱泼斯坦 90 寿辰而作的《广阔背景下的理性思考——听爱泼斯坦生日答谢词有感》,既是一篇意味深长的佳作,朴素而深沉,蕴藉而大气,也在敬慕爱泼斯坦之际体现了这种博大幽远的人生境界:

我本来以为,爱泼斯坦一定会豪情满怀地回顾他在中国七十多年波澜壮阔的新闻生涯,追述自己在中国人民最艰难的岁月,如何通过打字机和照相机向全世界真实地报道这个国家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如何不辞艰危,满腔热情地大量报道这个国家五十多年来走过的光辉而曲折的道路。可是,他却开门见山就讲“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讲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和它胜利的世界意义,讲中国人民为这个伟大胜利所付出的代价,讲“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为了这一胜利所做出的牺牲以及它对世界进步所做出的贡献”,惟独没有一句话提到自己。

我本来以为,爱泼斯坦一定会追述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邓小平以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给予他的关怀和荣誉,以及和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可是他一句未提这些值得人们羡慕的殊荣,只是深情地回忆起他的“领路人”埃德加·斯诺。他说:“在庆祝这些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的同时,我们在中国也在纪念中国革命的先锋战士、记者和朋友埃德加·斯诺诞辰一百周年。

> 他的经典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已被证明具有高度的预见性。在西方，他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的朋友，他代表了并象征着所有和他一样的人。”显然，爱泼斯坦仅仅把自己看作是“所有和他一样的人”中的一个。
>
> 我本来以为，爱泼斯坦可能会提到他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和磨难，特别是曾被当作“国际间谍”在秦城度过五年监狱生活的痛苦经历。但是他也一字不提。我理解，他从来只把这段经历看作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曲折。
>
> 我本来以为，爱泼斯坦一定会热情洋溢地用诗一般的语言感谢中国朋友为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隆重的生日聚会。可是他依然只是平静地说：“今天大家在这里所表示的对我的深情厚意，我想是出于对我们实现共同目标的一种欢乐情绪。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只不过是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我只是触及到了国际影响的一些方面。中国产生国际影响，根本在于她的巨大进步。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和过去一样，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更多的阻碍和磕绊，可是进步将会继续。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更愿意把你们今天的热烈情绪看作是我的一个真正的新生命的开始，而不是对我过去历程的一个总结。”
>
> 这么平静，这么谦和，这么理智，只有把个人的一切成就、贡献、荣辱、喜忧都放在历史和时代的大背景——也就是他所说的“更开阔一些的背景”——之下来审视，才能拥有内心世界的如此一片纯净，没有自矜，没有自悲，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有的只是对人类前途的乐观和信心，对整个世界的清醒认识和理性判断。（《人民日报》2005 年 4 月 25 日）

同样，正是这样一种平静、谦和、理智，这样一种“把个人的一切成就、贡献、荣辱、喜忧都放在历史和时代的大背景”之下而拥有的“内心世界的如此一片纯净”，使范敬宜的文字具有一派光明正大的气象。

学习范敬宜，反思新闻界，对改进文风当有所借鉴。眼下党八股、洋八股不是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也是淫雨霏霏，薄暮冥冥，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所列八条“罪状”，几乎无不深中肯綮：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其他暂且不论，单看那些不中不西、不文不白的时髦用语，那些“但书”、

“背书”之类了无生趣、莫名其妙的语言化石，就不难理解“文人毛泽东”当年在延安何以如此痛心疾首了。中央党校教授李书磊十年前也曾撰文痛陈：

在这种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映衬下，主流话语常常显出较为明显的党八股色彩，常常表现出一种自我封闭、自说自话的倾向，未能与纷至沓来、激荡不已的新思潮、新词汇形成充分的交流与碰撞，并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丰富、壮大自己。各级官员的公开言论常常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官样文章，大报大刊的文字也常常苍白贫乏、欠缺文气与文采，常常是空洞的漂亮话而不是真正的漂亮文章。想起来真是冤枉得很，主流话语引领出来的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却未充分地惠及主流话语自身。新鲜、深刻、真实的话语代表了执政党的正心诚意，代表了执政党理解世界、领导国家的能力，也是它团结社会、动员人民的力量源泉。如果一个执政党因党八股之困而减弱了其文化影响力并进而危及到自身与民族生存，那就应是它奋起从思想上与体制上反对党八股的时候了。(《战略与管理》2001 年第 2 期)

就当下新闻媒体的文风而言，至少有三点问题似较普遍——不顺、不确、不雅，同严复的翻译三原则即“信、达、雅”恰好相悖。不顺，是说语法不顺，语句不通，文字疙疙瘩瘩，句子别别扭扭；不确，是说一些基本的、简单的事实不确切，而这些问题其实稍微核查一下就不难解决；不雅，是说语言干巴巴的，没有韵味、没有回味。当然，新闻作品由于时效性、易碎性等特性来不及精雕细刻，更不可能时时处处字斟句酌。但无论如何，“责任心”以及“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的态度，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称职的、优秀的新闻人首先还不在于业务能力，而在于这种责任心以及严谨认真的态度，正如一批“长江韬奋奖”那样的新闻界同仁。范敬宜的写作态度一向严谨，甚至一字不苟。曹丕《典论·论文》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范敬宜对待文章也是如此。他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课，每一课、每一堂都一字一句写出讲稿，而且修修改改，勾勾画画。2010 年 4 月 12 日，是他平生上的最后一课，下面是他为这堂课准备的讲稿(括号里是他修改或增补的文字)：

“新闻与文化”这门课程，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道

> “特色菜”。据我了解，在全国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开设这门课的，可能我们是独此一家。这门课程从2005年开始设立，到现在已经坚持了5年。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这门课的意义和作用，由开始的不(太)理解、不(太)重视(到)逐步(有所)理解和重视。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李彬老师作了很大的努力，花费了不少心血，积累了许多(一点)经验。

从原稿看，“不理解、不重视”改为“不太理解、不太重视”，“逐步理解和重视”改为“逐步有所理解和重视”，“积累了许多经验”改为“积累了一点经验”。按说讲稿既非用于发表，而他授课也非照本宣科，本来无须如此讲究。但他对文字依然如此推敲，那么正式发表的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说，朴实无华而蕴含深厚的文风需要岁月的淘洗，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需要人生的修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需要精神的涵养，那么一丝不苟、一字不苟的为文态度则是可以立竿见影，不难为之的。

范敬宜晚年力倡“新闻中的文化”，在解放日报主办的“文化讲坛”上曾经说道：“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本身就应该是文化人，不论是被称为瞭望者，还是守望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从近百年的中国新闻史来看，凡是杰出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王韬、章太炎、梁启超、张季鸾，一直到毛泽东、瞿秋白、邹韬奋、恽逸群、胡乔木、乔冠华，等等，这些人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学养丰厚、才华横溢的文化人，政治品质和文化修养在他们的身上和笔下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如何作文人，如何作文章，范敬宜为新闻界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

演说奏鸣



新闻教育：重思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新闻学院院长论坛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

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教育面临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和共同挑战，我们今天会集一堂也是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迎接这些挑战，探讨新闻教育的一些共通使命。

就全球而言，新闻教育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新闻教育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其间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尽相同的发展时期。旧中国一流的新闻院系基本上都沿袭欧美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骨干人才大多留学美国，特别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局面自然也就随之告终。新中国的发展虽然曲曲折折，一路风风雨雨，但有一条主线始终明确如一，即但丁名言所说的：走自己的路。其实，对中国这样一个唯一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古国来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灿烂的世界大国来说，走自己的路乃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选择。虽然中国在数千年历史演化中，不断汲取各种文明的元素和基因，从而不断丰富自身的文明内涵，但中国之为中国却自有其巨大的历史能量和惯性。由此说来，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既是对旧中国的扬弃，也是对数千年文明及其精神的接续和延展。

从中国新闻教育自身状况来看，似乎一直在两极间摆动，一极是实践的需求，一极是理论的诉求。一般意义上讲，新闻教育及新闻学研究一直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追求两极之间的平衡。然而，实际运行中，理论与实践又难免存在张力，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和纠葛。极端实践派认为，新闻教育纯属多余之举。因为，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学科，如文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完全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而其赖以操持的实际能力又都可以通过、甚至主要通过新闻实践而

获得。事实上，目前世界许多国家也确实没有专门的、正规的新闻教育体系，而只有某种培训性机制。在另一端的理论派看来，新闻教育应该超越技术训练和专业培训，应该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具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品位，所以，应该达到学理上的自立、自足和自恰，不能受制于或依附于实践而亦步亦趋，更不能仅仅满足于传授一些活学活用的专业技能。

中国新闻教育的这种张力，这种矛盾、冲突和纠葛时起时伏，此起彼伏。最近二十年的新一轮回，可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为标志。传播学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中国内地兴起的。1980年代初，传播学进入中国，引起新闻学界的关注和兴趣，特别是其宽阔的理论视野、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新颖的理论体系，对传统新闻学产生强烈冲击。此后，研究传播学便成为越来越多新闻学者的共通旨趣，其中尤以理论探讨、舆论调查、受众分析、文化研究等更为人所青睐。1997年，传播学以一门学科的身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纳入国家的学科目录，从而意味着此后传播学将享有一切名正言顺的发展空间和成长土壤，比如研究生的教育、博士生的培养、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学科研体系等。截至2006年，中国内地已有19个具有资格授予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和研究所，其中新闻学9个，传播学10个。迄今为止，在中国的新闻与传播领域，新闻学虽然还无可争议地占据着“君王”宝座，但传播学也俨然成为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新贵”。

传播学的兴起和盛行，一方面固然对新闻学形成某种互补之势，而另一方面也使以往新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在新的层面上进一步凸显。虽然国际上的传播研究包罗广泛，既涉及诸多纯学理的探讨，也包括大量应用性的内容，但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传播学主要还是作为一门理论色彩浓厚、学理意味突出的学科而存在。比如，在一般的中国学者和学生看来，传播学属于学理，而新闻学属于技能，传播学高深，而新闻学浅显，传播学广博，而新闻学逼仄，等等。总之，传播学是对新闻学的超越和提升，所以传播学高于新闻学。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潮流和趋势，以涉足传播学为先锋、前卫或时髦，而以研习新闻学为落伍、保守或陈旧。由于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互相依托，新闻学的新动向自然不可能不影响新闻教育的走向，不可能不对新闻教育形成潜在的影响。比如，为适应潮流，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努力向纯粹学理的方向

拓展，在学科地位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出现明显脱离实际的迹象，如某种象牙塔的姿态。据权威统计，目前中国内地约有660余家新闻与传播的教学点。其中，大多数属于本科教育，少部分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大学达到研究生教育的层次，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无论在本科生还是在研究生教育中，目前大多数新闻传播院系事实上都越来越侧重于传播学，正规的新闻教育则越来越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五花八门、冠以传播名号的新学科，以至人们戏称："传播是个筐，什么都可装。"按照中国现行的学科目录，本科层次的新闻传播学分为四个专业，即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研究生层次分为两个二级学科，一是新闻学，一是传播学。也就是说，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平分秋色。

上述趋势从积极方面讲，是新闻学的学科品位得到提升，学科地位得到加强，学科影响得到扩大。而从消极方面看，新闻学以及新闻教育越来越脱离实际，甚至越来越迷失方向，特别在一线工作者看来越来越不知所云。面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大家今天会集一堂共同探讨新闻教育的共同命运，相信也会对我们有所启发。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David Klatell 教授在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50周年院庆时，也谈到新闻教育的问题：

> 本科生应该学习语言文学、历史、经济、社会学、数学、科学，而不是广告和公关，因为它太实际了。在研究生层次上可以学这些，本科生应该接受良好的、坚实的文科教育，上各种人文和科学方面的课程，知道地理、语言、数学、国际关系、历史、艺术等，从而成为更加有才智的人。

Klatell 教授谈的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比如，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将广告、公共关系、媒介经济学等内容作为本科教育的必修环节。这里当然不仅仅是具体课程问题，实际上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的理念。除了广博而坚实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外，新闻教育的宗旨到底在哪里？新闻学的核心究竟是什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到底怎么平衡？新闻学与新闻教育究竟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对此，一直存在不尽相同的认识，见仁见智，聚讼纷纭。

我本人从事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逾二十年，对此同样颇多感触，同时也有一些未解之惑。其中，最常困扰的问题就是新闻教育的第一要

义究竟是什么？经过多年的实践、反复的思索和诸多的探求，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还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社会及人类境况的透彻把握和深刻领悟，以及由此生发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职业荣誉感，并内化于专业方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些事项说起来很抽象，实际上又很具体、很实际。这里，我不由想起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先驱、美国报业巨子普利策。他有一段著名论述，在中国新闻界广为流行。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艘航行在大海上的大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而做到这一点，自然需要敏感的神经、广博的学识、真挚的情感等，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一种实践性能力，亦即将多学科知识和多背景问题融会贯通，进而以普通人的视角与水平将其呈现出来的独到本领。换言之，新闻学的学问不是书卷式的，而是实践性的，因为新闻是对一切问题了然于胸的洞察与感悟，西方新闻学常说的“新闻鼻”即为一例。就此而言，新闻学更像兵法，兵法固然有一套学问和学理，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一种实践性的知识和能力。中国古代有位杰出的军事家赵奢，他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儿子酷爱兵法，对各种军事理论了如指掌，谈起用兵之道可谓头头是道。然而，赵奢临终前却告诫国君，说自己这个儿子只会空谈军事理论，而不能将其灵活运用于军事实践，所以千万不能让他统兵征战，否则国家将陷入危险境地。后来，国君没有听从他的告诫，还是把军权交给赵括，果然一败涂地，由此还形成一句有名的成语“纸上谈兵”。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如果不能培养那种实践性能力，即将各种学科、各种理论、各种知识有机融入新闻报道的本领，而只是汲汲于学理，那么最终可能造就一批夸夸其谈的赵括，只会纸上谈兵，而不能利国利民。

那么，为培养对社会、历史与人类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新闻人，新闻教育需从哪些具体方面着手呢？根据中国的新闻实践，特别是根据清华大学新闻教育的传统，我们认为有两大方面需要考虑。一方面，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广泛研读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入体验，培养学生的开阔胸襟、广博视野、高远见识，特别是培养对人民的深切关怀和深厚情感。简言之，前者是对经典的体悟，后者是对人生的体察，亦即中国古话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造就一个大写的人，而只有一个大写的人才可能成为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守望者。当然，仅有这一面，对新闻教育来说还只完

成了一半使命，另外一半的任务同样不可或缺，不可轻略，这就是新闻学方面的教育和研究。虽然如今随着媒介环境的巨大变化，新闻学以及相关的传播研究及其教育越来越繁复、越来越庞杂、越来越发达，但一些基本内容依然如故，如新闻理论、新闻历史、新闻伦理、新闻实务等。常言道，万变不离其宗，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教育无论如何变化，不管怎样发展，这些基本内容都是其核心或骨架，离开这些核心或骨架，新闻学及新闻教育也就失去安身立命的根基。打个比方，不管人们盖的是茅草房还是摩天楼，总归离不开地基、墙壁、屋顶、门窗等建筑构件，而新闻理论、新闻历史、新闻伦理、新闻实务等，就是新闻学大厦的地基、墙壁、屋顶和门窗。

总之，新闻学及新闻教育都是大有学问、大有名堂的。一方面，新闻学需要综合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和自然学科，包括传播学的养分，因为新闻行当所应对的是无所不包的大千世界，而各种学科无非是对大千世界的不同解读而已。另一方面，新闻学更需要将广博的学科、学问、学理融入点点滴滴的新闻实践，在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历史进程中，协调天地之阴阳，平衡万物之关系，化解人间之纠葛，使社会生活能够尽可能避开险滩暗礁，一帆风顺驶向前去。这里，无论是中国的情形，还是世界的状况，都使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有必要为新闻行当设立起码的职业标准，有必要使新闻行当同医生、律师、会计师、建筑师等职业一样具有必需的职业准则与职业技能，而不应该任由新闻领域成为各色人等骋才使气的跑马场，甚至成为一些政客、商家、文人以售其奸的大舞台(尽管这种情形古往今来都在所难免)。这种专业化的标准、准则与技能，既可以用来规范新闻行当，又可以用来规范新闻教育，从而使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获得更加坚实的基础。

谢谢大家！

2006 年 4 月于纽约

政治素质　文化底蕴
实践意识　世界情怀

——清华百年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及其理念初探[①]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02 年成立以来，遵循清华“一个根本，两个中心，三项职能”的自身定位，即以学生培养为根本，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以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职能，一直把人才培养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各项工作均围绕培养人、教育人、塑造人而展开，并要求教师以教书育人为第一学术责任。建院之初，即确立了一个十六字办学方针——“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如今面临新清华、新百年的契机，如何因应世界潮流和中国崛起，为民族复兴的伟业造就更多新闻传播的大家高手，又现实而急迫地摆在面前。为此，既需要秉承教育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宗旨，广泛汲取人类不同文明与传统的精华，又需要总结清华百年新闻传播人才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建院以来的一系列进展，这里不妨谈谈其中四个要点——政治素质、文化底蕴、实践意识和世界情怀。

首先，新闻教育应该秉承高屋建瓴的政治理想，将政治素质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要务。所谓政治素质，归根结底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境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职业荣誉感，诚如温家宝总理致范敬宜院长的信中强调的：“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

① 本文初稿是 2008 年在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揭牌仪式上的发言，得到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新闻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胡显章教授以及现任副院长史安斌教授的修改。另外，原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华教授也曾给予指点，博士生涂鸣华、硕士生季萌等均有所贡献。特此说明，一并致谢。

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回顾古今中外的新闻历史，政治素质一向属于新闻大家的共通禀赋，从梁启超、邵飘萍、张季鸾、范长江、邹韬奋、邓拓、穆青到历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从著名的“三S”即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到美国报人普利策、评论家李普曼、广播电视的先驱默罗、克朗凯特，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到哥伦比亚左翼记者马尔克斯等，可谓无一例外。既是国学大师，又是新闻巨擘的梁启超一生写下1500万字文章，而他认为自己的文章都同政治有关。世界名著《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也直截了当地说过：“我生活中没有一种行为不是政治行为……我最美好的东西即政治觉悟，也是来自新闻工作。而政治觉悟，众所周知，是对现实的感受能力的最高表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加西亚·马尔克斯》)

清华百年历史同样涌现一批杰出的新闻人，他们无不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良好的政治素质。其中，既有梁启超这样的新闻巨子，又有章汉夫这样的革命报人，既有羊枣、胡乔木、乔冠华等评论家，又有俞颂华、赵敏恒、徐铸成等名记者……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清华新闻学院始终将政治素质摆在首要位置，作为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进而通过各种环节唤醒和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包括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专业实习、学生工作、就业引导等。院长范敬宜教授还主持了一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突破常规套路，摒弃照本宣科的模式，采用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机融入对中国社会及新闻传播实践的探究之中，邀请大家名家为学生现身说法，取得了良好效果。许多学生在这门课程以及相关环节影响下，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专业理想。2009年青年节期间，温家宝总理来清华与毕业生座谈，座谈纪要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其中涉及的8位学生有3位来自新闻学院——因《乡村八记》得到温家宝总理复信表扬的李强、志愿赴西藏工作的邹圣兰与携笔从戎的袁丽萍。这里，周劼人的变化尤为典型。这位西子湖畔的漂亮女生多才多艺，入学时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在西湖开家店铺，过自己的小日子。经过四年熏染，她的世界观、价值观、新闻观均发生“天翻地覆”变化，毕业时在数万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以学士身份进入新华社。2010年，在新华社业务大赛上，她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夺得头筹。如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已经建成清华大学精品课。

其次，新闻教育应该立足于坚实而深厚的文化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古今中外一流的新闻人，无一不是一流的文化人，政治情怀和文化底蕴是新闻高手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同样，清华百年新闻人也不乏这种文化人，如梁启超、胡乔木、乔冠华等。作为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先生，被公认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报人与新闻传播学家，对现代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思想的建树堪称开天辟地。如果说司马迁是古代的传播大家，那么梁启超就是现代的传播大师。他一生创办或主持17种报刊，戊戌前后的《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更是震古烁今，轰动朝野，“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以其报刊文章为标志的“时务文体”，清新刚健，气势如虹，一扫万古凡马空，开创了白话文和白话报的新时代。他提出的诸多新闻传播思想如“去塞求通”等，直到今天依然为人所重。作为国家领导人，同为江苏盐城人的胡乔木和乔冠华都是卓有影响的报刊评论家，抗战时期，他们的新闻评论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有“北乔”、“南乔”之誉，而“北乔”即胡乔木被称为“中共第一枝笔”，参与起草了两份里程碑式的“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还曾担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等新闻要职。同样，现任清华新闻学院院长的范敬宜既是卓有建树的新闻人，又是学养深厚的文化人，向称“诗书画三绝”，得到季羡林等先生的称赏。

所以，在注重政治素质的同时，我们也将培育学生的文化底蕴作为贯穿始终的基础工作。建院以来，学院遵循梅贻琦校长“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教育理念，按照清华“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模式，不断加强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注重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修养，强调人格的养成与思维的训练，尤其是启迪和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觉”(费孝通语)，为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发奋读书、深入钻研、自主创新。如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上大舞台，干大事业，成为一大批学子的共同志向。多年来，院长范敬宜除了主讲本科生、研究生的专业课，还开设了一门“新闻中的文化”，每次上课都一字一句地撰写和修改讲稿，每次作业都仔细批改，郑重写下批语。我们的新生入学时，都拿到一份《新闻传播学基础阅读书目》，共计100种佳作。其中，50种通识类书目涉及文史哲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学科，50种专业类书目则涵盖理论、历史、采写、编辑、评论、广播电视、新媒体等

领域。已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张杨同学，本科时就通读了《资治通鉴》、《史记》等典籍。他的同班同学刘蓁在《三联生活周刊》实习期间，发表多篇重头报道，其中《黄河第一大坝 50 年纷争》被《新华文摘》转载——也许是第一篇入选这份“中国第一刊”的本科生文稿。李强同学能在大二寒假完成《乡村八记》，也同深入的阅读及思考密不可分。2007 年，李强班毕业时自拍自导自演的故事片《不准郁闷》，在清华园上演引起热烈反响。2008 级的蒋方舟同学入学以来，已经连续获得文学大奖，同铁凝、张承志等作家同台领奖。2010 年，曾任《南方周末》调查记者的刘鉴强同学，出版了一部内容丰赡、写作高超的新闻作品《天珠——藏人传奇》，受到热议与好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再次，对新闻传播人才来说，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实践意识以及实践能力。曾经求学清华园的一代报人、《文汇报》创办人徐铸成，早在大学时代就积极投身新闻实践，在《大公报》北京分部担任实习记者，并赢得《大公报》老板胡政之的赏识，委以重任，从而开启其一生新闻生涯的辉煌篇章。事实上，新闻传播学始终是门实践色彩鲜明的学科，如何看待和对待实践问题一向属于新闻教育的核心关切。经过多年探索，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探索了一些路径。一方面，从目前清华整体教育思路看，实践教学已经上升为根本性的教育理念，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培养环节。这种理念的形成，经过历史的反复和反思。如果说过去讲“开门办学”，讲教育同生产实践相结合、同工农兵相结合，乃至取消正规的学历教育是走向一个极端的话，那么近些年来“关门办学”又越来越呈现另一个极端，乃至学生脱离社会、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躲进象牙塔，既不关心国情、民情，也不适应生活的风风雨雨。一线新闻人经常批评国内新闻教育脱离实际，许多学生进入媒体不得不“重新回炉”。针对经院式办学及弊端，清华新闻学院明确将实践纳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通过各种方式、手段和途径在传授基础理论与系统知识之际，贯彻实践教学理念，推进实践教学活动，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引导学生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新闻人为榜样，将书本知识、社会经验和专业能力融会贯通。为此，学院聘请一批卓有成就的业界高手，担任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师与导师，如《中国日报》原总编辑朱英璜教授、清华杰出校友熊向晖之女、新华社记者熊蕾、名记者曹聚仁之子、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等。

李希光教授主讲的国家精品课“新闻采访与写作”，以及新生研讨课“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采用大篷车课堂、情景模拟、案例教学、现场体验等方式，生动而灵活地开展新闻业务教学，得到广泛好评。其间，主讲老师邀请记者与学生一道下煤矿、登太行、穿越罗布泊、重走长征路，既使学生了解社会现实，感受人民生活，又使学生专业能力得到有效的锻炼。2007年，40余位本科生与《河南日报》记者一同采写的系列报道“在京创业的河南人”，集体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学院的学生报纸《清新时报》，从社长到主编，从编辑到记者均由学生担任，许多学生都在这里当过实习记者、编辑，报纸水平和影响力在清华园享有美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大报不止一次转发该报文章。另外，学生拍摄的纪录片、故事片等，也得到权威方面的肯定，有的还获得国际大奖。2008年，学院实践教学项目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2010年，融合实践教学与就业引导的项目又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硕士生和本科生在全国新闻院系率先将实践作品纳入学位论文的范畴，这项教育教学改革得到学校有关方面的支持，也受到兄弟院系的关注与嘉许。2010届的袁梦晨是本科生里第一位“吃螃蟹的人”，最后以一篇有内容、有深度、有水平的新闻作品《一个家庭的梦想史》而获得清华优秀学位论文奖。

最后，世界情怀同属清华新闻教育突出的特征，国际化已成为清华新闻传播人才及其培养的一大传统。大约一百年前，梁启超就意识到：“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在清华园留下身影的著名报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学灯”的主编俞颂华，当年身体力行，带领俄文学校刚刚毕业的瞿秋白亲赴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采访，成为面见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的第一位中国记者。清华新闻人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不妨说由此已经显露端倪。此后，无论烽烟滚滚的革命年代，还是热气腾腾的建设时期，这种精神传统与文化血脉一直绵延不绝。二战时羊枣的军事时评脍炙人口，至今仍称经典。留学日本、德国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乔冠华也以国际时评著称，1971年更以外交部长的身份率领中国代表团首次登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发表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著名演说，一时全球瞩目，风云激荡。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国际广播、卫星电视及新媒体等为标志的全球传播体系日渐形成和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新闻

传播也不可避免地汇入全球传播体系。如何应对“西强我弱”的传播现状，如何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力，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如何在全球传播体系中彰显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胸怀以及陈寅恪先生念兹在兹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然更成为清华新百年新闻教育的战略使命。2008 年，清华新闻学院举办“首届全球新闻教育改革研讨会”，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7 年的《新闻教育课程模板》(*Model Curricula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邀集国内外新闻教育专家展开研讨，以期推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国际化和专业化进程。按照这个课程模板，新闻学教学方案应该包括四个基础单元：

- 批评性思考的能力，包括对陌生材料的理解、分析、综合和对陌生材料进行评估的能力，对证据、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解；
- 运用叙述、描写和分析的手法进行简洁、连贯写作的能力；
- 对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了解；
- 对时事的了解和对历史、地理的大致了解。

为了推进国际化办学，我们提出“三个三分之一”的目标：争取开设三分之一左右的双语和全英语教学的专业课程；争取三分之一左右的中国学生有海外实习和交换的经历；争取国际学生的比例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建院八年来，经过师生的努力，这个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目前，学院招收 150 多名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日本、马来西亚、俄罗斯、多米尼克、缅甸等国留学生，包括三分之一全英文硕士项目的留学生。中外学生共同学习，共同营造具有包容性、多元化的学习氛围。落实国际化办学的战略，需要建设一支国际化的师资队伍。现在学院聘任的 25 名全职教师中，80%以上具有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校的博士学位或访学经历。另外，还常年从境外媒体和高校聘请访问教授，如美国彭博通讯社副总编辑 Lee Miller、美国《时代周刊》欧洲版总编辑 Ann Morrison、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Hugo de Burgh 教授、美国宾州大学新闻学院 Thomas Berner 教授等。2010 年 6 月，本科生李燕茜同学以《清新时报》总编辑的身份参加多伦多 G20 峰会，作为“中国校园媒体大学生记者首次正式亮相国际舞台”，并向参加峰会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汇报自己的感受：“能够代表中国青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感到很自豪，也感到了身上肩负的责任。”

为了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双语能力、多元文化素养的新闻传播人才，新闻学院还专门开设了两个硕士项目——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和全球财经新闻硕士项目，对新闻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产生积极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起源于2006年设立的英语新闻采编硕士方向，2009年被中宣部、教育部列为全国五家重点支持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硕士项目。这些项目不仅为主流媒体输送具备双语采编能力和国际视野的新闻人才，而且也培养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中国通”。2009年，美国高等教育界的权威刊物《学院》(*Academe*)发表封面文章，对清华的全球财经新闻硕士项目给予好评，认为是国际新闻教育改革的创新之举。

当然，百年清华的新闻传播人才及其培养还有一系列内容，需要不断开掘、反复汲取，新闻学院的八年历程更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反思的丰富经验，这里只是择其要者略述四点，权当抛砖引玉，以待各方高见。

2008年4月于重庆
2010年修改于清华



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

——在澳门大学“2008 年两岸四地传媒与时局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①

与人类既往的文明形态相比，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在现代社会占据首屈一指的显要位置，具有前所未有的突出意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核心价值体系同样至关重要。

文 化 政 治

所谓文化政治，既不是文化方面的政治，也不是一般理解的政治，像宫廷政变、政客竞选什么的，而是具有远为深广的社会历史意味，其中主要关乎天下之大事与人心之向背。众所周知，作为一项生活内容，通常所说的文化往往同政治、经济、社会等相提并论，而文化政治则是一个特定的综合概念，具有独立的内涵和外延。就其外延而言，文化政治不仅涵盖一般意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而且构成所有这些生活内容的基础。就其内涵而言，文化政治涉及各种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感、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凝聚力，是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基。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里就写道：“文化政治是一个民族、一个生活世界的最根本的自我意识。”或用赵汀阳的话说：

> 心灵上的同意是对一种政治统治的自愿自觉认同，因此，心灵的一致认同是政治权力的最后基础。只有能够创造一种为所有人或至少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精神生活，才能充分有效地维持政治秩序。(《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秩序》)

---

① 本文草成于 2008 年春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 20 期)。相继在延安大学、吉林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了报告，并根据各方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最后在澳门大学做了正式报告。为此，谨向郭必选教授、刘坚教授、张国良教授、陈怀林教授和有关学生致谢！

诸如我们是何许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生活，生活的意义何在等一系列“形而上学”，均为文化政治的核心命题。由此说来，儒家学说及其一整套社会伦理，自然属于中国古代的文化政治，“在文化政治问题上，孔子甚至比柏拉图更为清楚，孔子非常明确地把文化(特别是价值观体系和实践方式)看做是政治的根本问题”(赵汀阳)。至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话题，则更是针对美国当下的文化政治。

文化政治离不开各种文化形态：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历史叙事、教育传统、学术研究、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书报杂志、文娱活动，等等。虽然历史上各种文化形态原本具有天然的政治意味，体现着不同社会的内在权力关系，比如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中国古代的“春秋笔法”等。但是，文化政治成为各种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与根基，则是现代文明及其发展的结果。因为，与既往的文明形态相比，经过启蒙祛魅的现代社会既不可能像古罗马似的依仗纯粹暴力，也不可能指望中世纪“君权神授”之类宗教意识，更不可能凭借封建王朝父传子继的血缘关系，而只能通过文化政治以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感、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凝聚力。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将现代社会的这种特征概括为“政治的哲学化”和“哲学的政治化”。也就是说，现代政治无不依赖一套理论话语或“主义”——“政治的哲学化”，而各种理论话语或“主义”又无不直接间接作用于现实政治及其权力关系——“哲学的政治化”。从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到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从俄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等，无不体现着“政治的哲学化”和“哲学的政治化”。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滔滔数小时的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将政治与文化糅合在一起展开论述，这就是后来新中国立国的纲领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

再如，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以其话语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文化实践与政治实践水乳交融的关系。在他看来，哲学认识、科学理论、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及新闻报道等“话语”，归根结底无不围绕着现实政治而展开，无不体现着特定的“权力关系”。以自然科学为例，常人往往以为，自然科学中立、超然、只追寻自然规律而不涉及现实政治及其权力关系。其实，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电学等学科，无不服从或服务于现代文明征服自然的欲望和控制世界的意志，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目标

与权力关系息息相关。刘小枫一针见血地说道：我们学了那么多的“西方真理”，现在看来不过是“意识形态”，是“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强力真理”，而科学技术就是它的物化形式。自然科学尚且如此，其他类型的话语就更不用说了。对此，现代哲人培根用一句名言做了言简意赅的概括：“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

文化领导权

对文化政治而言，第一要务在于掌握文化领导权——更贴切的表述应该是文化主导权。所谓文化领导权或文化主导权，曾被学界“硬译”为文化霸权或霸权（hegemon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提出的概念，经过诸多批判性理论的演绎而成为透视现代社会的一脉重要学说。在葛兰西思想中，霸权或文化霸权等同于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属于现代文化政治的集中体现和具体运作。需要说明的是，他所谓的霸权同国际政治领域的霸权完全无关，与霸道专横风马牛不相及。这个霸权的本意其实是指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熏染和教化，类似父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所谓沾衣不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换句话说，葛兰西说的霸权是通过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通过和风细雨的教育传统、宗教习俗以及传播媒介等寻常方式运行的。在这种空气一般无所不在而习焉不察的自然环境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点点滴滴渗透了被统治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使得被统治阶级自觉自愿地认同既定的政治经济秩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驯服工具”，犹如赫胥黎笔下“美丽新世界”的良民，从而确保现行体制永世长存。所以，将文化霸权称为文化领导权或主导权更为恰当。

按照葛兰西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等犹如有形的前沿阵地，而文化领导权辐射的领域好比无形的大后方或战略纵深。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貌似固若金汤，就因为前沿阵地后面，还有这样的大后方或战略纵深。如果只关注前者而忽略后者，那么即使突破前沿阵地，夺取国家政权，也会陷入拿破仑、希特勒进攻俄罗斯的境地，陷入日本战史描绘的八路军游击战的汪洋大海：“没有明确战线、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无休止的战争。”总之，文化领导权意味着，“统

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和传媒等手段造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得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服从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是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韩毓海）。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弥补了机械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偏颇，为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新思路。其实，现代历史表明，无论推翻一个政权，还是维护一个政权，无论瓦解一个文明，还是捍卫一个文明，都必须首先解决文化政治和文化领导权问题。借用孟子的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这个“道”已经成为现代各种共同体安身立命的“主义”和“道义”，成为各种文化政治和文化领导权不得不占领和固守的制高点。因为，只有控制这个制高点，才能拥有所谓文化认同感、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凝聚力。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所概括的：

> 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血亲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一手硬，一手软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政治文明同样日新月异，包括人的主体意识日益提高（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党员的主体地位”）、依法治国的观念不断深入、多元开放的社会心态日渐形成等。然而，与此同时，一个现象日益明显，后果日益显现，这就是文化政治越来越放任自流，文化领导权越来越软弱无力。结果主流阵地不断被蚕食，被挤压，被吞并，“主义”制高点已风声鹤唳，山雨欲来。所以，毫不奇怪，当《色·戒》掀起的“玉树后庭花”大合唱风靡神州时，已经没有几个“文化人”和几家“主流媒体”能挺身而出，发出一代新闻人、首

位播音学教授齐越当年说的“堂堂正正”的声音，以至于让人怀疑这里曾是数千万抗日军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土地。这种态势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济建设一波三折而文化政治一路高歌构成反差。

对此，邓小平早在1980年代初，就曾以政治家的敏锐和话语指出“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即物质文明蒸蒸日上，而精神文明江河日下。以新闻传播为例，一方面事业发展迅猛，规模和效益已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而另一方面理论创新又乏善可陈，要么照搬照抄，要么僵化教条，与亿万人民的生活世界和中国媒体的实际状况渐行渐远。最近，正当全中国、全世界都为汶川大地震感到震惊和痛心之际，另类媒体竟同美国艺人莎朗·斯通一道，诅咒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为“天谴”！而当全国上下共赴国殇，世界舆论盛赞抗震救灾的大仁大义、大爱大勇之际，另类媒体又急不可耐地将中华民族的博大情怀和英雄本色纳入“普世价值”——明眼人都明白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美国价值”的障眼法而已。

如果说“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1980年代还是草色遥看近却无，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主导的利益多元、思想分化格局，以及冷战结束、苏东解体和全球化冲击，这个问题已经成为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了。“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此起彼伏，“《冰点》”事件、“《色·戒》”事件的频频发生，以及另类媒体的不断发难——所谓“噪音”、“杂音”等，不过是这个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

关于“一手硬，一手软”问题及其严峻后果，关于近30年文化政治的消退和文化领导权的式微，可从纵横两个方面的对比中看得更加清楚。横的对比，用美国与中国作为样本；纵的对比，用新中国的前30年和后30年作为样本。

中国与美国

按照所谓流行观念，美国俨然是人类的福音，世界的天堂，未来的希望。实际上，美国的社会问题丝毫不比他国少，严峻程度也一点不比他国小，而且许多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心仪美国的人也不能不承认。随便列举一二：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名列前茅，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7年8月的统计，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完

全金元主导的政治一向腐败丛生、乌烟瘴气，如小布什对付政敌的“黑名单”，而大公司的丑闻更是不绝于耳；频频发生的暴力事件如校园枪击案，连美国人都谈虎色变；吸食毒品更如家常便饭，卖淫滥交则似端茶倒水，艾滋泛滥，成为公害；至于历史上的种族主义行径——屠杀土著、奴役黑人、种族隔离与歧视等，国际事务上的横行霸道——以国家恐怖主义杀人越货、世界各地的美国大兵屡屡强暴民女、为害地方等，有时连其西方盟友都感到忍无可忍。受西方资助而唯其马首是瞻的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在 2008 年的年度报告里破天荒地对美国人权问题进行了着墨最多的激烈批评：“美国必须关闭关塔那摩基地和秘密监禁中心……必须明确杜绝刑讯和虐待……必须停止对独裁政府的支持”等，其中特别指出美国近年来一再挑衅国际法，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树立了“坏榜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苏联名记者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谈到阿·托尔斯泰的一则逸事。一次，托尔斯泰夫妇在巴黎舞会上结识一位黑人，对他颇有好感，故邀请到自己下榻的公寓共进午餐：

> 在公寓之中有一个美国人；他看见托尔斯泰把一个黑人带到餐厅里来，就勃然大怒。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便天真地向美国人解释，说这个黑人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他甚至还想提请赐给他公爵的爵位呢。美国人什么都不愿意听：“这样的公爵在我们那里都擦皮鞋。”于是托尔斯泰大发雷霆，把美国人从二楼上顺着楼梯扔到楼下去了——女主人号啕大哭，但寄居在公寓里的法国人却都发出了赞许的喊声。(《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如今颇能赢得好感，尤其是受到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的“文化人”倾心。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美国牢牢把持着当代世界的文化政治和文化领导权，掌控着约瑟夫·奈所说的文化软实力。它的学术思潮、理论流派、电影电视、报刊书籍、生活方式、消费时尚等一系列文化政治的实践及话语，对世人具有无所不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是例证。比如，感恩节本来是一个纯粹的美国节日，除了加拿大多少有那么点意思，世上再没有哪个国家过感恩节。然而，每到感恩节，中国的白领、小资也禁不住沉浸于节日气氛，煞有介事地吃火鸡什么的，仿佛那一刻成了“美国人”。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软实力背后还有一套“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真理话语，包括“自由、民主、人

权”等“形而上学”。这些真理话语及漂亮概念不仅由美国操控和推广，而且由美国定义和解释，从而深刻影响了世道民心和人心向背。因此，美国在“主义”和“道义”上仿佛高高在上，貌似得道多助。

与之相比，中国虽然存在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枯竭、贫富差距、官员腐败以及新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等，但是，任何不带明显偏见的人，任何具有历史感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当代中国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时期，国家兴旺发达，社会和平安宁，百姓安居乐业。然而，为什么中国还是常常不免于国内外的诸般不满、非议或攻击，乃至处处被动，动辄得咎，仿佛怎么做怎么不是呢？原因也仅仅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放弃文化政治及其主流阵地，不断削弱文化领导权——其中多以“解放思想”的名义进行，导致文化认同感、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凝聚力的层层瓦解。当然，这种瓦解本身也源于一种新的文化政治和文化领导权，其中尤以《河殇》为焦点。特别是一步步解构“共产主义真，党是引路人”的革命叙事后，未能形成一套为全体人民普遍接受、倾心认同的“形而上学”，一套使人生富有意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核心价值体系”。于是，“浮云柳絮无根底，天地阔远随飞扬”便成为普遍的心理症候。如果说现在还有什么“核心价值体系”，那么似乎就剩下一个字——钱。“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经济人理性”、“市场原教旨主义”等流行话语，无不映射着这种社会情态和心态，亦即莎士比亚借雅典的泰门而挑明的：

> 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这种物质巨人和精神侏儒之间的反差，让人想到一则笑话。飞机在万米高空飞行，机长报告旅客：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正以超音速飞行，飞机状况良好，“坏消息”是我们迷失了航向，不知道飞向哪里。2007年，一部电视剧《士兵突击》异军突起，也从侧面折射了当下核心价值体系缺失的普遍焦虑。如果说《色·戒》一类文化政治是对声色犬马及其价值的顶礼膜拜，那么《士兵突击》就是对有意义人生的重新追寻。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从时间的纵坐标上对比，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人民生活尽管清苦，国际环境异常险恶，发展进程一波三折。然而，从党内到党外、从中枢到基层、从文盲到文人，差不多都自觉认同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和中华文明的独立价值，纵然遭遇无数艰难困苦，全体人民依然“万众一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甚至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三个世界”等思想、“赤脚医生”等制度得到广泛青睐，“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而如今，人们生活越来越好，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但大家的心思却越来越纷繁杂沓，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越来越风飘云散。在“思想启蒙”、“国际接轨”、“普世价值”的种种旗号下，“知识分子”更是一步步地陷入“崇洋媚外”与“数典忘祖”的怪圈。结果，不仅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而且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与独立价值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时至今日，整个社会仿佛失去生命的根基和存在的意义，礼崩乐坏，失魂落魄，似乎最后只有《河殇》说的一条路——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即“全盘西化”。

这里，不妨将第一代共产党人在文化政治和文化领导权方面的历史遗产作为样本，与当下“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做一对比。众所周知，当年与国民党实力相差悬殊之际，共产党人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不是依靠硬实力如武装力量，而是首先着眼于软实力，即重视文化政治，掌握文化领导权，夺取“主义”或“道义”的制高点，从而形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一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以诗一般的意境展示了这种天下归心的局面。换言之，共产党人首先打的不是军事仗，而是政治仗或人心向背的文化政治仗。毛泽东就说过，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这方面，有数不胜数的例证和出神入化的手笔，如红区生动活泼的群众运动、白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鲁迅为旗手和以“左联”为阵营的新文化运动等。海外学者唐小兵指出：

> 这一场大规模、有组织的文化革命的滥觞应当追溯到20年代末期江西苏维埃政权倡导下的戏剧运动、民歌搜集，纵贯了后来的

> 抗战文艺、解放区文艺以及工农兵文艺。具体意义上的“延安文艺”(1937—1945)不仅引发了一系列民众性文艺实践(群众写作运动、街头诗运动、戏剧运动、秧歌运动,以及以“文化人”为骨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战歌社”、“抗战文化工作团”、“烽火剧团”),不仅促成了大批刊物杂志(《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新诗歌》、《边区文化》),而且也留下了有经典意义的作品(《白毛女》、《穷人乐》、《高干大》、《王贵与李香香》、《李家庄的变迁》)和相当完备的理论阐释。(《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代前言)

无怪乎,当年国民党官方文件描绘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时惊呼:

> 盖此辈普罗作家,能本无产阶级之情绪,运用新写实派之技术,虽煽动无产阶级斗争,非难现在经济制度,攻击本党主义,然含意深刻,笔致轻纤,绝不以露骨之名词,嵌入文句,且注重体裁的积极性,不仅描写阶级斗争,尤为渗入无产阶级胜利之暗示。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甚至专门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到会发表了里程碑的讲话。另外,当时还将文风问题,即文字的通顺、语言的晓畅等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与实事求是的学风问题和组织建设的党风问题并列为整风运动的三项内容。这并不是小题大做。因为,不解决佶屈聱牙的“党八股”、“洋八股”问题,不确立一种“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就不可能深入人心,当然也不可能赢得全中国老百姓的认同。这里,文风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

即使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一系列不无偏激的政治运动,初衷也在于加强文化政治,力图在掌握政治经济领导权后,进一步夺取文化领导权。如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批判、“鸣放”与“反右”,乃至最后失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归根结底都与文化政治和文化领导权有关。否则,就没有新中国的文化认同感、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凝聚力,当然也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四川汶川大地震再次表明了这一点,正如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丘震海所言:抗震救灾重新显示了社会主义价值的意义。总之,在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时代,文化政治和文化领导权不仅得到极度重视,而

且，成效显著，影响广泛。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仅以音乐艺术为例，这个时期优美动听的作品真是遍地开花，姹紫嫣红，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卓有成效地塑造了、影响了、主导了人们的观念领域和精神世界，正应了孔子所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比如，从歌咏烽火年代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曲《英雄赞歌》、管弦乐《红旗颂》等，到赞美新中国、新生活、新风尚的时代作品——《歌唱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克拉玛依之歌》、《北京喜讯到边寨》、《翻身农奴把歌唱》、《草原英雄小姐妹》及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等；从历史的黄钟大吕——歌剧《白毛女》、《江姐》，舞剧《红色娘子军》、《沂蒙颂》，交响诗《嘎达梅林》等，到生活的抒情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民族管弦乐《瑶族舞曲》，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春舞曲》、《赶圩归来啊哩哩》、《帕米尔之春》等；从现代京剧成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到地方音乐繁荣——河南豫剧《朝阳沟》、江苏沪剧《芦荡火种》、湖北的《洪湖赤卫队》、广西的《刘三姐》、云南的《阿诗玛》等，可谓美不胜收，举不胜举。

而近 30 年来，音乐创作日趋没落，既缺乏淋漓的元气，又缺乏动人的美感，更缺乏深刻的内涵。如果说 1980 年代作为一种历史的余响还有堪称经典的传世之作，包括《在希望的田野上》、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歌《长江之歌》、电影《人生》的插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等，那么 1990 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就只有消费主义、娱乐文化主导的流行音乐波涌浪翻了。在这种貌似不讲政治的流行音乐以及大众文化的熏染下，在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拥抱世俗的潮流中，不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属意的精神情怀几乎销声匿迹，而且马克思所期许的“音乐的耳朵”也无从谈起。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教授，论及当下文化状况时提出一个触目惊心的概念——文化沙漠化。在他看来，文化沙漠化将是中国的一场灾难。文化沙漠化的迹象，可归结为三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一是意识形态的危机感为什么越来越严重？二是大学里的学术

风气为什么越来越糟糕？三是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特别指出，文化沙漠化现象及其趋势并非没有文化，而是只有消费型文化，没有或缺少生产型文化：

> 生产型文化是指原创的、开拓性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文化活动及其成果；而直接用于满足社会需要的，属于享用、娱乐型的，因而是可以大量复制的文化，则是消费型文化。
>
> 文化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消费型文化的发展。我始终坚信大众是文化的主体，大众有权享受和消费文化的全部成果，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大众文化消费还并不特别繁荣。但目前生产型文化的衰竭却十分抢眼。所以文化沙漠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消费型文化的繁荣，而在于生产型文化的动力不足，导致原创力缺乏。这才是更深层、更具根源性的问题。

对比前后三十年的音乐文化，这种情况不是尤为突出吗？仅以林林总总的音乐演出及其曲目而言，有多少属于生产型文化，又有多少属于消费型文化，或者说，有多少是在吃过去的老本，又有多少是现在的独创呢？



敌友之辨

针对日益突出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21世纪以来，中枢相继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其中涉及的九大学科包括新闻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着力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些想法与做法可谓立意高远，用心良苦，并开始意识到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的首要意义。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从“治标”到“治本”，如何将政府行为变成文化行为，将国家政治变成文化政治。为了加强文化政治，巩固文化领导权，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疑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开展一系列的艰巨工作。下面仅就若干关键事项进行初步分析。

首先，应该明确文化政治的要害还是政治，而在古今一流政治家和思想家看来，政治的首要问题在于敌友之辨，如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楚汉之争”等。马克斯·韦伯的学生、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里更是明确指出，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一样，核心

都是“敌友之辨”：“正如真假是知识判断，善恶是道德判断，美丑是美学判断，敌友则是政治判断”（赵汀阳）。《毛泽东选集》里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开宗明义地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还以其特有的表达，对胡耀邦解释何谓政治：政治就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当然，正如施米特所言，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都是“公敌”而非“私敌”，他们并不意味着“在道德上的邪恶或在审美上的丑陋”。

既然政治的关键在于敌友之辨，那么在政治上就得区分大是大非，而不能一味讲究“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不分彼此。“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敌友之辨判然分明为前提的。虽然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问题不见得都以你死我活的决绝方式解决，但敌友之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严肃对待。否则，弄不好就成为俗话说的，“被人卖了，还替人点钱”。



不争论

其次，需对“不争论”问题进行一点辨析。改革开放初，“不争论”作为一种现实策略是必要的，也确实显示了积极的意义。当时，刚刚经过“文革”的纷争动荡，人们的思想还被一系列僵化的条条框框所束缚。为了全力推进现代化事业，同时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在纯粹的理论问题上过多花费心思，而把精力尽可能投入经济建设就成为明智的选择。即使如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恰恰始于一场波及全国的大争论，即真理标准大讨论。看起来，真理标准是一个正宗的哲学话题，但这个话题背后恰恰是现实政治。如果当时不占领这个“主义”与“道义”的制高点，那么改革开放的政治大业就无法推行。文化政治的意义，由此也可见一斑。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随着时移世易，随着“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日益突出和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特别是邓小平说的“两种改革方向”日益明显，如果还固守“不争论”律令，那么就无异于自动退出文化政治的疆域，自动放弃生死攸关的文化领导权，从而无异于政治自杀。宋有“议论未定，兵已过河”之讥：宋朝文人喜欢高谈阔论，党同伐异，而且学风空疏，不切实际；结果还没等他们争出所以然，敌方兵马已

渡过黄河，直逼开封。化用此语，面对国内外另类势力甚嚣尘上，四处出击，咄咄逼人，攻城略地，如果还一厢情愿地坚持“不争论”，那么结果就可能成为“议论未起，兵已过河”。而且，一旦过河，便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因为，后方广阔的战略纵深早已被分化、瓦解、渗透。

况且，不争论也只适用于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如今，新媒体如日中天，方兴未艾，由此形成的传播生态已非消极的“不争论”所能应对了。当各种争论在新媒体上如火如荼，成为沸沸扬扬的热点、焦点时，如果还侈谈“不争论”，不肯或不能发出有理而有力的声音，不肯或不能占领舆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那么，最后就只能像埋头沙丘的鸵鸟，既遭人耻笑，又被人抛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兴亡存废全在人心向背，岂能不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最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在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概括的一条思想路线，永远值得后人珍视。不过，由于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这条思想路线完全可以导致不同的理解和结局。如今，早不是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时代，也不是“文革”结束时期，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眼下没有谁不在理论上承认这条思想路线，关键是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其出发点和着眼点。新中国即将走过60年路程，前30年和后30年各有其成就与失误。前30年的曲折历史和渐渐僵化教条的问题，成为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同样，近30年的发展也存在曲折坎坷，并形成另外一些僵化教条的问题，包括“市场原教旨主义”、“新四化”——市场化、全球化、私有化、自由化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是今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如果不从现实问题入手，不着眼于实际状况，而依然振振有词地纠缠于时过境迁的话题，那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仅沦为没有对象、不着边际的空谈，而且沿着既定的思路进一步陷入僵化教条的境地，从而在根本上制约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塑。

综上所述，正在崛起的中国再不能忽略自己的文化政治，无视自己

的文化领导权。13 亿中国人民不仅需要现代化的生活，也需要自己的精神家园，需要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体系。否则，国力再雄厚，经济再发达，生活再富足，也不能解决生活意义和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更无从谈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倒可能面临“失道寡助”、“中国威胁”等危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对中美两国社会与媒体的对比不能不令人警醒：

> 事实上，对比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国主流媒体对不少社会事件的报道经常是更为深刻或者说更具有批判性。比如，美国主流媒体对贪污和人为灾害的报道往往流于就事论事，而中国媒体对同类事件的报道则会致力于挖掘深层社会矛盾，让读者看到这类事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看到报道所揭示的仅仅是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2005 年美国新奥尔良市受到飓风袭击后城市大半受到水淹，处于低地的穷人不得不向高地撤离，而一些高地住宅区的有钱住户却武装了起来拒绝他人进入，并且对进入高地住宅区的人们进行了射杀，不少人因此死于非命。在美国，这一事件在数年后才逐渐有了报道，但却没有在网上引起广泛讨论。相反在中国，杭州的一起汽车撞人交通案就能在网上掀起了一场持续的仇富热潮。试想，如果类似美国新奥尔良市集体射杀穷人的事件发生在汶川地震期间，网络上对富人和对社会制度的声讨肯定会一浪高过一浪。如果中国政府对此类事件的处理稍有迟缓的话，一场革命都可能会被引发。为什么美国媒体对射杀穷人事件的反映会如此迟钝？为什么美国百姓对此类新闻报道的反应会如此木讷？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人民对他们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有着很大的认同，以及美国的主流媒体对社会舆论有着巨大的建构作用。

2008 年 6 月于澳门
2011 年 2 月于清华



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当代中国①

今天主要谈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点滴认识，不见得十分恰当，更不见得系统，只是针对大家平常关注的一些话题略陈己见，但愿能引起一点思考和兴趣，讨论和争鸣。不当之处，还望批评。

日前，与学生聚谈时说道："学问有大小，思想无高低。"因为，学问需要积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故有大小之分，而各种思想只有角度的不同、视野的不同、立足点和侧重点的不同，犹如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不应有什么我高你低之别。另外，不同的思想及其价值都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而不可能人为地确立某种思想的至高权威，否则就成为一种专制了。比如，西方政治思想往往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强加于人，仿佛自己的思想比别人高明，别人不仅必须遵从，而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种专断也不亚于暴力独裁。某些媒体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其实就有点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专制。对此，哲学家赵汀阳毫不容情地指出：

> 没有哪一种价值观能够评价另一种价值观，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是其他价值观的规范和标准，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是最高权威，否则的话就变成精神独裁和思想专制了。检验价值观的标准必定落在价值观之外，必定落在话语之外……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

实事求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自建院以来，我们一直将政治素质、文化底蕴、实践意识、世界情怀

① 本文是2008年记者节前一天，在清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上的演讲。

作为培养学生的主要环节，其中政治素质又最为关紧。

什么是政治素质？一句话就是审时度势，即武侯祠那副对联所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毛泽东提倡的“政治家办报”，以及由此延伸的“政治家办台”、“政治家办网”等，并非望文生义的政治取代新闻、政治等于新闻等，而是指这种审时度势的政治素质，也就是现在常说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文革”后期，新华社有位驻联邦德国的记者王殊，就是审时度势的新闻高手。当时，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引发国内外对苏美战略是东移还是声东击西的讨论。王殊经过研究，审时度势，认定美苏争霸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另外，关于中德关系，当时国内普遍认为，二战后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而王殊通过走访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确认和平主义已经成为主流，而且联邦德国经济发展迅速，也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求。于是，主张中德建立外交关系，发展友好往来和经济合作。他的调研报告被外交部通报表扬，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重视，还专门请他到中南海深谈，最后认可他的判断。这是新闻人审时度势的典型案例。1974 年，时年 50 岁的王殊出任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

缺乏审时度势的政治素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淡薄，一门心思只想满足新闻人“为所欲为”“畅所欲言”的“自由”，那么，身处这样人多势众、情况复杂的大国——如社会阶层及其矛盾日益凸显，面对当代如此关系纠结、利益冲突的环境——如“台独”、“藏独”、“疆独”等问题日益尖锐，弄不好就人心涣散，分崩离析，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屡见不鲜。其实，现在西方的新闻理念也不是早期为所欲为的自由主义，正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已不是早期血腥野蛮的资本主义，而包含更多自律和社会责任的内容。西方人越来越明白，所谓新闻自由恰似一柄双刃剑，在促进文明和进步的同时，也会导致诸多社会问题，如逼死戴安娜的“狗仔队”，如所谓“富媒体，穷民主”等，而这些问题也开始在中国显现。中西新闻虽然存在种种差异，这些差异又根源于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但新闻人的责任和使命又是相通的：促进和谐、进步与昌明，避免危机、矛盾与灾难。用美国报业巨子、普里策新闻奖创始人普里策的那段广为人知的话说：“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哨。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并及时发出警报。”在这个意义

上,记者同军人倒是不无相似,虽说职守都在于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社会和平,人民幸福,但一流军人并不以寻求战事为乐事,以百战百胜为荣耀。相反,中外一流军人总以“上将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所以,一流的军人和一流的新闻人一样,首先都是审时度势的政治家。

那么,如何提高政治素质呢?清华国学导师陈寅恪先生有句话眼下比较流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人也喜欢以此自诩。不过,什么是独立,什么是自由?并非一句宣示就打发了。如果喊一句自由口号,树一杆独立大旗,就自由了,就独立了,那就太简单、太容易了,那就真成了:“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其实,不管是独立之精神,还是自由之思想,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不能实事求是,不能像陈云说的,“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清华还加了一句不惟洋,而是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则独立自由不过是空话或漂亮话,而且,往往从一种教条变成另一种教条。

我们知道,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经过“左”的、“右”的失误和教训,执政党越来越明确一条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中,实事求是是核心,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是条件。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否则,头脑僵化,刻舟求剑,那么实事求是就成为空中楼阁。这也是认识当代中国及其新闻传播事业、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原则,即首先应有一种开放务实的心态。

何谓实事求是?用学术化的语言表达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就是历史,就是千百万人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所谓“是”则是其中隐含的规律或逻辑,历史与逻辑达到统一就叫实事求是。国际问题专家张文木教授对此做了独特的解释。他把学问分为四种,第一种叫“以事说理”,就是从经验性的事实求得规律性的理论,显然这就是实事求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第二种学问叫“以理说事”,就是用现成的理论解释流变不居的社会现实。这种学问虽然也力图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立足点不在于脚下的大地,而在于肩上的大脑。比如,有些研究生写毕业论文不从具体问题入手,不考察实际情况,进而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从中提炼规律性的东西即理论,而是一事当前,先琢磨“用什么理论”,如果找不到什么现成理论,特别是西方的时新理论,比如“公共领域”,并用他人的大脑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削足适履的解释,就六神无主,辗转

反侧。这种“以理说事”的习惯就像有人调侃的，解决中国问题先得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地绕道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等。再如，有人总喜欢拿西方的新闻自由说中国的新闻实践，于是觉得这不合适，那不合法，这种习惯同样是用现成的理论剪裁生成的事实，用僵化的逻辑规范鲜活的历史。这让人不禁想起希腊神话传说中那张要命的床，妖怪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与他的这张床大小一致，分毫不爽，谁的个子高就砍去一截，而谁的个子矮就拉伸一截，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至于不顾国情、民情，一味倡导与国际接轨——明眼人都知道是与美国接轨，更是用僵化的标准对待鲜活的实践。美国有三亿人，中国有十三亿人，这就像美国是个三口之家，家境殷实，积蓄丰厚，小日子当然过得滋润。而中国是个十三口的大户人家，负担重，底子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总拿自家同人家比，肯定怎么比怎么别扭。而习惯于“以理说事”的教条人士，总爱进行这种比较，对十三口之家与三口之家的“接轨”耿耿于怀。我们应该还记得温总理同《华盛顿邮报》记者算的那笔账：再多的积累，被十三亿人一除就微不足道；再小的事情，被十三亿人一乘又成为天大的麻烦。另外，三口之家的关系已经错综复杂，看看奥斯卡奖影片《克莱默夫妇》就知道了；而十三口之家的关系岂不更是盘根错节，读读《红楼梦》就清楚了。

第三种的学问叫“就事论事”或“就理论理”，“事”和“是”是分离的，历史与逻辑是分离的，理论与实践是分离的，要么是纯粹经验性的说事，要么是纯粹理论性的说理。这两种情况也不少见。

第四种的学问是既不说事，也不说理，既无历史，也无逻辑，一事当前，方法先行。这种情况如今似有蔓延之势。研究生、博士生一旦染上这种习气，恐怕也就难成什么真学问、大学问了。

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价值

几年前，马克思被英国主流媒体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最近，由于“金融海啸”，《资本论》又成为世界范围的热点。不管赞同与否，人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达到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即实事求是的化境，具有毋庸置疑的科学性。所以，欧美一流的思想家、学问家无不受惠于马克思，即使质疑马克思，也不得不站在他的思想层面进行对话。国际知名的华裔新闻传播学者赵月枝教授，当年从北京广播学院

新闻系公派留学时，看着宿舍同学为马克思理论的考试头疼之际，曾经窃喜和庆幸，心想自己从此不必再为此费心。结果一到国外，导师开列的必读书就是马克思著作，当时的心情可谓“任是西方更西处，也应无计避马翁”。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一方面体现在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共产党宣言》为例，短短一万五千字，却生动而深刻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
>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还在于方法论，也就是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可能麻木不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这种方法论的科学意义，只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了。其一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著，体现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典范。这篇著名文献是在总结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又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分析，同时还融会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这篇文字最初是 1956 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7 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十大关系包括：(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在阐述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时，处处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火花，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一篇长文，专门讨论十大关系里的“中央与地方”问题，内容实在，论述精辟，这篇文章收入我们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拓展读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第二个例子，是十七大政治报告总结社会

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经验所概括的“十个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又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坚持发展市场经济；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发展生产力，又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既提高效率，又促进公平；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参与全球竞争；既促进改革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既推进党的事业，又加强党的建设。这十个结合同样充满了唯物论和辩证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还远远不够。因为，任何科学和方法都难免其局限性，并可能被其他理论和方法所超越。这里就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内涵即价值。除了深刻的科学内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还具有鲜明的价值意味。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和方法，而且也是或者说更是一套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既在于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科学性，又在于或者说更在于价值立场——为天下劳苦大众立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新闻学等，归根结底无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无不是为人民大众说话的，马克思主义是天下劳苦人和穷苦人的学问。比如，新中国诞生整整100年前的1849年，马克思曾在资产阶级法庭上慷慨陈词：“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今天所讲的“耳目喉舌”理论即由此而来。

立场：左或右

北京大学有位政治学教授在回答政治上的左右问题时说过：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正派。这多少像外交辞令，巧妙地回避了问题。

事实上，20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低潮，整个世界偏向右转，左翼、左派等不断被污名化、妖魔化。所以，现在人们对左的敏感就像当年对右的敏感一样。如今，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左翼、左派，当然也没有多少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右翼、右派。我国新闻理论泰斗甘惜分先生，针对有人称他左派的说法直言不讳地诘问道：

> 在西方尚且允许探讨马克思主义，说明那里还有一点学术民主，为什么在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呢，真正的左派（不是打引号的“左”派）有什么不好呢。（《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

中国人一向讲究饮食，孔夫子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有关饮食文化的传统不亚于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唐诗宋词等。根据新近获得茅盾文学奖作品《暗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有段台词：

> 民以食为天哪。代主任有所不知，我钱某人生来就好吃。说起吃我推崇中国菜，有五味、五色、五香之说。五味酸甜苦辣咸，五色红黄蓝白黑，五香花椒、大料、陈皮、丁香、桂皮。另外，吃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解口腹之欲。吃还可以食补、食疗，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人生无大事，吃就是大事啊。

但耐人寻味的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写道，马桥人把所有美食统统叫做“糖”，把各种美味全都说成“甜”，同老外把不同的辣都称hot，新疆人把美味佳肴都叫“香”如出一辙。左与右的概念也有点类似于此，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社会现象被归结为一个字——左或右。所以，在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时，首先需对其中的复杂性有充分估计。

应该说，左右之分在政治上不无道理，也有益于把握问题的实质。如果大致给左右划界的话，那么，通常说来，左翼倾向大多数底层民众，所以一向倡导平等；而右翼倾向少部分高层精英，所以一贯主张自由，只有自由才最利于实现高人一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权力”与“权利”。以名言“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著称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中产阶级主张自由，穷苦人渴望平等。那么，怎么协调这对矛盾呢？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黄万盛认为，应以博爱统领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博爱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高理想。他说：

> 自由、平等、博爱是不能分割的统一的价值整体，其核心就是博爱。博爱就是友情，就是普遍的同情。没有了博爱，自由就是心安理得地制造差别、恃强凌弱；同样，没有了博爱，平等就是光明正大地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只有博爱，人们才真正可能在自由中追求平等，在平等中实现自由。（《革命不是一种原罪》）

新中国即将迎来60周岁的生日。假如不惮简单的话，那么前30年是一种平等主导的发展，后30年是一种自由主导的发展。现在有一种普遍的错觉，认为新中国的前30年只有“运动”，没有发展。事实上，正如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以翔实数据和不争事实所表明的，前30年不仅发展迅猛，而且为改革开放奠定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他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也收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拓展读本》一书。当然，这种平等主导的发展一旦过头，势必成为大锅饭，导致平均主义和极“左”，于是才有“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所谓拨乱反正，无非是把过头的事情扳回常态。不过，矫枉有时难免过正，特别是前些年在市场经济下强调自由而忽略平等，强调效率而忽略公平，又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极端不叫极右，而叫“新自由主义”。最近，香港《东方日报》发表短评《金融海啸：世界向左转中国向右行》，虽然不无偏激，分析也失之粗浅，但其中涉及的部分问题和现象还是发人深思的。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邓小平说过一番朴素而深刻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针对当时僵化教条的极“左”思想说的，现在这番话又可用于同样僵化教条的极右思潮或新自由主义了。极“左”与极右虽在政治上针锋相对，但在认识上又同出一辙，即不是实事求是，而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所以，现在中国又面临一场新的思想解放，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如果说改革开放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实现了从极“左”回归常态，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从极右或新自由主义回归常态了。

在政治光谱上，世界上的所有共产党或社会主义派别都属于左翼。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国光，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时特别指出：

>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思想潮流中就是左派理论，共产党是左派政党，邓小平也是左派。如果不带引号的左也要反，那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那还有什么共产党领导？见左就避之唯恐不及，像躲瘟疫一般，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反“左”防右中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不是正常的左。共产党要明确自己

就是左派政党，态度要鲜明。共产党事实上执行的是中左路线，团结中右，反对极右！防止极“左”。

在左翼阵营里，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看到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也就是现在民主党派之一“民革”，看到鲁迅、茅盾、聂耳及其《义勇军进行曲》，看到新闻人徐铸成、范敬宜——虽然错划为“右派”，看到世界上反帝反殖的正义人士，如拉美英雄切·格瓦拉、名著《一九八四》作者乔治·奥威尔，以及欧美所有思想大家，包括同新闻传播学关系密切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北美政治经济学派，包括哈贝马斯、福柯、布尔迪厄等。当然，左翼阵营里也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康生、“四人帮”等——极“左”的代表。

在右翼谱系里，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看到跨国公司、垄断财团及其代理人如买办，看到蒋介石、小布什、麻生太郎等。同样，还可以看到希特勒、3K党——极右的代表。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将政治上的左右之别概括如下：

> 传统意义上的右翼是西方议会中的保守派，左翼是西方议会中的民主派和激进派。右翼多半和遗老遗少、王公贵族和宗教势力有关，而左翼则代表新兴势力，如各种民主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夹处激进、保守之间，往往是中间派。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极右翼，托派和无政府主义是极左翼。这是大致的划分，情况经常变。现在，左右两翼不断分化，有所谓新左新右。很多玩经济、玩选举、玩战争的，都是右翼的变种。很多玩理论、玩环保、玩人权的（还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同性恋等等），都是左翼的变种。

面对政治上的“左偏”与“右袒”，何去何从，取决于各自的立场和选择。当年，许多热血青年满怀理想、奔向延安，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大业，同时也有不少青年献身“党国”，为蒋家王朝、四大家族效力。

“去政治化的政治”

一次博士生面试，我们请考生列举十部经济学名著。一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高才生居然没有列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为什么，说《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不是经济学。这个回答从一个侧面显示了

当今的潮流——“去政治化的政治”。众所周知，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本来就同天下人的身家性命息息相关，从而具有突出的政治意味。何况，世界上哪家经济学，不是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哪个影响广泛的西方经济学家不是在讲政治经济学——即便名为经济学？世界上、历史上哪里有纯粹的经济学？就拿当今风头甚健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哪个在讲纯粹的经济学，而哪个不具有鲜明而突出的政治意味，就像马克思的经济学具有鲜明而突出的政治意味一样。

对新闻人来说，政治觉悟、政治素质、政治眼光、政治胸怀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政治上不开窍的人，永远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新闻人。这是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一再证明的，没有例外！一流的新闻人，永远都是政治家。甘老在谈及当年与王中先生的争鸣时明确指出：

> 我与王中同志的根本分歧是怎样看待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或者说，在新闻工作中淡化政治。我则认为新闻与政治是分离不了的，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虽然不能说报纸上每一角落都与政治有关（例如有些娱乐性的版面、关于自然界的版面以及广告之类），但就一张报纸的整体来说，很难说与政治无关。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先进的政治，还是保守落后的政治，报纸总是与某一政治立场相联系。不为这种政治服务就为另一种政治服务。如果他们说自己只是编辑，不懂政治，那他们不是装蒜，就是傻瓜。

《百年孤独》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美“爆炸文学”的代表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答新闻与文学关系的问题时也强调：

> 现在我认为，过去也一直认为，我想将来我也永远认为自己（在一般意义上说）既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此外，我还认为，作为小说家，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来自我对新闻工作的爱好、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和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经验。这为我培养了对现实的感受力。没有这种感受力，任何小说家也不可能成功。当然，我最美好的东西即政治觉悟，也是来自新闻工作。而政治觉悟，众所周知，是对现实的感受能力的最高表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论加西亚·马尔克斯》）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从外延上看，政治无非是天下大事，私人琐

事自然不构成政治，但天下人的琐事就成为政治了，比如生儿育女的计划生育、涉及千家万户的教育问题等。从本质上讲，政治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阶级集团的利益博弈，于是，分清敌友自然成为古今政治的要义，就像下棋、打牌或比赛首先得明确对手一样。德国政治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学生卡尔·施米特，在代表作《政治的概念》一书里鲜明指出，政治的核心在于“敌友之辨”，恰似道德的核心是善恶之辨、美学的核心是美丑之辨等。同样，《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开宗明义也说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番话虽然是针对中国革命讲的，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实际上也是一切政治的首要问题。当年在延安，毛泽东与胡耀邦有一段风趣的对话：什么是军事？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聪明的英国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故有“国家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之说，而利益恰是政治的核心和宗旨。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处于极度的政治化状态，连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也打上鲜明的政治烙印——其实是极左政治的烙印。比如，“文革”期间，有的地方买东西，都要先说一句政治口语：“斗私批修，同志，我想买盒火柴。”“继续革命，给你的火柴。”改革开放后，出于对教条化的极“左”政治的厌恶，社会上一度弥漫着远离政治、不讲政治、告别政治的风气，出现去政治化的潮流。而1990年代以来，政治又进入公众视野，因为人们发现政治原来是离不开的，你不讲政治，自有人讲政治，没有这种政治，自有那种政治。“去政治化”的结果，不过是另外的政治。沸沸扬扬的电影《色·戒》，就是典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读书》杂志发表文章《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精辟指出：

> 这种“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取向，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恐怕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真正主流的政治。《色·戒》不过是个小小的例证。这股潮流的形成，或许在某些具体情境或具体作品中包含着应对舆论监管的现实策略，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特别是二十世纪革命史），以及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化的消费社会有关。它是一种自觉的，甚至集体无意识的时代潮流。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主打的正是“人

性”这张牌，它的具体表现方式往往是“情感”，并附加审美包装。典型作品如《泰坦尼克号》，那是超越贫富、超越阶级乃至超越生死、超越时间的“爱”——呵呵，唯一没超越的是性别，那会影响它的普适性。

其实，没有人能做到纯粹的“不讲政治”，无非是有选择地讲，讲什么，怎么讲，判然有别。所谓“人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批判。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往往指向二十世纪乃至近代以来的革命史，通过批判革命的暴力，表达个体的悲剧，来否认革命这个所谓“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并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

自由与政治

2008年第一期《南方周末》评论员文章，以煽情笔调呼喊“让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关于自由的话题，向来聚讼纷纭。如果概括一种公认的看法，那么唯一得到认可的就是自由属于政治概念，所谓自由是指政治上的自由，而非诸如精神超越的自由。精神自由在老庄思想里已经阐述得非常透彻，江姐等革命烈士在渣滓洞也可以享受这种自由，萨达姆被小布什关在大牢里还可以继续写作。捷克民族英雄、著名记者伏契克，在法西斯的监牢里照样完成了享誉世界的作品《绞刑架下的报告》，其中写到即使在盖世太保的审讯室里也能思索，“谁能强迫思想也规规矩矩地坐着不动呢”？可见，自由问题并不是在精神层面讲的，而是在政治层面讲的。

据说，解放前夕有人劝胡适留在大陆，毛泽东答应他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而胡适回答：美国有面包，有自由；苏联有面包，没自由；新中国没面包，没自由。同样，自由主义文人、《观察》周刊的储安平也表达类似的看法：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统治下，自由是有无的问题。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是自由，谁的自由，如何看待自由？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自有不同的回答。在一个存在着阶级差别和社会分层，存在着剥削、压迫、侵略的世界上，那种纯洁如玉、宛若天使、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由恐怕是不存在的，最多只像乌托邦似的存在于想象之中，或如白雪公主与白马王子的动人故事一样存在于美丽的童话之中。如同其他现实的社会问题一样，政治上的自由总是同实际的历史

环境、具体的社会关系交融一体的，因此总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比如，有帝国主义列强的自由，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自由；有国民党特务的自由，就没有民主进步人士的自由；有官商勾结倒卖国企的自由，就没有下岗工人的自由；有小布什穷兵黩武的自由，就没有伊拉克人民、阿富汗人民的自由，等等。

如果不迷信教条字眼，而把目光投向千百万人的社会历史实践，那么不难看到当有人觉得新中国没面包、没自由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如《歌唱祖国》抒发的自由心声——“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与此同时，也是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宣布“列强在中国海岸随便架几门炮就能为所欲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时候。几亿人民的翻身解放、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同样是自由，而且是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天大自由。2003 年，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文版序言里写道：

> 人们很轻易就忘记——许多人已经忘记或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今日的中国是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产物。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所有现代革命中规模最宏大、最受人民拥护，并且可能是最富有英雄气概的革命。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名著《正义论》的作者、哈佛教授罗尔斯，1960 年代曾为三个悖论困扰：如果民主是个合理的制度，那么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如果民主是一种人性的、能够反映平等愿望的制度，那么为什么美国的种族冲突如此严重；如果民主是个有希望的、可以面向未来的制度，那么为什么美国年轻人如此绝望。这里且不论他的思考有多少道理，至少其中体现着一种知人论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开放务实的胸怀。

当然，西方的自由主义及其新闻观如同世界上其他主义及其新闻观一样，都有合理的内涵和科学的价值，值得认真汲取——事实上中国也在不断汲取。这里，关键在于如何将其精华有机融入具体的新闻传播实践，而不是照本宣科地全盘照搬或理论平移。对待自由主义也应该像对待其他主义一样，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精神，少一些教条主义的迷信，正如有作者指出的：不妨问一问名为自由的主义是不是都是争取自由的主义，正如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都是有益于社会的主义。

方 法 论

当下中国有两种极端的思潮，一种是极右，一种是极左。本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文章，也对此进行了专题分析。两种思潮各有自己的传播渠道，极右思潮占据了一些“主流媒体”，而极左思潮由于受到抑制往往通过网络媒体和人际交往发生影响。

应该承认，两种思潮都有各自生成的社会历史环境，即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客观上也能平衡和制约彼此的偏颇与极端，但相对于和平发展的“主旋律”显然均属“噪音”、“杂音”。不带明显政治偏见地看，当下中国应该说是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至少解决了“挨打”与“挨饿”两大生死攸关的问题，综合国力也明显提升，尽管还存在新的、严峻的问题，包括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住房等。这样的发展时期来之不易，是付出多少生命和鲜血的代价得来的，也是大大小小多少历史经验和教训换来的。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一言以蔽之，就是老子那句至理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大国就像烹调小鱼，小鱼十分鲜嫩，必须把握火候，小心翼翼才行，而不能急于求成，三下五除二，那样就七零八落不成样子了。长篇小说《白鹿原》也借关中大儒朱先生之口反复申述，不能像翻烧饼似的颠来倒去。在这个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在如此差异巨大、情况复杂的社会，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稳健，不能不走一步，看两步，进两步，退一步，而不能大刀阔斧，更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而且，世上的事情往往是兴一利，必兴一弊，利越大，则弊愈甚，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好事。如招商引资固然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但同时又难免带来一系列资源和环境方面的问题，从而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再如，放弃独立自主，奉行对外开放，显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获得变革的动力和活力，但同时也就面临叵测的风险和危机，就像那句套话说的，华尔街打个喷嚏，我们都得跟着感冒。所以，国防大学副校长许志功教授在一篇被《新华文摘》转发的头题文章里指出：

> 为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种倾向走向另一种倾向的情况，必须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反“左”防右、反右防“左”的方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了这一方针，既反对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也反对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30 年改革开放的回顾与思考》)

诸如此类的问题除了政治倾向和政治立场的差异，也无不涉及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简单说，就是如何使逻辑自恰的理论同生动流变的实践达到统一或一致，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具体说来，在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时，有四对关系需要把握和平衡：

一、是片面的还是全面的。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极左到极右在方法论上显然都是片面的。片面的认识即使再深刻，如所谓“片面的深刻”，也如现代派艺术的世界图景，往往被扭曲变形。

二、是联系的还是孤立的。学生容易孤立地看问题，还不善于用系统的、联系的思路进行分析，个中的原因恐怕也在于知识和阅历都还有所欠缺，有时不免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其四等。比如，有人喜欢拿民国的事情暗示当下的问题(不是说当下没有问题，而是说当下问题需要联系当下情景)，其中有一种与学生直接有关的说法：民国出了什么什么人才，出了多少多少人才。这里且不论诸如此类的比附有多少合理性，至少有一个情况是不应该忽略和回避的，即当时教授与学生的比例。最近，刚刚听了一场朱佳木的报告，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任胡乔木的秘书，他父亲是老清华的学子。他说，他父亲 1926 年考入清华经济系时，全系只有 7 名学生，比现在一个小点院系一年的博士生还少，而现在的经济系怎么的也得 70 人，大些的甚至可能 700 人吧。再如，有人往往称道西南联大的成就，而忽略三所名校在如此封闭环境下办学的条件，这个条件意味着学生只能专心学习。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今天把清华、北大、复旦集中起来，放在帕米尔高原办一所联合大学，是不是也能出一批旷世之才呢？另外，事实也表明，与西南联合大学同时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著名的“鲁艺”等同样出了成千上万的人才，而且是在更加简陋、更加艰苦的条件之下，而这些人才也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骨干，包括共和国首屈一指的新闻理论家甘惜分。

三、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前者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而后者是剥离问题所处的复杂环境，用抽象的理论、甚至统一的尺度教条地看待事

物，使之成为离开活水的死鱼。黄宗智在研究中国的法律制度时发现，共产党人早期提倡婚姻自由的激进主张，建国后便面临一系列具体情况，按照以往允诺的“单方要求离婚便允许离婚”，势必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如个别进城干部抛弃“糟糠之妻”，从而引发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反弹。所以，“在法律领域，毛泽东时代相应特殊历史要求而在民间和社区调解制度之上广泛运用了法庭调解制度”，而不是形式化地遵奉权利原则，抽象地倡导“婚姻自由”、“离婚自主”等（《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四、是变化的还是静止的。以前面提到的自由主义为例，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最大的政治自由，比起列强侵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并没有就此停止，事实上改革开放前还存在一系列不足，包括忽视、无视或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问题，如“文革”期间的“无法无天”。而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的自由、民主、文明的程度不断得到提升，人民的言论表达自由以及社会舆论空间都大幅度拓展。同样，目前的情况也不是十全十美，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依然需要放在发展的进程看待，需要用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思路予以理解和把握。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到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的战斗力。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今天，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的新闻传播界和新闻传播学，不过数量已不是一百个到两百个，而可能是一千个到两千个，甚至一万个到两万个。

综合今天报告的意思，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有一种开放而务实的心态，不为“左”或右的教条所束缚。其次，应该明确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确立自己的政治立场，培育审时度势的政治素质。最后，应该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将理论、历史与实际有机结合。这就是今天的主题——立场、观点和方法。

2008年11月于清华



文化自觉：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一点反思[①]

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当下不同学科和学人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何谓文化自觉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的创办人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1940年）前面写下四段告白，对此已经给予深切洞明的阐发：

> 一、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
>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
>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
>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述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时隔半个世纪，费孝通先生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关于这个著名思想及其提法，刘梦溪先生为纪念费孝通逝世一周年所作的发言有段简明扼要的概括：

> 这个思想是他在晚年提出来的，是他的独创。按费老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

① 本文系根据2009年在中国传媒大学和201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为博士生、硕士生所作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刊于《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5期。感谢丁俊杰教授、陈韬文教授、吴予敏教授为此所做的工作。

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个思想对当今中国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价值格外深远。

概而言之，所谓文化自觉及其宗旨，就是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004 年以来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论坛，在其编辑的年度报告前言里将文化自觉概括为“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命题的“文化”，其实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以及其他社会领域；而“自觉”则是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

文化自觉的前提，在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认同，这个认同基于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中国是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古老文明，近代以来又经历一百多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这是一个立足自身传统与现实、应对外来危机与挑战的过程，照搬现成模式既在历史上留下败笔，也难免将现实中国及其变革引入歧途。另一方面，所谓全球化浪潮隐含着一种支配性逻辑和同质化趋势，虽然中国社会需要也始终在借鉴其他优秀文化传统，从欧洲到日本，从苏联到美国，但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共同体，中国又不能不确立和保持独立自主的格局。

第二次思想解放

如果说三十年前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潮涌动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话，那么如今以文化自觉为标志的精神觉醒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虽然媒体上不乏“第二次”“第三次”“第 N 次”思想解放等说法，其实充其量多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余波。随着中国崛起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越来越多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学人意识到，只有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才能避免或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切实践行中国道路。不过，就学界总体状况而言，目前“我们

距离文化自觉有好大一段距离，如果不是南其辕北其辙的话”（刘梦溪）。新闻传播学界也不例外，有些情形甚至更为严重。

比如，无论新中国六十年，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新闻传播领域无不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经验，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值得认真开掘的学术矿藏。然而，当下的研究状态却往往同实践本身形格势禁，每年涌现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要么不怎么关注中国问题，要么一事当前，先找一套所谓理论——通常是西方或美国的现成理论，驴唇马嘴地套用一番，就像朱学勤形象比喻的，解释中国问题却不远万里，远涉重洋，先绕道巴黎、伦敦、华盛顿，最后才落脚中国大地。多少了解历史就知道，这正是当年言必称苏联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路数，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路数早已沦为历史的笑柄，而如今又日渐风行。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里，对言必称美国的今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所作的批评也值得我们深思：

> 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仍然想跑到美国并且投到美国东方学家的麾下，然后回来向本地的听众重复被我一直称为东方学教条的那些陈词滥调。这一再生产体制的必然结果是，东方学者因他在美国所受的训练而睥睨其本地同行，因为他学会了如何有效地“操作”东方学的话语；而在他的“老板”——即欧洲或美国的东方学家——眼中，他则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本地信息提供者”。

再如，现实中国及其新闻传播领域存在大量需要研究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和理论性对中国、对世界都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本该最富创造活力的年轻学人，面对鲜活的、生动的、风起云涌的实践于不顾，而总喜欢把玩所谓“研究方法”，仿佛方法属于超然物外的东西，具有无所不胜的魔力，一旦拥有它，就像拥有阿里巴巴的魔咒，一切学术宝库都将应声而开。于是，他们既不怎么关注生机勃勃的中国实践，又不愿对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独立思考与深入分析，而总想着把那个貌似客观、中立、科学的方法弄得精致无比、精巧无比。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一些学界中人看来，所谓方法俨然只剩一种，那种据说是美国通用的、统计量化的、一堆表格一堆问卷的东西。一提方法就是这个东西，似乎别的路数都不是方法。按照这个标准，古今中外无数思想成果与学问都没有方法，包括极大影响了历史的著述，

如《资本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也包括徐宝璜、甘惜分、王中等中国新闻学先辈的理论。而如此荒谬可笑的逻辑，仿佛被当下一些学者津津乐道。于是，面对一项研究，往往不问其他，而先问用了什么理论（当然指西方理论），用了什么方法（多指量化方法）。实际上，美国那套流行方法也只是不同方法里的一种，许多时候甚至是无关宏旨的方法，连西方人也不觉得“悠悠万世，惟此惟大”（1998 年世界社会学大会产生的《20 世纪社会科学百部经典书目》就是一例），而在我们这里俨然成为唯一正宗的东西。以这种学术心态，如何建立、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呢？社会学家黄平的批评不无道理：

> 现在所谓社会科学的伪科学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它既没有文史哲的厚重，也没有数学、物理学的那个形式。我自己身在其中，我列过五个社会科学的“不三不四”：第一，你讲故事不如记者来得快；第二，不如文学家来得生动；第三，不如统计局的数据来得准确；第四，对体制的问题不如身在其中的官员体会深刻；第五，不如当事人，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对事情把握得准。于是就弄了一些社会学的概念往那儿一堆，列出一些图表来骗人。

总之，审视当下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特别是那些看似新潮、新锐的研究不难发现，介绍外国（通常是美国）学术或讨论外国学术源流的东西多于深思中国问题的研究，搬用外国理论及方法的著述多于探究中国实践的思考。基于所谓普世主义，一些学人甚至以为外国（通常还是美国）学界关注的问题就是或应当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问题，于是难免忽略中国自身的重大问题及其蕴含。这种学术殖民化或自我学术殖民化的趋势，应该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有句广为人知并广为征引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其一贯的学术志向与情怀而言，陈先生表达的正是一种鲜明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面对西潮滚滚，举世滔滔，这位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挺身而出，以纵览古今、贯通中西的博大学识与精神境界，提出这一清醒的、高瞻远瞩的、不肯随波

逐流的主张。吊诡的是，陈先生的本意竟被误解或曲解。在一些学人看来，摆出叫板中国及其传统的姿态才叫独立，服膺一套主宰世界的“潮流”就是自由。这同陈先生的本意恐怕南辕北辙，因为其本意恰恰在于对近代以来形形色色“潮流”的质疑，从而达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样，没有这种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没有基于温情与敬意、同情与理解、兼容与并包的文化自觉，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就将始终以尾随者的姿态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面，在日益崛起的中国和日益发展的实践面前，时常扮演一个“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云山雾罩”、“莫名其妙”的尴尬角色，正如政治学家、中文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双聘教授王绍光反思中国政治学时揭櫫的问题——同样适用于中国新闻传播学：

> 蓬蓬勃勃的表面无法掩饰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我们提出的问题，更不会运用我们发展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的政治霸权和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我们不是不会说话，而是只会重复别人的话，没有能力与西方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更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语系。
>
>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接轨心态。接轨心态的要害是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批判意识。我们假定西方政治学是先进的、是科学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却忘了想一想这些假定本身有没有问题。愿意向西方学习是好的，但是一味盲目接受西方的理论却可能窒息自己的创造潜力。真正开放的心态应是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即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一切。

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新中国六十年的奋斗与探索，中国越来越显示自己的生机与活力，新闻传播也越来越体现自己的独立意志与创造精神。面对如此生气洋溢的新闻实践，中国学人可谓生逢其时，大有可为。我们相信，新闻传播研究一旦唤醒一种整体的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学术自信等，那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年轻学人将不负时代，不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新闻传播实践。

心弦述著



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百年中国新闻人》序

记得刚在大学新闻系任教时，曾向一位讲授中国新闻史的老师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新闻史不能像文学史那样，以作家作品为主线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多讲讲新闻人的有趣故事，多谈谈新闻人的传世之作呢？

1980年代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做学生时的直观感受。那时以至现在的新闻史，不管是课堂讲授还是教材内容，仿佛都是一种模式，即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出版了某份报刊，有几开几版，发行多少份，刊发了什么文章，产生了什么影响等。于是，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的流水账，里面很难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而满目都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如今新闻史著述尽管增加了广播、电视、网络等内容，但是叙事模式似乎依然如故。

如此一来，在大学新闻院系，新闻史便成为一门颇为尴尬的学科。一方面，从老师到学生，无不认为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专业基础，应该学好学透；另一方面，从老师到学生，又无不为它感到头疼，教者昏昏，学者沉沉。这也难怪，如此死死板板的东西，怎么可能让人有兴趣、有情绪呢。

20年前的这个老问题，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如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自然全面一些，深入一些，而不仅仅是一种想当然的感觉。比如，新闻史如果纯粹以人为主，纯粹讲故事，固然很有趣，很热闹，但弄不好也确实难以把握历史的全景与真貌，有时很可能成为演义，而不是历史。再如，新闻史研究同历史研究的情形相似，似乎越来越沉溺于“科学化”思路，将有血有肉的历史分解成这个时期、那个规律什么的，从而越来越失去应有的光彩与魅力。总之，其间因素比较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见物不见人的问题。不过，凸显人的身影、人的活动与人的精

神，总归是一切史学安身立命的根基吧。文学家爱说“文学是人学”，其实史学又何尝不是人学呢。没有人气的史学，自然也就没有生气了。

这种情况，就好比“前四史”与“后廿史”的差异。我们知道，“前四史”特别是其中的《史记》是何等引人入胜，又是何等生气勃勃，用鲁迅先生话说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广为流传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更是直接取材于“前四史”的《三国志》。至于“后廿史”特别是隋唐之后官修史馆撰写的这个史那个史，除了供学者参考外，恐怕没有几个读者肯去光顾，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它们乃是帝王将相的“家谱”。

面对新闻史的这种尴尬局面，人们也在寻求突破，并且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部图书——围绕旧中国的“报界档案”丛书和围绕新中国的《正在发生的历史》，就获得普通读者的青睐。这些学术成果的一大特色，都在于“讲述”历史而不是“讲授”历史。讲述历史，自然就会像司马迁那样以生动的笔触和饱满的热情，娓娓演绎许多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人物及其故事，从而展现历史的丰富内涵与真实原貌。而讲授历史，则难免像历代史官那样正襟危坐，高谈阔论，让普通读者永远敬而远之。

本着这样的想法与思路，去年春天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与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魏清荣先生一起，构思了一个颇为宏大的计划。这就是用一部百万字的大部头，讲述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新闻史上那些或生动有趣、或可歌可泣的人物与故事。其间，我们不讲什么大道理，而只想用众多新闻人的真实经历，尽可能展现原生态的、有滋有味的新闻画卷，宛如一幅中国新闻史的清明上河图，五彩缤纷，清新宜人。我们设想，此书的风格与面貌，应像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The Glory and the Dream*），以具体可感和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历史场景和历史故事见长，在看似轻松随意之间，勾画新闻事业的历史沧桑与人事变迁。

当然，这样的想法与思路，并不意味着没有主题，没有主线，没有思想。恰恰相反，我们正是想通过这样一幅多彩多姿、有声有色的图景，真切揭示中国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在我们看来，中国新闻史一点不比他国新闻史落伍，中国新闻人也一点不比他国新闻人逊色。我们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我们只想用中国新闻人的故事告诉世界与世人，中国新闻人为了自己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进步，一样的出类拔萃，一样的才华横溢，同时，一样的有血有肉，一样

的有情有义！

这个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选题形成后，我们与其说感到一丝兴奋，不如说感到一种压力。而作为主编，我心里更是惴惴不安。每当面对本书作者、我指导的六位研究生——朱丹、杨芳、刘蓁、涂鸣华、侯丽军、季萌时，我一方面不时责以“任务重、标准高、时间紧”，另一方面又反复用“豪言壮语”激励大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

好在这些作者不愧是清华学子，一旦引导上路，指导得法，很快就迸发出难以置信的思想活力与创造潜力。如本书执行主编涂鸣华，利用一个暑假，泡在清华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里，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最后拉出一个非常详细的写作大纲，甚至具体到每个章节目的标题（涂鸣华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2010 年毕业）。再如本书上卷主力杨芳，曾一再想打退堂鼓，但后来渐入佳境，越写越顺，越写越好，而且越写越投入，以至常常为一些新的发现、新的章节而手舞足蹈，有时还自鸣得意地考考人：“知道不知道这个……知道不知道那个……”（杨芳现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

如今，经过一番寒暑，书稿终于如期完工了。捧着这部近百万字的书稿，觉得原先沉甸甸的心头压力，已转化为书中沉甸甸的厚实内容。翻检全书，可以发现两个鲜明特征。第一，本书以史话体的形式，对中国新闻史进行了全景展示，从现代新闻事业萌发的晚清一路讲到 21 世纪，气象万千，跌宕起伏。第二，本书对中国新闻人的群体形象，进行了全面而集中的展现，既有《史记》人物列传式的浓墨重彩，又有《世说新语》人物素描式的传神勾勒，特别是新中国部分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总之，本书第一次以时间为经、以人事为纬，织就了一幅百年中国新闻人的斑斓画卷。

不言而喻，这样一项可谓前无古人的工程，这样一部堪称浩如烟海的书稿，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由这样一批初出茅庐的研究生承担，一定难免这样那样的差池，在一些细节上更有可能存在不准确、不恰当的问题。尽管反复强调准确第一，再三要求像新闻报道那样核实、核实、再核实，但是疏漏恐怕在所难免。其中，我们最感遗憾的全局性问题有两个，一是涉及的“人”“事”还不够广泛，尚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内容；二是相应的社会背景还不够丰满，从而使新闻人的形象还显单薄。所以，我们恳请各路学者与读者，多多赐教，不吝指点。为此，我们特意将一个

电子邮箱提供如下,同时希望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能够尽快出版本书的修订本。

对本书的作者而言,研究与写作的过程既是在追寻前人的"光荣与梦想",也是在实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研究生,能在读书期间完成这项工程,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我常爱对学生说,自古英雄出少年,那么这部史传就算是这些少年英雄的一次集体"亮剑"吧! 他们希望将本书"作为一朵鲜花献给中国的新闻事业,作为一盏醇酒献给中国的新闻人,作为一个路碑献给未来的新闻人"(涂鸣华)。

2005 年春于清华园



敬畏历史　珍重传统

——《中国新闻社会史》结束语

2001年，笔者调入清华大学后，师友见面总爱随口问个问题："你在清华上什么课?"对此，自己常常觉得口将言而嗫嚅，仿佛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因为，按照以往的教学科研情况，顺理成章的课程自然应属传播研究领域。然而，由于清华正在筹建新闻与传播学院，师资、课程、教材等都在陆续完善之中，比如新闻传播史的师资就付之阙如，而自己以前又讲过外国新闻史，于是就将中国、外国，本科生、研究生的新闻传播史课程全部承接下来，而传播研究方面的课程反倒日渐稀少。对于这种情况，不仅本人始料未及，估计同道也难以理解。于是，面对"上什么课"之类的问题，只好每每王顾左右。

特别是中国新闻传播史对自己来说尤属全新领域，虽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先生门下受业，完成一篇习作性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学位论文，但对近代以来的情况还是比较生疏。所以，起初开课不免有点硬着头皮的感觉。当时心想，反正是临时任务，不久即可卸任。没想到，这一上居然就上到现在，而且各种层次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算下来已讲了近十轮。更出乎意料的是，现在不仅上出"瘾"来，而且学术兴趣与科研方向都发生转向——从理论到历史，从外国到中国。

日前，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黄旦教授聚谈，发现我们在这一点上居然也颇有同感。我们相识有年，而且背景类似，经历相同，如以前都以理论见长，后来又一起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中国新闻史学科的权威等。他去复旦后，一开始也是讲授中国新闻传播史而非以前专攻的新闻理论，不料也是越上越有感觉。我们的共同感受是，中国新闻传播史领域其实大有文章可做，而且从新的理论、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看，还有大片有待开垦的学术处女地，疆域辽阔，土壤肥沃。本书就是在这片生机勃勃、生趣盎然的疆域勉力耕耘的成果或"开疆拓土"的战果，也可

以说是自己20余年教学科研和人生历程的一次小结。专业方面的想法已在书里谈过，这里再对有关事项说明一二。

首先，本书是根据授课内容记录整理的文稿。近年来，此类著述颇为盛行，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套“名师课堂讲录”就受到青睐，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钱理群先生关于现代文学，清华大学徐葆耕先生关于电影、葛兆光先生关于思想史等精彩讲录。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这种新颖的著述形式。

其次，由于主要面向普通学生和一般读者，本书省略了繁琐的、专业的注释，同时尽可能保持口语化的风格，以便于阅读和理解。另外，不加注释，既是因为本书吸收、消化、借鉴的东西难以一一注明，同时也是免得将一点粗略思想诿过于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末尾，写下一段“关于没有注释的话”，比较适合本书情况，所以照录如下：

> 这本书怎么没有注释呢？答案很简单：这里写注释，会引起误解、讨厌和不适当。会引起误解是因为我的话几乎没有一个特定的来源。列出一二部参考书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反而会漏掉其他的参考书。开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就等于抄一大堆目录，倒是适合于做一篇博士论文。不仅如此，如果遗漏了一种主要著作，那就很令人讨厌，对于没有罗列出来的作者，显得不公道。总之，注释对于专家不适当，对于非专家又没有必要。
>
> 最后，拼凑这篇故事的乐趣是借便做出推测和也许不大适当的比较。我不愿意让这种异想天开的话，叫人看起来似乎是根据一些无辜和认真的单行本作者以注释的形式列举出来的。泛泛而论的著作总是不大精确；讨论的内容越广泛就越不精确。……
>
> 这部关于中国长期灾难、斗争和再生的个人记述，是我自己的“家酿”，虽然配料是从几百部别人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

本书同样是这种“个人记述”或一家之言，也是著者从几百部相关著作里提炼的“家酿”。

最后，虽然自己一向服膺“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但历史肯定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管是历史事实，还是历史叙事，客观与真实、庄严与神圣既不能颠覆，更不容亵渎。因为，归根结底，历史乃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基。人们往往

喜欢将历史比做滔滔不息的活水，如所谓历史长河，而一代代的人就生活在这条滚滚活水的两岸，仰仗历史长河的滋润与沾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历史与理论》一书里写道："我们畅游于古代，恰似鱼儿畅游于水中，我们谁也无法逃避历史（We swim in the past like fish in water，and we cannot escape from it）。"换句话说，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的化石，而是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生命之源，是同人们的现实世界息息相关、丝丝相扣的源头活水。所以，一代代的人都必须重新诉说历史，必须自己诉说自己的历史，恰似一代代的人都必须引水蓄衍。由此说来，为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了给后代子孙留下繁衍生息的文化源流，当代史家自然有责任、有义务守护我们的历史长河。本书也正是本着这样的心意所做的微薄努力，弱水三千，但取一瓢。

最后，自应对一切促使和帮助拙著面世的师友表示谢忱。感谢业师方汉奇先生，将弟子从门外领入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堂奥，从而才可能有今天这点成果。感谢本套丛书的策划与主编戴元光教授，承蒙他的厚爱或错爱，将这本"轻薄"之作纳入其中，但愿不至于由于著者的浅陋而影响整套丛书的声誉和水平。感谢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教授和常务副秘书长李磊教授，由于他们的抬举，我才有机会将一点粗浅的体会拿来同全国新闻院系的同道交流，这就是作为本书代序的演讲。感谢江西报业集团以及集团副总编辑任辛先生，由于他们的热心相邀与安排，才促使自己将有关"新时期"的一些想法整理成文，这就是本书最后一节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最初是 2006 年应邀在江西报业集团做的报告。

感谢我在清华教过的历届学生，他们的聪敏、睿智及好学上进一直激励自己不断攀爬，不敢懈怠，教学相长在此洵非虚言。同时，本书内容也借鉴了他们的一些课业成果，如我指导的六位研究生共同完成一部近百万言的《百年中国新闻人》，拙著的许多逸闻趣事也出自这部新作（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感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04 级的五十余位本科生，由于他们的辛苦记录与悉心整理，本书才形成一个基础样本与雏形。感谢担任助教工作的研究生姜琳同学，她为我承担许多繁琐的事务性工作，并随时提供各种反馈，从而使本书的撰写得以顺畅进行。2006 年入学的博士生涂鸣华以及研究生朱一彬、罗有晗和杨科等同学通读初稿，提出有价值的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致谢！不言而喻，拙著的一应问题均由我自己负责，同时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2006 年，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将本书列为年度科研项目，并为

此提供了相应的科研经费，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2006 年八一初稿
2007 年元旦定稿

插图本附识

本书曾由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纳入其主编的“传学跋涉者丛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郁金豹先生为此多所费心，没有他们的“第一推动”，就不可能有这部增补修订的“插图本”，在此谨致谢忱！

这部“插图本”除了添加图片及对原有内容进行修订或补充，还增加了最后一讲“文化政治”，总计新添内容约占全书一半篇幅。“文化政治”一讲最初是应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黄星民教授的邀请，为他们的研究生做的学术报告，后来又在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学术演讲中进一步发挥。所以，还应该感谢黄星民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丁俊杰教授和兰州大学李文教授的盛情邀请，同时感谢负责记录的研究生朱一彬、罗有晗与杨科同学的辛苦整理！另外，在修订和完善“新时期”一节时，参考和借鉴了研究生季萌、徐博、王茜、赵晶和李强同学的有关学位论文，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博士生涂鸣华同学为配置图片付出了许多心血，博士生姚遥同学又补充了一些有价值的图片，博士生李漫同学、杨雅琼同学及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研究生王樊逸同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和清华大学历史学研究生张德付同学对新版文稿做了细致校阅——他们的努力都为本书增色添彩！

2008 年 5 月

插图本第二版跋

本书第二版杀青时，笔者适逢圣人所谓“知天命”之时，心底油然掠过一缕玄思：天命幽幽，大道之行，一介书生，如何得知。

确知的是，今年为新中国六十周年诞辰。经历一个甲子风雨兼程，如今站在乱云飞渡的全球背景下，更能深切体味“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的意蕴。

学长张文木教授笃信：神州崛起乃属天命所寄，人民共和国“奉天承运”肩负着这一使命。笔者激赏其战略眼光，也愿服膺如许信念。唯望天假以年，感领民族复兴的天命。

2009 年 9 月

插图本第二版附识

这个版本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和修订之际，包括删除代序、第六讲和附录，将民国和新中国两讲扩为六讲，新增、完善或删除许多内容等，还进一步突出前面版本的追求，具体说来：

1. 进一步突出薄古厚今的比重。
2. 进一步突出史论结合的特色。
3. 进一步突出图文并举的面貌。
4. 进一步突出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关联。
5. 进一步突出历史叙事和历史哲学的并重。

同时，进一步修订前面版本的各种疏漏或技术性差错。其间，博士生吴风、常江、姚遥和硕士生曾维康、秦珍子、沙垚又分别进行了校订，即将进入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刘宪阁博士对书稿清样作了最后审阅，指出各种需要修改的舛误，提出一些值得推敲的问题，在此一并致谢！至于其他不当与未尽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2009 年 9 月

附：

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中国新闻社会史》读后[1]

李　漫

初读李彬老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约在 2007 年冬，其后此书迭经

① 刊于《新闻爱好者》2010 年第 12 期。

裁汰增订,数易其稿,光目录就精心修改了多次。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插图本第二版面世之后,又读一遍,有些所思所得,虽不见得成熟,却是由本书所激发的,因而借此机会略作一粗疏的清理。

对于这部书,作者枕典席文孜孜跎跎,用力之勤恐怕在其所著诸书中最为突出。该书第一版即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6 月版,与最新一版插图本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版),二者间的差异之大是一目了然的。除了图片、排版、文字校对等编辑事务的精益求精,除了对史料的挖掘增补、锦上添花,除了作者一贯的晓畅通达而典雅剀切的叙事风格……我最关心的则是增补史料之外,删除了什么?为什么删除?并且除了这些删除和增补,什么才是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或者说,作者以搏虎之力而擒羊,究竟有何深意?这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如果仅仅把它看作一本叙事生动的新闻史教科书,想来对于花了如许精力的作者而言是并不能满意的,也是不客观的,虽然作者自己认为:“严格说来,本书既不是专著,也不是教材,而是一部根据授课内容记录整理的讲稿。”事实上,真正的课堂讲授和把讲授内容写成文字是两种工作,正如利科所说的:“‘写’把‘说’的偶然性去掉了”。显然,作者这么用心去做这本书,绝不简单地只是为了在众多新闻史教材中再添一种选择。因此,不管这个文本是学术专著,还是教材,或者两者都不是皆无关要紧,文本本身的独特性是什么,它存在的意义何在才是我们所要探讨和追问的。也因此,对于这个“既非专著又非教材”的独特文本,这篇“读书所感”同样既不会是一篇非常学术性的问题讨论,虽然毫无疑问会涉及到学术性的话题;也不会是一种非常感性化的好恶表白,虽然不可避免会有主观的判断;毋宁说这篇阅读感想,正是一个读者与该文本所进行的午夜倾谈式的对话。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从这部书的第一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6 月,以后简称上交大版)到插图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7 月,以后简称插图版),再到插图本第二版(以后简称插图第二版),到底哪些内容被删除了?或者至少说在目录上被删除了?对于一个诠释者而言,删除的恰恰是最值得注意的东西之一。按照诠释学派的观点,一个文本产生以后,文本的生产者对文本的诠释并不天然具有权威性。多重的解读可能会揭示原文本更多连作者都没有想到的意义。那么在这个视野里,我们可以认为,该书其实是三个独立而又相关的文本。这里,每个文本都有其历史阐释的意义,而不能简单地视为一个文本的修

订完善。如果将它们合起来读，并作一简单比较，会得到同分别读每个版本不同的体会，由此庶几可以体味作者在这一写作过程中的心境变迁。

从上交大版到插图版，再到插图第二版，变化最大的有两章，一是"范式嬗变：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是"文化政治：放眼全球谈新闻"。"范式嬗变"在交大版中作为专门的一章，到插图版则被取消而隐入文中，同时插图版比交大版中多了一篇代为序言的论文《"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以及"文化政治"一章。从插图版到插图第二版，这篇代序和"文化政治"一章也都隐去，相关内容散入文中。这显隐之间有什么意味？难道仅仅是编辑技术上的原因么？至少我的解读是否定的。目录可以说是一本书的骨架，目录的变动就意味着书的结构调整。对于这种结构的调整，除了叙事学角度的思考之外，我更关注的是其历史哲学角度的意义。

我们暂时不考虑书中展现出来的精巧叙事的能力、文采飞扬的表达和旁征博引的渊博，因为这是作者一贯的才子风格。那么，这样看时就会发现，该书第一版即上交大版的亮点是"范式嬗变"这一章的内容，应该说它是作者对新闻史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在这一章里，作者将新史学的观点引入新闻史的写作中，区别了三种范式下的历史叙事，即革命化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将三种范式新闻史中各自的特点总结为："革命化范式突出舆论动员、宣传引导，现代化范式强调新闻自由、思想启蒙，民族国家范式讲究国家认同、专业主义等。"同时，对三种范式主导的新闻史各自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可惜由于每个章节的篇幅所限，反思并没有得到深入。对于上交大版而言，民族国家范式似乎是其所依从的范式，以此将自己区别于一般"教科书"新闻史和官方新闻史所具有的革命化范式的倾向，以及一般"公共知识分子"新闻史和"自由派"新闻史所具有的现代化范式的态度。但是作者此刻同时也在思考和忧虑的是，三个范式共同特点都是西方的线性历史观，如何才能"真正把中国传统自身的特性纳入考察视野"？而这正是插图版将要做的工作。

在讨论插图版之前，需要指出，在我看来，三种范式的划分，本身是有一定问题的，如果不说是"范式"而说是叙事、方式、修辞等，可能更妥当。因为按照库恩所谓的"范式"概念，这三种"范式"只能算两种范式：政治化范式与非政治化范式。因为，无论是"革命化'范式'"（毋宁称为

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是一种政治化范式。正如书中所概括的,“革命化范式强调宣传,现代化范式突出自由”,而宣传与自由、革命与改良/现代化、救亡与启蒙都是一种政治化范式。至于民族国家范式,其实质则是国家化范式,是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范式。因此三种范式/叙事的前两种是政治立场相反的政治化叙事,它们的相反相争正合乎库恩范式的定义:观点不同却遵循同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反映在新闻史的范式上就是政治立场。前两种“范式”虽然政治立场相左,但都一定是有政治立场的,这是前提。然而,民族国家范式(这个名称也许换成国家化范式更妥当)在本质上其实是取消政治立场的,在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之前,没有政治上的善恶。不过,在分析新闻史的叙事时,用这三种“范式”来归纳,显然要比用政治化与非政治化范式来归纳要清晰得多,只不过范式这个词用得不够准确。但在范式已被滥用得有失原意的情况下,我们权且继续沿用“范式”这个概念吧。

插图版的问世,表明作者多少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而且并不满意于依从本质上是非政治化的“民族国家范式”的新闻史叙事,因为可以看得出文本的内容的确是有比较鲜明的政治立场的。因而,很自然的,本来就已经有很大意义创新的“范式革命”的一章,在这一版本里却被大刀阔斧地芟除了,并将内容化入第五章。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版本中,添加了论文《“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作为代序,通过这篇论文明确提出了插图版的书写目标是社会史范式与叙事学方法相结合。将社会史范式引入新闻史写作,无疑也是一项值得注意的创新。这种引入才使得本书的题名《中国新闻社会史》真正具有了社会史的意味,这是上交大版所不具有的。更重要的变化出现在插图版的第六章,即“文化政治:放眼全球谈新闻”。将文化政治作为一章,是很醒目而有深意的。对于没有政治立场的新闻史叙事,即非政治化的“民族国家范式”的新闻史叙事,作者在这个版本中也刻意想要避免受其影响。因而,特意添加了文化政治这一章。在这一章里,着重讨论了去政治化的现代政治社会中,如何重塑政治的、文化的权力与信心。抵抗这种名义上非政治化而本质上的政治化,正是插图版的意指所向。这种将政治/文化政治的重要性以专门一章的形式予以凸显,更显示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特别的关注与忧虑。寄希望于激起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此通过争取“文化领导权”来转换西方的线性历史观对当代中国历史叙事的宰制。

但是出人意表的是插图第二版的目录中竟又重新取消了序言和文化政治这一章，而将原先的“风雨苍黄”和“红日初升”两章经过增补各分为上中下三章。乍一看目录，作者似乎将自己的立场取消了，又采取了非政治化的叙事模式。然而，细读之后才发现，在全书的各个角落，似乎都回响着一种犹如呢喃独语的声音，一刻也不停地激发着读者去思考：什么是中国历史，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虽经数千年的沧桑沉浮却始终“其命维新”的原因何在。阅读过程中，如果不自我提醒一下，几乎会忘了这是一本新闻史学的论著，而像是通过一位名叫“新闻”的导游在阅读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阅读中国社会，阅读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和奇闻轶事。插图第二版在完全延续插图第一版以社会史的范式与叙事学的方法为写作特色之际，又增加了一种特色，那就是历史/政治观的进一步“内在化”，然而却是一种一目了然的内在化。将政治观与历史哲学观用叙事学的方法，包括春秋笔法的论述，蕴含在更容易让年轻读者接受的文本中，使得他们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得到了价值判断的能力。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篇代序被删除了，因为社会史范式的提出是与政治史范式相对应的。政治史范式的从上到下视角、关注历史趋势与总体结构，同社会史范式从下到上视角、关注历史细节与个体经验正好相反。然而，可以看出，虽然书中将一个个新闻人的个体经验鲜活地表现出来，一个个独特而重要的文本重新得到展示，但《中国新闻社会史》仍然是一部从上到下的历史论述，这里的新闻史解读仍然并没有脱离试图对结构变迁的把握和描述，因而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个社会史范式的论著。将这篇代序言删去，也许是出于这个考虑。但社会范式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整体观与通史观使得文本自身具有了单纯政治史范式的论著所不具有的独特魅力，那就是在描述历史迁演、天命代易的同时，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历史社会画卷。作者一再引用钱穆所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一文本庶几得到作者个体性的实践。

插图第二版同时被删除的文化政治一章，其核心观点事实上已化为青烟散入字海。虽然没有独立成为章节，但对于文化政治的关注，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注重，对于文化自觉的激发，对于文化自信的培养等，书中在在皆是，甚至大段的表述也是随处可见。因而，要不要这一专门的章节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能将其本质得到传达，所谓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此之谓欤？因而，取消序言和文化政治一章并非一

种非政治化的表现,而是出于一种修辞学的思考。从非政治化到再政治化,再下一步如何走?再政治化的方式分两种,一种也许可以用施特劳斯所说的"显白的教诲(exoteric teaching)"比喻,施特劳斯常常引用伏尔泰的一句话:"勇者的天命就是将他的所思所想自由地表白出来"(Le partage du brave homme est d'expliquer librement ses pensées.),这种直白的表达是坚决而明确的,如阳光一样烛照人心。另一种也许可以用歌德所说的"音韵袅袅(der Nachklang)"比喻,歌德有咏月诗曰:"你洒入丛林与河谷/静默而迷朦的清晖/而我的灵魂/化为清光把你追随。"(Füllest wieder Busch und Tal/Still mit Nebelglanz/Lösest endlich auch einmal/Meine Seele ganz)这种让人不知不觉的温和,如月光一样润泽灵魂。两种方式本书似乎都有所采用,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这种如歌德月光般静默温和、照物无声的方式体现出来。

因而,我们也许可以作一个不恰当的概括,《中国新闻社会史》的文本所体现出来的符号实践,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文本自身成长的历程:由对新闻史普遍存在的两种政治化(革命化与现代化)的现状不满意,而产生了一个非政治化倾向的文本(民族国家范式的上交大版);继而由于对上交大版的非政治化倾向的不满意和对"为什么不能政治化"问题的再度思考,文本转向了"新新闻史"的实践(插图版),即社会史的范式加叙事学的方法;由于社会史的范式不足以容纳文本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视野,因而"文化政治"这一章便自然(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而突兀(文学与史学叙事意义上的)地出现了,文本再度政治化,以一种"直白的"方式;然而,在政治化仍然被庸俗地理解为官方的、"文革"式的、意识形态化的、宣传的、愚民的(或者将与之相反的自由主义政治化理解为启蒙的、客观的、真实的),而非政治化与政治化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的时候,伏尔泰式的勇者是无助的,而且关键不在无助而在无效,因而,序言与文化政治一章又自然(文学与史学叙事意义上的)地消失了——毋宁说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以一种更具史学修辞特征而更有自信的方式存在着了。

总之,这个文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恰恰体现在这个似乎不重要的目录—结构的变迁之中,以自身的成长或变动实践了作者本身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插图第二版)。至于作者的思想究竟如何,只能用王维的一句诗来描述了: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

新闻的“精气神儿”

——《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前言

本书初衷在于为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提供一部原典或经典的专业读本，类似文学专业的“作品选”、“文论选”等。说起来，新闻史与文学史都不离两类研究，一类是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一类是文选，如《昭明文选》。如果说专著相当于人的骨骼，那么文选就好比人的血肉，至于贯穿其中的思想则恰似人的生命或灵魂。

若以1917年商务印书馆《上海闲话》一书的长文《上海报业小史》（姚公鹤）为起点，中国新闻史研究已逾90年历史，从1927年戈公振先生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算起，这门学科也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代新闻史学者孜孜探求，默默耕耘，使这片学术园地日益成为新闻学的大后方和根据地，为整个学科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中，中国新闻史研究更是取得一系列突出进展，涌现一大批厚重之作，不仅得到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嘉许，而且也引起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关注。以新闻研究最高荣誉奖“吴玉章新闻奖”为例，获奖著述多半为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成果。

当然，中国新闻史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发展也不平衡。以高校的教学为例，新闻史专著就远远多于新闻史文选，据说仅冠“中国新闻史”之名的教科书就不下百部。与此相对，学生急需的“文选”却极度匮乏，根本无法满足莘莘学子和芸芸读者的需求。统计一下，目前的新闻史文选确实屈指可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参考资料》(1981)；

方汉奇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1982)；

谷长岭、俞家庆编《中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1987)；

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1987);
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文选》(1998);
……

这些文选虽为当时的教学科研提供了宝贵参考,产生了积极效果。然而,随着学科发展和时代变迁,其中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大略说来有三点。其一,所选文本基本截止于新中国成立,此后六十年的发展往往付之阙如。其二,选材题材比较单一,多以报业为主,既缺乏其他新闻媒体内容,也较少涉及相关社会背景,对当今学子和读者来说未免陈旧,难覆所用。其三,即使如此,这些著述也早已脱销,无处寻觅。所以,不管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方面讲,还是从满足读者现实需求的角度看,重新编选一部中国新闻史文选都可谓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正是面对这种窘迫局面,我们才不揣浅陋编选了这部文选,以应教学之需和学生之急。之所以称为“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也是为了同拙著《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版)相配套。这部文选上迄先秦,下至当代,共遴选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原典或经典文献约150篇,此外还有只列篇名未录正文的100篇“存目”。为方便读者了解有关背景,我们为每篇文章都撰写了“题解”,如《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的题解: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国别史,也称《春秋外传》,杂记西周及春秋时期八国的人物、事迹和言论,旧说为左丘明所著,司马迁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据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矇”的目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或新闻,左丘明就是略早于孔子的一位著名瞽矇。瞽矇讲述的历史或新闻被后人记录,整理成文,就称为《语》,按照国别区分有《周语》、《鲁语》等,总称《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选自《国语·周语》。文中记述周卿士邵穆公规劝周厉王的一段谈话,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一个重要道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对于人民的言论,执政者应该疏导而不应该堵塞。

再如为“草原英雄小姐妹”报道所写的题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个蒙古族小姑娘为保护公社羊群同暴风雪搏斗一昼夜的故事,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伴随新闻报道,她们的名字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从此

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当时,“草原英雄小姐妹”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等艺术作品,编入小学课本。另外,由刘德海等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同管弦乐《红旗颂》(吕其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何占豪、陈钢)、钢琴协奏曲《黄河》(殷承宗)、交响诗《嘎达梅林》(辛沪光)以及音乐会组曲《红色娘子军》(吴祖强等)等,一同构成新中国最美的音乐篇章与红色经典。

不言而喻,任何学科的任何文选都不是纯粹的“资料汇编”,其中无不体现着特定的意图或旨归,从而才有选什么、不选什么的裁量。正如孔子编选《诗经》不只在于含英咀华,更是张扬一种“真、善、美”的社会价值和伦常观念,也就是《论语·为政》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关于文选及意义,鲁迅先生曾写道: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取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集外集·选本》)

那么,这部《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的意图或旨归是什么呢?

一方面,首先自然是为新闻人(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提供一部有用有益并有趣的专业参考书。从读者角度着想,我们在编选过程中主要考虑如下因素。一是篇幅适中,即选材方面既不过于庞杂,也不过于简略,一册在手,精华在握。过于庞杂,对一般人来说显然没有必要,徒增阅读压力和经济负担;过于简略,则又难以反映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全貌和时代风云,无法使人尽情领略其间的万千气象和新闻魅力。二是将经典性与可读性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希望选出中国新闻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里程碑文献,以体现“参考、借鉴和启发”等价值,而且希望选出的文字对普通读者也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而不仅仅是有利于专业学习及其研究。虽说新闻史文选不大可能都像文学史文选那样具有可读性,但在不影响经典性或权威性前提之下,我们也尽可能兼顾文章的多姿多彩、有滋有味。三是将新闻史内容与社会史视野有机融合,尽可能体现新闻与社会的多重互动。另外,本书还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拓展。在时间维度上,本书上迄先秦的《春秋左氏传》,下至21世纪的进展。在空间维度上,力求包罗广泛,除了报业领域,还涉及广

播、电视、网络、期刊、新闻思想、新闻制度、新闻教育、新闻法规，等等。

另一方面，这部选本的意图或旨归更重要的还在于正本清源，弘扬一种新闻精神或新闻理想。换言之，这部文选欲使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进一步感触新闻的“精气神儿”。提出这样的话题，是因为随着当今市场化、商品化、世俗化的潮流汹涌漫溢，随着新潮理论和时尚观点的起伏流行，新闻的“精气神儿”似乎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化、越来越变异。一次，某名校出版社请我“鉴定”一套丛书的出版价值。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套冠以“新闻”的丛书不仅与新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恰与新闻的“精气神儿”相抵牾，五花八门的选题基本上是广告、公关、媒介经营、传媒研究等。看到这些貌似新闻的东西，不由想起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詹姆士·W. 凯利(James W. Carey)几年前的有名批评：

> 面对“传播”一词的四处泛滥，面对在“传播”旗帜下广告、公关、传媒经营管理、平面或音像传媒制作、网络媒体制作等等的冲击，新闻尚未认清自己面目，已处在了四面楚歌之中。(转引自潘忠党《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

针对这种“群雄并起，天下混战”的乱局，这位美国新闻学界的高人在2000年发表了一篇引起热议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译文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以砥柱中流之势提出新闻的三项原则：

> 原则一：新闻和新闻教育绝不等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介研究、公共关系或广播。新闻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成型于特定的历史时刻，绝不可与其他相关但不同的社会实践相混淆。新闻与那些活动既不可在教学中混淆，也不可在新闻实践中等同。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作为独特的现象来关注。
>
> 原则二：新闻作为独特的社会实践不可与传媒和传播相混淆。传媒是新闻得以发生的组织和官僚机构，是新闻使用的技术；传播是意义传递的一般过程，但是它们都不是新闻。新闻实践可发生在或大或小的组织，可由实践者个人或群体共同操作，可以使用声音、书写、印刷媒体或电视摄像机。新闻在哪里及如何生产是重要的问题，但如果将新闻混淆为传媒或传播，无异于将鱼和鱼的故事混为一谈。
>
> 原则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其实，不管新闻有多少种定义，有多少种解读，在钟爱新闻的人心目里，新闻永远都是一片神圣的领域、一种理想的追寻、一项值得献身的事业。一句话，新闻总有一股子“精气神儿”。因为，说到底新闻同千家万户的身家性命连在一起，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连在一起，同诸如“人文精神”、“人本主义”、“人道理想”等字眼连在一起，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始终是新闻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学生们发现，“光荣与梦想”被我常常挂在嘴边。的确，这个出自美国名记者曼彻斯特名作《光荣与梦想》的词语，也传神而凝练地体现了新闻的“精气神儿”，体现了古今中外一切新闻人的永恒追求。新闻虽然表现为明确的世俗关怀，但其核心却体现为强烈的精神冲动，犹如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的追求一样。一切真正的新闻人，骨子里其实都是诗人。记者穆青的“勿忘人民”，不也正是诗人艾青的情怀：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如果这样说有点玄虚，那么不妨看看这部文选的名家名作就不难理解了。这些作品本身，已经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人，什么是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什么是新闻人？新闻人就是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徐铸成、朱启平、范长江、邓拓、斯诺、白修德、爱泼斯坦等。什么是新闻？新闻就是《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西行漫记》（斯诺）、《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冯健、周原）、《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王石）、《万里神州驯水记》（郭超人）、《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范敬宜）、《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罗开富）、《阳光·阴影·希望——南国百日游》（段连城）、《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记优秀共产党员、木里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张严平），等等。这样的新闻、这样的新闻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恰似鲁迅笔下的“民族脊梁”——舍身硬干、埋头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

诚然，新闻界泥沙俱下，新闻人鱼龙混杂，正如军旅中有勇士，也有懦夫，有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之辈，就有滥竽充数见利忘义之徒。而且，即使勇士也难免这样那样的缺陷，也不见得一生勇敢、一世壮烈，但用鲁迅的话说，有缺陷的战士终究还是战士，正如完美的苍蝇毕竟还是苍蝇。何况，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不明白，我们不能由于新闻行当有

“坏人坏事”，自己就有理由不做“好人好事”；不能因为新闻领域有些败类，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背弃新闻的理想。古之圣贤不是说过，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吗？那么，本书也是为一切有志于新闻理想的人，为一切如邵飘萍所言愿为新闻伟业奉献终生的人而提供的一部见贤思齐的样本。

本书的编选过程，是先由笔者提出原则和思路，并由博士生姚遥同学进行初选，再由笔者补充和定夺。初选之后，又由博士生李漫同学组织9位新闻学研究生分头撰写题解初稿，再由笔者修改定稿。最后，博士生涂鸣华同学又组织这些同学分头校核原文，依据一手文献逐段逐文检查，以确保准确与权威。参与撰写题解和校核原文的同学是：韩璐、朱一彬、罗有晗、杨科、刘锐、李强、康雯萱、章炳捷、郑亦心、秦珍子等，他们的工作值得特别书写一笔。

在编选过程中，业师方汉奇先生、同门学长郭镇之教授都曾给予热心指教，在此谨致谢忱！当然，本书所有问题自当由笔者承担，而且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各种纰漏和缺憾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提出批评与建议，以利我们修改与完善。

2008年5月



全球视野与史家眼光

——《全球新闻传播史(第二版)》后记

正如拙著《全球新闻传播史》第一版后记所言,本书的基本思路、总体脉络和核心内容均形成于1980年代。众所周知,那是一段西风日炽的岁月,“河殇”式的思想几乎成为时贤的共识。所以,虽然第一版成书时尽可能予以修正与调整,但是偏颇之处依然在所难免。比如,对中国印刷术和德人古登堡的评价,就带有明显“西方中心论”的烙印,认为中国的印刷术虽然在发明时间上位列第一,但对现代文明的影响不大,而真正推动人类传播第三次飞跃的是以古登堡为标志的革命性发展云云。事实上,笔者不仅读过T. F. 卡特的名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而且深为其渊博有力的论述所折服。可惜,第一版落笔时还是不自觉地贬抑国人的发明而抬举西人的贡献。于是,如今重温诸如法国汉学家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等著述,特别是如下文字时不禁汗颜:

> 许多年前,当我在美因茨参观古登堡博物馆时获知,古登堡是所谓的印刷术的发明者,不禁为之感到震惊。说实在的,这种说法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除非是不学无术者,谁不知是中国人发明了各种形式的印刷术:从雕版到根据文稿需要精心制作的可灵活使用的彼此独立的活字?
>
> ……
>
> 我觉得,若以“发明”这一词的确切意义来确证是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那是万万不可接受的。他只不过将一种早已在由忽必烈可汗帝国统一的欧亚大陆上流行的技术运用于我们的拼音字母,包括拼音字母形式。

再如，笔者在讨论19世纪商业化报刊及其兴起的时代背景时，过多关注新闻传播本身的演化逻辑，诸如从“观点纸”到“新闻纸”的进程，而较少分析其间深刻而复杂的政治经济动因。对此，加拿大批判学者哈克特和赵月枝在《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里透辟指出，在19世纪的英国，废除印花税并非所谓“新闻自由”的胜利，由此开启的大众化或商业化的市场媒体亦非进步的、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保守的资本势力有意操纵的结果，意在对付当时日渐兴盛的激进媒体，包括深受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欢迎的报刊。这些分析与洞见，也为拙著所不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一版“导论”部分阐发的“新史学”，如果不是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就可能产生误解和误读，甚至如方家批评的导向历史唯心论和虚无论。事实上，近年来确有一些重新解读历史的作品，特别是涉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文字，往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义剪裁历史，为其所用。当然，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归咎于新史学本身，实际上新史学是以默认历史和史学的基本共识为前提的，包括历史本事的唯一性、真实性、客观性以及史学著述的全面性、总体性、有机性等，在此基础上突出史学的主体意味，突破“旧史学”的僵化刻板，打通历史演化与现实人生的真切关联，即拙著所谓当代意味、思想蕴涵、叙事本性等。显而易见，这些特征也是古往今来伟大史家和史学的共性——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到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至于“凡例”中提到的，本书还主要着眼于西方一隅，期待“有机会能将视野真正拓展到全球范围”，也由于精力、水平及学术兴趣的转移，现在看来越来越难以实现了。总之，上述缺憾都已成为无法抹去的历史，只能留待后人弥补或超越吧。这么说并非抱残守缺，不思改进，而是因为作品一旦形成也就成为一个独立生命，犹如婴儿呱呱坠地，除了局部的修补和完善，整体格局已经难以变更，除非另起炉灶。

拙著第一版2005年问世以来已经印刷四次，并有幸获得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和国家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的荣誉。其间承蒙各方人士不断给予批评雅正，包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杨雅琼和研究生陈轩棋、彭茜等。这些宝贵意见都在这部第二版里得到体现，在此谨致谢忱！同时感谢业师方汉奇先生为第一版赐序，先生的道德文章永远是后辈的楷模！

2009年2月于清华园

流水前波让后波

——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①]

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在我国已有差不多二十年的历史。其间虽然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传播研究与教学也获得长足进展。尤其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传播学列入研究生培养目录，使之成为新闻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之一，更为传播学的“大跃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此书的问世，从大的背景上看也得力于此。

这部全国电大教材的出版恰逢世纪之交。巧的是，另外两部全国性传播学教材也在此时先后面世，这就是教育部“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系列中的《传播学教程》(郭庆光)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系列中的《传播学概论》(吴文虎)。此时此刻，回顾传播研究在我国的风雨历程，就有了别样的历史意味和蕴涵。

迄今为止，中国内地的传播学大致经历了三代人的辛勤耕耘，每一代人都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尽了自己的心力，在寻寻觅觅、孜孜矻矻的探求中，留下许多颇堪回味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成果。

第一代的开山人物，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资深教授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教授为代表。曾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张隆栋先生，早在1950年代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系刊《国际新闻界》时就开始追踪新兴的传播研究。当然，那时的零星摸索还只是星星之火，而且不久也就熄灭了。1980年代初，他又在复刊的《国际新闻界》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详尽介绍和评析传播学的长文。这组文章内容

① 本文原为《大众传播学》代前言，199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2002年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2009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再版。

广博，材料详实，脉络清晰，新人耳目，可谓第一代研究者给人印象最深的力作。与此同时，郑北渭先生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接连撰文，评述传播学，俨然与张隆栋先生形成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此外，原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苑子熙教授、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李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研究员等，均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代传播学人，为传播研究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首屈一指的贡献。如李启教授参与翻译的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 1984)，今天看来虽然显得过时，但作为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权威译著，其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在第一代传播学人开天辟地种种努力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数 1982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组织发起(由此形成以后历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均由新闻所主办的传统)，会期三天[①]，参加会议的代表 30 余人，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新华社和《新闻战线》等新闻教学、研究和实践部门，中宣部新闻局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一大成果，就是明确了我们对传播学的基本态度，即后来广为流传的 16 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同时，会上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 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性、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

可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此后，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就逐步展开，与此同时第二代传播学者也就脱颖而出。

第二代多属第一代的学生，其中佼佼者有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范东升(范长江之子、现任汕头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曾执

---

① 据《国际新闻界》1982 年第 4 期刊发的《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徐耀魁、黄林)一文，会期是 23—25 日。据《新闻战线》编辑部 1982 年 12 月 5 日编发的内部材料《报纸动态》[82]第三十四期上的《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社科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供稿)一文，会期是 23—26 日。

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陈韵昭和居延安（后来赴美留学）、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徐耀魁研究员和传播研究室主任明安香研究员、后任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吴文虎教授、兰州大学新闻系的戴元光教授（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和淮阴师专的邵培仁教授（现为浙江大学教授）等。

比起第一代的“重点进攻”，第二代的研究更像是“全面进攻”。也就是说，他们更加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不再满足于草创阶段的“零打碎敲”。他们或著书立说，或登台执教，显示了指点江山议论风生的思想锐气。在这场向传播领域发起的全面进攻中，有些战果至今令人难忘。首先值得提及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已改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这部1983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传播学图书，其中的10篇文章和3篇附录在传播学刚刚引入之际，对人们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东南西北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陈韵昭先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开设传播学选修课，引起学界的广泛兴趣和普遍反响，她的讲稿深入浅出，活泼有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系刊《新闻大学》连载后颇受欢迎。另外，由她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部为美国大学采用的教材，内容通俗，讲解清楚，其作者之一坦卡德就是施拉姆培养的博士。这部较之《传播学概论》更加浅显实用的译著，出版后也是广受青睐，对普及传播学知识，推动传播学研究均发生显著功效。最近，我国的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郭镇之教授又组织翻译了该书的第4版，名为《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

除了纯粹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之外，第二代里一些受传播学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样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里，只提三部各有千秋的著作。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以细致入微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思想做了详尽考察，为我们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传播及传播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二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龚文庠教授的《说服学》（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从说服角度探讨了传播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题，观点新颖，资料翔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创新之著。三是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孙旭培研究员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用传播学的视

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进行审视和梳理，提炼了一系列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规律，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如果说第一代的里程碑是 1982 年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那么第二代的形成标志就是 1986 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会议，不仅代表广泛，人数众多，而且议题丰富，讨论热烈，从中折射出当时传播学研究如火如荼遍地开花的盛况。这次会议有两点突出之处：其一是围绕吴文虎教授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框架体系而展开了深入探讨，由此显示了对系统理论的共同追求；其二是开始关注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当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的王志兴（后来赴英留学），在会上提交一篇关于批判学派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

当然，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全面推进内地的传播研究。这次会议之后，传播学才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主要表现一是大学纷纷开设传播学课程，一是一批高水平的传播学译著接连问世。像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祝建华（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系教授）等翻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博士生颜建军等翻译的《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 1989）、复旦大学新闻系博士张国良翻译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黄煜（现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等翻译的批判学派力作《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 1989），就属其中著译俱佳的上乘之作，至今仍为研习传播学所必备。

众所周知，1989 年的政治风波对学界也不可避免造成波涌浪翻的激荡，传播研究同样如此。尘埃落定后，学界开始冷静反思和积极调整，学风也由此发生显而易见的转变：喧嚣的场景让位于冷清的气氛，入世的立场让位于超然的态度，价值的评判让位于学理的剖析，思想的随笔让位于学术的论文。如果说 1980 年代的学风是“热风吹雨洒江天”，那么 1990 年代的学风则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就在这意义重大而悄然发生的转变过程中，传播学的第三代学人逐渐崭露头角。第三代与第二代的差异主要不在于年龄，真正隔开两代的分水岭是知识结构与研究姿态。第三代基本都是“文革”后进入大学的，经过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一般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的还在国外留过学或做过访问学者，比较熟悉当代国际学术的状况和趋势，具有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为系统的知识结构。

尤其是，他们更倾向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姿态，在研究取向上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或者说，他们首先关注学术自身的价值，以及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关系，其次才考虑应用层面的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姿态固然有利于传播学科的正规建设，进而启动我国传播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而从消极的方面看，有时也难免落入“象牙塔”中而与生动活泼日新月异的传播实践相隔膜。无论如何，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第三代传播学人已经历史性地肩负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

如果说第一代传播学人的贡献在于线上——开启一道门缝，第二代传播学人的成就在于面上——使传播研究全面铺开，那么第三代传播学人的作为就在于点上——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举其要者，可以列出如下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喻国明，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舆论调查领域建树颇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王怡红，在人际传播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研究员郭镇之(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专攻议程设置理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教授张咏华，在大众传播社会学上取得国内领先的研究成果；清华大学传播系(现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留日博士崔保国，在信息与信息社会的研究上独树一帜；暨南大学新闻系留法博士陈卫星(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对欧洲传播学的研究多有创获，他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的长文《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被《新华文摘》所收录，成为该刊创办 20 年来刊登的第一篇传播学文章……有鉴于此，1998 年，以出版新闻传播学书籍闻名的新华出版社，策划了一套“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其中已经收录或将要收录的选题，就包括这类“点”上突破的成果。

正在进行的“新世纪传播学丛书”，颇能体现第三代学人的整体水平与风貌。这套丛书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列入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项目。按照计划，丛书一共五部，分别针对拉斯韦尔勾勒的传播学五大研究进行刨根究底的论述，以期为既往的研究进行一次系统的总结，同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五部专著由五位第三代学人承担——计划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国良博士(项目负责人，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创意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郭庆光博士(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黄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李彬博士(现为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的张咏华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截至目前,“新世纪传播学丛书”已有四部问世: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除了“点”的突破,第三代学人在一般传播理论的研究上也向纵深推进。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 1993)、段京肃等《基础传播学》(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和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等,都各具特色,成为当今传播学基础理论的通用教科书或参考书。尤其是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在迄今已有的众多同类书籍中,堪称体系完备、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论述精当。

如果说,作为第一代贡献的标志是 1982 年的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作为第二代成就的象征是 1986 年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那么作为第三代崛起的契机就是 1993 年的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称之为契机,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次会议与上次相隔 7 年,当全国传播研究者再次汇聚一堂时,人们发现第二代多已风飘云散,硕果仅存者寥寥无几。二是自这次会议之后,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固定为两年一次,每召开一次新人就多出一批,等 1999 年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时,传播研究已经基本成为第三代的一统天下了。

站在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传播学的第四代是不是已如地火奔突,蓄势待发呢?作为受过第一代和第二代栽培滋养的第三代,我们在感念前辈的同时,怎能不热切期望新人的出现,期望他们将我国的传播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按照历史辩证法,我们深知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每个人的一生能够做成一件富于创造性的事情已属不易。虽说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大家代为不绝，但一般人的创造力毕竟有限。当一个人的才情才华与才智才思挥洒殆尽时，为更年轻的一代让路铺路就属明智之举了。[1]

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在这部传播学教材的前面写下这篇“代前言”，既是对前人的感念，也是对自己的反思，更是对来者的瞩望。

---

① 十余年前写下这段文字时还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期待，而如今第四代传播学人已经头角峥嵘，阵容俨然。复旦大学的吕新雨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海龙博士、中国传媒大学的徐培喜博士、清华大学的史安斌教授、北京大学的王维佳博士、澳门大学的刘世鼎博士等，都是其中佼佼者。如果不揣简陋的话，第四代的特征可否概括为：更具有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更具有历史意识与批判意识；更兼顾新闻与传播、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会通等。

飞鸿回旋



这组文字选自近年来的部分通信，其中绝大多数是与学生的通信。

谈 学 术

身边的大师

人们每每崇拜远方的大师，如德里达、哈贝马斯、亨廷顿什么的，或景仰已逝的远古大师，如柏拉图、孔子、孟子等，最不济也是王国维、梁启超等，而对身边的大师往往视若无睹。当然，这符合人之常情，因为身边的大师太普通，太平凡，以至于人们意识不到他们的不凡。记得林肯遇刺身亡后，马克思致电哀悼，说到他是那么谦逊、那么平凡，以至于等他倒下时，人们才发现他是一位伟人。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在如诗如画的《白轮船》里，塑造了一个可爱的莫蒙爷爷，他说了许多大智若愚、耐人寻味的话，如“先知不知道自己是先知，只有强盗才知道自己是强盗”等。这些都表明大家或大师反倒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人们往往容易忽略。

清华与北大

北大与清华的风格确实不一样，一是飞扬的，一是凝重的；一如飘逸的李白，一如深沉的杜甫；一为诗人家园，一为烈士熔炉。总之，一者出世，一者入世，而入世自然得讲究“实事求是”，自然带有浓重的家国情怀——这同岳麓书院的精神气质相似。故清华有“行胜于言”的训诫。

这些年清华录取的名校才俊越来越多，而且往往是第一名保送的。当然，我对第一名什么的并不怎么看重。关键是天赋、才气与潜力，同时加上适当的调教。事实上，一些“第一名”后来未见其佳者也颇有人在，而起初看似中才之人，后来脱颖而出者又屡见不鲜。当年，蒋南翔

校长向复旦丁淦林老师要上海学生,丁老师问需要什么条件。蒋校长说,不一定是最好的,只要中上就行。

入世与出世

前沿讲座的最后一讲请来格非老师,果然名不虚传,非常精彩。内容自不待言,见识不俗,也是我常常思虑的,同时口若悬河,妙语如珠,教室里座无虚席,自始至终欢声笑语不断。我在最后总结时谈道:开场是清华的范老师,终场又是清华的格教授,都是大家,都很精彩,可谓善始善终。不过,两人取向又有所不同:范老师"入世",格非"出世";或者用专业术语说,范老师是经验性的,格非是批判性的。然而,两人在深处又是一致的,都体现着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范老师的"重"是其先祖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格非之"重"则让人想起屈原、杜甫、陈子昂,想起讲座中谈到的贝多芬、沈从文等。事实上,就在欢声笑语之际,我的心里却是异常凝重:"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比如,格非讲到大众媒介对人的生命及真实感的荼毒时说道,如今我们常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一对恋人,由于某种原因无法结合,双双殉情的"新闻",对此人们已经没有什么感觉,精神都已麻木,最多唏嘘两声,而没有想到这不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吗?

学术要素

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前言"里谈到同样的问题,包括范式、理论及方法等:

> 综合的、历史的社会学,实际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经验的、分析的社会学归根结底也只是一种社会志。
>
> 在欧洲和美国,马克思主义所称的那种批判的传统、综合的和历史的社会学传统并没有消失。美国的C.赖特·米尔斯和赫伯特·马库斯、德国的T.W.阿多诺、法国的L.戈德曼,尽管他们的评论源自民粹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既反对T.帕森斯著作中

提到的那种形式的、反历史的理论，又反对局部的、经验的和特有的调查。

……

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所难免，一时半会说不完，三言两语说不清。简言之，有“一大一小”。大的问题，可能还在于如何把握和处理各种“辩证关系”，比如，对待前人或外人的不卑不亢，即杜榕的那句结束语——“挺起学者的脊梁，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至于小的问题其实也不小，如文字的干净与洗练。我一再强调，语言文字是看家本领，正如射击、投掷是军人的看家本领。枪都打不好，还怎么打仗。同样，句子都写不顺，还怎么做研究、写论文，将来又怎么当记者什么的。当然，这个功夫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语言这个东西是不容易学好的。当下比较现实的事情是从整治长句子入手。短而好的句子比长而好的句子难写，就如短而好的文章比长而好的文章难写一样。麦克阿瑟打日本，靠的不是什么本事，而是成吨的飞机、大炮、军舰等，真正靠本事的是我军一支支精悍的敌后武工队，那才真叫斗智斗勇呢！

弄斧到班门

做学问也好，做其他事情也罢，就得有一点班门弄斧的精神，怕就怕没有这种精神。华罗庚说，“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我在给新生上“学术要素”课时，特别谈到不卑不亢——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也就是说，面对前辈“大师”或“大家”，既不必战栗觳觫，汗不敢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同时也不能藐视一切，鄙薄一切，仿佛老子天下第一，横扫千军如卷席，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两种倾向在年轻学子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所以特别予以提醒。当时这么说，还主要基于国内的情况，最近觉得面对国外似乎也有类似心态，而且问题更突出，主要表现就是在“洋大人”面前卑躬屈膝，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处处不如人，甚至永远不如人。以这样的“奴化”心态，怎么可能去发展、振兴和推进自己的学术思想呢？最近热播的连续剧《亮剑》，塑造了一群敢做敢当的中国军人，弘扬了一种“逢敌必亮剑”精神。如果连这种与人过招的精神都没有，还能谈什么呢？不管做什么，首先得有这么一种精

神，这么一种胆量，活的不就是呼吸一口气嘛——呼是吐口气，吸是争口气。所以，要的就是“班门弄斧”，就怕不敢班门弄斧，特别是不敢在洋人面前弄斧——“亮剑”，而是兀自先缴了自己的剑——“大人高抬贵手，俺们边陲小民，心甘情愿永做大人的学术殖民地”。清华法学院教授冯象论及中国法学时说道：

> 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赌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或王先生预见的“香港化”。
>
> 有鉴于此，中国法学，至少其前沿精英，就应当在拒绝学术腐败的同时，培育强烈的政治意识，关注民族利益，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像王先生一样，把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放在中国的现实，而非任何“国际规范”或“普世价值”。如此，法学才能触及历史真理，即上升为史学而承载民族精神，加入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时文与学术

近代以来，社会与历史越来越受制于各种各样的时文，包括炎炎赫赫的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等，这些时文借助越来越兴盛的大众媒体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与之相对，类似阎云翔这样严肃、科学、认真的学术著述，由于其专业性、学理性以及平淡无奇而极少为人关注，包括大多数接受高等教育者。就拿一些研究生，甚至所谓学者权威来说，其历史观、价值观也就是时文水平，有的恐怕根本无法理解真正学术著述所谈的话题。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和悲哀吧。

仰慕前贤

中午游泳回来，在办公室小憩时读到《读书》上一篇佳作，其中提到名著《华阳国志校注》的作者任乃强先生：“像这样的前辈学者真是令人高山仰止，那个时代大家也真是大家——有学问，有情趣，有文才，深奥学问做得，有品位的美文也写得，为文不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

式，不像时下的某些宏文，以貌似高深的理论、术语或曲线唬人，其实无趣得紧……”

“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关于学术，最佳境界自当是“有学术的思想”或“有思想的学术”。如果说思想是灵魂，那么学术就该是血肉。所以，没有血肉的思想就如孤魂野鬼，所谓“野狐婵”是也。反之，没有灵魂的血肉则如行尸走肉，了无生趣。当下中国学术界，既不乏野狐婵，更常见行尸走肉。仅仅是野狐婵或行尸走肉也并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自娱自乐或混口饭吃，而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允许的，也是正常的。最怕的是它们当真了，而且拿着去“实践”了，从而误国误民，甚至祸国殃民。如食洋不化、自以为是者流，如当下的“新自由主义”者流，由此造成的灾祸已经远非单纯的学术问题了。

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是王元化先生提出的。与此相似，黄宗智倡导，经验与理论的有机联系；马克思主张，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何谓历史，人们的社会实践；何谓逻辑，自己的一家之言。

翻译及其他

“翻译如少妇，忠者不美，美者不忠”，让人想起意大利格言——Tradutore，traditore（translator is traitor）。当然，这主要针对精灵一般的文艺作品，对于有板有眼的学术著述应该有所不同，至于产品说明书一类的文字则径直可用翻译机什么的。现在许多产品说明书读着就像机器写的，生硬无趣不说，还往往莫名其妙，有时真怀疑那些玩电脑、搞技术的人是不是也快成机器人了，弄得连一句正常的人话都不会说了。

自忖远未达到“深刻而不苛刻”的境界，但确实心向往之，因为只有大家才能进入这样的境地。年轻人总是苛刻而不深刻——往往又自以为深刻，随着阅历增加，才逐渐由苛刻逐渐转向深刻，只是这个转化过程没完没了，也许一生也不见得能够完成。等到有朝一日真能从容不迫地洞悉幽明，恐怕也该“羽化而登仙”了。

教学相长

关于教学相长，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教师与学生，一是教学与学问。从前者看，教学相长主要体现在二者的矛盾关系上，即教师与学生之间构成一种持续的“张力”，为了缓解这种张力，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教师就不得不提升自己，以保证学力在这种矛盾对峙中不至于衰竭。从后者看，教学与学问也是互相促进，互相生发，互相刺激。对此，我也深有体会，二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就是在教与学的矛盾张力中，一点点、一步步走过来的。即以去年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和正在杀青的《中国新闻社会史》而言，就均为教学工作的副产品。许多前辈大家，事实上也多是在教学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名山之作，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最初就是讲稿，再如钱穆先生的大量著述也都源于讲义。昨天在万圣书园又购得一批好书，其中有部北大名教授李零的《我读〈孙子〉》（中华书局），其中前言还特别谈到当年他在北大初开此课的“惨状”——第一次下来只剩一名法国留学生了，于是不必再用教室，改在自己家里单独授课，而现在他的课堂可是回回火爆，场场爆满。总之，虽然学生不一定在具体的知识和学问上赋予先生多少“长进”，但他们求索探寻的渴望却是激发先生的一大精神活水。

关于左派右派，既涉及社会政治层面的内容，也关乎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周末读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心潮激荡，所见所感略同，当下中国的最大问题不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而在精神文化上的安身立命。换言之，诸如我们为什么做中国人，做中国人的意义何在，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美国人等，这些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解答，所以触目所见尽是“全球化”、“与国际（美国）接轨”等话语，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畸变。

方法论偏差

目前有种倾向，似乎一提实证方法就是定量统计等，我对此颇不以为然。别的不说，乾嘉学派的研究，不是实证研究是什么。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学问，用的不是实证方法又是什么。难道非得是美国的那

套"洋八股",才叫实证研究,才是科学方法,真是匪夷所思。

如今,学界讲求方法论蔚然成风,这是值得肯定的现象和趋势,比起泛泛而论确是一个进步。然而,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不能不令人警醒和担忧,那就是唯方法论,尤其是唯量化实证方法论,仿佛不用数据、量化、统计、表格、问卷等,就不属于"科学"研究,就不"入流",这未免又堕入另一种偏颇。对认识论上的霸权问题,人们越来越有共识,而对方法论上的霸权问题,迄今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这种所谓"方法论拜物教",政治学者王绍光批评道:

> 年轻学者里边也有一种倾向,就是要学那种最时髦的东西。我经常碰到有同学问我:哪个理论是现在最流行的?哪一个方法是现在最流行的?
>
> ……我有个研究生,以前是学档案学的,来中大三年,统计玩得非常好,他已经非常棒了。但我担心的是他为了玩这个数据,就把他今后的研究变成 data driven,这个就变成雕虫小技了。

按照我的粗浅理解,方法论属于工具,只是路径,而任何学科及其研究的目的并不在工具或路径,而在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没有问题或问题意识淡薄,而只是操持各种工具、寻觅各条捷径,那就无异于舍本逐末。我担心,这样一路下来,我们的研究(包括新闻传播研究)不仅在认识论上离中国现实渐行渐远,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同中国语境形格势禁。正如王绍光谈及政治学领域的方法论膜拜时所言: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是重要的,但方法毕竟是工具。不能本末倒置,为了运用所谓"最新"、"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而舍弃更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
> 既然方法是工具,它便没有绝对最好的,只有最适用的。在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曾有过一个希望采用当今最"尖端技术"的阶段,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只是在有了惨痛教训以后,第三世界国家才认识到"适用技术"的重要性。在研究中国政治时,也许不必,也不可能采取国外最"先进",最时髦的方法。

总之,条条大道通罗马,道路不是一条,方法论也不是一种。千万别被一些时髦的研究方法所遮蔽,而忽略了学术研究的真谛——问题。

通家之学

赵一凡的新作《西方文论讲稿》值得一读。赵一凡是我欣赏的那种学者，有通家之气。这个“通”字既在于对世界学术前沿的高瞻远瞩，融会贯通，又在于表达的行云流水，深入浅出。当年收入三联“读书文丛”的那部《美国文化批评》，已经让人见识了他的这种风范，现在这部积十余年心血的“讲稿”更上层楼，汪洋恣肆，挥洒自如。该书只是“上半部”，涉及结构主义、现象学和后现代，“下半部”则涉及“西马”与“后学”。在他看来，当代西方学术有三大源流——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现象学，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流变都由此而来。这种判断不无道理。至少把握这三大源流，当代世界的学术地图也就了然于胸，而且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豁然与通达。本书题献他的哈佛导师艾伦和中国老师钱锺书，让人不由想到钱锺书的另一弟子、同样留学哈佛的张隆溪。也许受钱锺书通家之学浸润，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读书文丛”)同样举重若轻，纵横捭阖，而且同样文笔轻灵，明白如话。

学风与文风

“自由”知识分子喜欢跟着流行理论跑，不仅是一个学风问题，进一步看是精神萎靡、生命枯竭问题。前日与学生聚会，说到陈寅恪先生的“不古不今”之学，觉得时新流行之学往往昙花一现，难有多少恒久价值。“跟风”之辈常爱拿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事，殊不知这里说的独立和自由恰恰是针对跟风而言的，特别是跟西潮之风。学习与借鉴固不可缺，但现在普遍情况却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弄到篮里都是菜，不管三七二十一。言必称什么的党八股、洋八股之风似已达到空前但愿绝后的地步，王明时代望尘莫及，1980 年代颇遭诟病的追新逐奇、食洋不化也难以望其项背。最近评阅一篇博士论文，自始至终被弄得“找不着北”，不妨摘录一段：“知性概念通过虚构的情节化叙事转译为电视剧文本的过程中，特定的观念内核被情景化编码为理解社会生活的预设结构，据此纷繁的社会现象、历史事

件以及文学文本被重新调教为合理的结构或秩序，这种内在的知性概念在电视剧文本的封闭世界内被诠释为一种必然性结构。”不知有多少人能理解其微言大义，而诸如此类的“高论”在博士、硕士论文里并不罕见。

当然，板子不能都打在学生身上，其实这些毛病相当程度上源于当下新闻传播学界的风气，包括学风和文风，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嫌。前阵子冒出个什么“长尾巴”，貌似弄得不少人跟着后头捉迷藏，这也就无怪乎涉世未深的学子人云亦云了。中旬将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准备就此问题谈一谈，也希望学术期刊搞点专题研讨，认真反思一下党八股或洋八股。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对比《反对党八股》列举的八条“罪状”，现在许多问题如出一辙：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流传出去，祸国殃民。



西学浅议

关于西学，以我的肤浅理解，似乎总有一根筋的感觉，从古希腊的哲学（包括科学）到如今各种学术思潮，往往如此。按照中国的辩证法，一根筋有利有弊，利在穷根究底，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而产生了许多深邃的理论思想；而弊在不善通融，往往将复杂的事情单一化，从而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患。以现代文明为例，虽然启蒙理性解释了一系列规律，从而造就了古人无法想象的现代世界——便利、舒适、应有尽有等。然而，同时由于坚执这种理性，忽视或无视远为纷繁复杂的世界，结果带来能源、环境、生态以及社会人生的失序与混乱，而且愈演愈烈，用原北大哲人陈嘉映的话说：这个世界就像一列奔驰的火车，终点是万丈深渊，我们的工作无非使它能慢一点就慢一点。

落实到中国的事情上，任何单一化或一根筋的思路就更要命，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传统更为错综复杂。最近去西南地区走了十天，虽是浮皮潦草，浮光掠影，还是进一步体会了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形。所以，尽可能用一种宽厚胸怀看待世界，理解人生，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宰相肚里能撑船”等，确实是中华文明的一种极高境界。

清通之美

在我看来，越是真，就越是美，越是美，就越是近于清通，即返璞归真、简洁高妙的境界，犹如先秦诸子的学说、李白杜甫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贝多芬的音乐、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思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老所长陈乐民先生，对美国舶来的某些“国际关系理论”一向不以为然，认为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玄学”，“不足取法”。

现代人的设计癖

现代社会现代人的最大毛病，也许是所谓“设计”，设计社会，设计制度，设计人生，设计一切。而在所有设计背后，无不隐含着一个“自以为是”的愿望，那就是只要有一个好的设计，并一丝不苟地落实，那么就一定会产生一个好的结果。原教旨的共产主义设计、原教旨的资本主义设计、原教旨的自由主义设计、原教旨的法西斯主义设计等，无不如此。其实，人生也好，社会也罢，不完善是正常的，世人所能做的无非是以这种完善代替那种完善，或者以那种不完善取代这种不完善而已。毛泽东说得好，矛盾无所不在，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人类社会就是在层出不穷的矛盾中发展的。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例，即使假定理论上存在一个所谓纯粹的、十全十美的市场，其中法制健全、监管得力、运行有效，即使实现了这个市场化的设计，那么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做梦吧，说不定那个时候，又陷入另一种更可怕的状态，就像当代美国人一样——平庸、乏味、无聊、浅薄等。除了人生与社会的复杂性使任何完好设计都显得僵化、教条，并使结果从一种不完善“折腾”为另一种不完善，中国社会的错综复杂更使任何单纯想法变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改革的修辞

关于改革，不能停留于概念和修辞层面，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其实际内涵。就像革命年代谈革命，虽然大家用的是同一个概念，舞动的是同一面旗帜，实际上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可能南辕北辙。比如，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讲革命，讲人民，殒命孟良崮的国军王牌军军长张灵甫临终前的遗言，看上去完全像是革命烈士的就义书。现在，貌似人人都讲“改革”，犹如清末“咸与维新”，而什么是改革以及深化改革，人言言殊不见得理解一致。改革犹如一句政治正确的口号，而需要追问的是什么样的改革，谁的改革，向何处去的改革，而不是稀里糊涂地“跟着改革走，牵着精英的手”。否则，真是被人卖了，还替人点钱呢。有种说法倒是比较坦率，“改革就是利益调整”。比如十个铜板，过去你五个，我五个，现在调整一下，你一个，我九个，这就是某些所谓的“改革”及其实质。另外，为了让你心服口服，还需要进行一些“配套”改革，如转变政府职能什么的，有的“人民警察”差不多沦为“新阶层”看家护院的家丁了。法学界不是有人还想着把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也变成“新阶层”的马弁吗——军队国家化云云。邓小平说过，有两种改革，一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可谓一针见血。

总之，在大是大非上，务必头脑清醒。这既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样也是为了极少数新贵阶层的利益。这些政治、经济、文化“贵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得计，无所顾忌，一意孤行，仿佛天下是自己的，未来也是自己的。殊不知，中国老百姓既是世界上最好糊弄的，最温良恭俭让的，也是最富有造反传统或革命精神的。正如林冲一方面何等忍辱负重，一让再让，另一方面一旦“逼上梁山”，翻江倒海也不是好惹的。

两类价值

学界无行，自古皆然，明目张胆，于斯为盛。贵校重金礼聘的某教授总爱拿民国文人说事，胡适啦，傅斯年啦，徐志摩啦，仿佛那个时代既无民族危亡，又无人民苦难，“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如果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至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三、其四等。否则，怎么解释钱锺书的《围城》，其中可尽是民国闻人的影子。

其实，任何时代既有鲁迅这等民族脊梁和自由战士——如张承志，又有胡适一类“知识分子”和学界霸主；既有宁为玉碎、尽忠孝慈的朱自清——《背影》恰似现代版《陈情表》，又有蝇营狗苟、鸡鸣狗盗的“围城教授”——包括传人范跑跑及其粉丝；既有风霜高洁水落石出的萧红，又有一身名利的张爱玲……当然，西方“发达国家”也好不到哪儿

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如洛奇《小世界》所讽喻的。

所以，还是中庸为上，既不做所谓“进步论”、“进化论”的狂热信徒，也不做九斤老太。面对鱼龙混杂的世界与学界，只能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世界本来如此，学界一向如此，一万年太久，从来如此，好也好不到大同社会，坏也坏不到人类毁灭，这就是朴素而高明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大智若愚的好兵帅克说得好：该怎么的就怎么的，反正就是这么的，从来没见谁说事情不是这么的。

文化自觉与民族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能一头扎入故纸堆里，从古人那里寻求“复兴”的希望。当今之世已经完全不同于一百年前，更不同于一千年、一万年前。现在的事情应该由现在的人，面对现在的问题，做出现在的回应，有没有本事实现民族复兴，归根结底还在于现在人的创造力或生命力。我赞同甘阳在“通三统”一文里提到的思路，即中华文明的传统、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传统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个人价值传统有机融合，进而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格局。这里关键还是费孝通说的“文化自觉”，特别是作为“先知先觉”的知识人、文化人、读书人，更应该有这种文化自觉。以“感恩节”为例，这些天我也收到若干短信祝福，包括博士生、业界精英等。对此，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的愿望都是美好的，借着“感恩之节”表达良好祝愿。问题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纯粹美国的节日，连英国人、法国人都不过的节日，他们对这样的日子记得如此清楚，如此在意，包括马上又要“上杆子”的“耶诞节”，而对一些包含自身文化精神的节日却可能麻木不仁，这不是耐人寻味吗？如果当代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心态，那么最后实现的恐怕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所谓“全球化”即“美国化”的狂欢。

民族复兴一方面固然须有清醒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也须有开放包容的姿态，乐于、善于、勇于向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学习。现在文化人里存在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故步自封，以为天下之美全在中华，用传统重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另一种是“崇洋媚外”，以为天下之美全在“欧美”，所以巴望“全盘西化”或“彻底的西方化”。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事实上，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一直在不断吸纳各种文明元素，

“兼容并包”并不是蔡元培校长的独创，而是中华文明的传统和美德。这大概也是世界各大文明无不有生有灭，惟独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主要原因吧。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教授说得好：

> 在我们文化成长的过程中，是可以吸收各种营养的，但是最后成长起来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我们既不要怕像谁，也不用怕不像谁。人的成长可以吃蔬菜水果、吃猪牛羊肉，但最后长出来的还是自己的肉。所以，我们要以一种中华文化主体的大胸襟、大气魄，成就自己大时代的大手笔。（《文化沙漠化将是中国的一场灾难》）

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在费孝通看来，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既不是“复归传统”，也不是“全盘西化”。文化自觉以及与之相应的学术自觉，既体现着一种文明体系的“救亡图存”，又应和着一种五味杂陈的“大国崛起”。换句话说，消极意义的文化自觉是一种被动应对，积极意义的文化自觉是一种精神觉醒。作为唯一延续千万年的文明体系，中国从来不乏文化意识。比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王朝兴替，国家兴亡，而是指文化的“救亡图存”。王朝兴替也好，国家兴亡也罢，不过是一家一姓、一时一世的事情，而文化的延续、文明的传承却关乎千秋万代，所以是一切国人即所谓匹夫都有责任的。

我常常强调，一方面应有“文化自觉”，明确“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一方面应与当代国际学术前沿进行深入的对话，“入乎其中，出乎其外”，从而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和体系。近代以来，中国学人一直有两种常见的心态，一种是胡适似的“殖民地”心态，完全丧失自己的“文化自觉”：“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于是，结论自然就是“全盘西化”。另一种心态又是自高自大，觉得天下之美尽在中华，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都不如中国文化，也不适合中华文明，于是，结论就是一心“走自己的路”，不在乎世界潮流。一个泱泱数

千年的文明大国，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肯定得走自己的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聪明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无非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而不可能逆潮流而动。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已经越来越密切地相互联系，而西方影响又首屈一指，罔顾如此格局也不现实，更不明智。由此说来，“文化自觉”与“对话意识”应该并行不悖，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诗人公木有段精彩论述：

> 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中而不知外，谓之鹿塞；知外而不知中，谓之转蓬。视野必兼古今中外，基点当是今日中国。（《作诗·治学·为人》前言）

文化论坛与文化自觉

就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而言，应该说越来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潮流，2004年设立的“中国文化论坛”就是代表。这个论坛的顾问也包括海外及港台知名学者，如杜维明、金耀基、许倬云等。论坛每年围绕一个主题，举行一到两次年度论坛以及多次小型讨论会，并将年度论坛的论文与报告交由三联书店出版。最新的一次论坛主题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同名书籍已经问世。按照中国文化论坛的立意，文化自觉在于“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而这个命题中的“文化”实际上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以及其他许多领域，并不仅仅指涉文化本身；而“自觉”则表达的是在全球化处境里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只有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才能避免或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

劳动节抒怀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正巧收到芝加哥来信，而信里一系列新见又无不同“劳动人民”及其命运息息相关，真是再好不过的劳动节礼物了。

清华已经启动百年校庆活动，包括出版社的一系列选题，如新近出版的《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其一大亮点在于证明“荒岛”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编撰之处，而大礼堂乃陈梦雷的当年故

居。另外,我以为最有价值的还在于彻底澄清那个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流俗之见——清华乃美国善心发作,退还庚子赔款所建。事实恰好相反:美国先是巧取豪夺,多报了一多倍义和团期间的损失。后来,在驻美公使梁诚有理有节的争取下,美国才勉强同意退还部分不义之财,但要求用于培养赴美留学生,用心不言而喻。果然,美国培养的胡博士就开始嚷嚷清华得益于庚子赔款的"盈余之数",是友邦的"友谊之证"等,诚可谓一派"胡言"。这也算为你的帝国主义"贪婪无耻、虚伪狡猾"之论,提供一个小小例证。

最近,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希望对你有所参考。胡绳的著述涉猎无多,好在范文澜、郭沫若、胡绳、金冲及等几代史家,秉承的都是同样的"历史与逻辑",坚守的都是同样的"公理与正义"。至于茅海建一路研究,虽然用力甚勤,也颇有足观,但其思想前提如中国落后而西方先进、落后就得挨打等已属明日黄花。记得十几年前,有人就在《读书》上撰文予以批评,而当时还兀自沉浸于"现代化迷思",故觉印象深刻。好像今年初在香港中文大学时,还同你读及茅海建导师陈旭麓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十五讲》,慨叹大家毕竟是大家。

所谓大家,在我看来,首先不在于学问的大小,著述的多少,而在于一种正大光明的境界和元气淋漓的气象。日前在学院博士生论坛的总结发言里,我还以汉魏与齐梁相比,讨论大家与小家之别。汉魏之风,大气磅礴,甚至不免显得粗粝,犹如塞外风光。而齐梁之风固然精致小巧,玲珑剔透,却难免一副病怏怏的贫血相,恰似上海滩的张爱玲。治学应追求大家之风,哪怕粗糙一些,也强似精细无比、齐梁诗歌似的小家子气,如民国文人研究、往事并不如烟什么的。

大气自何而来?我想,既来自一种伟大文明的底气,更来自我一向强调的"人民大众"及其历史实践。如果眼睛盯着大户人家的钟鸣鼎食,盯着自诩清高的文人墨客,那么,精致倒是精致,高雅固然高雅,只可惜难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的气象,更无陈寅恪先生"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恢弘。最近三联出版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新译本)》,该书 1980 年代曾经风靡一时,前些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就以"感动一个时代的书"为由再版。而如今再读,却觉兴味阑珊,那种抽象人道的自恋情结就像西方版的《往事并不如烟》,虽然精致精美,美轮美奂,终究是风花雪月,小情

小调，难脱“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的逼仄。与此同时，列宁正在思考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时代命题，却如汉唐雄风，磅礴于全世界而永葆其青春。正如你也意识到这些时代命题及其深远意义，包括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影响。

潘维与唐士其

眼下，有识之士越来越明确，作为一大文明共同体，中国的存在与发展必定有其自身的强大传统和内在逻辑，也可谓“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问题在于如何将其同实际的、亿万人的生活实践有机结合，同普世言说有机结合。潘维教授的文章《中国模式》已经展开高水平的探讨，唐士其教授的文章《中国道路“模式”化了吗》又给予高水平的回应，这一珠联璧合的思想对话前承陈寅恪“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接费孝通“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等立论，同时应和着当今自下而上方兴未艾、着眼于历史与文明的第二轮思想解放高潮，如汪晖的《现代中国的思想起源》、刘小枫与甘阳的经典重读等，相信会与中国崛起一样汇成汹涌潮流，席卷华夏，最终形成全球化背景下的主人翁精神，而荡涤百年来的奴化意识。

如同潘老师的文章一样，唐老师的大作也包含许多值得深思的内容和发人深省的观点，其中特别重要一点在于中国道路是不是应该遵循西方现代文明的物质目标和物欲导向，换句话说，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是不是能够形成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效解答，如果“四个现代化”、“科学发展观”等还是以美国为样本，那么诸如此类的反思都将失去意义，而不得不融入西方及其中国喉舌鼓吹的“普世价值”。其实，唐老师的文章已经给出一个基于现实的解答，中国的人口与资源注定我们无法拷贝美国的模式和道路，当下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已使中国不堪重负，而这一点恰恰是西化派的死结，也是他们有意无意回避的要害，他们只是许诺了乌托邦的大饼。换句话说，即使非洲、拉美等后发国家的乱象可以略而不计，中国巨大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最后也必将制约这种不着调的乌托邦设想。仅看北京每年递增百万私家车，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乱象就清楚了。赵汀阳在《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一书的开篇即写道：

只要具备人人自私和资源稀缺这样两个条件，世界就是个坏

的世界。很不幸，人类世界所具备的缺点远不止这两点。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这两个条件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必要的，这两者导致了人类生活所有值得思考和言说的悲欢故事和成败历史。

就《新青年》与《东方杂志》而言，归根结底还是体现着不同的文明取向。只不过，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现代国家建设是迫在眉睫的现实急务，“科学与民主”又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捷径和必由之路，陈寅恪等所谓保守主义自然显得不合时宜。然而，经过百年奋斗，中华民族不仅“自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而且现实的成就与潜在的危机，如社会层面的“人心不古”、自然层面的“生态恶化”等，都迫使人们不得不认真对待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了。这里，真正困难的还不在于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既不缺乏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也不缺乏多方取经、自我调适的学习能力，而在于刘小枫着力引荐的施特劳斯忧思，即那种盲目而热烈的现代性想象，包括人定胜天的偏执狂热、另类媒体的走火入魔等。如今，反思明亡也是一大热点，其中最值得汲取的教训其实正在于此。不妨说，明朝的河山也算葬送于当时自以为是、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

黄宗智论学

黄宗智的《经验与理论》是其学术研究的精华，涉及一系列富有启发的理论与方法，对重新理解耳熟能详的“理论联系实际”、破解种种僵化或模式化的西方学术套路、更不用说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及其研究等，无不富有新意。特别是，全书最后一章《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是在人大温铁军那里做长江学者时，为博士生、研究生开讲的学术报告，对踏上学术之路的新人启发尤大。他提醒学子对计量统计的所谓新经济学保持距离，不要将一切希望寄托于技术，“把学问等同于计算”，完全接受简单的实证主义认识论。他还批评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院系，包括新闻传播学科，基本都以西方文献为主：

> 譬如，对研究生们的“开题报告”的“文献”讨论部分的要求，主要是与当前西方学术研究“接轨”，而所与接轨的常常限于二、三流的复杂繁琐的当前学术界的著作，没有进一步考虑到基础性的经

典源流。这样，学生的视野难免限于庸俗，提出的问题多是次级的问题，不能深入到根本性的层面。当然，也有“本土化”的呼声，这是可用的资源，并且可以走向费孝通先生那种建新鲜概念于踏实的经验研究，并付之于实践检验的优良传统。但是，这方面的文献尚嫌单薄。

诸如此类的论断俯拾即是，值得深思。

实证科学方法论

汪晖同纽约大学的中国研究生讨论方法论问题时，也对所谓科学实证问题进行了剖析和反思：

如果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只是赤裸裸的现实，这就将人类社会的问题化约为物的问题、实证的问题了。这是今天社会科学的最大问题，一切都是数据或证据。这个方法论后面有没有世界观呢？有。这个世界观是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大转变以来形成的世界观，非常丰富，但也很单调。从根本上说，即不从具体论证上而是从它的结构上来说，它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合法化知识。它已经把国家、经济、社会、市民、法律等领域理性化了，已经是理性化的结构了。所以我们要找到知识上的突破，需要在这个基本的问题上去怀疑。这个知识分割提供了各种各样精密的知识，我们完全不学习不行。我们要认真学，学进去，但同时在重构历史图景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思考。

人性、色戒及其他

张爱玲及其色戒，可以作为当下的一个典型文本，从中透视一系列事关重大的命题，如伦理、正义、现代性、人生意义、中国革命与人类前途等。这些命题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虽然错综复杂，却无不关乎亿万中国人的命运，特别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身家性命。所思《只谈风月，不谈风云？》一语中的：

所谓“人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批判。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往往指向二十世纪乃至近代以来的革命史，

通过批判革命的暴力，表达个体的悲剧，来否认革命这个所谓"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并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

换句话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人、一出戏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一种命运的问题。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中，伴随夏志清"重写文学史"的喧闹，"十七年"的文学、文化以及新中国的诸多历史探索均被押上审判席，遭到前所未有的消解，甚至诋毁。如今，随着一系列现实变故，如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生态危机、精神崩解等，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一切，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从中国革命到世界革命，其中也包括曾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十七年"及其蕴含的丰富现代性。《新华文摘》最近一期转载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明教授的文章《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评价》，颇有新意和启发：

并不是回到左派旧有的立场，或者政治正确的老路，而是要在更广阔的现代性的视界上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作出了多少贡献？毛的创新体现在什么地方？这并不是我们现有的理论解决了的问题。有这么多的作家和理论家在1949年之后，回应毛泽东的《讲话》表达的文艺思想，企图创建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野心。这个野心不管它最终失败了还是造成了很多悲剧，但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想象，一方面给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构提出了宏大的形象，另一方面试图与中国民族传统风格联系起来，创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作品——这一理想是西方现代性所不能概括的，只有在现代中国激进化方案中才能解释。……在世界现代性的文化谱系中，中国的文化/审美现代性，是要重新或者单独给予定位的，这个定位谁来完成？只有中国学者自己来完成。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他还指出，当代文学并不是一个颓败的结局，而是有一定数量的大作家和大作品。对此，我也认同，就像认为不少当代学人的水平不在民国之下。只是陈晓明教授列举的一些作品，如阎连科的《受活》、贾平凹的《废都》等，我不敢完全苟同。若论大作家、大作品，我会举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古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范稳的《水乳大地》、阿来的《尘埃落定》、铁凝的《笨花》等。至于前十七年，则有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浩然

的《艳阳天》、姚雪垠的《李自成》，以及《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旗谱》、《红岩》等。这些作品虽然有其时代局限，如鲜明的政治色彩、革命情结、时代风云，但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言，政治是铸就大气的灵魂。而近三十年来，艺术与艺术家貌似远离政治，沉溺于小我之中，只谈风月，不谈风云，从而也就失去元气淋漓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其间一个最常见、最突出的事实，就是普通人已经很少留意作家作品，排除消费时代、商业社会、网络生态、浮躁心态等因素，缺乏真正感染人、打动人的作品无疑是问题的根源。以柳青的《创业史》为例，刚好不久前还重读了这部新中国的经典，联想六十年的风风雨雨，真是感慨良深！同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韩毓海，在《春风到处说柳青》一文里对此作了通透的分析，酣畅淋漓，鞭辟入里，令人豁然开朗。

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研究新闻之学，还是探讨社会之学，都是不得不面对和深思的背景。否则，充其量也就是那种精致无比的东西，可以自娱自乐，而终将难成其大，因为那种学问既不能深刻的“解释世界”，更无法切实的“改造世界”。

学问之道

目前在读博士生 12 万，每年 5 万博士进入就业市场。博士与硕士应该明确各自定位，区别对待——硕士定位于高级应用型人才，博士定位为高级研究型人才。何谓高级研究型人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韦伯在《学术与政治》里说道：如果你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你的灵魂和命运就取决于眼前这份草稿，取决于你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你便同学术无缘了。你绝不会在内心经历所谓的科学“体验”，而没有这种被局外人嘲讽的独特迷狂，没有这份热情，没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历史意识，那么你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也就不该再做下去了。“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

学与思、思与写

《中华读书报》刊发茅海建的《习史的路》，其中谈到两种培养学生的方法，一种是经过严格训练方才动笔，一种是通过研究及著述而深入学科领域——茅海建导师陈旭麓先生即这样训练他们。茅海建说，两

种方式各有利弊，他也不清楚哪种更好。同样，我也不清楚，恐怕还是因人而异吧。夫子有句熟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化用此语是不是可以说：写而不学则罔，学而不写则怠。虽然滥写、滥发文章不值得提倡，但适当的写作还是必要的，哪怕是“训练性”的写作。否则，就像茅海建说的，“年轻时若不勤于动笔，又何来成熟？又何能思畅笔顺？很可能会长久地涩于写作”。就此而言，应该把握学与思、思与写的关系。

学术何为，前沿安在

学问上的迷茫不必焦虑，有些东西需要积累，有些问题需要沉淀，假以时日，总会豁然开朗。日前为研究生做了一场报告“学术何为，前沿安在”，还以自己为例，谈了种种“探索之中有迷茫，徘徊之际有方向”的话题。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我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尽力向最高处攀爬，哪怕一辈子也爬不到顶，也要上一点是一点，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透。新闻传播学的一大问题也在于眼界偏低，视野偏窄，结果讲的东西不是没有道理，而是远远不够，于是“高人”看来不免觉得浅陋。

积累知识是画龙，驾驭知识是点睛。最近看的两部书，再次领悟这一点，一是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一是金一南的《苦难辉煌》。金一南的话题集中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期间正是当下热门的领域，有趣的、无趣的知识井喷一般涌出，其中之所以鱼龙混杂，不在于知识的多少，而在于眼界的高低。画龙并不难，关键是点睛的慧眼。

当然，《苦难辉煌》也讲了不少知识，引人入胜，启人心智。如“一·二八”上海抗战的爱国将领蔡廷锴是国军一员猛将，官至团长、师长还亲率敢死队冲锋陷阵。他原本出身贫寒，同国军的许多将领一样，故金一南写道：“这种现象尤其多见：出身富家的加入共产党，为穷人争天下；出身贫苦者却加入国民党，为富人保江山。”蔡廷锴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南下部队左翼总指挥。部队到达进贤时，他乘乱清理了队伍里的共产党员，脱离起义军，使南下计划受到严重挫折。毛泽东说他一生打过四次败仗，头一仗就是第三次反围剿时同国军蔡廷锴部交手。此役，红军伤亡重大，两位师长阵亡。

谈 世 事

曹操：奸雄抑或英雄

陈寅恪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的教案里，已对曹操进行了公允的评价，毛泽东、郭沫若等对曹操的好感更是众所周知。郭沫若在戏剧《蔡文姬》里借屯田都尉董祀之口，盛赞曹操的文治武功与雄才伟略。且不论是否“趋奉”，董祀的赞誉用于魏武帝与毛主席都是实事求是的：“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的景象。”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却一直遭到无良文人的诋毁，在戏剧舞台更被塑造为白脸奸雄。怨不得，毛泽东对此心有戚戚，写下诗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读《三国志》时曾指斥某些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确实，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等诗章没有宇宙般的浩茫情怀是写不出来的。对比之下，曹丕及其“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的《燕歌行》，就显得逼仄而局促了。



说“士”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确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说的“士”，绝不仅仅是读点书，识两字，懂点“知识”，会一通叽里呱啦的斯瓦希里语什么的。真正的士乃是二桃杀三士的“士”，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士”，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士”。一句话，那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即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潜 规 则

所谓中国“封建”“专制”云云，是典型的“落伍”思想，看似红火的所谓“潜规则”更是似是而非。哪个社会、哪个时代不是一方面按照“文件”语言宣示某事，另一方面又按照实际规则操作某事呢？这倒不是因为某人或某些人“口是心非”，实在是因为实际情况非得如此，看看日常家庭的言谈举止就明白了。以社会层面的“潜规则”为例，《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一方面鼓吹人人生而平等，而另一方面又将黑奴当作牛马。

母亲·母国·母语

读着来信，心底不禁泛起感动的涟漪——既感动于诗人般清醇的梦想，又感动于志士般伟岸的担承，既感动于对故国家园的殷殷眷恋，又感动于对天下苍生的深深牵挂。最感动的还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相信只要有繁衍子孙的母亲在，有化育万物的母国在，有生生不息的母语在，绵延千万年的中国就会永葆青春。

“现代化”与“本土化”

中国自进入所谓“现代”以来，可以说一直在各个领域受着两股力量的撕扯，一是“现代化”，一是“本土化”。两股力量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所以问题就比较复杂。任何执其一端者，都不免胶柱鼓瑟。或是“西化”，或是“僵化”，都显得幼稚可笑，其结局也都是死路一条。所以，生路应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这对政治家来说需要智慧与艺术，对学问家来说同样需要智慧与艺术。近代以来的大学问家，一定是在现代化与本土化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者，如社会学的费孝通，哲学的冯友兰，美学的宗白华，经济学的陈翰生等。

读历史 看现实

《十二个春秋(1975—1987)》差不多看完了，有些地方看得细，有些地方看得粗。对于亲历者来说，这些故事更有许多感同身受的味道。

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这是看后的突出印象。作者既在为自己辩护，更在为他一生信仰的理想辩护，为共产党、毛主席，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辩护。这不能不令人肃然，在西风日炽的时代又不免显得悲怆，就像那位同风车搏战的勇士堂吉诃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敬佩这种貌似落伍的英雄，如寂寂寥寥的济南人张承志，即使未必完全服膺；反感看似时髦的名流，如红红火火的上海滩张爱玲，尽管未必一概反对。随波逐流还不容易嘛，顺流而下就是了，多么轻松，多么风光啊。然而，面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时尚，能做中流砥柱、岿然屹立者，则非有大仁大勇不可——这才是陈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呢。追随时尚的潮流，说什么“独立”？遵循霸道的逻辑，谈什么“自由”！

另外，他的辩护放在一二十年前可能引来嘘声，而今天则得到越来越多的深思，因为实践而非理论教育了人们，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资本主义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末路一条，死路一条。这个道理本来已在中国近代史上得到充分证明，并为此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而如今又在重新进行历史“论证”，而代价又是同样惨痛，包括生命的代价、精神的代价、环境的代价、资源的代价等！正是基于这些惨痛代价，近年来才“不得不”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包括回归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新一代领导人一上任首先去西柏坡，2006 年春节又去延安，这绝不是随意的，而是具有鲜明象征意味的。也正是这些重大调整，才导致那些时尚者流越来越激烈的反弹，尤其当他们的势力坐大、形成内外呼应的“统一战线”之际。因为，他们目标很明确，即义无反顾地将中国导向资本主义，导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当然，他们绝不会这样赤裸裸宣示，有些人也未必充分认识自己的作为和实际的结果可能南辕北辙(就像苏联首屈一指的异见人士索尔仁尼琴，看到苏联解体后的一系列惨痛现实而痛心疾首悔不当初一样)，而是往往打着普适的价值或人类的旗号，如自由、民主、人权、文明、与国际接轨云云。然而，正如上课时曾经提到的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将军所言：屈服一位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他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是，屈服一个民族争自由、求幸福的意志，则是古今中外都绝对不可能的。而中外时尚者流的问题恰恰在于，忽略了十几亿“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这种不可屈服的意志！



大学话题

大学话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更非我辈“外行”所能轻易置喙。学科目录上，教育学是同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等相提并论的一大学科门类，而新闻传播学还只是文学门类里的一个一级学科。当然，外行发点感慨、感叹、感想什么的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外行的有些看法未必都是“胡言乱语”。

姚国华的文章有两点深有同感。第一，大学首先是培育一种精神，即他说的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理想或理念。清华校友、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先生说过，大学教育首先是培养全面的人，其次才是有专业知识的人。复旦多年来致力于通识教育，在校长杨玉良看来，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真正成为一个人格完整的人。日前说起今年毕业班拍摄的纪录片《大肆》，针对清华新闻学院应该注重实用性、职业性，以便学生好找工作等主张，我又强调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所，清华尤其不是为找工作、找所谓好工作而办的。至于茫然、失落、觉得大学四年没有学到东西等，恐怕是文科或大学的共性。文科或大学的共性在于，仿佛没有学到什么具体东西，但实际上又在潜移默化地受影响、受熏陶。无论是当年大学毕业时，还是毕业二十余年的今天，我也同样会觉得大学四年似乎没有学到什么值得一提的。对大学生来说，真正的学习是在大学之后，大学一般只是懂得如何学习、为何学习。我的读书生涯，也是在大学毕业后才开始的。

虽然还没有顾上看《大肆》，但知道其中的各种想法、各种情景其实并不新鲜，“古往今来”的大学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而且随着大学生走向社会、走向真正人生，现在看来怎么样的东西都会变得不怎么样。所以，《大肆》的价值在我看来，只是真切地记录了大学生活的部分内容。等毕业十年二十年后再看，恐怕最多引起一点回忆和感情的涟漪，而不会再有现在的激动，因为它没有什么真正可激动的内容。那么，真正激动人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说的精神，超越个人利害得失的理想或理念。对这种精神或这种理想，可以有不同表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不管怎么表述，这种精神、这种理想才是大学的灵魂，才是大学教育的核心，也才是真正应该培育塑造的。不论

“西南联大”还是“抗大”，都以这种精神和理想著称。“文革”前的大学同样具备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和理想，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大批有志气、有抱负、有专业的大学生，并从他们中间走出胡锦涛、温家宝等国之栋梁。学院倡导的以及平时强调的，也是这种精神和理想。我们不希望学生成为鼠目寸光、鸡零狗碎的人，为一时的工作、为“推研”、奖学金等芝麻绿豆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人，这种境界成不了大器。

第二，评判所谓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得看用什么标准。如果用美国的标准、西方的标准，那么中国任何大学都矮人一头，别想出人头地。美国有关机构评选了 14 家“全球最美的大学校园”，其中亚洲只有清华，然后欧洲有两三家吧，其余都在美国。我们在为母校额手称庆之际，是不是也想一想这种评判的问题，难道世界最美的校园绝大多数真的都在美国。如果用对国家、民族、历史的影响等评判，那么清华、北大、人大、复旦等对中国来说怎么能不算一流大学呢，哪个中国家庭不知道清华、北大，不以清华、北大为最高目标、莫大荣誉呢？港校可以拉个把高考“状元”，但不可能有清华和北大的精神，在那些地方倒是可以专心致志为自己谋一份好差事，安居乐业，仅此而已。至于想从那里大批量地走出左右未来中国的“大家”、“高手”，从而使清华、北大瞠乎其后岂非痴人说梦。当然，所谓港校也是中国的大学，同清华、北大等是兄弟姐妹关系，他们在兄弟姐妹的排行里有自己的位置，但在大家庭里肯定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

美国暴行

辞旧迎新之际，飘下一天纷纷扬扬的瑞雪。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新华网的报道，也不在于萨达姆是否反人类，而在于美国有什么权利、谁赋予它权利，不远万里去侵略一个主权国家，去戕害、杀戮、荼毒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无辜的妇女、儿童、平民、百姓。这个问题其实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天下人都知道，甚至就连普通的美国民众心里也门儿清，正如美国大兵回答记者的问题：

> 伊拉克问题是两国之间的战争，还是侵略？
>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侵略了！

其实，即使在古代，人们还懂得“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道理，元首被俘也不见得遇害，比如宋徽宗父子，遭遇“土木之变”的明英宗最后也被蒙古可汗释放。由此看来，美国的暴行就不仅是骇人听闻了。相信一千年以后，当人类真正实现大同理想，史书上会像今人记载春秋战国的暴秦一样记载21世纪：初，暴美倒行逆施，一意孤行，激怒荆轲等义士，而暴美不思己过，幡然悔悟，反而变本加厉，穷凶极恶，大开杀戒，荼毒众生，致使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当然，对于历经数千载风雨、惯看秋月春风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暴行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这里唯一让人不平的是，流氓就流氓吧——我是流氓我怕谁，杀人就杀人吧——杀印第安人、杀黑人早就不眨眼了，何必还要处心积虑地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什么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啊，让人不禁想到睢景臣的讽刺名篇《高祖还乡》：“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新年快乐，天下太平！



谦卑自持

最近由于“突击”书稿，也生吞活剥了一些前贤大作，包括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看得越多，越觉天地之大，世界之广，人生之繁，历史之深，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所以愈发觉得需要保持一种谦卑，无论对历史还是对前人，都应以慈悲之怀与同情之心去感悟“各民族间共通的欢心与苦难”。北大牛军教授，在凤凰世纪大讲堂上谈“毛泽东的外交遗产”时，也提到这种知人论世的姿态，还引用杜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提醒我们理解前人或他人时，千万不可轻狂或张狂。所谓不废江河，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亚历山大等风流人物，主要还是信里说的“人民、民族、制度、风俗、地形、文化、历史”等。

“欲灭其国，必灭其史”

2007年有部好书《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通过大量历史细节“再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展示一个你不知道的延安”，饶有趣味。新时期以来，“告别革命”乃至“否定革命”、“颠覆革命”成为一

批文人的时尚,“冰点”事件、“色·戒”事件等即其最新表现。由此也可看出,当代中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相比于经济发展确实软弱无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已被搅得有点清白不辨,是非不明了。肉食者似乎也意识到“文化政治”的严峻性,2007 年“九一八”纪念日,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在延安召开,陈奎元、张全景等发言,都谈到“欲灭其国,必灭其史”的问题,陈还引康熙进士陆陇其的话说:“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

说到明史,近年也颇有不着调的东西大行于市,步《万历十五年》后尘,对古人、对前人极尽“妖魔化”,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对此,中央民族大学明史专家陈梧桐老先生,在新著《明史十讲》里给予有理有据的批驳。可惜世人往往喜欢名嘴式的忽悠,而不愿亲近孔子式的深沉,恰似喜欢《三国演义》而远离《三国志》。名著《美国自由的历史》译者、留美学者王希教授曾同北大教授韩毓海谈到中国史叙述与美国的不同,说在美国史叙述里,美国的每届领导人好像都是伟大光辉正确的,没有一任是有问题的(我组织研究生翻译《白宫前沿——白宫记者团团长海伦·托马斯自传》时也颇有同感),只有我们喋喋不休地说自己的前人有问题、不争气。当年胡适解释日本侵华时竟说,今天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于祖宗不争气造成的。关于明史,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教授在《鼠疫:政治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里,提出一个新观点——“老鼠灭亡了明朝”。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固然有待检验,但至少比各种充斥着成见与偏见的畅销书更值得关注。

为了延安之行,特意买了一套路遥《平凡的世界》,二十年前听张家声在广播里播这部作品的印象还栩栩如生。根据路遥作品改编的电影《人生》,1984 年上演后获得一系列大奖,插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汲取西北民歌的精华,歌词与旋律无不扣人心弦,如“双扇扇的门来呀单扇扇地开”,那么朴实而优美地表现了对人生的感悟,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如今,路遥那种美好自然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已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或为诡异变态的“大红灯笼”,或为纸醉金迷的“一地鸡毛”,甚或群魔乱舞的“色·戒”。更可怕的在于,这些东西通过流行文化、消费社会、市场经济等,形成铺天盖地、漫山遍野之势。

现代文明与逐新趋奇

所谓现代文明乃属西方中心散播的东西，这种文艺复兴以来历史的突出特征之一是逐新趋奇，用马克思的话说，除了变化，再无其他选择。如今，这种逐新趋奇的变化节奏越来越快。即以最新奇的电脑科技为例，清华八年自己已经换了五六台、七八台——记不清了，而我一向不喜欢逐新趋奇，对技术玩意儿更是不屑一顾。问题是每当换一台新机器，都说这是最新款的，包罗万象，天下之美尽在于此，从此可高枕无忧矣。然而，还没过一两年，所有的变化已经让你感到，当初那个最时髦、最时新、最先进的玩意儿已经近乎古董，再不更新换代不仅显得落伍，而且使着也不顺溜了。于是，你就不得不被这种逐新趋奇的潮流不断推涌着、裹挟着，想不动都不成。

现代学问也是如此，在逐新趋奇的潮流里翻腾不停，乐此不疲。受制于实践的新闻传播学，就更是难以摆脱这种宿命。曾几何时，人们无不为来自大洋彼岸的传播之学欢呼雀跃，以为终于找到真理，找到真正的治学门径，而现在，明白人发现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由于勾兑了许多水分，还不如旧酒醇厚。日前接到某研修班通知，请海外“大师”、“海不归”传经送宝云云。眼见“趋炎附势”的青年学子，又将飞蛾扑火地涌去，我们只能顺其自然，还能如何？该怎么的就怎么的，反正就是这么的，从来没见谁说事情不是这么的——大智若愚的好兵帅克如是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谈何容易啊。

重温理论与实践

对中国政治和中国问题，我们的焦点还是集中在网络学堂那番长篇对话——可惜遗失了。其中，核心问题在于：任何学说、理论和主义，既要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更需同亿万人的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而对中国这个人口众多、差异巨大的国家来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又是多么错综复杂。最近学校展开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活动，我们同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分在一组讨论，听钱院长等经济学家、法学家引经据典，颇受启发。其中，谈的最多的一点，就是许多国外的理论和案例很难解释中国问题，更不用说解决问题。对此，应该尽

可能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让思想冲破牢笼”，不为种种成说所束缚，尤其不为种种舶来理论所禁锢。其实，这些舶来品也是与各自社会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刻舟求剑食洋不化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像某些时贤转运的西方经济学。以近来升温的西藏事务为例，无论历代王朝的体制创新，还是新中国的民族政策，都包含一系列富有智慧的理性思考和制度安排，当以“同情理解”的态度认真汲取。

思考中国与美国

应该承认，比起屠杀印第安人、奴役非洲黑人、镇压劳工运动等，美国社会确实趋于进步，黑人总统当选又是一例。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发展的样板和文明的示范，其问题也日渐突出。一方面肆无忌惮的霸权，构成全球人类的头号危险因素，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已非虚词。另一方面，美国的生活方式日益呈现反人性、反人道、甚至反人类的“异化”特征，诸如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精神危机以及当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等都是例证，好莱坞大片更展现了触目惊心的乏味气息、颓败症候和恐怖前景，假如全世界都过上美国式生活，那么真正的末日恐怕也就降临了。届时崇美者发现，自以为播下人类文明的龙种，结果收获的却是满世界的跳蚤。面对当今各种危局和危机，人类应该探求新的出路，应该破除僵化教条的一根筋思路，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世界、美美与共等不失为一种选择。

文艺话题

为了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人生和人性，了解社会和历史，需要关注和重视文艺问题。如果说哲学是人的大脑，历史是人的骨骼，那么文艺就是人的血肉。前辈诗哲有言，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而文艺针对的就是生命之树，鲜活、灵动、郁郁葱葱、和谐统一等。所以，古今各路通家，从孔子到柏拉图，从康德到章学诚，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无不通晓文艺，赵汀阳、刘小枫、汪晖、朱苏力、张旭东、赵一凡等当世才俊也都对文艺涉猎颇深。说到底，文艺问题属于社会人生问题。以美国社会的“异化”为例，黑色幽默等现代派作品达到何等精妙的批判境

界，“二十二条军规”真是入木三分。当下中国也显现此类荒诞、悖谬、扭曲人性、无孔不入而又无可奈何的科层化或官僚化趋势，并美其名曰“与国际即美国接轨”。同样，了解民国故事，不能不读萧红作品，而张爱玲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也是一种另类的写照。遗憾的是，新中国的天翻地覆、大起大落，本来应该铸就史诗巨著，而目前仅有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差强人意，至于所谓80后、90后往往显得苍白乏力，除了玩世不恭和玩弄技巧，谈不上悲天悯人而洞悉幽微的大情怀、大境界、大格局。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昨天此刻在泉城，万家灯火迎新年，而现在已回京城。这种个体的位移，也如时代与国家的巨变。想起百年前《大宅门》的故事，从京城到济南，千儿八百的路程，坐马车、牛车得颠十天半月，还提心吊胆，生怕被土匪、军阀骚扰。如今，动车三小时，飞机四五十分钟，非常便捷，也非常安全。这就是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邓小平推动的新时代。今天听了胡锦涛的《告台湾同胞书》，有几句印象深刻，如“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骄傲和自豪”！古人云，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另类”媒体多为丧邦之论，而这样的句子无愧于兴邦之言。

在学院拿了一堆贺卡，其中一张是台湾新闻学泰斗、政治大学新闻系李瞻老先生的。老人家是当年孙立人将军的“部曲”，对这位出自清华的爱国名将推崇备至，几近崇拜。信里有一段写道：“孙立人将军为清华杰出校友，世界名将，与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巴顿将军齐名，在贵校校史馆中应有适当表扬。如有需要，弟愿予以协助。”我对孙将军的骨气同样敬重，特别难忘将军指挥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血战日寇，曾下令凡到过中国的日俘一律就地正法。百年校庆时，应该好好表扬一下这位有骨气的中国将军、清华校友，也借以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交通。



海鲜

说到海鲜，想起《中国青年报》总编辑陈小川讲的一个故事。他老

岳母是当年胶东土八路，生长海边。那时候，地主老财才能吃肉，而穷人只能吃海鲜。他老岳母后来闹革命的动因之一，据说也是想吃肉，而不想吃海鲜。如今，这种当年穷人吃腻的东西，居然成为富裕和身份的象征，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与此相似，改革开放前，人们整天都是“瓜代菜”，难见荤腥。大概从1990年代后，时尚人士已经不怎么吃肉，而以各种野菜为新潮。我读博时，也是穷学生，肚里没有多少油水。一次，有人郑重地请我吃饭，说大鱼大肉吃腻了，今天咱们就吃点野菜吧。

输出革命与输出战争

所谓“输出革命”的提法不准确。第一，革命不是输出的，任何革命归根结底都是由自身社会矛盾引发的。至于外来因素，包括思想影响、理论指导、人员参与等，都必须与自身革命运动相结合才能奏效。比如，美国革命虽有启蒙运动的影子，也有拉法叶特等法国大革命骨干的参与，但不能由此说法国向美国“输出”革命。第二，这种提法本身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意在否定革命、贬损革命。第三，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确支持和声援亚非拉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其中既有国际主义的正义理念，也有感同身受的切身体验。应该看到，当时中国的姿态及其行为不仅赢得世界一切追求正义人民的信赖，而且为中国赢得天下归心的政治环境。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就得益于此，甚至毛主席、周总理本来都没想到能够这么顺利、这么快进入联合国，因为美国处心积虑想方设法搞了很多名堂，当时人们(包括我们)都觉得美国胜券在握(参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所以，投票结果一出来，真是全场欢呼，举世欢庆，美国遭遇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了解这些背景，就不会跟着西方及其“第五纵队”谈论所谓“输出”革命了。如果说真有什么“输出”的话，那么今日美国为向世界输出其价值观，倒是不惜频频输出战争和动乱。

两大问题

处于所谓转型期，问题貌似层出不穷，思想也是复杂多变。对此，一方面应该相信我们有能力驾驭一切，相信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自我

调适能力，所以，三十年来、六十年来，虽然不断有人预言或诅咒今天崩溃、明天瓦解什么的，而新中国依然蒸蒸日上。当然，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不必回避，比如当下的两大问题，一是自然层面的环境问题，一是社会层面的信仰问题。环境问题如不解决，则危及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根基；信仰问题如不解决，则不仅动摇当前的社会，而且也将使未来的发展失去意义，再多的钱、再好的日子有什么意义呢。蒋南翔校长倡导又红又专，邓小平说这个“红”绝对不可少，推开来说，这个“红”其实就是信仰、信念什么的，就是人生的目标、文明的价值等。失去这些也就失去目标，正如那则笑话说的：好消息是飞机正以超音速飞行，坏消息是迷失了航向。

高贵与伟大

相对于鸦片战争后的百年魔怪舞翩跹，相对于西方几百年的“血与火”，新中国六十年尽管难免种种失误与困顿、曲折与挫折，但无疑属于近代史上无可比拟的现代化奇迹。尤其是——用潘维的话说：“中国成功的基础不包括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不包括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也不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不断的区域战争。”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随着“风景这边独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睁眼看世界，探究中国模式以及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突破西化的所谓“普世”魔障，寻求更伟大、更包容、更体现正义与尊严的文明之路。就此而言，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的新作《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又是一例。他的如下论述是何等透辟，同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的有关论述一脉相承：

> 和欧洲人对大陆和海洋的思考所形成的地缘政治思想或自由与专制的政治理念不同，中国人对山（大陆）和水（海洋）的思考并非着眼于现实的政治力量比较，也不是着眼政治制度的构建，而是着眼于更为根本的人心培育问题。
>
> （中国）共产党理论中最核心的要素不是阶级，也不是民族，而是“国家”和“天下”这样的概念。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就在于这个阶级概念的背后，有着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同理想。而这个“国家”也不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而是传统

儒家的家—国—天下的差序格局。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使得他们看到了拯救中国的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拯救全人类的途径。由此，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现实动机，不如说是基于国际主义和“天下大同”的古典理想。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旧中国”与“新中国”的根本区别。

“一国两制”概念之所以没有被提升到一般性的理论思考上来，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视野过于狭隘，将其看作是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智慧或者解决港澳弹丸之地的权宜之计，而没有看到在邓小平的政治思考背后，实际上贯穿了从毛泽东到中国古代历朝伟大政治家关于边疆治理的连续性思考，而在这思考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套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

中华帝国兴起于秦汉，繁盛于唐宋，发达于元明清，尤其大清帝国运用一套成熟的、灵活弹性的政教制度，将中华帝国治理边疆的宪政体制发展到极致，有效地解决了唐宋以来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边疆问题。这套政制的核心就在于捍卫帝国主权和中央集权制度下，采取因地制宜的个别统治的政策：“以八旗制度统治满洲，以盟旗制度辖蒙族，以行省制度治汉人，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政教制度驭藏番，以土司制度辖西南苗夷，以及以宗主制度对番邦。”

正是基于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的正义原则，并肯定各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文明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华民族的统一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放弃了“改土归流”的现代化方案，尤其是用汉族文化同化少数民族文化的大汉族主义，回到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历史传统，从而针对多民族“大聚居，小杂居”的历史现实，采取了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思路。由此，包括中国藏人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幸运地避免了北美印第安人颠沛流离的悲惨命运。

总之，中华文明的一国多制传统及其政治理念实际上体现着一种伟大的平等意识，“在这平等的背后是对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

发自内心的尊重”。

进而言之，中华文明之中既蕴含着“中庸”、“和谐”、“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伟大传统，也体现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贵德行，从而根本有别于傲慢与偏见、蛮横与霸道的种种原教旨主义，如威·豪伊特指出的：“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

所以，无论强世功，还是刘小枫、赵汀阳，抑或马克斯·韦伯、列奥·施特劳斯等，都深刻意识并揭示现代文明以及现代政治的病灶。在这些一流思想者看来，现代文明以及现代政治的根本弊端就在于高扬“激情”和“欲望”，并将“利益”作为鹄的，仿佛“政治的全部目的就是将人们的激情和欲望导向利益的最大化计算”（强世功），由此彻底失去了古典文明一贯尊奉的高贵德性，沦为一地鸡毛的功利算计。从“看不见的手”到“丛林法则”，从殖民时代的强盗逻辑到全球化时代的“华盛顿共识”，这种无德无行的理念渐行渐远，渐行于世，于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不从根本上反思并扭转这种文明颓势与精神颓势，人类的未来与前途不堪设想。而强世功及其《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实际上寄托着一种“天朝上国”的宏图远虑：“如果说中国的崛起对人类历史有贡献的话，不仅是指其经济增长，而且是建构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政治体制以及与这套政治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哲学思想。我们中国人应当有这个雄心和信心。”说起来，这种雄心与信心早在三百多年前，就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哲人莱布尼茨所感悟：

> 在日常生活以及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欧洲和中国）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可以互相交流。在逻辑的严密性和理性思考方面，显然我们（欧洲）要略胜一筹……但在人生的伦理认识和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和中国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龙 须 沟

看到国家建筑设计院总设计师谈话，说起建国初旧城改造的背景，同时下流行的认识颇异其趣，包括前些年的畅销书、新华社记者王军的《城记》。解放初期，北京市到处都是“龙须沟”，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而梁思成等教授对此并没有多少感同身受的体验，他们的文物保护思路固然不错，可惜对一个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新生政权来说，未免远水不解近渴，过于“奢侈”了。“人民政府”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继续生活在“龙须沟”，那样的话同高高在上的“民国政府”还有什么区别。今天反思当年一些“短视”行为，为古城消逝叹惋之际，不能不设身处地考虑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以为众人皆醉，唯我独醒，领袖与人民都陷入“疯狂”，要么毁城，要么生娃什么的，只有梁思成、梁漱溟等人保持“清醒”，唯有事后诸葛才叫聪明，不过是“看上去很美”的新神话而已。

两条道路

《红旗文稿》第 176 期的头题文章谈到，西方与中国走了两条路：前者走的是资本俘获国家之路，后者走的是国家左右资本之路；前者是先发国家的旧路，后者是后发国家的新路。英国的鸦片贩子俘获了政府，英国海军就会千里迢迢赶来替他们打鸦片战争。

血与火的鸦片贸易

近些年来，太平天国及近代中国一系列反抗、斗争、革命运动等，不断遭到时贤“与时俱进”的唐突，比如“冰点事件”。你以经济史、货币与物价、人口增减、资本积累、列强扩张等资料，仔细考察和辨析“长时段”的历史因缘，相信定有更深刻、更真切的了解。

犹忆年轻时，阅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一笔笔鸦片贸易的明细账，一笔笔白银增减、贸易出超入超的详尽数据等，虽然一时看得似懂非懂，但清廷的软弱无奈，列强的歹毒霸道，还是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即使被“新启蒙”忽悠，那些刻骨铭心的历史印迹依然挥之不去，费正清所谓“伟大的中国革命”开辟的新天地更成为知人论世的基础。

这个过程固有知识的积累、思想的深化、眼界的开阔等因素，以我之见，更深切的体会还在于常识。举例来说，说破天也难以让人相信走私毒品、贩卖鸦片、巧取豪夺、杀人放火等，是所谓“文明”、“进步”、“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过去如此，现在依然。

《南京！南京！》

新一期《新华文摘》转发电影《南京！南京！》的三篇评论，不无批判眼光和思想洞察力。其中第一篇，张冰的《〈南京！南京！〉：历史叙事中的困境》（原载《读书》第9期）指出，陆川囊中别无其他长物，唯有所谓"人性"这一件宝器而已，"一路祭起，似乎无往而不克"。问题是，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漂浮于实际历史之外的人性，即所谓"去历史化"的人性，不愿面对也无力处理此类问题："为什么江边唱歌喝酒的日本兵和凶残的刽子手是同一个人？为什么日本兵从军日记里那个日常生活的南京，和血流成河的南京是同一座城市？"此类问题恐怕也是"文人雅士""正人君子"不愿面对也无力（无意）回答的，他们只是抽象谈论貌似高雅的爱呀、文明呀、进步呀，等等。就像前些年那部在央视播出、颇遭非议的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其中被《资本论》揭示和批判的资本文明及其野蛮血腥——"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全部泯灭无闻，只剩下一些脱离历史语境的科技进步、制度先进、教育发达等空泛说教：

> 陆川的策略其实很简单，说穿了无非就是将人——包括杀人者和被杀者——还原为"人"……这个"人"的人性就像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一样，可以顺畅地通兑一切，去除隔阂，达成沟通。在这个由无差别的永恒人性所搭起的平台上，所有人都不过是"人性"的虚幻影子而已。太阳底下无新事，关于"人性"我们又能说出什么新东西，无非是亘古不变的几出悲喜剧而已。而在用人性通约一切之后，还能够区分杀人者和被杀者吗？他们都是"人"，都为某种"人性"所驱使，在"人"的层面上，他们完全可以扯平了。由此可见，将人还原为"人"的"去符号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将具体历史中的人抽象化的过程，一个去历史化的过程。正因如此，我们在《南京！南京！》中看到的，只是对"人性"的抽象刻画，却看不到活生生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活动的人。

这样的历史叙事貌似漂亮，实则苍白无力。

谈　书　籍

莎翁剧作及其翻译

如同巴尔扎克的作品翻译属傅雷先生，托尔斯泰的作品翻译属汝龙先生，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则属朱生豪先生。在短短三十二年的生涯中，朱生豪历经艰辛，忍受苦难，以一人之力两度译介莎翁诗剧，留下一曲生命与艺术的天鹅之歌。他曾经说过："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读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辍。"朱生豪与夫人宋清如的一往深情也称佳话，有诗侣莎魂之美誉。

古人云，三日不读谢朓诗便觉口臭，诸如"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确实唇齿留香，满目清新。李白称：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而莎士比亚以及朱译莎士比亚，也有如此效果。学生知有此好，从美国带回耶鲁版《莎士比亚全集》（*The Yale Shakespeare*），置于床头，偶或翻阅，辄感澄明。比如《第十二夜》写了两对阴错阳差而终成眷属的欢喜冤家，剧情台词无不令人捧腹，而又情韵悠长。下面这段，公爵奥西诺差女扮男装而热恋自己的薇奥拉，向伯爵小姐奥丽维娅求爱，而奥丽维娅又不知不觉爱上形容俊朗的假小子薇奥拉，其间种种微妙感情和精美台词让人过目难忘：

薇：小姐，您是世上最忍心的女人，要是您甘心让这种美埋没在坟墓里，不给世间留下一份副本。

奥：啊！先生，我不会那样狠心；我可以列下一张我的美貌的清单，一一开陈清楚，把每一件细目都载在我的遗嘱上，例如：一款，浓淡适中的朱唇两片；一款，灰色的倩眼一双，附眼睑；一款，玉颈一围，柔颐一个，等等。

再如罗密欧对朱丽叶的那段有名赞美：

> 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起来吧，美丽的太阳！……天上两颗最灿烂的星，因为有事他去，请求她的眼睛替代它们在空中闪耀。要是她的眼睛变成了天上的星，天上的星变成了她的眼睛，那便怎样呢？她脸上的光辉会掩盖了星星的明亮，正像灯光在朝阳下黯然失色一样；在天上的她的眼睛，会在太空中大放光明，使鸟儿误认为黑夜已经过去而唱出它们的歌声。

闲话《狐狸洞话语》

前日在港，闲来无事，踅到中环的一家三联书店。此间书贵，价比天高，翻来翻去，好不容易发现一本好书，一看价钱顿时气馁。临走时，李欧梵的《狐狸洞话语》闯入视线，由于早闻此书，于是不惜血本，花75港币买下这本只有244页的小书。

一路上在地铁里就开始随手翻看，晚上躺在床上继续看，第二天上午去拜会一位教授前又抽空看了一阵儿，基本上看完了。记得有次回答学生问题时，曾经声明自己算不上“博览群书”，与李欧梵等相比差距很大。不过，读《狐狸洞话语》，发现原来自己同这位前辈还颇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对高头讲章理论大著都有点敬而远之，看书总是有头无尾，往往买了许多书，结果往书架上一放就再没有时间光顾，等等。这样一来，觉得彼此的心理距离似乎近了许多。不过，最心旷神怡的，还是他谈的许多话题都是我所感兴趣的。比如，随便举个例子，他对英国学院作家洛奇(David Lodge)《小世界》的评析，就让人悠然心会。

下周准备去香港中文大学，除了拜会同行专家，也是为其优美的校园所吸引。学校依山傍海，顺势而上，一石一木都仿佛精雕细刻一般，李欧梵曾在中文大学执教。由此想到，大学还是应该远离一点尘嚣。用学术化的表达，大学的内在超越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外在超越的格局。当年西南联大之所以出了那么多人才，除了其他因素，有一点也很重要，而这一点往往被人忽略，即“与世隔绝”的环境。这种环境使师生们心无旁骛，而只能一心治学。

如今，这种环境只能是奢望了。仅看北大校园的围墙一会儿拆，一

会儿建，就可略知外界尘世的滚滚浪潮对校园的冲击了。去年，有本畅销小说《桃李》，是以北大的教授、研究生等为原型的，作者也是北大毕业的研究生。虽然比起《围城》、《小世界》等作品，《桃李》只是一部畅销书，但它反映的现实却是活生生的。

话又说回来，从另一方面讲，校园与世隔绝是不是也容易造成人们不谙世事、耽于幻想、眼高手低、无所作为呢？去年开学之际，请中央党校李书磊教授来给新生作演讲，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是北大毕业的，在对比北大与人大的校园时说道，燕园的幽美养成了北大学生的懒散与空幻的脾性，而人大校园的世俗风格则使学生始终保持与人世的密切关联，从而具有鲜明的务实风格。这个对比颇有意思。

重读《资本论》赞叹马克思

这个假期是几年来比较放松的一个假期，因为暂时没有硬任务、死任务，于是看点“闲书”，干点“闲事”。今天心血来潮，翻开《资本论》，拜读起来。读时心里不禁慨叹，经典就是经典！当然，许多经典需要同特定的情景与特定的心情相契合，才能激发心灵的感应与思想的火花。若不是这些年的人生遭际和当下的社会变故，若不是内心诸多的困扰、郁闷和忧虑，是不可能发现《资本论》原来竟是这么通透，马克思不愧是BBC评选的“千年第一思想家”啊！不说他的思想多么精深，也不说他的思路多么严整，仅就他的文字而言，每每觉得那么清澈、明晰、通达，往往富于诗意。比如，资本原始积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再如，书中转述的：“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眼下竞相追捧哈耶克，达到如日中天、炙手可热，可同马克思的博大深邃与悲天悯人相比，不是有天壤之别吗？元稹悼亡诗写道：“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同样，年轻时觉得“搞笑”的事情，包括“马克思主义”，现在居然一一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

2011 年年初，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巨擘霍布斯鲍姆出版了新著《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故事》（*How to Chang the World*：*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在这位十月革命当年出身的老共产党员看来，今天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曾被视为“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穷奢极欲，2008 年的金融危机又是一例。

寒假阅读

寒假读了一批书，有的重温，有的新睹，获益良多，思绪万千，“觉今是而昨非”，“独怆然而涕下”。后面罗列一些书目，供参考。

1.《资本论》、《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西方政治思想史》（麦克里兰）、《国富国穷》（兰德斯）……

2.《18 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魏丕信）、《南明史》（顾诚）、《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谢国桢）、《洪业——清朝开国史》（魏斐德）、《甲申朝事小纪》（抱阳生）……

3.《中国的现代化》（罗兹曼主编）、《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弗里曼等）、《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柯文）……

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杨念群等主编）、《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钱穆）、《赵树理选集》、《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老皮缅处的宅子》（茨维塔耶娃）……

魏晋风度

嵇康、竹林七贤以及魏晋名士等，是我所追慕的先贤，《世说新语》百读不厌。窃以为，宗白华先生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是对魏晋风度最完美的阐发，还有何满子先生的《中古文人风采》也相当不错。在我看来，魏晋风流与诗化哲学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通，故也喜欢以叔本华为代表的一脉哲学传统。

不唯书　不唯师　只唯实

其实，任何想了解社会、认识世界、把握时代的人，都不可能不同

历史打交道。马克思说得更绝：只有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学。想想看，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不都是在历史的平台上展开的吗？除非你不想真正了解社会、认识世界、把握时代，否则一旦稍稍介入，怎么可能不同历史打交道？这其实是个常识，可惜就是这样一个常识，许多人死活都不明白。在他们看来，仿佛历史只是古董，史学只是发思古之幽情。

我们的一些研究不能“实事求是”，而是“实事求洋”，这就意味着研究中国问题、谈论中国话题，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必须首先跋山涉水、远涉重洋、不远万里绕道伦敦、纽约，看看洋大人怎么说，然后才能鹦鹉学舌复述一番。上海翻译协会副会长黄源深以外国文学批评为例说道：

> 我们似乎都忙于告诉国人外国人是怎么说的，而忘了自己该怎么说；忙于“宣讲”外国文学批评理论，不经意成为这些理论的代言人……我们常常仰视外国文学批评理论，因而陷入一种盲目崇拜。从来不问一问，这些理论存在什么缺陷或局限性，却一味将其奉为经典。(《文汇读书周报》2009 年 9 月 25 日)

诸如此类、见怪不怪的现象，遍及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昨天与两位研究生谈话，还说到这种全民族、全社会的自卑心理或心态。凭着这种心理与心态，还侈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春日捧得好书归

前天下了一场小雨，昨日刮了一天恶风，今朝放晴，碧空如洗，人的心情也一下明朗了。昨天游泳回来，路上一丛丛、一束束的花树，已是争奇斗艳，好不热闹，河边蜿蜒的一排排柳树也开始绿色葱茏，婀娜飘逸。

昨天在万圣书园买了一堆好书，喜不自禁。其中，阿尔谢尼耶夫的《在乌苏里的莽林里》盼了许久，就像黑泽明以此为蓝本拍摄轰动影坛的《德尔苏·乌扎拉》时说的，“实现了我三十年来的夙愿”。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编的《北大文学讲堂》也有意思，它是中文系招牌课《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研究》的录音整理版，荟萃名家、名作、名讲，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怎一个“爽”字了得。比如，出身山东大学的韩毓海讲张爱玲，从中国到世界，从哲学到文学，从社会到思潮，纵横捭阖，鞭辟入里，确实是高人高见。

唐诗与宋词

唐诗与宋词，犹如男人与女人。一者阳刚，一者柔美，一者奔放，一者含蓄，一者豪情如火，一者柔情似水。从这个背景看，即使所谓“豪放派”，在唐人看来其实也近似“小男人”了——当然有例外。无怪乎，宋人很会享受生活，品味艺术，讲究情调，而这些都更具有女性气质。看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就略知一二了，《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笔记小说更是极尽铺排其细腻繁华、精雕细刻。由此可知自己为何偏爱唐诗，甚至博士论文都选唐代。因为，我等蛮荒之人天生粗粝，受不了曲里拐弯的东西，觉得男人胸怀就该直来直去，气吞万里如虎，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什么的，就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上马杀敌，回家尽孝什么的。

读《沈从文传》

与北方莽汉相比，两湖、两广及云贵川等地人民自然偏低一点。此次去的苗寨，就属地图上标有的一个乡镇——矮寨。当时曾想，这个地名会不会与个头儿有关呢。当年做博士论文时，看过《太平广记》等笔记小说记载的一个故事。说到湖湘某地有一部落，人们个子很矮，大概属于“侏儒”类型。于是，地方官便把他们当作“奇货”，年年进贡朝廷，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天，得空就看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沈从文传》)，其中一开始就谈湘西的历史、文化、地理、风物等(作者也是湘西人)，铺叙历代中原王朝对“南蛮”、“西南夷”、“五溪夷”等边地民众的歧视、迫害、屠戮等，看得悲愤满怀、心痛不已。怨不得，“边疆人民”、“少数民族”都对毛泽东如此怀念，因为他老人家确实把人民放在心里，真正一视同仁地对待大小民族，热爱他们，尊重他们。不管他有什么样的错误或失误，但普通民众的内心对这一切却明镜般的透亮。看了凌宇的书，才发现周涛散文《不去》里的那个索溪峪原来就在湘西。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个被周涛写得如此神奇的地方原来就在这里呀。凌宇还写道：“大庸的青岩山，桑植的天子山，慈利的索溪峪，永顺的猛洞河、不二门，吉首的大、小龙洞，龙山的地下溶洞群……处处可见造化的鬼斧神工，使人心醉神迷、流连忘返。”

周涛散文

今人喜欢没品位无厘头,什么“大话西游”之类的。看看诗人周涛的散文,就知道什么是有品位的幽默和智慧。第一次结识周涛,就是他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散文《不去》——写得真是绝了。为什么“不去”,妙处尽在这里。周涛文字很漂亮,也很精粹,既才思纵横、才华横溢,又生动幽默、妙趣横生。论家常将他与余秋雨相提并论,其实是皮相之论。因为,他们的文字看上去虽然都“美”或者说漂亮,但骨子里却不可同日而语。周涛好比沈从文,出身军人,又是诗人,西域的大漠风尘,天山的冰清玉洁,成就了他的一片天籁世界。而余秋雨只是一介“江南才子”,不乏华丽之气和雕琢之功,独缺自然之韵和本色之象。

读书如交友

我的好书标准,没有什么“深文周纳”的道理,只看是否能让人一口气读完,读得完就是好书,读不下去就觉得 boring,哪怕是经典、哪怕是名著。其实,读书如交友,关键在投缘,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投缘的朋友可能是引车卖浆者流,而话不投机者中可能不乏“仁人志士”、“正人君子”。反正,好人未必都能成为好朋友,同样,大家眼里的好书也未必能成为自己的好书。

昨天在北大参加博士答辩。走着去十分钟就到了,一看时间还早,便到未名湖畔“徜徉”一番。接着拾阶而上,来到斯诺墓前,晨风微拂,鸟雀鸣啭,曦光透过树丛,斑驳满地,一片宁静圣洁。想当年,这位 AMERICAN FRIENGE OF CHINESE PEOPLE(墓碑语),就在这个园子里教学、思考、著述,关注中国,研究世界,最后成就了不朽的《西行漫记》。

万圣归来

此次去万圣书园,又是满载而归。总计购得 9 种 22 部佳作。虽然书店离家不远,但提回来还是没少费劲儿。其中,收获最大的是买到向往已久的《读史方舆纪要》,这是清代学者顾祖禹倾其一生心血撰写的历史地理学巨著,前人盛赞为“数千百年绝无而仅有之书”,梁启超也称

之为“旷古一绝作”,当年范长江就是带着这部书开始其西部之旅的。

此外,还有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 年的中国历史》。史景迁为耶鲁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J. D. Spence,因为追慕司马迁而取这个中文名字。他的历史著述向以“好看”著称,所以雅俗共赏,流传广泛。再如,富恩特斯的《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富恩特斯为拉美“爆炸文学”的代表人物,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齐名。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曾以英文缩简本《疯癫与文明》行世,这次则是从法文直接翻译的全本。

“大部头”与“硬骨头”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大部头,一个暑期能啃下来也不简单。这既是一部世界名著,又是一部经典译著。它以贝多芬如火如荼的一生为主线和原型,展示了一种绚丽多彩的精神和命运之旅。读的时候,参考《傅雷家书》和《傅译传记五种》。另外,还可结合欣赏贝多芬的作品。

《资治通鉴》确实属于一块硬骨头,不是随便能啃的。你们未学古代汉语,实在是莫大的缺憾。想起大家毕业时提的意见和建议,可惜唯独没有提及这点,不免遗憾之外又添遗憾,因为这至少说明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缺憾将可能给你们一生带来无法估量的潜在损失。当然,现在绝大多数人不会这么想,他们可能最多关心外语是否学好,至于古代汉语和古代典籍学不学似乎都无足轻重。1926 年,王力先生投考清华国学院,经历了“一次特别的入学考试”,全部试题是回答“四个一百”:一百个古人名以及所处朝代;一百个古地名,并答出今天的位置;一百部书名及其作者;一百句诗词及其出处。对比一下,就知道差距所在了。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万籁无声的冬日,清晨静如飘扬的雪花。开轩面场圃,高行健翻译法国诗人普列维尔的小诗《公园里》不禁飘然而来:

一千年
一万年

也难以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那朦胧怅恍的意境，那一咏三叹的意绪，犹如李商隐如梦如幻的“无题”。特别是后一句，“巴黎是地上一座城/地球是天上一颗星”，一下拉开那么广袤的时空，将生与死、瞬间与永恒等精深微妙传达得淋漓尽致。记得大学毕业前夕，在七八个同学的集体宿舍里，无意间读到这首诗，当时就像触电般一激灵。宿舍同学一起热议《公园里》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大雪封门读好书

深爱北国的寥廓壮美，想起大漠风尘、冰山雪岭、草原牧场，想起西域清朗的天空、清冽的河流、清爽的空气，还有那些唱不完、道不尽的心灵之声，那些忧伤、悲凉与惆怅的民曲小调，总不免心痛神伤，同时又胸襟宽广。

还有一周就该放假了，每到假期，都是看闲书、听音乐的好时候，昨天又在万圣书园买了一批书，包括：

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汪民安：《现代性》，“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这套小丛书不错。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早想拜读的名著。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可以看到许多有趣、生动、具体的细节。

[美]卡尔·贝克尔:《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名家名作名译。

[美]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德]妮科勒·施莱等:《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三联书店,2006。

……

当时只是随意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认为是优秀的著述,现在排列起来才发现,挑的基本都是史学方面的东西,即使贝克尔的"天城"也同历史有关,贝克尔本属"新史学"的代表,曾任美国史学会会长。另外,还有一本闲书,即科技史名家、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的著述《云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东方出版中心,2006)。此类著述虽属"私人叙事",然而从这些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里,有时更能窥见历史的本相和感悟历史的真谛。清华校歌词作者80年前阐述歌词意义时写道:"地有东西之分,文有竖横之别,然而好美恶丑、好善恶恶,人之心理,大略相同。"如今哓哓而论的所谓古今之分(如古人保守而今人开放)、中外之别(如中国专制而西方民主),恐怕大抵都是一些无谓的"伪问题"吧。

读书随缘

在我看来,读书一事也得随缘随性,不可强求。读书如交友,一样得对脾气。同样的书,在不同的心境和情景下,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年轻时读得兴高采烈的书,现在可能兴味索然;而当时不感兴趣的书,现在又读得酣畅淋漓。遇到喜欢的书不容易,正如不可能常常遇到情投意合的朋友。所以,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乡土中国》也是我喜欢的,不仅喜欢那种融会贯通和平易通达,而且喜欢那种"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最近正看哈佛教授 Ross Terrill 的《毛泽东传》(人大版),挺有意思。

读《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最近刚刚读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

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张旭东是198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才子,后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近年常常回国访学,本书是他为北大博士、硕士讲课的记录整理稿。书中讨论的话题或感同身受的命题,也是自己这些年追问与追寻的,即所谓"文化政治"问题或安身立命的根基问题。不管事情多么艰难、道路多么曲折,相信以数千年文明的博大浑厚、以十数亿民众的移山伟力,中国终如浴火的凤凰决然重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用一句历史决定论的话说,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山南水北"话"色·戒"

又去北京语言大学的游泳馆畅游一番,然后在"穆斯林餐厅"吃碗家乡饭,再去万圣书园逛一逛,买了一批书,于是又得浮生半日闲。买的十几本书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三联书店的《金翼》和《走向田野与社会》,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莱辛的《金色笔记》和韩少功的散文《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以及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金翼》是人类学名家林耀华的代表作,素享盛誉。《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教授的文集,对社会史研究颇有启发。行龙也是自己的博士同学,当年就住隔壁,士别十年,大有成就。《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是经济史名著,用清华教授、中国经济史权威李伯重的话说,"这是经济史领域的一本大师级杰作",中文版曾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莱辛的《金色笔记》,被诺贝尔委员会称为"二十世纪审视男女关系的巅峰之作"。

先读《山南水北》,因为对韩少功作品一向看重,《马桥词典》、《暗示》尤其对味。果然不负所望,出手不凡,同样的深刻,同样的平凡,同样的引人入胜。这是作者"归隐乡野后创作的首部跨文体长卷散文","记录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深入体察",富有生命气息和泥土滋味,故事生动有趣,文字清新宜人,既像一位老农如数家珍谈论自家日常生活,花草虫鱼,鸡鸭猫狗,又如一位哲人高士娓娓阐发世间大道,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令人想到美国诗哲梭罗的《瓦尔登湖》。随便抄录几段吧:

> 每天早上我都是醒在鸟声中。我躺在床上静听,大约可辨出七八种鸟。有一种鸟叫像冷笑。有一种鸟叫像凄嚎。还有一种鸟

叫像小女子斗嘴，叽叽喳喳，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似乎它们都把自己当作公主，把对手当作臭丫环。（《晴晨听鸟》）

“衣冠禽兽”一类的恶语，在这只公鸡面前变得十分可疑。把自利行为当作人性全部的流行哲学，在这只公鸡面前也不堪一击。……这样想下去，禽兽如果有语言的话，说不定经常会以人喻恶。诸如“兽面人心”，“狗模人样”，“人性大发”，“坏得跟人一样”……它们在暗地里完全可能这样窃窃私语。（《养鸡》）

觉得这种树稍稍有点蠢，有点弱智。比如初秋之际，寒暖不定，它们似乎是被气候信号搞糊涂了，不知眼下是什么季节，便又落叶又发芽的，如同连哭带笑，又加棉袄又摇扇，有点丢人现眼。（《蠢树》）

草木的心性其实各个不一：牵牛花对光亮最敏感，每天早上速开速谢，只在朝霞过墙的那一刻爆出宝石蓝的礼花，相当于植物的鸡鸣，或者是色彩的早操。桂花最守团队纪律，金黄或银白的花粒，说有，就全树都有，说无，就全树都无，变化只在瞬间，似有共同行动的准确时机和及时联系的局域网络，谁都不得擅自进退。

比较而言，只有月季花最娇生惯养。它们享受了最肥沃的土壤，最敞亮的受阳区域，最频繁殷勤的喷药杀虫，还是爱长不长，倦容满面，玩世不恭，好吃懒做。硬要长的话，突然蹿出一根长枝，挂上一两朵孤零零的花，就把你给打发了。（《再说草木》）

什么是生命呢？什么是人呢？人不能吃钢铁和水泥，更不能吃钞票，而只能通过植物和动物构成的食品，只能通过土地上的种植和养殖，与大自然进行能量的交流和置换。这就是最基本的生存，就是农业的意义，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以土地为母的原因。英文中 culture 指文化与文明，也指种植和养殖，显示出农业在往日的至尊身份和核心地位。那时候的人其实比我们洞明。（《CULTURE》）

总之，不愧是一部“挑战思想意识主潮的另类心灵报告”。所谓“主潮”，无非是以主流经济学家等为代表的“新潮学者”，以“南方”等为代表的“新潮媒体”，以及以一批“大佬”为代表的“新潮精英”。面对这种所谓“主潮”或“新潮”，有时禁不住想我们还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不仅数千年文明被一笔勾销，而且

成千上万的人民英雄也白白牺牲了，包括被“新潮”文人恣意玷污的郑苹如——《色·戒》女主人公原型。这一期《读书》发表了一篇佳作《只谈风月，不谈风云？》，对此做了剖析：

> 从思想层面来讲，《色·戒》巧妙地呼应了当前中国由来已久的主流话语——用个体生命消解宏大叙事，并视之为人的解放（如八十年代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这股思想潮流，本质上就是“不讲政治”，不讲性政治也不讲时代政治，消解历史意识，高扬人性旗帜，认为人性具有先天的超越性，而政治必定局限于一时一地，而且是暴力的、反人性的。也就是说，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才是《色·戒》影迷们的心理支点。你拿民族大义的板砖去拍这个？不是拍在棉花上，就是拍在皮球上。而且，这种“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取向，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恐怕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真正主流的政治。《色·戒》不过是个小小的例证。这股潮流的形成，或许在某些具体情景和具体作品中包含着应对舆论监管的现实策略，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特别是二十世纪革命史），以及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化的消费社会有关。它是一种自觉的，甚至集体无意识的时代潮流。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主打的正是“人性”这张牌，它的具体表现方式往往是“情感”，并附加审美包装。典型作品如《泰坦尼克号》，那是超越贫富、超越阶级乃至超越生死、超越时间的“爱”——呵呵，唯一没有超越的是性别，那会影响它的普适性。
>
> 其实，没有人能做到纯粹的“不讲政治”，无非是有选择地讲，讲什么，怎么讲，判然有别。所谓“人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批判。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往往指向二十世纪乃至近代以来的革命史，通过批判革命的暴力，表达个体的悲剧，来否认革命这个所谓“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并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

“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真是一针见血！略感遗憾的是，当今之世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这种“主潮”——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们最多不过是像哲人陈嘉映对待这个时代的态度：“它就像一列越来越快停不下来的火车，而面前正是悬崖，我们的全部努力，也就是要使它能慢一点点算一点点。”

自由与宽容

自由主义是个很大问题，尤其同中国的问题联系起来更非三言两语所能厘清。比如，自由主义倡导“宽容”，可又是有史以来最不宽容的一套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其宽容只是在自由主义谱系之下的宽容，就像一位海外新闻学者所言：自由主义让人“自由”言说，而结果说的都是“自由”的话语，这才是可怕的地方。实际上，这种所谓“自由”，是另一种专制——自由的专制。更可怕的是，中国的一些所谓自由主义者往往比他们所攻击的制度、思想及传统更专制、更武断、更不宽容，即使西方的好经到他们嘴里也念歪了。这恐怕是他们在大多数人民（人民在他们眼里只是等待“启蒙”的群氓）中没有多少市场的原因吧。

语言与家园

说到苏联解体，想起当年一幕：戈氏可怜巴巴地向老布什乞援，说我已经按照你们的旨意做了一切该做的事情，包括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等，甚至解散了共产党，现在你们该兑现当初的承诺吧，结果理所当然地遭到老布什及其盟友们的拒绝和鄙视。作为政治家和大国领袖，戈氏实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谁让你这么幼稚或弱智呢？地球人都明白，政治斗争、国际斗争岂能如此天真！即使貌似好得合穿一条裤子都显肥的美、英两国，私底下还不知怎么互相掐呢。精明算计的英国人不是早就说过，国家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什么永远的朋友或敌人。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说的都是一回事，即人之为人、人之在世归根结底有赖语言符号所支撑的“文明世界”。人的一切辛苦劬劳，最终的意义都得落实在这种广义的语言符号中，如文字、图像、音乐、舞蹈、神话、传说、哲学、史学、文学等。这种本体论的语言观，同工具论的语言观（产品说明、定量研究、美国大片等）不可同日而语。面对这些语言符号，人就像在触摸祖先的灵魂，呼吸生命的气息，感领文明的魅力。为此，我也从来不把著述仅仅视为名山事业，仅仅当作知识、真理、学术等，而更视为安身立命的家园。在这一点上，唐诗宋词、莎士比亚、海德格尔、《怀念战友》、乔姆斯基等，可

以说都在同一境界。最近，重读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同《光荣与梦想》一样不仅有趣，而且更有思想的佳作，创造历史与书写历史能够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怎不令人追慕与称羡！

现代性问题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症结，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方向的迷失，即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文明等虽然是以线性的、进化的历史为根基，但又是没有方向或失去方向的历史运动，未来永远只是一个朦胧的目标，在奔向美好未来的过程中，方向被不经意地无限推延与搁置。于是，人生只剩下过程而失去意义，过程就是一切，所以尽情“享受生活”。有个流传甚广的笑话，对现代性的利弊得失做了简要而深刻的概括：机长告诉乘客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飞机正以超音速前进，坏消息是我们迷失了方向，不知道最后飞往何方。

有关现代性的问题，应该再参考一些基本文献，如詹明信的著述（至少他的北大演讲）、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雷蒙德的《关键词》等。刚在万圣书园买到刘康的新作《文化·传媒·全球化》，其中一些内容可以参考，如《中国现代性的不同选择的再反思》一文就很有启发。刘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著名学者，现在是詹明信所在杜克大学的教授。

《刘亚洲战略文集》

刘亚洲的战略思想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分析每每令人茅塞顿开，惊心动魄。他的语言也干净利索，一针见血，颇有毛泽东之风，如“中国与美国的较量迟早会到来。先下手为强”、“我们应当学习毛泽东，要有大战略观、大历史观、大历史感”、“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中国”等。不过，到底是文人出身，虽然思想犀利，不乏真知灼见，可惜激情有余，理论功底不足，知识体系残缺不全，不仅同毛泽东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按中规中矩的学理标准也不免漏洞百出。看来，毛泽东当年对中高级干部的提示何等英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朱东润自传》

文史大家朱东润是复旦名教授，建国后长期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他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曾经影响和惠及几代学人。他的自传可与何兆武先生的口述自传对照起来读，有意思的是朱先生留洋英国，却成为国学泰斗，而何先生出身本土，却成为西学名家。读《朱东润自传》除了解 20 世纪的风风雨雨，更让人感慨文坛学界的乌龙八卦，进一步体会无论什么学科、什么学问、什么立场，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人，还是人的正气和大气，而《朱东润自传》也体现了这种正气和大气。比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发妻“文革”死于非命，朱先生痛心不已，从此再无眼泪，但他将个人悲剧置于国家民族的兴亡之中，没有流露丝毫怨怼之气，结束于 1976 年 12 月的这部自传，最后一段反而写道：“中国的前途是远大的，人类的生命是永恒的，我已经活了八十年，但是还要活下去，还要努力，我的愿望是无休无止地为祖国、为自己选择的工作而努力。”

书里有段写到徐志摩，令人捧腹：

> “听听清泉，听听它滴的是什么调子。”这里玩的是“听它滴调”四个双声字，新在哪里？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是远远落在白居易的诗具六义的主张之后。徐志摩到欧洲去镀过金后，回来生搬硬套，把西洋诗的形式套到中国诗的脑袋上，什么十四行诗，什么“商籁体”，真是泰兴人（朱先生是江苏泰兴人）的俗话“异样骡子学马叫”。十四行还有数可稽。为什么一定要十四行，多一行少一行不行吗？这些规矩有什么意义？“商籁体”更别致，不知道是中文、是外文。作为中文，谁也不懂什么商籁。算是外文，那么“上来”、“伤癞”都一样，为什么要“商籁”呢？一句话，这是文人的病态。徐志摩中等个儿，雪白的脸庞，走起路来，先把左脚沿地面平拖半步，再把右脚拖过来，并齐了，然后再向前拖。这样的走法平时很难看到，可能是一种革新。

新中国读本

探讨新中国的新闻传播，不妨先从以下读本入手，然后逐步展开。

通　史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和逄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1949—1976)可以作为入门读物。杨奎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和金冲及独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也值得参考,特别是后者的新中国部分。新时期的历史尚无权威著述,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梳理了八九十年代的脉络,简明扼要,可供一阅。

回　忆

此类文字多如牛毛,而且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作为入门读物,可看陈一然编著的《亲历共和国六十年: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与决策》,都是重要人物对重要事件的亲历与亲述。新中国六十年之际,三联书店编辑了《60个瞬间:1949—2009》,包罗广泛,举一反三,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细节。至于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更是经常征引的一手文献。

思　想

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课堂记录》(三联书店)很好,内容广博,深入浅出,不仅涉及丰富的学术思想资源,有助于对许多问题的思考,而且对思想史及其研究的论述颇有启发。另外,黄旦教授的博士论文、芮必峰教授的博士论文以及海内外相关著述也可参考。

社　会

这方面的著述举不胜举,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作为入门读物,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袁晞的《社论串起来的历史》、哈佛博士阎云翔的学位论文《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亲密关系和家庭变迁(1949—1999)》等,均以严谨扎实的研究和生动活泛的笔调而引人注目。

方　法

这方面值得参考的,有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黄宗智的《经验与理论》、杨奎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应星的《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等。

汉　学

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莫里斯·迈斯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的同名著述等，都是经常提及的名作。另外，刘东主编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已经出版百十种，蔚为大观，其中许多相关著述及章节也可参考。

闲　书

文艺作品就是一例，如赵树理的《三里湾》、老舍的《龙须沟》、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都属于经典之作。

“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

1980年代以甘阳为首的青年学者，策划出版了影响广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其中包括经典系列的“学术文库”和普及系列的“新知文库”，前者如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著述，后者如马丁·布伯的《我与你》等。甘阳是丛书编委会的主编，刘小枫是副主编，而陈平原、李银河、周国平等均为编委。八九之后，中国社会及思想学术界均发生巨变，当年的“哥们儿”不仅分道扬镳，而且严重对立，就像五四后的情形，其间症结还在于近代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如《通三统》、《民主四讲》、《中国香港》等著述，恐怕同“西化派”已经格格不入。看看强世功对比大英帝国的政治智慧而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这些问题：

> 相比之下，我们早期的资产阶级要么忙于废帝制，根本没有意识到由此导致的政治正当性的流失，以及进一步引发的内战(指辛亥后的军阀混战)；要么忙于镇压工人运动，甘心依附于西方资产阶级，陷中国于半殖民地状态之中。而今天的新兴阶层依然“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心怀恐惧，忙于对外与国际接轨，对内剥削压榨同胞大众，而不知道如何把民众引导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原因一方面如同当年毛泽东批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天生的软弱性和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无力承担起民族独立解放的政治领导权；另一方面正如韦伯批评当年德国新兴资产阶

级沦为了庸俗的市侩主义，政治上鼠目寸光，缺乏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不明白政治是围绕民族生存展开的永恒斗争，更不明白政治支配权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化领导权。（《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大家陈旭麓

陈旭麓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十五讲》涉及一系列有趣的题目，既有不少宏大叙事，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也有一些私人叙事，如“道光皇帝是怎样一个皇帝”、“孙中山与鲁迅”、“小凤仙其人”等。他在谈治学经验时，论及问题与问题意识从何而来的两点体会。第一，博览史籍，广泛涉猎，日积月累“就会有问题从书中跳出来，不容你不去思辨，不去搜集资料进行论证，终止一吐为快”。第二是各种感同身受的现实触动，“驱使我去追溯历史，寻求前因”。这两点，正是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会通：积累史料、广泛搜求属传统史学；而陈旭麓的“由今及史，探源追流”则是新史学的追求。由此延伸，可以说社会方面的学问和研究都无非基于这两点：一是广泛涉猎，二是感同身受。

第十一讲“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从近代中国的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关系上，分析了频频发生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同当下着眼于中国国情的学者一脉相承，如温铁军。温铁军一直主张，清末民初以来的社会巨变，归根结底均源于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之矛盾。陈旭麓以史家的谨严，提供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实情。如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六千万，大致相当于今天北京、上海、广州三城的人口总和。康熙时突破一亿，乾隆末年骤增三亿。再如清朝开国时，人均十亩地，而道光时就只剩两亩，等等。今天，人口更接近十四亿，土地、水源、森林、草原等资源又逐渐萎缩，人地矛盾更趋严峻。所以，许多基于中国实际而非西方理念的学者都认为，这个基本矛盾和基本国情制约着中国的一切，包括生产方式、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文化精神等。那天报告会上，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吴予敏院长也谈及这个话题，并且讲了一个在江西的考察见闻。某地有山上与山下两族，各有自己的家族来源及其生活方式，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恩恩怨怨，既与时代风云相契合，又与族内争斗（资源、财富、地位

等）相交织。表面看，许多事情固然涉及国共之争、姓社姓资、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等，而追根究源又无不关乎两个部族的“人地之争”、“利益之争”。

京派与海派

陈旭麓二十余年前发表于《解放日报》的《说“海派”》一文，短小精致地阐发了京派与海派。如海派“既清新，又轻佻”，“京派是传统文化的正宗，海派是对传统文化的标新，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等。

南北之别，自古皆然，禅宗有南宗、北宗，昆曲有南昆、北昆等。曹景行之父、民国名记者曹聚仁认为，“京派笃旧，海派骛新”。而鲁迅的《京派和海派》一文别出机杼：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

在陈旭麓看来：洋场的风情大都以商情为转移，出入其间的海派文化反应快，变化多，花样新，不似京派文化的矜持与凝练，大大发挥了商的灵活与多样。

当然，京派海派属于大而化之的说法，其间种种差异千变万化，不好一概而论，南人北相、北人南相的情况其实屡见不鲜。

“华人与狗不准入园”

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写到一个细节，他初到上海时，一日同朋友约着去法国公园游玩，没想到在门口看见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准入园”，遂愤然离去。这些年，消解中国革命，贬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似成“时尚”，一些另类媒体与无良文人更是一犬吠影，众犬吠声，呶呶不已，喋喋不休。日前又炮制一个说法，说当年作为列强侵凌铁证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子虚乌有，从来没有这块牌子云云。方志敏烈士在天有灵，听到如此“高论”当作何想。

程巍及其《六十年代》

名师高徒，名不虚传。作为赵一凡弟子，程巍博士的学位论文《六十年代》不同凡响。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版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与赵汀阳的

《论可能生活》、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评》、李伯重的《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等佳作并列。这篇博士论文的视野与眼光、思想与见地、写作与文字等,用所谓国际水准衡量相信也不逊色。他通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理论,剖析了1960年代欧美学生的"造反"运动,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这场席卷西方世界的闹哄哄、乱糟糟浪潮,既不是"无厘头"的瞎闹,也不是吸食毒品、嬉皮士、性泛滥之类"反文化"运动,而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经过这场革命,一百多年前就已占据政治领导权和经济领导权的资产阶级,才夺得自己的文化领导权。也就是说,这群看似"胡作非为"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实际上是以极低的代价,完成了先辈未竟的"革命大业"。好的著述不仅在于视野的开阔、内容的丰赡、思想的深刻等,而且在于论述过程的完美、精湛和透彻,《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也是如此:

> 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是经济革命(工业革命),目标是夺取经济霸权,第二次革命是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目标是夺取政权,而第三次革命将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革命(反文化运动),目标是夺回文化领导权。
>
> 当一个阶级没有控制文化领导权时,即便它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绝对控制权,也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再现自己。
>
> 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一个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美学趣味和道德旨趣抬高自己的形象,贬低对手的形象,使自己崇高化,使对手妖魔化。但当它进行这一神话工程时,一定会以人类、国家、社会、传统等普适概念掩盖自己的特殊利益,借以僭取通常存在于普适概念中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
> 贵族阶级不光刺中了资产阶级的心,还控制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资源,如大学、研究所、科学院、出版社和刊物,虽然它在社会政治层面日益衰微,可在文化上却拥有绝对的优势。这就像作为被压迫或剥削者的无产阶级拥有绝对的道德优势。实际上,贵族和无产阶级分别控制着资产阶级时代的美学领导权和道德领导权。
>
> (60年代运动)摧毁了早先的贵族阶级和后来的左派设置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各种非资产阶级的文化障碍和道德障碍,大大

拓展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空间，大到足以接纳它的一切新老对手们，致使他们甚至感到一种压力，仿佛惟有显示自己的异端性，才对得起这种宽容，而每当他们显示出异端性时，无非就给资本主义体制增添了一份新荣耀。

通过60年代，西方进入了后现代。亚当·斯密当初所说的“自由放任”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也成了道德市场、文化市场以及私生活市场的唯一原则。

新左派与左派的区别在于：前者实际是新中产阶级的代言人。

资产阶级通过60年代运动夺回文化领导权后，其意识形态的重建工作便在悄悄进行，而且以“价值中立”的社会学面目出现。……一切可能使人联想到剥削和压迫的词汇，都被暗中替换成了中性的社会学术语，而左派意识形态反倒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或有害的乌托邦理论。

当今，有谁会认为做一个“中产阶级”是一件在道德上有愧疚感、在美学上有自卑感的事？60年代运动成功地瓦解了文化等级制和传统道德，也就成功地为资产阶级洗刷了文化和道德上的罪名。

西方中产阶级在西方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并通过全球化将这种领导权扩展到第三世界，以其在第三世界的文化代理人来控制第三世界的价值观。

新右派已成功地把自己那一套政治词汇变成了普通人用以描述突发事态时的基本词汇，以至给左派带来了这么一种压力，即压迫和剥削是无罪的，但谈论它们却是有罪的。

……

本书对理解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颇有启发与参考。比如，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都同文化政治和文化领导权有关，其中涉及胡适的唯心主义、胡风的“反党集团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电影《武训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反右”、“九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这些看似玄虚、甚至折腾的运动，其实同样关乎文化领导权，因为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劳苦大众，不仅需要掌握政治领导权和经济领导权，而且必须夺取文化领导权，不然的话，哪怕“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绝对控制权，也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再现自己”。事实上，京剧改

革及其“样板戏”的初衷之一，恰恰是为了清除一直把持戏剧舞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等，并使“工农兵”成为戏剧舞台的主角，正如他们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一样。

重看“十七年”及其经典

批评家雷达的《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思考》原载《人民日报》，本属“共和国六十年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本次会议引人注目，因为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开始重新评价新中国的文学，特别是曾被妖魔化的“十七年”经典作品，如《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茶馆》、《苦菜花》、《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以及《李自成》等，更被视为一串“豪华名单”，再次得到重视。这些作品虽然不无内在矛盾与局限，但在时间长河中经受了检验。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两个长期思索的问题，其一是政治视角问题，雷达说：“现在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之后，有的作家认为离政治是越远越好，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政治视角有时候是比较大气的。”其二是深入生活问题。他认为，当时强调深入工农兵，了解人民生活，有时尽管教条，但往往确保艺术家的灵感来源。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当属纯粹的艺术即音乐，以“嘎达梅林”、“梁祝”、“黄河”、“红旗颂”、“阿诗玛”等为标志的一批优秀作品，为人民艺术及人民生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美学典范。

怀念那些读书的日子

韩少功的《怀念那些读书的日子》一文，以生动有趣、细致入微的笔触，描摹了一幅“文革年月”的读书图景，少少许胜多多许，四两拨千斤地颠覆了一些宏大叙事，是一篇知人论世的难得佳作。文中写的秦某，最是令人印象深刻：

> 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

> 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茨、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
>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尤其见面第一句话，“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真是活脱脱一个读书人！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德国思想家，一生创立两套思想体系，且都影响广泛。当今之世，如此痴迷读书的人不知还有几何。

延河边的文人们

《延河边的文人们》的作者朱鸿召博士，为沪上学者，2007年以一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声名鹊起，钩沉了大量历史细节，论述新人耳目。《延河边的文人们》是他的一部旧作，重新出版。“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土窑洞的灯火映红了天……”“文人们”一书从写作到再版，恰好也是十三年。作者在后记里写道：

> 我所经历着的这个十三年，也是一个天地翻覆的时代。……最近十几年、二三十年，我们所谓工业化、城市化了的土地，绝大多数属于可以耕作的良田沃壤，是祖先们经过几千年的精耕细作，洒下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流传下来的“息壤”。我们有什么足够的理由，三下五除二将其变成死地呢？
>
> 可惜的是，最近十几年、二三十年间，敢于对现代化进程进行深刻反省的学术和学人都太少了，甚至集体失语、失声。

这里批评的对象，显然包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包括无良文人及其喉舌媒体的一派哓哓之声。在他们眼里，中国历史包括新中国是一团漆黑，人类历史就是所谓从愚昧走向文明，走向西方，最后走向美国。仅举一例，便知此类成见之浅薄。元代有条刑律规定，禁止任何部门擅拆私人信函，并依据信件内容起诉作者。换句话

说，不管信里写了什么内容，都不能依据信件量刑判罪。而当下肆无忌惮的人肉搜索，就连所谓“残暴野蛮”的元人都不屑，何况这种“以恶制恶”最终只能导致“恶上加恶”。网友“啊木星”怀念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无限怅惘地写道：

> 天还是蓝的，水也是绿的，庄稼是长在地里的，猪肉是可以放心吃的，耗子还是怕猫的，法庭是讲理的，结婚是先谈恋爱的，理发店是只管理发的，药是可以治病的，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拍电影是不需要陪导演睡觉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欠钱是要还的，孩子的爸爸是明确的，卖狗肉的是不能挂羊头的，结婚了是不能泡 MM 的，买东西是要付钱的……（《中国青年报》2010 年 8 月 9 日）。

文化杂谈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春风，随着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越来越多先知先觉者开始突破那种“尾随者的心态”，挺起精神的脊梁，探求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如《战略高度》里的各路高人访谈。再如，“马工程”虽有颟顸的官员及其败笔，但绝大多数项目不失为光明正大，气宇轩昂。甚至新中国六十年的献礼影片《风声》，都不妨视为对《色·戒》的间接反击。同年热播的电视剧《潜伏》，更将争自由、求解放的“堂堂正正”之气推向高潮。《风声》是根据麦家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获得茅盾文学奖，手法新颖，艺术高超。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传主向哲濬与影片《东京审判》里的梅汝璈都是老清华的校友，由于他们的杰出才能与爱国热情，东京审判不仅将血债累累的东条英机等送上绞刑架，为数千万死难同胞讨回正义与公道，而且也赢得列强的尊重。当然，列强真正低眉顺眼，将中国人平等对待还在数年之后的抗美援朝胜利之际。无论老清华，还是新清华，都有十分强烈的家国情怀，这所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大学，没有成为洋奴买办的家园，反倒成为最富爱国精神的地方，从毛主席赞许的朱自清、闻一多，到一批“我愿以身许国”的两弹一星元勋，从陈寅恪等国学四大导师，到提出文化自觉的费孝通，无不体现着这种精神品格。这才是鲁迅先生期许的“民族脊梁”。

第四期《读书》有清华旷新年的《九十年代的“上海怀旧”》，思想犀

利，境界高远，既有敏锐的感觉，又有深刻的剖析，使纠结缠绕的现象拨云去雾。文章谈到，1990 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上海怀旧”现象，既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上海摩登》等著述有关：

> 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带动示范下，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动了一场“重写”。这次“重写”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记忆和地图。通过“重写文学史”，张爱玲被供奉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圣坛上，大有取代曾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的文学史地位之势。

更与 1990 年的浦东开发有关。在九十年代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一条通往三十年代的记忆走廊打开了。就像张爱玲及其色戒只让人们记得“人性”而忘却血污，九十年代的上海怀旧也仅仅突出“世界主义”，所谓“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而淡忘或遮蔽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记忆。旷新年写道，出身复旦、以“身体写作”自居的卫慧及其《上海宝贝》，以惊世骇俗的姿态加入“上海怀旧”的潮流，同时也揭示了上海怀旧的本质。小说里的女性都是“世界主义者”，但是，她们的身体却界定了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上海宝贝”一方面是具有强烈优越感的上等中国女性，另一方面却像妓女一样卖身白种男人。文章最后以一串问号结束：

> “上海怀旧”波及大陆、台港和海外华人学者，它为何如此强烈地袭来？“上海怀旧”以“摩登”、“国际化”为中心，上海为何被如此记忆？“上海怀旧”被看做是一座城市寻找自己的历史和性格，然而，“上海怀旧”不应仅在城市文化视域内讨论，“上海怀旧”不是对一座城市的记忆，而是一个民族的现代记忆。“上海怀旧”和九十年代的“告别革命”、“与国际接轨”，和现代化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构成了怎样的关系？“五四记忆”与“上海记忆”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另外，中国现代文化的“创伤记忆”由何而来？“上海摩登”能够提供成功的修复吗？最后，还有一个“谁的记忆”的问题。国外学者、海外华人、台港精英和大陆新贵在为这种记忆授权的同时扮演了什么角色？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

韩毓海教授是北大中文系的才俊。记得当年读博时，他刚在《中国

青年》发表了一篇发聋振聩的《北大，魂兮归来》，对北大种种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评，引起不小的反响。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学者，是个顶天立地的山东汉子，饱读诗书，心系天下，文字也很漂亮，有声有色，激情澎湃。他的《天下：江山走笔》，既有深厚的学养，又有高远的见识，既有纵横的才情，又有刚烈的血性，是这些年读过的佳作之一。

他的新作《五百年来谁著史》，被张旭东誉为“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甲申指 1644 年，当年发生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如清兵入关、崇祯自杀、闯王败北等。时过三百年的 1944 年，郭沫若以一部《甲申三百年祭》闻名一时。这部著名的小册子，总结了李自成的失败教训，成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文件之一。明史及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一直是学界的热点之一，有关研究层出不穷，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欣赏谢国祯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顾诚教授的《南明史》。谢国祯是清华国学院学生，受教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顾诚是北京师范大学名教授(可惜今人貌似尽知于丹)，毕生研究南明史，皓首穷经，英年早逝，以眼泪、笑声和全部的生命完成一部煌煌之作《南明史》。仅看全书起句，就气势不凡：

> 公元 1644 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合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

2008 年暑假期间，蒙学校关心，上庐山疗养，随行带着一套姚雪垠的十卷本长篇小说《李自成》，一气看完，不亦乐乎。

刘小枫：《施特劳斯与中国：古典心性的相逢》

刘小枫《施特劳斯与中国：古典心性的相逢》，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通过施特劳斯的思想，透视古往今来的世道，真是非常之人，非常之文：

> 无论各种“主义”论说背后有何等精致的哲学，她们首先是一种政治实践性的论说，无不显得热烈而有斗争性……
>
> 施特劳斯倡导的政治哲学突出“古典”的规定，首先意味着从根本上质疑现代“盲目而热烈的”“主义”(无论保守、左倾还是自由

主义)——回答为什么我们要引进施特劳斯，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由此得以摆脱百年来对西方现代的种种“主义”、“盲目而热烈的”追逐。

即便有人从故纸堆中出来后从事政治实践，至少也懂得了人不能胜天的古训，不大可能再是个政治实践上的愣头青。与此相反，现代的“主义”大多基于人定胜天的信念，容易让人热切而盲目。

施特劳斯的古典主张如果让一些中国新锐学人不舒服，乃因为我们同样是在罗伯斯庇尔的如下政治理想指引下被培养出来的：“在地上建立智慧、正义和美德的大厦”，这可称之为伟大的“现代性构想”。

如果说现代的古典让我们摆脱了对古典的迷信，那么，如今我们首先需要摆脱对现代的迷信……

我们引介施特劳斯的第二个理由就在于此：对现代之后的西方文教制度的学理基础，我们应该抱持审慎的态度。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教育为我们提供了契机，因为，古典教育要求我们瞩目古代的高伟灵魂，这只能见诸于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讲是非、好坏、对错、善恶，必须基于一套道德原则，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古代文明，早就已经总结出这样的原则，现代的社会科学废除了这些原则，“在地上”另立原则，我们必须寻回古典的原则，才能挽救我们作为学人的道德—政治品质。

我们引介施特劳斯的第三个理由就在于：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让我们懂得，中国之“道”百年来面对的仅仅是西方的现代之“道”，而非西方的古典之“道”，使我们得以摆脱以现代西方之道来衡量中国古典之道的习惯立场，摆脱现代西方文教体系中的种种“盲目而热烈的”政治想像。

……

文中一系列核心思想点中了现代、现代性、现代文明的死穴，也说出了困扰于心而苦于无法透彻说明的问题。比如，现代社会不讲德行，唯利是图，还每每振振有词，布什杀人盈野居然得到一片欢呼，范跑跑、色戒等居然堂而皇之，大行其道，等等。再如，每每当你反思这些问题时，又遭遇反科学、反民主、反现代以及传统、保守、左翼等诘难，其实内

心纠结的是一种“前不见古人”、“怅望千秋一洒泪”等悲天悯人。读了刘小枫的文章，诸如此类的困扰一下子涣然冰释。多么希望天下人师都能有此境界，都能以此发蒙后生，这才是真正的传道、授业、解惑。

赵汀阳与坏世界

最近断断续续读着一本好书，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赵汀阳是我十分欣赏的年轻学人，也是有思想、有水平的当世哲人，他的《论可能生活》也入选“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另类媒体起劲宣传所谓“普世价值”之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检验一种价值是好是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历史实践，而不能是另外一种价值，否则就成为“思想专制与精神独裁”了。这大概算当下有关普世价值的最有见地的评说。治学方面，他的一大特点在于融会贯通，论从己出，从不拾人牙慧，极少引经据典，所论多独得之见，深刻之思，连语言都明白晓畅，好似大白话。比如，《坏世界研究》开宗明义就讲道：

> 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好世界。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
>
> 只要具备人人自私和资源稀缺这样两个条件，世界就是个坏世界。很不幸，人类世界所具备的缺点远不止这两点。
>
> 我原来研究形而上学，考察了许多呆主意，后来研究伦理学，考察了许多傻主意，再后来研究政治哲学，又考察了许多坏主意。

书中论及古今中外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实践，高屋建瓴，纵横捭阖，而且每每新人耳目，这些大抵得在其论述脉络里方能理解，无法简单的、断章取义地说明，下面只是管窥蠡测地引述一二：

> 文化政治不能被理解为政治的一个方面，而必须被理解为政治的一个基础。政治至少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利益，另一个是文化。
>
> 一个社会把什么事情看做是最值得追求的和最受尊敬的，它将决定一个社会的总体价值取向，所以这是根本的政治问题。
>
> 与西方的政治思路完全不同，中国政治不是从国家问题开始的，而是从世界问题开始的。
>
> 如果西方国内民主不能推广成为世界民主，如果西方国内自

由迁徙不能推广成为世界自由迁徙，如果西方的人均占有资源不能推广成为世界的人均占有资源，如此等等，就证明了西方制度不是一个能够普遍推广的制度，不是一个对世界负责的制度，它只利于一国之私，而有损世界共同利益，所以就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制度。西方政治从来没有形成一个以世界利益为重的政治世界观，而只有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观念，这是一个明显的政治思想缺陷。

……

张正隆与《枪杆子：1949》

如果说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王树增的《长征》堪称书写革命低潮之际义薄云天的佳作，那么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则可谓抒发革命胜利之时气冲霄汉的华彩。作者以挥洒自如的健爽笔墨，细描了“四野”从东北到西南的征战，铁流滚滚，英风飒飒，横扫千军，气吞万里，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壮美画卷。浸淫如此氛围，就像聆听乐圣的“第三”、“第七”、“第九”交响曲，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与张正隆同为“四野”后人或传人的阎明，以一部《往事不忍成历史》表达了相似而别样的情怀。如果说这等豪迈心声属于气息宽广的“黄钟大吕”，那么国民党传人的类似作品则如李敖所嘲讽的、气息奄奄的“残山剩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没办法，这是历史造就的气象与格局，所谓殆天数，非人力也。只消读一读王树增《解放战争》的结尾，就不难体味历史的长河落日，惊涛拍岸，大江大海，汹涌澎湃：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海南岛解放。

解放战争中最后一场大规模进攻战结束了。

五十五天后，朝鲜战争爆发，攻击台湾岛的作战计划被迫搁浅。

新中国的和平的生活开始了。

仅仅一个月后，位于南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即四野的一纵、二纵、三纵——解放军主力中的主力）奉命向北进发，一直开进到国土北面那条纵贯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除了少数高级将领之外，官兵们还不知道他们将要继续

作战。

他们乘上火车，从这个国家的南方向北方行进。

南国的椰林在热风中摇曳，珠江丰沛的水系环绕着闪闪发亮的稻田。南岭的湿云绸缎一样飘浮，滴水敲打着芭蕉浸染出满坡青翠。湘江水天一色，长江白浪千叠，两岸是望不见的一熟天下足的吴楚沃野。晨风迎面吹来，土地的芳香渐渐浓郁，成熟的麦子颗粒低垂，那条黄色的大河自天际而泻，大河边溽热的柳林里蝉鸣不已，太行山蜿蜒而至。著名的城墙垛口之外，黑土地上山高林密，河滩上的庄稼泛着深深的油绿，在挺立着的高粱的梢头上，天蓝得犹如南方的那片海水——这片国土养育的近千万儿女，从投身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那天起，就怀揣着光荣回家的憧憬，他们想擦干爹娘眼角边的泪水，把自己的立功证贴在堂屋的墙上，然后去自家分得的那块田地里春种秋收，但愿风调雨顺收得好庄稼，但愿房上的草顶换新瓦，但愿娶上媳妇生了娃，但愿好日子红红火火年年岁岁地传下去……

山河锦绣，儿女情长。

英雄壮怀，天地沧桑。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谈　人　生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本学期课程较多，为应对各种课程，特别是博士生的理论课程，不得不多读一些“名著”、“正典”等，既是重温，又是学习。眼下为准备下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话题，正在重读 Mosco 的大作，同时涉猎 Schiller、Chomsky 等人的东西。

此外，也读了一些闲书，尤为推崇一部名为《长征》的纪实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军旅作家王树增，本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文章即选自这部作品。以我之见，《长征》是继斯诺、索尔兹伯里之后的又一力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内容更加丰满，气魄更加宏大，细节更加生动，文笔更加漂亮。

关于长征，在与研究生的一次例会中，也想谈谈这方面的话题，包括音乐作品《长征组歌》。日前上课，随便问起这部音乐经典，不料几十位本科生居然既没有聆听，也没有听说。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也在电视上看了，最后的《国际歌》如老杜诗歌，沉郁顿挫，悲凉慷慨，《暗算》最后也是结束在这里。可惜，时代已经不属于气韵沉雄的唐诗，而让位于风花雪月的宋词——“杨柳岸，晓风残月”。看看时下偶像崇拜就略知一二。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今，不仅死得轻于鸿毛，活得同样轻于鸿毛，芸芸众生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无不趋之若鹜，而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则避之犹恐不及，还美其名曰“躲避崇高”。于是，人生与生命都变得轻飘飘的，犹如一张钱币。帕斯卡尔名言“生命是一根脆弱的芦苇”，看来可以改为生命是一张轻飘飘的钱币了。

人生况味 丰富多彩

当代人貌似很忙，而且越来越忙。只是忙来忙去，不知在忙什么，为什么忙，仿佛只是为填补“空虚”的生命空间。不是有句修正主义的名言嘛——“终极目标不存在（如共产主义），过程就是一切”。于是，现代人的信条就成为 enjoy life。然而，没有目标，没有意义，这等人生还值得一过吗——希腊哲人如是说。所谓现代文明，是否可谓没有目标与意义的文明呢。如今，全世界不都在讲发展嘛，发展成为最硬的道理，而发展只是过程而不是目标，更不是意义。日前同学生闲谈，还说到最受不了的一点，就是港台明星嗲里嗲气侈谈什么“只要开心就好啦”。酒囊饭袋，有什么可开心的。何况人生的意义及美感，远不止于所谓开心，诸如悲伤、忧愁、伤感、寂寞、孤独、惆怅、哀怨、凄凉、幽怨等，都远比所谓开心更意味深长。至少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以及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极少是为开心而作的。至于四渡赤水、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败美帝野心狼等，也远不是所谓开心就能包容的，而其中的人生意味又是多么饱满，多么丰盈啊！

许纪霖在一篇谈“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文章里写道：

> 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经济理性人”，不相信任何价值，也不认为有绝对的善恶，只有一个东西是可靠的，那就是拜金主义。拜金主义在理论上披着功利主义的外衣，高级的形式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低级形式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二者虽然在境界上有高下之分，但在精神意义上都是虚无主义的，都祛除了精神的价值而将一切还原为物化的价值。

深入社会 深入民间 深入历史

关于来信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只能简单谈点原则性看法，不求解答你的困惑，只求为你提供一点思路。

首先，我欣赏你的这种书生意气，还有热血男儿的正义感。这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一个日渐市侩化的时代越来越显得难能可贵。我希望你能一直保持下去，因为许多人年轻时一腔热血，而经历一

些磕磕绊绊之后便“看透”一切，随波逐流了。

其次，所有类似你这样的热血青年，看待社会与人生都有一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纯粹愿望。然而，事实上这种愿望在古今中外的任何社会中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免不了各种各样不如人意的事情，想要达到纯粹的境界只能寄托于乌托邦。有为的人们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使社会和生活变得相对纯粹一些而已。

再次，对信中谈及的具体问题，也需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中考量，才能有一些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否则，如果仅仅就事论事的话，那么这种事情是无穷无尽的，就像毛泽东说的，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仅仅给路边的乞丐一点施舍，而是得想办法为所有乞丐提供衣食无忧的途径。所以，历史上一切有为的热血青年，最后都必然会关注社会的根本问题。

最后，还想提醒一下，如果真正关注国计民生，如果确实想为天下苍生尽点心力，那么就需要研究一些“朴学”、“实学”，探讨一些《黄河边的中国》等话题。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深入社会、深入民间、深入历史，不断调查研究，了解国情、民情，这样才可能对社会根本问题有深切洞明的认识和感同身受的体悟，从而能够切实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上面说的这些“大道理”，可能现在未必透彻领会，事实上也不可能指望一下都明白，因为这得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万里路，指的也是这样一种社会阅历与人生经历，没有万里路的铺垫，万卷书的道理是无法参透的。

小女生 大气度

一大早看到来信和“家乡”帖子，感到亦喜亦悲。夜里听着淅淅沥沥的春雨，朦朦胧胧还飘出“春雨贵如油”、“无田似我犹欣喜，何况田间望岁心”等意绪。

以往，你已屡屡让我见识了你的灵秀与才华，而你的“自传”又让我意想不到地领略了你的古雅与淹博。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女生，怎么会有如此气象呢！且不说一个大学生，就是忝为“教授”者现在又有几人能写出这样纯正而漂亮的文言呢？

这是“喜”的一面，而“悲”的一面，则在于你对故国家园的深长眷恋，对民间疾苦的揪心牵挂。在我看来，这才是铸就大气与大业的根本

所在。否则，仅有才华才情什么的，充其量也就是齐梁文人一路，以及“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小荷才露尖尖角

任何学科包括新闻学和传播学，都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或层面，即知识、理论和思想。知识自然是每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可谓系统化和条理化的知识，而思想则属于从理论中提炼的精华。所以，任何一个学科能够达到思想层面的总是凤毛麟角。比如，经济学的知识多如牛毛，而真正形成一套类似剩余价值理论的已经所剩无几，至于达到马克思思接千古、视通万里、酣畅淋漓、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者，则更是屈指可数了。

在我看来，你的演讲所涉及的既不是知识，也不是理论，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可惜这样的东西，往往是“可为智者道，难与俗人言”（司马迁），借用 T. 卡莱尔在其名著《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对思想英雄的论述——思想是点燃人生的天火。

听了你的演讲，我也很受启发。其实，你的一系列想法，就是从你涉猎的众多学科知识和理论中精心提炼的，从中可以隐约看到许多人所熟知的理论身影，比如丹尼尔·戴扬等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所概括的三种电视直播脚本。

当然，你的思考有你自己的角度和见地，同样富有意义和意趣，而且不乏概括力和穿透力。你的表达也恰到好处，不卑不亢，自然流畅，语言有韵味和文采，将一种复杂高深的思想表现得清晰、通透、简洁。

总之，我为你兴奋，更为你骄傲。我相信并期待你们中间，若干年后能出现一批开疆拓土的实干家，一些卓有建树的理论家，同时还有一二高标出世的思想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新闻事业的“光荣与梦想”一展风采，就像昨天你们的“小荷才露尖尖角”一样。

播种记

现在的教学工作，除了专业知识的传授、思想视野的拓展，精神品位的提升等，还有一点就是“播火记”，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一路播下

无数的火种。这些火种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燃烧，就会发光，就会形成燎原之势。或用另一个类似的比喻，也是蒋南翔校长用过的比喻，叫作“播种记”。就是说，在一批批学子心中播下“良种”，待阳光、雨露、季节、时令等凑巧时，种子就会发芽，生长，甚至长成参天大树。我还引用叶挺将军的话，“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何去何从，都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这是毛泽东当年听说林彪外逃后说的话。其实，人生的道路不也是如此吗？好在，历史的规律与法则是大浪淘沙，淘出的永远是金子，淘去的永远是沙子，历史也好，人民也罢，最后选择的只能是精华嘛，谁会选择糟粕呢？天安门广场不为人民英雄树碑，难道为汉奸卖国贼树碑不成？所以，一方面，对你信中表露的心迹非常欣赏，觉得不愧是新闻学院出来的，不愧是清华学子，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另一方面也想告诉你，不必对信中提的人与事那么在意，人各有志，随他去吧。一母所生的孩子，还有“民族魂”和“民族败类”之分呢。当然，现在不大爱提败类什么的，不是连大汉奸的狎昵之作《今生今世》都可以冠冕堂皇出版，甚至一些精英还大捧臭脚，据说要多元，要宽容，要全球化了。另外，我还特别欣赏你说的那么一种精气神儿，大概这正是新闻学、新闻学院能够赋予学子的最宝贵财富了，人生在世说到底，不就是这种精气神儿嘛。现在，一些小青年爱说什么“没劲儿”，“没意思”，其实就是没了那股精气神儿。这两天想听《长征组歌》，给你回信的当口，还在边写边听。长征是一部英雄的史诗，《长征组歌》是一曲英雄的赞歌，处处洋溢着一种饱满的精气神儿和昂奋的生命力，大气磅礴，扶摇万里。德国的铁血宰相曾说，只要听着贝多芬的“英雄”，他的精神就永远不竭。其实，长征以及《长征组歌》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精神源泉，一曲响遏行云的英雄交响曲，有了这样的精神源泉，我们也会一往无前！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范院长和你骨子里都是中国的“士大夫”，所以你才能将他写得如此传神。至于你的“高谈阔论”，对我也颇有启发。特别是你举的德、日教训，即“国权”先于“民权”确实值得警醒，这也是我近来深思或反思的问题。别的且不说，即以一些高张“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而论，其行径往往让人不寒而栗。橘

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自由主义的谦卑、宽容、对自我的不确信以及虽不苟同于你却捍卫你的话语权等精神气质，在他们身上似乎荡然无存，而看到的往往是霸道、褊狭、唯我独尊、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等情结。借用康德句式，“自由”在他们那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同“主流”争夺“统治权”或“国权”的手段。

关于两代学人的“差距”，窃以为应该辩证地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我们这一代虽然总体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处于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但许多学科还是涌现一批大家，他们的成果与水平、贡献与地位同那些民国大家相比丝毫也不逊色，比如“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里的一系列著述。只不过前辈大家经过“累层”的宣扬，如弟子门生的传播已经如日中天，而当世大家则尚待时光的淘洗与历史的检验。当然，这代学人也不乏平庸之辈或中才之人，而且有些毛病于自身、于学界都是致命的。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教授评价说，一些77、78的所谓“大牌学者”已经渐渐成为学术发展的绊脚石：

> 他们位高权重，掌握了过多的学术资源，却未能产生相应品质的学术产品；他们建构了似乎无远弗届的学术网络，而所作所为却往往难掩人际关系庸俗的一面；他们指导着许多硕士生、博士生，而却日益墨守成规，对新的学术进展和思想发明缺乏兴趣和敏感；更可怕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继承了某些上辈学人的文化基因，开始带着酸溜溜的偏见，看不惯、看不起下一代学人。

江山代有才人出，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希望最终恐怕还是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有良好的条件和基础，见多识广，思维敏捷，而且社会和学术环境也大为宽松，远非昔日可比。所以，如肯深入，必有作为，而且“必将产生大学者、大学术，与中国的大发展相得益彰”。总之，对前辈可以高山仰止，不必望而却步，否则的话，“我们不做谁做，现在不做何时做”。

心仪大学生

学生在报社实习，想做一篇研究生与导师的报道，找我问了一系列问题，如你心目中的研究生应该什么样。于是，我讲了一段难忘的情

景。那是一个夏日，中午游完泳，到三教楼下的咖啡厅买吃买喝，无意间看到角落里坐着两个男生，一个娓娓讲述，一个静静聆听，俩人全都一脸安详平和，一副心无旁骛。特别难忘的是，讲述的男生用一种轻柔、流畅、舒缓有致的语调，淡定自如地谈着中世纪教堂什么的。忍不住听了一会儿，由于上课在即，不得不离开。从此，那个下午，那个角落，那两个学生，那脸上纯净的表情，便深深印入脑海。在一片乌央乌央（北京土话）的滚滚红尘中，他俩就像两个天使，浑身散发着圣洁的光芒。这才像大学，这才是大学生！



“愤　青”

在我看来，年少时不愤青、不另类、不先锋，就不是正常人。愤青说明有理想，有热情，有憧憬，有追求。当然，这时的理想还空泛玄虚，热情又易感情用事，憧憬往往茫然无着，追求常常不着边际。因此，如果一味愤青，不依不饶，那么心智恐怕也有问题。一般来说，随着年龄、阅历和经验的增长，都会变得通达、宽厚、优容，即使对待各种反常现象，也会心怀悲悯，而非一味究诘。那心情恰似老托尔斯泰说的，“谁没有在上帝面前犯过罪，谁没有在沙皇面前犯过法”。



两点嘱咐

临行之际，提示两点。

第一，媒体就是媒体，新闻就是新闻，分什么平面、非平面的，那都是些无谓的划分。正如参军打战，保家卫国，担负的是一样的职责，面临的是一样的生死考验，而所谓陆军、空军、海军等不过是形式的差异而已。

第二，学校即是社会，社会也是学校，彼此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明白这点就不至于把社会看得那么可怕，也不至于把学校想得那么美好。归根结底，学校也好，社会也罢，不都是人的活动场所嘛，而人与人能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呢？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听其自然，随遇而安，便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

生命的追寻与精神的探求

偏处一隅对学者来说未必不是好事。在北京等地虽然可以得到“学术话语繁盛的气氛”，但有时也难免心浮气躁。比如，自己就觉得心境不似当年在“外省”，那时或一人独处、阅读、思考，或朋友聚谈，海阔天空。如今忙忙叨叨，一地鸡毛，朋友聚会往往也跟应付差事一般。

你对学术精神与境界的追寻，我深为认同，特别是对“洋八股”的批评。我也经常以此敲打学生，别把活的学问都做成死的木乃伊。然而，举世滔滔的洪流，已非我等书生能够抗拒或扭转，看着学生或学者拿着同一把榔头，将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当钉子敲敲打打，悲哀之际也觉无奈，只好用路易十六的名言自我安慰：“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

诸如《共产党宣言》、《延安颂》、《诗人毛泽东》等均属上乘之作，曲高和寡也属自然。现在不少学生，都是流行文化追星族，自以为“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实际上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不过是被人操纵、乐在其中而不自觉的木偶而已。对此，我的经验是不必太介意。因为，一方面，既然有人愿意沉溺于这样的美梦之中，那么何必忍心打搅他们呢，就让这样浑浑噩噩沉睡下去吧。另一方面，我又始终坚信，任何时代其实都不乏鲁迅先生称许的“脊梁”，如果说其他人不可能不浑浑噩噩，那么他们也不可能不担负社会的责任和历史的使命。同时还相信，中华文明蕴涵着无比丰富、无比巨大的生命能量，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不断释放，从而铸就今天，影响未来。

耐性与定力

下午，参加毕业生座谈会，还谈到现在社会风气的浮躁问题，许多人总想着一夜暴富、一举成名、一步登天什么的，一点耐不住性子。而在中国做点事情，一定得有耐性和定力，否则成不了气候，更成不了大事。当如今许多人风风火火、随波逐流的时候，你能耐得寂寞，守住心性，兢兢业业，踏踏实实，那么，有朝一日，人们回过神来，蓦然回首，你就在灯火阑珊处了。用一位记者的话说，认真写好每一篇稿子，认真做好每一个标题，说不定哪一天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名记者了。

一生干成一件事

一辈子能干成一件大事就不错了，同样，一个阶段能干成一件小事也不错了。兵法一向讲究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关于晏阳初、梁漱溟以及乡村建设等，没有多少可说的了，你已研究得很深。还是那句老话，有历史感者深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现在许多咋咋呼呼、热热闹闹的名堂，包括似乎改天换地的所谓网络、博客、手机等，若干年后回头一看同样不过尔尔，就像现如今看电影电视、听广播一样，日常生活"该怎么的就怎么的，反正还是这么的"。不变的只有江山和人民，只有娅楠在毕业典礼上概括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

接到当年学生的电话，谈了工作、疑惑与思考。他们这批三十来岁的人，如今基本成为报社骨干。前些年，一方面出于对"体制"的反叛或反感，一方面基于年轻人的冲动或时髦，纷纷投奔"默多克"而去，以为"摆脱党的领导，投入资本的怀抱，就可以尽情享受所谓'新闻自由'和追求自己的'新闻理想'"，从而迎来一个改天换地的新时代。现在发现，事实远非如此，于是又想回归主流，而且成为新的"时尚"。经过一番折腾，他们才体会平时讲到的那些道理，如主流就是影响千家万户的大事情，就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兴旺的大关节，在许多看似"老套"、"僵化"的东西里其实蕴涵着丰富内涵。这些道理在亲身经历后，才会真正深刻领会。所以，现在不用多说，自己倒比我们还主流了。他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脱离主流，而是如何回归主流，因为任何想在历史上有点作为的人，都只能顺应社会生活的主流，而不甘居于边缘。何况，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包括各种各样的人才，江山代有才人出，你不愿意干，自然有许许多多的人愿意干，而且可能比你干得好。许多人总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以为离了他就怎么样，后来发现身后有更多"如狼似虎"的人才，那时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

本期央视《面对面》节目，王志对话吴建民。其间，吴建民谈到他的人生、他的大学生活、他在外交战线的风风雨雨，一派大家风范和大

将风度。特别是谈到他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力挫美英等国反华提案时，更让人觉得酣畅淋漓，气势如虹，一似折冲樽俎的儒将。最后，说话一向温和谦冲的这位外交家，竟连语调都提高几度，斩钉截铁，势如破竹。节目结束之际，吴大使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我希望回首自己的人生，可以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本来我还想在毕业典礼上讲讲这段话，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如愿。今天，我就顺便将这层意思送给你吧，相信将来你也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

王侯将相宁有种

报社的十八般武艺都应该了解，虽然不一定都熟悉。只有这样，将来才可能指挥千军万马，才可能指挥得动千军万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是天生的老总，又有哪个老总年轻时就想着将来要当老总的。现在一是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二是认认真真学习积累，不断提高理论水平。领导是干什么的呢？一句话，领导就是用各种理论指挥人的——这是古往今来的一条铁律。老百姓说得好，当官的动动嘴，当兵的跑断腿，就是这个道理呀。

我常对找不到研究题目的学生说，世界上不缺研究题目，缺的只是发现它们的眼睛。显然，这是化用罗丹那句名言：生活里不缺少美，缺少的只是发现美的眼睛。当然，这种眼睛也是需要逐步培育的，包括观察、思考、好奇心、读书积累、交流碰撞等。

弟子不必不如师

离家远行，开始难免会有一些不适应、不习惯，想家思亲也在情理之中。应对诸如此类的情况，我的经验就是咬咬牙，挺一挺，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世界上最难受的是痛苦，比痛苦更难受的是忍受。心字头上一把刀，只要咬紧牙关默默忍着，天下就没有什么应付不了的事情。其实，历史上许多“成功人士”，一方面固然有特立独行的地方，一方面也取决于坚忍不拔的精神。所谓“笑到最后，笑得最好”不是因为一直在笑，而是因为一直在忍：忍受艰苦、忍受磨砺、忍受挫折、忍受寂寞。许多人之所以最后一事无成，不是因为没有本事，而是因为没有吃苦耐劳的坚忍。尤其在这样一个浮躁、急躁的时代，一个人人恨不得一

夜暴富、一举成名、一步登天的时代，坚忍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了。

中文大学有很好的学习条件和研究氛围，山青水秀，名家云集，加之背靠大陆，面向大海，具有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的得天独厚优势。能够在国际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华裔学者，几乎都是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的。另外，你又有强烈的学习兴趣和钻研劲头，相信在这样的环境里定会有所成就的。后生可畏，后来居上，弟子不必不如师，应该有这种气魄。新闻理论泰斗甘惜分先生有句名言：不敢批评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能超越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论文选题

大作已阅，不同凡响，看架势，快赶上一篇硕士论文了，由此也体现了清华学生的实力或水平。不过，这么说也隐含着问题。现在学生论文的普遍倾向，不管是本科还是博士，往往狮子大张口，选题太宏大，于是做出来的东西与其叫“研究”，不如叫“综述”、“概览”。打个比喻，你们现在的兵力能端掉鬼子的一个炮楼就不错了，可惜大家动不动就想吃掉一个旅团、师团，甚至整个关东军什么的。这个问题当初在课业论文上就反复提醒，不知道为什么题目总小不下来。想想看，你们一个区区武工队，居然就想包抄华北派遣军，岂非异想天开嘛。其结果只能是东放一枪，西投一弹，看上去怪忙活，实际上不解决什么问题。

身体第一　学业第二

真是天妒英才呀，才俊似乎总是这疼那痒的，总是不得安生、不得消停似的。然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所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等。不管怎样，既来之，则安之，好好休息，细细调养。另外，建议训练一下游泳——世上最好的运动，身心都可以得到调剂，而且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才子怎能不爱水呢。坚持游泳，身体必有改观，现在看来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了。傍晚，又去西湖畅游一番，怎一个爽字了得，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云云。

其实，乃师已说不上什么研究和创造了，只是像当年小平在长征路上一样“跟着走”而已，走到尽头就是了。真正在研究和创造上有希望、有潜力的，还得指望后起之秀。如果一切正常、顺利，那么不出十年，相

信你们就该头角峥嵘了。

喜读"历险记"

昨天晚上整理近半年的各种邮件,还时时读到你那些一惊一乍、才华漫溢的来信,包括假期想去新疆的计划等。今天一早,又见到你同样出生入死的历险记。似乎每年暑期,你都非得整出一场出人意料的"创举"不可,惊心动魄,惊险刺激,语不惊人死不休似的。这回没想又导演一出"川滇藏"来,同样的精彩惊险,同样的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令人不由想起青年范长江,逞英雄之所快,行常人所不为,九月入泸,深入不毛,谱写历史之际也演绎个人生命的华彩。乃师常常困惑,这个貌似文静、看似柔弱的小女子,哪儿来这么彪悍、强蛮的劲头儿呢,整个一挥刀跃马、风驰电掣的哥萨克骑兵嘛。俗语说,无湘不成军,湘人的血性在你身上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喷涌。想你此行定有不少生动、有趣、鲜活的人生经历,也会留下一些动人心弦的文字。即以信里对"老少边穷"地区状况的描述,读来就心为所动,魂为所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上大舞台,干大事业,可谓学院的"系铭",这在你们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昨晚,看你们"誓将扫盲进行到底"的戏谑之语,心里还在嘀咕,尔等都号称文盲,那么 80 后里不知还有谁是非文盲。当然,用山东大学的校训来说,"气有浩然,学无止境",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一辈子也学不完。比如,最近翻阅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许多内容可能就对你有所启发,特别是有关新疆、西藏的章节。另外,斯文·赫定等西域文字,也值得再次研读。

岁末杂感

随着一封封来信与短信,感觉 2007 年的脚步已经笃笃临近。看到你的近况特别高兴,短时间里取得这些成绩令人欣喜,同时也在意料之中。曾几何时,提起子弟兵,还可以掰着指头如数家珍,而现在提起来都是一把一把的,数不胜数了。我们的"十六字方针",即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越来越显示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如今,清华新闻人就像当年反击法西斯的苏联红军一样,一批批走过红

场，一浪浪奔赴前方。

由于不信教，故耶诞节、佛诞节均如身外物，一如耶经、佛经、古兰经等（作为思想文本则另当别论），也无须莫名其妙凑热闹，让老外看着滑稽，就像我们看老外过春节，若再放放鞭炮、贴贴春联就更有意思，犹如我们弄个耶诞树、戴个小丑帽。昨天，有位博士生带着介绍信见我，希望就什么什么谈一谈，我让她周一晚上开放日来办公室一叙，她问周一不是耶诞节吗，老师难道不过节吗。心想，别说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节，就是中秋节、端午节等，逢开放日也会准时赴约。你可以不来，但我不能不到，正如你可以不仁，我不能不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中国文化或可称为君子文化，至少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君子情怀。比如民间一直尊崇“先生”，而先生其实就是君子。再如中国人即使动武，也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杀伐攻取乃属下策。当代人嚷嚷的“软实力”，其实早在老庄哲学里就已讲得非常精赅——上善若水嘛。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我同意你的看法，对网上东西往往不屑一顾，所谓“看者无多，应者寥寥，随风飘散而已”。而那些大谈博客传播、博客新闻的东西，同样觉得像痴人说梦。道理很简单，不要说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依赖”网络、博客，即使全世界六十亿人都上网，结果就如同将现实搬到网上一样，谁听谁的，谁看谁的，谁在乎谁的呢。那么，到底听谁的、看谁的、在乎谁的呢？不管是按照“现代”的马克思，还是“后现代”的福柯，当然归根究底还是“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社会权力等。比如，依据马克思理论，中国的问题不正是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从而影响整个权力格局和话语表达嘛。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固然属于美好理想，问题正如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如何将它们一一落实在具体的社会情景或历史实践之中。马克思说得好，问题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你的思考一向“前卫”，思想也比较“尖端”，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关键同样在于如何将西方的理论落实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昨晚偶然翻阅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能不为他的远见卓识所折服。这篇写于 1926 年的文字，这篇出自一位三十来岁青年人手笔的经典，居然如此透彻地揭示了

中国社会的问题及其根源，而且如此准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脉搏——后来的一切仿佛都成为对其理论的验证。

教学相长，砥砺学问，我的回应就权当是你的一块思想磨刀石吧。

美国的月亮就是圆

目前，除了一些主流媒体，其他众多媒体要么完全服膺于“市场”逻辑，怎么来钱怎么干，至于新闻理想、媒介伦理、社会责任等仿佛都成为虚无缥缈的名堂，要么主动受制于“西方”逻辑，怎么对立怎么来，怎么拧巴怎么干，什么四项原则、民族传统、伟大复兴等似乎都成为理当排斥的东西。本周“冰点”文章又是一篇毫无悬念的名堂，某个哈佛教授开设的“什么是幸福”一类课程。用句港台腔，拜托，这些粗浅道理中国老百姓都懂得，而且在践行，至于中国的大学更是可以随便挑出一堆更出色的这类教授。咱们能不能换点新鲜的，别总是美国的月亮就是圆，就是圆啊就是圆。

如果是基于对媒介问题的困惑而想赴美留学，也许并非最佳选择。因为，这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如城市交通拥堵，而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对此，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可供借鉴的他山之石，于是不远万里去取经，相反，现在的许多问题恰恰源于胶柱鼓瑟或食洋不化，“美国如何如何，所以中国应该如何如何”几乎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思维定势。现在缺的恰恰是对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和认真应对，特别是将所谓“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识与创造。中国的问题还是需要立足中国的实际，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近代以来，各个领域做出成就的无不遵循这条原则，而背离这条原则的要么无所作为，要么祸国殃民。当然，如果纯粹基于所谓学术兴趣，希望在书斋里自娱自乐，那就另当别论了。

文、史、哲与想象力

如果清闲，最好可以多读读“闲书”，特别是文学、历史和哲学。上周为上课，也对新生讲到这个问题，还打个比喻：史学相当于人的骨骼，文学相当于血肉，哲学相当于心智。没有这三方面的营养，人就势必长成歪瓜裂枣。史学不足则身材欠佳，文学不足则瘦骨嶙峋，哲学不

足则头脑简单。至于各种专业，则如干活吃饭的工具因人而异。另外，文、史、哲的基础意义还在于激发想象力，而想象力是成就一切大业的原动力，包括学术研究。没有想象力，最多只能成为优秀的匠人，而不大可能成为富有创造力的“诗人”。新清华的特征在于务实——“行胜于言”，新闻传播学更是务实，其利自不待言，而其弊则“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有时可能妨碍“拔尖”、“创新”。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说：

> 简单一点的因果关系，科学可以处理，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体系，科学处理不了。越复杂的东西要用越含糊的东西来处理。比如对一个简单的东西，物理学可以处理，再复杂一点，可能用生物学来处理，再复杂一点用社会科学，再复杂一点就用历史，什么东西可以处理最复杂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只有文学。

北京正是一年一度的金秋时节，天高云淡，天朗气清，万木霜天红烂漫，便引诗情到碧霄云云。由于迎接本科评估，清华园也整饬一新，鲜花簇簇，绿草茵茵，路边如仪的林木一片金灿灿景象，人在画中走，画在身边行，确实赏心悦目。东西主干道为了奥运又进行了彻底翻修，快赶上我们新疆好地方的一级国道了。



《慢》

梁启超关于“美国人生”的六个匆匆忙忙，可谓精辟而传神。就连捷克异见作家米兰·昆德拉，前些年也忍无可忍地出版了一部《慢》，批判现代文明，倡导索罗哲学，虽然难以卒读，尽管索然寡味，还被时贤热捧一通。经典影片《卡桑德拉大桥》有句台词，同样精辟而传神。北约总部的美国上校为了国家脸面，不惜隔离肺鼠疫感染的列车，将其导向一条死亡之路，并命令沿途不许任何人离开列车，否则“格杀勿论”。蒙在鼓里的乘客们嚷嚷下车，有人说到巴黎还有急事，于是有人劝解道：“晚到巴黎，总比早进天堂好。”现代人匆匆忙忙地“奔命”，生怕赶不上什么似的，其实人生终点殊途同归，与其急急慌慌奔向那里，不如慢慢悠悠随遇而安，诺贝尔奖作家安德里奇在《德里纳河上的桥》里，也说过类似的道理。今天看完卡达莱名作《亡军的将领》，同样是东欧作家，同样是东欧背景。安德里奇曾任南斯拉夫作协主席，卡达莱曾任阿尔巴

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2005 从马尔克斯、格拉特、大江健三郎等候选人里脱颖而出，获得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说："卡达莱是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历史民俗学、政治学等领域都留下印记的作家，他描绘了一种完整的文化，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比起《德里纳河上的桥》，他的《亡军的将领》未免逊色，前者无愧一部伟大的民族史诗。可惜，当年英勇抵抗纳粹的南斯拉夫已被美国肢解得七零八落，曾与中国友好的阿尔巴尼亚如今恰似鹰犬（号称"山鹰之国"），最近又接纳了几名"东突"分子，至于同霍查过从甚密的卡达莱转而献媚西方，也是江郎才尽，江河日下。

刚读了《当代》第 2 期上发表的《多少往事烟雨中——我的父亲陈占祥》。陈占祥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城市规划设计师，解放初与梁思成一道提出保护北京城的《梁陈方案》，结果付诸东流，天人合一的北京城从此消逝。其中一段文字谈及古城与汽车，也与社会人生的快慢话题有关：

> 生命为什么一直都在匆匆忙忙地奔走赶路？为什么非要在自己头顶悬一条鞭子，天天敢死队似的冲锋陷阵？我们为什么不生活得简单一些、悠闲一些，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领略人生旅途的绚丽风光？女儿的法国丈夫斯岱芬是美国斯坦福医学院的博士后，他对美国人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的生活方式很不以为然。……斯岱芬对我们说："每个人都要走到生命的终点，有的人是气喘吁吁地跑着冲向终点，有的人是悠闲地散着步走向终点。为什么不走得从容一些，放慢脚步欣赏一下路边的湖光山色？那不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高速和财富并不代表品位，也未必有美学上的意义。"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罗曼·罗兰与梅森葆夫人的通信集，是如诗如歌的爱情名篇，犹如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书函，比起清华名师浦江清先生所鄙视的徐志摩真有天壤之别，浦先生在《清华园日记》里将徐志摩及其人品、作品概括为"肉麻"二字，堪称精辟。

看到周小燕教授的访谈节目，对这位老人更是景仰。老人家 1940

年代就以漂亮的花腔女高音蜚声国际乐坛，被誉为“东方夜莺”。有一次出国演出，外国人听说她是“优秀共产党员”，大为惊异。这位当年的“美女”笑道：怎么，你们以为共产党都是青面獠牙。周小燕不仅才艺高超，而且师德高尚，在上海音乐学院有口皆碑。她与著名导演张俊祥是一对伉俪。节目最后，她一袭黑衣，怀捧鲜花，前往公墓，在张俊祥的塑像前伫立、凝视，然后缓缓地、深情地抚摩塑像的面部。在张俊祥的墓碑文字旁边，已经刻着周小燕的名字。她说：我死后，希望人们忘记一切给予我的荣誉，而只记得我是张俊祥的夫人……

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一篇报告文学《沿着雪线走》，有个故事同样令人感念。大意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1950 年代双双考入军校，后来响应号召，共赴西藏。虽然俩人一直在一起，但由于战事及纪律，没有多少卿卿我我的时间。最后，经过多年风雨，两人终于毕业，并留在同一所军校。然而，正当他们准备举行婚礼时，又接到新的任务，为此他们推迟婚礼，帅小伙儿毅然奔赴前线指挥所，结果——天妒英才——被一颗炮弹拦腰炸断，当即牺牲。噩耗传来，谁也不忍心告诉新娘，只说受了重伤，正在抢救。姑娘心急如焚，一个劲儿自责、后悔，说才分开两天，怎么就出事了，要是我和他在一起，就不会发生意外了。然后，驱车前往，怀着又焦急，又祈盼的心情。结果——又是该死的结果——路上遭遇车祸，当场死去：

> 她真的就随他而去了，那么急，那么不由分说。好像任致逊在那边喊了她一样，她连“嗳”一声都顾不上，就奔了过去。
>
>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
> 唯一能够安慰的是，马竟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逊已经牺牲，而任致逊牺牲时，也不知道马竟然离开了人世。在他们彼此的心里，他们都活着。他们只是不约而同地一起走了，共赴黄泉，去那里活，去那里相爱。也许在他们很少很少的情话中，有那么一句：至死不分离。如果还有一句就是：永不失约。
>
> 马竟然和任致逊，牺牲后双双被追认为烈士，一起安葬在日喀则的烈士陵园。
>
>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
> 他们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吗？

爱的艺术

法兰克福学派的弗罗姆有本几万字的经典《爱的艺术》，谈及许多爱情话题：

> 爱情是一门艺术。人们要学会爱情，就得像其他的艺术——如音乐，绘画，木工或者医疗艺术和技术一样的行动。
>
> 爱情首先是给而不是得……“给”比“得”带来更多的愉快，这不是因为“给”是一种牺牲，而是因为通过“给”表现了我的生命力。
>
> 给的最重要的范畴还不是物质范畴，而是人所具有的特殊范畴。一个人究竟能给别人什么呢？他可以把他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他的生命给予别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是他应该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他应该同别人分享他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简而言之一切在他身上有生命力的东西。
>
> 爱情的积极性格除了有给的要素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是所有爱的形式共有的，那就是：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
>
> 从根本上来看爱情是意志的行为，是人作的一项把全部生命交付对方的决定。……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也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一个诺言。如果爱情仅仅是一种感情，那爱一辈子的诺言就没有基础。一种感情容易产生，但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如果我们的爱光是感情，而不同时又是一种判断和一项决定的话，我如何才能肯定我们会永远保持相爱呢？

杰出的小说与杰出的译作

万圣旁边的“首航超市”，新开了一家特价书店，有大量中外经典名著，价廉物美。前日去了一趟，两百来块钱就抱回二十余部佳作（多数都有，依然想买），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著名译”系列的：

《变形记》（奥维德）

《十日谈》（薄伽丘）

《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瓦西里耶夫)

《诱拐》(斯蒂文森)

《一生》(莫泊桑)

《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

以及傅雷译的《贝姨》、宋兆霖译的《赫索格》(索尔·贝娄)、《永别了,古利萨雷》(艾特玛托夫)等。

再如,穆旦、闻一多、朱自清、曹禺(均为清华校友)、郭沫若、夏衍、余光中、艾青、赵树理、冯至等人的代表作或精选集,以及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

书的价值自不待言,而书的品相也精美完好,有些甚至就是刚刚出版的。如此珍宝如此“贱卖”,让人不知欣然,还是怅然。拿《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来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出版,属于“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区区 6 块钱,在食堂吃碗过桥米线都不够。这本书不记得读过几遍了,每次读都感到心灵的洗礼与精神的震撼。五位女兵,形象鲜明,性格各异,一个个活灵活现,最后各以不同的形式“牺牲”,无不死得令人心痛。第一位牺牲的姑娘是个高材生,爱读普希金诗歌,在替准尉取烟荷包的路上,死于德军侦察兵的刀下。由于对方没想到是个女兵,一刀下去,扎在左胸,没有当即致命,所以发出一声“微弱、仿佛叹息似的呼唤”。这一声似有如无的呼唤,被经验丰富的准尉听到了。“他的神情逐渐严峻起来。这一声古怪的呼唤仿佛深深印在他的心上,仿佛至今还在耳边鸣响”,准尉的心“顿时凉了,他已经猜想到这一声呼唤意味着什么”。当他后来手刃两个敌人后,心痛地想到:“在人类这连绵不断的棉线上,一根细小的纱被一刀割断……”

作品虽是二战题材,主题却是“和平”,诗一般的书名就蕴含着这一意味,而和平是用鲜血换来的。书的结尾处一起一伏、一动一静的两个对比场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的心意。“一起”“一动”是准尉最后怒发冲冠,破釜沉舟,独身一人,硬闯敌巢,用仅剩的一颗手枪子弹和一枚失效手榴弹,逼降剩下的五个德寇,撕心裂肺地吼道:“怎么样,胜利了吗?……胜利了吗?……五个姑娘,总共五个姑娘,总共只有五个!(却阻击了 16 个人高马大、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兵)……可你们别想过去,什么地方也别想去,就得老老实实地死在这里,统统死掉……哪怕

上级饶了你们，我也要亲手把你们一个一个毙掉，亲手！让他们审判我好了！由他们审判去！……”“一伏”“一静”是随即过度的“尾声”，一片迷人的田园风光，人们尽享安宁，静谧，鸟语，花香，湖畔有人钓鱼，给朋友写信：“我今天才发现，这里的黎明是那样的静悄悄，静悄悄。”如此动静相连的结尾，让人联想起小提琴“梁祝”，随着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殉情的高潮涌过，音乐迅速滑向余音袅袅的尾声，在如梦如幻中渐渐消散。

俄罗斯文学翻译家高莽（乌兰汗），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一部杰出的小说，一本杰出的译著》里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1987年，作者瓦西里耶夫随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一天游览长城，高莽同他谈起这部小说及其同名电影在中国的影响。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在一家餐厅吃饭，随便问女服务员：“你看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吗？”她一愣，不知道这个问题同进餐有什么关系，故轻轻答道：“看过啊……”高莽说：“这位苏联朋友就是小说的作者！”她一下清醒过来，睁大眼睛，满脸喜悦，惊呼：“我看过两遍！我感动得哭了！”然后，开闸放水，滔滔不绝。她不停地讲啊讲，高莽已无法翻译。瓦西里耶夫望着她，热泪滚滚，说：“你不用翻译了，我都明白了！”在场的一位卡尔梅克诗人看到这个场面，插了一句话：世上有些作家很有名气，大家都知道，可很少读过其作品，这样的作家是可悲的；世上有不少人知道一些作品，很少知道其作者，这样的作家是幸福的——而你，瓦西里耶夫，就是这样的作家。

在人类历史中，除了肇始于希腊罗马的欧洲文化，俄罗斯文化同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一样，都同样源远流长，博大深沉。“赶时髦”汲取西方文化之际，切莫忽略这些同样伟大、甚至更加伟大的文化传统。如果说这些人类文明的精华犹如蓝天大海，那么以“三片”即好莱坞大片、薯片和芯片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充其量只算个池塘。张承志对此有很深体悟，他痴迷伊斯兰绝非单纯的族裔认同，而有深刻的历史与文化认知。他是我国民族学、边疆史地泰斗翁独健先生的弟子，在中亚考古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读书》第5期发表了他的《金卷银卷阿凡提》，从阿凡提谈到他念兹在兹的西域、阿拉伯文明，及公理、正义、和平等“普世价值”。身为西域人，我们从小就喜欢阿凡提，就像美国人喜欢杀人越货的“西部牛仔”，但从没有像他那样意识到阿凡提故事的深意——和平：

阿凡提的内容无所不包，人称它是笑话版的百科全书。但在它的叙述里，几乎没有涉及战争。

也许这才是一个被人忽略的现象。确实，绿洲里那些连自己都没觉察的、平静慵懒的日子，须知就是亲爱的和平。阿凡提正微笑着在那里骑驴漫步，其实是在向我们暗示。

推开窗子就一拥而入的空气一般的和平，仿佛晴天里淋不湿甜瓜秧子的雨水，只渗入了人的心田。有谁特意去留意每天的空气呢？所以没人想过他们不意获得了和平。

学会欣赏阿凡提也是一件美事，读多了他的笑话，会弄懂人民的话语和生活方式，能明白一个个从毛驴上瞥来的眼神。

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是近代中国唯一的“和平年代”，人们尽情享受着这一切，已经觉得理所应当，自然而然，就像没人特意留意每天的空气一样。而我们应该知道，和平同样得来不易，既有无数先驱者的热血，又有亿万劳动者的汗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人们不该忘记。北大潘维老师说得好：“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一为文人……

“一为文人，便不足观”，这么说不够周延。准确讲应该是文人里的一部分不足观，毕竟文人里颇有一些有德行、有骨气、有气节者，他们往往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从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从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女侠秋瑾，到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民族魂”鲁迅，从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傅雷夫妇，到“以笔为旗”高扬清洁精神的张承志，就构成一长串中华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文人巨阵。中国之所以成为人类唯一绵延数千年的文明，相当程度上也在于这些文人及其传承的高贵精神。作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精神上无疑也属于这一脉伟大传统。他曾盛赞鲁迅先生，称他为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诸如此类的评价也隐含着对比——有些文人的骨头软，膝盖软，而这些骨头软、膝盖软的文人已然成为眼下不少文人膜拜的偶像。

现代文人里更有闻一多、朱自清那样的高洁之士。在荷塘月色附

近的漫坡上，有座闻一多的雕像，一袭长衫，围巾飘逸，仿佛爆裂的发型感觉激情四射，手里拿着那柄熟悉的烟头，雕像的基座上镌刻着诗人的一句名言：诗人的天职就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好似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此类情怀当然不是无行文人所具有的，他们要么像祖师爷一样没骨头，没膝盖，要么像钱锺书《围城》塑造的文人群像，蝇营狗苟，一地鸡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作为自觉意识强烈的文人，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态度，自己的处事原则。正如面对日寇加诸的战争，中国人别无选择，可大敌当前，是抵抗，是屈服，是卖身投靠，是认贼作父，其间的选择余地有天壤之别。当《大美晚报》的编辑朱惺公面对敌伪的屠刀，毅然决然编发抗战文字，不惜殉国之际，张爱玲及其男人胡兰成则选择为皇军歌功颂德，为大东亚战争摇旗呐喊。所以，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说得好，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荒唐的是，当今文人似乎喜欢懦夫，于是对其精神前辈顶礼膜拜，甚至将胡兰成作品大张旗鼓地摆上书肆，摇唇鼓舌地吹嘘“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云云，同时对鲁迅为代表的精神传统弃若敝屣，甚至大张挞伐。

此刻音响正在播放“英雄交响曲”，一往无前的滚滚音流宛若拿破仑大军。在贝多芬眼里，真正的英雄不仅是创造历史的伟人，而且更是精神高贵、器宇轩昂的文人。有时，伟人和文人形如一体，其实难以区分。文天祥如此，林则徐同样如此。清华有座英烈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不同时期为国捐躯的校友姓名、入学时间、牺牲事由等。其中一位令人难忘，他求学清华，后来投笔从戎，成为飞行员。淞沪抗战时，驾机与敌搏杀，后来弹尽油绝，战机又被击伤，最后毅然撞向日舰，与敌同归于尽。



不知生，焉知死

关于家国，冯玉祥将军有首小诗：

> 鸟爱巢，不爱树，树一倒，没处住，看你糊涂不糊涂！
> 人爱家，不爱国，国如亡，家无着，看你怎么去生活！



至于信仰及人生意义，确属我较少谈及的。具体缘由，未曾细想，大致说来，或有如下因素。其一，这些问题为私人领域，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中国人一般不在这方面强加于人，三教九流，各行其道。其二，将死亡定为所谓终极关怀恐怕是西人私见，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三，正如你所阐发的，欧洲人视现世人生为罪孽渊薮，政府固然是恶的，人心、人性、人生又何尝不是恶的，世俗社会，七情六欲，都归摒弃之列，悠悠万世，唯有死亡与天国才是人间正道。而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对人生在世及其意义另有自己的理解，包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乐善好施，中庸平和，追求一种天地万物其乐融融的境界，内心没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剧烈冲突。最后，无论什么价值，也不管何种文明，必有一整套生活意义，使人的生活区别于动物的生活，甘阳主编、三联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里，新出一部北师大民俗学者岳永逸博士的《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也谈及此类话题。总之，中国人对待死亡与人生的基本态度，还是先哲说的“不知生，焉知死”。

谈　专　业

对话批判学派

拜读 Mosco 的对话，获益良多，而且感到所见略同。比如，下面两段论述，也是我所赞同的：

> 该书中，我首先分析了人们如何制造神话来为科技赋予意义的。神话是传播的一种，是人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的一种解释。电报刚刚被发明的时候，人们称其为世界和平的钥匙，以为一旦全世界的人可以迅速交流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会有战争。当然，这个神话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而当电力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相信这是“罪恶的终结”，因为世界不再有黑暗。而现在，计算机科技又成为“地理的终结”、“政治的终结”，甚至“死亡的终结”。比尔·盖茨声称的“计算机带领世界革命”也是一个神话。大亨们如何创造神话，而受众又如何解读这些神话并揭开其神秘的幕布，这些都是该书关注的课题。
>
> **您是如何理解“高质量的研究”的？这对研究生是非常重要的。**
>
> 简单地说，第一，要问正确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正确的问题呢？正确的问题要对世界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第二，好的问题也需要有理论贡献。它必须抓住一些核心的概念，有助于人们认识、理解世界的重要概念。比如说社会阶层、性别、种族、商品、权力等。同时，你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不是描述，而是理解社会阶层与媒介使用的关系。第三，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来帮助你清楚地认识问题。这并不是说必须要用统计学方法，也可能是采用一些可信的机构发布的信息，发表的调查或

者媒体工作者收集的数据等等。他必须要有清晰明了的研究方法，无论是质化还是量化的。要旨就是要用理论指导问题的研究，通过好的研究方法，能够提供明确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别人所使用。比如说你发现有六七个媒体集团控制了世界上的媒体，我得到这一结果之后可以去看看是否如此或者数字有异，我也可以研究这一状况的变化或者其意义。这些都需要得到清晰的阐释。

新闻教育

李良荣教授的文章(《新闻教育未来之路》)涉及新闻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困惑，可以归结为四个不可逆转：大学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的趋势不可逆转；新闻人才供过于求的局面不可逆转；各行各业对人才需求急功近利的局面不可逆转；媒体融合的趋势不可逆转。为此，新闻教育面临一大问题：应该重在通才教育，还是重在专业教育？与此相关，学生重在理想，还是重在饭碗？诸如此类的困境与困惑，李良荣教授"自己都感觉控制不住"。当然，他还是提供了一条底线：无论如何，新闻教育得强调"三基"：基本理念、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而"三基"正是高等教育一直奉行的原则。其中，他又特别重视学生的基本理论，包括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李良荣之所以强调"三基"，是因为当下新闻教育有两个现象让他不无"恐惧感"，也让我有同感。一是放弃基本理念，放弃新闻学的人文精神，将新闻教育弄成专业化、技能化的"培训"；二是教育教学内容"很杂、很散、很空"，影视、动漫、产业等纷纷攘攘——"学科无边界，专业无核心"。另外，他对批判精神以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也别具一格，给人以启发：

> 批判一定不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指责，一种抱怨，一种牢骚，那不是一种严肃的批判。我说的批判是能够敏锐的感觉到并且勇于指出现实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才是我所说的批判精神；
>
> 如果知识分子也是牢骚满腹，那就是混同一般的人，那你不配当学者。所以批判一定是指向一种建设性的，没有理想的批判就是毁灭性的批判，如果是毁灭性的批判，那就是一种破坏。

媒介与社会

俗话说,卖什么吆喝什么。研究媒介技术的,如麦克卢汉,自然比较重视媒介技术的历史影响与社会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有其道理的。不过,对人类社会来说有比这些更重要的,比如媒介内容,存在本身,政治经济秩序等。而要把握这些东西,仅仅研究媒介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读《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黄河边的中国》等书的用意。

新闻写作

昨天上课,开场讲的就是兵团对中国大局的意义,即毛主席、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兵团不存,则新疆不稳;新疆不稳,则西域不宁;西域不宁,则中原危殆。同时也谈到兵团人的精神,所谓“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而这种精神,往远处说是源于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朝近处讲则来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迸发的昂扬奋发之气。

新闻稿是我修改的。第一段是导语,改动不大,主要是把长句子“化整为零”,便于读者阅读;第二段是新闻背景,没有这个背景,整个新闻就莫名其妙,因为既然讲的是“兵团五十年”,那么就得交代一下五十年前的历史;第三段与第四段是新闻主体,用事实申述兵团五十年的使命、作为与意义;最后一段是结尾,也就是你说的“升华”——开发新疆、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重要力量。

且不论原稿是不是“倒金字塔”,即便“倒金字塔”也不是新闻写作的金科玉律。了解一点新闻史,就知道“倒金字塔”是怎么来的,何况不是常讲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嘛。凡事没有基本的章法不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如果时时处处拘泥于章法,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看看古今中外那些卓有建树的新闻人,差不多都是在“有章法”与“无章法”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的。这就是辩证法。

新闻人的人文理想

最近,正在关注有关新闻教育的问题,看了一些文章,思考了一些

问题，加之二十余年的经验和“管理”阅历，每每感到“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你敢说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都能上通天道、下合人情、大利天下、小利学子？诸如此类困扰时时袭来，特别是在一个变化空前的时代。

尽管不无困扰与迷茫，有一点还是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无违”，即新闻人的人文理想或人文关怀。在一个普遍功利化、实用化的世界，这种理想和关怀貌似越来越稀缺，但谁也不应否认这是新闻人的灵魂，也是吸引一代代有理想的新闻人投身于此、乐此不疲的关键，用你信里的话说就是“信仰与责任”吧。

我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一课上，就曾讲到范敬宜老师一再强调的责任问题，同时以激情作为对比。献身新闻传播当然需要激情，恰似献身任何领域一样，如军人的沙场点兵、牧师的“拯救灵魂”等。不过，激情这玩意儿往往不靠谱，不仅来无影、去无踪，来得猛、去得快，而且容易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癫狂疯魔，如纳粹、“9·11”等。所以，如果把如此沉重的社会使命，都寄托于这样一些飘忽而冲荡的情感，那么怎能让人放心呢？

当然，理想或信仰等似乎也比较虚飘，所以以此安身立命更需要勇气和定力。多年来，已见惯激情澎湃、理想高张的青年，如何消磨理想的光芒，最后随波逐流，并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下渐渐成为“普通人”。这里也有一个不断调适自己的状态心态问题，一方面需要坚守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得在错综复杂的实际情景中发光发热，确实是一门更大的社会学问，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总之，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新闻人、一切“先进”的新闻思想，归根结底都在讲求“铁肩担道义”、“万世开太平”，都在张扬人文理想和人文精神。潘忠党教授最近在一篇解读凯利（James W. Carey）批评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文章里，对此做了精彩阐述：

> 新闻的天然学术家园应当是人文学科和人文取向的社会科学。新闻自然地与政治理论同属，因为政治理论培育我们对民主生活和体制的理解；它自然地与文学同属，因为它从文学得到对语言和表述强化了的敏感以及对叙述形式的理解；它自然地与哲学同属，因为它可从中获得其道德基础之澄清；它自然地与艺术同属，因为艺术丰富新闻对视觉世界之一体的想象空间；它自然

地与历史同属，因为历史为新闻提供了自觉意识的基石。

……

在今天的改革当中，我们似乎又在以比美国新闻界更加投入的热情拥抱市场，以一些“传播”的科目取代新闻的教学内容，或将新闻专业挤压到了某种夹缝之中。红火的是广告，是媒介经营和管理，是网络媒体，黯然失色的是新闻。在美国，凯利指出，这个大趋势是“可悲的，是良机丧失史上的又一篇章”。难道我们要在若干年之后对中国的场景作更加沉痛的感慨？

致博士考生

看到来信，有点诧异。一来，作为国际传播的研究生，竟对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有如此兴趣和研究，令人刮目相看。二来，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有如此学术志趣和专精研究，又让人觉得意外。当然，这么说绝非轻略北广，而是一般印象，贵校更偏于应用，特别在广播电视方面独占鳌头。如今你呈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学术形象，这就使人不免有点诧异。

关于元代问题，你的钻研和思考，应该说在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已经领先，后生可畏，可喜可敬。考察元代的新闻传播，肯定得用多学科的资源和视野，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新闻学或报学，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汉语文献。我相信，涉猎的学科越多，视野越广，则发现的问题就越广泛，研究也就越有意义，如法国汉学巨擘谢和耐的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关于博士考试，我们没有任何门户之见，相反真心希望海纳百川，汇天下之英才，育未来之栋梁。你有如此功底，我个人自然乐意考虑你的愿望。当然，你得首先经过考试，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最后综合比较，然后定夺。至于说“导师往往喜欢自己的学生”云云，这里并不存在，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众优相权取其最”。

本事·创造力·意匠经营

学无止境，艺无止境，需要提高的地方还很多。看了你的大通讯，高兴之余不由想起今年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新华社记者张严平

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点不比“普利策奖”逊色，生动、感人、荡气回肠、行云流水云云。好新闻无非靠两条，一是事实本身确有价值，一是记者本人确有本事。有本事而无价值，那么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清华一直倡导“上大舞台、干大事业”，就新闻行当而言，只有在主流媒体才更有可能接触、发现、开掘有价值的事实。另外，有价值而无本事同样不成，那么多主流媒体采访、报道王顺友，为什么只有张严平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这就是人家的本事。所谓本事，就是创造力。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就是有创造力的人，也就是有本事的人。具体说来，本事或创造力归根结底是一种“意匠经营”。艺术家的创作需要意匠经营，科学家的发明需要意匠经营，军事家的运筹帷幄需要意匠经营，学术著述需要意匠经营，同样，新闻作品也需要意匠经营。

谈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

学院也好，学界也罢，最缺的就是两类人才，一是新闻理论，二是媒介伦理，特别是新闻理论更是奇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近些年来国内新闻学界几乎一边倒、一窝蜂地捣鼓传播学，甚至每每想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结果老一辈的学者渐渐淡出，而新一代的人才又青黄不接。据说，某所著名的新闻学院近些年连着留下 9 位博士任教，都是搞传播研究的，第 10 位博士留校时承诺做新闻理论，结果刚一进来就转为传播。

在我心目中，新闻理论应该既熔铸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理论的精华，又切合中国新闻传播的实践，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既能获得国际国内学界的普遍认可，又能对实践形成有意义、有价值的指导和启发；既能在逻辑上高度自洽、浑然一体，又能发挥孙子兵法一般的应用功效；既能让青年学子心服口服，又能使一线人员入心入脑——显然，这个目标太宏伟了。郑保卫教授的博士生唐远清，写了一篇学位论文《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提出新闻学走向成熟的四条途径：遵守逻辑规则、坚持学术规范、平衡协调好科学精神与政治原则间的关系、妥善处理好理论抽象与指导实践的关系。这些思路与建议值得重视。

再谈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

读着来信及其思考，仿佛在听着一位学界新秀侃侃而论。虽然有时难免带着某种稚嫩，但锐气、勇气和朝气却是显而易见，恰似万里春光，一路铺洒，挡都挡不住，或如柴翁第一钢琴协奏曲“开场白”，一股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扑面而来。江山代有才人出，不信春光唤不回！

说来也巧，前日刚刚回复一信，其中也谈到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些看法，与你的所思所想和邱老师的一系列告诫不谋而合。比如，许多青年才俊放着学科基本问题不顾，一窝蜂扑向媒介经营、文化产业、网络博客等时兴领域。当然，这些时兴或现实急务自有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但如此风风火火一边倒的局面，特别同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历史、新闻传播业务等领域——即新闻传播学三大支柱相比，恐怕就不是纯粹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意义所能解释的。其实，说白了，“研究”时兴东西有钱有势，有名有利呀。由此说来，单纯责怪学生也有失公允，事实上这些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学界，特别是当下学界的浮躁与急功近利。客观地说，学界的浮躁与急功近利由来已久，并非现在才有的问题。大而言之，近代以来，由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和救亡启蒙的急务，学界始终无法沉静下来，从容治学，“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就是象征。不过，当下学界的浮躁与急功近利，似乎更多还是同权力或权势相勾连的问题。比如，这些年，“经济学帝国主义”之所以甚嚣尘上，单就学术而言，一方面是源于一部分学人居庙堂之高而经世济世的理想（且不论结果如何），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一部分学人那种“学问一讲，黄金万两”的欲望。总之，一个为名，一个为利，急功近利也就由此而来了。然而，如此一来，当今的经济学也就一方面异常火爆，一方面也鲜有建树——除了倒腾一些西方经济学的货色，或者喊一些意识形态的口号与教条，诸如市场化、私有化云云。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来信所谈有关理论的话题，让人想起美国华裔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黄宗智的一段精彩论述，他将理论的“利弊得失”阐述得非常透辟，与你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 理论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但它也能使人堕落。它

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地运用。它既可以使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其简单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使我们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它既可以使我们与中国研究的圈子之外的同行进行对话，也可以使我们接受一些不易察觉但力量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既可以使我们进行广泛的比较，也可以使我们的眼界局限于狭隘的西方中心的或中国中心的观点。对理论的运用将像一次艰难的旅行，其中既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和报偿，也同样布满了陷阱和危险。

为此，我经常提醒你们要有“批判意识”。所谓批判意识，就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不相信成论的态度，其中尤为重要的还是对自己的质疑。其实，这也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神，即对自己的不确信和对他人的不武断。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两个基本常识，一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二是一切事情都不可能十全十美。

总之，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始终是真正的学术、真正的研究所面对的一大矛盾或关系，特别是对新闻传播学这样的学科来说，如何处理这对矛盾和关系，更是每位严肃学人不得不思考、不得不应对、不得不解决的。目前看来，还属马克思处理得最漂亮、最完美。听说清华有位海归教授，办公室挂着一幅马克思画像。或问：为什么？答曰：偶像啊！开学在即，又该给研究生讲“学术基本要素”，第一讲就涉及“问题导向”：一切学术研究的核心都在于“问题”，学术研究的所有工作都应该围绕问题而展开；学问之道，有学有问，如果说兴趣是驱使学术研究的动力，那么问题就是引领学术研究的目标，等等。

人生道路与长征精神

谈到长征和红军精神，觉得最可宝贵的、也是人类精神永恒财富的同样有两点，一点是百折不挠的信念，另一点是无坚不摧的意志。正是这两点，再加上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和天佑红军的神奇命数，才创造了这等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人世间总会有各种各样不如人意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外国有外国的问题，现在有现在的问题，将来有将

来的问题，别指望天上掉下一个大同盛世桃花源。人生在世，本来就是一场永无止息的长征，不是这路敌军，就是那路敌军，不是自然的灾难——雪山草地，就是人间的苦难——围追堵截。只有明确信念、坚定意志，然后一往无前、一路拼杀，也许前面是延安，也许前面只有高台——西路军覆灭之处。不管是中途倒下的，还是最终到达的，这条人生的长征路总得走下去。既然如此，那么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达者知命，就像邓小平说的"跟着走"，最后说不定就走成"总设计师"。总之，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

谈学论道

严耕望先生治学经验与何炳棣先生"读史阅世"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谈的不仅是学问，更是人生；不仅是为学的真谛，更是为人的精髓。如果能把这些东西吃透，并贯彻于人生实践，当能成就有价值的学问和有意义的人生。

你的紧张、压力和苦闷，我都能想象到、体会到。事实上，这也是任何事业必经的过程，用乐圣的话说，"经由苦痛达到欢乐"。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天降大任，必先劳其筋骨。没有万里跋涉、浴血奋战，红军不可能走向最后的胜利。咬紧牙，莫烦恼。至于心情，总得靠自己调节，围追堵截、左冲右突的心情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但只要有抱负、有志向，那么万水千山只等闲，即严先生说的，"第一有抱负"、"第二能自信"。

选题的事情，不必那么焦虑。这个问题得靠水到渠成，不能靠揠苗助长。水到渠成，一切顺利；揠苗助长，处处被动。现在下的各种苦功，都在为你筑渠引水。等把学科的地图搞清楚了、前沿的问题看明白了，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兴趣，自然就能发现适当的题目。何况，一般来说，博士选题怎么也得一年以后才可能有点眉目，刚刚入学，特别是第一学期往往村村起火、寨寨冒烟，哪可能顾及这个问题，所以不必过分焦虑。另外，鉴于你的学术背景，我觉得大众文化问题及其研究似乎不是你的长项，而且这个方面在我看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有点边缘化。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动点心思，这样既把你的经济学和媒介经济学积累调动起来，同时也是国际国内的主流研究。这里所谓主流，不是指那种貌似红得发紫的东西，那种对策性、功利性的

东西，而是具有浓厚学术性、批判性的理论传统。

关于《新闻界》的随想

现在的大学生处于新时期以来的“低谷”，记者同样如此。当下记者许多简直就是“新闻民工”，所以，你们的担忧与迷茫不是没有道理。另一方面也需要明确，记者职业本来就存在艰难、困苦、危险，历经艰辛甚至出生入死本来就是记者天职，正如军人本来就该保家卫国、舍生忘死。范长江对记者的利弊得失概括得好：

> 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像新闻记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一个稍微有能力的记者，在他的旁边，一方面摆着：优越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的虚荣，金钱与物质的享受，温柔美丽的女人，这些力量诱惑他出卖贞操，放弃认识，歪曲真理。另一方面摆着：诽谤、污蔑、冷眼、贫困、软禁、杀头，要确保新闻的正确选择，这些力量强迫他颠倒是非，出卖灵魂。

同时应该看到，目前这种状况不可能一直延续，物极必反，到一定时候当会出现转机，发生逆转。世界是运动的，事物是变化的，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曾几何时，老板还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如今摇身一变成为趋之若鹜的时尚，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梁衡有句座右铭、大白话说得好，能做事的时候就做事，不能做事的时候就积累。所谓积累，不仅是经验、才干、阅历等方面的准备，同时也是一种坚守。如果情况好的时候才做事，情况不好的时候就走人，那么八成也做不成什么像样的事了。比如，“文革”期间时兴“读书无用论”，许多人也是同样迷茫不知所之，以为从此再无出路，就这么浑浑噩噩吧，结果等恢复高考时就傻眼了，而那些坚守者则峰回路转，成为新时期的弄潮儿。

俗话说，大智若愚，不是说装“愚”，而是真愚，是大而化之的愚。相反，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里也是屡见不鲜。人生的大事就得大而化之，不必想得那么多、那么细，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能做事的时候就做事，不能做事的时候就积累，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活的就是一口气，岂能蝇营狗苟、婆婆妈妈、鸡零狗碎、家长里短。至于如今记者的

"不堪",想想范老师当年连黑板报都不能办的情形就释然了,那可是恨不得"如有来生,还做记者"的人啊。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一种理想,一种坚守,一种执著。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新闻理想则另当别论,条条大道通罗马,处处青山埋忠骨,似乎也不必一条道儿走到黑。

所谓"高手"

关于"高手",我在一次会议上细化为四点: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学贯中西的文化底蕴、高超的专业水平(特别是文字功底)和国际化的视野与交往能力。能够兼备这四点,一般来说就基本符合"高手"的标准了。至于现实中找工作是否如意,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不见得"高手"一定能在第一次求职中得到理想的岗位,经历一些曲折或挫折都是正常的。只要是人才,总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不在这里出就在那里出,不在这时出就在那时出,总不会埋没的。所以,不必太在意一时一地的得失,还是风物长宜放眼量。

校园枪案与舆论导向

媒体的力量、舆论的导向实在至关重要,不可小觑。以最近这一起美国校园枪击案为例,就不难看到其舆论导向的"高明"。本来是一起震惊世界的惨烈悲剧,本来应该引起世人对美国社会制度的反思与批判,结果不经意间世人关注的目光又被引向所谓"爱"、"宽容"、"人性"等所谓"普世精神",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再次溜掉了。正如"9·11"发生后,本来应是对其穷兵黩武、胡作非为、草菅人命、横行霸道的"国策"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绝好机会,结果最后居然成为全世界"同仇敌忾"反对所谓恐怖主义的契机,一帮中国文人甚至嚷嚷"今夜我们是美国人"。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在

两部书稿能够得到如此盛赞,惶恐之余也觉欣慰。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的评价,是目前第一家对此的反馈,更使我们不胜欣喜。来信所言"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在",言简意赅,情真意切,确

实概括了我们的一种精神追求，也体现了十几位新闻名家的共同气质。

学问之道，所言极是。如今，“党八股”、“洋八股”泛滥，所谓“学问”有时既不涉及社会民生，也不关乎思想大义，往往装腔作势，莫名其妙，真如《围城》说的“一本正经的无聊，故作高深的浅薄”。窃以为，大家之道除了“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在”，也总是深入浅出，融会贯通，正如一般记者只能使专家明白，而一流的记者则使专家和百姓都明白。小提琴王子帕尔曼说得好：最伟大的演奏也是最简朴的演奏。

中国传播学

“三十而立：中国传播学之未来”圆桌会有一个共识，即传播学或中国传播学毕竟还得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对中国社会及其传播的探究与影响为立身之本，而不是再局限于西方理论的平移和科学方法的操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中国的传播研究如果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不能产生独到而深刻的“思想”，那么它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台湾就是前车之鉴。那里的学者大都受过美国的学术训练，专业理论娴熟，研究方法趋时，然而由于缺乏文化自觉与问题意识，研究的东西往往意义不大，意思不大。现在，国内传播研究也有走向这种歧途的趋势。

这种研究及其趋势实际上是唯美国马首是瞻，以美国的理论、方法和规范强加于中国，而忽略各种传播研究（包括美国和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从而使之沦为某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语及其操练，并美其名曰“普适”云云。香港的许多研究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尽管有些学者也很有名望，常在“国际”期刊（实为美国期刊）上发表文章，但此类东西除了强化美国传播研究的主流话语，并博得某些“洋人”的认可外，事实上对中国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并无多大意义，言者谆谆，听者邈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令人担忧甚至可怕的是，这种研究及其趋势在一片“与国际接轨”（众所周知其实是与美国接轨）的声浪下颇有蔓延之势，特别是对博士生为主体的青年学者影响尤大。如此，则非“中国传播学”之幸事。

针对这种状况，我特意引用了《读书》的一段文字，虽然它说的是“国际关系学”，但差不多可以替换为“中国传播学”：

> 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我国同经济学一样，原是无源之水，既无基础理论，更无自身特色，一向是在新闻学和文史哲的夹缝中苟且偷生的，但近年来时来运转，却突然成了显学，究其原因，不过是靠了“国际”（“传播”）两个字罢了。实际上，国际关系学的处境很是尴尬，专家们的信息来源不如在第一线的新闻记者，在象牙塔中又缺乏其他学科认可的学术规范，学理上很难站住脚，国际上也缺少影响力，只是在炒西方的学术冷饭而已。
>
> 在中国大国地位上升的历史时刻，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却停留在只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货栈的水平上；一门在概念系统和话语系统上全盘西化的学科，其前景着实令人担忧。

说这番话的相蓝欣教授，是《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的作者。本书列入百种书目之“博通类”，并有一段“题解”。

当然，你们现在还无法完全摆脱“学术殖民”的状况，因为通行的学术体制要求必须遵循一系列所谓学科规范和规则，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这些规范与规则也并非毫无意义，相反，用得其所则威力无比。我在发言中打了一个比方，各种“先进”的理论、方法、规范等犹如武器，自然是多多益善，越充足越好，越先进越好，而用它们来解决中国问题则如战役和战果。武器只是武器，并不等于战果，武器是 F-16，是航母，是导弹，而战果是歼灭的对手或敌军。有了先进武器，并不一定就能取胜，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不是照样被伊拉克游击队打得魂飞魄散、望风觳觫吗？没有先进武器也不见得就不能取胜，当年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新四军、志愿军不照样把小日本打回东洋，把美械装备的国军打上小岛，把美国大兵打趴在三八线上吗？同样，甘惜分、王中等“学术土八路”（本人也都是八路出身）在新闻传播学界所取得的赫赫成果，不也是现在多少“海龟”望尘莫及的吗？所以，我们不排斥先进武器，但也不迷信武器，记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说过，战争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作战的根本目的是胜利，“只要胜利，就师出有名”，管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武器，用什么招数。就学术研究而言，人既包括作为研究主体的学者本人，更包括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总之，掌握先进武器是为了作战并取胜，不是为了在阅兵式上显摆，就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批评的，手里一个劲搓着箭，连称“好箭，好箭”，可就是不放出去。如果不能抓住敌人（发现问题）、消灭敌人（解决问题），那么再好的箭也

是白搭，再先进的理论、方法、规范充其量也只是纸上谈兵。

新闻史研究

就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而言，日益面临着一种“战略性调整”。具体说来，涉及三点。一是研究领域的调整，即重点由旧中国转向新中国。旧中国渐行渐远，新中国如日东升，不仅时间与旧中国相埒，如旧中国报业百科全书的《申报》有七十七年，而新中国已经跨过六十，这六十年与当下业界、学界的关系更为密切。二是学科定位的调整，即重心从历史学转向新闻学，明确新闻史学属于新闻学的分支，而不是历史学的分支。历史学指向过去，新闻学指向当下，历史学侧重凝固的事实，新闻学关注生成的实践。三是理论与方法的战略性调整。承认新闻史学属于新闻学而非历史学，那么，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就面临战略性调整，除了延续史家青睐的文史传统，势必更多侧重于政治学、社会学、思想史、国际关系等学科。



翻　译

甘阳在《将错就错》里也说到，现代中国人一遇到西方的东西，一定挑上好的词语，如美利坚、英格兰、法兰西等。如果有谁把 NEGLANG 译出阴格冷，那中国人肯定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了，就像“移鼠”（耶稣）要给人吃耗子药似的。

而同时，凡是亚非拉的东西，那就对不起，尽用些让人恶心的词。比如，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加蓬、毛里塔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让人不由联想起茹毛饮血什么的。

攻取东北的两种战略

同一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谈及“成家”“立业”问题，提出两种战略以开导之。以解放战争的东北战事为例，拿下东北即“成家”“立业”自然是最终目标，但是其间的战略却有两种。一种是毛泽东的，先集中兵力打锦州——相当于建功立业，锦州一破，则东北全境即可传檄而定。另外一种是林彪的，即由长春往南，一路死打硬拼，寸土必争，寸城必

克——相当于各种“实惠”一个不少，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两种战略，孰优孰劣，不言而喻。可惜，许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偏偏就选择林彪的战略而不肯采纳毛泽东的战略。因为，前者保险而后者冒险。所以，肯选后者的多属“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



治学

传播学批判学派是自己曾经热心的领域或话题，由于跟着导师方汉奇而不得不放弃时还曾遗憾，但越到后来越庆幸命运的安排，让自己在学术盛年发生关键性的“转向”，即由他乡转回故乡，由虚空落脚实地。传播学的理论及其研究，固然有意义，也有意思，但问题是太庞杂，太空泛，边界不清，主旨不明，有时看起来热闹，实际上又像一群闲人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所以，除了个别大家、通家的思想启人心智，多数堪称“可怜无补费精神”——既无补于学术与学问，又无补于世道与人心。尤其是，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几乎没有多大意义，除了培养一些传播学博士，有时还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反正，不管主观还是客观，自己现在更关注“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无论理论还是表述，即蒋梦麟一代学者所践行的目标。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当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交锋异常激烈，虽然主流信守“不争论”，但实际的争论一天也不曾停止，而且随着西方势力日益渗透和国内新贵日益坐大，传达其声音并表达其诉求的思想、文化、学术、艺术以及新闻传播等也甚嚣尘上。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此同时，有中国立场、战略眼光、精深研究的学术思想同样日益崛起，特别令人欣慰的是一批70后、80后年轻学人逐渐崭露头角，以其从容自信的文化自觉、开放吐纳的国际视野、不卑不亢的批判意识而隐然显现，成为民族复兴的希望。

从这个角度讲，《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再版适逢其时。眼下，以美国学派、经验研究等为主的著述充斥市场，读者早已“审美疲劳”，所谓“自由多元”的世界越来越简约为单调乏味的一元化声音——“资本主义（美国版）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新闻自由（美国

版）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云云。此时，若出版一套批判传播研究丛书，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思想宏富，视野开阔，人们当会感到耳目一新。

这两天在京郊一处“山庄”开会。房屋凉台对着一片田野平畴，远处有山峦蜿蜒，凌晨之际，时闻鸡鸣，狗吠，鸟啼，颇似“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意境。写完复信，站到凉台，呼吸清秋的气息，眺望清朗的天空，适逢一轮朝阳悄然升起，橘黄色的阳光为大地抹上温暖的、油画般动人的色彩。此情此景，不禁油然想起八十年前，毛主席在井冈山写下的那段激荡人心、富有诗意和预见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画地为牢与突破重围

个人的发展战略是个大问题，战略不当，即使战术再出色也难免被动，甚至失利，故孙子曰“上将伐谋……最下攻城”。只是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其中既关乎世界与中国，又涉及专业与专长。简单说，首先应该确立或明确“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对此建议看看三联书店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一书，由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和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主编。其次，新闻史研究及其史学观已显陈旧，已觉落伍，无法应对大浪淘沙的社会变局和新闻实践，看看人民大学清史学者、梁启超后人杨念群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就知道新闻史内部多么守成，而新闻史外部又多么新锐。最后，所谓“新闻史”是一种画地为牢、自我封闭的圈子，新闻史研究如果不能与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水乳交融，不能与社会历史的广阔背景积极对话，而只是捣鼓历史上以新闻为名发生的人与事，最后恐怕走上穷途末路。细究起来，新闻史属于新闻，而不属于历史。如果属于历史，那么自有历史学者研究，而且研究得更细致、更专业。新闻为何？新闻是社会政治，是影响当下、左右未来的历史实践。总之，必得跳出传统学科的藩篱，突破所谓新闻史的羁绊，以问题意识为主导，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为目标，寻求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

闻鼙鼓而思将帅

惊悉沈苏儒同志去世，不胜感念，望风追悼！此时此刻，忆及与沈老的忘年之交，不由感慨歔欷。记得十年前，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任系主任，不久收到一封从原来任教的学校转来的沈老书信。当时，他刚刚出版了一部新作，其中引用了拙著《传播学引论》的一点资料，于是惠寄一本并附上一封对晚辈勖勉有加的书信，这让我既兴奋，又感动。从此，或电话联系，或书信往还，或带着学生登门拜访，我同沈老一直保持联系。在他的启发和勉励下，我指导的清华研究生也进行了一些中国对外传播的探讨，其间经常蒙他悉心指教。今年9月份外文局准备召开沈苏儒学术研讨会，邀我参加，由于才疏学浅，对外宣了解无多，于是就想谈谈与沈老的交往，以及从中感悟的点点滴滴，为此还找出他写来的书信。后来，会议改期，未能与会，遂成遗憾。为了表达对沈老的悼念，特将2007元旦他的一封来信和自己的回信公开发表，"闻鼙鼓而思将帅"是他对外文局前局长段连城同志的评价，而如今也可用以追怀这位新中国外宣事业的先驱了。原信有个细节，信笺外文局抬头被沈老画上一笔，以示私人通信，不打单位名号。看似不起眼的轻轻一笔，也体现了前辈大家的风范。

一年前，"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研究中心"成立，沈老应中心主任、外文局前局长范敬宜教授邀请前来参加中心成立大会，并出任中心的顾问委员会委员，音容宛在而斯人已去。沈老，走好！

沈老：

拜读来信与大作，不胜欣然与歆慕！您与我们范敬宜院长一样，浩浩然有博雅之气、大家之风，无愧底蕴浑厚、学养精湛的文化人，令后学之辈高山仰止。您为段连成同志《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写的后记，言简意赅，评点精当，同时饱含深情，意韵深长，寥寥几笔即将段连成同志一生的行止与贡献说得非常透彻，"闻鼙鼓而思将帅"，令人感动，更令人深思。

学生最近刚刚完成一部"新闻史"的书稿(《中国新闻社会史》，清华

大学出版社，2009 年新版），其中也谈及段连成同志的作品与著述，您惠寄的材料很有价值，有助于对这部分内容的补充与修改。下面是拙著的片断，不敢劳您费心，只望您知道“革命自有后来人”，在一个纷纷攘攘的时代，依然有人继承你们的事业，沿着你们开辟的道路前行，你们所做的一切不仅融入共和国的历史篇章，而且必将影响、教育和激励一批批的后来人。

受到来信和您多次教诲的启发，我们想在两个方面做些具体工作。其一，新中国“外宣”方面有许多好的传统、好的做法、好的经验，需要认真提炼和总结，上升到系统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层面。正如来信所言，实际工作“需要理论指导的地方还很多，但得不到这样的理论指导”。目前对外宣工作的批评很多，而这些批评固然有一定道理或逻辑，也值得认真反思。不过，总体看来，似乎批评性多了些，建设性少了些，言必称西方的多了些，真正切合中国实际的少了些。这样一来，对实践部门来说至少产生两个结果：要么不屑一顾，我行我素；要么东张西望，无所适从。眼下最需要的其实还是“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让一线人员觉得不仅有用，而且好用。这就需要回到历史，需要怀着敬意与谦卑，从新中国几代“外宣人”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败、光荣与梦想中加以提炼，同时需要从爱泼斯坦、路易·艾黎、段连成、刘尊棋以及您这样的大家高手身上进行开掘，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对外传播学”，就像段连成的《对外传播学初探》、您的《对外传播学概要》一样。我院将成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心”，老范同志亲自牵头。中心成立后，也会将外宣方面的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另外，我准备先让自己的研究生对段连成等人物展开研究（2009 届研究生罗有晗以《记者段连城研究》获得清华大学优秀论文奖），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同时，也部分解决来信所说的大学教育脱离实际的问题——这正是老范同志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如果确立了有关选题，那么届时还得经常麻烦您。

其二，关于建立实习基地的事情，我认为是个很好的建议，我将向老范同志和李希光常务副院长汇报，并将您的来信附上。本来我们正在不断加强同实际部门的联系，并且已在有关媒体建立实习基地。如今，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又增加一个专业方向——“英语新闻采编”（2009 年改为“国际新闻传播”），每年招收十余名学生（现为二三十名），这就更需要外文局等部门的支持和配合。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这个事情也

是一种“双赢”，既有利于学生的培养和就业，也有利于外宣工作的后继有人、长足发展。

（刊于《对外传播》2009 增刊）



外宣问题

2008 年暑假，随俞可平等二十位高校学者考察西部外宣工作，思考了一点问题，并写下一点感想。

近三十年来，在西轻东重的态势下，为了融入西方世界，我们在许多方面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对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东西，包括各种西化思潮和意识形态基本上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而且一忍再忍，似乎觉得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现代化以及相关的现代性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发展问题，在文明形态和国家政治层面上讲首先是一个合法性问题。这种文明或政治的合法性不同于传统的血亲继承、暴力争夺、君权神授等，而必须通过一整套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予以确立。否则，就失去安身立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从而无论政治如何昌明、经济如何发达、社会如何安宁、人民如何富足，都无法摆脱各种非议与攻讦。具体就外宣战线而言，这些年战术上或技术上不断进步，但战略上往往受制于人，做得好是因为听了别人的话，做得不好是因为没听别人的话，久而久之，连自己都越来越相信一些鬼话——所谓“普适价值”。学者强世功讨论香港政制的一段分析，为此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思考：

>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以何等的政治自信，将香港作为通向西方世界的跳板，并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正当性发起了意识形态的挑战……这一代领导人的自信，不是来源于国家的经济实力，而是来源于政治正当性的正义原则，即共产主义信念所支撑的“民主”原则和“平等”原则，由此不仅能凝聚人心，而且始终掌握着话语主导权。可以说，整个“冷战”话语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原则与资本主义阵营的自由原则之间的较量。
>
> 起初，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原则占据了上风，第三世界尤其是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这种“民主”和“平等”原则下展开的，美国因为种族隔离、英国因为殖民统治而丧失了政治正当性。为此，英国步入非殖民化时代，美国为了打赢这场冷战而被迫取消种族隔离，由此六十年代美国兴起的人权运动被称之为“冷战人权”(cold war rights)。在这场“民主”与“自由”对抗的冷战背景下，西方思想家一方面在政治哲学上极力诋毁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民主原则，将民主等同于“多数人暴政”和“极权专制”，从而把所谓英美自由主义推向了神坛；另一方面也对民主原则进行技术化处理，将民主原则等同于代议制选举，并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将“民主”概念变成所谓的“宪政民主”，从而重新夺得了民主话语上的主导权。

改革开放以后，与西方世界努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首先采取了“硬着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并拱手让出了“文化领导权”，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接着又以“不争论”的方式处理政治正当性问题，致使中国政治丧失了政治正当性原则的是非辩论，窒息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侩主义；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受到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的冲击。我们由此陷入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新兴精英阶层在全球化的经济生活中享受短暂的和平和私人的快乐，以一种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主，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界定权和对生活方式的辩护权，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读书》，2009年第2期)

如果不能打破这种“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承认”，不能确立自己的一整套“历史与逻辑高度统一”的话语体系，那么一切外宣工作最终恐怕都难以摆脱被动格局，而只能成为应对他人各种非难的辩护和解释。

新闻观与价值观

赵鼎新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的第二

章和第十二章谈及新闻观及其价值问题。按照他的分析,“中国目前国家与媒体精英(或更广泛地说是知识精英)之间的联盟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缺乏价值基础”,“这种基于利益的认同是很不牢固的,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一旦政治出现变故,这些记者(包括在体制中的得益者)会毫无心理障碍地站到体制的对立面,为政治危机添砖加瓦”。

所以,如何激活中国新闻学的思想活力事关重大,非同小可,因为不仅是为了有机地解释世界、能动地改造世界,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实践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虽然“去政治化的政治”无所不在,包括这些年盛行的所谓专业主义,但是泱泱大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处于价值缺位的状态,新闻传播也不例外。芮必峰教授的博士论文,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恰恰在于高扬“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中国新闻传统及其价值。

顺便说一下,赵鼎新属于“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于复旦,后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现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他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属清华社会学系策划的一套“清华社会学讲义”丛书。

另类的耳目喉舌

作为另类的耳目喉舌,其背后不仅有招商局总裁一类的经济精英,而且更有督抚大员等政治精英和红得发紫的文化精英。他们已经越来越形同一个利益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越来越想主导和主宰中国的未来和改革的方向。这也是毛泽东与邓小平曾经深感忧虑的。从这个意义看,对老人家的一些看似突兀的言行,自然就多一层同情之理解。汪晖说,现实的中国和世界仿佛又回到19世纪,20世纪的一系列革命、解放似乎都没有发生。只看这个强势集团的所作所为,所思所言,不是跟当年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压迫人民大众的“四大家族”如出一辙吗。梁实秋与闻一多对罗隆基的评价,用在这里倒是别有意味:“才高于学,学高于品”(梁实秋),“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骂,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闻一多)。

卡波特的《冷血》

性格是否决定命运不好说，但性格决定习惯应该没有疑问。自己是个急性子，读书习惯也是风扫残云，不求甚解，喜欢的书更是欲罢不能，爱不释手，恨不得一口气读完，否则心思恍惚，坐立不安。印象最深的是叔本华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差不多一周，吃不香，睡不熟，所有空闲时间都在这部书上，躺在床上，趴在沙发，手不释卷，席不暇暖，似乎书里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敲打着心弦，开启着心智，困扰人的世界奥秘仿佛一层层打开，心里一阵阵欣喜，一阵阵悸动，直到合上最后一页，依然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作为纪实作品与新闻经典，《冷血》自然无法同叔本华的哲学名著相提并论，但那种阅读的愉悦和快感却是相通的。卡波特不愧是20世纪美国文豪诺曼·梅勒所称"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冷血》则"韵律天成，字字如金"，诺曼·梅勒的《夜晚的大军》也是同类佳作名作。《冷血》里有许多细节活灵活现，令人过目难忘。比如，两个杀手作案后，四处游荡，穷愁落魄。后来晃荡到中西部，在千里无人烟的公路上徒步跋涉，很想劫持一辆车，再次图财害命。可拦了半天，也没人敢停下。想想看，那种鬼地方遇上一对凶神恶煞的陌路人，吊儿郎当，破衣烂衫，哪个人愿意停下来。最后终于拦住了一辆车，因为司机是个话痨，又独自开了很久，昏昏欲睡。上车后，两个歹徒按照事先约定，一个坐在副驾驶位置，一个坐在司机身后，等副驾驶的家伙发出信号，身后歹徒就下手。没想到，副驾驶同司机聊得上瘾，嘻嘻哈哈，总也不发指令，后座凶手心急火燎，暗自痛骂同伙：司机都是快死之人，你跟他套什么近乎。最后终于要动手了，副驾驶位上的歹徒问司机：

> "再给你猜个谜语：去厕所和去坟墓有什么相似之处？"他咧嘴笑着说，"猜不出来了吧？"
>
> "猜不出来。"
>
> "该去时，就必须得去！"

司机大笑起来。然而，更可笑的还在后面呢，正当凶手即将出手，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凶手事后说这简直是一个"该死的奇迹"：

> 第三位搭便车的人突然出现了，这是一位黑人大兵，善良的推

销员为他停下了车。“喂，太好了！”当他的救命恩人向车子跑来时，司机大声说，“该去时，就必须得去！”

新闻学学位

《博览群书》2010年第3期，刊发贺越明的文章《“历史”与“新闻”的学科归属》。贺越明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的，毕业后接着攻读研究生。文章写道：复旦新闻系“文革”后第一届学生，即所谓“77级”1982年春毕业(78级同年夏季毕业，两级只差半年)，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授的是“文学学士”学位，注明“新闻学专业”。而三年后读完研究生，颁授的又是“法学硕士”。原来，1981年王中先生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的唯一新闻学成员时，新闻学还属于文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在北京开会时，他作了一个发言，要求将新闻学置于法学门类。由于准备充分，讲得有理有据，这个建议得到采纳。于是，贺越明等研究生毕业时，拿的就是法学学位而不再是文学学位了。一次，王中召集研究生谈话，专门解释：

> 新闻是反映事实真实的，而文学是依靠想象和虚构的，还可以夸张，所以新闻学挂靠在文学下面不合适。……我考虑，法学是注重事实的，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记者报导新闻也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所以，就提出划入法学门类好。

可好景不长，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新闻学又被列入文学门类所属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与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和现代汉语并列二级学科。后来几经努力，方汉奇先生任学科评议组成员时，才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仍然属于文学门类，继续颁授文学学位。1982年，王中在一次讲课中还说道：“新闻主要是写事，不是写人的活动尤其是人的内心、思想活动。……最近有人提出新闻要写人，我看有问题，这变成传记文学了，是朱东润研究的。”朱东润当时是复旦中文系的名誉系主任。

与之相似，与此同时，甘惜分先生1985年在兰州大学新闻系的演讲《新闻学与历史学》，同样从注重事实这个角度提出将新闻学挪出文学门类，而置于历史学门类。在他看来，新闻与历史“其实是一家”，“记

者与史学家是一对亲兄弟”。而附属于文学的新闻教育，使学生“天天受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染和熏陶，他们只幻想文学艺术的优势，他们却不懂得或者不去想新闻工作者的巨大优势，不立志把自己锻炼成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请问这样的教育体制对培养新闻工作者不是南辕北辙吗”。最后甘老得出结论：

新闻与历史的关系远比新闻与文学的关系要亲近得多……所以我建议：第一，凡未设新闻系的高等院校中的新闻专业，最好从文学系中分离出来，放在政治系、哲学系、党史系均可，最好放到历史系，以便学习历史理论和中外历史知识。……第二，适当增加新闻专业的历史课程。第三，大学授予学位，如果不能单独授予新闻学学位，也最好不要把新闻学学位归入文学类去，不要授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最好把新闻学归入历史学这一大类中去，授予历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最近两年又把新闻学学位归入法学范围，因为新闻学和政治学（属于法学门类）也有血缘关系，比之把新闻学归入文学一类要好一些。但我以为归入历史学一类更为妥当。

新闻博士

李良荣教授说，现在一些博士生、研究生喜欢玩弄宏大理论，整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而连基本的新闻现象都不懂，既不会读报纸，又不会看电视。他说，好的新闻学子应该能够看出一期报纸上，什么报道好，什么标题不对，原因何在，如何改进，应该贴近新闻实践，针对具体问题开展理论分析。他的这种思路同张文木推崇的第一等学问何其相似——所谓“以事说理”。其实，这也正是“实事求是”的路径，而当今学人和学问恰恰有违甚至远离这个路径。钱钟书的大弟子张隆溪在《书城》第 3 期发表文章，谈到钱钟书对后人的启发，也批评了这种只尚空谈、不重实际的学风：

在系统理论的大旗下，往往从概念到概念，无论几十年前如唯物、唯心、阶级性、人民性那样的老概念，还是近十多二十年来如身份认同、话语霸权、自我殖民等来自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新概念，都很容易脱离文本和现实，变成一套充满抽象概念和术语的

套话、空话。不少人从这样的概念出发，写论文下笔千言，看起来洋洋洒洒，振振有词，其实却脱离实际，虚假空洞。钱先生的著作则与此相反，都始于古代典籍文本的具体细节，有感而发，绝不做空疏的议论。

储安平与浦熙修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第二版)有部《新疆新观察》，收录了新闻名家储安平的《新疆新面貌》和浦熙修的《新疆纪行》。当时，储安平代表《新观察》，浦熙修代表《文汇报》——均为当年响当当的“主流媒体”。两部新闻作品对解放初的新疆，进行了弥足珍贵的即时报道。考虑两位作者后来由于右派问题而作品遭禁，浦熙修虽然平反而储安平下落不明，如今一些论者又总将他们同新中国对立起来，重刊与重读这些文字就愈发珍贵了。

储安平的《新疆新面貌》是1954年到1956年，作者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特派记者身份，深入天山南北采写的系列报道，其间“走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地方”。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些报道的精选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可惜新书刚刚上架，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就成为“大右派”。杨镰在本书代序里写道：

> 《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的22篇报告文学，通过具体的细节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新疆进入和平生产时期的整体状况。认真读过《新疆新面貌》，就知道新疆今天的来之不易。可以说经过60年的历史进程，今天新疆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直射，新疆今后的路径走向，就确立于那个时期。……储安平通过《新疆新面貌》反映的思想观点，当然离不开它的时代，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坚持自己搜集第一手素材，一切来自生活真实。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在《新疆新面貌》之中写到的内容，为那一阶段的历史留下了真切的印记。

浦熙修同属一代名记，抗战时期与三位闻名一时的女记者一道，被称为“四大名旦”——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的夫人，也就是说她是彭德怀的大姨子。当然，最让她青史留名的还在于毛泽东“钦定”的右派身份。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毛泽东亲自修改、标志反右运动拉开大幕的文章将浦熙修列为新闻界的右派代表。由于这份"殊荣"，她的《新疆纪行》同样销声匿迹。这部"新疆新观察"，是浦熙修1951年在新疆宣讲抗美援朝时的新闻作品，连续刊发后产生广泛影响。当时，她是"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成员，也是新疆解放后最早进入新疆采访报道的内地记者之一。1953年，平明出版社将这一组系列报道结集出版，题为《新疆纪行》。读过储安平的《新疆新面貌》和浦熙修的《新疆纪行》后，杨镰归结了一句话："新疆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是切实改善人民生活。新旧新疆的对比线，在于人民生活状况。"

这些作品不仅生动记录了时代变迁，书写了新中国、新社会的焕然气象，而且尽情抒发了"万方奏乐有于田"的历史心声，思想感情与叙事风格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而这些显然不是所谓"违心之论"所能解释的。毋宁说，其中既展现了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社会变迁，又体现着翻身解放的各族人民"手举金杯把赞歌唱"的情怀，亦即一种汇集于、激荡于千万人心中的共鸣。在《在塔里木河下游》一文末尾，储安平以新闻记者的笔触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

> 村子里有好些人都聚拢到我们那一间小屋子里来，安静地并津津有味地旁听着我们的谈话。后来我看到一个有着很长的白胡须的老年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贾马利)，由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扶着，一步一步摸索到我们屋子里来，看样子好像他要和我谈什么似的。大家帮着招呼他从人群里走过来。他的眼睛没有瞎，然而他的眼珠子里发出来的光，就像一个瞎子那样不集中在任何地方。他仿佛是在凝视我，但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有些颤动。他说话也仿佛很困难似的。他说："过去乡保长来，骑大马，拿着鞭，见人先抽几鞭再说。要把我们抓到别的地方去做苦工。现在，再没有打我们的人了。我听说毛主席派了人来问我们好。我看不到毛主席，我要来看看毛主席派来的人。我没有什么话要说，我只是要向毛主席道谢。"他这样说时，忽然一下子扑到地上叩起头来。他那严肃的、诚恳的、老态龙钟的表情，强烈地感动了我。他那忽然的动作一下子使我紧强到极点。我立刻肃穆地跪下来回拜他，亲切地并带着一种晚辈的心情把他扶起来。屋子里所有的人这时也都立了起来。这一带人民在旧时代里所遭遇的侮

辱、灾难和苦楚，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党对毛主席从心底里激发出来的淳朴的恳挚的感激，都在这个肃静的、感人的、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场合中透彻地表达出来了。

无怪乎，储安平的笔下不时流淌出直抒胸臆的文字，按照所谓专业主义标准有违新闻的客观性：

毛主席的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民族政策，这几年来在新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大家融融洽洽，互信互助，的确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这一年中，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去，甚至到最偏僻的小村，当地的兄弟民族都以无比的热情接待我，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给我充分的帮助和照顾。谈谈笑笑，毫不生疏。他们把我看作一个来自祖国的首都、来自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的可敬的远客。(《新疆好地方》)

1955 年 8 月，乌鲁木齐。

多少年代以来，我们的国家一直沉沦在黑暗的、有劲使不出的、近乎瘫痪的境地里，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就像久阴初晴的原野一样，到处阳光焕发，生意蒸长。每个人，每块地方，都在劳动着，创造着。他们既创造财富，又创造历史。阿尔泰山上的战斗只是全国万里战场上的一角；它所缔造的诗篇也只是时代大合唱中的一行。三天山巅所见，使人更加坚信，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必然日趋强大，并将按部就班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在阿尔泰山之巅》)

1955 年 11 月，乌鲁木齐。

惭愧《符号透视》

拙著《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是平生完成的第一项、也是唯一一项所谓“国家项目”。这种许纪霖所谓“课题学术”，感觉就像南方的水牛，前有缰绳牵着鼻子，后有鞭子赶着屁股，不胜别扭和难受。自此以后，不受此等“计划学术”或“规划学术”羁绊，还是做回自己的西域天马，独往独来。另外，完成这项课题之际，正任系主任，头绪纷繁，心绪杂乱，往往忙碌一天，晚上坐下来已经头脑昏昏，眼皮耷拉，哪儿还有多少精力投入思考和写作呢。所以，本书一向被我当作学术生涯的

“滑铁卢”，虽然高人韵士时有谬奖与勖勉，但潜意识里还是不愿意再提，所谓“败军之将，岂敢言勇”。

新闻传播学基础书目

最近邮件系统频繁出错，弄得不知哪封信发走了，哪封信收到了。好在你意识到这个问题，又重发回信，而且终于收到，否则我们就像京剧《三岔口》的情景，互相在黑暗中打着哑拳，你来我往，却互不照面。

你提的意见都很好，我们的许多想法不谋而合。比如，法拉奇的采访记及其续集原在专业类第 14 款。再如，《中国应用电视学》曾经列入，现在听从你的建议再次补入，同时参阅张颂、吴郁老师的大作。《作为话语的新闻》对普通读者可能稍显奇奥，我们的原则是“广泛性、基础性和可读性”，但还是尊重你的意见增加进去了，算作一种新的思路吧。作为基础书目，彼得斯的东西可能太“离奇”，估计大学生看得头大。不过，《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确实不错，值得推荐。至于彭兰的博士论文本来是有的，这篇论文今年荣获“全国百佳博士论文”，也是迄今为止新闻传播学入选的第三篇（2010 年又增加了薛文婷博士的一篇）。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15 讲》

本书是在我们开设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课的基础上形成的。这门课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我们的教学宗旨不在于讲述原典与经典，告诉学生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毛泽东怎么说、邓小平怎么说等。我们认为，这样做不仅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生生不息的活的灵魂，而且实际上也将青年学子距于千里之外。我们希望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个案式讲座，结合具体的、现实的、不同层面的新闻传播话题，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精神进行阐发，使学生既了解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更把握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邀请的各路大家及其背景，本书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理部分，由国内、国外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权威学者承担，第二部分是实践部分，主要由各类主流媒体的行家里手登台，第三部分是管理部分，主要由有关

部门的负责人进行讲解。

主持这门课程的范敬宜老师，是知名的报人或新闻人，一生从事新闻工作，建树大，影响广。他曾任《辽宁日报》记者和副总编辑、国家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出任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另外，范老师还是一位学识淹博的文化人，早年曾在无锡国专读书，受业于唐文治等国学大师，后在圣约翰大学中文系毕业，诗、书、画均享令誉，其《敬宜笔记》一书即由季羡林先生作序。作为范仲淹的嫡孙，最近他又应邀出任新成立的范仲淹研究会会长。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文坛隐然刮起一阵风，唧唧喳喳一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喧腾，年轻学人自是望风披靡。单就字面而言，不管是独立的精神，还是自由的思想，当然都属于好东西，就像当年的咸与维新，如今的改革开放。问题是，何谓自由，何谓独立？古今中外，一切有思想、有创建的人，包括当下卓有建树的学人，不会没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吧，否则，那些思想、那些创建从何而来呢。那么，眼下吵吵自由独立什么的，又有什么意义呢？积极意义自不待言，而有一点不便挑明的，就是为思想变节、精神投靠寻求貌似合情合理的心理安慰，恰如古代文人雅士打算弃暗投明时爱说良禽择木而栖云云。与之相应，还有“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等，言外之意，读书人有三六九等，其中最高级的一等曰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独立、自由的典范——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需要自我标榜的，我们可曾听过鲁迅先生、傅雷先生、钱钟书先生这么标榜吗。而嚷嚷独立自由的文人雅士，倒是自觉不自觉地显示了另外一种精神的驯化，思想的景从。因为，所谓独立只是相对于华夏核心价值体系的独立，而不是相对于美国独立宣言的独立；而所谓自由也是相对于中国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自由，而不是相对于法国人权宣言的自由。陈寅恪先生力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是有感西潮滚滚，中国人的精神与思想越来越失去自我而言的。可惜先生播下的是龙种，没想到如今收获的多是跳蚤。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大作关于"修辞立其诚"、如今"分心"者多而"动情"者少、当代文坛更重"怎样写"而轻视"写什么"等意见，我都深以为然，我理解你的批评是针对重技术而轻文化的世风。

本学期最后一课上，我也对此有所指摘。我颇不习惯的一点，是那种慌慌张张、跌跌撞撞的世态人心，一天到晚，失魂落魄，一年到头，一地鸡毛。学界层出不穷的"改天换地"神话也不胜其烦，什么 WTO 了，什么产业了，什么融合了，什么自媒体、全媒体，人人都是记者了……概念一个比一个新，预言一个比一个猛，好像从此天不是天，地不是地，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好像太阳不再升起，月亮不再落下，老板不再算计，霸权不再嚣张。资本、技术及其召唤的媒体与文人，仿佛不把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变成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就不肯罢休似的

元旦前夜，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一场新年音乐会，莫斯科爱乐乐团演出，上半场为德、法、意等作曲家作品，下半场全是俄罗斯作品——自然而然而又颇堪玩味的安排。其间演奏了两首中国乐曲，一是开场的《红旗颂》，一是返场的《北京喜讯到边寨》，皆前三十年经典。眼下物质发达了，而此类作品却日渐稀少，若多一些元气淋漓、生气洋溢的佳作，多一些《梁山伯与祝英台》、《嘎达梅林》、《瑶族舞曲》等艺术精品，当比什么传播都更有效果，比什么软实力都更有力。也许，当今之世志不在此，人人忙不迭地织围脖呢。或曰，先秦有诗经、楚辞，魏晋有古诗、世说，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元有散曲，明清有小说，现代有鲁郭茅、巴老曹，而当今只剩段子、短信、微博了。这些东西可以消遣娱乐，而不可能支撑民族复兴的伟业，正如不可能巴望沙滩上起高楼。所以，文化自觉与文化建设才是未来的"第一要务"。

当代中国文化及其建设主要包括三大有机构成，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哲学思想以及学术理论，二是以中华文明与中国革命为骨架的历史叙事，三是以熔铸古今中外一切精神遗产为血肉的艺术作品。所谓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该着力于此，优秀的文化不是钱堆出来的，也不是抖机灵玩出来的，而是用心用命用灵魂创造出来的，就像刚刚辞世的史铁生。

谈 逸 兴

生存与死亡

见到来信，正值“五一”长假，欢喜异常，就当是这个节日的一份礼物。今年这个假期特别长，有九天，都超过春节了。平日忙忙碌碌，疲于奔命，猛地消停下来似乎不知该做什么了。也许，这就是现代人的共同宿命吧，即只管朝着未来、朝着明天狂奔而去，至于未来与明天是什么则不必管它，反正只管把当下此刻的生命时空填满。所以，看到“我为什么而活”时，怎不悚然而惊呢。

昨晚在校园散步，还不由思索类似问题。其间，想到老托尔斯泰的中篇《伊凡·伊里奇之死》——一部反思人生意义的名作，继而又想到加缪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其开篇就是一句石破天惊的名言——“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细细琢磨，他为什么把自杀提到如此高度呢？加缪不是在推崇自杀，更不是在鼓励自杀，尽管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加缪对人生及其荒诞往往表现出一种悲剧性的体悟。按照粗浅理解，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只有当人们面对自杀之际，才可能真正严肃地思考“我为什么而活”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永恒的，换言之就是永远无解的。中国古代诗人对此感触颇多——“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等。

闲话游泳

傍晚游泳，秋雨似停非停，偌大游泳池没几个人，池水清盈泛绿，柔波绵延舒展，人如一叶扁舟在水面轻快滑行，直如张孝祥《念奴娇·过

洞庭》所言，“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游泳不仅是一种优美、文雅的身心运动，而且更是一种触及本源的精神修炼。畅游中会觉得自己就像一条鱼，轻盈，流畅，无拘无束。特别是夏天，击水户外，仰望无垠蓝天，呼吸自然气息，与天地融通，与万物为伍，比空谈什么大道理都更让人心灵超迈。

追慕贝多芬

意大利之行，让人艳羡。记得曾经写过一段文字，对比意大利与德意志。前者傍着地中海，海风吹拂，阳光明媚，于是在意大利的精神与文化传统中，涂抹了一丝亮丽明朗的光彩。后者邻着阴冷幽暗的北欧，感觉终日不见阳光，不是雾霭留连，就是朔风凛冽，于是德国文化总不免有点阴郁气，包括享誉世界的音乐与哲学。这都是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随便举个反证，就足以推翻如此滔滔之论。以贝多芬而论，他固然有“命运”一类沉郁之作，可也不乏明亮欢欣的乐章，如《第七交响乐》，尤其是第四乐章，更是载欣载奔，就像一路唱着、跳着，甚至手脚劈叉拿大顶，连滚带爬，简直比酒徒狂欢节还闹腾。怨不得萧伯纳在名篇《贝多芬百年祭》里说，这是让“最黑最黑的音乐家玩儿命跳下去的舞蹈”，与之相比，再“火爆”的黑人音乐听起来都如同《少女的祈祷》。

琴声叮咚　思绪缥缈

喜欢钢琴音色，纯净圣洁，仿佛仙境不染尘埃。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中钢琴弹奏的“鳟鱼”主题，直把人的身心都淘洗干净了。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一开始飞流而下的琴音，更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甚至喜欢钢琴演奏的“梁祝”。原来有一盘CD，就是钢琴协奏曲“黄河”和“梁祝”，结果有次上课给弄丢了，一直耿耿于怀。

音乐与美文

现在的许多东西固然热闹、时尚，但总感到缺乏一点精神品位与文化含量。晚上散步去学院，路上想起《红旗颂》。这样的作品给予人的

精神享受和思想启迪，是无法言表的。它会让人联想起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著名碑文，联想起成千上万的先烈前赴后继的伟烈壮举，油然而生“民族复兴的使命感”！一些学生的文字结结巴巴、啰啰唆唆，在我看来，八成也是因为不通音律。好文章一读就能感觉出来，就像好音乐一听就能沁人心脾。

忧郁与明朗

春节期间，看了一部反映新疆解放的 20 集连续剧《苍茫天山》，昨天晚上刚刚落幕。作品实在一般，可还是看完了，不为别的，就为心里的家乡，更为那些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牺牲的英烈。既然是他们的子孙，自然有义务让他们为之奋斗、直至牺牲生命的伟业永世长存，好比林肯在 Gettysburg 战场发下的庄严誓词：

> It is for us the living, rather, to be dedicated here to the un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who fought here have thus far so nobly advanced.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永世长存)。

忧郁与明朗看似矛盾，却都是值得欣赏的精神气质。忧郁可以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为代表，明朗则以贝多芬为典范。柴可夫斯基的六部交响乐全像林妹妹一样，心事重重，郁郁寡欢，而被老托尔斯泰称为俄罗斯灵魂之象征的“如歌的行板”，更是如泣如诉，泣不成声。相反，贝多芬作品则如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少年英雄，英风飒飒，豪情漾漾，即从巴峡向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一路欢歌，天清气朗。特别是他的“英雄”、“命运”、“田园”、“合唱”等交响乐，以及历史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春天奏鸣曲”等，无不生机勃勃，生意盎然。如“春天奏鸣曲”，既是春天和自然的礼赞，更是生命和爱情的欢歌，乍

惊乍喜之情仿佛杜丽娘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至于"英雄交响曲"，则是我最喜欢音乐家的最喜欢作品，"戎马半生"不知听过多少遍，特别是第一乐章那排山倒海、一往无前的进军号角，使人不禁想起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话：听着贝多芬的音乐，我的勇气永远不竭！也许忧郁更指向内在精神层面，明朗更指向外在社会层面。个体生命永远是孤独的、忧郁的，即使伟大如毛泽东同样如此，所谓"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而明朗则往往同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历史运动等丰功伟业联系在一起，贝多芬的"英雄"本来就是献给拿破仑的，是由法国大革命的时代精神所激发的。

音乐及其时代

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是自己钟爱的作品，莫蒙爷爷的形象更是令人难忘。这位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有许多大智若愚的至理名言，比如"跟驴子没法说清楚它是一头驴子"等。关于老歌，同意你的基本判断，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80年代这个所谓"物质贫瘠"的时代，产生了新中国至醇至美的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如"梁祝"、"长征组歌"、"东方红"、钢琴协奏曲"黄河"、"嘎达梅林"、"红旗颂"、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以及举不胜举的歌曲，像现在依然经常演唱的"我的祖国"、"歌唱祖国"、"英雄赞歌"等。音乐是时代的心声，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确是千古名言。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时代变了，心声自然也就跟着变了，"长江之歌"遂成绝唱，取而代之的就是邓丽君（连名字都带着三四十年代大上海的香艳味、脂粉气）、超级女声等。如果说之前的音乐是一种精神的体现，那么之后就越来越成为各种欲望的宣泄了。

至于新疆，从来都是歌舞之乡。按照地缘政治学的惯常说法，这里乃国际政治的中心。故曰得中亚者得欧亚，得欧亚者得天下。美国虽然偏处一隅，但一直想方设法控制欧亚。所以，新疆以及整个中亚自古以来都是四战之地，兵家必争。左中堂抬棺远征，视死如归，必欲收复新疆，显然比李中堂高出一筹。毛泽东下令解放大军挥师西进，屯垦戍边，拱卫新中国，也属千秋伟业。正因如此，自古以来新疆也就成为各种文明汇聚冲荡的中心，甚至新中国56个民族倒有47个在新疆。于是，民族融合，文明杂糅，斑驳陆离，眼花缭乱，以致英国史学家汤因比

希望转世托生新疆。为此，中国新疆乃至整个西域、中亚地区的歌舞素以多姿多彩、缤纷绚丽著称，远的如哈萨克的民族史诗《玛纳斯》，近的如王洛宾改编的一系列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掀起你的盖头来》、《半个月亮爬上来》等都是例证。雷蕾的父亲雷镇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所谱的几首插曲，根据锡伯族民歌改编的《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等，都大量吸取西域的音乐素材，从而脍炙人口，流传不衰。来信所提的《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在新疆音乐百花园里只是一支寻常的小花。

假期得空看了一部电视剧《暗算》。全剧三部，分述193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我方谍报机关与敌周旋、斗智斗勇的故事，均属“激情燃烧的岁月”，歌颂了一群为信仰、为国家赴汤蹈火的忠勇之士。片中的音乐低回婉转，一咏三叹，似乎一直揪着人的心绪，其中最后一部的最后一集在英雄逝去、时空交错的画面里，一点点升起《国际歌》的歌声，将全剧的悲剧情绪推向高潮。剧情故事一波三折，惊心动魄，演员表演可圈可点，最吸引人的还是台词，中文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许多都像书面语，仿佛文绉绉的，但经过演员的出色演绎，却感觉非常自然、非常优美、非常动人，比如“全世界的黑暗都不足以影响一根蜡烛的光辉”。也难怪，此剧是根据麦家的茅盾文学奖作品改编的。

除此之外，就是备备课，看看书了。最近又新买了一批书，包括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三联)、台湾史学家许倬云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商务)、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名作《启蒙辩证法》(上海世纪)和斯沃茨的《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等。朱苏力以“梁祝”故事为素材，分析古代婚姻制度、社会习俗等，别开生面，饶有意趣。弗里德曼的东西对我这号经济学外行，也多少有点启蒙和启发，不过总觉得这等马克思眼里的“庸俗经济学家”在敞显某些问题之际，是不是也在遮蔽真正的问题，比如剥削、压迫等。霍克海默、布尔迪厄等自然也是分析大众文化的经典，不待仆一二言也。许倬云的中国大历史看上去气魄宏大，眼界开阔，不同于中规中矩的一般历史教科书，其中也谈到明清人口激增，得力于美洲引进的玉米、番薯、土豆等易植高产作物，这些作物最早

都在福建、广州栽种。

音乐与读书

这两天过节，闲着无事，整理了一批喜欢的小雅音乐。所谓小雅，自然不包括“大雅”，如贝多芬、“梁祝”等。刚才去学院，一路冷清，园子里也快成了《光荣与梦想》里说的“人弃鬼居”了。于是，路上想着有闲之后，将来也“不务正业”，给学生开门音乐欣赏课。当然，这个想法也非风花雪月之属，事实上，如果没有文化修养（包括音乐修养），而满脑子都是刘德华、周杰伦等，也很难指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以这里所选的作品为例，其中不独是精神的愉悦和美感的熏陶，同时更包含着时代的“心声”、人民的“心声”。比如，《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既在音乐美学上达到简洁流畅，又那么传神地抒写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之爱国豪情，正是这种豪情激励着钱学森奔回祖国，激励着范敬宜奔向白山黑水。再如，马思聪的《思乡曲》，千回百转，肝肠寸断，而其意境与李白的《静夜思》何其相似。

节前把博士召集起来聊天——也算“指导”，其间谈了2007年几部好书。理论方面，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名不虚传，它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均问世于二战后期，均对当代世界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不过两者思路完全对立。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最初颇受哈耶克左右，1990年代哈耶克之辈红得发紫，下岗、三农、血汗工厂等纷纷随之而来，而抵抗这套弱肉强食理论及其趋势的一大利器就是波兰尼的《大转型》——“自由市场制度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和环境代价”（波兰尼）。如果说波兰尼的著作是国际难得一遇的大作，那么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则是国内难得一遇的佳作。它不仅对现代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融会贯通的讲解，而且通俗易懂，举重若轻，很少同类著作的八股腔。历史方面，以奇人沈志华的《中苏关系史纲》和明史专家陈梧桐的《明史十讲》最好。前者以大量一手解密档案为基础，对20世纪的中苏关系做了细致阐述，将中国革命的历史置于东亚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下剖析，许多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后者虽然只是谈一个朝代，但对当下许多唐突历史的风气也不无反拨，其中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方法尤其出色。比如，现在坊间一些戏说明朝的东西，把农民起义军都写得那么暴戾恣睢，而《明史十讲》则

做了令人信服的公允分析。文学方面，印象颇深的有铁凝的《笨花》，一部类似《白鹿原》的作品。专业方面，徐泓老师的《大人物·小人物》最令人难忘。比如，她写的几位侄甥辈孩子——“小人物”，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同样风格的著述还有赵毅衡写胡适那批留学生的《彼岸的诱惑》、吴迪给老外讲中国电影的《中西风马牛》等，每每令人悠然会心，忍俊不禁。

小雅音乐

这些小雅作品牵连的是故国情思与乡土情怀，如同庄稼一般植根于大地，故有绵绵不绝的生命力。实际上，世间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无不“来自泥土，归于泥土”。所以，人们对乡土的眷恋，乃是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眷恋。令当代“自由分子”大伤脑筋的德国思想家施米特，也是从这个角度精辟阐述了所谓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如“游击队理论”。

过年几天快成音乐“发烧友”了，而且一发不可收，弄完中国，又弄外国，最后优中选优确定了50首小雅作品。其中一些作品神往已久，而一直无缘接触。比如，为了一张《马赛曲》CD，多次托人去巴黎，居然空手而还。再如，《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也曾多方寻觅，同样是四处茫茫皆不见。另外，即使一些作品手头不缺，但散布于各种CD，想听一部中意的作品，不得不捎带一堆不感兴趣的东西。此次挑选作品的经验再次说明还得自力更生，只有自力更生，才有真正的独立与自由啊。顺便说一下，《志愿军战歌》的词作者是位连指导员，同曲作者、现任文联主席周巍峙均为山东人，而周巍峙的夫人就是著名歌唱家王昆。

有这等音乐相伴，即使每日粗茶淡饭、破衣烂衫也一样其乐无穷。事实上，当年在农村，穿得那么简朴，吃得那么简单，干得又那么辛苦，可一天到晚那么快活，其中一大原因就在于这些美不胜收的音乐。比如，当时特别打动人的电影《创业》插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富有内涵，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铁人精神”——“越苦越累心越甜”。

再谈小雅

春节几日当了一把音乐“发烧友”，直到今天才开始“退烧”。从中国到外国，将自己喜欢的小雅作品几乎横扫一通，并整出一个排行榜。

所谓小雅，是针对贝多芬、“梁祝”等大雅而言的。这个排行榜虽然难免个人偏爱，但也相信或自信中外小雅的一流作品差不多一网打尽了。

马思聪的《思乡曲》不用多说了，一流佳作，可以入选华人音乐的“十佳”。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等插曲同样如此，而《冰山上的来客》似以《高原之歌》为首选，可惜没有找到，退而求其次——《怀念战友》。《娘子军连歌》找到一张 Flash 版，配上画面更为动人，尤其娘子军的军容与现代女军人的英姿前后映照，别有一番韵味。《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有两个版本，一是钢琴曲，一是管弦乐，无不出神入化，无不美妙绝伦。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最后用一段女声哼唱代替伴奏，与男声彼此呼应，也是妙不可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属于少数“五星级”作品，这样的作品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其中蕴涵着中华民族一百年英勇卓绝的历史，熔铸着千百万仁人志士的满腔热血。昨晚去学院，在空荡荡的大楼里将音响开到最大，以尽情领略铁流滚滚、一往无前的气势。听着这样的浩荡音乐，哪怕不知道国军、共军，不在乎黑暗、光明，也能懂得摧枯拉朽的含义。仅用二十分钟便一挥而就的《志愿军战歌》犹如中国版《马赛曲》，传神地体现了时代的心声、人民的心声或曰“天意”。“文革”期间出版了一套颇有影响的歌曲集，名为《战地新歌》，起初只出一本，后来又出“续集”，再后来则干脆按编号一直出到大概第六集。有的“战地新歌”既是名作，也是经典，《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即是其一。另外，《赶圩归来啊哩哩》、《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也是同时期的佳作。同样，《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青春舞曲》、《瑶族舞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等作品，都吸收了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属于民族音乐的极品。蒙古民歌《嘎达梅林》，通过作曲家辛沪光(即三宝母亲)在交响诗《嘎达梅林》中的精彩演绎，已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的主题音型，则借鉴锡伯族最流行的一首民歌的元素，朴素自然，优美流畅。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以精神为旗帜，那么后毛时代则以欲望为号召。音乐等艺术之花多在精神的雨露中缤纷绽放，所以这里的小雅精品多属烽烟滚滚唱英雄的时代，至于新时期只能勉强挑出《乡恋》、《话说长江》、《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等。《话说长江》不妨说是以前时代的袅袅余音，《乡恋》则开始显露“邓丽君”似的香艳气、脂粉味。王立平的《太行颂》也属新时期难得的佳作，从作品到演唱都是一派大家风范。可惜的是，以演唱《太行颂》、《太阳岛上》等闻名的太行子弟关贵敏，后来成为“法轮功”信徒。某日，接到

“法轮功”电话，先播放一段他的演唱录音，接着是一通说教。好好的歌唱家也被弄得五迷三道，实在出人意料。外国小雅有一首没能找到，即罗萨斯《乘风破浪圆舞曲》。

郁郁寡欢之际，听听这些旋律，心情就会格外舒畅，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说过，听着贝多芬，他的勇气永远不竭。同样，听着这样的音乐，也会感到生命如春水浩荡，永远奔腾！

中外大雅排行榜（20 部）

古曲《阳关三叠》
管弦乐曲《春江花月夜》
冼星海《黄河大合唱》
晨耕、生茂、唐诃、遇秋《长征组歌》
何占豪、陈钢《梁山伯与祝英台》
辛沪光《嘎达梅林》
吕其明《红旗颂》
舞剧《红色娘子军》
歌剧《洪湖赤卫队》
现代京剧《杜鹃山》
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
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
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
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
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
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
柴可夫斯基舞剧《天鹅湖》

音乐与时代

歌曲《国家》据说广受好评。然而，不出所料，听后颇感失望。虽然

创作阵容庞大(艺术如同思想,灵魂在于独创),也用心良苦,但从音乐或文化的角度看,实在不敢恭维,可谓词不成韵,曲不成调,既无激荡人心之气势,又无扶摇而上之境界。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听听《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等,境界高下立见。

无可奈何花落去。一个世俗、庸俗的时代看来真的到来了,美国式的市侩状态越来越成为地球人的通病,指望这种时代再产生文化杰作似不现实。昨天,“冰点”又发精英的陈词滥调,大谈五四精神,由此也知道何谓“精神侏儒”,尤其与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等五四演讲相比。高调出台的影片《南京! 南京!》遭到质疑,再次显示了文化精神的孱弱和混乱。相反,《铁人》等作品让人重新领略亿万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精神气局,这种气局也体现于何建明的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这里的部长指大庆会战总指挥、独臂将军余秋里,1980 年代受所谓“渤海二号”影响的核心人物。好在随着各路当事人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人们终于开始重新审视一切。林肯说得好,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谁也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大小右派认为,毛泽东欺骗了全国人民,而当全国人民始终怀念他、敬佩他时,他们又认为是毛泽东骗术太高,天下人一直被蒙蔽。毛泽东研究权威萧延中教授对此颇不以为然,故作无知地说:我认真想一想,觉得这么说好像没有道理。确实,右派掌握了那么强大的话语权,怎么就欺骗或糊弄不了天下老百姓呢,看来问题真不在此。

再谈音乐与时代

经典的音乐如同其他艺术作品,总是一个时代的心声和写照,《歌唱祖国》更不例外。特别欣赏“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淋漓尽致地表达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向往光明,争取独立自由的不屈不挠意志。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屏息凝神倾听这样的音乐,由此不难触摸一个民族的灵魂。民国时的国防大学校长蒋百里将军有句话说得好,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之调整政策也是可能的,但是,屈服一个伟大民族争自由、求解放的意志,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毛泽东一生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律令。

他一向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个命题得适当限定，如卑贱者往往最聪明，高贵者有时最愚蠢等。毛泽东研究权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认为，小看毛泽东的人，不是他小，而是你小。此话同样适用于贬损周恩来的人。先被收买后被神秘暗杀的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也写过一本类似玩意儿，在逐腥觅臊者看来，俨然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其实一文不值。

贫家子弟的升学比例问题，已经非常明显、普遍，清华就是一例。如果说近三十年来，人口比例已经构成一大社会隐患的话，那么贫家子弟升学越来越低则属于另一社会问题，后患无穷。当然，现在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认识，而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最近，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的新作《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其中对此做了深入细致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如对新右派（即所谓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由派代表了新兴富裕阶级的利益，而新左派则代表了工人、农民的利益。"该书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政治与社会译丛"第二辑，第一辑里的《大转型》属于博士生的必读书。

音乐的三种境界

刚读了《中国作家》第1期的作品《伴宴》，背景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世相，一民乐团为了生存，不得不为豪富名流觥筹交错之际弹琴鸣弦发清商。这种情形本已凄楚悲凉，斯文扫地，更不堪的是富豪女出高价，非点乐团技艺高妙而遗世独立从不伴宴的"角儿"，为其宴会演奏，同时安排角儿的总角之亲、被自己收为夫君的男子到场，以示有钱能使鬼推磨。作品以音乐或民乐为主题，审视了现代文明现代人的生存及意义。其中谈到音乐的三种境界——声、音、韵，今人只听"声"，不知"音"，更不用说用心品味的"音韵"。当年敝衣褴衫，生活清贫，生活于乡野天籁之间，偶然听到飘过的一段"音韵"，即使五音不全，断断续续，也每每使人长歌当哭，远望当归。如今西装革履，正襟危坐于包间雅座，却昏昏然、木木然，心如枯井，波澜不惊。正如作品写的："粗心一点听，所有的曲子都是驾轻就熟、流丽婉转的，可是他知道，那早已不是音乐了，只是一堆声音。"确实，社会越来越"发达"，技术越来越"先进"，音响越来越"高级"，但"音"乐和神"韵"也越来越远逝。这同

所谈“古今之学”及其命运，岂不若合一契：研究经费越来越充裕，研究手段越来越现代，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可学问的“心音”和“神韵”越来越消散，似乎只见汹涌澎湃、此起彼伏、你争我夺的学术“话语”，所谓“一堆声音”——呕哑嘲哳，但为稻粱。

欣赏小雅

几首小雅，百听不厌。《饮酒歌》的开怀，《卡林卡》的奔放，“伏尔加”的雄浑，“歌之翼”的深情等，无不令人留恋徘徊，世上竟有这等美妙神奇的东西，真是不可思议。买书读书讲究版本，同样的东西，不同的版本，常有天壤之别。音乐更是如此，因为需要经过乐队、指挥的“再演绎”过程。比如，“长征组歌”得听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版本，“贝九”自然是卡拉扬的版本，而“伏尔加”最好是“苏军红旗歌舞团”的版本，那真是浩浩汤汤，一泻千里，波澜壮阔，势不可当，而中央乐团的版本略显疲软，深沉有余，气势不足。

来自泥土，归于泥土

此生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古今中外的诗人即一切富有生命感的人，心灵深处都是还乡的。乡土、乡村、土地等，既是生命有机体及其新陈代谢的依托——没见过谁吃钢筋水泥新媒体的，更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来自泥土，归于泥土。

军旅之歌

劼人帮着搜罗了一大批经典名曲，包括烽火年代的“英雄之歌”，如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周巍峙的《志愿军军歌》、郑律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以及法国大革命年代的《马赛曲》、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等。许多德国古典哲人，都从形而上学的角度阐发了军旅对人生的意义。简言之，军旅不仅仅是保家卫国，而且还是一种不同凡响的人生。古往今来，诗人们歌咏最多的主题，一是爱情，如宋词，一是军旅，如唐诗。如果说前者是人生的至美之境，那么后者就是人生的大美之境。现代第一诗人毛泽东的多数诗作都围绕军旅，其间固然与他的革命生

涯有关，但也体现了一代伟人吞吐宇宙的博大情怀。一山飞峙大江边，红军不怕远征难，百万雄师过大江，遍地英雄下夕烟。当然，具体到实际情况，部队并非世外桃源，同样存在各种问题。但借用列宁的一句名言，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的高度。

附件的几首军旅名曲中，《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属于人民海军。今天在书店，看到一本谈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的新书，心想现在捣鼓晚清和民国成为时尚，从学术兴趣讲固然无可置喙，只是觉得与其翻腾旧中国丢人现眼的旧账，何如好好研究新中国的傲然崛起。当然，有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通过翻腾旧账而“开历史倒车”，倒回民国，倒回晚清，否定“伟大的中国革命”（费正清），进而否定中国道路。对此，咱们也应该理解和包容，一个强大而自信的国家是允许“痴心妄想”、“异想天开”的。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如“两弹一星”元勋。而人文社会科学更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人文关怀。最近，美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去世，国际学界为之痛惜哀悼。亨廷顿的学问自然非比一般，故赢得世人高度评价。然而，媒体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有意忽略，不提亨廷顿终其一生都是铁杆儿的爱国者，美国制度的捍卫者，美国精神的宣扬者，美国社会的推崇者。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而这恰恰是那些自由文人无法企及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三种生活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如果说人有三种生活——现实生活、理想生活和精神生活，那么，学问就是自己的现实生活，学生则代表未来的理想生活，而音乐或艺术就是精神生活了。

这组小雅作品以“草原英雄小姐妹”最动听，“瑶族舞曲”、“青春舞曲”等也百听不厌。在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放给老父亲听，老人家近乎失聪，不得不把音量调到最大，靠近耳畔，这位当年“一野”老兵的脸上立刻浮出一丝喜悦。那一往无前的音乐洪流，不仅体现着人民军队无往不胜的精神，而且也象征着中华民族无坚不摧的意志。略觉遗憾的是，锡伯族民歌《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本是一曲朴实、欢快、自然、清新的名作，结果被“黑鸭子”演绎得有点不伦不类。这些作品既是新中国最美的精神创造，也是近代以来中国音乐最出色的篇章，同时更是世界音乐百花园里毫不逊色的奇葩。

外国小雅以《马赛曲》和《军队进行曲》最富美感和内涵。毛泽东《实践论》里有两句名言：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真正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真正感觉它。早年听《马赛曲》，觉得是近代一切革命中最有英雄气概和精神蕴涵的作品，尤其对比美国独立战争中问世的《杨基歌》，即 VOA 的开始曲，一个像凤凰，一个像乌鸦。为什么？当时只有朦胧的感觉，而不能理解，更不能解释。如今，对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历史意味有了一定理解，再来回味这两首同类而不同趣的作品，就能深刻感觉其中的不同境界了。简言之，法国革命是近代世界最伟大的人民革命，其核心精神是自由、平等、博爱，即《共产党宣言》阐释和揭示的历史意味：代替那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将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所谓美国革命不过是一帮商人、富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而进行的利益之争，既说不上正义与非正义，更谈不上什么崇高与神圣。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马赛曲》何以诗意盎然，正气凛然，二百多年来一直激荡人心——人民之心，至于《杨基歌》却像小阿飞哼唱的、流里流气的玩意儿，怨不得遭到当年英国正规军的嘲笑。

也许，千年之后，一切灰飞烟灭，留存世间的还是这些美不胜收的作品，后人说不定也以这样的作品感悟今天的精神和时代的气质，就像我们通过唐诗宋词进入先人的精神世界一样。

《长征组歌》

由于看王树增《长征》，又听了《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这部 20 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也是《黄河大合唱》之后最杰出的合唱作品。词作者萧华，长征开始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才十八九岁，在最惨烈的湘江之战中担任后卫，1955 年授上将军衔时刚三十出头，是共和国最年轻的上将（上有十员大将和十大元帅），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伟大音乐往往都是历史的回声和时代的心声，《黄河大合唱》如此，《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同样如此。如果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是亿万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就不可能有“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怒吼。同样，如果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般长征，也就不可能有如此元气淋漓、精神充沛的音乐

作品。

古人讲究“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礼崩”“乐坏”往往相提并论。今人似乎对此并无深切洞悉，故将音乐仅仅视为个人消遣或娱乐。其实，一个时代的音乐就是一个时代的表征，从潜意识里塑造人的精神气局。以所谓“流行音乐”为代表的东西，只能表征一种饮食男女、“蝇营狗苟”的生活，被这种氛围所笼罩的人生，也只剩小悲小喜、小情小调，而难有更高远、更阔大的气局。

《东方红》

现在已不是大江东去的史诗时代，而是小桥流水的抒情诗时代。若论经典，还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是百年中国历史风云的心灵激荡，是亿万人民争自由、求解放的精神飞扬，同时也是周总理和众多“人民艺术家”的生命交响。最近，有关部门组织了15场大型庆典活动，今晚看了其中《百团万人颂中华》音乐会，汇集了全国一百多个合唱团，一万余人，在水立方演出。昨天看了教育部、重庆市委等部门合办的国庆音乐会，两场音乐会都有合唱《东方红》，气冲霄汉，响遏行云，让人感叹经典毕竟是经典。

《阿诗玛》

《阿诗玛》及其音乐是新中国最值得骄傲的艺术成就之一，体现了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前进方向，即世界的、民族的、大众的。作为民间传说，阿诗玛的故事已在撒尼人中流传多年，美丽的阿诗玛与英雄的阿黑哥既是撒尼人的骄傲，也是古往今来一切人民生活及其艺术追寻向往的人生境界，诸如西北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陕北的《三十里铺》、江西的《十送红军》等数不胜数的歌声舞姿，无不蕴含着这种美丽动人而痛彻心扉的情愫。五六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感召下，许多艺术家深入生活，深入民间，发掘、创作了大量富有生活气息和生命元气的作品，留下至今熠熠发光的经典。比如，上海音乐学院何占豪、陈钢根据江浙民间素材，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来自沪上而深入草原的辛沪光，根据蒙古曲调谱写了交响诗《嘎达梅林》（她的儿子三宝为同名影片谱曲），湖北歌剧舞剧院的《洪湖赤卫队》以一曲

"洪湖水,浪打浪"风靡至今。《阿诗玛》、《刘三姐》等歌舞片,就诞生于这种时代背景和精神氛围。

特别是《阿诗玛》,无论剧情故事,还是人物塑造,无论歌词,还是音乐,都可谓完美绝伦,达到现代艺术的一个高峰。阿诗玛的故事非常简单,也非常普通,但又非常感人。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撒尼人生活的阿着底,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名叫阿诗玛,阿诗玛的心上人是英俊、勤劳而善良的阿黑哥,他们一个织布,一个放羊。后来,富人热布巴拉仗着财大气粗,抢走阿诗玛,逼着阿诗玛同自己又蠢又丑的儿子结亲。阿黑闻讯,快马加鞭赶回来营救,他的歌声、他的勇敢终于战胜恶霸父子,一对恋人欢欢喜喜回家乡。令人痛恨又痛惜的是,恶人在小两口回家路上放下滚滚洪水,阿诗玛不幸遇难,水落石出,化为石林,千年万载,长留人间。前年的滇桂行,还专程去石林,并在阿诗玛装束的小导游陪伴下,游览了心中的这方美丽圣地。

电影《阿诗玛》有几首唱段格外迷人,清新隽永,如诗如画,包括《长湖水,清又凉》、《马铃儿响来玉鸟唱》、《一朵鲜花鲜又鲜》等。

国庆阅兵

昨日凌晨,曦光微露,开始还像五十年国庆似的,地上有刚刚下过的秋雨,天上密布着浓浓阴云,然后一点点放晴,典礼开始之际,已经云开雾散,阳光普照,及至铁流滚滚威武行进,战鹰呼啸飞临广场,更成为再好不过的艳阳天了。鲜艳的天安门城楼在蓝天映衬下,猛一看简直跟宣传画似的。天遂人愿也是对历史、对天意民心的一种寄托。人民网有则留言说得好:

> 毛泽东主席将其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参加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一家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他本人成为亿万中国人民敬仰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在他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改变了近代以来遭受侵略和压迫的命运,获得了独立和解放,真正站立起来了,赢得了尊严和地位。不仅如此,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甚至成为全世界各国追求平等正义的进步力量学习的榜样,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非常广泛的积极影响。至今,我们在海外还时

常因为毛泽东而获得别国朋友的尊重……

当万众欢腾迎国庆、四海同唱东方红的时候，人们更加缅怀缔造共和国的人民领袖，更加感念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尤其是，毛泽东主席以一生的奋斗，终于使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成为新中国神圣而不可动摇的信仰。不久前闭幕的党代会上，胡锦涛再次庄严宣示："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随着时光流逝，后世之人将会日益体会《歌唱祖国》、《红旗颂》等名曲的意味，领悟纪录片《走近毛泽东》的结束语：

他最大的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最大的创造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他最艰辛的探索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他最伟大的作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部纪录片的撰稿人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即《大国崛起》等节目的撰稿人，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他的新著《读毛泽东札记》。



六十庆典

机场大妈的话反映了中国百姓的共同心愿和群体心理，除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等，还有地位再卑微也不忘天下，身世再困顿也不失尊严。刚去万圣书园，路上忽闻《志愿军战歌》的旋律由远而近，旋见一辆半旧不新的摩托驶过，车上不知何处装着喇叭，一路奔驰，一路欢歌，驾车男子衣衫破旧而怡然自得。这种事情若非亲见，任哪路记者也想象不出来。

《八一军旗红》是首名曲，总书记检阅人员方阵时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检阅武器方阵时奏《八一军旗红》。词作者张永枚是著名的军旅诗人，当年脍炙人口的长诗《西沙之战》作者。歌曲四段均以"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作结。一位老将军接受采访时说，十一走过天安门，戎装笔挺，"向毛主席的画像敬礼"。国庆联欢晚会的压轴乐曲《青年友谊圆舞曲》，一般人可能不大熟悉了：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
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
……
白鸽在天空中展翅飞翔，青春的花朵在心中开放
年轻的朋友们团结起来，为和平为友谊献出力量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团结之歌

作为五六十年代的流行乐曲，这首圆舞曲洋溢着春天般的清新气息，鸟语花香，春风荡漾，心儿也禁不住翩翩起舞。

四天来，京城天气一直奇好无比，天蓝风轻，日月皎然。上午去看老范，意外得到惠赐的书法《岳阳楼记》，顿觉“把酒临风，其喜洋洋”。原文与书法自不待言，题跋也一派大家气象：“先祖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陲为良将，在庙堂为贤相，在文坛为大家，所撰《岳阳楼记》光昭日月，传诵千古，诚可谓不朽之人，不朽之文。”的确，一般人能有上列功业的任何一项，都属不易并值得自豪，而范仲淹则集布衣名士、州郡干员、疆场名将、庙堂贤相、文坛领袖于一身，达到古人所谓“三不朽”的境界即立德、立功和立言，放在世界上也堪称不世出之奇人也。

几张西湖照片拍得不错，色彩如此鲜亮，不枉西子之艳名。南宋御街与六十华诞相映衬，更有一番历史韵味。中宣部三令五申，不许用“祖国母亲六十生日”之类说法，而有些媒体偏偏不管不顾，也不想想祖国母亲岂止六十岁。

《星条旗》与《星条旗永远飘扬》

“星条旗”有两首，有时难免弄混。《星条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是美国国歌，至于《星条旗永远飘扬》(*The Stars and Stripes Forever*)则是一首进行曲，是“进行曲之王”苏萨的代表作。由于《星条旗永远飘扬》比较流行，往往被混为美国国歌《星条旗》，2011 年 1 月 26 日的《环球时报》社论就是如此。这种张冠李戴的情况，恰似美国的圣迭戈(San Diego)与拉美的圣地亚哥(Santiago)往往被人混为一谈。



强 力 集 团

说起俄罗斯的“强力集团”，在音乐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一方面，其

主要成员都是“业余”音乐家，本职不是教授，就是军官什么的。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情，而且富有一种纯朴的、散发着生活气息的民间情调，就像观赏列宾的油画似的，使人不由深深感染。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缤纷绚烂，五光十色，将东方神秘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特别是那段少女哀怨幽深的主题，一听之下便留下难忘印象。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也是如此。最喜欢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上》，一队驼铃行进于广袤的戈壁、沙漠，在明澈的天空映衬下，金灿灿，明晃晃，悠来荡去，优哉游哉，宛若一幅诗意盎然的油画。其实，俄罗斯作曲家，无论是学院的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还是业余的强力集团，都具有如此鲜明的美学风格，富有诗意，充满活力，有声有色，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更是人类音乐宝库的璀璨明珠。诸如此类的浓郁风情在俄罗斯音乐先驱格林卡身上已经非常突出，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就是代表。这首名曲往往被用于那些欢腾热烈的场合，如大学生健美舞比赛什么的。如此诗情画意的作品，恐怕只有德奥作曲家能够媲美。



俄罗斯

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博大深广，远非美国的浅薄庸俗可以比拟，且不说它的哲学、神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绘画、建筑、诗歌等，也不说其精神世界的辽阔、浩瀚与深沉，仅仅是俄罗斯民歌就美不胜收。听听苏军红旗歌舞团合唱，就知道人们为什么把美国文化称为垃圾了。由此可见，历史并不都是文明战胜野蛮，相反，野蛮战胜文明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音乐艺术的超验价值

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贝多芬

一

在希腊神话的九位文艺女神中，主司音乐的欧忒耳珀（Euterpe）一向最受世人钟爱。因为她能将人直接引入物我两忘、恬然澄明的诗境，

使人感领唯有真正的诗人才有的那种“浩浩乎如冯虚御风”、“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的飘逸高迈。倘说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那么音乐就是人与神之间沟通的中介。语言使人意识到人的存在,音乐使人意识到神的存在。

关于音乐,尽管有“巴洛克音乐”、“古典音乐”、“浪漫派音乐”、“现代派音乐”等流行说法,但那无非是学院式的标签,因为说到底一切与天地共存与日月齐光的音乐实际上都是浪漫主义的。

浪漫主义就其本质而论与其说是一种特指的艺术思潮、艺术风格、艺术流派,不如说是一种普适的人生哲学,其要旨在于精神的超迈,心境的轻灵,人生的诗化。浪漫主义的灵魂中固然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和强烈的理想情调,但更重要的还是那种对内在生命的本真体验以及对超验存在的痴迷神往。这种灵性飞动、生趣盎然,既沉入生命之中、又超乎现实之上的浪漫精神,恐怕没有比基尔克敦尔论莫扎特《唐璜》一文表现得更生动、也更充分:

> 听唐璜!听他生命的开端!像闪电从乌云中放射出来,它从真情实意的深处迸发出来,比闪电还要快,比闪电还要无常,但却一样可靠;听它是怎样坠入生活的五光十色之中,又怎样粉碎在生活的坚固的堤防上;听这些轻松的、飘忽的小提琴声,听欢乐的示意,听喜悦的呼唤,听享受的极乐,听它的狂烈的逃遁,它越逃越快,越发不可制止,听激情的无疆的渴望,听爱情的叹嘘,听诱惑的耳语,听勾引的鸣啭,听瞬息的静默——听呀,听呀,听莫扎特的《唐璜》!

浪漫主义是音乐女神的灵魂,而音乐女神则是通达浪漫主义理想境界的引路人。在浪漫主义看来,音乐既是生命之流的律动,更是一道超验的神圣灵光。她宛若一道金光灿灿的桥梁飞跃此岸,横跨彼岸,从而使感观存在与超验存在的沟通成为一种可能。

就西方音乐而言,18、19世纪之交恰似一座空前(巴赫除外)绝后的高峰,就像中国诗歌在盛唐时期达到前无古人(屈原除外)后无来者的完美一样。耸立在西方音乐之巅的则是三个巨人般的伟岸身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值得深思的是,这座空前绝后的音乐高峰恰恰崛起于西方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之际,而且恰恰崛起在秉有浪漫主义的德意志。这绝非巧合。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上看,近代的浪漫主

义运动无疑是对剥夺神性与诗意的现代文明所做的第一次反拨，是遭到现代文明放逐的人渴望返回天地人神共居的家园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如果说工业时代的主流是“走向世界”，那么浪漫主义的精神就是“走向内心”。浪漫主义者追求的，乃是一个旨在同冷冰冰的金属世界相抗衡的活生生的诗意世界。他们不堪忍受生活的散文化，生命的平庸化，而力图用自身的灵性为现实罩上一层诗意盎然、精神流溢的光环。作为一个自为的精神世界，一个纯粹的诗意国度，音乐始终伴随精神的超越、主体的自由、个性的解放而趋向成熟。不妨说，主体越独立、越完善、心境越浪漫、越诗化，音乐越达到完美的高度。不能想象一个说不出“贝多芬只有我一个”的人，会写出“英雄”、“命运”、“田园”、“合唱”那般精美超绝、石破惊天的音乐。

二

在德国浪漫派中，将音乐当作超验的神明来崇拜，从形而上的角度追问音乐意义的是让·保尔、瓦肯罗德、蒂克和 E. T. A. 霍夫曼，无怪乎他们的音乐美学号称“器乐的形而上学”。如果说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为代表的维也纳乐派是音乐艺术最高成就的标志，那么“器乐的形而上学”可以说是音乐美学最高成就的标志。那么，为什么是“器乐的”而不是“音乐的”形而上学呢？因为，“音乐”过去一直仅指声乐，并不包括器乐，器乐一向被视为“不完整”的音乐从而属于声乐。直到 18 世纪“德意志民族的骄傲——交响乐”问世，音乐的观念才发生根本转变：以前被贬为“不完整”音乐的器乐，现在变成音乐艺术的正宗；而曾经备受推崇的、几乎被视为音乐同义语的声乐，如今则沦为“不纯粹的音乐”。这种“不纯粹的音乐”即声乐根本不在德国浪漫派音乐美学的考量之中，他们心目中的音乐就是以交响乐为主的器乐，对他们来说器乐就等于音乐。纯粹的音乐即器乐，“由于它的材料没有形体，所以是最精神化的艺术，由于它是一种没有对象的形式游戏，所以是最感性的艺术。”（汉斯立克）这种音乐自然非常契合德国浪漫派所追求的那种既非感性又非理性的超越的世界精神（Weltgeist）和生命的诗化状态，而浪漫主义音乐美学的本质也正在于超越性，它要超越内容和形式，寻求一个幻想力（想象力）能在其中无拘无束、自由游戏的世界。

与音乐的超验意识相关联，“器乐的形而上学”自然把音乐视为最

有哲学深度，最具启示意味的艺术，正如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 F. 施莱格尔所言，“一切纯粹的器乐都有通往哲学本体的趋势”。说到音乐的超验性常人还能理解，但论及音乐的哲理意味就不是一般所能接受的了。因为，对众多的“音乐爱好者”来说，音乐实际上都被当作排忧解闷、麻痹神经的精神鸦片，甚至等而次之被视为刺激感官、获得快感的美味佳肴。我们不是常能听到诸如紧张之余听听音乐、“消遣消遣”的说法吗？不是连康德都认为音乐的“享乐多于修养”吗？这实在是对音乐的莫大误解。诚然，音乐能引起感官的愉悦而天然具备消遣的功能，但倘若只把这层“表皮”当作音乐的真谛并对之摇头晃脑、如痴如醉，那就无异于买椟还珠。对此贝多芬曾忿忿不已地说过：“我必须藐视这个世界，它对于音乐是比一切智慧和哲学更高的启示这个事实一无所知。”事实上，在音乐女神轻松愉快、活泼感人的话语中，隐藏着深邃的思想、玄奥的哲理，流露着宇宙般浩瀚的悲哀及困惑。库茨涅佐夫在论及“太阳少年”莫扎特的音乐时就写道：“莫扎特的音乐是深刻的本体论的……实质上，莫扎特解决的问题就是陀思妥耶夫要解决的问题：世界存在着抑或只是一个幻影？世界存在的保证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尼采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

> 可曾有人发现，音乐解放精神，为思想添上双翼？一个人愈是音乐家，就愈是哲学家？——抽象概念的灰色苍穹如同被闪电划破；电光明亮足以使万物纤毫毕露；伟大的问题伸手可触；宛如凌绝顶而世界一览无遗。

总之，对于浪漫主义来说，音乐既非生理的兴奋剂，亦非心理的麻醉剂，而是超验的神启。它把自我引出生命的躯壳，带往“永恒的憧憬的国土”（霍夫曼），导向生命的本真存在——“世界精神”，即无可名状的、只有主体的幻想力或想象力才能把握的那种“看不见的境界”、“看不见的精神”（蒂克）。一句话，音乐是一种灵魂的语言，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音乐——这就是奇迹”（海涅）。

三

浪漫主义及其音乐美学之所以推崇音乐，强调音乐的超验性，是因为在“除了需要之外什么也不重视，除了功利之外对什么都没有乐趣”的功利化年代，在一个人灵丧失、神灵隐遁的散文化时代，唯有超验的

音乐还能为诗化人生留下一片绿草茵茵、清流潺潺的净土，唯有超验的音乐还有希望使枯萎的心田重新感领神性的雨露甘霖，还能使有限的生命爆发出永恒的火花。按理，诗化人生的路应该由语言的诗来铺设，但在诗性日渐枯竭（想想羊羔体）、语言日渐沉沦（想想织围脖）之际，诗已愈来愈不成其为存在的深思，愈来愈远离童话的境界，而诗人也已不再是一个祭司、一个先知，而沦落为一个可怜的、无病呻吟的“写诗者”。这里，明显不过的就是随着“写诗者”成批涌现，人生非但未向诗化飞升，反而更深的沦入散文化的泥沼。怨不得诺瓦利斯认为，诗有一个特殊的名称，诗人构成一个特殊的行业，都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在他看来，诗一点也不特殊，“它不过是人的心灵所具有的行动的方式”。当此之时，音乐自然成为诗化人生的唯一途径，因为在音乐中闪烁着纯粹的诗意之光，音乐就是完全诗意化的象征。正如蒂克所言：“交响乐能够体现一种五彩缤纷的、丰富多彩的、朦胧不清的、按照美的原则发展的戏剧，这种戏剧是诗人绝不可能提供给我们的；因为交响乐……只耽于它那纯粹诗意的世界。”

当然，浪漫主义所理解的“诗意”并不同于一般“诗情画意”式的诗意。在浪漫主义那里，诗意是生命本真的体现，是灵性的、放射光辉的精神，它不是“外在于我们”，而是“内在于我们心中”。歌德曾用玫瑰开放的美妙瞬间来比拟诗意，此刻玫瑰所展现的魅力正是一种由内向外、稍纵即逝的灵光。显然这种活灵活现、生生流动的诗意绝非语言所能充分把握而不失其神韵，这种由生命本身释放出来的内在灵性只在乐音的流动中得到纯粹的显现。被卢卡契称为“浪漫派唯一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诺瓦利斯说得很明确，“诗意是内在世界的总体显现”，“在纯粹的诗意方面，没有一种艺术比得上音乐，在音乐中，精神赋予材料及其各种变化以诗意”。

具体来说，音乐为诗化人生提供保障的关键，还在于音乐美的本质特征，它高度凝聚在“形式”与“幻想”（想象）两大音乐美学的范畴中。在所有艺术中，唯有音乐的材料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原型，它是一个完全由“形式”构成的天地，假如一定要为音乐找到一个“内容”的话，那么这个内容就是形式本身。因此，音乐所有的仅仅是形式。不过，“‘形式’这一概念在音乐中的体现是非常特殊的。以乐音组成的‘形式’不是空洞的，而是充实的；不是真空的界限，而是变成形象的内在精神”（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也就是说，音乐的“形式”，并不是一个同“内容”

相对立的概念,而是生命的本质及其显现。既然是生命的本真显现,那么人们自然会在乐音的纯粹连续中感觉到生命世界的丰富多彩,在这种充实的形式中实现有限与无限、经验与超验的统一。

如果说"形式"是音乐审美中客体方面的表征,那么"幻想"(想象)则是审美主体所赋予的禀赋;如果说幻想力(想象力)在其他艺术中受到内容的制约而举步维艰,那么音乐则为其提供了天马行空自由驰骋的无限空间。幻想的意义何在?首先,幻想是一种真正接纳美的机能,它表现为一种无利害、无目的的纯观照的精神活动。正是在这种童心未泯的"自由游戏"中,我们才能体味音乐美的深微意蕴。可惜,当人们面对音乐的"迷宫"时并不让精神处于纯观照的幻想之中,而是尽力调动"情感",把自己沉浸在情感的汹涌浪潮里,仿佛听一曲"梁祝"不哭成个泪人儿就不算懂音乐似的。其实,用感情驾驭欣赏乃是病态的,只有用幻想统摄欣赏才是审美的,因为感情是一种原始的、粗糙的、未经升华提炼的东西。蒂克早就说过:"如果你把泪水和情绪杂入音乐,那么音乐就只是你们的女仆,而不是创造自己的女神。"对于那些沉溺于感情的听众,音乐已经并不重要,正如汉斯立克所嘲讽的:"一支上等的雪茄烟、一碟精美的菜肴、一次温水浴在无意中的作用,与交响乐对他们的作用是一样的。"现代人缺的不是伴随原欲的情感,而是美感。在那些聒噪刺耳的"阿里巴巴"音乐之中,充斥着沸腾泛滥、矫揉造作的情感,而唯独没有美感。对这种煽情的、歇斯底里的音乐,人们根本无须调动幻想,只要打开情感的闸门,"跟着感觉走"就够了。为尼采所深恶痛绝的现代文化的两大特征——做戏与激情,在当今的所谓流行音乐、通俗音乐中,都表露得淋漓尽致。

四

契切林曾把莫扎特比作"一座宇宙和现实生活、天狼星和日常琐事之间的桥梁"。其实,纯粹的音乐即富有浪漫精神的音乐,无一不像一座沟通天堂和人间的桥梁,它把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打通,使人的灵魂向诗的王国超逾升腾,与神圣、永恒、爱等交融在一起,最终……也许,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还是让我们默默的浸润在清凉的乐音之泉吧。否则,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又该说:"啊,有时候多么想不听这种毫无趣味、毫无意义的人类的高谈阔论……沉醉到美妙的音乐和因为心灵充实而无言可说、轻轻的心灵接触式的宁静境界中。"

谈 山 河

南昌点滴

这些天，抽空参观了八大山人纪念馆、绳金塔、滕王阁等名胜。八大山人纪念馆一带，池塘逶迤，田野空旷，馆内曲径蜿蜒，竹木森然，漫步其间，心境恬淡，颇得王维独坐幽篁里的神韵。昨天傍晚，参观了滕王阁。站在滕王阁上，真切领略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情景，感受了“人杰地灵、俊彩星驰”的意味。《滕王阁序》里有句“徐孺下陈蕃之榻”，下榻一词由此而来。此次下榻的宾馆在赣江边，故曰滨江宾馆。入住的“世邑楼”(十一楼)外边是条临江路，白天不觉得怎么样，晚上车来车往，比住在 Broadway 还喧腾。

惟楚有才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作为塞外边民，遥遥翘望的“楚天”一分为三，一是东部吴侬软语的江浙地区，一是中部热辣火爆的湖湘一带，一是西部世外桃源的巴山蜀水。三地文化灿烂，一向人才荟萃，而风格各异。最喜欢湖湘一带，原本人杰地灵，孕育屈原及其楚辞，奇崛诡异，刚烈忠勇，多与西域气质相通，故每诵《国殇》不禁心潮激荡，热血沸腾——带长剑兮挟秦弓，子魂魄兮为鬼雄！近代以来，这里更是豪杰辈出，文采斐然。左宗棠抬棺西征，收复西域，永远让人敬佩：“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遍插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毛泽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等，也无不得益于湖湘的奇山秀水与人文气韵。孙中山闹革命，屡败屡战，左冲右突，最后还是武昌城头一声炮响，辛亥革命才获成功。故岳麓书院大书

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书院的著名匾额“实事求是”及其精神蕴涵，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大源泉。

青藏杂记

此行属学术考察活动，行程十天。周四飞到西宁，周五集训并参观塔尔寺，周六去青海湖，顺道访问原子城纪念馆，晚上乘车赴拉萨。由于车票紧张，后来铁道部又专门加挂了一列软卧。据拉萨火车站站长介绍，目前西藏三票难求，即火车票、飞机票和布达拉宫门票——平均每日进藏八千游客而门票只售两千张。

周一在列车上度过，要么看书，要么欣赏风光。沿途风光无限，气象万千，高原湖泊，倒映蓝天，绿草茸茸，覆盖山峦，如民国奇书《艽野尘梦》描绘的：“沿途风清日暖，细草如茵，两面高峰直矗，山巅积雪，横如匹练。有时出岫白云，与摩天积雪，共为一色，凝眸远望，奇趣横生……”

拉萨天色蔚蓝，令人心静，自然提升精神境界。市容干净整洁，出人意料，规划设计井井有条，不像乌鲁木齐粗服乱头，没有章法，看似繁荣发达，实如暴发户女儿，大红大绿堆了一身，胭脂口红涂了一脸。拉萨夜景也很美，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往来如织，喷泉随音乐翻涌，彩灯映照的布达拉宫肃穆雄伟。

在大昭寺一家小书店，发现民国奇书《艽野尘梦》，是一位清末入藏军官的笔记之作，颇有内容和趣味。据说1950年代初，18军进军拉萨时还指定高级将领作为参考。同行的一位藏学家也推崇此书，说当年写博士论文时曾为此书感动涕零。全书约六万余字，都是文言，由于配以将近一半的注释及说明，还请中央美院的老师绘了许多插图，读来也不觉得怎么费力。如一段写到鏖战后的夜景：“时月黑风凄，山高夜静，怪鸟悲鸣，河水呜咽，用兵绝域，凄恻心脾。古人乐府，尤无此苍凉悲壮也。”然后编者为此加上李颀的《古从军行》作为背景：“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书里最奇的故事，是一百多将士误入藏北无人区，历经数月，千难万险，最后出来时只剩几人了。而更令人感喟的是，作者与一位藏族少女的生死爱情，真是刻骨铭心，惊心动魄。作者陈渠珍，号称“湘西王”，与熊希龄、沈从文并称“凤凰三杰”，沈从文还曾一度担任他的秘书。

“艽野”一语，出自《诗经》的“我征徂西，至于艽野”。原指荒野，代指青藏。

都说来到这里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高原反应，一些情况听上去还挺邪乎。有意思的是，人没什么异常，该干啥干啥，倒是笔记本电脑居然一度“身体不适”，无法正常工作。当时还以为出了故障，怎么摆弄也不见效。后来，请来当地一位计算机高手，一检查说没有别的问题，可能就是“高原反应”，据说这种情况还挺常见，回北京就正常了。问题是，这几天怎么办呢？心有不甘，于是早上醒来，把窗子打开，给它透透气，心想早上氧气充足，也许能治疗一下其“娇生惯养”的毛病。没想到，本来不过是没辙儿的瞎折腾，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最后居然真治好了。

西藏话题

汪晖的《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收录了一篇论文《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对“3·14”事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视野之开阔，见解之透辟，思想之敏锐都可谓无出其右。特别是其中有关“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文化领导权的论述，尤其令人深长思之：

> 这一危机是“去政治化”状态下的危机。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此讨论“去政治化”状态下的危机不是出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怀旧，而是借此指出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基本问题：西藏问题是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普通危机的一个部分。正由于危机根源植根于当代进程本身，民族问题并不能单纯地用经济不平等来加以全面解释，它也体现在文化政治的领域。在1950至1980年代，民族题材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电影和其他文化创作中，少数民族文化始终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代，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不仅体现在对西藏、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史诗、民间音乐与文学及其他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护，而且更体现在对于一种新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创造。在音乐史诗《东方红》中，由胡松华、才旦卓玛等演唱的蒙古、西藏民歌在整个史诗剧中居于极端重要的地位；《五朵金花》、《草原英雄小姐妹》、《阿诗玛》、《农奴》、《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等以少数民族故事为中心的电影

是那个时代中国电影中的经典性作品；在1950—1980年代，中国油画、国画和壁画创作中，新疆、蒙古、西藏和西南、西北各民族的人物、场景和故事始终居于重要位置。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上述作品后面添加一个漫长的系列。但伴随整个社会的“去政治化”过程，这个系列在1990年代终结了——我所指的终结不仅是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的大规模介绍终结了，而且是少数民族文化日渐地与旅游市场的开发相互联系，而后者正是东方主义在中国重新植根的社会基础。如果将这两个时代的民族题材作品加以对比的话，前者的宗旨是通过一种社会主义文化来形成新的普遍身份，而后者则通过强化民族文化的“东方性”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前者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普遍身份，而后者则将民族性建构为本质性差异……

昌耀与周涛

来到青海，怀念昌耀。昌耀，本名王昌耀，同盛唐“七绝圣手”、“诗家天子”王昌龄“同宗同族”——仅就诗人气质和精神气脉而言。这位终生行吟于青藏高原的当代诗圣，身后为中国诗坛留下一座圣洁肃穆的珠穆朗玛峰。2000年，“新边塞诗人”周涛写下一篇动情的祭文《羞涩与庄严——昌耀百日祭》。文章不长，著录于此，以表达对两位西部诗人的敬意：

昌耀的辞世令我异样的平静，这平静使我自觉有些接近冷漠。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我是较早知道昌耀病情的人，也是他在病榻上挂念过的人。青海的朋友在电话里说“你能不能过来陪他几天?”我说“不必了”。我是绝不会去目睹他临终前的痛苦面容的，而愿意永久地保留他给我的印象——昌耀独有的羞涩与庄严。

我和昌耀一共只见过三次面，平时基本没有书信，偶尔有过一两次电话，将近二十年来，相忘于江湖。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的“绿风诗会”，那是一次全国近百名诗人参加的盛会，可谓群贤毕至。昌耀是一个独行的孤旅，他的存在像一个无声的预示，给兴奋喧哗的诗人节抹上一层淡淡的悲苦。当时他给我题下的留言是：“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炊。”可能没有人想到，正是他的颜色染

就了他以后十数年间诗歌的命运。他在情感上已经是先知的。

之后的认知则完全是因为他那本《命运之书》，正是这部诗集，使我意识到大师的存在和经典的凝重。读毕掩卷，我说了这样的话：所谓昌耀，就是当今中国行吟在青海高原上的屈原！这位命运的逐臣、艺术的孤立者同样不为人理解，区别在于屈原的忠心孤愤不为楚王解，昌耀的绝世诗篇不与国人通。

潮涨潮落，云起云飞，这多年来文坛兴衰了多少一时人物，喷射了多少过时喝彩，惟有昌耀如艾青笔下的礁石，淹没了又露出来……对，纪念昌耀最好的办法就是读读艾青的那首短诗《礁石》，那是对他最真实的写照。

大约到了1979年，我去兰州开会，专程去了一趟青海，我没有去看青海湖，而是专门看昌耀。我想看看这个真实的昌耀和我头脑里用文字构成的昌耀是不是吻合。结果，比我预料的还要严丝合缝，昌耀是一个圣子圣婴，是全身最少沾染世俗油污的人，他的羞涩与庄严说明了他内心的清澈与坚忍。他就是青海湖。

他的确是羞涩的。那天我们到处找不到他，留了话，下午他骑自行车来到省军区，一见面他低声说："他们不让我进，我说找你。"然后我们到房间里坐下来，我为他削了个苹果，他始终把那个苹果擎在手里，没有咬一口。到了吃饭时间，他要回去，我坚持留他一起用饭，但是我注意到昌耀很少动箸，他只是象征性地吃了一顿饭。

后来我去了昌耀的住处，很是简陋，外间是公用办公室，里间一个小屋是他的住室。我没说话，内心有些酸楚，偌大的青海难道养不起昌耀这样一个诗人么？可他却得意地说："一下班他们都走了，两间房子都是我的了！"我望着他儿童般天真的表情，心想在人世间他是无知的，因而也是满足的。

我说："干脆我帮你调到新疆来吧，我能办到，条件要比这儿好得多。"他没料到，愣了几秒钟，两双眸子互相凝视片刻，信任和遗憾转瞬变幻。然后他说："算了，我在这儿待惯了。"这一刻，他的羞涩变为庄严，坚定而且圣洁。他知道服从命运，深懂敬畏上天的安排。任何诱惑都不可能再改变——这个诗人自身已经成为青海高原上的一座山脉。也是，昌耀怎么可能离开青海呢？他已经长在那里了，就如圣婴已经无法脱离苦难母亲的怀抱。

过了一年，我们在北京又见了面，是《人民文学》的一次颁奖活

动，昌耀依然谦虚羞涩，坚定庄严。应该说昌耀式的羞涩已是当今很少见的一种神态，与种种招摇撞骗、大言不惭、应付自如、自命不凡相对照，我从那羞涩里看到了良知——被现实风尚埋在很深很深处的良知。昌耀就是这样一面镜子，青铜出镜，他的存在总能照出一种别样的东西来，他能让有心的人看出自己的脏处和异样处，因而生出一些对自己的羞愧之心，这大概就是人格。

现在，这面镜子从高处跌碎了。所幸他留下了自己的诗作——珍贵的不可再得的卓越绝响。不管他是怎么死的，我敢断言，他肯定是没有白活。有《命运之书》，一生足矣。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活法，但我没见过哪个人比他更接近圣人。

昌耀现在是安详的，他的灵魂因了高原而离天堂最近，他无愧于自己，更无愧于人世。假如青海湖夏季的天空中有一大朵洁白因强烈的阳光而爆裂开花的云，那一定是他在俯瞰万顷碧波了……昌耀你好！

附：昌耀《高车》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的轶诗

吉木萨尔

新疆诗人周涛在《新疆！新疆！》一文里提到，诗人牛汉来新疆，一下飞机就评价新疆的风："北京夏天的风软塌塌的，吹到身上有些黏。新疆夏天晚上的风，就不一样，刚健凉快，有劲道！"周涛答："新疆的风是从雪峰上过滤过的，那是我们的大冰箱。"周涛是新边塞诗的翘楚，《这是一块偏心的版图》道尽塞外之人的悲凉与豪迈：

饮马长江从来是一句诱人的口号
游牧者的劳动是战争，追逐水草是天性
奴役人如同役使畜牲
发起一次战争像围猎一支兽群
但是南方却用一个宫女就解了围
用一曲幽怨的琵琶引去遍野铁骑

周涛的散文同样精彩，如名篇《吉木萨尔纪事》。乌鲁木齐附近的吉木萨尔闻名于“史”，汉唐时代就是重要军镇。当年，周涛的父亲在此“下放”，有次他去探望父亲，见到一“匹”可爱的、通人性的小猪。《吉木萨尔纪事》这节的标题就是“一匹难忘的猪”，讲了几个有趣的故事，令人莞尔：

有一天，父亲被分配去队里看场，远远望见一群猪呈进攻队形缓缓移来，渐进，父亲猛地一声吆喝。见有埋伏，猪群纷纷向后逃窜，独有一猪，不但不逃，反而泰然行至队前带头，边走边回头哼哼，猪群马上重整队形跟随而来。父亲细看，原来是我家那头小黑猪，它不慌不忙，胸有成竹，不断回头用猪语鼓励同伙，自己却故意表现出一种随便而大方的样子，像人在请客做东时的样子差不多，它表现了一种猪的潇洒和庄重。好像它认定，它的主人看场就等于今天它请客。这显然会使它在猪群的地位迅速得到承认。不料，父亲虽被开除了党籍，却仍然满脑子大公无私的思想，在小黑猪即将被确认领袖的关键时刻，一点面子也不讲，坚决地用木棍把它们轰走了。

这使小猪很委屈，用一天半时间对父亲表示疏远和装不认识，大概它想不通这件事为什么那么不通猪情。

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大家都很奇怪，说猪蠢是没道理的，猪连后门都会走，这几乎已经达到了人的相当智力水平了。

难怪哈里·杜鲁门曾宣称：“不该允许不了解猪的人当总统！”为了在这篇纪念猪的文章里显得庄重些，我特意对它用了“一匹”。

鼓浪屿风情

来到鼓浪屿，住在“海上花园酒店”。厦门现在的气候非常舒适，海

风轻拂，空气清新，正是江南好风景。

见到鼓浪屿，想起那年在这里游历、瞻仰郑成功的情景，正想着轮渡就把人带到郑成功的高大塑像前，夜幕下的塑像金碧辉煌，特别显眼。上岸后，见到一棵大榕树，冠盖峥嵘，枝干遒劲，很有个性。乘着酒店电瓶车蜿蜒而上，穿过看不清、弄不明的一些小胡同，最后来到下榻的宾馆。

宾馆按照欧式风格设计，有点洋气。站在阳台四望，一片树影，非常安静，想起那首《军港之夜》：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我对祖先留下的每寸土地都充满眷恋，同时每到一地都有不同的感受。相比而言，北京的皇家气派和大家风度还是最令人神往的，也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

记得诗人舒婷就住在鼓浪屿，这里还是著名的钢琴岛，可惜现在是听不到什么琴音。喜欢舒婷的那首小诗：

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
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
也许藏有一个重洋
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
……

伴着清晨的阵阵鸟语花香，从梦中醒来。打开阳台，四望葱茏，一片青翠。昨晚，灯影昏黄之中，一切都隐匿无形。现在，阳光普照，万物明朗，美丽的鼓浪屿尽显眼底。站在花园的栏杆前，可以看到山下的海滩和远方的海平线。开会前有点时间，沿山道而下，去海边遛了一圈。出宾馆大门，又见几株榕树，高大宽广，威仪如山。面对榕树，想起舒婷《致橡树》。顺山道漫步，发现著名景点——菽庄，一处幽美的江南园林，内有家独一无二的钢琴博物馆。不到五分钟，来到海滩，漫步其上，心底不由飘起那首台湾校园歌曲：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海上花园酒店的位置很好，景色秀丽，视野开阔，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日光岩。鼓浪屿是文化岛，仅名人故居就有钢琴家殷承宗、清华体育鼻祖马约翰等。马约翰在清华享有很高声望，每年学校举行的体育赛事就有“马约翰杯”。

晚饭后，厦大一位老师陪着散步，溜达到轮渡码头。听她说，鼓浪

屿有三多，其中一多就是小巷多。我们下来走的是条主路，沿途还经过“鼓浪屿音乐厅”。有意思的是，路上大概每隔 20 米的样子，就有一块标有五线谱音符的路砖，沿着这个路标就不会迷路。

鼓浪屿不愧是海上花园，充满诗情画意。不说那海风吹拂下的摇曳树影，也不说各式各样精致优雅的中西建筑，更不说林巧稚、林语堂、殷承宗、舒婷、马约翰等文化名人的印记，只说刚才路过的鼓浪屿音乐厅，玲珑典雅，让人心生暖意，从中传出合唱训练的乐音，还夹杂着老师的“申斥”。在这春风沉醉的夜晚，怎不令人抒怀??

刚刚游历了日光岩和菽庄，一行五人，由星民兄做导游。星民兄的母亲是鼓浪屿人，至今岛上还有表亲。鼓浪屿号称“人间仙境”、“海上花园”，这里出诗人(包括作家、音乐家等)一点也不奇怪。沿着曲曲弯弯的小径，一路攀上日光岩，小岛风光就尽在眼底了。沿路植物茂盛，花树宜人，移步换景，风情无限。特别神奇的是岩崖峭壁上的树木，硬是从齐展展的石壁上长出参天大树。更有一些奇特的巨大岩石，简直像刀削斧劈一般，齐刷刷的，堪称鬼斧神工。这里曾是郑成功的水寨，半坡上有郑成功纪念馆，郭沫若题字。岛上的房屋建筑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各种风格和谐有致地点缀于海、天、花、树之间。今天阴天，偶尔还飘点雨星，苏轼曰：“冒雨登山也莫嫌，只缘山色雨中添。”下山到菽庄时，阴得更重。菽庄名字来自其主人的字，听说还有一段浪漫故事。当年，菽庄追求一位姑娘，姑娘要求建一栋房子，于是他就设计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园林。我对江南的小桥流水没有特别的感觉，虽然也觉得幽美如画，或许天生适于大漠风尘的粗粝风格吧。学兄李磊教授对此倒是异常痴迷，在南京任教一年，几乎将周边名胜跑遍了，什么秦淮烟雨、杏花江南的，雅人有雅兴，不同我等俗人。

长江万里图

李白等已将庐山、三峡写绝：登高壮观天地间，疑是银河落九天，巴东三峡巫峡长，轻舟已过万重山……他们的绝代诗文早使河山入画，万里入梦，亲临其境反倒没有什么感觉了。看着长江渐如第二黄河，对比“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杜甫《秋兴八首》)、“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白居易《长恨歌》)等情景，进而联想火烧连营、白帝托孤、李白流放、杜甫沉吟，不禁有怅望千秋一洒泪的感怀。其

间，正在重温姚雪垠新版《李自成》（十卷本），许多故实多在长江上中游地区，更是浮想联翩，感慨不已——既为一代英雄的悲剧，也为这等讴歌奴隶的杰作。读完之后，意犹未尽，于是重读顾诚的《南明史》。看似巧合的是两部大作均以大顺军余部在三峡的坚守与败亡告终，令人不胜欷歔。可惜今人的口味只适合"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畅销书，就如时尚人士觉得"流行音乐"已在"抒情"，还听贝多芬干什么。顾诚论述明末士风，特别是东林"君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黄宗羲等"清流"党同伐异，唯我独尊，褊狭、偏执犹如当今另类媒体，则让人无奈地感叹历史往往只在重演。

奥运期间基本都在外地，人称"避运"——相对于在京"受运"。由于对体育竞技没有感觉，其间主要关心两件事，一是每日的金牌数，二是奥运的政治意味。所谓莫把奥运政治化，其实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当今之世，哪个国家不把奥运政治化，何况奥运本身就是政治，西方文明的正统与一尊就在诸如此类的仪式中不断强化，而"言必称美国"的源头正是"言必称希腊"。1984 年，国人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 Los Angeles 奥运会，活生生感受那种貌似青春、阳光、笑逐颜开、现代时尚等盛况，恨不生为美国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也就油然而生。若说奥运只是体育，应该发扬友谊、和平、友爱等精神，不过是善良人的一厢情愿。反倒是奥运开幕当日，俄罗斯拔剑出鞘，扬威西方，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国家与人民多少扬眉吐气之际，也揭开了当代政治温情脉脉的面纱和本相。就举办奥运而言，虽然存在这个问题那个不足，但中国的形象、实力、精神风貌在世界骤然大放异彩，就如当年抗美援朝打败美帝一样，不是几笔经济账能算得清的，这就是奥运的政治意味之一。国人的爱国情、自信心极度高涨自不必说，只看回归同胞十年前拜别"大英帝国"时垂头丧气，而如今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还有多少人愿意再做当年的帝国顺民呢。这同样是奥运会的政治意味。至于金牌、比赛、体育明星、开幕闭幕什么的，不过是负载这一切的符号或仪式而已。



南人北人

无意间发现一本《南人北　北人南》的书。一瞬间，没弄明白书名的意思，什么南人北北人南的，又费解，又拗口，翻开一看才明白，原来是以不同地域文化为主题的散文集，包括几个部分：

一、南北：北人厚重，南人机灵
二、东北：坚定勇敢乃至于冷酷
三、京沪：北京人豪爽 上海人细腻
四、华北：天津人热闹 山东人憨厚
五、西北：有整体雄浑 无琐碎甜腻
六、湖广：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七、东南：玻璃映射出的一片“流离世界”
八、西南：女则秀中有骨 男则有节有气

仅凭目录，觉得编者思路有点凌乱，但还是买下，哪怕只为茅盾的《新疆风物杂忆》。全书六十万字，基本都是名家谈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包括鲁迅、茅盾、郁达夫、沈从文等。书的勒口上印着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 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

闲来翻阅，读到一篇《江西填湖广》，作者王振中是复旦教授，以研究区域经济文化著称，本书竟收了他的五六篇文章，“江西”一文末尾注明“1996 年残暑雨寂于复旦园”。所谓江西填湖广，主要讲湖广的开发有赖江西人的移居和作为，填者，人口涌入之谓也。文中谈了不少有意思的历史掌故。比如，明代的江西人，在朝野上下颇为引人注目，仅仅吉安府就出了一千多个进士，在全国无与伦比。再如，17 世纪，有人从云南出发，沿着怒江顺流而下，进入缅甸，沿途发现只要出现聚落，头领必定是江西移民及其后裔。元明之前，江西更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口曾居各省之首。不过，当时还没有“省”，而只有“路”。省是元代以后的建制，最初是行省的简称，而所谓行省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中央政府在唐代曾叫中书省，行省的意思就是行中书省，后来演化为现在省一级的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演化为一级地方政府，是中国政治的一种历史通例，比如汉代相当于省一级的刺史，最初就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监察大员。江西填湖广，有两条路线，一是南下广东，一是西进湖广——历史上的湖广主要包括湖南与湖北。据说，朱元璋强迫江西人迁往两湖时，背井离乡的人被反绑双手，途中

想方便时，就得求押送的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有了“解手”一词。由于大批江西移民的涌入，才促进了湖广的开发及经济发展，“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也反映了这一点。

另一篇王振中的《得饶人处且饶人》还是写江西。这里的“饶”，竟指江西的饶州之饶。按照王振中介绍，唐宋时饶州是移民进入江西的主要通道，“特别是南宋时期，这一通道显然更为重要，许多人经由此地从都城临安移徙饶州及江西各地。其中，有不少素质较高的宗室成员和文化人”。由于饶州自然条件优越，这里很快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富饶之地，景德镇及其瓷器就是一例。宋人洪迈在名著《容斋随笔》里也写道：

> 江南既为天下甲（古代江南指江西），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

为此，当时江西出了不少神童。流风所及，颇似《神童诗》写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由于这些神童往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江西人王安石还写下《伤仲永》一文。南宋时，朝士已经多为饶州人，由此形成“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说法。

《南人北　北人南》有篇韩少功的文章《阳台上的遗憾》，谈到南人北人的方位感及其差异与缘由，挺有意思，也有启发。他说：

> 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以人为转移，是一种主观方位；东西南北，以物为坐标，是一种客观方位。这样说起来，似乎南人较为崇尚主观意志，而北人较为遵从客观实际。
>
> 指路方式的不同，当然还可能有更多的原因。比方说，南方多阴雨，四野茫茫，如果人们没有随身揣着指南针，就很难像北方常见的晴空之下，瞥一眼日头，轻易辨出东西南北。
>
> 又比方说，南方的街道多是弯曲偏斜，不像北方的街道那样总是四向方正，多以皇宫或神庙为中心，次第森严秩序井然组成棋盘式格局。在那个棋盘里，东西南北已被纵横街道刻入人心，很难有南方的模糊。

香港中文大学掠影

中大依山傍海，风景清秀。山上草木茂密，郁郁葱葱，形形色色的鸟类据说有一百三十多种，如翠鸟、白鹭、银耳相思等，唧唧喳喳，婉转啼鸣，煞是赏心悦耳。各种建筑均依山而建，大小道路遂曲曲弯弯，不少地方坡度很大。所以，这里要么步行，要么坐车，自行车用不着。为方便行人，山上辟有公交线路，在陡峭的山坡上，大巴也能开得飞快。校园在郊区，如一方世外桃源，隔离尘嚣，而山脚的“大学站”又连通深港，并不与世隔绝。这样的环境适合读书，心思宁静而清净，尤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有无限的遐思和神往。

下午起床，收拾一下，带着笔记本、相机等盘桓下山，前往山脚的校园湖，听说是此间一景，类似清华荷塘和北大未名。绕湖逡巡两周，然后在一处僻静的角落坐下，那里有一圆形石桌，周边还摆着几个石凳，背后一株大树，绿荫遮盖，石凳上貌似还有滴下的鸟矢。此刻，太阳已经落在身旁的山后，阳光依在，暮霭未起，天光云影共徘徊，远近啾啾鸟鸣伴着徐徐海风，仿佛弹奏着一曲自然的心声。湖畔行人渐稀，小路边、桥栏上的夜灯早早开启。望着眼前景物，心里不禁浮想：理工科满足人们的眼前需求，而文科使美好的东西天下传扬。就景物本身而言，这方池塘同荷塘、未名并无差异，甚至可能更漂亮、更宜人，可为什么无法同日而语呢，说到底不就是因为荷塘、未名更有“文化”嘛。

中大校园基本上依山而建，山腰、山头有几处平地，星罗棋布着各个学院、图书馆、高楼、餐厅、超市、书店等。步行上上下下，要么走弯道、台阶，要么乘不同楼宇的电梯——当然首先得熟悉这些电梯。新闻学院在山顶的“新亚书院”，即中大的前身，也是钱穆先生的建树。有名的“天人合一”景观，也在那里。下午一路上行，一会儿台阶，一会儿电梯。途中，又转了转“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由于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而闻名。金观涛是1980年代所谓新启蒙的精神领袖，同李泽厚等齐名，都属当年的风云人物，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影响很大，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一说颇受瞩目，虽然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上大学时，他们夫妇还在母校母系任教，后来调往北京，一时平步青云。六四前夕来中大访学，此后一直滞留，最近国内还出版了他们夫妇的一

部大部头著作。前几年，博士生听说京城有金观涛的演讲，慕名而去，失望而归。不过，他们在中大创办的一份刊物倒是颇有声望，即《二十一世纪》。2003年来香港时，在陈阳博士陪同下，逛了逛中大校园，无意间路过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正好金观涛夫妇都在，还拜访了他们，并执弟子礼。今天特意转到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心存侥幸，希望再能邂逅他们。中心在一个四合院的地方，环境清幽，格调雅致，四周是两层小楼，中间一方天井，摆着几盆鲜花，还有垂柳依依，四遭环绕着清池，成群金鱼游弋嬉戏。围着天井转一圈儿，看到每个房间的门把手上都写着名字，其中一间是“金观涛 刘青峰”，还有一间是“《二十一世纪》编辑部”。

从中心出来，沿山路转到山顶，先去看那个神秘而有名的“天人合一”，一路问去，无人不知。半路又看了看“新亚书院”的独特纪念碑：在一处缩小的古罗马斗兽场一般的台阶上，立有一块墙壁，上面镌刻着历届学生的姓名。上次来就留意到这一独特风物，最难忘的还是新亚书院1952年文学院第一届第一位的学生，如今鼎鼎有名的哈佛教授、钱穆弟子余英时。

天人合一确实富有创意和灵思，她是在面朝大海的山崖旁，建的一方水平的景观，水平面猛一看像是镜子，实际上是清水，犹如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更奇妙的地方还在于，这方镜子似的水平面，同远处大海融为一体，产生一种奇妙的视觉效果。水平面一处凹槽又像八卦图，中间栽着一株苍老遒劲的大树。天气阴沉，近景远景交融的效果看得不太明显，即使如此已为之叹服了。天人合一的旁边，立着一块石壁，上面刻着钱穆晚年论天人合一的一段文字，言简意赅：

> 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
> 天命、人生合二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
>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天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意。
>
>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
>
> ……

天人合一、新亚书院、新闻学院等均在一处，于是顺便拐到学院看看，昨天曾在“宣伟伯研讨室”（Schramm’Seminar Room）参加学术研讨。宣伟伯，就是曾为国内传播学界高山仰止的威尔伯·施拉姆，宣伟伯是其弟子起的中文名字。他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1980年代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许多年被国内奉为传播研究的“圣经”。他的一位华人弟子余也鲁，就是中大新闻学院的元老，做过系主任（当时还是新闻传播系）。传播学刚刚引进国内时，余也鲁曾陪施拉姆去北京等地讲学，一时掀起传播研究的热潮。没想到，昨天自己的文化自觉报告是在这个地方开讲的，而文化自觉的旨归也在于破除当年的那种迷信和迷思。



云南印象

正在美丽的云南，感受春城无处不飞花的昆明。晚上，到有名的翠湖公园散步。昆明本来就有一种安宁、淡雅、清幽的气氛，翠湖园内更是弥漫着淡淡的诗情画意，池水逶迤，曲径蜿蜒，荷叶遮盖，桂花飘香，点点滴滴的灯火点缀其间，三三两两的游人漫步周遭，恍兮惚兮，如入人间仙境。带着“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的曼妙歌声回到宾馆，打开邮箱，意外地看到你的来信，惊喜之际，想起刚刚听到的一句云南谚语：所有的日子今天最好，今天的日子此刻最好！

我曾说过，祖国的每一寸河山，在我心中都有同样的分量。所以，每到一地，都觉得那么美好，令人流连忘返，借用杜甫《酒中八仙歌》的诗句，甚至“恨不移封向酒泉”，来昆明自然也不例外。前天从北京过来，飞机落地前，俯瞰下面一片浩荡的水域——滇池，心情就有点激动。进入市区，又见沿路鲜花簇簇，姹紫嫣红，绿树翠竹，满目青葱，不由想起一首老歌——“歌如潮，花如海，欢迎朋友四方来”。当晚，同郭老师一起到“国立西南联大”旧址瞻仰一番，旧址就是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立着一块三角形的纪念碑，代表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学校。接着，又去转了转毗邻的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与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园都很漂亮，处处显得精致、雅致、细致，跟南方的环境、气候、文化以及人的气质很吻合，让我等北方莽汉愈发显得粗服乱头，支里八叉。前日上午，结伴去了昆明的西山，主要想看滇池。上大学时，曾背过“天下第一长联”，对滇池早已神往：“五

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可惜,如今滇池也被高速运转的现代化弄得不像样了,站在半山腰都能闻见池水污染的气味。

公事结束后,前往海拔3700米的香格里拉县,入住五星级的“天界神川大酒店”(Paradise Hotel),这里属迪庆藏族自治州。余下几天,都在香格里拉游弋。先去有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松赞林寺,康熙赐名归化寺。在这里,平生第一次见了一位活佛,并且第一次领受活佛的祝福。本来还想同活佛谈点人间烟火,谁知一进去顿感神圣肃穆,无言以对。接着,又去金沙江畔的虎跳峡。关于其神奇壮观,前人之述备矣,不假一二言也。身临其境之际,不禁联想到李白《蜀道难》:

>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当年背唐诗,最喜欢李白的五绝七绝,而最头疼他的古诗长调,尤其是《蜀道难》,佶屈聱牙,不知所云。如今面对虎跳峡,才明白何谓“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

晚上,在一家“客栈”用餐。名为客栈,实为一家民营宾馆,带有古风,更带有浓郁的民俗。陪我们的当地领导,分别来自藏族、白族、纳西族,而且汉名都姓李。藏族出身的宣传部长,是中央民族大学78级的,汉语很好,口才也不错,一路上聊了许多,非常投缘。三个民族的同事彼此亲密无间,手足情深,让人不禁心生暖意。天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外物与内心和谐等,都在这里得到体现。

几日来,虽然所见有限,所闻不多,但内心总是荡漾着感动之情。郭梅尼爱说,记者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要满怀真情地讴歌时代、人民和生活。抹去这些话语的时代色彩,她说的无非是这样一个道理:人间既有刺猬(或苍蝇)及其繁殖的条件,也有孔雀(或蜜蜂)及其生长的环境,关键在于个人的选择。选择做刺猬,那么就整天找这个茬儿、那个茬儿,而这些茬儿确实存在,层出不穷。而选择当孔雀,如郭梅尼等,那么自然乐意展示美丽,乐意“讴歌时代、人民和生活”。对人间丑恶,我同样义愤填膺,对“时代、人民和生活”及其蕴藏的无限美好,我更是心驰神往。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许,将来也效徐霞客,漫游天下,书画山河,赞美人民,讴歌生活!

诗人与诗歌

当下一些所谓诗人，日益躲进自我世界，呢呢喃喃，咕咕哝哝，玩技巧，玩深沉，躲猫猫，猜谜语，云遮雾罩，不知所云。说实话也不想知其所云，因为不觉得有什么拨动人心的所云。按照《天涯》主编李少君的概括，中国文化本来是一种“诗教”，诗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里一直起着类似西方宗教的作用——浸淫、超越、教化。而当今诗人及其作品，不知道还能引起多少人兴趣，这个问题不能仅仅怪罪市场，怪罪人心不古，利欲熏心什么的。也许，某种探索确实需要时间，有待后人理解和接受。但无论怎么新奇，怎么探索，诗言志、歌咏言总是诗的本质及存在形式，没有高洁之志、不能歌之咏之的美感恐怕难以言诗。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如诗如画，令人如痴如醉，相信什么时候都会受人喜爱。韩笑的《教我如何不爱她》虽然朴拙有余，蕴藉不足，但同样让人过目难忘：

日出泰山，
月落三峡，
漓水恋奇峰，
平湖醉彩霞……
呵，心房里珍藏着千年的画，
教我如何不爱她！

鱼游东海，
鸟唱西沙，
塞北萧马，
岭南艳花……
呵，热血里激荡着唐宋的诗，
教我如何不爱她！

浪拍虎门，
雨洗雁塔，
惊雷响戈壁，



祥云照拉萨……
满眼里闪耀着先烈的梦，
教我如何不爱她！

风舞红旗，
泪洒天涯，
长城迎佳宾，
熊猫传情话……
呵，遍体的伤疤抬起了头，
教我如何不爱她！

这里，诗人用一组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的意境，表达了深爱的情怀：千年的画、唐宋的诗、先烈的梦，既是对祖国的赞美，也是对恋人的倾诉。



城市妙喻

读到一篇博文，对几大城市的描绘真是传神，寥寥几笔，京津沪的神态就跃然纸上：

在各大城市中，位于北京附近的天津，也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地方，其历史地位还有些不尴不尬。

她的位置很尴尬。

几个大城市像是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依附于老爷的不同女性，地位不同，处境也各有差别。原配大太太家里有权有势，是门当户对八抬大轿过门的，老爷当然也高看几眼，这是北京。二太太家里有钱，又是上过洋学校的，见过世面，当然也与众不同，上海，侬晓得啦。而最近几年娶的则是几个年轻貌美又懂得勾人，说话嗲声嗲气的，老爷被她迷得不得了，比如深圳。

她算是个收房丫头，不折不扣。本来是大太太的贴身丫头，随着陪嫁过来，还算稍有几分姿色，和老爷接触多了，一来二去也就给收了房，趁着新鲜劲儿也得过几天宠。但春梅毕竟只是春梅，怎么也僭不过去，凡事都得看着大太太的脸色，又没有二太太洋气，那些个更年轻的姨太太仗着年轻貌美得老爷宠幸又不把她放在眼里，所以她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不尴不尬，上不去，下不来的。

……

学堂余韵



这组文字主要源于“网络学堂”的师生互动，一鳞一爪，即兴而发。

课 下 杂 谈

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是在国家政治层面上讲的，而不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上讲的。在日常生活层面上，个人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甚至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都无所谓。

二、为什么国家政治层面必须讲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如自由主义呢？原因很简单，这是历史形成的，也是由总体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总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各种各样的主义纷至沓来，包括自由主义，而唯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顺天应人”，厥有天下。于是，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共产党的思想体系，而且也成为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

三、那么为什么“现在”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呢？作为执政党及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有其合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所谓“科学与价值”；一方面，也是一面象征性旗帜，即其内涵更多地还是实事求是地应对和探求现实的重大问题，从而提出一整套治国方略。而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包容其他主义，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只要这些主义有利于中国的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



语 言 问 题

不少同学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也同它的语言及其风格有很大关系，至于这种风格是否能用“华丽”概括还可商榷。我们不妨欣赏一下《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和结语：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另外，语言及其风格是一门非常高超的“行为艺术”，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表达手段。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就其所讲内容而言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可是效果却有所不同，根源也在于所谓“话语”及其风格。正因如此，毛泽东将“话语”及其风格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看看《反对党八股》一文就知道了。

具体到新闻专业，语言同样是生命所在。一切有影响、有意义、有价值的报道，首先就体现在语言的生命力上，甚至白岩松、敬一丹的成就也离不开他们的说话本领。一位操持过十八般武艺的新闻老人说过，别看现在这个高科技、那个多功能的，把这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剥去之后，你会发现所有记者的所有本事其实还是那支笔。

破解话语迷阵

如今各种话语堆积的黄土高原，已经深深掩埋了学术的金脉和本真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太多神仙的说教，我们已经很难听到英特耐雄纳尔的歌谣。”(昌耀《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特别是各种党八股、洋八股的盛行，更使人们同自己休戚与共的人民与社会渐行渐远。

为了破解这种“今夕何夕”的话语迷阵，特向大家推荐社会学者曹锦清的名作《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以及文化学者黄河清的新著《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附译布迪厄〈遏止野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这些著述直面真实世界，力图揭示真实世界，可将人们从五彩缤纷的云端拽回坚实辽阔的大地，且文风朴实，论述自然，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事情说得透彻，道理讲得

精辟，读来不隔、不涩、不烦，几乎可以一口气顺顺当当看下来。两书的差异在于："黄河"着眼于国内问题，"全球化"着眼于国际事务；"黄河"在平实中彰显大家风范，"全球化"在酣畅中富于内在激情，对中西媒介也多所论列，如：

> 中国众多的政治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只知顺从西方舆论媒体的有意宣传，尤其是出于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情结，认定"全球化"是世界潮流，是历史必然规律，一往情深地拥抱"全球化"，简直是糊涂得不可救药。

这样的著述不仅仅是提供一些新的知识和理论，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还是那句话，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建功立业不能急于求成。用穆青的话说，凡是急于成才的人，结果往往是成不了才的（南振中《与年轻记者谈成才》一书"序"）。其实荀子早就说过："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中美国情

关于中美两国的"国情"，可以做这样的对比。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犹如一盘国际象棋，而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好似一盘中国象棋。它们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都受制于"系统"，即每个棋子的布局和走法，都绝不仅仅只是自身的事情，而是同"左邻右舍"息息相关的，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同的是，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各有各的"理念"、"棋局"、"战略战术"等，常常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两者的最高目标都是，一方面拱卫"老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等，而另一方面战胜"对手"。即使如此，两者差异不容忽略，我们不能拿国际象棋来下中国象棋，正如不能拿中国象棋去下国际象棋，虽然可以彼此借鉴某些精神和原理。

举例来说，总理正在国外访问，跟各路老外谈石油进口，你这里报道说国内石油储备如何如何成问题，那边老外立马把油价提上去了。你说这样的报道算什么？新闻自由？知情权？类似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去"主流媒体"实习一下就知道，何谓"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何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专业与行话

学习任何一个专业、一门学科，也就是掌握一套独特的行话。条条大道通罗马——殊途同归，真理或道理都是一样的，古与今、中与外——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不同的只是这些道路或行话，而离开这些道路或行话，就不可能抵达罗马。

既然是行话，首先就得说得在行。所谓基本功，就体现于“在行”。然后，再想法说得好、说得漂亮。而要想说得地道、说得在行，就非得经过系统的、严格的、正规的专业训练，其中读书、实践与练习等都是必要的环节与步骤。



张 爱 玲

可以在两个意义上谈论她。

一个是作家作品的意义。这方面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正如还有人喜欢她那位汉奸情人的文字一样。

另一个则是象征意义，即她体现的那种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等。这个层面涉及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已经远远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就此而言，张爱玲们可导向白领、小资、超女、超男、芙蓉姐姐等，而不会导向斯诺、卡帕、邓拓、范长江、张严平等。

张爱玲的走红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世风相同步，萧红的落寞同“父老乡亲”的地位下降相一致。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无法确定，但平行的历史进程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仅说文字，那么正好为“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之比提供佐证。司马相如的文字固然漂亮，但内涵却与司马迁不可同日而语。正如张和萧的文字虽然都不错，但内涵却不可同日而语一样。



萧 红

读到一首萧红悼念鲁迅先生的诗，令人心伤：

泪涔涔，雨霏霏，



远渡重洋归；
归来不见先生面，
野草掩墓碑。
路遥遥，夜漫漫，
今生难再会；
我愿化作一支笔，
来世永相随！

当时，萧红刚从日本养病归来，听到鲁迅先生逝世，悲不自禁，写下这首小诗。不愧是一位风华绝代的文学家，一位有情有义的中国人。

周小燕与周恩来

上海音乐学院的周小燕教授，一生培养了许多歌唱家，三四十年代就已名扬世界。不仅人长得“靓”，歌唱得好，而且“德艺双馨”。有次出国访问，老外听说她是“优秀共产党员”，觉得挺意外。她说：怎么，你们以为共产党都是“青面獠牙”？

周总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也是风度宜人的翩翩君子。对此，即使死硬的反革命也不得不由衷折服。不过，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妥协，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话说：如果事情对他不利，那么他连星期天是星期天都不会承认（见尼克松《领导者》）！

张　承　志

在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阵势面前，诗人张承志以富有诗意、血性与才识的如椽之笔，一如既往地抒写正义、良知和公道，展现着一位穆斯林的美丽、英武与动人！

听说刘康来学院讲课，提到“谁是中国的萨义德”问题。我以为不必牵强附会地比附，因为中美的国情大相径庭。如果非得找一个类似萨义德的中国人，那么张承志庶几近之。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就是张承志及其精神的内核，也是游牧之人的共同境界。此种人生境界同小资、白领等不可同日而语。列宁说得好，雄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雄鹰那么高。

回归政治经济学

今年头期《读书》有组头题文章，题为“重回政治经济学时代”。为什么“重回”呢？因为，这些年红得发紫的所谓“经济学”，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及其阶级性，原来自诩的所谓“纯科学”越来越成为误国误民的理论根据。所以，人们越来越觉得纯粹的经济学既解释不了现实问题，又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充其量只解决了“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问题），如今看来还得重回曾经一度被视为过时的“政治经济学”——经济问题必须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换言之，仅仅强调“生产力”远远不够，还不得不重视“生产关系”，仅仅强调“效率”远远不够，还不得不重视“公平”或“正义”！

这些年来，有思想的人为什么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越来越趋于理性和平和，因为现实的发展越来越印证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比如，毛泽东常常批评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只强调生产力，不强调生产关系的倾向，觉得如此下去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从而使中国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后来，这些批评成为过时的东西，大家觉得只要生产力提高了，生产上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然而，这些年的情况越来越让人意识到，发展是硬道理，公平与正义同样是硬道理，而且是更硬的道理。换言之，生产力固然很重要，而生产关系同样重要，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更为重要。中国历朝历代的覆亡往往并不在于生产力落后，而在于生产关系的扭曲。现在谈得较多的“拉美化”问题，也不在于生产力方面，而在于生产关系方面。如果不反思“新自由主义”，不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市场威权主义”“市场专制主义”等，那么中国也将面临拉美化前景，三农、下岗、教育、医疗、治安、环保、腐败等一系列严峻问题，都是拉美化的征兆。毛泽东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读书》的讨论不是没有缘由的。

学问与破案

考证或研究同破案差不多，任何案子多少总有蛛丝马迹。首先设法找出这些蛛丝马迹，然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展开推理，从而得出一些逻辑线索，最后通过实践进行验证，证明了就算破案了，证伪了还得重来。

专 业 纵 横

国 际 新 闻

一般非专业人士，对印度的了解，主要通过电视新闻，而中央电视台通过美国新闻网转播过来的印度新闻，无非是铁路中断、大水泛滥、沉船死人、公路翻车。除此之外，我们对印度几乎是一无所知。久而久之，印度在我们心目中就成为一个充满不幸的可怜的国家。我们并不知道印度每年以百分之六的速度持续稳步的经济增长。因为这并不能激起观众的好奇心，电视台对此也没有兴趣。在当今这个世界，美国的新闻资源正像美国跨国公司一样，具有一种话语霸权，美国人对印度的形象，也通过新闻媒体“拷贝”给中国。以此类推，印度对中国的形象，也是从美国新闻中的中国形象“拷贝”过去的。

美国对中国的报道与对印度的报道一样，不是“天安门事件”，就是走私军火、出售导弹、强迫计划生育、劳改产品、福建船民偷渡，等等。这些即使全部是事实，也只是变化中的中国之一部分。而在美国人的头脑信息库中，它们却成为全部的中国。美国人不了解，也没有心思去了解，中国三十年来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多少提高，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享受的自由已经扩展了多少等。难怪许多美国人来过中国后，都会感叹实际的中国与美国媒体报道的中国往往风马牛不相及。

新 闻 教 育

学习新闻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从实践入手，这是绝大多数记者的成长道路。另外一条是从书本入手，这是新闻教育的路径。两条道路各有利弊，同时也都各能成就大业，只要认真，只要努力。这已为古往

今来的新闻史所证明。

外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好一概而论。中国近百年的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还是形成深厚的传统。至少从人大、复旦、广院等老牌院校，走出了一批批卓有建树的新闻人。与此同时，中国新闻学研究也已拥有丰厚的学术积淀，在众多的专业领域都留下出色的成果。这些都足够研究生阶段学习和借鉴的。

概括起来，一是政治眼光，二是新闻敏感，三是社会实践，四是广博学识——都是许许多多过来人的老生常谈。所以，关键不在于道理，而在于践行。《人民日报》不读，《新闻联播》不看，国家大事不管，天下风云不顾，只沉溺于自己的那点小情小调、小悲小喜，上哪儿培育新闻敏感呢。

于是，还是回到毛泽东的问题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如果对这些问题真有兴趣，建议翻翻《实践论》。这是毛泽东在抗大的演讲，涉及知与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等辩证关系，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传播学史》

1942 年，施拉姆在竞争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一职时，曾向校长呈交一份新闻学院的蓝图：我希望所看到的新闻学院将不会像其自身那样软弱，而是像这所大学一样强壮。它不是一群教师和学生坐在这所大学的边缘地区，摆弄着他们的小玩意，在文章第一段拼凑着关于谁、什么、哪里和何时的情景描述，而是处于这所大学的中心地带的学院，它会以这样的假设开始，即新闻学院所要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

一方面，施拉姆蓝图的基本精神应该肯定和重视，不管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抑或是新闻传播学，都应该提升自己的学术品位和学科地位，应该站在同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平起平坐的高度审视社会现象。

另一方面，这个学科确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甚至是操作性，犹如医学的手术操刀。如果光说不练，或者说只是满足于对社会现象头头是道的评析，而不能对新闻实践或传播实践发生实际作用，那么就像医

学只有理论而没有外科手术一样，势必影响这个学科的发展，甚至是生存。

如何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有机地结合起来，一直是新闻传播学及其教育的一大课题。

媒介与社会的三个关键词

一般来说，大学的学习首先并不在于知识，因为知识是学不完的，而且知识总在不断变化。大学的学习关键还在于方法、视角与思路，即蒋南翔校长说的“猎枪”而非“猎物”。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供给大家的“猎枪”即方法、视角与思路，可以大致概括为这么三个关键词：中国的立场、人民的感情、主流的意识。同样的事物，使用不同的方法、站在不同的视角、遵循不同的思路，则看到的就是不同的景象。

以马噶尔尼使华事件为例。《南方周末》的文章认为，从马噶尔尼到入世谈判，近两百年的中国历史只是走了一个之字，转了一个大圈儿，又转回到原来的起点——“自由贸易，协定关税”。“马噶尔尼访华，卑之无甚高论，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 WTO 时耳熟能详的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乾隆拒绝这八个字，是因为外夷不肯行双膝下跪大礼”云云(《南方周末》2001 年 11 月 29 日)。这套说辞无非来自《两个世界的撞击》，一部充满“傲慢与偏见”的畅销书，同样“卑之无甚高论”。

其实这套说辞的潜台词，无非是说乾隆很蠢，两百多年来的中国人很蠢，“抛头颅，洒热血”的千百万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同样很蠢，因为居然连这么一个“卑之无甚高论”的道理都不明白。同时，也是在说列强或“文明世界”并没有什么“图谋”，它们只是想跟你平等地做生意，和平地搞外交而已。结果，两百年前的乾隆皇帝不明白，两百年后的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不明白。于是，精英及其媒体着急啊，恨铁不成钢啊，第一要务是“启蒙”啊！

不过，按照《视界》第 9 期的文章《是什么遮蔽了史家的眼睛——18 世纪世界视野中马噶尔尼使团来华事件》，或者盛洪论述 18 世纪英国“重商主义”即贸易保护主义的文章《一个划时代的谎言》，则完全不同了。简言之，列强根本不像精英所臆想的那么善良而无辜，乾隆也完全不像他们所嘲弄的那么颟顸而愚钝。

事实上，在讨论课上热议的《大分流》，以及沃勒斯坦、弗兰克、阿瑞吉、王国斌等世界一流学者看来，截至18世纪，人类处在另外一个"世界体系"之中的，其中并没有现在所追述的那么一种"格式化"的历史图景。

如果一定得分个你高我低的话，那么这个体系的中心恰恰是东方。由此可知，乾隆的"傲慢"实在就像现在的美国对非洲的某个蕞尔小国，如博茨瓦纳使团的傲慢一样：上国天朝，物阜民丰，根本不在乎与尔等的"自由贸易"。再说，列强的"狼子野心"，乾隆也不是没有察觉。

总之，知识积累固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方法、视角和思路，亦即"中国的立场、人民的感情和主流的意识"。

三个关键词乃基于三种"反常"倾向：向上（诸如大都市、时尚、豪华、小资等）多于向下（基层、"三农"、"老少边穷"等），向外（诸如全球化、国际化、外语等）多于向内（国情、民生、母语等），向前（诸如Brave New World、现代化等）多于向后（"传统"、"历史"等）。

其实，上与下、外与内、前与后等，都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决然断开。所以，只顾一头而不顾另一头，并且往往是更重要的另一头，那么其结果既使自己的身心发生断裂，犹如人格分裂，同时更会严重制约自己的长足发展。

这个道理一点也不复杂：一个不关注"1200万"海陆版图、不关心"13亿"人民、不关怀"5000年"传统的人，怎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脊梁"呢？中国又不是伊拉克，可以在外国大兵胁迫下，从外面请一帮养尊处优的"临管会"执掌自己的命运——想都不用想！

新中国的媒介与社会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新闻发展，有两本书颇有价值。一是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其中对改革开放前的一系列历史做了迄今最通达的论述，引用的多是一手的文献资料。比如它对"反右"的前前后后所做的描写就远比《往事并不如烟》这样的"文学"作品全面而深刻得多。最新一期《新华文摘》摘录其中一段有关"9·13"事件的文字，让人看得惊心动魄。第二本是方汉奇先生等主编的《正在发生的历史》，一本新中国的新闻发展史，以讲故事的形式叙述。

网络与新闻

平时不怎么上网，故对那些鸡零狗碎、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感兴趣。虽然专业是新闻，但用美国诗哲梭罗在《沃尔登》里的话说："我肯定，我从未在报上读过任何令人难忘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人被抢劫、遭暗杀或死于事故的新闻，读到某座房屋起火、某艘船只遇难、某只汽船爆炸的消息，读到一头牛被轧死在西部铁路、一只疯狗被打死、冬天里一群蝗虫的报道——那么我们就再也不用读其他新闻了。一个足矣。如果你熟悉了原理，你还会关心难以数计的事例和应用吗？对哲学家来说，所有新闻正如它所称呼的都是流言飞语，编辑和阅读新闻的人都是一边喝茶一边闲聊的碎嘴婆子。"当然，他所说的主要是那些商业化的新闻媒体，也包括现在的各种商业网站。

《人民日报》

首先，《人民日报》不是省部级以上高官才看的，普通老百姓看《人民日报》的大有人在，特别是在基层。因为，最权威，最全面，最可信。这也是老外包括美国的CIA，密切关注《人民日报》的原因。

其次，《人民日报》也不是那么boring，它只是同一般小报的风格不同而已。这种差异就如同"大臣"与"小吏"，或萧红与张爱玲。

另外，《人民日报》与中宣部平级即省部级，人民日报社社长和中宣部部长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媒体有三家属于省部级，即人民日报、新华社和解放军报。

说到这里，倒是可以再补充一点，也是那天沙龙略微提到而没有展开的。原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在学院的一次研讨会上，曾语重心长地告诉同学，千万不能忽略两个"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是似乎没有什么"话语权"，也几乎听不到其声音的人民大众；另一个是"政府官员"，尤其是几十万"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这些占人口总数99%以上的人，平时可能根本不被大家注意，仿佛不存在似的。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注意到的，往往是这个星那个星、这个精英那个精英、这个大款那个大款、这个名流那个名流什么的。但是，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恰恰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可能没有声音，但他们有强有力的行

动。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人们就会知道，什么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什么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而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两个“沉默的大多数”。至于“小资媒体”或“中产喉舌”，放在这个层面一估就另当别论了。

两类电影

电影可分两类，一类是好莱坞之类“没心没肺”的东西，像《空军一号》、《生死时速》、《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等；一类则是“有情有调”的艺术，中国的且不说，外国有《三十九级台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两个人的车站》、《卡桑德拉大桥》、《钢琴》等。

《列宁在1918》、《列宁在1919》等，都曾是当年常放的故事片，列宁的卫士瓦西里是那个时代“儿娃子”的偶像——英俊、勇武、忠诚、为天下劳苦大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同当下那些歪瓜裂枣、假模假式的时尚明星实在迥异其趣。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有一个场景：准尉带着5个女兵去搜捕一个落入本军后方的德军伞兵，结果发现却是18个人高马大、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兵。明知不敌，准尉还是决定与敌周旋，等待援军。当时，准尉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那就是我们不能退却，不能避让，因为在自己的身后就是美丽的俄罗斯！

电影VS电视

电影犹如文学——虚幻的、出世的、审美的等，电视好比新闻——真实的、入世的、功利的等。虽然都用“文字”——镜头，但实际上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或如记者出身的台湾电影演员兼导演刘德凯比喻的，电影与新闻处于“南北极”。现在许多文学院弄新闻之所以弄不好，就是因为犯了这个毛病。遗憾的是文学与新闻的差异众所周知——虽然都用文字反映世界而实则完全不同，电影与电视的差异却鲜有注意。

《我的团长我的团》

最近一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就是一个颇堪玩味的案例(类似赵月枝新著 *Communication in China* 的案例)。这是第一部反映“中国远征军”的影视片，由《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等剧导演康红雷执导。在英勇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中国远征军”是一段悲壮插曲。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日军步步进逼，为了配合缅甸英军的对日作战，并保卫自身西南交通线，中国迅速组建了一支远征军，由中国战区“太上皇”史迪威统帅，聚集了一批名将，如清华校友孙立人、与清华有缘的杜聿明等，许多西南联大学生也踊跃参军，如梅校长的公子。远征军入缅后，由于指挥混乱，英军又私心颇重，只想保存自己，尽快逃之夭夭，而不顾国军死活，结果数十万大军土崩瓦解，溃不成军，机械化的 200 师师长戴安澜将军殉国。远征军溃败后，分为两支，一支由史迪威率领，西撤印度；一支由杜聿明指挥，东返中国，返国途中，进入野人山，其间瘴气弥漫，蛇蝎横行，部队死伤枕藉，惨不忍睹。清华校友、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穆旦，同梅公子一样投笔从戎，参加了远征军，据其好友王佐良 1946 年发表于伦敦的《一个中国诗人》记载：

> 1942 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想到过人能够这样疲倦……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叮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让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只说道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的奇异的、看了使人害怕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

对书写这样一段惨烈历史的作品以及长于英雄题材的导演，人们自然翘首以待，寄予厚望。可惜结果让人失望。作品本意原想塑造一批另类的英雄，他们本来丢盔卸甲，军无斗志，吊儿郎当，偷东西，贩私

货，正如国军普遍存在的情形一样，而后来一个个慷慨赴难，英勇杀敌，倒在抗日的疆场。这样的题材处理得当，有望成为一部壮怀激烈的大片，以康红雷的艺术水平和精神格局也望成为中国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然而，遗憾的是这样好的题材、这样好的导演，最后却弄成鸡肋——节奏拖沓、情节散乱、故事苍白、对话冗长，明显感觉为了拖沓而拖沓。而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的介入——每集一百万的售价。于是，“有骨头、有头脑、有心肝”（韩少功语）的康导，似乎也架不住这种利诱，将一个好端端的题材糟蹋了。

《风声》与《建国大业》

十一晚上看了电影《风声》，比《建国大业》好看。虽然原作本身就是茅盾文学奖作品，并有电视剧《暗算》的精彩在前，但电影再创作的高超之处还是不少，包括几位演员的出色演绎。其中尤为突出的一点是将原作的军统故事改为共产党的抗日斗争，犹如《潜伏》将共产党故事改为军统特务反水。不管主创人员是否有意，看后都让人不禁想到那部为汉奸招魂的《色·戒》。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就知忠奸之别与正邪之分，所谓“汉贼不两立”。

复旦的“两典一笔”

说一千道一万，新闻人最终还是靠笔头吃饭，别听现在怎么咋呼，怎么忽悠，什么融合了、新媒体了、改天换地新时代了，最后发现新闻还是新闻，社会还是社会，记者的本事还是手头一支笔。本周，复旦举行新闻教育八十年庆典，复旦新闻的传统就是“两典一笔”，即古典、经典和文笔。其实，这也是古今中外一切“高端”新闻教育的共同目标。

清华新闻人

清华大学在其一百年的历史上，不仅为民族复兴书写了辉煌篇章，而且也为新闻传播贡献了自己的心力，并留下一串赫赫有名的身影。其中，既有梁启超这样的新闻传播巨匠，又有章汉夫这样的革命报人，既有羊枣、胡乔木、乔冠华等评论家，又有俞颂华、赵敏恒、徐铸成等名

记者……他们既是新闻人的典范，也是清华人的自豪。

作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被公认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报人与新闻传播学家，对现代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思想的建树堪称开天辟地。如果说司马迁是古代的传播大家，那么梁启超就是现代的传播大师。他一生创办或主持了十七种报刊，特别是戊戌前后的《时务报》、《新民丛报》等，震古烁今，轰动朝野，所谓“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以他的报刊文章为标志的“时务文体”，清新刚健，气势如虹，一扫万古凡马空，开创了白话文的新时代。他提出的一系列新闻传播思想，如“去塞求通”等，直到今天依然为人所重。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江苏盐城人胡乔木有“中共中央一支笔”的美誉，曾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秘书，参与起草了两份历史性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同为盐城人的乔冠华以外交家闻名于世，曾率中国代表团第一次登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发表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著名演说，一时全球瞩目，风云激荡。同时，他们又是卓有影响的评论家。抗战时期，他们的评论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有“北乔”“南乔”之誉。“北乔”胡乔木还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等新闻传播要职。

作为一代报人，俞颂华五四时期就主持“四大副刊”之一——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0 年，他率俄文学校毕业生瞿秋白前往苏联，成为十月革命后最早访苏的中国记者，并与列宁、托洛茨基等相见。1937 年，赴延安采访，见到毛泽东、周恩来，被清华水利专家黄万里之父黄炎培先生称为“新闻界之释迦牟尼”。《文汇报》创办人徐铸成同属 20 世纪中国报业奇才。《文汇报》诞生于风雨如磐的“孤岛”时期，高举抗日旗帜，挺起民族脊梁，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他开创的办报风格，既熔铸古今，又会通中西。1950 年代，毛泽东对徐铸成说，“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俞颂华和徐铸成还是有名的新闻教育家。俞颂华曾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苏州)新闻系主任，徐铸成晚年参与创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中国第一家以传播命名的新闻院系。

……

抚今追昔，不管是峥嵘的革命岁月，还是火热的建设年代，清华园走出的许多学子都耕耘在新闻传播领域。他们或以笔为旗，书写正在

发生的历史；或激扬文字，纵论天下风云变幻；或运筹帷幄，擘画新闻传播的宏图大业；或兢兢业业，为新闻传播的大厦添砖加瓦。虽然其中许多人默默无闻，但在新闻传播的风雨历程上无不留下点点足迹，付出滴滴心血。小说《红岩》里刘思扬的原型刘国鋕烈士，电影《声震长空》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领导人的原型傅英豪等均为代表。

为了继承、发扬与光大清华新闻传播的历史传统，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2002年清华大学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范仲淹嫡孙、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出任院长，提出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理念。这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起点。新一代清华新闻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秉承先辈梁启超先生的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在，短短八年，已有一批清华学子活跃于新闻传播的舞台：现为《人民日报》记者的李强同学及其《乡村八记》得到温家宝总理的赞许，现为学院青年教师的周庆安博士被聘为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原《南方周末》调查记者刘鉴强以一部“新新闻”作品《天珠——西藏传奇》受到瞩目……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随着新清华面向新百年，清华新闻传播学科及其学子势将以更加远大的抱负，体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

（刊于《水木清华》2010年第8、9期合刊）



书 里 书 外

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颂

共有十位青年作家获奖。西部作家红柯榜上有名，代表作《西去的骑手》。获奖评语如下：“他继承了草原民族的叙事和咏唱传统，在单纯、直接中抵达庄严和宏大，伸张了速度、体积、天真、力量等英雄般的人性价值。红柯以鲜明的写作个性丰富了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小说的想象空间和表现能力，开拓了新的精神向度。”《白鹿原》、《尘埃落定》、《西去的骑手》等，最初都是“无名之辈”的无名作品。

大 师

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在如诗如歌的《白轮船》里，塑造了一个可爱的莫蒙爷爷，他说了许多大智若愚、耐人寻味的话，如“先知不知道自己是先知，只有强盗才知道自己是强盗”。

先知或大师不知道自己是先知，往往默默无闻，只有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才能为人所知，为世所重。而当下红得发紫的所谓大师，可能不旋踵即“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些所谓大师都有一群或主动或被动的粉丝，互相策应，彼此哄抬，遂使大师越来越像大师。而先知往往特立独行，不屑于此，于是寂寂无闻。不过，有道是，历史自会证明价值。



阅 读

阅读周策纵，发现五四运动如此深奥、如此生动。

阅读蒋廷黻，发现老清华确实大师云集、群星灿烂。

阅读费正清，发现“伟大的中国革命”之鲜活。

阅读斯诺，发现火车不是推的，经典不是吹的。

阅读陶菊隐，发现名记者都有“大境界”。

……

重读马克思

响应助教号召，重温马克思及其相关经典。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读到许多格言式的警句：“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国民经济学（如当下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西马”或“新马”的经典，恰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是“正统”马克思的经典。所以，也就成为批判性传播研究的重要文献。

继续阅读：《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人大版），英国肯特大学的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麦克莱伦代表作，涉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如葛兰西、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阿尔都塞作品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最为警觉和最为现代的再阐释”（德里达），代表作包括《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等。他的思想和文字，可用“深入浅出”概括。《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中的价值观念》（商务印书馆），美国学者宾克莱的名著，由北京大学洪谦先生推荐出版，其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后裔的论述非常精辟。《〈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人大版），作者孟氧为人民大学教授，既是一部学术名作，也是一部艺术作品。

《西行漫记》

既有历史细节的捕捉，又有时代精神的把握。

既有理性的客观呈现，又有激情的奔涌浩荡。

《黄河边的中国》

对《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看法，见仁见智，完全正常。但一定说某

某研究不能这么做，某某研究只能那么做，是不是也有点武断呢。本书及其研究取向，是个很大的话题，简单地说，在我看来，“黄河”延续的是《乡土中国》一脉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即所谓“实事求是”。作者并非不会西方那套量化统计的研究方法，他做过许多这方面的工作；也并非不懂西方的一套思想理论，他也写过类似西方哲学史一类的著作。他之所以写“黄河”，除了一位中国学者的责任感，也是因为他有意想破解被“洗脑”的“所知障”，希望尽可能(尽管不可能)以无知无识的状态，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当然，“黄河”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确没有太多“创新”。其理论是温铁军等“三农”专家的习见，其方法则是《街角社会》一书开启的参与式观察。之所以产生这么广泛的影响(仅以版次和印数论大概是1990年代后最多的一部学术类著作)，主要可能还在于语言及其风格，即古人说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谁让人家写得那么漂亮，奈何？

不管怎么说，中国现在确实“进步”了。特别是学术思想，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非孔子，贬周公”，只要能自圆其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谁把谁怎么样。而且，现代人还怕别人不把自己怎么样，看看网上那么多声音，有谁去听呢，发出这些声音的人还巴不得你去跟他“理论”，可惜没人跟他理论，因为大家都很忙。

《冰点故事》

忙里偷闲，一口气读完《冰点故事》。“一口气”是自己衡量好书的土标准。感想很多，一言难尽，先偷懒抄一段“后记”里的话吧：

> 我只想告诉读者：在一个大报编辑的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我还想让本书读者看到：在这个国家里，尽管有种种令人愤慨的现实，但善良、勇敢、坚韧、抗争、同情心、爱、创新……这些全人类共同尊崇的优良品质，仍在默默地、顽强地存在和生长。如果不是为了捍卫它们，我不知道我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价值。
>
> 我想，只有那些总是感到“有责任”的人们，才应当从事新闻这个职业，才能在这个职业中感到快乐……
>
> 对新闻这个职业，我能说的，就是这样几句话。

读书体会

借花献佛补充几点读书心得：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 （《论语·为政》）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礼记·正义》）
勿将自己的大脑变成他人的跑马场 （叔本华）
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晏子春秋》）
主义可以变，国情没法变 （温铁军）
……

民国年间那批学者的本事，首先不在于懂得多少，而在于“化”的能力，即将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然后自主创新，蔚为大家。

诗歌与诗人

看看昌耀、周涛，还有闻捷。或如雪山，冰清玉洁；或如大漠，壮怀激烈；或如草原，清新刚健！现在娃子真可怜，从小到大被各种变味的“音乐”、“小说”、“电影”、“诗歌”践踏得乱七八糟。

张承志指出，印刷垃圾堆积的黄土高原，已经深深地掩埋了学术的金脉。同样，文化垃圾堆积的黄土高原，也已深深掩埋了精神的血脉。

1998年，昌耀在访问俄罗斯后写下一首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吞吐着英雄主义气息，仿佛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一般恢弘壮丽、气势磅礴的长诗《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这首现代“离骚”流露的思绪与意念，可以说与批判学派的精神一脉相通：

我在物欲横流的世间，“堕落”为一个“暧昧的”社会主义分子。此际朝觐几代人的精神的家园，纯是一次不期而至的殊遇。而现在，我能够用平静的心境，称自己是半个国际主义的信徒。

看哪，滴着肮脏的血，“资本”重又意识到了作为“主义”的荣幸，而展开傲慢本性。它睥睨一切。它对人深怀敌意。它制造疯狂。它蛊惑人心。它使几百万儿童失去父母流落街头。它夺走万千青年人的生命。

这个世界充斥太多神仙的说教，而我们已经很难听到“英特纳

雄耐尔”的歌谣。

好诗太多了，由心发、由心赏。如屈原、《诗经》、魏武、陶渊明、唐诗、宋词、元曲、现代诗、朦胧诗、先锋诗等，如普希金、莎士比亚、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勃朗宁夫人等。仅仅一部《古诗源》就有多少名篇佳句，读读诗人周涛的散文名作《读〈古诗源〉记》就知道了。

百年遗书

“百年遗书”包罗广泛，林觉民“与妻书”自然在内。此外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王国维先生的“五十之年，唯欠一死”，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阮玲玉的“人言可畏”，人民艺术家赵丹的“我不喜欢哀乐，我喜欢贝多芬”，原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将军的“党对我很好，我也无愧于党”，“党国元老”于右任先生的“故乡不可见，惟有痛哭”等名篇。

外国部分有篇拿破仑给儿子的遗书，最后一段写道：“让我的儿子经常读读历史，并思考历史的重大事件：只有历史才是唯一、真正的哲学，我希望他无愧于自己的命运。”

每封书信后面的“背景资料”同样有益有趣，耐人寻味。比如，送赵丹遗体去八宝山的灵车，竟是周总理当年用的同一辆车，灵车里传出的不是哀乐，而是赵丹喜爱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

阅读是今天的主题

今天，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网络、电视甚至手机上面获取信息，但这些绝大多数只是信息而已。只有当我们拿起一本书——当然是值得一读的书，我们才会被带进一个真、善、美的世界。用罗素的话说：“阅读将使我们与伟大的人物为伍，生活于崇高的思想的渴望之中，并且在每一次困惑中都会被高贵和真理的火光所照亮。”



《当代》

本期《当代》的打头作品《黄河殇——花园口·1938》，让人对那段

历史有了更加丰富的理解，同时感叹历史真相如云似雾，变幻莫测。作者邓贤是抗日将士后代，有多部抗战作品，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国之魂》，重新钩稽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悲壮历史，写得荡气回肠，气壮山河。本期《当代》还有一篇对外经贸大学德语教授虎头的散文《鞭影下的尼采》，写尼采与莎乐美的悲欢离合，文笔轻俏，别有意趣，如：“邓丽君在《四个愿望》中说，每个女人需要四个男人：偶像、爱人、父亲和欲偶。……我深信，每个女人都走在寻找四个男人的路上，可惜她们绝大多数都倒在仓促的婚姻中。”

治乱兴亡

眼下，唐突先人，鄙薄经典，俨然又成为时尚，势头不亚于“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时贤更是竞相加入这场大合唱，并美其名曰解放思想。貌似走红的某名流，为了洋学位，写了篇博士论文，从屈原一路骂将过来，中国历代诗人差不多骂了个遍，陶渊明、李白、杜甫、李商隐、辛弃疾、苏东坡、柳永一个都不少，什么中国文化是流氓文化，中国诗人是流氓诗人云云。显然，与其说别人都是流氓，不如说恰恰暴露自己的流氓心态——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看到另类文人及其媒体糟践水浒、三国等，仿佛中国经典同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对此没必要一一理论，下面仅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角度，谈谈《三国演义》的微言大义。

在民间，三国故事家喻户晓，三国人物妇孺皆知，这般千百年绵延的文化传统，不是几个舶来的大字眼就能轻松打发的，如此经典若无值得深究的内涵，怎么可能影响千家万户，又怎么可能流传千里万里。一生培养了十六位院士的化学家、清华校友时钧先生，年少时常常在书包里藏着三国、水浒，有一次与同学打赌，看看谁能背出更多的小说回目，结果三国背完，又背水浒一百零八将。若按时贤的高论，则意味着这么多年、这么多人都愚不可及，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三国粉丝都属于浑浑噩噩，有待精英启蒙的群氓。果真如此的话，岂不有违名流雅士奉若神明、顶礼膜拜的信条，如人人生而平等什么的。仅此一端，就表明蒙昧的未必是平民百姓，而恐怕是峨冠博带的大人先生。

如果心胸豁达，心态平和，当不难体味三国故事的生趣盎然，元气淋漓，其中既包蕴着为人处世的道理，又隐含着治国理政的玄机。以开

篇的名言为例，"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有大道存焉。如果说分久必合是治世，那么合久必分则为乱世，而治乱兴亡不仅构成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而且也属于人类世界的第一命题。撇开种种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天下事说到底正如赵汀阳概括的无非治乱二字。他说，"无论一种制度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是美德主导的还是权力主导的，只要能够形成治世就是好制度"。道理再简单不过，没有哪个平头百姓愿意生活在硝烟弥漫的乱世，哪怕那里开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鲜花，命且不保，赏花何为；同样，没有哪个普通人家不愿意生活在国泰民安的治世，哪怕国王当政、大臣弄权。这个道理，普天之人仅凭本能就可心领神会，特别是身处"9・11"、"3・14"、"7・5"的普通民众更是感同身受。

逻辑上讲，讨论治乱兴亡，不能囿于各自为政的"国家"，特别是现代地缘政治以及政治学意味的国家，而在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天下"。因为，天下概念包含着普天之下、天下为公等无外之意，类似于《国际歌》唱的"英特纳雄耐尔"。而国家往往以邻为壑，一国之兴意味着他国之亡，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更是一种利益的集合体，每个集合体充其量可以保障自身的和平安宁，而无法兼顾天下人的共同利益。相反，所谓丛林世界实际上属于礼崩乐坏的乱邦、乱世，想想当年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再想想当下这个"起火的世界"（蔡爱眉）或美国在今日伊拉克造成的局面，就不难理解这种局面及其根源。人类不能为了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和平安宁，而让其他国家和人民一直承受天下大乱的世道。

那么，如何求得天下太平，万邦和谐呢？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昭示一条普世价值：以王道对霸道，以教化对强暴。因为，再强大的力量，相对天下也显得弱小，就像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让全世界臣服。即使暂时让全世界臣服，也不可能心服口服，更不可能永远心悦诚服，就像貌似强大的蒙元帝国。所以，深谙此道的中国人自古重视仁义道德，强调礼乐教化，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包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而诸如此类的大道理，也在三国故事中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三国并非只是杀伐攻取，亦非只有阴谋诡计，那些曲折生动的故事、活灵活现的人物，特别是三国归一的结局，无所不在地昭示后人：天下治则人人安，天下乱则家家亡，贵为皇亲国

戚、王公大臣、文人雅士也在劫难逃；至于治乱兴亡之道，不在以暴易暴，而在世道人心，在玄德、孔明为典范的仁义礼智信，如七擒孟获，如鞠躬尽瘁。

安史之乱爆发后，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妻离子散，最后流落四川。当他徘徊于成都武侯祠，面对千古贤相，怅望天下兴亡，禁不住写下传诵不朽的动人诗章《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演义》开篇引用的那首《临江仙》，更是道尽治乱兴亡的无限感慨：

>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
>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进而言之，对待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应该本着前辈大家谆谆教诲的同情之理解，先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贴着实际，设身处地讨论问题，而非高高在上，用一套僵化教条说三道四。这是知人论世的起码要求，也是中国人温良恭俭、善待一切的天性。借用时贤喜欢引用的套话：我不喜欢你说的话，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近一百年前，英国作家G. K. 切斯特的一段话更意味深长：

> 传统即是给予我们社会中最不显眼的那个阶层——那就是我们的先人——投票的权利。这是一种让死去的先人享受的民主。传统拒绝向一小批偶然还在世的、傲慢无比的权势集团投降。所有的民主派都反对由于出身地位的偶然因素而剥夺人的投票权，传统则反对由于死亡的偶然性而剥夺先人的投票权。

世上的伟大民族无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充满敬畏，珍爱有加，唯独另类文人及其喉舌对祖先如此轻薄，对经典如此放浪，如果说反思的话，这才是真正值得反思的，用北京大学美学教授叶朗的话说：“一个民族只有尊重自己的祖先和文化，才能获得其他民族真正的尊重。”

新中国的苦难辉煌

关于新中国，真是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刚刚读完国防大学少将教

授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写的是抗战前中国的大历史，尤其是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与日本军阀四股政治势力在中华大地上角逐的活剧，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我想，如果将来有谁再写一部类似的、新中国的“苦难辉煌”，特别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重塑中国、翻转世界的伟大历史，那一定更是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用一位开国将领写给女儿的信来说：“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

2010 私人阅读史

2011 年第 2 期《新华文摘》有一篇李杨的《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值得关注。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十年前即 2001 年曾发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洞察。“社会主义现代性”一文，可以说延续了他的这种探索与思路。本期《新华文摘》还有廖文《文学的责任》，原刊《人民日报》，虽然略显空泛，四平八稳，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意味同样不可忽略。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类似问题，包括李杨同事陈晓明教授最近的《在历史愿望与朴素的生活书写之间——重读〈创业史〉的文学意义》，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时代潮流与思想新风。

年终岁末，一些媒体又忙活各自的图书“排行榜”。作为一介书生，自然没有这等“公共”能耐，只好自娱自乐地翻检过去一年的“私人阅读史”，仅凭印象，自觉如下著述细读之下可圈可点：

——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

——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的《中国香港 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南开大学华庆昭教授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

——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研究员的《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程巍研究员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 年代与文化领导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洁非研究员的《典型文坛》与《典型文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瑜研究员的《悠悠山河故人情》

——中国政法大学应星教授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华中科技大学吴毅教授的《小镇喧嚣》

——新疆作家刘亮程的《凿空》

——香港作家陈冠中的《盛世》

……

此外,有一批专业书也令人难忘,包括《张友渔学术论著自选集》“新闻”篇,人民大学高钢教授的《新闻报道教程》、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敏研究员的《苏报案研究》、美国记者杜鲁门·卡波特的名作《冷血》、澳大利亚记者约翰·皮尔格主编的《别对我撒谎——23篇震撼世界的新闻调查报道》、中国记者玛雅的《亲历美利坚》与刘鉴强的《天珠——藏人传奇》。

与此同时,一边欣赏,一边整理,集纳了二十首“中外名曲”,如《康定情歌》、《瑶族舞曲》、《北京喜讯到边寨》、《伏尔塔瓦河》、《纽伦堡的民歌手》、《乘着歌声的翅膀》等,聊作新年礼物,借花献佛。听说白宫欢迎胡主席的晚宴上,钢琴家朗朗演奏了一曲《我的祖国》(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属另一部名为《我的祖国》组曲),神经敏感人士啧有烦言,因为乐曲出自抗美援朝的经典影片《上甘岭》,而抗美援朝是美国及其粉丝“永远的痛”。毫无疑问,这属于无心插柳的巧合,各方只是基于朗朗所谓音乐美的考虑而已——谁让刘炽的旋律优美如歌、令人陶醉呢?但这里也不能不承认隐含着音乐或文化与政治的血肉联系,比如熟悉此曲者自会联想“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等歌词。文化与政治的联系可能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距离,但不可能了不相干,犹如天上人间、世道人心貌似互不相属(天上是天上,人间是人间),而实则又一脉相通,亦即前述《新华文摘》文章所揭橥的话题。



社 会 话 题

政治与政治体制

关于政治以及政治体制，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分析得非常透辟，纵横捭阖，深入浅出，就像王绍光的《民主四讲》。赵汀阳的精辟分析，无法在此详细展开。倒是王绍光讨论这个话题的一点看法值得一提：

> 在讨论中国政治时，我们常听到一个说法，中国只有经济变革，没有政治变革。这里同样存在对"政治"的定义问题。说没有"政治"变革的意思恐怕是西式政治（多党制、全国竞选、舆论自由）还没有在中国出现。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定义，把"政治"定义为权力关系，中国似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革。
>
> 很多人都问到中国到底有没有政治改革，然后都得出结论没有政治改革。我觉得，这要看你的政治改革的标准是什么。我先打个比方，如果来定义什么是"美"，有人下了一个定义，说金发碧眼是美，那你在中国就找不到美了，因为你的标准已经使你在中国找不到美了。……没有出现多党竞争的体制就不叫政治改革，那就确实在中国找不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与此相似，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的如下观点同样直指要害：

> 我们的宪法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有一些根本的内容从来没有修改过，比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等等，这些概念都围绕"人民共和国"展开。……尽管"人民"的内涵可以变，但是人民共和国本身是不能变的。所以，我认为核心问题就在于：当人们在说民主的时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

制下说发展民主呢，还是要废掉这个体制，在新的政治基础上重建民主？说得更直白一点，是在维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下发展民主呢，还是废掉这个宪政体制，发展竞争式的多党民主？如果是前者，从法理上就是主张落实宪政，如果是后者，从法理来说就是革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西方人和不少中国人一直在说，中国经济在增长，但是政治体制滞后，而且往往危言耸听地说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不能进行下去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这些说法从来不是事实，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断在改革，这种变化是在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都能够感受到的。其二，当许多人在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改不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假定其目标不是宪政改革，而是民主革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国情

常说"中国国情"什么的，什么是中国国情呢？概括地说：

第一，中国是农业大国，而且这种情况不会根本改变，至少一百年不会根本改变。因为，中国有 13 亿人口日日嗷嗷待哺，指望用外汇在国际市场上买粮度日，无异于痴人说梦，异想天开。一些精英喜欢侈谈"国际接轨"什么的，正是忽略或无视这个基本国情。

第二，中国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特别是土地资源、水资源、石油等矿产资源越来越匮乏，从而构成一对持续的、总体的矛盾关系。

第三，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而这种发展又"不平衡"。比如，既有灯红酒绿不亚于纽约的地方，又有"老少边穷"几近"贫民窟"的地方。

第四，中华民族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庸、平和、讲究和谐，祖先的尚武精神已经泯灭，列强的黩武意识又没有学来，不可能依靠海外扩张解决自身发展的矛盾。否则，够那些鼓吹"全球化"的海内外人士喝一壶的——想一想，十数亿失去土地的、没有任何生活保障的人，一旦被鼓动起来，拼命向欧美"天堂"移民、拓殖，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历史图景啊。

……

一言以蔽之，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长的



大国——这恐怕是最大的国情,一切情况与思考归根结底无不由此而来。比如,大国犹如大人,肯定比小孩吃得多。再如,大国尤其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大国,自有气吞万里的气魄、壮志凌云的抱负,当然也有不同寻常的麻烦,中国、俄罗斯、美国、印度等均属这样的大国。所以,听到诸如中国与新加坡之类的比较,就难免想起那个笑话:母蚁对公象说,“我有了,是你的”。

面对这样的国情,不能不从一种“高远”的层面考虑问题,不能不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现实,而不能仅凭一些抽象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如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等。真想为天下人谋福利,就得从天下的角度考虑问题,然后设法解决问题。《读书》——新闻学院学生第一本必读杂志,曾在头题发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的文章《巨人的瘸腿:从城镇医疗不平等谈起》,就属于这样的典范。

事实上,胡温新政已经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而若想理解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是实践性,包括实事求是的内涵;二是人文性,即对所有人的尊重,而不是只对一部分或少部分人的高看。所以,马克思有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过,这句话有个前提,前面还有一句,往往被一些拉大旗作虎皮的时贤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中华文明的兼容性

昨天,几位博士开题,事后老师闲聊时还谈到,中华民族是最兼容并包的民族,什么宗教都接受,什么信仰都不排斥,而且还都能和谐统一地融为一体。不像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打来打去,杀来杀去,只为别人跟他的信仰不一样。

现在民间的基督教信徒貌似不少。据说,还把流行音乐改编成各种“劝诫歌”,如“走啊走啊走,跟着耶稣走”。冯玉祥号称“基督将军”,所部都信基督教,冲锋陷阵高呼耶稣基督等口号。不过,其部军纪严

明，也是有口皆碑。

君子与小人

北京师范大学顾诚教授的《南明史》真乃心血之作、生命之作，同时也无愧大家之作。开篇第一段，就写得何等壮阔，气势非凡："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和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书里除对这段历史清晰晓畅的叙述——不亚于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对东林党人的批判。

提到东林党人，人们就会想到那副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因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们是一群冰清玉洁之士，而实际上情况远为复杂，甚至不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所能概括。与魏忠贤等阉宦相比，他们自然以正人君子著称或自居，但就误国误民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点不比其对手逊色。一来，"他们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能手，对弘光朝廷的覆亡负有直接责任"；二来，更重要也更可怕的是，他们往往自居道德高地，以无可比拟的道德优越感俯视群氓，从而将任何事情都推向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好即坏的决绝境地，从而使任何妥协、商量、讨价还价等都变得不可能。清人戴名世早就指出："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顾诚说得更直截了当：

> 人们常常受旧史籍的影响，以为东林、复社人士大体上都是骨鲠正直之人，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团体，其中光明磊落者固不乏人，但由于明末东林—复社名满天下，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势力，许多热衷名利的人也混迹其间，变成一个大杂烩。
>
>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言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不仅迂阔，而且褊狭，表现为党同伐异、门户之见等。对此，明

史大家谢国祯在其名著《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赵园在获得首届长江读书奖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里，都有专门而犀利的剖析。谈这些似乎抽象一些、辽远一些，其实跟现实联系起来就清楚了。比如，一些所谓“自由党人”就属当代的东林党人。他们同样怀着褊狭的门户之见，以所谓“自由”、“民主”、“宪政”等“清直”党同伐异，不容商讨，一副“真理在胸笔在手”（红卫兵语）的架势，而且，同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文明与野蛮

宋朝是个武功孱弱而文治斐然的时代，文学艺术如宋词、哲学思想如禅宗等都彪炳千秋，即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同样达到精致、细腻、典雅的境界，这在当时的一些文人笔记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以及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都有详尽叙述。看看那个时候的人活得多么艺术，多么讲究，多么有滋有味。诸如此类的历史遗迹，让人有时不由思量一个“反主流”的观点，即野蛮往往战胜文明而不是相反。

流浪与游牧

内地人喜欢说流浪什么的，而边塞人喜欢说游牧。游牧不仅是一种生存状态，而且更是一种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马平川的戈壁滩，放开喉咙好唱歌。

新中国：素描·写意·扭曲

社会历史犹如大江大海，浩浩汤汤，特别是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更是波涌浪翻，变幻无穷。与此相对，任何理论、任何叙述、任何概括都极其苍白乏味，所谓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面对广袤的社会人生，面对上下千万年、纵横千万里的世界，首先应该保持一种敬畏，即钱穆先生一再说的“温情与敬意”，即使不得已而表达也在心底明白，自己所知所述实乃沧海一粟或冰山一角，而远非实际发生的历史和实际存在的世界。比如，当下形形色色的六十年话语，不管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充其量不过是共和国恢宏壮观景象的现实主义

素描，或浪漫主义写意，甚或现代主义扭曲。“特别是”涉及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涉及他们六十年所经历、所感受的万千变故，就更使各种各样的话语，尤其那些“精英”话语显得幼稚可笑。毛泽东说过，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昨天与一群博士、博士后聚会，谈到“文革”问题时还指出，现在各种“文革”话语可以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不可完全当真，因为貌似强大的时兴话语不过是表达了个别精英的感受和认识，同千百万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多少关系，包括一些名流的所谓“牛棚回忆”。

总之，先得保持一种平常的心态、开放的心态，然后才可能把握历史的丰富蕴涵，体察人生的无穷况味。否则，先把自己的内心封闭了，定型了，那么，就只能看到一个逼仄的世界，甚至扭曲的世界。

民主如何正当

赵汀阳在《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里，谈到民主如何正当的话题，值得三思。他认为：

> 就民主本身而言，根本就没有正当性。假如人多就等于道义所在，那么有理就等于声高。从德性上说，以多为胜甚至不如恃强凌弱体面，“多”不算本事。
>
> 柏拉图以来许多最重要的思想家都质疑民主，他们有可能什么地方想错了，但绝非无理，他们对民主的怀疑至少比今天世上流行的对民主的盲目和过度颂扬更为深刻。
>
> 民主的致命问题是，民主与专制一样伤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同样没有正当理由。要证明多数人伤害少数人好过少数人伤害当事人，恐怕太难。而且，关于专制总是迫害多数人的故事其实也不太真实。在正常情况下，专制采取的也是维护多数人利益而迫害少数人的政治策略，因为这样才能获得更多人民的支持而巩固统治。只有不可理喻的暴君才会昏到搞成众叛亲离，或者只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专制政府才会狗急跳墙与多数人为敌。
>
> 民主本身虽然缺乏政治正当性，但却可以使公共选择具有程序合法性，从而使政治质疑失去理由（因为政治选择是人民自选的），因此民主能够成功地回避对政治正当性的深度追问。

只在一个特殊语境中，民主才是充分正当的……也就是所谓专制或集权的语境。但在反抗专制的斗争胜利之后，民主就由反抗压迫的行为演变成优势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民主。当民主由反抗的政治变成常态的争权政治，由反抗强权的王牌变成争权夺利的王牌，民主的正当性就基本终结了，因为一旦民主完成了反抗少数人的暴政这一政治使命，就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蜕变趋势。如果忽视民主蜕变的这一秘密，就没有真正理解民主。

为了克制民主的蜕变，就必须使民主受制于能够压缩民主空间的政治条件，这就是法治和自由。

……

献给贝多芬……

早年求学于西南联大、晚年定居于清华园的九叶派诗人郑敏，有传世之作《献给贝多芬》。作品属于常读常新的佳构，乐圣属于平生崇仰的高贵灵魂。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再录此作聊表心意：

人们都在痛苦里哀诉
唯有你在痛苦里生长
在一切的冲突矛盾中从不忘
将充满希望的主题灿烂导出
你的热情像天边滚来的雷响
你的声音像海底喷出的巨浪
你的心在黑暗里也看得见善良
在苦痛的洪流里永不迷失方向
随着躯体的聋黯你乃像
一座幽闭在硬壳里的火山
在不可见的深处热流旋转
于是自辽远的朦胧降临
你心中
神的宏亮的言语
霎那间千万声音合唱圣曲

学问八俏





这组系列讲座的对象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05 级研究生，主题为"研究生学术基础要素"，时间从 2005 年 8 月 31 日到 9 月 9 日，历时两周，一共八讲。承蒙五十余位研究生辛苦记录和整理，遂有初稿。

一个关键点

欢迎诸位新生!

各位都是从全国各地网罗的精兵强将,起点都很高。不过,这里想强调一下,你们还是把这个起点放一放。一次,清华老校长蒋南翔请求上海方面给清华推荐学生,人家问有什么条件,他说:“不一定最好,中上就行了。”这是懂教育的人说的懂教育的话。依我二十多年的教育经验,我对此深有同感。像爱因斯坦、钱锺书等旷世之才另当别论,一般人有中上素质就可以了。看看历届学生就知道,进来时的起点跟出去时候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你们放一放自己的起点,暂时忘记自己的什么名次、什么竞赛奖等,重要的还在于未来几年的学习过程。当年,老学长钱伟长先生考入清华时,语文和历史都是满分,物理只考了 5 分,数理化和外语加起来不过 20 多分。于是,陈寅恪先生希望他学历史,杨树达先生希望他读文学,而钱伟长却选择了物理。因为,入学第三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想“科技救国”。当他向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申请转系时,吴先生劝他学文一样可救国,钱伟长执意学理,吴有训只好让他试读一年,如果数理化三门课有一门不到 70 分就作罢。经过一年苦读,钱伟长如愿进入物理系。后来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他不仅成为杰出的科学家,而且同钱三强、钱学森一道被视为新中国科学界的象征。

这个系列讲座,希望让大家了解基本的学术要求和学术规范,包括学术研究的价值、学术研究的操守、学术研究的方法、确立有意义的选题、查阅相关文献、使用工具书、撰写论文等。一句话,就是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些条条道道。这门课怎么上,我也没有底,因为不仅清华以前没开过这样的课,全国高校恐怕也没有多少家开过,虽然大家都知道这门课很重要,也很必要。为此,我特意问了一些学生,请他们谈谈

这方面的困惑和问题，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下面是部分学生的反馈，我相信这些反馈也是在座各位的共同问题：

——我现在几乎就不明白“学术”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多读一些书就可以把学术做好吗？或者说，评判某一个人的学术做得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希望在上完“学术基本要素”一课以后，自己一方面可以建立起一个对学术的评断准则；另一方面，可以为我以后的学术研究指明方向和方法。我觉得这两点对于我们以后的成长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学术要素就是学术研究的规范吧，比如说研究之前一定要做“文献综述”之类的。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是很缺乏的，所以真的什么都想知道。比如什么样的选题才是有价值有意义并且又有可实现性的？一旦确定了一个选题范围，应该怎样开展研究呢？一般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呢？开始写论文以后要注意些什么呢？大到布局谋篇，小到标点符号，是不是都有统一的规定呢？

——1. 怎么能发现问题？发现一个问题，怎么知道是否有做的价值，价值多少？是大量阅读文献以培养“学术敏感”还是同时也有其他的方法？2. 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能把它写成一篇论文，就是怎么能找到最适合的理论去诠释或者怎么能从中建构新的理论？3. 批判学派和实证学派今天在国际上的最新发展状况是怎样的？美国还那么“实证”吗？欧洲还那么“批判”吗？有人说，“批判学派”在中国的发展步履维艰，咋回事儿？怎么能找到一个最优的结合点？尤其是实证研究，怎么知道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怎么就知道通过对这个对象的研究能说明某个作者想说的问题？再结合《社会学的想象力》之类的名著讲讲吧。4. 怎么看待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的关系问题？5. 总括的介绍一下现在的国内国外的前沿问题都是啥？大约做到啥程度了？还有传播学现在的边界划到哪里了，和别的学科都交叉成什么样子了？传播学现在的几个学派分支都在干什么？6. 对我们的要求，大致的规划建议。

……

这些同学的反馈意见很及时，也很有参考价值。我们的课上，也会

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下面是根据自己对学术要素的理解，以及这些年研究生教育的一些问题，设定的八讲内容，并套用“八股”的形式。其实学术要素说起来也是某种八股，当然，八股不见得是坏东西，它只是一个程序、一个规则，而规则是无所不在的，做事总要有一定的规则，某种意义上讲，学术要素也是我们这个领域做事的规则。下面是八讲题目：

1）破题：一个关键点

2）承题：一组关系链

3）起讲：误区与问题

4）入手：学界与学风

5）起股：研究与方法

6）中股：谋篇与写作

7）后股：细节与规范

8）束股：讨论与总结

今天谈第一讲，讨论学术研究的一个最关键的东西——问题意识。

先简单谈谈有关学术、学问的基本概念。所谓学问就是系统化的知识，而学术研究就是对这种知识的补充、完善、修正或超越。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那么我们举个反例：与学问相对的是什么呢？是常识。常识也是知识，是各种各样的知识，每个人不管有没有学问，做不做研究，都不能没有常识。比如，大家都知道太阳从东边升起，又在西边落下，这就是一种常识，而学问就是把这些常识提升到理论化、系统化的层面。比如，天文学告诉我们为什么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整个宇宙是怎么回事，太阳系又是怎么回事，地球为什么围绕太阳转等，这样一来二去的，知识就成为系统化的学问了。

迄今为止，世间万物的各种系统化知识，可分为三大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是针对自然界的系统化知识。比如，常说的理工农医等就属于自然科学，还有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等。社会科学是有关社会的组织、运行和管理的系统化知识，主要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或叫人文学科，可以说是最古老，对人类来说也最重要、最基础的系统化知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展自然科学，我们就可以驾驭自然、了解世界；繁荣社会科学，我们就可以认识、了解和把握社会的构成及其规律。然而，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人之为人还在于人是有精神寄托的，人生

在世是有文化、有意义的。这些关系根本的问题，关乎人之为人以及安身立命的问题，都由人文学科所应对。一般来说，人文学科包括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神学、宗教等。在我看来，传播学更近于社会科学，而新闻学更近于人文学科。由于社会与人文的亲缘关系，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又统称为人文社会科学。于是，针对自然的自然科学与面向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便形成人类的两大知识体系，即所谓文理分家，文理对峙。这方面有部名著，英国学者 C. P. 斯诺的《两种文化》，专门讨论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差异问题。

下面讲讲学术研究的目的。大家为什么要读研究生呢？为什么要做研究呢？这是首先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比较宏大一些，我们从事科学研究是为了不断推进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也就是所谓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层意义对将来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学来讲更为突出。《大学》里有段名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里所谓"大学"不是现在所说的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它指的其实就是大的学问，不是那种"雕虫小技"的玩意儿，而是学问的大境界。就是说，学问的最高境界在于使社会、使人生更加美好。宋代大儒张载说过一句气魄很大的话。我们为什么做学问呢，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然，这都是很高的理想和境界。我想，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学者，内心都怀着这么一种理想。马克思如果没有这种宏图和抱负，就不可能孜孜不倦地在大英图书馆一待几十年，据说还把地面磨出了脚印。

不过，这方面的意义，听起来离大家似乎比较遥远，因为现在研究生已不作为一个学术性的学位，我们培养的也是高级应用型人才。那么，对大家来说，从事科学研究的意义在哪里呢？一句话，就在于通过研究型学习，不断强化自己的专业知识、理论素养与综合能力，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我相信大部分同学来到清华读书，最直接的目的还是为以后更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昨天，我收到学院转来的一位求学若渴的学生来信，这个学生是北大毕业的，在某杂志社干了好几年，也挺有成就的，但现在觉得自己在理论知识上还比较薄弱，制约着自己进一步的提高，所以很想来深造。其实，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干一段时间后就觉得后劲乏力，若想再进一步发展就得有更雄厚的知识基础。

具体说，研究生期间争取做好两件事：一是打下比较厚实的基础，如文史哲以及经济、社会、法律等方面的基础；二是写一篇有价值、有深度的论文，通过论文训练使自己成为某一方面、某个领域的小专家。如果研究生阶段能够做好这两件事情，对以后的“可持续发展”就非常有利了。

目前，新闻传播学界常见两类学者和学生——学者是过去的学生，学生可能是将来的学者：一类太“专”，一类太“隔”。太“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面太窄，只厮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其他的领域缺乏兴趣，也不涉猎。太“隔”的问题又跑到另一极端，即由于兴趣过泛而对专业问题钻研不深，涉猎不够。比如，一些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研究生就存在类似问题，一方面，他们拥有复合型的知识背景，比如法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等；另一方面，原有的学科背景又对他们形成某种障碍，以至于对新闻传播专业似乎总不入门、总不上路，甚至对一些常识性问题也不甚了了。大家最后毕业是要拿新闻传播的专业学位，是要做新闻传播的专业论文，而部分学生由于专业方面的隔膜，论文水平就显得一般化了。

学术研究的类型。一般来说，研究类型包括基础研究或理论研究，即所谓学术的“学”，它解决的是“为何”的问题，研究的是自然、社会与人类为什么会是如此这般的问题。与之相对的是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即学术的“术”，它解决的是“如何”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做事情的学问。以新闻传播学为例：什么是新闻，什么是传播，新闻传播是怎么发展的，为什么发展，有什么规律和特征，又对社会和人类发生什么影响等，这些都属于基础研究或理论研究。而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则告诉我们如何从事具体的新闻或传播工作，如何把这些工作做好，如何采写新闻和编排报道，如何提高报纸的发行量或电视的收视率，扩大媒体的影响力，如何投放广告，如何融资，诸如此类。这两大类研究不太一样，但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都不可偏废，恰似一个轮子的车子跑不起来，一只翅膀的鸟儿也飞不起来。

总之，不同类型的研究针对的是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对象而并不意味着高低贵贱。有些搞理论研究的可能看不起搞应用的，认为他们没有学术性，没有理论性；反过来，一些搞应用研究的可能又认为理论都是象牙塔，不着边际。实际上，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理论研究会促进应用研究，应用研究也会激发理论研究。

德国诗哲费希特说过：你是什么人，就选择什么哲学。套用此话，你是什么样的人，就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换言之，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应该允许朝着不同的方向生长，而不必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看别人做得好也跟着学。对他人有意义、他人能做的事情，不一定适合你，反之亦然。所以，大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追求选择自己的职业。契诃夫有句话说得好："有大狗，也有小狗；可是小狗不应该因为有大狗的存在而心慌意乱。所有的狗都应当叫，就让它们各自用上帝赐给它们的声音叫好了。"

问题意识。虽说学术研究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追求，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基本的东西又是一致的、相通的。今天要讲的一个主要话题，也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罗马"，这个"罗马"在哪里呢？在于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学术研究的核心在于问题，不管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新闻学、传播学等，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围绕不同的问题展开的，有问题才有研究。学问之道，有学有问。学是学术，问是问题，离开问题，所谓学术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就成为空中楼阁了。如果说兴趣是学术研究的激发点，那么问题就是引领学术研究的原动力。一开始就需要明确这一点，特别是对我们这样的学科，问题意识尤为重要。

不妨把问题意识分解为三部曲：首先是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其次是针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最后是解决问题。不仅在中国是这个路数，在美国同样如此。以美国的传播研究为例，往往先提出一个假设，然后进行验证，最后得出结论，同样是三部曲。美国的许多研究论文，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首先，假设实际上就是问题；然后，针对这个假设进行定量的、定性的分析；最后，验证这个假设或推翻这个假设。这和我们说的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可谓殊途同归。

学术研究的关键在于"问题意识"。李良荣教授曾在郑州大学新闻系的演讲中，提到当下新闻传播学存在的一些毛病。比如，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是所谓"大问题"、"空问题"、"老(旧)问题"等。"大问题"是指许多硕士、博士论文的选题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空问题"是指所谓新闻哲学、新闻美学等玄虚问题；"旧问题"就是前人早已研究、并得出结论的问题，今天的学者学生由于不了解而又重复研究，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复。

此外，是不是还可以把这些问题分成"真问题"和"伪问题"。只要研究的是真问题，就有价值，哪怕是虚的、空的也没有什么关系，都可以研究。问题不论大与小、虚与实，只论真与伪。中世纪修道院那些神学家研究的问题都很空、很虚，比如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骆驼能不能从针眼里穿过等，但这些问题对后来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却有莫大的价值，至少它从逻辑方法上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我们知道西方人逻辑严密，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就和中世纪神学家的"钻牛角尖"不无关系。

下面再讲讲问题意识的培育。问题意识从哪里来？一方面，是加强基础知识与理论素养，即"读万卷书"。具体说来，第一是文史哲功底，特别是搞人文社会科学的，如果将来想在这方面有大的发展，文史哲功底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越雄厚、越扎实，发展的潜力就越大。何小菲同学暑假通读了《资治通鉴》，这个工夫很有价值。有同学可能会问，《资治通鉴》和新闻传播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非同小可。不仅《资治通鉴》，还有诸子百家、柏拉图、莎士比亚等，都与新闻传播学密切相关。法学学者徐国栋的文章《多藏与"寡读"》值得参考。他是学法学的，但在研究生阶段却读了大量文史哲名著，他觉得这种阅读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建构了一个大的知识体系和框架，这个体系与框架一旦建立起来，再去钻研某个专业和领域就会发现其实都是相通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至于《资治通鉴》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理论泰斗甘惜分先生"文革"期间曾经仔细通读，仅此一端，就可以知道《资治通鉴》与新闻传播有什么关系了。

第二是专业知识，如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历史等。新闻学和传播学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其中最基础的新闻学理论、传播学理论、新闻史、传播史等，不管是什么方向的学生都需要掌握，哪怕从功利角度讲，如果没有这些专业知识，学位论文就做不下去，更别想做好，最后也难以顺利通过答辩。历年研究生答辩都遇到类似问题，他可能认为自己的课题是某个领域的，我只要关注这个领域就行了，殊不知这些领域都是相互联系的，尤其是基础性内容，一旦深入下去就会捉襟见肘。像研究美国的新闻传播问题，却对美国新闻史一无所知，说出话来颠三倒四、张冠李戴，而这些问题严格说来都属于学术硬伤。

第三是专题知识，即前人对某个专题的研究及其成果，属于你所确定的研究方向的知识。顺便提一下，这三种知识的划分是《十九札》一

书的作者、北京大学的朱青生教授提出的。专题知识在我们讲论文写作的时候还会涉及,包括文献综述,即在研究特定方向的问题前,需要对这个问题的所有研究进行系统把握。知识基础与理论素养犹如一个金字塔,最基础的东西是文史哲,接着是学科基础,最后才是金字塔尖上那个同具体研究课题有关的专业知识。这是一方面的积累,即读万卷书。

另一方面是实践功底,即所谓“行万里路”。不管是“读万卷书”,还是“行万里路”,都是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实践方面的积累往往需要一生,像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是用了六十年的时间才感悟到的。

就实践功底而言,首要的内容是人生的阅历,种种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会对你的学术成长和问题意识培育有所启迪,而不会是无用的、无关的。因为,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说到底都与社会和人生有关。年轻时的学术体验,与中年时的学术心得有所不同,其中就包含着不同的人生阅历及其感悟。其次是社会知识与社会阅历,这些内容同样属于实践的范畴,同时是“行万里路”的所得。最后才是专业实践。这也像个金字塔,从底座的人生阅历经过中间的社会阅历,最后到达塔尖的专业实践。可见,所谓实践既包括社会实践,也包括专业实践。如果没有实践的功底而去研究新闻传播学的某个问题,就有可能成为纸上谈兵。我们的助教侯丽军同学本来白白净净,现在晒黑了,因为她在一家媒体实习了一个假期,做见习记者。让她去的目的就是增加她的人生阅历、社会阅历以及专业阅历,因为她是从校门到校门一路读上来的,以前又是学外语的,对专业领域比较陌生,所以特别需要这样的实践过程。

最后,我用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的说法,把研究需要具备的一些基本能力或素养做一概括。刘知几认为,优秀史家的禀赋包括三个要素,即才、学、识。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古往今来文人学士很多,而优秀的史学家很少呢?”刘知几回答:因为优秀的史学家需要具备三种素质,而同时具备这三种素质的人不多,所以古往今来文人才子很多,优秀的史学家很少。这句话可以推而广之:研究生不少,而有创见的研究生不多,因为需要同时具备才、学、识。“才”自然指才华,这里带有一点天赋的味道,也就是爱迪生讲的百分之一的天赋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中的那个“百分之一”。但是,光指望天赋肯定一事无成,重要的

还是“学”，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九勤奋努力的结果。“识”是指见识，而独到的见识是在不断钻研、学习、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的。后来，清季大儒章学诚又在他的《文史通义》中增加了一个“德”。仅有“才、学、识”还不行，作为优秀的史家或学者还必须有“德”，无德无行的史家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把坏人写成好人，把好人写成坏人等。所以，优秀的史家还必须有“德”。不言而喻，才、学、识、德可谓一切学人共同的素养。

这是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一个关键点，也就是问题意识，以及如何培育问题意识。这个话题可以用清华闻人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里的一段名言予以总结，相信大家对此都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妨重温一下：

> 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一组关系链

今天这个题目想从《孙子兵法》讲起。《孙子兵法》有许多精辟论述，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常人以为，用兵作战当然是百战百胜最好，战无不胜是最佳境界，所谓常胜将军，永不言败。而孙子却认为，屡战屡胜其实不算什么，真正了不起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不必动武就已经让人屈服，这才算高人呢。孙子本人在历史上还留下一段故事，说他如何把一群弱不禁风的嫔妃训练成虎贲之师。如果把一群五大三粗、膀大腰圆的人训练成猛士，这个不算什么本事，他们本来就有这个素质。真正的“善之善者”，是把弱不禁风的才子佳人训练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沙场勇士，这才叫善之善也。

再如，“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也是讲辩证法的，相反相成嘛。按说把人置于死地，那不就死定了么？其实，在一定条件下这样反而能够绝地求生，绝处逢生。楚汉相争的时候，韩信就用过这套战法。他把将士引到无可逃生的地方，从而使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奋勇反击，结果大获全胜。

再有一段也很有名，我在《传播学引论》中还征引过。“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音乐中的音节不过五种，宫、商、角、徵、羽，但是由这五种音节所组成的音乐却是美妙无穷、听不胜听的。“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色彩，也不过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几种，可由这些色彩所组成的图案却是变化无穷，看不胜看的。“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湘菜、川菜、粤菜，甜的、酸的、辣的，不过就那几种味道，但由几种味道变换出来的美味，却是一辈子也尝不尽的。孙子顺势而下就讲道：“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打仗、战争、用兵战法，不过是“奇”和“正”两种

情况的变化。“正”是一般的战法、正正规规的战法，摆开阵势，两军对垒。而八路军武工队的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则属于“出奇兵”，打得鬼子不安宁。奇正相生，也是循环无尽的。

举《孙子兵法》为例，用意何在呢？从中能够体会到什么共同的道理呢？它讲的虽然是兵法，但是从中引发开来，却有一个适用人生百态的通则，简言之就是辩证法或辩证思维。之所以先讲《孙子兵法》，就是因为下面要谈的一组关系基本都是遵循辩证思维或辩证法的。

下面就逐一展开这组关系，其中有的讲得详一些，有的略一些。大多数关系没有什么解释，也没有固定答案，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知道这些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犹如战法的奇正相生。

为人与为学——做学问、搞研究不是孤立的为学而学，为学与为人密不可分，古人讲“君子儒”和“小人儒”即针对这类问题。这里将这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一环首先提出来，就是想引起大家的充分重视。用清华的校训来说，为学属于自强不息，而为人属于厚德载物。另外，关于为人与为学，一方面需要注意小节、细节，另一方面更需要追求大气、正气，而大气与正气总是相互联系的。

古与今——通常情况下，对待古与今的问题，一般人会看重今天而忽略过去，与此相应的就是忽略历史。比如，有些学生会觉得我只要把握今天，关注当下就可以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跟现在没有什么关系。这当然是很大的错觉。古与今如同昼与夜、男与女、上与下、前与后等关系一样，总是彼此关联，相辅相成的。这就像读《资治通鉴》和新闻有什么关系、和今天有什么关系的问题一样。随着你的视野与事业逐步展开，你会发现古今之间联系是何等密切。说到这里，我觉得没有学好古代汉语，阅读古文能力弱，是当代学生的一个普遍缺陷。有位新闻系老主任曾经要求年轻人应该掌握“双语”：一是外语，一是古汉语。掌握这两种语言，古今中外就能打通了。现在许多学生最多能够做到打通中外，但却隔绝古今。

中与外——说到中与外，又涉及刚才说到的外语问题。外语包含的内容其实是很丰富的，而不是说外语就是英语，英语就只是为了交流。事实上，打通一门外语也是打通一门文化传统。比如，阿拉伯文化、西班牙文化、俄罗斯文化等，而诸如此类的文化传统一点也不次于英语世界，哲学、史学、文学、医学、自然科学等都有辉煌的建树。比如，

西班牙文化里的塞万提斯，拉美文学中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还有俄语以及俄罗斯文化等，都是博大精深的。这里推荐一套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这是一套文化大工程，几乎涵盖外国文化经典的所有基本著述。当然大家在研究生期间，尤其在这么紧张的学习期间恐怕也读不了几本。但是，作为一个系统性、原典性丛书，至少应该从这里入手，特别是其中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史学等。

博与专——这组关系上次已经提到，同样需要辩证理解。太专固然不好，太博也有问题。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就算精力充沛，还有不免驳杂的问题。其实，这些关系都有自己的体验，谈出来供大家吸取和借鉴。做学问自然需要固定在一个领域，就像凿一口井，不断往下开掘才有可能见到水或油。否则，东刨一下，西刨一下，最后可能什么收获也没有，留下一地大大小小的窟窿眼。我们有一份“新闻传播学基础阅读书目”，分为两类，博通类 50 种和专业类 50 种。前者都是一些基础性的著述。比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以及名记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等。专业类里有新闻的，也有传播的。上一次提到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讲他在博士学习阶段进行综合考试的情况，真有点过五关、斩六将的惊心动魄。当时，请来面试的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提的问题既专业，又细微，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和准备根本应付不了。现在一些研究生每到开题的时候都非常痛苦，不管是新闻专业出身的还是非新闻专业出身的，都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研究题目，不知道该研究什么或问题在哪里。其中原因一言难尽，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还没有进入这个学科领域，对整个领域的学术地图不甚了了。一旦进去这个领域，你的思维就会活跃起来，就会发现疑点与难点。

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这组关系同上一讲提到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对应。马克思说过一句有名的话，过去的哲学家主要忙于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对新闻传播学来讲都是不可偏废的。要推动新闻传播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即改造世界，首先要认识其基本规律和基本问题，首先要科学地解释新闻传播现象，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有力有益地改造世界。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总体状况是，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应用研究异常火爆。另外，新闻学研究比传播学研究“弱”，新闻学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又更“弱”。所谓基础理论，就新闻传播学来讲，主要是三大块

儿：一块儿是理论，一块儿是历史，一块儿是方法，也就是常说的史论和方法。其中，专业历史和专业理论又是不可分离的关系、辩证的关系、相辅相成的关系。理论是从哪里来的？不能纯粹是抽象的、逻辑的、推演的，而同样得从历史实践中总结、提炼和概括。同时，历史如果缺乏理论的支撑也会成为一堆“断烂朝报”。基础研究主要是“史论”，其中历史研究相对较“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座诸位恐怕没有几个愿意以新闻史、传播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志趣吧。为什么呢？觉得那好像是个“冷门”啊，还要坐“冷板凳”。基础理论虽然也比较“冷”，但作为想当然的一种误解，许多人觉得可以拍拍脑瓜儿，就能整出一套新的“理论”。而历史无论如何都拍不了脑瓜儿，必须有根有据。所以，愿意从事历史研究的更少，而这又涉及一组辩证关系——“热”和“冷”。

“热”和“冷”——“热”得快，往往“冷”得也快，而“冷”在某种情况下又会转化成“热”。像新闻史研究现在看起来似乎属于冷门，然而作为这个学科的基础，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兴办新闻专业，这方面的师资将越来越缺。所以，现在看起来“冷”的东西，说不定将来又成为“热”的。目前，全国有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点 660 多个(2008 年最新统计已达到 877 个)，以全国普通高校 1000 多家计算，也就意味着全国有一半以上的高校都有新闻传播教学点。其中不少都是仓促上马，师资严重不足，特别是专业的、基础的师资极度匮乏。其他师资从什么地方转来还可以对付一下，而专业的、基础的师资不可能一蹴而就。

尊奉权威与破除迷信——青年学生容易犯两类毛病，要么就是迷信权威，高山仰止，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所谓权威面前抬不起头，小媳妇似的战战兢兢。甘惜分先生有两句话说得好，不敢与老师辩论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能超越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换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要么，又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似乎“老子天下第一”，“打遍天下无敌手”，“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两种倾向显然都有偏颇。尊重权威是对的，就像牛顿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一步步往上攀登。任何研究都不能撇开前人及其思想，独自开辟一套所谓全新的理论。所以，对待前人及其思想应有足够的尊重。与此同时，也需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长江后浪推前浪，自古英雄出少年，现在的权威也是从当年的青年走出来的，也不是横空出世，从天上掉下来的。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经常会遇到这对矛盾。首先得有事实判断，研究任何事务，都得搞清楚“是什么”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准确的事实性判断，这是一切研究的最起码要求，也是谈“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时谈到的问题。与此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形成特定的价值判断。好还是不好，应该还是不应该，这都属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不管怎样，研究者也是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好恶、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等，而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着对研究对象的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各自独立，各行其是；一方面又互相渗透，彼此制约。比如，经济学已成为一门显学，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一例，新闻传播学领域同样带有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烙印，媒介经济学就是一例。这些年，时常听到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的批评。按说作为经济学，它首先是一门科学，是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可是为什么又遭到批评呢？因为，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包含太强的价值判断，他们说的一系列经济学问题，同时也包含大量他们的自身利益考虑，诸如“腐败有理论”、“吐痰论”、“冰棍论”、“老夫少妻优生论”等，很难说哪里是事实判断，哪里是价值判断。虽然人们主张严肃的学者应该秉承严肃的科学精神，追求科学真理，可是许多时候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真理，本身就隐含着深刻的价值判断。总之，一方面应该将事实判断作为科学研究的首要命题，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价值判断的潜在影响。

照着说与接着说——这组关系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意思是，学术研究中，首先应该照着说，也就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沿着前人的研究路数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接着说，也就是说出自己的东西。如果说“照着说”是继承，那么“接着说”就是创新。仅仅“照着说”肯定不够，那是述而不作，学术就不能发展，就失去活力。反之，仅仅“接着说”则更成问题，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诸位读研究生，写学术论文，也面临着这组关系，先“照着说”，再“接着说”。不能光“照着说”，只把前人的东西复述一遍。反之，抛开前人的成果，一上来就“从我开始”，就“接着说”，同样更成问题。比如，现在常见的低水平重复问题，前人已经做得很好的东西，自己不知道，又重做一遍，而且做得不怎么样。

个人兴趣与社会需求——这组关系主要是针对社会科学，特别是新闻传播学这样的应用性社会科学而言的。一方面，任何研究，包括研究性学习，当然得有自己的兴趣，得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没有兴趣的东西肯定做不好。同时，在个人兴趣的基础上，也不能不考虑社会的需求。怎么处理，因人而异。一个极端是唯社会需求是从，今天“热”什么，我就做什么，完全不管个人对此是否有兴趣。而另外一个极端，完全不顾社会的需求，只顾自娱自乐，同样也成问题。当然，兴趣是会发展、会变化的。另外，社会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错综复杂的，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兴趣和社会的需求做一个有机的结合，找一个恰当的结合点。

方法与对象——这组关系在方法论一讲还会讲到，这里先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基本的原则是不同的方法适用不同的对象，换言之，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比如，我们要去麦加朝圣，有哪些途径呢？

学生：飞机
学生：丝绸之路
学生：海路坐船，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
学生：从中亚过去
学生：坐火车
学生：开吉普
学生：骑自行车
学生：步行
……

可见到达目的地的途径很多。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往往告诉你只有一条路，比如坐飞机。这条路好比美国一枝独大的实证研究、定量研究，你只能这么走，这么做，似乎这是唯一的途径。接着，告诉你如何买机票、登机注意事项、机上安全知识等。当然，现在最便捷、最时髦的途径是坐飞机，与之相似，现在做研究最时兴的也是定量实证这一套方法。但是，除此之外，其他途径和方法是不是也行得通呢？坐飞机固然便捷，但为此也丧失了许多其他的乐趣。步行虽然时间长一些，但沿途万里风光也足以赏心悦目，还可以见识许多世面，像唐僧取经有多少额外的收获！所以，各种方法各有利弊，不必强求一律。

学术与思想——这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学术里没有思想吗？思想里没有学术吗？其实两者是相互包容，但又各有侧重。学问家着眼于系统知识的梳理，像历史学家孜孜不倦地进行考据。思想家呢？他也是以各种学术成果为基础，然后才能提出自己的思想。这种关系在中国近三十年有不同的表现，比如 1980 年代曾经是思想家火爆的年代，思想启蒙，狂飙突进，各路学者多以思想家自居，改革应该如何，经济应该如何，等等。到 1990 年代，一度好像掉了个儿，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这是李泽厚概括的。最佳境界应像王元化所说，“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走向世界与走向内心——就像上次说到“大狗小狗都要叫”，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哲学，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爱好、不同的志趣决定着不同的学术志向。这里大概可以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走向世界”，一种是“走向内心”。所谓“走向世界”就是致力于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变化。所谓“走向内心”则不怎么在意学术和现实的关系，而更多将学术作为理想或生命的寄托。钱锺书先生说过，“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与此相关的是“追求恒久与追求当下”。

追求恒久与追求当下——这个问题在后面讲学界与学风的时候还会谈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同的追求自然有不同的结果。如果在意当下的大红大紫，那么就别再指望永世留名。反之亦然，上帝的法则永远都是公正的。《红楼梦》成书的时候默默无闻，而那时不知有多少畅销书风行于世呢。学生常常同我谈起当下学界的一些不良风气，并为此感到悲观。其实，我相信任何时候都会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人，一群埋头苦干的人。等时过境迁，尘埃落定，他们才会显露出来。有价值的东西一定会留存下来，费尔巴哈说过一句话给人印象深刻：“真理不会敲锣打鼓地来到人间。”

国际视野和本土意识——首先，在所谓全球化时代，任何事情包括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各行其是，不同外界进行对话与交流。同时，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关系社会人生，同本土语境与情境息息相关，国情、民情、文化传统等，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又具有在所难免的影响。即使貌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也同样需要适应本土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需要经历“理论联系实际”的转换过程。西方理论如果不经过这种转换，生搬硬套直接拿来，在中国现实中往往水土不服，哪怕头头是道，逻辑密不透风。其实，各个学科的大家，如社会学家费

孝通、哲学家冯友兰等,一方面有很好的国际视野和现代学科背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完美契合,最后蔚为大家,留下不朽精品,成为后人不断汲取的源泉。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几万字,不用半天就读完了,但包含的东西却多么耐人寻味。

狐狸与刺猬——这组关系涉及博与专的问题。当代思想家以赛亚·柏林在他的《俄国思想家》中提到,狐狸懂得很多,而刺猬专于一门。哈佛教授李欧梵,就自称是狐狸型学者,他兴趣很广,有本文集就叫《狐狸洞话语》,他的书斋名为狐狸洞,跟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类似。而冯友兰先生与之相反,属于刺猬型学者,一生专攻中国哲学史,成为一代大儒。

新闻与传播——这组关系是学生经常问到的,也是感到困惑的。新闻怎么样,传播怎么样?有一年我给学生出了一个题目:就"新闻与传播"做一篇论文,好好研究一下,如果理论上说得透彻,实践上有参考价值,说不定对学科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现在这种格局是自然形成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新闻学在新兴学科中都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媒介环境、媒介技术、媒介生态的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传统新闻学已经无法完全应对,传播学应运而生,获得迅猛发展。1997年,国家学位委员会将传播学列为正式学科,与新闻学平起平坐。在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虽然关系密切,但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国体系,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新闻学依然是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与主干,因为它所面对的一大任务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人才。事实上,我们的研究生培养也并未严格区分新闻学与传播学,而是在新闻传播学的综合平台进行的,最后大家拿的学位也是新闻传播学的学位,而不是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位。

书里与书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不可偏废,书里的世界与书外的世界也是互相联系的。除此之外,还想特别突出两点:一是欣赏音乐,培养艺术品位,为什么是音乐而不是其他呢?因为,音乐是所有艺术的皇冠,是最美最纯的艺术。范敬宜院长爱讲"物艺相通"的道理,"物"就是做事,包括做学问,"艺"就是艺术,包括他所擅长的诗书画。做学问与懂艺术是相通的,例子举不胜举,如大家熟知的爱因斯坦精通小提琴。有一次,为写一篇大文章辗转反侧许多天,一直不得门而入。后来,在一位同学家里欣赏他的高级音响,当听到苏军红旗歌舞团

演唱的《伏尔加船夫曲》时，心潮激荡，灵感迸发，文章的思路随之豁然开朗。另外一点是游泳，清华的传统是“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在所有运动中，游泳是最好的项目。游泳不仅是一种享受（其他项目往往龇牙咧嘴），而且在水上轻盈滑行时，精神仿佛也得到升华，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感觉妙不可言。诗人张永枚写过一首长诗《西沙之战》，其中两句写战舰——“舰首剪开万朵梨花，舰尾抛出千条白练”，游泳也是如此。



误区与问题

昨天跟大家讲了一组关于学术研究的辩证关系，或者说矛盾。既然是关系或矛盾，就涉及如何处理、如何权衡的问题，这也是一门学问。当代学人受毛泽东影响很大，尤其是世界观、方法论。比如，他说的“为人民服务”就深入我们的骨髓，人民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重于一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是这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所以，听到那些乱七八糟的杂谈怪论，什么“砸烂三铁卖国企”、“教育产业化”等自然非常反感。苏联有个笑话，勃列日涅夫请母亲参观他的豪宅，老人家看了后眼花缭乱，最后问了一句：“儿子，房子确实不错，可共产党来了怎么办？”至于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方法论，对我们的影响就更是难以估量。大家知道，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毛主席有一种辩证思维，一种大智慧。他的《矛盾论》是部深入浅出的哲学经典，有兴趣的同学不妨找来看一看，对知人论世以及做学问都会有启发，其中就谈到一些矛盾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目前研究生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对待学术研究的一些误区。昨天一讲可能抽象一些，今天讲点实在的话题。

历史问题——不管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不管是“接着说”，还是“照着说”，都不应该忽视历史，历史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想一想，一切问题只要追根溯源，都跟历史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以为，马克思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他构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理论体系。其实，他的理论也是基于对人类历史的深刻把握，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正是基于对历史的全面把握和透彻理解，他才写出诸如《资本论》这样的皇皇巨著。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理论体系自有其严密的逻辑，从概念到范畴步步为营。而这

个逻辑体系又不是空虚浮泛的，而是同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紧密契合的。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很不容易啊。要从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提炼一套理论，而这套理论又与现实和历史的总体变化高度吻合，实在太不容易。看《资本论》，尤其是第一卷涉及原始积累的论述，简直就是一部严谨的历史著作。所以，马克思说，只有一门社会科学，那就是历史学。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博士生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科学的文化理论》一书里也指出：“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早内在于所有的历史学著作、所有的编年史写作，以及法学、经济学、语言学的每一个论点之中。”

另外，许多新闻传播学的名家名作，实际上都渗透、包含和融汇着大量的历史元素。比如，加拿大传播学家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麦克卢汉的《媒介通论：论人的延伸》等，都是基于对人类传播历史的认识而形成的理论经典。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的《报刊四种理论》更是从历史线索中，概括了所谓四种新闻传播体制及其理念。赵月枝与其导师合作的专著《维系民主》，既是剖析新闻传播客观法则的理论著述，又是论述英国 19 世纪新闻业的历史研究。

总之，千万不能忽略历史，历史是各门学科的基础。即使从实用的角度说，大家毕业后一般有三条出路：一是新闻，二是研究，三是从政，若想在这三条路上“可持续发展”，历史的根基都是非常重要的。

选题问题——研究生在做论文的时候，常遇到这样的困惑：发现一个问题，可苦于找不到一套合适的理论进行解释。这里其实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各种理论、各种思想当然应该从实际生活中来，或者说从社会实践中来。可是，现在许多研究生却仿佛以为，理论应该从理论中来，特别是从亨廷顿、萨义德、福柯等西方理论家的思想中来。显而易见，这完全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误区，以至于许多学生认为写论文之前都要找到一个所谓“理论”，似乎没有这个“理论”可套，这篇文章就靠不住。他们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现成的理论出发，不是问题先行，而是理论先行，似乎正确思想不是来自实践，而是来自已有的现成理论，不是从问题提炼理论，而是用某个现成的理论去套实践。正如王绍光感叹的：

我感觉现在的年轻学者，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老想用中国的数

据来印证、检验某一个外来的理念。我经常跟他们说，先把理论忘掉，先看你的实际材料，然后再去抽象化，找出概念，想办法解释它。理论是次要的，理论是晦涩的，理论是灰色的。但你要说服他们已经很困难了，他脑子里已经形成这些东西。

举个例子，我曾跟一位研究生探讨过一个题目，根据其兴趣、特长设计了这个题目，大体是关于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品位，侧重于媒体对大学生文化品位的影响，研究的切入点是清华学生的媒介接触行为。我们探讨之后，她也觉得是个有意义的选题，不仅有理论价值，做好了对国内外文化研究都会有所启发，另外也不无实际的应用价值，甚至可能对有关政策产生影响。这样的论文，就是实际而有价值的，而不是泛泛的、为做而做的东西。这种具有原创性的东西不可能抄抄拼拼，从网上攒出来，而必须深入实际，去做大量的研究，包括调查、访谈以及各种文献的查阅等，难度挺大。结果，谈了半天，这个学生还是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什么呢？居然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论去套这个研究。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弄个所谓理论去套自己的研究呢？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且通过研究而使问题获得解决，这不已经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吗，为什么非得先有什么理论不可呢？人的正确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从前人已经形成的书本结论中来的吗？那么，前人的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硬伤问题——这个问题在研究生论文中比较普遍。什么是硬伤呢？打个比方，对一个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来说，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是“五音齐全”。即使做到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因为还有更高标准，但是“五音齐全”肯定是个底线，达不到这条线显然不能成为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更不用说成为优秀的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那么，各种硬伤就是“五音不全”。这里有个“五音不全”的例子，一个“跑调”跑得离谱的例子：

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就告诫一位意大利王子：“被爱比被怕更重要。”(转引自约瑟夫·奈)

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原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大家看看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对，作者没有引用，而是转引，这是问题之一。更致命的问题还在于，他正好把原文的意思弄颠倒了。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代表作有《君主论》，其核心思想

跟韩非子类似，都是给君王出谋划策，教导君王如何实行专制统治，如何驾驭自己的臣民。明白这一点，至少可以判断马基雅维利不可能提出上面这种温馨的理论和主张。其实，人家的本意是说：

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安全得多……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他人的意志之上。（商务版《君主论》）

让人爱戴取决于他人的意志，而让人畏惧则取决于君主的意志，这才是马基雅维利的本意。类似现象在研究生论文中时有所见。严格说来，这种硬伤是很严重的问题，思想理论可以见仁见智，而这种硬伤就像 1＋1＝2 一样，如果说成 1＋1＝3 就肯定错了。

标题问题——这也是许多研究生容易忽视的问题。按说标题属于点睛之笔，你下了那么大的工夫写的东西，别人第一眼看到的首先是标题。可惜好多同学在这上面不太在意，文不对题的情况比比皆是，更有许多标题显然没有经过认真推敲。标题首先得准确，有些研究生论文连这一点都达不到。比如，《回归之后 XX 的报道》，就得说明是香港回归，还是澳门回归。其次传神，画龙点睛就应该把文章的精气神儿传达出来。比如，《“冰点”与当下中国的现代性》既准确传达了文章的主旨，也让懂行的人一下子就明白文章的命意所在。

写作问题——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一些论文应该说研究的问题颇有意思和价值，也确实花了心血，下了工夫，可惜写得不好，难以卒读。犹如一位美女，粗服乱头，邋邋遢遢。有的文章含混晦涩，让普通读者读不懂，仿佛只给专业人士欣赏。这种故弄玄虚的现象，目前还挺流行，后面谈文风的时候还会谈到。美国的一些实证研究就往往让人一头雾水，写起来吃力，读起来乏味，粘上去头疼。至于有的论文连基本的语法与逻辑都成问题，读起来疙疙瘩瘩的，颠三倒四。也许，有的学生可能以为写论文跟写普通文章不一样，就得端起架势，“装腔作势”以显高深。其实，不如老老实实学会把普通文章写好，把意思表达清楚。这里举个例子，也是硕士论文中的一段：

从最早的马可·波罗笔下塑造的元大都宏伟的宫殿、豪华的庆典、丰饶的物产、珍奇的器物以及儒雅而温良的公民，到鸦片战争以后近代的中国“东亚病夫”不堪一击，到爱德华·斯诺笔下的

《红星照耀中国》，到解放以后红色专政国家，文化大革命时的狂暴激情，到天安门前的政治运动，到李希光教授批判的“妖魔化中国”，到在莫斯科申奥舞动的中国，到非典时期《时代》杂志上得了肺病的五星红旗，中国的国家形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起起落落。不难发现这一系列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中，中国在太多数时候是保持沉默的。

文字啰唆，逻辑混乱。从什么到什么，一路“从”下来，前面还有点脉络，后面就乱了，看到最后不知道这些列举之间，有什么起承转合的关系。还有一处硬伤，把埃德加·斯诺写成爱德华·斯诺。再看一段：

通过这类事件进行内容分析可以进一步验证回归后的《南华早报》是否会因为以香港本地人为主的读者群更加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而提高对彰显中国人自豪感的奥运会盛事更加关注。

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够一口气把这个句子念下来。我数了一下，一共 80 个字。《美联社报道手册》有关于句子长度的规定，要求句子不超过三十个单词。这是新闻报道的要求，需要短句、短词，学术文章因其理论性和严密性，有时确实需要长句子，但要注意意思的顺畅、节奏的转换。这里有个实用的办法，就是写完之后读一读。读不顺的地方就有问题，就需要琢磨，其中也包括节奏感问题。为什么提醒大家注意书里书外的关系，包括游泳锻炼，欣赏音乐，阅读名著等，其实也是为了培养一种内在的感觉与节奏。美联社记者的经验谈中也说到，稿子写完了之后读一遍或者默念一遍，读得顺的东西人家才能看得顺。像上面这个句子读得顺吗？读得下去吗？更不用说理解了。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语言问题。他说语言不好学，是要下工夫的。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他们的语言是很丰富的，他们有很多鲜活的表达。范敬宜老师讲过一个故事。他坐出租车的时候喜欢和司机聊天，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一次回家，又聊了一路，到家门口时——范老师住的是部长楼，司机一看，这位貌不惊人的老头居然住在这里，开始有点迷惑，后来琢磨了一下说：“我明白了，您以前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儿。”说得多么生动啊，范老师一直赞赏不已。第二是学习外语，外国语言中有许多丰富的表达、丰富的思想、丰富的语汇，举不胜举，包括古往今来的经典名著，以及“山与山不会相会，人与人总会相逢”、“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行遍天下”、“有地儿就有中国人，哪儿

乱必有美国鬼”等俗语。第三是古代汉语。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丰富的遗产，通过学习也可以培养一种语感、节奏、韵律。比如：唐诗名作《古从军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一波九折，一咏三叹。再如《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些东西浸润久了，就不大会写出那些别别扭扭的文字了。古人说得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规范问题——学术规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学科都很重视，其中既有一套伦理，又有一套操作程序，为所谓学术共同体共同遵奉。如果不遵守这些规范，那就属于违规行为，轻则遭到批评和谴责，重则被清除出学术共同体。具体说来，学术规范既有大的制约，如不得抄袭剽窃、不得造假等，又有一系列细致的要求。比如，外国人名翻译问题，一些学生可能觉得无所谓，不是从其他什么地方转述，就是自己随便弄个译名。其实，这种事情都是有规矩的，要么遵循约定俗成的翻译，这主要是指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已经广为人知的名字，像贝多芬、俾斯麦、莎士比亚、拿破仑等；要么按照权威的“译名手册”，如商务印书馆的《英语人名译名手册》、《英语地名译名手册》、《阿拉伯语人名译名手册》等。前面说的埃德加·斯诺看起来是规范问题，追究起来其实也是你在专业方面不够深入，不够专业，如果你对中国新闻史的情况略有了解，就不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为什么要制定和遵循这些规范呢？简单说，是为了保障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比如，译名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个小事，实际上译名如不一致，大家就无法顺畅交流，同样一个人，你叫他“张三”，我叫他“李四”，这样怎么交流呢？现在有些缺乏学术训练的新手，往往喜欢自造一些人名、地名。我给研究生指出此类问题时，有人还说：“啊？还有这些标准吗？我以为自己想怎么译就怎么译呢。”有位博士生翻译了一部《英国新闻史》，内容不错，遗憾的是一上来就有这种问题，把作者Curran译成“卡瑞”，稍微翻一下译名手册，就会看到规范的译名是“科伦”。所以，这些年译著不少，但往往让人忐忑，不敢相信。所以，这些问题看起来不大，实际上不小。北大教授王铭铭将“孟子”译为“孟修斯”，清华教授把“蒋介石”错成“常凯申”，士林哗然，教训深刻。

方法问题——这个问题在方法论一讲还会专门谈，这里不妨先举个例子让大家看看：“本文主要采用理论研究法、系统分析法、实地调研访谈法和案例分析法等四种方法。”然后下面又进一步列举：“我要用宏观、中观与微观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综合归纳的方法，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比较分析法。”可见，他还没搞清楚什么是研究方法，所以罗列一大堆所谓方法。

注释问题——这里的问题也不少，后面还会专门讲到。比如，有的论文写到“根据有关资料整理”，“有关资料”指的是什么呢？原来是网上的东西，经过他的整理，这怎么能作为文献引用呢？注释形式不管怎样，最基本的一点在于交代出处，这个观点、材料、理论从哪里来的？哪怕是从某某课堂笔记抄来的也可以，只要标明出处，能够让人按图索骥找到你所引用的东西。从网上“汇编”的东西，让人上哪儿去求证呢。如果有人看了你的文章，觉得这个资料很有价值，又到哪儿去找这些“有关资料”呢？

学界与学风

昨天课后有位同学来信，问到学文史哲的意义是什么？学习文史哲有什么用？还问如何学，用什么方法学才能学好。我想这是大部分同学都会面临的困惑，这里就先做一个解答。

一般说来，学习文史哲的近期意义在于有利于大家的学习和研究，长远意义在于将来的工作和事业发展。因为文史哲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就像数学是整个理工科的基础一样。新闻传播学和文史哲的关系更为密切，新闻学专业本科的基础课程都是文史哲的。

当然，无论作为一种素养，还是作为一种基础，文史哲都需要长期的积累，乃至一生的积累。所以，这个东西急不得，就像人的生长一样，有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过程。这里主要强调两条，一是万卷书，二是万里路。读书应该以原典、经典为主，书籍浩如烟海，一辈子也读不完，随便一个分支都读不完，所以尽可能读原典、经典。听说这个假期左娅同学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赵晶同学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这些都属于经典。作为入门参考，上次介绍了新开的书目，里面 100 种书籍有 50 种基本都是文、史、哲的基础读物。

另外还想强调，文、史、哲是基础的话，历史就是基础的基础。如果基本的历史背景不清楚，基本的历史线索不明确，好多问题看起来就会云遮雾罩。举个例子，《白鹿原》是部长篇小说，如果对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没有大致了解，读起来就会一头雾水。对历史的涉猎受制于时间和精力，最好还是从一些原典、经典入手。比如，有精力就读读《资治通鉴》，没精力就读读《史记》，如果《史记》还嫌太厚，那就读读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

今天的主题是学界与学风。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呢？一方面是根据同学的反馈，大家想了解一下目前学术的态势、状况；另一方面，同学

中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追根溯源大都出自这里。所以，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仅就同学论文表现出来的现象进行讨论，还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狄更斯《双城记》开篇有段著名的文字：

>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季；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也一无所有；我们都将走向天堂，也将一起奔向另一个方向。

目前学术界的情况，大致也可如此概括。比如，现在“思想自由，学术宽松”，可以说是新中国最好的时期。新闻传播学的繁荣发展也是有目共睹，比如前面讲过全国高校至少一多半都有了新闻传播教学点。大致统计一下，跟改革开放初相比，至少增加一百倍。当时，全国新闻专业教学点也就三五家，很长一段时间新闻教育的格局都像是“美苏争霸”，即人大与复旦两大巨头各占半壁江山。广播学院崛起以后，又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90 年代以来，形势变化越来越大，特别是清华、北大等创办新闻传播学院后更是群雄并起，欣欣向荣。与此相关，硕士、博士数量激增。改革开放初，硕士比现在的博士后都金贵，人大第一届新闻硕士招生的专业是新闻史，主要导师是方汉奇和甘惜分。计划招收两名，后来由于生源太好，打报告上去扩招近十名。这批“黄埔一期”现在都是新闻界的领军人物，包括刘建明、童兵、郑保卫教授等。所以，那个时候名片上印上硕士头衔都觉得很荣耀，而现在博导都已经遍地开花。

改革开放初，新闻传播方面的学术期刊少得可怜，有一些还是内部刊物，比如我读书时喜欢看的《解放军通讯》、《光明日报通讯》等，就是 36 开的薄薄小册子，其中许多小文章其实就是记者通讯员的经验谈，正规论文几乎没有。如今，新闻传播学的刊物公开出版的就不下百十家，以至于现在不得不规定一些所谓核心期刊，因为刊物太多了，为了辨别哪些刊物更好，文章更值得关注，就形成这么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开始还有一些积极作用，现在随着研究生数量的激增以及发表论文的需求越来越大，一些核心期刊的稿子其实花钱就可以登，渐渐失去应有的品位与意义。

另外，如今新闻传播学的专著、译著、教材也是多如牛毛，而1980年代研究传播学就一本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弄得言必称施拉姆。而现在，特别是21世纪之后，光是传播学的译丛就有好几套，每一套都是几十本，根本看不过来了。

当年答辩非常严格，郑重其事，而现在连博士答辩都往往像走过场似的，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到风水的流转。冰心老人曾经说过："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学则如何？"这是在1990年代初说的，那个时候她已经有感于经济大潮下学术的沦落，觉得没有学术就没有希望。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情况已经不算什么。因为，如今事情愈演愈烈，甚至出现"学术腐败"这等触目惊心的术语。学术和腐败怎么能连在一块儿呢？过去在人们的心目中，学术是一个圣殿啊，是一个神圣的领地啊，怎么能和腐败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对此好像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一些很有名望的学者也陷入这个泥潭。

再谈一个喜忧参半的问题——课题学术，这也算现在的新东西，一个愈演愈烈的问题。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课题还是在清华，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课题，因为我觉得研究就是读书啊，写文章啊，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后来才大致明白所谓课题学术是怎么回事。说课题学术喜忧参半，是因为现在好多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个人所能驾驭的领域，不得不用这样一种方式集体攻关，如方汉奇先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皇皇三大本，就是集合整个中国新闻史学界的专家，经过十多年的撰述而完成。自然科学就更不用说了，还有许多研究属于跨学科的，更需要用课题的形式进行，一个人承担不了。这是喜的一面，合理的一面，而且国家在这方面确实给予越来越大的资助。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例，十年前有三五万就很多了，而现在动辄就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几千万。由此也就涉及忧的一面，即课题学术泛滥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对学术研究的根基产生冲击，对学风产生恶果。这些问题日益显露，高校都把课题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教师要有多少省部级课题、国家级课题等，申报博士点、硕士点都作为重要指标。而大家往往只考虑拿下多少课题，有多少经费，却不怎么考虑研究的成果和水平。其实许多国家经费都打了水漂，没有产生多少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这种考核机制给很多独立的学者也带来巨大压力。人大一位教授、社会学家郑也夫，因为不堪其扰而调到北大，结果发现北大原来也是如此，"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啊！这给学术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带来严重

后果。现在清华文科也认识到这一点，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予以扭转，比如专门拿出一部分基础研究基金，资助基础研究的人文学者，可以自由申报，不必完成那些学术上的“命题作文”，也没有繁琐的考核指标，给学者营造宽松的氛围。

下面重点谈一下当下对研究生影响最大的学风问题、文风问题，比如浮躁、华而不实等，这也是和大家关系最密切的。张文木教授在清华演讲时说过一段话：

> 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工夫，于是只有靠在面上不停地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教授，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锺书《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做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的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

他在另外一段话里，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问题：

>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青年毛泽东办的自修大学章程的基本思想和学风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问题而非主义，但这决不表明毛泽东没有主义，只是毛泽东讲求从问题中谈主义，从中国问题中谈共产主义。1927 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问题，而非普世主义。后来他和王明的斗争，都不是关于主义，而是关于问题的斗争。经过三十年代的失败，共产党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学术空论，要讲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共产党的学风转向调查研究和讲究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三十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佳境。

我们给大家的参考资料里有一篇李书磊的《再造语言》，也谈到延安整风，而整风的内容包括学风、文风，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延安整风甚至将学风与文风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毛泽东的整风报告有一篇《反对党八股》，专门讨论文风问题。毛泽东说，党八股也是洋八股。在李书磊看来，党八股是个“世纪顽症”，毛泽东总结党八股的八种

表现形式，现在依然存在：1)空话连篇，言之无物；2)装腔作势，借以吓人；3)无的放矢，不看对象；4)语言无味，像个瘪三；5)甲乙丙丁，开中药铺；6)不负责任，到处害人；7)流毒全党，妨害革命；8)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如今，学术界的问题也涉及学风与文风。比如，“言必称美国”同当年延安整风时批评的“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苏联”，实际上是一个性质的毛病，即所谓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从学术研究角度讲，这种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应该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比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等，就具有这种作风和气派。

再谈一下现在研究生中经常表露出的对待理论的两种倾向，也可谓对待理论的两种误区：一种是经验主义的，一种是教条主义的。经验主义往往排斥理论，其实理论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任何人都不可或缺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得好：“鄙视理论的人，不过是被一种过时的理论所左右。”另外，教条主义言必称理论，看上去似乎极度推崇理论，实际上却以僵化的态度窒息了理论的鲜活灵魂。

下面借用一篇关于博士生教育的文章，具体讨论一下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的问题。虽然文章说的是博士生，但也同样适用于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因为，其中说到的六类问题在他们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只不过博士生表现得更为突出：

> 1. 选题缺乏创新意义，常见炒剩饭的多，老生常谈，不见真问题，形同无病呻吟，或者无的放矢，几乎没有什么撰写价值。作者不是站在当代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而是搞模糊战术，举例式地针对某一两个自己不大喜欢的观点展开讨论，有的甚至还专门瞄准某个已有一定知名度的论者早年发表的而且早已修改甚至放弃的某个见解，摆出商榷的阵势，或者干脆自言自语，只见热闹，不见门道。

缺乏新意、老生常谈，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博士生中存在，硕士生和本科生中也同样存在。多年的教学经历中，论文选题让我眼睛一亮的还不多见。相反，许多论文仅看题目就让人昏昏欲睡了。比如，匿名评审的一篇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信息哲学”，而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东西，涉及许多学科——信息论、控制论、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政治

学……这么多的学科都在探讨“信息”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作者真有本事，能将前人的研究“通吃”，不过起码应该将已有的相关理论梳理一遍。可文章又没有这样做，而是自说自话地搞了一套“信息归类”，泛泛而谈，浅尝辄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博士论文应该针对某一个问题做精深的探讨和论述，而这篇论文只能用泛泛而谈来形容。这使人不但对学生的水平感到怀疑，同时也让人疑惑导师是怎么把关的，这样的题目在开题的时候，就不应该通过，因为不像博士论文，而像某种普及式的资料汇编，而且是很不完全的汇编。最后只好把文章退回去，让学生修改后再组织答辩，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这类文章其实应该属于否定之列。

2. 论证缺乏问题意识，平时少学且罔，不知“目轮火爆，肩山压石”之妙用，未得门径，临阵下笔时，不敢或没想到要对学术史做比较系统的清理与交代，往往三言两语打发了事，难见货真价实的学术对话。如果读者再往下看，通篇都像“自恋”式的自讨自论，自表自决，一如学术泡沫。作者费力论说的那些可以成立的道理，却已不是什么秘密，同行咸知；至于同行生疏的个别段落与字句，却恰恰是最需要资料去论证或修正的部分。有的连论文的结构也显得残缺不全，既缺“导言”或“绪论”之类的总体交代，亦无“结论”式的总结篇什。

还以刚才提到的论文为例，作者对有关的学术史既没有进行系统的梳理，也没有针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他说的“信息”观点，对专家来说早已是常识性的东西，而作者仍在费力地、绕来绕去地讨论。而应该重点论述的问题，却又被他当作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一笔带过。论证缺乏问题意识，是研究生论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避免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在专业领域深入钻研，另一方面也要在实践方面深入体悟。只有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否则论文很可能流于泛泛而论。

3. 资料收集未见“采铜于山”，多属照搬他人，顶多花了一点“集锦”的工夫，在转引他人论著中的资料、数据、论证过程、方法与论点时，大段小段地抄录与剪接、拼凑相结合，不仅抄错，还以不注出处、不作任何说明为常见，或注得很不准确、很不全面，投机取巧，五花八门；更为常见的是，尽量不看甚至完全不看原始资料，

> 原原本本地从别人的论著中把资料抄来，把转引当作直引，敢惹“剽窃”之嫌，从博士生到导师，都丑闻不断，斯文扫地；还有的将他人提交学术研讨会公开交流却未曾在报刊发表的论文据为己有，鹊巢鸠占，顶多在标题与段落上做点文章。论著的引文方式与注释方式则毫无规矩，随心所欲。

上文说到的“采铜于山”出。自顾炎武的《日知录》。顾炎武是“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日知录》是集他一生心血的作品。顾炎武在序言里自谦道，虽然这些文章没有什么高见，但“自信都是采铜于山”。意思是说，书里的内容都是作者一手采集来的有价值的原材料。就好比冶炼铜器，有些学者的原材料用的是现成的铜器，比如铜壶、铜碗什么的，甚至是精美的铜制艺术品，然后将它们重新回炉冶炼。这样一来，不但将本来的好东西破坏了，而且很可能炼出一些次品。而顾炎武说，他的研究是直接到山里采集高品位的矿石，然后从中提炼高品位的金属。有价值的研究往往如此，需要直接到山上去采集原材料，而不是那些二三手的材料。

有些人引用别人的东西不仅不注明出处，而且常常转引错误。正如前面举的例子，把《君主论》关于“爱”和“怕”关系完全颠倒。作者应该没有看过《君主论》，否则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更严重的是，文章的整个立论完全就建立于这个错误的引用之上。

资料收集是学术界近来比较常见的问题，而且板子也不能只打在学生身上。最近某出版社出了一本国家级教材，作者也是某大学知名学者。结果书中出现让人匪夷所思的错误。其中引用了一段毛泽东的话，说毛泽东说过，“民兵是胜利之本”。然后，针对古往今来民兵的重要性展开大段论述。可事实上，毛泽东说的是“兵民是胜利之本”，意思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真可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啊。

> 4. 分不清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的界限。有的把本来难以与政治挂钩的论题硬是朝政治那边挤，始终没弄懂二者的区别；有的不曾花点力气去清理事实，就大谈其价值评判，大有以价值评判取代事实评判之势，滔滔不绝；有的过于看重论点，却轻视论据。

学术研究首先得搞清基本事实，然后才能形成一定的价值判断。现在一些研究为什么显得薄弱乏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用观点取代事

实，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比如，一部新出的中国新闻史著述，从头到尾几乎都在进行价值判断，而所谓事实判断基本上都是围绕其价值观展开的，结果真像胡适批判的，把历史弄成了任其打扮的小姑娘。实际上，把事实搞清楚，最能让人信服，这样的研究结果才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如果先确定观点，再找论据，这样拼凑出来的东西是很难站住脚的。

> 5. 就论文形式而言，无论是博士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年论文或练笔作业，还是学位论文，文字表达能力每况愈下，常见文句不通，词不达意，虽名曰“文科”中人，却常使国语委屈蒙羞，有的甚至还不及一个比较像样的中学毕业生的文字表达能力，文化传承令人忧虑。无怪乎，无论是有识之士，还是一般民众，人们已普遍认为，我国博士生的整体质量还比不上1980年代初的本科毕业生，如今欲期驳倒此说，良非易事。

如今，一些学生的文字的确让人头疼。本科生文字功底不足还可以原谅，硕士生、博士生的文字还一塌糊涂就说不过去了。现在，文字水平高的研究生不少，但是文字不怎么样的也不在少数。我在改这种文章时觉得不像大学老师改论文，倒像小学老师改作文。写文章首先应该通顺，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啊，可一些研究生似乎连文通句顺也做不到了。

> 6. 滥发论文。不仅论文质量堪忧，而且出现数量夸张，一稿两发甚至三发或者更多者已见怪不怪，以浪费学术资源为成本，扰乱学术园地。可以说，凡是我国学术界所存在的学风欠佳与学术失范现象，无论是低级错误，还是“高级”错误，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中，都不难找到可以对应的依据；不仅在研究生中存在着，而且导师也不缺位，此类师生共同体还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我国学术失范现象的基本力量。学风浮躁之现象固然为历代正直学人所讥讽，并非全属今人之发明，而今日之浮躁，其广度与深度却堪称中华历史之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几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殆无异议。

清华向来反对滥发论文。今年，根据学位委员会的意见，事实上取消了研究生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当然，名义上还得发表一篇论文，但

经过专家认定，未发表的论文也可算数，只要达到应有的水平。

下面再看看造成以上问题的六点原因，我觉得讲得也很好。

> 1）基础学科研究的难度与毕业出路不佳的社会需求之间成反比，带来生源危机。

由于基础学科学生就业出路不太好，所以学生难免趋于浮躁。在饭碗都找不到的情况下，很难要求学生定下心来坐“十年冷板凳”。

> 2）在生源危机的背景之下，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招生规模反而空前膨胀，导致生源质量一如雪上加霜。

学生太多，老师就会应付不暇；其他工作再多一些，对学生的指导就难免应付。以我为例，每年带一到两个研究生，就已经觉得吃力。导师要对学生在很多方面负责，从学术上指导论文写作，到找实习单位和工作单位，甚至在生活上都要关心。学生多了，老师的负担重了，就很难保证质量。清华在控制学生规模方面做得不错，今年又规定每个导师招收研究生不能超过三个，博士生不能超过一个。听说有些学校一个老师负责的博士生常常达到二三十个，甚至还有四十多个的。弄到最后，有的博士生导师连谁是自己的学生都认不齐。

> 3）整体性社会风气的不良，侵蚀着教师的职业道德与学术风气，掣肘其学术水准与指导能力的提升。

现在好多人，名义上是名教授、名学者，实际上早已不做研究了。而在学术研究方面，一旦脱节，就很容易掉队。

> 4）学生的入学动机不纯，为求真求知而来者较少，以拿学位当谋职跳板者居多，还不乏官员与富翁的“镀金”。

大家想要通过清华的平台提升自己的实力，以求将来更好的发展，这种想法很正常，无可厚非。关键是既然来到这里，就应该珍惜机会，认真扎实地把事情做好，而不是仅仅镀层金。实际上做好研究，做好事情，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才是真正有利的。

> 5）学术评价体系与高校竞争中重数量、轻质量之风盛行，带来体制的“逼良”。

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这些年的批评

之声不绝于耳，如前面提到的课题学术问题。

6）学术规范教育严重缺失。有些学生违反学术规范，实际上是由于不知道、不了解。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开这门学术基本要素课的原因之一。我们希望在大家入学之初，入门之初，就能懂得学问之道的基本规矩，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一个基础。

研究与方法

研究生期间，有两件事需要重视。一是打下雄厚的基础，二是写好像样的论文。两件事做好了，研究生就算没白读。为了做好这两件事，需要关注三个环节。第一自然是读书、学习、思考、交流等，这是作为学生最基本的功课。第二是实践，包括社会实践和新闻实践。不言而喻，作为学生，学习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毛泽东当年说过，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等。这是个简单的道理，这个主次关系不能颠倒，颠倒就不是学生。作为学生，学习永远是第一位的，实践只能是第二位的。

有的学生以为，我喜欢读书，跟着李老师读研究生就是读书。这是一个严重的曲解。其一，我的工作如果仅仅在于营造一个读书的氛围，那么实在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因为，读书对于一个大学和大学生而言，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最本分的事情，就像农民种田，工人做工一样，难道还需要费力推进吗？其二，我从来没有仅仅强调读书，我强调的有两点：一是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二是上大舞台和干大事业。读书也不仅仅是翻翻书本，而是包括阅读、思考、交流、写作等一系列有机环节。如果仅仅是死啃书本，那就是书呆子了。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果仅仅是阅读而不思考，不交流，自己闷着头死读书，那不就成为书呆子了嘛，就像叔本华说的：把自己的大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总之，读书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阅读与思考，还需要交流，同学交流，本系交流，外系交流，本校交流，外校交流……这种思想的碰撞同样非常重要。读书不仅仅是啃书本的事情，实践也不是单纯跑新闻的事情，还得了解国情、了解民情、了解社会、了解人生。

第三个环节就是听课。读书、实践、听课，我把听课放在最后。因为

我发现，很多学生往往把听课看得很重，其实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是自主性的，是研究性的，听课是次要的。关于听课，有如下建议，供大家参考。

首先，尽量少选专业课。当然，不管以前是什么学科背景，有两门专业课至少听一听。一门新闻采写，一门新闻编辑。这是新闻传播这个行当的看家本领，这两门技术学好了，将来就不愁没有工作。虽然现在媒体很多，就业渠道很多，但一般来讲，作为第一个职位、第一份工作，往往还是记者和编辑。历年经验也是如此。即使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编辑和采写也还是基本功，中外电视行当的名家其实多是文字记者出身。

其次，尽量多听一些大家的课。清华这些年云集了不少各个学科的大家，如葛兆光、汪晖、格非、阎学通、胡鞍钢、崔之元、刘北成等，他们都是海内外知名的大家。听他们的课，重在获得一种思路、眼界，得到思想的启发，而不在于具体的知识。

最后，在课程这个环节尽量少花时间和精力。我上学时不是标准的好学生，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课也是东一耳朵，西一耳朵，有意思、有兴趣就多听听，没意思就干别的，包括睡觉。听课主要还是受启发和熏陶，学习大家如何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借鉴其方法和思路。而单纯的知识，通过书本就可以完全获得。

下面进入今天的主题——“研究与方法”。按照牛顿等《大学论文写作十二讲》的概括，一个典型的研究过程由八个步骤组成，虽然犹如一套八股的程式，但也不无参考：

第一步要选定某个问题，就是定下问题，并针对它进行研究。

第二步对已有的研究和理论进行评述。你选的这个问题不可能横空出世，前人多多少少总有所涉及。要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进行评述，这也就是文献综述的环节。

第三步是提出研究假设或研究问题。在梳理和评述他人研究之际，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假设。前人的研究工作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还有不足，而针对前人的不足，你想怎么做，从什么角度做等，然后提出自己的假设。

第四步是决定一种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假设有了，怎么对这个假设进行论证呢？要有对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设计。

第五步，搜集相关数据。这是不可少的一步，尤其是美国实证方法占主流的研究，更要求研究者做大量的具体工作，包括调查、统计、搜集

资料、数据分析,等等。

第六步,分析和解释结果。数据有了,资料齐了,就要对它们进行分析和解释,同自己原来的假设进行对照,看看是否吻合,有什么出入。

第七步是用恰当的方式呈现研究结果。最后的研究成果是写成论文还是写成研究报告呢?要找到适当的方式把研究结果呈现出来,告诉别人。

第八步,对研究进行重复,如果必要的话。客观的科学研究应该可以重复,就像自然科学一样,即同样的条件能够得出同样的结果。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应达到这个要求。

概括起来,你需要告诉别人自己研究的是什么问题,前人对此是怎么研究的,你又是怎么看待这些研究的,你对这个问题及其研究是怎么考虑的,准备做哪些工作,采用什么方法或方式进行研究,研究之后有望发现什么结果,这些结果最后是否印证自己的假设,等等。研究生的论文一般都是这套模式。

这里需要把论文和文章区别开来,因为人们往往把两者混淆。学生混淆也罢了,一些学者也似乎搞不清楚。比如,有学者登记科研成果,居然说自己一年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其实,这种所谓论文绝大多数应该属于文章,而不是论文。论文一年能有一两篇已经很不容易,真正有分量、有价值的论文十年磨一剑都不稀奇。自然科学的一些重大研究及论文,一个课题组集体攻关尚且还得很多年。那么,论文与文章的区别何在呢?一般来说,文章主题先行,作者有个想法,把观点提出来,然后摆一些例子,按照形式逻辑进行一番论证,最后证明自己的主题,就成为一篇文章了。比如,报纸上的文字除了新闻报道,绝大多数都属于文章的范畴。而论文则结论在后,这个结论经过科学研究,下一番工夫后才能得出。换言之,论文是对一个科学研究过程的总结和报告。关于文章与论文的区别,郑振铎先生的如下意思值得玩味:

> 原来鉴赏(相当于文章)与研究(相当于论文)之间,有一个深湛的鸿沟隔着。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心底的赞叹与直觉的评论,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鉴赏者是一个游园的游人,他随意的逛过,称心称意的在赏花评草,研究者却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不是为自己的娱乐而去游逛名园,观赏名花的,他的要务乃在考察这花的科属、性质,与开花结果

的时期与形态。鉴赏者是一个避暑的旅客，他到山中来，是为了自己的舒适，他见一块奇石，他见一泓清泉，都以同一的、好奇的、赞赏的眼光去对待它们。研究者却是一个地质学家，他要的是：考察出这山的地形，这山的构成，这岩、这石的类属与分析，这地层的年代等等。鉴赏者可以随心所欲的说这首诗好，说那部小说是劣下的。说这句话说得如何漂亮，说这一个字用得如何的新奇与恰当；也许第二个鉴赏者要整个的驳翻了他也难说。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与研究，才能下一个定论，才能有一个意见。

以上八个步骤里有**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选题，一个是方法**。今天凌晨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常做，背景也反复出现。一个背景是从小生长的新疆，一个背景是曾经待过的农村。背景都是这样，梦境也差不多，醒来后一般都记不住了，只剩影影绰绰的一点模糊印象。今天的梦也是如此，大概自己想去某个地方，本来那地方很容易到达，很近。如上街，回家，就隔几个街区。结果不知怎么阴差阳错的，岔到另一条道上去了。然后，想拐回来，可结果发现差得更远了。于是，又从那个更远的地方往回走，转一圈发现越走越远，而且越走越难，到了最后面对的竟是崇山峻岭、虎豹豺狼。何处是归程，让人很绝望。这个梦说明什么呢？想说两点，一是方向，二是道路。凡事方向得对头，道路得正确。不对头的话，就会渐行渐远。搞研究也是如此，方向就是你的选题，道路好比你的方法。找对了方向，找对了道路，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否则，就会像梦里的情景，越弄越苦，越弄越难，越弄越绝望。

选题是做事的目标。找到一个好的选题，就像谚语里说的一样，你的论文就成功了一半。现在研究生、博士生中，比较普遍的一大突出问题就是选题——不知道从哪去找有价值的选题。当然，这也跟现在大环境有关系。比如，一个博士生导师可能带四五十个学生，认也认不过来，又怎么可能想出四五十个有价值的选题呢？上哪儿去找这么多有价值的选题呢？

确立选题的原则，根据学生的情况可以概括如下几条。一是符合自己的兴趣，没有兴趣的东西做起来就很痛苦，而且越做越痛苦，最后只能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对待，这种情况在研究生中时常发生。当然，这个问题也不能全怨学生，许多时候自己做不了主，有的选题明明不感兴

趣，可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做，最后只好当成一个任务，应付差事，完成了事。如果想做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应付一下，拿个学位什么的，那么首先就要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第二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宜小不宜大，选题越小越好，特别是对研究生论文来讲更是如此。小的选题并不意味着价值小、意义小，那是两个概念。越是小的题目，越可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不要以为做一篇有价值的东西，就一定得弄个宏大的题目，诸如"中国富强之路研究"、"人类永久和平研究"等。上次举的博士论文也存在这种问题，包括"信息哲学"，不仅大，而且空，一句话就是大而空。

总之，大家一开始就应该有问题意识，读书、学习、思考、交流、实践、听课等，总是带着一种好奇、一种探索的劲头，不断的琢磨，不停的思考。而不要等到开题时才考虑这个问题，许多学生往往都是等开题前几天才想该研究什么问题，这样出来的选题一般都比较草率。如果题没有开好，头没有开好，那么下面的研究工作也很难做好。

选题定了，目标有了，下一步就是怎么达到这个目标，而这就涉及方法问题。方法好比工具，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锤子，那么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是钉子，这是一句西方的谚语。意思是说，方法应该多种多样，道路应该多种多样，不要把方法或道路理解成唯一的。比如，我们做家具，有刨子、锤子、锯子，各种各样的工具各有不同的用途。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适用对象，方法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学者应星在其颇受好评的博士论文《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就此也谈道：

> 并不存在着什么"真正科学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是以实证的面目还是以反思的面目出现的，而是由什么样的主题和什么样的材料决定了什么样的方法。

关于方法问题值得多说一点。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总体情况看，有这么一个趋势：1980 年代不太重视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如此，其他学科也差不多。那个时代号称思想启蒙时代，狂飙突进时代，大家都恨不得登高一呼，四海云应，个个想成为精神领袖，思想先驱。1990 年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用李泽厚的话说，"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这时，学术研究越来越受到青睐，各种学科的建制也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成型。1990 年代初倡导所谓"学术规范"，有关讨论非常热烈，其中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注释。1980 年代的东西，著作也好，论文也好，

往往不重视注释，仿佛自说自话。即使注释，也远不如现在这么严格和规范，比如媒体炒作的所谓汪晖论文问题，其实充其量属于注释规范问题。1990 年代以后强调学术规范，首先从注释开始，各个学科都很重视这个问题，新闻传播学也不例外。注释看起来是个技术性问题，其实涉及的是学术研究的规范，如尊重前人的成果、重视学术的积累、强调研究的传承等。近些年，国内高校连着举办几个影响较大的高级研讨班，都涉及方法论问题。今年更热闹，更火爆，说明大家越来越看重方法。与此同时，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就是唯方法论，方法至上论。其中，又以美国的方法一枝独秀，大家谈来谈去似乎都是美国的方法，包括实证方法、定量统计方法等，好像不谈这些东西就不能搞研究了。以至于很多研究生也遇到类似的苦恼，本来某个选题不需要用定量统计，但又怕受到质疑：你的研究有没有统计？有没有问卷？这又跑到另一个极端。

一方面，应该重视方法论（methodology）与方法（methods），用毛泽东的比喻就是如何搭建过河的桥梁。所谓方法论，简单说是对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方法论与方法的关系犹如形而上与形而下，一个属于一般理论，一个属于具体应用。另一方面，重视方法论与方法的同时，还要考虑是否适用，是否同你的选题、你的研究、你的论文相吻合。也就是说，应该先把研究问题搞清楚，然后看哪些方法最能解决问题，最符合研究的需要。学科不同，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的问题不同，所用方法自然不同。经常见到这种情况，有些同学对某种研究方法情有独钟，问题还没确定，研究方法倒先确定了。这里提醒一句，除非你的论文在于阐述这个方法，否则就是本末倒置。方法是从问题中浮现的，用什么方法，怎么用，无不取决于问题本身。所以，先考虑问题，再考虑方法，而不是颠倒过来。

在我看来，**方法以及方法论可以概括为这么三个层次：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方法与方法论**。做研究也好，不做研究也好，这个学科也好，那个学科也好，大家都会涉及这个层次的方法与方法论。这个意义的方法与方法论，包括辩证法、形而上学、形式逻辑、归纳演绎等。**其次是学科意义上的方法与方法论**。诸如哲学的、史学的、文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方法与方法论等均属此类，不同的学科往往都有适合自己的主流方法与方法论。**最后才是操作意义上的方法（不是方法论）**。比如，现在常说的问卷、调查、文本分析、数据统计，等等。

一般方法与方法论跟哲学、世界观等联系密切。在我国，一般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即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念出发，从观念出发；同时，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看待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根本区别。“客观地”不用说，研究问题需要保持一种客观态度，才可能求得真理与真相。“历史地”就是要联系地而不是割裂地看问题，许多研究往往将问题孤立起来，使之处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境地。比如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受众”这个概念就是如此，仿佛受众是个孤零零的东西，本身也没有任何区别与差异，仅仅属于所谓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实只要将所谓受众置于社会历史的纷繁情景之中，就会知道这个概念何等无谓而粗疏了。“全面地”就是防止片面性，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些都是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与方法的通则。这些通则也适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不管做什么课题，都得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与此相对的唯心论，并不是没有价值，从方法论意义上说也不是毫无意义。相反，唯心论在人类思想史进程中，也形成很多有影响、有意义的成果，比如，形式逻辑、概念推导等。

这里顺便谈一下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其实融合很多元素，首先是辩证法，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精髓。先秦的诸子百家，如《老子》、《易经》、《孙子兵法》等都包含丰富的辩证法。其次，是明清之际兴起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传统，构成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核心。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都包含丰富的方法论，有助于大家从更高的层面上分析问题，研究问题。总之，一开始不要陷入具体的、操作性的东西。如果对这些高屋建瓴的问题没有搞清楚，那么操作性的东西即便玩得再好，结果也可能是一本正经的无聊，煞有介事的浅薄，就像英国后现代理论家与作家戴维·洛奇在《小世界》里所讽刺的学者与学术，那是一部妙趣横生的西方学界的儒林外史。

关于专业方法论与方法，这里主要谈谈与新闻传播学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学科方法与方法论。**哲学方法论**包括思辨、抽象、推理等，对此大家耳熟能详，不必多说了。**史学方法论**也同样重要，包括考据、文献等都是传统史学常用的一些基本方法。20 世纪新史学兴起后，方法论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如现在兴盛的口述史。口述史不是随便说说的

事情，首先人物要选得恰当，怎么选人是很关键的。然后是如何记录，怎么叙述等，都有一系列的讲究。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就是口述史方面的权威，他的一些主要著作都是用口述史的方法完成的，如著名的《胡适口述自传》，就是他和胡适聊天记录下来的，还有《李宗仁回忆录》实际上也是口述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口述史研究中做得很好，那里汇集很多世界名流的口述史资料，像中国的宋美龄、顾维钧等民国要人。20世纪的影像资料丰富以后，通过影像这种方式来研究历史，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史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至于**文学的方法论**，在文化研究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

人类学研究方法论与方法，包括民族志、田野调查等。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本专业书——《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作者郭建斌是复旦新闻学院毕业的博士。他是云南大学新闻系的教授，该书是其博士论文，借用民族志的方法展开研究。为此，他在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独乡生活了将近一年，这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听他说写论文的过程异常艰辛，进山的时候，手机就没信号了，在大山里待了几个月，通信很不方便。等他出来的时候，感觉像九死一生似的。这种研究精神值得提倡，深入那样一个地方，通过实地考察，扎扎实实做论文，研究当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与现代传媒的关系，探讨报刊和广播等传播媒介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发展与历史，以及传播媒介及其社会功能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等。他用的就是人类学的方法——民族志、田野调查等。

按照专业化的定义：所谓"民族志，主要是来自人类学的一种田野调查方法，研究者由此深入到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之中，从它的内部提供有关意义和行为的解说。这种方法强调，研究者要想被研究的共同体和群体理解，就得打通文化距离，民族志学者广泛收集材料以描绘一个社会群体的面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情况，倾听一切，询问问题"(《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与此类似的方法是参与式观察，即在一种非实验室的语境中收集研究资料的过程和方法。参与式观察是社会研究的一种常用方法，它的优势在于允许自我以某个群体一员的身份对群体进行观察，主要劣势在于参与者可能将其价值观加入观察过程，从而有可能失去客观。如果参与观察者不公开他的身份的话，那么又会构成欺骗，就像我们说的匿名采访。美国某一年有个邪教闹得很厉害，于是有研究者便化装成信徒，

深入内部进行参与式观察，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有点像特务行径，一旦败露会引发一系列理论与伦理的纠葛。

田野调查也是用得很多的方法。像李强同学的《乡村八记》以及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等，都用到这种方法。今年开题的时候，一个研究生和我探讨，最后定下一个题目——《记者郭超人及其时代》。郭超人是前新华社社长，已经去世，可以盖棺定论了。新落成的中国新闻大厦即中国记协办公大楼，在第二层布置了一片展区，展出的都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风云人物，从邵飘萍一直到范长江、邓拓，其中也有郭超人。研究郭超人及其时代，显然无法采用美国式的方法——入户、访谈、问卷、调查、计算机统计等，那就格格不入了。这里，必须用其他一些更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更能够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的方法，如史学方法就是最基本的方法。再如，田野调查即我们说的访谈也是一种有效的，甚至必不可少的方法。为此，我们确定了与郭超人有关的 20 个核心人物，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跟郭超人有过种种交往、联系，通过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视角，收集资料，最后再结合历史文献，形成一个相对客观、准确、丰满、真实的郭超人。这种访谈不是一般的聊天，而是有一系列的方法论讲究，包括怎么提问、怎么观察、怎么记录等。

社会学方法论与方法。社会学与新闻传播学联系最为密切，美国的传播学实际上就是“寄生”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无论理论还是方法都跟社会学的联系非常紧密。比如，美国许多传播学大家、名家本身就是社会学家，所谓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就是个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方法方面颇有建树和影响。另外，社会学的每门专业、每个研究者，也都有自己钟爱的研究方法。比如，公众舆论研究一般采用调研法，婴儿心理分析通常采用观察法(婴儿的心理分析只能观察，他不会说话)，组织传播研究可能用个案研究，政治社会事件的研究对文献记录和内容分析比较重视，等等。总之，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方法及方法论同社会学最为接近，其中又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定性或称质化方法，一种定量或称量化方法**。尽管这种二分法不见得完全准确，十分合适，但是有助于了解大致的情况。

定量研究建立在“客观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客观主义认识论，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客观与主观是完全剥离的，有那么一个客观东西在那里，我们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就能把它搞清楚。20 世纪以来，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都带有这种客观主

义色彩，认为所有知识都来自直接观察和基于直接观察的逻辑推理。这种思路及其方法论，显然更多是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家了解世界的方法就是把现象汇总出来，进行客观观察并找出其中的规律。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也深受这种自然科学及其客观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定量研究、实证主义、科学方法等，这些概念往往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即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后现代的评论家则对此持有异议，在许多理论著作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反思与批判。当然自然科学始终保持繁荣昌盛之势，而人文社会科学也一直受这种思路左右。不过，有些评论家认为，人文科学主要解决人生意义和价值问题，应该有一套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方法论。

下面再看看定性方法。这里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认为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也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可以进行定量、统计、模式推导等，就像数理化一样来解决人类社会的复杂问题；另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系统，精神现象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不可能用所谓精确的、科学的，甚至刻板的方法进行解剖的，“他们不认为真的存在中立、超脱的观察者”。也就是说实证研究、定量统计等方法有个前提，即有个客观存在的东西，科学家和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研究对象是一回事，研究主体又是一回事。而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不可能存在这种中立、超然的研究者。“受现代物理的启发，他们提出，观察者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被观察者，实际上，脱离了调研对象，观察者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现代物理学是针对经典物理学即牛顿物理学讲的，而在牛顿物理学看来，世界俨然自生自灭，人们用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可以互相剥离，互相分离，井水不犯河水。而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则认为，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实际上不可掰扯开来，主观和客观是密切联系的。薛定谔的“测不准”原理，精练地概括了这种思想。按照传统物理学的思路，你要知道一杯水的温度，只要将量表放进去测一测就能得出准确数据，就能知道温度是多少了。而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你把量表插进杯子的时候，已经改变了水的温度，水已经不是原来的温度了。同样，作为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研究者，一旦介入研究对象，也就影响或多少改变了原来的自然语境，客观世界已经主观化或主观世界已经客观化，所谓客观超然已经不

可能。

关于定性方法，往往被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如“现象学的”、“诠释主义的”、“自然的”、“经验性的”、“辩证法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最常见的还是定性方法。定性研究源自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认为知识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就是说，定性与定量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不一样。所谓建构主义是说各种知识、各种理论都是一种人为建构，即使打着“纯客观”、“科学研究”的旗号，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建构。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固然是一种建构，即使自然科学同样也是建构起来的，正如福柯等后现代理论家所揭示的情形。王治河在“后现代交锋丛书”的《汉译前言》里，有段话讲得比较精辟：“后现代主义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理性，它所反对的是对科学的迷信，是科学沙文主义。这种科学沙文主义把科学看作认识他人和世界的唯一可靠模式，同时否定一切不能实证的人类价值及精神活动。”

最后，我们对定性与定量作个对比：定量强调客观呈现，定性强调主观建构；定量是发现理论，定性是发明理论；定量强调描述，而定性强调论述；定量更多用数据统计，而定性更多是文字阐述；定量是分析的，定性是综合的；定量研究是人为的，而定性研究是自然的，等等。这是跟新闻传播学关系比较密切的两种社会学方法论与方法——定量和定性。由此可见，方法不是唯一的，且不说一般意义的方法与方法论，也不说学科意义上的方法与方法论，即使操作层面的方法论与方法也不是唯一的。现在有种倾向好像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唯方法论，而且是唯方法论中的定量方法论。似乎一切研究都必须用这种方法与方法论，否则就不科学，就没有方法。这就未免有点武断了。

定性与定量问题，还有一些误区需要澄清。第一，定性与定量的划分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两者截然分离，互不相涉。实际上，定性研究也会使用一些定量方法，反过来，定量研究也可能不同程度地用到一些定性方法。事物都是联系的，方法论与方法也是如此。第二，学生往往以为定性研究好做，定量研究难做。事实上，要想做好研究都不容易。比如，迄今为止的新闻传播学“全国百篇博士论文”，基本上都是定性的。所谓“全国百篇博士论文”，就是国家为了鼓励学术研究、鼓励博士生认真治学，每年从全国各个学科评选一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个难度自然很大，迄今为止新闻传播学只有三篇入选（2010 年中国传媒大学薛文婷的论文荣膺第四篇），都出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其中

杨保军的《新闻事实论》，完全是抽象的、思辨的、推理的，所费心力一点不比采用定量统计等方法的研究少。第三，实证研究等于定量研究，所以只要不用问卷、统计等就不是实证研究。其实，正如厦门大学陈嬿如教授所言：

> 实证研究方法包括除了纯粹的哲学和神学思辨之外的大多数研究方法，其共同特点是植根于客观现实而非从书本上的抽象思想出发。实证研究方法既包括定量的实证研究，也包括定性的实证研究，比如历史研究（基于历史事实）。某些实证研究方法有自然主义倾向，它们关注的材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留下的“自然”轨迹，而非“人为”制造的数据和材料。所谓“人造”，比如实验法和调查法—如果研究者不对被试或调查对象提出某个问题，这些无辜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不论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实证研究，其核心都在于“观察”，而观察是一个可以泛化的科学概念——有实验室里的观察，也有对历史现象的观察，只不过后者的第一手资料记录者与后来的研究者通常不是同一个人。

总之，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唯一的。我们都知道理论不是唯一的，其实方法同样不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唯一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与方法论，就是普遍遵循的形式逻辑——通过合乎逻辑的程序得出结论。这一点不管是做什么研究——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新闻学研究、传播学研究、理论研究、实际研究等，都是必须遵循的。所以，如果简单归纳，一篇论文只要做到两点就算达到基本标准，一是言之有物，一是言之成理。言之有物，是说研究的问题有价值、有意义，一篇史学论文即使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而将有关史料搜集齐全就算言之有物了。至于言之成理，是说能够自圆其说，逻辑上达到自洽。

谋篇与写作

第一讲曾跟大家讲过，不要以为科学研究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实际上，它从方方面面培养你的素质、夯实你的基础。不管将来做什么，这些素质和基础都是必要的。比如形式逻辑，三百六十行都离不开，不管做什么总得讲逻辑，而科学研究就是培养逻辑思维的主要途径。再如，我们常说的文字，要做一篇优秀论文，更不用说“全国百篇博士论文”，文字肯定得精益求精，字斟句酌，既通顺，又完美。还有不能不说的严谨，大到对选题的把握、相关文献的熟悉，小到每个细节，如资料的准确、数据的科学，每个环节都得严谨。这些通过科学研究的过程都能得到培养，而一旦养成这些习惯，将来无论做什么，都会受益无穷。

我自己做博士论文就深有体会，我不敢说自己多么用功，但完成后确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发生一种本质的变化，上到一种全新的境界。我读了三年，第一年也是基础课。由于外语第一个学期提前通过，第二个学期基本上就进入论文阶段。首先是选题，前面说了，非常苦恼的。选题一旦确立特别兴奋，甚至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感觉，我一定要做好，我有信心有兴趣做好！接下来就是最痛苦、最煎熬的过程。想想看唐代那么遥远，又多么辉煌灿烂，而自己又不是学历史的，需要涉猎多少东西啊。理论上讲，至少得把新旧“唐书”及《全唐诗》、《全唐文》、《资治通鉴》等通读一遍吧。另外，还有好多相关的文献、文集，光这些东西就不知有多少，更不要说后人的有关论著和论文，真是汗牛充栋，读不胜读。看完之后，还要提炼素材，逐渐形成思路、想法，最后还有一字一句的写作。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写第一章是最难的，改来改去，费尽周折，而越到后面就越顺手，最后甚至有渐入佳境的感觉。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谋篇与写作问题。

上一讲谈了研究过程中的主要环节——选题和方法。选题是决定论文质量的首要环节，好的选题就是成功的一半。关于方法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方法，虽然1990年代以后随着学科规范、学科建制的完善，方法问题越来越引起各个学科的重视，包括新闻与传播学科，人们对方法的意义认识更明确，总体上讲比以前好许多，但是轻视方法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包括认识和实践两方面都存在这种问题。

例如，今年研究生答辩有个同学，在量化统计领域钻得较深，还参加过这方面的高级研讨班，又有很好的数理统计的基础，研究方法课的成绩不错，自己也对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等话题很感兴趣。他的论文是用实证方法，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机关报《信使》杂志，探讨其中所呈现的诸多跨文化传播或国际传播现象，如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歧视等。此类问题在研究之前可以作为一种假设，为了证实这种假设，他采用规范的实证方法，如对某期某篇文章进行分类、量化统计、内容分析等，进而对研究假设进行证明或证伪。论文的观点和结论没有太多出乎意料的地方，凭直觉和印象也可以想到此类的问题或倾向。其意义在于方法论及其方法，从而使其结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若驳倒他不容易，除非拿出更雄辩的数据和更科学的方法。没想到这篇论文在答辩中受到质疑，而且主要是针对其方法论和方法，觉得这套方法本身意义不大。结果，小伙子本来意气风发，因为能做到这种程度的确不容易、不简单，需要有相当的功力。没想到遭到这样的质疑，于是答辩时就蔫了。旁听的同学有点打抱不平，说按道理这样的论文是应该肯定的，这样的方法是应该鼓励的，因为我们太缺这样的研究，有同学愿意在这方面下工夫，并且做得不错的本应该给予好评。这是我说的方法方面存在一种偏颇，即对方法问题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充分。

而另外一种倾向或偏颇又是迷信方法论，唯方法论，甚至唯美国方法论，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郭庆光老师在日本修的就是这套方法，他不止一次谈过，包括他个人及其导师对这种方法都持有保留态度，对其利弊得失都有清醒认识。上周一位博士生过来看我，也提到这个话题。她刚刚去武汉大学参加了一个方法论的高级研讨班。她说这种美国式的研究方法确实不错，有其价值，但它有一套自洽的体系，在那套体系、那套话语中，可以说非常完美，也非常科学，一旦脱离这套体系就另当别论。换句话说，如果不在那套体系中，这套方法就值得推

敲。后来，我把上节课讲的意思略微说了说，她也觉得所见略同。

现在一些年轻学者，包括博士生都认为方法就是美国的那套方法，除此之外都不叫方法。那么，我们就想问一句，美国那套方法也不过是二战之后才兴起的。在此之前，许多学术成果和思想成果算什么呢，难道算伪科学？即使是现在，在美国之外很多地方，比如欧洲，也没有完全套用美国的方法，那又算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上节课总结的时候特别提到，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唯一的，不要迷信。每种方法都有它适用的领域、适用的对象、适用的问题，既有它适用的一面，也有它局限的一面。另外，还想补充一点，美国的那套方法可谓富人的方法，要玩那套东西得有钱，没钱玩不转。就拿问卷、统计等来说，光鼓捣这些东西就要花多少银子呀，如果是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统计调查，更不知得怎样花钱如流水呢。我们的研究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选题确定后也想尝试着做些调查统计什么的，比如“三农”电视研究，就想是不是针对某一农民工群体或乡村，做些量化统计，搞些实证工作。但一涉及经费，就望洋兴叹了。因为没有钱就做不成这个东西。说到这里，想到唐德刚曾经谈到的一个观点。他说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的学术。发展中国家各个方面都处在发展中状态，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学术都是发展的，这方面也不好攀比。美国的研究有充裕的经费可以任其倒腾，不管是否科学，有没有意义，至少人家玩得起，而我们往往玩不起。所以，我说那是一种富人的方法。政治学者王绍光教授的提醒值得关注：

> 既然方法是工具，它便没有绝对最好的，只有最适用的。在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曾有过一个希望采用当今最“尖端技术”的阶段，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只是在有了惨痛教训以后，第三世界国家才认识到“适用技术”的重要性。在研究中国政治时，也许不必，也不可能采取国外最“先进”，最时髦的方法。

这是上次课讲的内容，这次讲讲谋篇与写作的事情。

清代学者在治学上讲究三个环节：义理、考据、辞章。义理，就是现在常说的思想；考据，就是实证研究，即现在所谓学术；辞章，就是谋篇布局，遣词用语。他们把辞章摆到和思想与学术相提并论的高度，这一点倒是同 20 世纪以来学术思潮的大趋势相吻合。把语言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上升到统领一切的高度，是 20 世纪整个西方学术思潮

的一个明显趋向，各个学科都带有这种烙印。上次讲定性研究时，提到知识是一种建构而不是一种发明，就来自这里。因为，在20世纪语言哲学看来，语言的意义不仅是传达意思的工具，同时本身也是对世界的一种建构。

李欧梵在他的《我的哈佛岁月》中，提到当下中国存在两种危机，他把语言的危机和贫富的危机相提并论，说明这个情况之严重。而论文的写作，同辞章语言等都有直接的关系。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一种敬畏，因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如此。我们说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历史，说到底都是一回事。没有这种敬畏之心，就没法谈真正的、有价值的研究。曹丕说过一句有名的话："经国之大业，万世之盛事。"他把写文章提到这种高度，认为文章绝不是简简单单自娱自乐的事情，而是经世济民、安邦定国的大事。

研究生论文写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也跟缺乏这种敬畏之心有关。换句话说，有人可能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其中，有的在应付差事，有的虽然也重视，但觉得不过是个任务，是个外在于己的工作，所以越来越缺乏敬畏之心。当然，这个问题同样不能单纯责怪学生，追根溯源也同整个学界的大气候有关，整个大气候越来越不把学术与学问当作神圣的事情，而往往当作追名逐利的东西，所以学生有这样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下面就谈谈论文写作的一些具体问题。首先，谈谈好的论文有哪些标准。这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有同学在反馈中提到的。好多同学谈到，我也想把论文做好，我也很敬畏，也很严谨，但怎么做才算是好东西，不知道什么样的论文算是好的，应该注意哪些环节。对此，我们大概归纳几点。

第一，选题是否独到。这一点已经多次提到，它是决定论文成败的首要环节。这个事情确定了，论文就成功了一半。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即使解决不了，也很有价值，也比做了很多没什么价值的研究有意义。

第二，概念是否明确，特别是核心概念。国外的研究比较讲究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得把概念界定清楚，即你讲的是什么，研究的是什么。不仅一开始就得把概念界定清楚，并且一以贯之地在这个界定的意义上使用概念。与此相关，逻辑必须严密。我们会发现，在许多答辩场

合，教授们往往追究的只是个别概念，而不是学生自以为得计的研究内容和结论。

第三，观点是否新颖，资料是否充实，也是很重要的。在论文评阅或答辩过程中，老师们也常常关注这些问题。比如，他写评语的时候常常会说：本文论点如何如何，材料如何如何。

第四，研究方法是否得当。这方面是学生容易出毛病的地方，好像没有哪篇论文在这方面挑不出毛病。关于研究方法，第一要科学，第二要适当。也就是说，你的方法不仅可靠，而且同你的问题相关，可以实实在在解决你的问题，而不是拉一堆方法的旗号唬人，什么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演绎归纳相统一的方法，等等。

第五，文字是否恰切、准确、精当。好的论文对有经验的老师来说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好的论文也是如此。其中，文字往往就是一个直观的因素。历年的优秀论文在写作上都是很完善、很漂亮的，不仅仅是内容充实、有创见、有新意，同时写作也很完美，文字也很干净。

如前所述，好的论文其实就是两条标准，一是言之有物，一是言之有理。下面是《大学论文十二讲》中开列的作文“诀窍”，有的有道理，有的不见得，仅供参考。

> 第一是用单数第一人称表明自己跟文中思想、反应、信念、评论等的关系，至少在第一稿务必这么做。享受当“作者”的感觉！直截了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认为”、“在我看来”，好像我们都是这样说的。一般不会用第三人称。第一稿不妨张扬一些，要把情绪调动起来。如果你喜欢用形容词、副词，只管用。

第一稿不要有什么框框，有什么约束，先写起来，写开后再说，有的东西不是一开始就想周全的。跟打仗一样，作战计划只是大致的东西，不要指望每一步都按着计划进行，有些情况是预料不到的，打着打着可能就变了。论文写作也是如此。开始有一定的想法和资料，也有一个大致的思路，这就是开题报告的内容。然后就按着这个思路走，走的过程会有一些变数，写作的过程会产生新的思想，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也许，走着走着，笔下就可能蹦出灵感，蹦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好像某种神秘的启示，在笔尖上自己蹦出来。所以，第一稿不妨张扬一点、放肆一点。方汉奇先生经常说，“做人需严谨，做文需放肆”。

> 刚动笔的时候，别去想读者会怎么评价你的文章和写法。编

辑、出版机构、导师以后都会提醒你这一点的，别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和精力。和前面说的一样尽量放开手脚。尽量用短句子，特别在写第一稿的时候。长句子容易把自己搅糊涂。

现在学生往往喜欢用长句子，可能是受外语的影响。其实汉语最大的特点是简洁有力。如果懂得汉语的精髓，受到古汉语熏陶，那么句子往往比较简洁、凝练、富有表现力。这里给大家带来一个反例，一篇新华社稿子的导语：

> "我喜欢你的领带"，这句听上去有些耳熟的话让一脸错愕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几秒钟迷惑之后开始努力搜索起尘封的记忆。

我统计了一下，一共 44 个字。这么长的句子一口气都读不下来，要看明白意思还要琢磨琢磨。其实，这个句子稍微变一变就很好：英国首相布莱尔听到这句话，一脸错愕，迟疑几秒，似乎努力搜索尘封的记忆。

每年论文评阅与答辩的时候，满目都是这样的句子，改不胜改，也没法改。以前学生少，还有精力做做这样的工作，现在确实是顾不过来。所以只能好自为之，自己认真琢磨，反复推敲，仔细打磨。而所有这些工夫都不会白费，不要以为这样做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这方面下的所有工夫，都会在以后的工作中显现出来。就像军人常说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基本功练好了，将来才可以拿得起，放得下。

> 尽量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写作风格和论证方式。尊重自己的风格，如果写来顺手，就保持下去。如果写一篇概要耗时比正文还长，那就扔开它，别听人家说什么概要非写不可的话。如果你喜欢开夜车就这么干，如果你喜欢天南海北最后才落到主题上，没关系，就这么干。

还是在说第一稿要撒得开，要尊重自己的风格。虽说学术研究有些共同的要求和规范，但是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体现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而不必千人一面。当然，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不是容易的事情，只有那些大家才有自己的风格。但是作为初学者、年轻学者，也不妨追求自己的风格。

> 给自己定规矩，每天写多少小时（或分钟），或者完成多少字数。如果有难度，把目标放低一点，并且一开始别突破。如果可

能，弄一个闹钟来。闹钟一响，哪怕正有好想法呢，先停下。很快你就会被这种打断弄得烦躁不安，越来越想多写几分钟。多搞这么几次，当然如果精力无法集中则还回到自己的写作规矩中去。每天写几段，一周下来你就有好几页纸了。这比每天花四五个小时来折腾自己、弄出废纸一箩筐更可取。

这个事情倒不必拘泥，但其中基本原则还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写论文要有一个大致计划。说起来，大家开题的时候都有详细的计划，都会写得很清楚，什么时候交大纲，什么时候交初稿，什么时候交定稿，说得头头是道，其实大多数往往都是形同虚设，自欺欺人。这也是现在论文总体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因为时间投入不够。这里应该承认，有些同学还是做得非常认真，非常出色的。比如何威同学，当年的硕士论文写了十几万字，俨然一部专著。当然，硕士论文不追求字数，在我看来，有三万来字就可以了，最多不超过五万字。对一篇硕士论文的选题来讲，你掌握的资料和具备的知识，能有三五万字就应该可以把问题说得比较清楚了。如果还说不清楚的话，说不定就有问题了，不是研究方面的问题——自己没有完全搞清楚，就是表达方面的问题，绕来绕去，本来十个字可以说清楚的事情，啰啰唆唆二三十个字也说不明白，结果字数自然就膨胀了。

不管怎样，写论文都应该有个大致计划，而且赶早不赶晚。既然这个事情非做不可，为什么不早做呢。赶早可以争取主动，赶晚就势必陷入被动。

如果短句过多，读起来像电报稿，那就把句子串一串，行文更流畅一些。不过这样做的时候要小心，宁可句子短，也不要句子复杂。长短句结合，读起来更有韵味。

这些规则仅供参考。包括我说的一些规则，只是一种借鉴。长句子还是短句子，应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特别是根据论事说理的需要，不必强求一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学生的文字，如新闻稿、论文等之所以有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在于心里没有读者。我们是学新闻传播的，都知道传播对象的重要性。你说的话人家理解不理解，接受不接受，你说得清楚不清楚，这个问题应该始终记挂在心。这样至少在写作中，不会出现疙疙瘩瘩的东西，你会想这个顺不顺，人家读得明白不明白。我们不能光想自己的感觉，很多同学被指出这类问题后还不

认账，觉得自己说得很清楚么，自己看得很明白么，你们为什么不明白呢。我自己有一个形成习惯的经验，无论写什么东西，似乎总有一个读者站在面前，觉得自己是写给他看的，读给他听的。如果哪个地方自己觉得都不清楚，那么人家能清楚么？所以说，“对读者问题估计越充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理解就越顺畅”。

> 放弃自己权威的表现就是引语过多，大量大量的引语，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埋没在别人的东西底下。还有做论文要立观点不要掉书袋。要有新的观点，不是显摆，不是掉书袋。我们有同事把这个过程比作庭审，所有的证词都要摆到这里来互相答辩质疑的，你引用的东西，你自己的东西，都要摆到这里来，经过一番辩驳。这些都是写作的一些细节和规范。

引用别人的东西一定要有批判的眼光，要有独立评判的意识，而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一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哈贝马斯怎么说，马上拿来就用，总得分析分析，看看有没有道理。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

细节与规范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学位论文一般都有一种八股式的套路，如摘要、关键词、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主体论述、参考文献、致谢等。之所以需要这种套路，既是为了严明学术规范和学术纪律，也是为了便利学术交流。比如，文献综述是对前人有关研究进行的系统梳理和评述，一方面显示研究深入的程度，一方面引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和背景。也就是说，通过文献综述，才能发现前人哪些东西做得好，哪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基于这种情况，你准备在哪方面实现突破，在哪方面入手，从哪方面切入等。《大学论文写作十二讲》一书里也写道："文献综述，作为论文中不可缺少的一章，它向读者表明你为什么做这个研究，为什么此时此刻做。你应该向读者表明你研究的独到之处。这部分也是你展示自己作为学界中人批判能力的好地方。"

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因为目前这方面做得比较欠缺。有位博士生的论文几乎没有什么文献综述，一问起来还说自己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前人没有什么研究成果，所以文献综述单薄云云。这样的解释是说不通的。因为，任何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在其研究的题目上，都应该是、而且肯定是开创性的，而绝不能是人云亦云，炒炒前人冷饭，否则还有什么必要劳民伤财做研究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己可以开天辟地，"无中生有"，因为任何研究都应该是、也只能是循着前人的足迹继续前行，即我们前面讲到的"照着说"与"接着说"的问题。没有照着说就不可能接着说，照着说就集中体现于文献综述部分。文献综述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与研究问题直接关联的，比如，一篇阐述新闻定义的论文，就需要将古往今来有关新闻定义的文章进行系统梳理和综合评析；另一种情况则是与研究问题间接关联的东西，比如古往今来关于消息、信息、传播、传闻等方面的思想观点等。许多情况下，直接的文

献可能确实不多，但间接的东西一定不少，如果认真涉猎，深入钻研，肯应该能够发现大量与此有关的资料或文献。

与此相关，参考文献也需要提醒一下。一是得按某种顺序排列，比如音序，不能颠三倒四，胡乱排列，让人摸不着头绪。为什么要按一定顺序排列？为了方便读者检索。另外，需要强调实事求是，用了哪些文献就开列哪些文献，不要觉得罗列得越多就显得越有学问。这种做法不仅自欺欺人，而且还会弄巧成拙。也许某个答辩老师对列举的某篇文献感兴趣，追问一下，而你并没有掌握，那就吃不了兜着走吧。

注释也是学生论文经常出问题的地方。一般常用的几种注释形式有文后注，页下注，文中注等。文后注，页下注，都比较传统，比较常见。文中注最早还是中国古人治学所用的方法，一般用大字表示正文，用文中的小字表示注释。不过，现在所用的文中注是近年从海外舶来的，港台学者用得较多，国内学者也开始尝试，因为它有一定的便利。比如，它把引用的所有参考文献都列在文章后面，按照作者顺序排列，作者下面再分列参考与征引的文献。这些文献在文后注和页下注中，每引用一次都要将有关信息全部写一遍，而且每看到一个注释，都要翻到下面或后面才能知道出自何处，所以容易干扰思路。而文中注则只在征引的地方，用括弧写上作者、年代、页码等核心信息，不仅比较简单，而且紧跟引文，一目了然。

不管什么形式，所有的注释目的首先都在于交代出处，同时提供相关信息，做出必要的解释与说明，而这些解释与说明在正文中往往不好体现或不便体现。比如，正文的思路有其逻辑脉络，一以贯之，一般不好插入对某个问题的解释，只好用注释加以说明。

至于注释格式，有不尽相同的要求和规定。这些操作方面的差异不必十分介意，因为不同的格式都是基于同样的原理。前面举过一个例子：有同学在注释里写到，“根据有关资料整理”。为什么这样注释有问题呢？因为，这个出处没有交代清楚，读者无法按图索骥查到他所说的资料。还有同学问到，报纸上、文件上的东西能不能用？其实，只要和研究课题有关的资料都能用，报纸、文件当然能作为引证资料，哪怕这个资料源于谁谁某年某月的课堂笔记。唯一的要求只是交代出处，只要能循着你所说的线索查到它，哪怕它没有正式出版，甚至连正式文章都不算。换句话说，只要不是自己编造的东西，只要能够按图索骥查到的东西，都可以包括在引用及注释之列。

一般来说，注释的内容包括作者、文献全称、页码、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年月等。朱清生教授的《十九札》里谈到注释的六种方法，更详细，更专业，可资参考。总之，注释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交代资料的出处，二是做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把握这两点，什么地方该做注释，什么地方不该做注释，就比较清楚了。

下面介绍一些常用的工具书。一是《现代汉语词典》，这应该是一切文字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书，由我国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任主编，他也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这部词典应该是《新华字典》外，发行量最大的字典，非常权威，也非常有用。大家平时遇到不懂的字、不懂的词，都应该多查、多看，不要想当然，这样就慢慢培养了自己的语言素养。

二是《英汉大词典》，这部词典也应该是必备的。这是我国目前最常用的权威英文词典，功能很多，解释准确。大家不要以为字典词典仅仅是解释一个音、一个义什么的，水平高下全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中。比如，《现代汉语词典》与众多其他词典就不可同日而语。《英汉大词典》也是如此，主编陆谷孙先生是复旦大学的知名教授，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专家。不久前，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还请他做了一次演讲，讲汉语危机，这倒很有意思，一个英语专家讲汉语危机。其实像这一辈大学者，文字功底都是很好的，都是学贯中西的。他讲到汉语的特点、汉语的魅力、汉语的危机……其中还提到自己的一位博士生给他写信，信封上写的敬语翻译出来，就是让陆谷孙先生恭恭敬敬地、熏香沐浴地来读他的信。当然，学生本意并非如此，结果用词不当，意思弄反了。

三是《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当今之世最权威、最通行的一部百科全书。中文版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也已形成皇皇巨著。记得1980年代初，由于邓小平过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达成协议，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一共十卷，影响很大。那时自己刚刚工作，工资较低，家里赞助才买了一套。这套书使用多年，挺有帮助，包括备课、写作都经常参考。到21世纪前后，简明版又扩充为全本不列颠百科全书，内容更加全面，也更实用。同样，《中国大百科全书》也形成系统，不过其中的“新闻出版卷”比较陈旧，至少有20年没有修订了。

以上是两部词典，两部百科全书。除此之外，还有一本《新闻学大

辞典》，是目前我国新闻学或新闻传播学最权威的一本工具书。主编甘惜分先生是新闻学泰斗，参与辞典编纂的都是新闻传播学界的名家大家，老一辈有甘惜分、方汉奇、宁树藩等，年青一辈有刘建明、童兵、陈力丹等。内容包罗广泛，涉及业界、学界、现代、历史、中国、外国等，还有一些附录。听说有学生就把这个词典背下来，然后考上了名校研究生的。这部辞典问世有近二十年，一般不容易看到。所以，今年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新闻传播学百科辞典”，主编是甘先生的弟子童兵教授。

下面再谈谈“译名手册”。大家在写论文、参考外文文献的时候，难免会涉及人名、地名、机构名等翻译，这就需要参考统一的、规范的“译名手册”，而不能想当然地自己随便翻译一通。这个事情看似不大，其实也体现着学术基本功。这方面的问题不能全怪学生，现在一些学者，特别是“海归”都不懂得这个规矩，不知如何使用权威的译名手册。有的甚至连一些约定俗成的译名都不清楚，闹出“小儿科”的错误或笑话。

最后简单谈谈答辩的事情。答辩需要注意哪些具体问题呢？首先，陈述应该尽量简练。因为，你的文章答辩老师基本上都看了，这时候只需要强调要点，对有关事项进行补充和说明。某种意义上讲，答辩其实是一个仪式，其中给你一个陈述的机会，但你别拿着棒槌就当针(真)，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其次，陈述要抓住要点和主线，要言不烦，并适当谈谈不足及其原因。回答问题要干脆，至少显得自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多少说多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切莫强不知为已知。

讨论与总结

今天是“研究生学术要素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一方面补充一点相关内容，一方面大家可以就学问话题做一些讨论。

起初对这个系列讲座的设想是：不求该讲的都讲到，只求讲到的都是该讲的。就是说，还有许多内容、许多该讲的还没有讲到，或是因为不知道、不了解，或者觉得关系不大。这里讲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并不包括所有的学问之道。比如，昨天晚上何小菲同学与我聊天，提到“个人学术档案”问题，也是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讲到的。这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而讲座里并没有涉及。传统的学术和老辈的学人都很讲究这个东西，如新闻史泰斗方汉奇先生做了十万多张卡片，分门别类，一盒一盒，一箱一箱，装在那里。这是他一生的财富，这些卡片实际上是他建构的一个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研究宝库，在这个学术宝库中，他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我们说藏书家和学问家不一样，为什么？藏书家的书很多，但只是收藏而已，而学问家可能没什么书，在我印象中，朱光潜、钱锺书等先生就没有几本书，他们的书都在肚子里，或者在自己的学术卡片或学术档案里。

再如，今天早上看《读书》，觉得有两份杂志需要大家关注。不管是学什么的，不管有什么专业背景，这两份杂志都应该经常关注，不说每期必读吧，至少应该经常翻翻。一份是《读书》。这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份学术思想刊物。它的学科覆盖面很广，除了人文社会科学，有时还涉及自然科学，比如黄万里先生是搞水利的，我在《读书》上看到他早期的两篇文章，当时还不知道黄万里是谁，只是觉得这个人讲得很好，关于水利和治水一套一套的，很受启发。这个杂志不一定每期都读，每一期也不一定每篇都读，但要经常翻一翻，总能找到感兴趣的东西，总会给你一些启发，这是其他任何刊物都无法替代的。

另一份是《新华文摘》。它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好文章，包括一些文艺作品、美术、雕刻等集纳起来，半月一期，有些文章同新闻传播直接相关。比如，这期就有一篇《流媒体的传播学解读》。这个杂志里，政治、经济、哲学、法学、新闻、历史、文艺、社会、文化、教育、管理、科学技术等无所不包。半月一期，半月一翻，天下好东西就差不多尽收眼底，从而保证你在一个比较高、比较全的平台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

以上都属于那些该讲的而没讲到的东西。其实还有许多内容，限于时间，也限于自己的能力，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了。这就是所谓不求该讲的都讲到，只求讲到的都是该讲的。

下面，我们就把所谓学术基本要素概括一下。

首先是严谨。这是所有学问都应遵循的，前面几讲从不同方面讲到这个问题，大到治学态度，小到标点符号，都涉及这个问题。最近，媒体在集中宣传一位中科院院士，名字记不得了，是搞石油的，做出很多杰出贡献，九十多岁的老人，眼睛都看不见东西了，还拿着放大镜，对着二百多万字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一字一字地抠。人家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找些助手——他的弟子都是院士，让他们做做就行了。老人家说，挂名的事我不干，既然挂我的名，那我就一定要字斟句酌。老人家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要求人们的报告不能是大概、差不多，而必须精确。自然科学必须这样，不能错一点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其实，人文社会科学同样不能有丝毫马虎，像前面举过的那些例子，如关于马基雅维利的，错一点儿，意思就南辕北辙。

其次是创新。学术一定要创新，没有创新的学术属于述而不作，也就是人云亦云，还有什么意义呢。自然科学也好，人文社会科学也好，费了半天劲儿，花了大笔银子，结果弄一堆老生常谈，就没意思了。这里不妨给大家读一下班卓同学的一封来信，其中也涉及学术及其相关问题：

> 我觉得，用英文思维方式写出来的文章和用中文思维方式写的文章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和文章的好坏基本没有关系。以您提到的“布莱尔领带”新闻为例。从通常的英文写作方式出发，可能一开始就会说到布莱尔将英国申奥时戴的领带赠给了一名年轻的中国记者，这是最主要的新闻事件，然后才会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年是怎样提问的，现在是怎样先错愕后相认的——基本上倾

向于开门见山的文章结构;而典型的英语新闻的句式安排也相应比较“头重脚轻”——文章第一句可能会使用简单句,让布莱尔的名字一开始就出现,而不是在二十多个字之后才出现。与之相比,中文思维方式的写法从文章结构到句式可能都更注重情绪的积累。文章开头以一句打破常规思维的对话为起点,然后是对人物表情的描写,最后才揭示主角身份;文章结构也是先“遥想当年”,然后才慢慢讲到今天的新闻故事。就好像进了一座园子的大门,先看到照壁,转个弯走几步才到大厅。这两种写法虽然有差别,但是应该都能被观众或读者接受,不会因为采用了什么方式,文章就注定和观众读者有隔阂。

不愧是有过新闻经验的同学,不仅讲得头头是道,而且文字也很干净!班卓讲的有关中文和英文差异的观点,同许多学者的见解不谋而合,其中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看似文字与写作问题,实际上还有深层原因,比如民族文化、社会心理、历史传统等。前年社科院一位博士的论文做得很好,她借用符号学理论分析中国的正面报道。现在经常强调以正面报道为主,其实不光是政府倡导的事情,也同深层次的民族心理有关。比如,从大禹治水到现在抗洪抢险,中国社会一直讲究激浊扬清,属于一种所谓善感文化,而西方社会更近于所谓罪感文化。中国人更向往美好的东西,当然并不表示丑恶的东西不存在。中西方的侧重点不大一样而已。这里,又想起今天早晨读的《读书》杂志,里面有一篇吴飞的《理解自杀之三》。文章提到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很高的原因,人们过去想当然地认为是男尊女卑的结果。然而,吴飞通过一系列调查,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正是因为妇女地位提升了,妇女意识觉醒了,所以稍有不如意的事情,就可能走向轻生之路。这就说明有些理论中西是有差异的,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

我们再来看看班卓同学关于语言的想法:

中文的句式和文章结构是很丰富多彩的:“倒装”、“前置”、“后置”的句式在中文里的应用说不定比英文还多(特别在古文当中);而“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也用得很普遍,并不能说用某种顺序和结构的就一定是受了英文的影响。本科学英语时听老师说过,就算语法拼写完全正确,也还有“好英文”和“坏英文”的区别。“好英文”读起来朗朗上口,用词精确,而且句子结构清

晰，不容易出现歧义；而“坏英文”则相反。我想，中文应该也同样有“好中文”与“坏中文”之分。如果一篇文章写出了“坏中文”，那可能是行文节奏韵律出了问题，或是表达不到位，又或者是选择了不适当的文章结构和句式——问题出在错误的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的结构和句式本身不好，更不在于使用的行文方式是不是在英语中很常见。

的确，昨天说得不够周延，提到的那些问题，并不是由英文本身引起的，而应该说是受坏英文的影响。中文也同样有好坏之分，这是需要补充的。这里不妨看看下面这段文字，感受一下好英文的魅力：

Let every nation know, whether it wishes us well or ill, that we shall pay any price, bear any burden, meet any hardship, support any friend, oppose any foe, in order to assure the survival and the success of liberty.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My fellow citizens of the world: ask not what America will do for you, but what together we can do for the freedom of man.

这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就职演说。肯尼迪是哈佛大学高才生，文采风流，就职演说也是自己写的，而不是由人捉刀代笔。演说通篇都是这样的语句，简练、有力，还带着一种庄严的感觉，就像《圣经》似的。这就是班卓说的好英文，用的都是很简单的词语、句式，这种简单又不是一般的简单，而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大家之作，包括诗歌、文学、演说、著作、音乐等都具有这种特点，所谓深入浅出，举重若轻，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著作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下面是一段有名的句子，出自《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是当年回答林彪有关“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一封著名回信：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回到前面的话题，语言是需要下工夫去学的，是不容易学好的。至于学术语言，应该达到这种境界——严谨而不失活泼，准确而不失生动，朴实而不失隽永。大家看，这又是中国的辩证法，相反相成。当然，首先要做到的是前面的要求，即严谨、准确与朴实，在此基础上再达到后面的水平，即活泼、生动与隽永。好多大家之作，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等，语言都很朴实，但又耐人寻味。

课堂问答

问：昨晚我和海燕散步时候在争论一个问题。上学期，听了甘阳的讲座——人文精神与大学之道，他提到大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应该提倡通识教育，进行文史哲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性教育。他举例说，芝加哥大学曾经一度进行教育改革，推行四年本科的通识教育，遭到众多反对。实行几年，后来又改回两年通识教育加两年专业教育的模式。我比较赞同他的说法，我意识到大学四年由于靠自学，文史哲等知识太欠缺，所以赞同他的观点。但是，海燕说，如果大家都钻在学校这样读书，就会增加教育成本，浪费时间，没有效率。甘阳还说到，像法学、商学这些在社会上特别重要的领域不应该设置本科，本科应该进行通识教育，有一定门槛后再进行专业学习。海燕说，这样的话时间太长。

答：你们俩争的也是世界上一直在争的问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思路与取向。当年我第一篇练笔译作正好涉及这个问题。那篇文章开篇就讲到，两个中年妇女回忆各自所受的大学教育。一个说，大学的时候学了很多文史哲、钢琴、音乐、美术，修养很好，可是找不到工作，穷困潦倒。另一个学了一门很实用的商科、会计之类的专业，后来日子过得很滋润，但她说我不懂贝多芬，不懂莎士比亚，生活索然寡味。到底该怎么办？文章开始就用这样一个故事，把两个观点都摆出来。这就是世界大学教育面临的共通问题，我们也是如此。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协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识教育讲的是全面发展和实践能力——包括生活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对矛盾，至少在短期不可能完全消失，只是如何把握尺度。对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科，都有不同的处理。比如，复旦今年的新生不分专业，先受通识教育，北大早些年也听说实行大一、大二不分专业的做法。我们这里从新的教学方案实施后，也是按照这种大方向走，大

一、大二侧重于文史哲、综合性的自然科学，进行广泛的人文素养教育；大三、大四再侧重专业教育。这两者都不可偏废，只顾哪一头，至少目前的现实中都会有问题。这是矛盾，就看怎么协调。

问：没有一个专业会说自己不好。为什么新闻专业的人总是批判自己呢？这会不会引起人格分裂？

答：什么是批判？批判不是“文革”那种颠覆一切、打倒一切的“批判”。“批判”不完全是颠覆的、负面的，而往往是反思的、分析的、理性的。热爱这个专业，同对这个专业的反思并不矛盾。在中外新闻学教育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把新闻和商业放在一起不妥当，会形成人格分裂。美国电影《惊曝内幕》有一句台词：你是新闻人，还是商人。在许多媒体，新闻与经营是严格分开的。

问：第一讲谈到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问题。如果是理论研究，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在本土的创新很容易踩到禁区，受到束缚；移植西方的理论又可能水土不服，因此理论研究出成果较慢。如果是应用研究又担心生命力不强。所以，我对两种研究方向的前途不清楚。

答：这种理解可能有些偏差。什么是学术？经世致用也是学术，生命力强不强，价值大不大，取决于研究的深度，研究的水平，而不取决于研究的类型。应用研究也有很多很好的成果，像陆小华老师做的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别以为对策性研究很容易，有时也许更难。你说的“禁区”也不尽然。我认为，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宽松的时期，而且有大量等待开垦的学术处女地，大量值得探究的问题。不要以为，只有那些“针尖对麦芒”的东西才算有价值的研究。其实许多这种考虑与其说是学术性，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论及所谓敏感话题时说得有道理：

> 这些有政治禁忌的领域或问题，真有很大的学术意义，或普遍性的学术意义？是否在这些问题上突破了禁忌，就能全面并大大提高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准，提升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世界影响力？
>
> （某些政治化研究与政治化学术的）繁荣或关注将大都在意识形态层面，而不是学界一般说来更崇尚的智识层面的贡献，并且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学者也不会去蹚这个浑水的。这种突破尽管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有兼容并包、多样化的意义，但总体看来，

更多是政治观点表达争论，或是情绪性的表达，而不会实实在在地推动人文社科学术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只是加入一种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主导的意识形态合唱，而这其实会是对学术自由的侵蚀。

这就如同我在政治上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承认其意义极为重大，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新的哲学学术成果。

如今有些学者只是用学术自由说事，以此来推卸自己履行学术责任不力，掩饰自己学术能力不足或干脆是自己学术懒惰的一个最便利的借口。

钱钟书《管锥编》的主要部分是在“文革”时期撰写的；而如今有几位学者能静下心来写并最终写出这样的著作？学术需要勇气，但勇气并不等于学术。学术需要环境，但环境也不等于学术本身。（三联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导言）

问：您的学术快乐是什么？

答：治学心境不是快乐与否所能概括的。奥地利作曲家苏贝的《轻骑兵序曲》，是首通俗易懂的世界名曲。全曲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突出轻骑兵奔赴沙场、一往无前的豪迈之情，洋溢着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慷慨之气；第二部分表现大战后战场的悲凉落寞，一片沉寂，情绪转为低落徘徊；第三部分重整旗鼓，再振雄风，向新的目标发起冲锋，军号嘹亮，军旗猎猎，最后在凯旋的高潮声中结束。我觉得，自己的治学体验就像这部三段式乐曲：起初，钻研一个自己喜欢的题目时不免兴高采烈，情绪高昂，好似轻骑兵跃马挺枪，一路拼杀，左冲右突，直捣黄龙；等完成任务、特别是看到成果面世时，反而莫名其妙地陷入颓唐消沉，仿佛所做的一切都那么无谓，连看都懒得看一眼，心情郁郁犹如站在荒凉的古战场凭吊；不久，内在的激情又开始“蠢蠢欲动”，仿佛在召唤和激励自己发起又一轮的攻势。由此说来，治学的快乐与否也是互相交织，此起彼伏。

最后，为了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我们不妨推荐两篇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问题与方法完美统一的上乘之作，均为年轻学人的博士学位论文：一篇是程巍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一篇是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前者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等理论视角与方法，论及西方社会的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同传播研究也有关联，对中国的文化政治包括新闻传播颇有参照意义。这种研究，就属于前面说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作为一项典型的社会学研究，《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研究方法犹有启发。一般觉得，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尊崇科学实证的研究，如以美国为代表的传播学经验学派，为了客观，排斥叙事。而本文却主要以讲故事的笔法完成，不仅生动，而且深刻，既有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学理思考，又像一篇曲折生动、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或深度报道。社会学家、清华教授孙立平教授对《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评价是：

> 这本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对一次极富中国特色的集体行动的独特逻辑，以及其中所蕴涵的复杂的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深入而透彻的分析，更在于作者再现和分析这个“社会事实”的方式。作者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流动着的社会事实”，一种“实践着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正是在这里面，人们发现了那些社会之谜的谜底。

其中，应星特别谈到“我为什么要用故事来讲”的问题。两篇论文均入选学术口碑良好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好了，我们的系列讲座，今天就到此结束了。送给大家八个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谢谢！

屐履清音



湘行杂忆



湖大印象

住在湖南大学的望江楼——带点古风的名字。此处位于岳麓山畔，旁边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顺着蜿蜒的山道往下去，不多远就是“闹腾”的湖大校园了。说是校园，并不准确，因为湖大可以说没有校园，校内的园子与校外的社会几乎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学校就是市井，市井就是学校。常见的围墙在这里是不存在的，甚至连校门都没有（临走才见工人正在“校门”前忙活，捣鼓一个类似清华主校门前那样的低卧石碑，上面刻着毛体“湖南大学”）。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格局，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人大。北大才子李书磊来清华演讲时说道：北大的园子犹如世外桃源，学生云游天外，不食人间烟火；而人大校园同社会接触密切，充满世俗味道（不含贬义），故学生与社会的关联比较紧密、自然，也与实事求是的校风相契合。由此说来，湖大比人大更胜一筹，干脆连围墙和校门都没有，校园就是社会！走在校园，仿佛置身大街上、市井里，一片喧腾、喧闹，甚至喧嚣，颇不习惯。然而，同行的研究生对此却欣然处之，说当年就是因为舍不得这里的一草一木，才又专门考了研究生。不管怎么说，一方水土一方人，一处校园一处生（学生）。

当然，湖大校园很漂亮。树木葱茏，蓬蓬勃勃，真是翠绿欲滴，有种浓得化不开的感觉。千年古刹，黄瓦红墙，隐约点缀其间，自然与人文和谐相融，现代与传统有机汇通，有时不免给人一种“楚辞”般印象——神奇而诡异，深邃而清丽。晚上，漫步校园，灯影憧憧，更觉得恍兮惚兮，如梦如幻。听着轻柔曼妙的“湘音”，尤其是女子说的湖南话，不由联想起“莺歌燕舞”或“鸟语花香”的意境，颇有百听不厌、韵味悠长之概。

一夜雨声，连绵不断。已是凌晨六时，天色依然昏暗，浓云密布，阵

雨淅沥，山岚雾色，朦胧飘忽。一师过来，邀我上山，去赏爱晚亭。雨下得时大时小，但似乎都落不到身上，只闻雨声，不见雨点。一路攀登，但见古树参天，曲径通幽，转眼就到爱晚亭——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亭前一方池塘，曲折逶迤，颇有江南风致。只是亭内有两三大妈晨练，放着录音机，呕哑嘲哳难为听。山道三岔两横，四通八达，道旁时见名人墓庐，如黄兴、蔡锷等，可谓"青山有幸埋忠骨"。半山上有一"古麓山寺"，门楹上写着"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门旁挂着"湖南佛学院"的牌子。

岳麓山的泉水挺有名，路上常有三男两女拎着大小"油"桶，上山去接泉水。拾阶而上，周围茂密的丛林杂草间，总能听到哗哗流淌的山泉。

湖师大感怀

与湖大一墙之隔的湖师大，原是湖大的一部分，1950 年代院系调整时分家。昨天下午，湖师大同仁将我们一干人马邀请过去，参观、汇报、宴请。没想到，这个学院已经颇具规模，仅广播电视实验室就有语音、非线编、拉片、形体等，而且做得有板有眼。这让人既感动，又酸心。岳麓山下，湘江之滨，原有一批埋头苦干、舍身硬干之士，默默的，坚忍的，犹如无往不胜的湘军。特别是看到那些陈旧的课桌、黑板及板书时，感触更是复杂。院长是"77 级"老大哥，送每位代表一本小册子，都是他平时为学生写的小文章。其中有篇送别毕业同学的文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晚上，由方先生的一位湖师大弟子陪同，沿湘江边走了一遭。借着幽幽灯火，眺望橘子洲头，遥想青年毛泽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由感慨湖湘大地孕育了毛泽东，湖湘文化造就了毛泽东。如此江山如此人，这样的人物自然诞生在这样的地方了。

岳麓扫盲

上午，接受湖大学生记者采访，谈到对湖大的印象，说了些人杰地灵的空话。直到下午游历岳麓山、岳麓书院、橘子洲头等，这种印象才

变得具体而鲜明起来。比我低一级的同门学长也姓李，也是一米八的个头，也是来自西域。不过，他是“高人雅士”，不似我一介俗人。过去，在人大读书，常常一起散步。今天下午，又一起活动。我们先从小路攀缘登上岳麓山顶，再沿大路盘桓而下。一路上雨水时断时续，时大时小，树木葱茏而茂密，溪水清冽而流响。到达山顶，放眼四望，烟雨迷蒙，山雾缭绕，随着云雾流动，山峦起伏，时隐时显，仿佛命运似的，既深不可测，又变幻不定。下山途中，又见几处烈士墓。黄兴墓碑上刻着许多名人的挽联，包括孙中山、于右任等。其中，章太炎的最有名，给人印象也最深——“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与岳麓书院比邻而居两日，今天始得入内瞻仰。园内重门深院，名胜众多，池有荷花，路有修竹，曲廊回环，别有洞天……触目所见，皆让我等化外之人感到自己没文化、没品位。为了沾点文化气，故在园内一茶室坐了坐，也附庸风雅地“品茗”（不说喝茶）、“论道”（不说聊天），俨然古之高人在此开坛、讲学、授徒。人大食堂的墙壁上，曾经挂有一幅书法作品，上书“白马西风塞上，杏花烟雨江南”。今日所见所闻，让人不由想起这幅字。中国人的豪情壮志往往挥洒于塞外，所谓“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每每回归于江南，所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此时此刻，才深感湖大的幸运——背依麓山，面接湘水。真是要山有山，要水有水，“仁者乐（读‘要’）山，智者乐水”。

边城·湘行散记·湘西

漫步雨后的凤凰城，不知不觉来到留影《边城》的沱江，那条翠翠曾经嬉戏、守望的江水，还有那座充满诗情画意的虹桥。夜幕中的沱江别有韵味，印象最深的是两岸吊脚楼上一排排、一盏盏红灯笼，静谧中显得红火，倒映水中，明灭闪烁。从桥上沿青石板台阶盘旋下来，就到江边。江岸依然用青石板铺成，齐齐整整，平平展展，水齐着江岸流淌，人沿着江岸前行。走出一段，有竹木搭成的小桥，紧贴着水面，跨过桥去，岸边有一排女子摆摊揽客。细一看，卖的是大大小小的莲花状红色纸船，中间有蜡烛头，点燃后顺水漂流，据说许个心愿，挺灵验的。不管灵不灵吧，反正买了十只，点燃后顺流而下，犹如一列乘风远航的舰队，构成一道夜色里的小小奇观。

两岸民居，风格鲜明，青石板的小巷蜿蜒伸展，湿漉漉，亮闪闪，俨然戴望舒的《雨巷》。迷恋于这些小桥流水的风物，禁不住心生感慨：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这些民居多用作旅游出租的客房，每每名为“某某客栈”，古色古香的，比大酒店、度假村什么的有味道多了。沿街走去，常常见到这些出租房的门厅里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看来“边疆人民”、“少数民族”对主席的感情还是很深，他们似乎固执地厮守着这份情感，就像固守着千百年来祖先留下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在虹桥上见到一家书店，卖的多是沈从文的各种版本著作。挑了一本“漓江版”的《边城·湘行散记·湘西》，小店还备有各种纪念性的印章，挑了一款，上有“中国·凤凰·2005-5-23”字样。

以前的湘西像一首诗、一个梦，美则美矣，迷则迷矣，却好似雾里看花，氤氲一片。若非今日参观了沈从文故居，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就生于斯，长于斯。另外，以前朦朦胧胧觉得他早年当过兵，家境贫寒。今天才知道，原来他祖孙三代都是军人，而且爷爷还是提督——方先生说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在故居又买了他的《中国服饰史》和凌宇的《沈从文传》，上面均有故居纪念章。这部传记 20 年前风靡一时，题为《从边城走向世界》。

乘船漂流沱江，江水深幽清洌，摸一摸，有点凉。想下水畅游，沾点灵山秀水的仙气，可惜没带泳具。沿江漂流，可以尽情欣赏沱江两岸的吊脚楼，只是感觉反不如夜色灯火之美了。船工也是苗族，是早已汉化的“熟苗”。以前，他自己撑船单干，现在归县里的旅游公司，一月有一千的固定收入，家有一妻二女，还有田地，家境小康。他说，虽然现在比单干时银子多了，但花费也比以前高了。问他是否还想要个儿子，他说不要了，养不起。船行途中，见岸边搭有一座木台，上有几位着苗装女子，不停地与来往船只对歌。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打鼓女子，动作曼妙多姿，手臂婀娜翻飞，好似轻盈起舞。

晨曦初露，车过湘潭。外面依然烟雨迷蒙，云雾缭绕，想起贺铸词里的意境：“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此番湘西之行如一次朝圣之旅，寻访圣迹，涤荡心灵。或由边城走向世界，或由边城走向内心。而只有走向内心，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沈从文如此，古今大家莫不如此吧。

2005 年 5 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期间

南疆腹地漫游记

［**题记**］斯文·赫定——“中国西部的最后一位古典探险家，第一位现代探险家”，有部传世之作《亚洲腹地旅行记》。我的这篇闲文，从标题到内容，都受到赫定作品的启发。当然，本篇文字既非科学考察报告，也非正式作品，只是一些旅途信手所记的见闻与杂感。由于边走边记，拉拉杂杂，来不及斟酌，也顾不上打磨，充其量只能算“原生态”印象记而已。

此次南疆之行，历时整十日，长驱一万里，沿塔里木盆地顺时针转一圈儿，即从南疆咽喉的库尔勒到罗布泊，再沿盆地南缘315国道到西陲重镇喀什噶尔——喀什市，然后走盆地北缘314国道返回库尔勒，与民国初年谢彬《新疆游记》所述其南疆之行的路线正好相反。一路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非文字所能尽述，借用诗人郭小川的佳句：“不走南疆，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不到喀什，不知新疆如此源远流长。”



亚心之都

今日，长驱一千余里，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中间还绕道吐鲁番，参观了葡萄沟、坎儿井、交河古城等。

车出乌鲁木齐不久，即到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站——达坂城风力发电站。这里以王洛宾一曲《达坂城的姑娘》扬名天下：“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圆呀西瓜大又甜，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如今，一望无边的戈壁滩上，矗立着一排排巨大风车，犹如始皇帝兵马俑，军容严整，威武雄壮。为便于人们拍照留念，高速公路旁专辟出一弯空地，当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车门忽被一阵强风猛然吹开，这时才意识到外面风力有多么强劲。据说，风力发电站可以满足乌鲁木

齐相当部分的用电量。发电站还在继续扩建，原野上堆放着工程材料，待全部竣工，边城就该彻底告别困扰多年的黑色污染了。说是“边城”，也许不确，因为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就在市郊的永丰乡，简称“亚心”，1992年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地理研究所经过科学测算而确定。在“亚心”之点上，一座伟岸的“亚心”铁塔拔地而起，塔形为英文亚洲的第一个字母“A”。乌鲁木齐由此也称“亚心之都”。

乌鲁木齐乃魂牵梦绕的故土，“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飞机越过城市东面的博格达峰，市区便一览无余，呈现眼前，平平展展，坦坦荡荡。环城皆山也，乌鲁木齐周边群山环绕：西有妖魔山，东有博格达——天山主峰，南有南山，北有红山——乌鲁木齐地标。民国初年，湘人谢彬在《新疆游记》里曾这样记述乌鲁木齐的山：

> 西北四里，有红山嘴（即红山），峭壁悬崖，形如蟾蜍，昂首南面，陡坡直上。西南与福寿山（即妖魔山）仅隔一路。……有浮屠七级（如今尚在），与福寿山所有，如双岑对峙，地形险要，乌城西北一屏障也。东南博克达山（即博格达峰），为天山绝顶，望之如在目前，实距二百余里。其山四周皆有冰雪，盛暑不消，世称雪海。……上有大龙潭（即天池），周数十里，水清而甘，深不可测。

谢彬，湖南衡阳人。1916年，受北洋政府委派，来新疆调查财政，足迹几乎遍及天山南北，沿途以日记形式完成这部《新疆游记》，并陆续刊发于《时事新报》，旋即引起各方关注，被视为一部新疆百科全书。后来，在上海主编《民心周报》、《醒狮周报》，投身五四运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曾任湖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解放前夕病故。

除了磊磊落落的起伏山峰，市区还有一条和平渠，穿城而过，水流湍急，水质清冽，系由历史上屡屡泛滥的乌鲁木齐河改造而成。新疆水系大多来自天山融雪，所以冰凉刺骨。渠水穿流的河滩如今已是绿树葱茏，片片花坛连绵不断。这里原是名副其实的河滩，除一条清渠，其余均为坑坑洼洼、乱石遍地的空旷“河谷”。跨越两岸多为木桥、木栏杆，边城小子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有年发大水，水漫桥面，河谷浊浪滚滚，其情其景，依然历历在目。和平渠曾是孩子们嬉戏的乐园。但由于落差大、水流急，时常有人不慎落水身亡。按说，渠水并不大，也

不深，只是水流湍急，一旦落水，就很难把握，只有随波逐流，直至筋疲力尽。为此，渠道每隔一段，都特意辟出一圈儿缓冲区，这些缓冲区就成为孩子们的游泳池。说起来，至今保留的游泳癖好，最初就是在此养成的。

和平渠旁的人民公园是市民的主要休闲地，位于和平渠西岸，故称西公园。黄昏散步，公园里时见翩翩起舞、自娱自乐的人群，年轻女子一边打着响指，一边跳着民族舞，一副陶然忘我的神态，完全沉浸在音乐和舞蹈之中。西公园北门附近有片水域——鉴湖，可划船，可游泳，周围一排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似与纪晓岚和《阅微草堂笔记》有关。主编《四库全书》的这位清代大学士，曾被“发配”边城三年，留下一卷《乌鲁木齐杂诗》，其中第一首写道：

山围芳草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
行到丛祠歌舞榭，绿氍毹上看棋枰。

看来流放西域、发配迪化（乌鲁木齐）的纪才子，对这里还是颇为留恋的。事实上，“流放”、“发配”等不无地域歧视、文化歧视的味道。按季羡林先生的概括：“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有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四个，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个交汇点，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新疆是一首浪漫主义的历史长歌，在新疆人眼里，谁能“发配”新疆、“流放”西域乃是莫大的福分。这里地大物博，面积相当于十个浙江或三个法国。境内有壮阔雄丽、奇崛优美的自然风光，大漠戈壁、冰峰雪岭、湖泊湍流、草原绿洲，无不如诗如画；还有绚丽多彩、缤纷灿烂的多元文化，融汇东西南北和古今中外的精华；更有一系列五彩斑斓、轰轰烈烈的历史画卷，乌孙、楼兰、丝绸古道、安西都护府、西域三十六国等，说来无不令人心思飞扬；至于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伊犁的苹果库尔勒的梨，更是名扬天下，香飘万里。“发配”、“流放”这等地方，不是福分是什么呢？至少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一生痴迷新疆，留恋西域，甚至为此终生未娶。同样，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对话时，更流露如此愿望：如果容许自由投胎，他最愿意选择的时空是佛教传入新疆的公元七八世纪，也就是李白生活的年代。李白生于西域碎叶城，唐代“安西四镇”的辖区，而唐朝在碎叶的守军曾多达万人，屯田十万余亩。西公园北门新起一座李白雕塑，一身洁白，清清朗朗，既是他清风朗月的人生写照，也是他冰清玉洁的精神象征。雕

塑底座上，镌刻着千古流芳的《关山月》：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火州吐鲁番

算来还是十年前来过吐鲁番。这里是有名的火州，《西游记》的火焰山就在吐鲁番，一片火红的崖壁与天上骄阳相互烘托，更觉火热灼人。而就在火焰山下，一片片绿油油的葡萄架青翠欲滴，构成炎热与清凉的强烈反差。另外，这里也是世界陆地最低点，艾丁湖低于海平面一百多米。在吐鲁番行驶，车上的海拔显示器一直在零度海平面上下浮动。

吐鲁番的坎儿井以及交河、高昌等古城遗址，都是闻名世界的文化遗产。坎儿井号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与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齐名。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在广袤的戈壁滩下面开凿这样一条地下水系或水网，将天山雪水引来灌溉，从构想到施工都可谓巧夺天工。在坎儿井博物馆里遇到一位昌吉师范的大三女生，正利用暑期来此实习，家在青海，毕业后想留在新疆工作，说是喜欢这里。昌吉是乌鲁木齐北面的一个回族自治州，方位相当于北京延庆，听说最近两地已经合为一体。

来到交河古城，自然想起唐代诗人李颀的名句：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交河古城位于两条河谷环绕的一块陡峭山岩上，几十米岩壁构成一道天然屏障，所以古城没有城墙，交河也由此得名——两河相交。当年，唐太宗灭高昌国，在此设安西都护府，统一管理西域军政事务。后来，安西都护府移到南疆，驻节古代龟兹国的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库车，统辖著名的“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和疏勒。站在古城，骋目远望，视野开阔，一览无余。遥想当年，金戈铁马，狼烟动地，如今一片荒芜，无声无息，都化为历史尘烟。古城平台上不时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的小碑石，指示着各种遗址，如官署、寺院等。古城最高处有两位维吾尔族姑娘，一身艳丽的民族服装，裹着头巾，露出线条分明的

面颊，颇有古希腊雕塑的神韵。旁边有块指示牌，说明可以付费合影。那一袭浓郁的民族风情，令人不由动心，拍照时还被摆出一些 pose，她们则罗裙轻扬，姿态优雅。两人汉语说得很好，自称是汉语学校学生，同时手里还拿着“许国璋”英语教材，口语还很标准，“Have a good day”云云。

新疆与北京有两小时的时差。赶到吐鲁番附近的托克逊县已是下午三点多，即北京时间五点多。绕道这里，是为了品尝这里有名的托克逊县拌面，因为此间拌面全疆第一。南疆有不少遐迩闻名的美食，如沙湾的大盘鸡、托克逊的拌面、巴楚的烤肉、洛浦的烤包子、叶城的烤全羊等，有人甚至不远千里，专门托人带回品尝。过去，老国道经过托克逊县，拌面的生意异常兴隆，而现在新国道开通，车辆都绕县而过，生意不免萧条。这种情形在西域历史上每每发生，随着商旅兴衰而兴衰的市镇屡见不鲜。到托克逊县前，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当时，眼看再有几公里就可进城，使辘辘饥肠品尝美食佳肴。谁料路边突然冒出一块牌子，说是前面修路，不得通行。一个穿公路维修制服的人拿着小旗挡在面前，好说歹说，口气似有松动，暗示得留下“买路钱”。给十块不干，给五十还不行，那意思至少一百以上。于是，我们决定还是不给他提供腐败之机，又倒回吐鲁番，多绕几十公里。在新疆，几十公里不算什么距离，这里动辄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令人不解的是，托克逊县有关部门如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应该在前面的路上早早设置指示牌，使车辆提前绕行，不至于跑到城边而不得进，又折回头跑冤枉路。

南疆锁钥库尔勒

出托克逊县不久，开始翻越天山，山那边就是南疆锁钥库尔勒。“天山高，天山险……天山路，弯又弯……”这是一首电影插曲，影片反映的是当年工程兵指战员在这里筑路铺石通天堑的艰苦生活。原来印象里，天山之险峻与行路之艰辛，丝毫不亚于李白笔下的“蜀道难”，“危乎高哉，难于上青天”。十年前去吐鲁番，二十年前去伊犁，最难忘的情景一是颠簸不平的道路，一是经常拥塞的路段。经济社会相对滞后的南疆，感觉更是“行路难”。没想到，如今天堑已变通途，南北疆的高速公路竟是如此通达，畅行无阻，质量、等级、舒适度等都不在美国高速公路之下。所以，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一千里的路程大半天就轻松跑

完。相比之下，不要说一千多年前的法显、玄奘等瞠乎其前，即使民国年间署名“天涯游子”的《新疆漫游记》展现的交通状况也不可同日而语：

> 我们在酒泉时，就听见一班老于行旅的人们说：一到奇台，旅程中最使人厌倦的那段路，就算到了尽头了。其中有个迪化人并且还说：“从奇台到迪化，有一种西北的特别快车可乘，它在一天半内可赶六站路，比任何骡马和马匹要快不少。”但我们自从安西出发，一路上所过的沙漠和险路，非常艰苦难行，使我们对此很觉得怀疑。这样快的车子，在目前尚没有良好公路的状况下，要在西北赶这样快的路，旅客一定要跌得颈折体裂了。
>
> 当我们将出奇台城门时，忽然路上的行人都纷纷避往西边，而且有人在大声地喊着说：“快车过来了！”一阵旋舞的风沙过处，銮铃狂鸣，三匹长腿的骨瘦如柴的马，疯狂地奔驰而过，御者也在用皮鞭疯狂似地驱赶它们，进城门时一冲而过，在大街横冲直撞地过去了。这时我们已经看清所谓“车”者，只是两根大竹竿缚成舆轿那样的东西，坐在里面的两个旅客给颠得前仰后合，恐怕头也已经给颠昏了。

到了库尔勒，才算到了南疆。新疆的自然地理形象地包含在“疆”字里，左边的偏旁意味着弯弓射雕的土地，右边的“畺”字是毛泽东为《新疆日报》题写刊名用的异体字，至今依然沿用。其中的“三横”恰似北边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和南部的昆仑山，三山之间的两个“田”字既代表两大盆地——北疆的准噶尔盆地和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又表示两大盆地里的大油田。另外，翻开地图不难发现新疆被天山拦腰一分为二，北疆以准噶尔盆地为中心，又分为东部的哈密、吐鲁番等和西部的石河子——由解放大军即后来的生产建设兵团建起的一座戈壁新城、克拉玛依——著名的石油城、出产古代史籍所谓“天马”的伊犁等。南疆以塔里木盆地为主体，包括环绕盆地的一串串绿洲与城镇等。如果说盆地中央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那么环绕四周的绿洲就好比它的一条护城河，而库尔勒就相当于这座宫殿的东北要塞，战略位置非常显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地当丝绸之路的北线孔道，库尔勒也是古代西域交通的咽喉。由此北上，可进入北疆，南下经过尉犁可抵达楼兰、罗布泊，翻越楼兰附近的阿尔金山是如今有名的“可可西里”，而由库尔勒一路西行更有一串串诗情画意的历史名

城——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在谢彬眼里，库尔勒“人烟繁密，商贾辐辏，为焉耆之精华，当驿路之孔道”。清末阿古柏祸乱南疆，窃据此处，俨然都城。为此，左宗棠毅然抬棺出征，统帅8万将士挥师西进，后任新疆首任巡抚的刘锦堂将军更一马当先，翻天山，越流沙，涉大漠，追剿敌酋，终使阿古柏仰药自裁。左宗棠率湘军挺进新疆时，一路在秦陇道上植柳，被人称为“左公柳”，时任陕甘总督的湘乡人杨昌濬有七绝一首，既赞誉收复新疆的伟绩，又颂扬植树造林的功德：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库尔勒的香梨一向有名，以细腻脆甜、水分饱满著称。当年主要用于出口，后来据说慑于库尔勒附近的马兰核试验基地，老外自动放弃“特供专利”，于是国人也得以品尝。品尝之后，并没有什么后遗症。如今，内地市面的库尔勒香梨，其实多为阿克苏香梨，两者非常相似，但有一个特征为库尔勒香梨所独有，即梨把色黑。

作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首府，库尔勒还是塔里木油田会战指挥部所在地，城市一座最高建筑物名为“塔指”，城里道路有“塔指东路”、“塔指西路”等。夜晚徜徉库尔勒街头，但觉流光溢彩，一片繁华景象。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城市规划井然有序，绿地、树木、人行道等井井有条，精致考究，每个细节都不含糊，雅洁秀美不让江南名城。据说，这座五十余万人口的城市，还属于全国十大卫生城。在常人印象里，塞外边城多以粗放、粗粝、粗犷见称，像这等考究的城市实属少见。更令人流连忘返的是那条穿城而过的孔雀河，河水丰盈而舒缓，河堤整齐而精致，两岸灯火通明，河水波光明灭。大桥边的广场，人们散步、聊天、嬉戏，水中一只只小舟悠来荡去。河边广告牌上有四句话，颇能体现这里的风光节物：

实力库尔勒 活力库尔勒
魅力库尔勒 和谐库尔勒。



大漠胡杨

现在，从库尔勒出发可走沙漠公路，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趋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市，全程五百多公里，一路坦途。在茫茫沙漠建

这样一条高速公路,也是一桩了不起的人间奇迹。不过,为了感受塔里木的全貌,我们还是舍近求远,绕道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端,顺时针环塔里木盆地一圈儿。这条路的东线途经尉犁、楼兰、罗布泊等处,南线路过若羌、且末、尼雅、和田等地,最后抵达南疆重镇喀什噶尔——喀什市,然后折回来,从北线经过阿克苏返回库尔勒。

今天,我们离开库尔勒。一路上,风景变幻,气象万千。忽而沙丘连绵,忽而活水奔流,忽而有平原绿洲,郁郁葱葱,忽而是千里戈壁,风沙弥漫。路上见到一段“世界最长砖铺路”,还立有一块纪念碑,说是当年红卫兵留下的遗物。路是用一块一块的砖头铺成的,大约可并行两辆车,一眼望去,颇为壮观。在一片光秃秃的沙漠戈壁上,修筑这样的道路不知得用多少砖头,得费多少人力,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若说以前新疆交通是头等问题,那么南疆道路就更是令人头疼。一般人之所以鲜至南疆,特别是塔里木盆地东南缘,主要问题也是交通非常不便。所以,能有这种路也算“高速公路”了。当然,比起现在的高速公路和国道则有天壤之别。在现在的国道旁,还不时见到当年的简陋公路,拐上去跑一段,就可以体会那种摇来晃去、上下颠簸的滋味了。

一路行来,见到一树树、一丛丛的胡杨,连绵不断,中间还夹着一片片红柳,印象深刻,令人难忘。胡杨属耐旱植物,在干旱酷热的环境下生长,具有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故有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美誉。2007 年,在南宁评中国新闻奖,新疆电视台报送的一部电视专题片博得六十多位评委的一致赞赏,并以高票当选 2006 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节目反映的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新疆军人、某野战军团长,事迹感人,制作精良,记得节目的标题就叫“大漠胡杨”。

沿途所见,感触颇深的是水,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生机,哪里就有活力,哪里就有生命。途经塔里木河、罗布泊等地,想起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曾经报道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改造工程,由于引入活水,整个流域又焕发生机。当年,斯文·赫定在新疆腹地旅行记里也曾设想:

> 在原计划中,我就曾向南京政府提过塔里木河下游及孔雀河的利用问题。引水入罗布沙漠,使 2000 年前的古楼兰城附近的村庄复活,把那里的冲积平原变成良田和花园。这情景在 34 年前——1900 年 3 月 28 日我发现楼兰废墟时——就曾梦想过。
>
> 在我给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涉及到的另一个强烈吸引着我的

问题是：让汽车公路经过楼兰，使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复苏，建立起中国内地与喀什噶尔之间的交通运输和联系纽带。

而今天，我们就奔驰在这条赫定当年设想的公路上，经过楼兰，折向西去，沿着315国道，前往南疆之行的目的地——喀什噶尔。按照民国初年林竞考察西北的记述，如果以乌鲁木齐为行程的起点，那么，“西南通喀什噶尔，五十六日可达；南至和阗，四十日可达；东南至婼羌，二十八日可达”(《亲历西北》)。婼羌就在今日的行程之中。

今天长途奔波，行程是昨天的一倍，达到1 200多公里，走了整整12个小时。路上美景恰似杨镰《发现西部》里屡屡描述的，“寂寥、肃穆、自尊又略显孤芳自赏的美感”。长途旅行有时容易困乏、走神，于是路上时见各种交通警示牌，有的标语过目难忘，如：喝得醉醉，摔得碎碎；心存侥幸，必遭不幸；良药苦口利于病，交通法规利于行，等等。

拐上315国道西行的第一站是若羌，东邻楼兰，西通于阗，是丝绸之路的南线要冲，按照谢彬《新疆游记》的概述：

> 婼羌(即若羌)东经敦煌、安西直达关内各省，西道且末、于阗径抵莎车、喀什，西北逾尉犁可至库车、阿克苏，东南越屈莽山可赴西藏、川边、青海、西宁。当孔道之中权，绾四达之枢纽，固商货之天然聚散场，特交通未辟，遂无足观。

今日似乎亦无足观。由于地处塔里木南缘，与且末一样均属最偏僻的地方，驾车兄弟在南疆近十年，几乎跑遍各地，以前也没有到过这里。1916年，谢彬这样描写若羌的社会状况：“民国初，南疆迭见戕官之案，其地僻在一隅，尤匪徒渊薮，于阗鞭长莫及。民国二年(1913)十二月，遂越境戕杀婼羌知事胡奠华。”目前，若羌全县人口约两三万，地广人稀，多为少数民族，与当年情形大同小异——“全县人口，四千二百九十八人……只有汉人二家，且皆改为回教”(谢彬)。

所以，在若羌县城遇到一位新疆大学毕业的学生，不由感到稀奇。像这种出身新疆第一名校的汉族大学生在当地应属凤毛麟角，回乡工作非同寻常。闲聊时听说，其父辈“文革”期间从山东逃难过来，在天高皇帝远的若羌安家落户。他有一个妹妹，西安外语学院毕业，留在那里工作。他是父母唯一的儿子，遵循山东人或中国人的古训，父母在，不远游，回家尽孝，伺候老人。问起个人情况，他说此地男女比例失调，但凡有点想法的女子都想嫁出去，不愿待在这里，他虽届而立，

尚未成婚。

比起富庶发达的北疆，南疆总体上还比较落后，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南缘一带多为国家级贫困县。到若羌正赶上午饭时分，县城大街上却找不到像样的餐馆，好不容易见到路边露天民族小食店，过去一问人家还不开张。大学生说，当地人很少下馆子，而外来人又不多，所以饭店生意清淡。历史上，若羌曾是西域古城，地处丝绸之路的南线，东来西往的行旅客商络绎于途，取经求学的高人雅士你来我往，曾是何等热闹和繁华。它的东边有楼兰古城的遗址和罗布泊，楼兰是西域探险史上最有名的遗址，发现古城的斯文·赫定由此扬名世界，而楼兰、若羌依然如故。好在这里的交通状况已经大为改观。穿过若羌的315国道东往西宁，西抵喀什，一路畅通，平安舒适，而且经行的南疆境内没有一个收费站，可以纵情驰奔。听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还做过一期专辑，集中展现这条自然与人文景观最为丰富的国道。

放开车速，一路飞驰，傍晚落脚民丰，“沙漠公路”南部终点。沙漠公路北起塔里木北端奇台县的314国道，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抵民丰县的315国道。若羌附近有楼兰遗址，民丰附近有尼雅遗址——精绝国都故址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下榻的地方就叫尼雅宾馆。沿途见到一系列取材历史古迹的宾馆，如楼兰宾馆、高昌宾馆、尼雅宾馆等。西域探险史上最重要的成就，就在于发现尼雅和楼兰的佉卢文文献。所谓佉卢文，是一种早已死亡的古印度文字，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我对西域史及探险史所知寥寥，对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宝藏实在也如文盲，只能根据所见所闻记下一些零碎印象。

民丰县的地名，令人想到物阜民丰等意思。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维吾尔族百姓早上也像汉人一样，吃油条，喝稀饭，这在全疆各地恐怕绝无仅有。维族主食是馕，一种烤制面饼，小时候邻家的维族小伙伴早上都是吃馕、喝茶。民丰虽然也属国家贫困县，但县城面貌却看不出多少贫困的景象，街道宽阔，街市热闹。晚上散步，华灯通明，一条主干道两旁一排排现代化的照明装置，连绵不断，一眼望不到头，看上去煞是气派。下榻宾馆旁边新建的县委大楼，虽然说不上豪华，却也显得雅致、精美、现代。诸如此类的“形象工程”在南疆地区并不罕见，应该承认这些工程毕竟改善了“投资环境”，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

万方奏乐有于阗

出民丰县不远的于田县，就是骑着毛驴上北京、一心想见毛主席的库尔班大叔的家乡。今天，于田县城立着一座塑像，即取材于那张毛主席与库尔班握手的有名照片。维吾尔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热爱生活，达观率性，富有幽默感，骑着毛驴、充满智慧、喜欢讲哲理故事的阿凡提就是象征。南疆地区"欠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据说也与这种特性有关——南疆是维吾尔族聚集区。这种特性常被概括为所谓"懒"，即现在说的"少富即安"，没有大的进取之心、发奋之意，随遇而安，悠然自得。我倒觉得，这种性格颇似远古一边耕作、一边咏唱的老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另外，维吾尔人的生活态度，还让人想起那则流传很广的笑话：富翁开导一位跷腿晒太阳的"懒人"，说你应该奋发图强，"懒人"说为什么要奋发图强，富人说只有奋发图强才能赚钱，"懒人"说为什么要赚钱，富人说只有赚钱才能享受生活，"懒人"说我现在不正在享受生活吗。维吾尔民族既懂得享受生活，又充满生活的乐趣和智慧，无穷无尽的、令人捧腹的维吾尔笑话就是其生活情态的体现，如斯文·赫定在喀什听到的一则塔里木笑话：

> 有个要去"走亲戚"的穷人嫌自己的毛驴瘦弱难看，便向"巴依"(地主)邻居借毛驴。邻居推托"我的毛驴不在家"。但话音刚落，毛驴就在后院驴圈震耳欲聋地叫起来。穷人责难道：瞧，毛驴明明在呀！邻居生气地说："你这个人呐！你居然相信毛驴的话，而不相信我！"(《发现西部》)

这些笑话一般难用文字传达，只在鲜活的方言口语里才能充分领略其活生生的意趣。也正是如此率性、达观、开朗、幽默的民族，才会出现库尔班大叔那种憨直而可爱、洒脱而执著的人物形象。今年，中国新闻奖评选，部队报送的一篇新闻稿，是2006年各大媒体都曾报道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人。他从解放军来到村子起开始记日记，记下几十年的变化，包括第一部电话、第一台电视等，也记下解放军帮助老百姓做的诸多好事。从政治上讲，这则新闻固有不言而喻的新闻价值，从学术上看，这些日记又是珍贵的社会史资料。听说，老人的日记已被有关图书馆或博物馆收藏。

说到于田，自然想起毛主席与柳亚子先生解放初的那次有名酬唱：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奏乐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诗里说的于田（于阗），是今天于田县所属的和田市（和阗），即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于阗国。这是个同昆仑美玉相连的地方，于阗意为“产玉石的地方”。清初改于阗为和阗，1959年改和阗为和田。自古以来，于阗、和阗或和田有三宝：丝绸、毛毯和美玉。

前往和田路上，收到学生独伊的短信，她今年研究生毕业，眼下在和田锻炼。听说我们经行此地，便邀请做客，还说“新闻宣传部门有意请你做个讲座”，考虑一下，欣然答应。于是，开始闭目思考报告内容，大致想从边疆“地缘政治”谈起。按国际政治的著名理论，得中亚者得欧亚，得欧亚者得天下。自古以来，西域及中亚都是各大文明交融、碰撞、纷纭激荡的地方，从而谱写世界文明史的无数精彩乐章。直到今日，这里依然是国际政治的核心，东南西北各路人马均在这里纷纷亮相，剑拔弩张，难分难解，远交近攻，斗智斗勇。由此说来，地处中亚的新疆对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战略意义。事实上，新疆不稳则西部动荡，而西部动荡则中原危殆，这是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所以，自来志士高人都懂得新疆乃国之根本。清末，左中堂与李中堂之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涉及这一根本及其所在。巩固这个根本，一靠硬实力，一靠软实力，包括新闻传播。在新疆，硬实力首先自然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一路行来，在每处重要地点都可以看到军旗猎猎的兵营，这是保证边疆稳定的主力军。同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是不可小觑的力量。全疆现有十四个兵团师，每个师有一二十个团场，每个团场相当于内地一个县。这几百个团场散布天山南北，与地方的县、市、州等犬牙交错，融为一体，成为边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星罗棋布、遍及全疆的社会力量，维持新疆的稳定局面将会何等艰巨。由此可见，毛主席、党中央当年下令十万大军脱下军装

屯垦戍边的决策何等高瞻远瞩。据说，当时兵团将士有“三不争”之令，即不与当地百姓争地、争水、争粮，一切全靠白手起家。所以，许多团场的环境非常恶劣，有的甚至几十年住地窝铺(类似窑洞的简陋住所)，没有进过城，更没有去过首府乌鲁木齐，“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新疆作家董立勃的“白豆”系列小说，就集中反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

此外，新疆稳定也离不开软实力，特别是在所谓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日趋复杂，矛盾、冲突、交锋、争夺也日益激烈。一路上，还特别留意新闻传播方面的状况。比如，南疆地区报纸的影响较小，看报的人不多，其中主要原因一是慢，二是丢。宾馆报纸还是几天前的，有个报栏的《人民日报》居然是半个月前的，《新疆日报》也是十天前的。想一想，订份报纸，十天半月才到，还丢三落四，订报还有多大意思呢。与报纸相比，看电视的人显然较多。在托克逊小吃店，就见到巴郎子(小孩)津津有味地收看《西游记》等电视剧。至于一般公职人员，也常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可惜，由于今天是周末，公职人员大都放假，几经协商，最后不得不放弃在和田露脸的机会。

和田市郊有条汹涌充沛的大河，名叫玉龙喀什河，水流浩浩荡荡，沿途农田颇受其惠，谢彬《新疆游记》就记载说，“沿途渠水溢流，稻田弥望，村舍不断，人烟稠密”。关于这条河，听到两个传说，一好一坏。坏的涉及淘玉，所谓乱世黄金盛世玉，由于现在玉石价格腾涨，许多急于发财的人跑到玉龙喀什河的河谷疯狂淘玉，还动用掘土机，将河谷弄得天翻地覆，高峰时节的掘土机数量都超过修建三峡大坝的规模。好的传说是关于一位水利工程师，他勘察、设计、组织建设了玉龙喀什河水利工程，使和田周边几个县的百姓受益，而他自己由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由于没有打听到详细情况，私心希望他是清华水利系的学生，同时再次见证“金杯银杯，不如口碑”的道理。

新疆地区有 47 个民族，是中国民族数目最多的省区。其中，维吾尔族为第一大少数民族，占全疆 1 700 万人口的一半，其余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还有哈萨克——故有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首府伊宁市)、蒙古——故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柯尔克孜——故有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阿图什市)等。南疆是维吾尔族聚集地，沿途见到各色人等多数都是维吾尔族，汉族极少，且大多会说维语，当地称“双舌头”，也算“双语”。过去维吾尔族主要以毛驴子、毛驴车代

步，现在又增加“电驴子”，即摩托车、“电驴车”等。在南疆，摩托车随处可见，维吾尔姑娘也一样骑摩托车，风驰电掣，呼啸而过。一次，还看到国道中间，摩托车与出租车相撞的场面。所谓电驴车的前部也是摩托车，只不过后面牵着一辆平板车，上有凉棚，侧有踏板，两边各坐四人，中间再坐几人，一辆电驴车就可乘十人许。电驴车属当地“面的”，随叫随停，随停随下，反正不论远近，坐一次都是一块钱。在叶城，看到一排电驴车，披红挂彩，列队而行，原来是场婚礼。当电驴车与毛驴车同行，电驴子与毛驴子并存，难免有种现代与传统交错的感觉。如果库尔班大叔今天再上北京，恐怕就骑电驴子了。

和田西边的叶城县与若羌县遥相对应，若羌县在塔里木的东南角，叶城县在西南角。从若羌县沿 315 国道一直东进是青海的西宁，从叶城县下 315 国道向南则进入孔繁森当年工作的西藏阿里。孔繁森最后是在新疆殉职的，这片寥廓疆域成为烈士长眠的地方。叶城县还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外景地，南有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口岸等。

由于叶城为边境重镇，故有重兵驻守。新疆稳定看喀什，喀什稳定看叶城。今年初，新闻中还报道此处破获的一起民族分裂分子策划的恐怖行动，捣毁了他们设在叶城南边雪山上的训练营，除个别人逃脱外，绝大多数都被逮捕法办，严重打击了分裂势力。不过，若想清除分裂主义的社会土壤，还需不断加强交往，包括经济交往、人员交往、信息交往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即新疆人常说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同行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还谈到法国古典派画家大卫的一幅名画《萨宾的妇女》，作品反映的是一段真实故事。一次，罗马人乘机劫夺了萨宾部落的妇女，受辱的萨宾人卧薪尝胆，最后准备反攻，眼看一场血腥厮杀即将发生，原先被抢的萨宾妇女突然一个个抱着孩子，出现在两军对垒的阵前，说这个孩子是你的外甥，那个男人是你姐夫，这时双方将士还怎么下手，从此干戈化为玉帛。

和田一带的县城，只有一个县不在国家贫困县之列，这就是叶城西边的泽普，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附近的油气资源，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为泽普提供约一亿财政收入。泽普县城很漂亮，现代化程度高，文化氛围浓。一进县城，迎面一排法国梧桐遮天蔽日，形成一条绿色通道。晚上散步，在文化体育局的橱窗里，看到一组正在展出的书画作品，有汉语，有维吾尔语，作者都是学校师生，内容多为各族百姓生活情景，其中还

有一幅半人高的总书记标准像。不远处县城广场更是罕见，像这种名副其实的广场在内地不可想象，因为只在新疆才有如此奢侈的地皮。广场约二三百亩，地面基本大理石铺就，平展洁净，中间点缀着一些绿地、花坛、雕塑等，还分布着小桥流水、演出场地等。翌日电影海报上，有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广场中央竖着一杆高高旗柱，飘扬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听说民族分裂分子曾在月黑风高夜，偷偷将一些国旗换成伪旗，这么高的旗杆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这里对教育非常重视。马路边隔离栏杆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宣传画或广告语，一幅写着“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画面竟是清华的标志性建筑，俗称“二校门”的牌坊，不过牌坊上的字不是“清华园”，而是另一历史建筑“清华学堂”，上面顶着一个天安门式的大屋顶。另一幅广告牌上写着：“党以重教为本，政以兴教为先，民以支教为荣。”路边不时有醒目的、巨大的指示牌：“前面有学校，请注意学生安全。”

瀚海绿湖

出泽普县不远，是一条历史上有名的大河——叶尔羌河。孔雀河、玉龙喀什河、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均属于塔里木河水系。由于附近降雨，叶尔羌河汹涌奔腾，浊浪翻滚。路上时见零星雨点打在车窗上。

历史上，新疆或西域一直是各种文明相互冲荡的大熔炉、大摇篮，《史记》、《汉书》等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即为典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不知上演了多少轰轰烈烈的历史剧目。以宗教为例，公元十世纪左右新疆才改宗伊斯兰教，而盛极一时的、曾以鸠摩罗什等高僧为象征的佛教，在一次次腥风血雨的战争中黯然退场。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冷战结束、苏东解体之际，提出一套“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今后世界上的冲突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所谓文明的冲突，具体说来，也就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等文明的冲突。不管这套理论如何遭到各种究诘，新疆分裂势力确实往往以宗教为号召，最近粉碎的“东突”分裂分子就自称“伊斯兰解放党”，叶城、泽普、伽师等县沿途不断见到打击“伊斯兰解放党”的横幅。其实，新疆分裂势力全看美国的眼色，美国想利用其制造麻烦，他们就蹦跶两下，美国想央求中国提供支持，他们又像泄气的皮球。所以，真正的“麻烦制造者”不是一小撮恐怖分子，而是他们的后台老板。有位埃及将军说过一句大实话：有地儿就

有中国人，哪儿乱必有美国鬼。

美国人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哲学形成于美国一点也不奇怪。美国想利用谁，谁就成了“自由战士”，包括当年的塔利班；美国想打击谁，谁就成了“恐怖分子”，比如现在的本·拉登。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道理，随它自由拨弄，全看是否有利于己，朝秦暮楚，翻云覆雨，旷古未有，举世罕匹。话剧《伊索》的智者伊索被主人差去，一会儿让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会儿让买“世界上最坏的东西”，结果伊索买的都是“舌头”。正当主人暴跳如雷时，伊索却从容解释：优美的诗歌、动听的歌曲、恋人的喃喃絮语、父母的殷殷教诲，以及引人入胜的历史传说、启人心智的哲学思想等，无不靠人们的舌头传达，所以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与此同时，无穷无尽的辱骂、中伤、诽谤、流言、拨弄是非、挑起战火、背信弃义，以及邪教的传播、精神的奴役等，又无不依赖一片小小的舌头，所以它又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美国在当今世界的所作所为，为舌头故事提供了生动的现实注脚，也算是一种“双舌头”吧。

泽普与喀什之间有岳普湖县。从地名看，这个地方当年应该是片湖泊水域，而现在却有名无实，不见湖水踪影。听说，有届领导觉得背着这样的地名不免冤枉，干脆动员开挖一个人工湖，而这个人工湖便成为现在喀什附近的一处景观，冠以“沙漠风情游览区”的雅号。来的时候正赶上天阴刮风，尘沙飞扬，四野弥漫。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从一道收费门进来，即见一片开阔的水域，逶迤蜿蜒，碧波涌起。岸边除了码头、游船，还有专供游人乘坐的沙漠观光车，附近卧着一群骆驼，也是供游人享用。湖里有鱼，湖面有水鸟翩飞，对岸是一片绵延起伏的沙丘。驱车前往，顺着上面插的一根根彩旗，深入“沙漠腹地”转悠一圈儿，也算领略了这番“沙漠风情”。

下午三四点钟，在湖畔饭店吃午饭，品尝这里的美食——烤肉、烤鱼等。然后，经过古代的莎车国（莎车县）、伽师国（伽师县），直奔古代的喀什国（喀什市）。

喀什噶尔风情

下午八时许，终于到达南疆之行目的地——喀什市，即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古称疏勒，今称喀什，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唐代设立著名的

“安西四镇”，其中就包括龟兹（库车）、焉耆、于阗和疏勒。如今，这里是南疆的政治文化中心。人说，不到南疆等于没到新疆，而不到喀什等于没到南疆。又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喀什不知新疆之美。

喀什市中心，还保留着一座巨大的毛主席塑像，虽然看上去不比复旦大学门口的那尊大多少，但由于坐落在一个二三十米高的基座上，便显得异常显眼。塑像下有典礼台，前面有广场，广场尽头是排“金水桥”，过了桥是绿色充盈的“人民公园”。广场中央，也竖着一杆高高的国旗，粗略看去似比天安门广场的还高出一截。

喀什的主要景点一是艾提尕尔清真寺，二是香妃墓，三是大巴扎。巴扎者，阿拉伯语“集市”也。许多国内外游客，都爱来此购物，徜徉，观光。大概承袭了阿拉伯商人的传统，维吾尔人一向善于经商，也乐于买卖活动。同这里的商贩讨价还价，也是一桩赏心悦耳的事情，不管是漫天要价，还是就地还钱，彼此嘻嘻哈哈不伤和气。这同内地不大一样，那些地方如果要价一百，你上来就砍到一块，人们往往觉得你是在羞辱他、戏弄他，弄不好还会发生冲突。而在新疆商人看来，不管顾客怎么杀价，货还是我的，钱还是你的，买卖不成仁义在。喀什大巴扎的旁边有条维吾尔族人聚集的老街巷，由于民族风情浓郁，生活气息洋溢，也是游人常常光顾的地方，中央电视台还为此做过一期专题节目。

艾提尕尔清真寺始建于1442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清真寺也是全国最大的伊斯兰教礼拜寺，一次可容纳七千穆斯林祷告。清真寺前也有广场，一下车就听到阿訇悠长绵延的诵经声，在黄昏的习习凉风里悠悠飘荡。寺前广场，游人来往，周围店铺，生意兴旺。至于著名的香妃墓，其实是香妃家族的墓地，由于这位乾隆皇帝的爱妃归葬于此而闻名。

喀什的街道清净、雅洁，虽然比不上“全国十大卫生城”之一的库尔勒市，但市容市貌更富于边疆风情。与南疆现在畅通无阻的公路交通状况一样，一路行来大小城镇之整洁，也是颇为出乎原来的“刻板印象”。喀什与北京有两个半小时的时差，吃完晚饭十点多，天色才逐渐昏暗下来。下榻的“塔西南邦臣酒店”位于市中心，是一家四星级旅馆，距火车站、飞机场有十分钟的路程。凌晨六点（相当于本地四点）醒来，隐隐约约听到远近的鸡鸣声、军号声，别有一番滋味。杨镰在《发现西部》里，专门写到喀什噶尔的声音：

我早就注意到，不知为什么每个到过那里的人，对喀什噶尔的声音都有一种不被时间消淡的印象。

凯瑟琳（英国驻喀什噶尔外交官马嘎特尼夫人）在《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第五章“喀什噶尔回城”中，最具特色、最有感染力的段落，就是对喀什噶尔城市之声的描写。读那细致、凝练的优美文句，仿佛又仰望着喀什噶尔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又徘徊于巴扎迂回的曲巷，又步入香妃陵庄严的拱门，又远足在精耕细作的田野；活色生香的妇女，五光十色的人群，摇曳生姿的青杨，碧玉般流动的溪水……唢呐和手鼓不是凡乐，叫卖和吆喝不是嘈杂，人声鼎沸不让人感到烦躁，毛拉一遍遍地呼唤做礼拜也不仅是单调重复，而喀什噶尔的印象，喀什噶尔的情结，已被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录制成信号永不衰减的信息储存。

如诗如歌帕米尔

上午十一点离开喀什，晚上十一点回到喀什，十二个小时行程，来回八九百公里。今天，一路上到帕米尔高原，最后到达红其拉甫口岸的国门。

听过许多帕米尔的传说，也听过不少帕米尔的音乐，来到帕米尔才切实感到何谓名不虚传。帕米尔古称葱岭，为天山、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三山会合处，也是西域沟通中亚的咽喉。古今不知有多少铁骑冲过这里，也不知有多少商旅经过这里，更不知有多少游人路过这里。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及其足迹永远镌刻在这里。盛唐的边塞诗派，更与西域、南疆、帕米尔等有万千渊源：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百年前，将届而立之年的斯文·赫定就是经由葱岭来到喀什，从而开启西域探险的绚丽生涯。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这里，现在喀什街头随处可见“冰山来客”青稞酒广告。影片的几首插曲脍炙人口，流传不衰，如《歌唱战友》《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只有来到这里，才会真正体味那些深情、高远、气息悠长的咏唱：

翻过千层岭
爬过万道坡

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
野马似的雪水河
冰山埋藏着珍宝
雪水灌溉着田禾
一马平川的戈壁滩
放开喉咙好唱歌

车出喀什，一条平平坦坦的大道一路延展，伸向天际，据说战时可以随意起降飞机。不管是不是吧，南疆的道路确实给人留下良好而意外的印象。曾几何时，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北疆地区，还难免出门难，行路难，而如今南疆也都一路通衢，畅行无阻，四通八达，无远弗届，看来“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初见成效。根据有关资料，过去十五年，我国修建的公路里程达到 80 万公里，几乎可绕地球 20 圈，其中新疆的公路里程已有将近 15 万公里。就连帕米尔高原这等艰难险阻的地方，现在都开通了国道——从乌鲁木齐直抵红其拉甫的 314 国道。从喀什上去，一个来回近千公里的路程一天跑完，在以前真是不可思议。当然，我们的越野车“沙漠王”也功不可没，连边防检查站都觉得意外，上午刚刚过去的车，怎么傍晚就赶回来了，算来平均时速都在百公里以上。有些路段限速 40 公里，飞驰的越野车猛然减速，缓缓行驶，简直就像闲庭踱步、慢慢悠悠的老人。

进山后，国道便一直沿着塔什库尔干河的河谷攀升。塔什库尔干河在喀什汇入塔里木河，源头在帕米尔高原的冰峰之上。其中慕什塔格峰以“冰山之父”闻名，斯文·赫定数次登顶，均告失败，“冰山之父”的雅称即来自斯文·赫定。一路行来，慕什塔格峰的皑皑冰峰不断显现，道路两旁更是风光无限，气象万千。时而，濯濯童山，大开大合，骨骼坚硬，线条分明；时而，高山牧场，水草丰美，毡房片片，牛羊点点。途中有塔什库尔干河形成的高山湖泊——卡拉库里湖，湖水碧绿似梦，湖面平坦如镜，倒映着天光云影和湖光山色。这座秀美的高山湖泊位于慕什塔格峰下，名称来自柯尔克孜语，意为“黑湖”。

帕米尔高原主要是游牧民族塔吉克的聚集区，现有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当地简称“塔县”。县城很小，安逸幽静，处处开着星星点点的各色小花。一进城，就见县城的街心花园立着一尊白色塑像，塑像顶部是只展开双翅的雄鹰。如果说哈萨克族爱马，维吾尔族爱驴，那么

塔吉克族就爱鹰。大概由于这个缘故，作为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鹰的饲养在塔吉克人这里不属违法行为。塔吉克族是中国境内唯一的白色人种，隆准深眸，英俊秀美。怨不得许多艺术家、画家、音乐家、摄影家等，都乐于来此采风，从事创作，留下一系列精美绝伦的作品。

从塔县前行百公里，就是著名的红其拉甫口岸。这里海拔高度五千多米，属中国最高的边境口岸。新疆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接壤最多的省区，有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等。红其拉甫即为中国通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的主要边境口岸，从今年 8 月 1 日起，来此旅游的人都得办边境通行证和旅游证。口岸约有一个班战士驻守，记得“新闻联播”还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再往上走几公里是国门，界碑一边写着“中国”，另一边写着“巴基斯坦”。有位巴基斯坦士兵在界碑处站岗，见到我们，友好地过来合影。山上很冷，飘着雪花和冰霰，还刮着飕飕寒风，虽然加上一件外衣，还是难抵逼人的寒气，所以只能匆匆看看，便赶快躲进车里。由于缺氧，汽车一时还打不着火，下车推推也没有用，最后还是靠车子自己下滑才解决问题。

塔县有座石头城，也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巧取豪夺”大批敦煌文物的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一百年前的 1906 年曾经到过这里，他在哈佛大学所作的西域考古探险报告里说到这座古城：“古城位于大片河谷草甸边的一处台地上，四周城墙用石块砌筑而成。城中央的堡垒建筑已经倒塌废弃，但还有人居住。古城已经变成一个极小的村落。”古城原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蒲犁国王城，清代设蒲犁厅、蒲犁县，民国还在古城驻扎军队，所以听说上面曾发现弹药。现在古城一片荒芜，断垣残壁，只有高高的、残缺的城墙以及箭垛，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的形貌。站在高耸的城墙环视，塔什库尔干河从脚下的河谷从容流过，开阔的河谷长满蓊郁葱茏的水草，洁白的蒙古包散布其间，一片祥和安宁、古朴自然的景象。傍晚时分，一直阴沉的天空开始放晴，太阳从一片片浓云间闪出来，古城、草原、山峦、河谷披上一层灿烂明丽的霞光，真是江山如画，美不胜收。下山途中，在一片同样风光的山谷，看到一条彩虹无遮无拦，跨越两端，恰似一道彩色的拱门，清晰而壮观地耸立其间。

与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相邻，是两个同样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自治地区，一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一是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新疆地形以三条东西向山脉为骨架，即北部的阿勒泰山、中部的天山和南部的昆仑山。沿着三条山脉的边缘，形成三条东西陆路走廊，现在三条国道大致与之平行，即北线312国道——从上海经乌鲁木齐到达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中线314国道——从乌鲁木齐到红其拉甫口岸；南线315国道——从西宁到喀什。三条山脉中间夹着两大盆地，即北疆的准噶尔盆地和南疆的塔里木盆地，两大盆地又各有两大沙漠，即北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沿帕米尔高原北上，就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它们犹如三条山脉西部的闸口，构成拱卫边陲的一道屏障。此外，正如当地人说的，这里的每一个牧民都是一名哨兵，这里的每一座帐篷都是一座哨卡。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自然以柯尔克孜族为主体。柯尔克孜人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人，只是译名不同而已，实际同宗同源，如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同宗同源。据有关专家考证，柯尔克孜人或吉尔吉斯人乃汉代名将李陵的后裔。李陵将军为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嫡孙，曾为汉朝征讨匈奴，屡建奇功。一次，不慎中了埋伏，奋力突围，转斗千里，敌众我寡，弹尽粮绝，最后负伤被俘，本欲诈降，不意被武帝灭门，不得不滞留漠北，从此与家乡和家人天各一方。当时，司马迁由于为他求情，还被汉武帝一怒之下判了宫刑。李陵将军的身世一直是后人咏叹的题材，托名李陵的“古诗十九首”，以一咏三叹的人生感喟和沉郁苍凉的艺术风格而灼人心肠。作为李姓人氏，自对柯尔克孜人或吉尔吉斯人怀着别样的情感，吉尔吉斯作家、苏联作协主席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就是自己钟爱的作品之一。

前些年新闻报道里宣传的吴登云医生，就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所属的乌洽县医院。现在乌洽县是新建的，老乌洽县毁于一场地震。新县城的中心广场，也有一座类似塔县的塑像，一个竖立的热瓦甫或冬不拉一类乐器，两边各有一顶柯尔克孜人的典型白色毡帽，表明柯尔克孜人是个热爱音乐的民族。乌洽县境内有座奇妙的山峰，整整一座山都是贝壳，当然是风化为岩石的贝壳，大大小小嵌在山岩之中，知情者称为“贝壳山”。显然，若干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与海底世界，随着地壳运动而隆起，成为现在的贝壳山。沧海桑田之慨，在此获得真切印证。

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北上，就是“塞外江南”伊犁河谷，河谷

中的伊宁市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如果说喀什市是南疆的灵魂，那么伊宁市就是北疆的明眸，喀什扼南疆孔道，伊宁居北疆要冲。当然，关于伊犁以及北疆的故事，是另一篇纪行的事情了。不过，关于哈萨克人爱马，刚刚听的一则故事不免令人嘘唏，值得略述一二。一次，某单位买下几十匹伊犁马，准备宰杀。伊犁自古出产骏马，汉代史籍所载“天马”、“汗血马”就出自这里。看到单位一下买来这么多马，一哈萨克少年忍不住在马圈转悠观赏，看着看着突然大惊失色地指着一匹小马说道：这匹马太好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马，于是恳求刀下留马。遗憾的是，单位经理执意杀马取肉，为此哈萨克少年三天不说一句话，蔫蔫地蹲在大门口，仿佛被抽走了精气神儿。

天山明珠神木园

喀什到库尔勒的 314 国道，一直沿着天山南麓伸展。路的这边是戛然而止的山脚，齐齐崭崭，离公路不过百米，犹如一部大气磅礴的交响乐轰然收场，没有任何回旋和余响。路的那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平平展展，一直伸向天际，好似一位刚毅沉默的硬汉，多么艰苦都不失自尊，多么久远都保持信念。戈壁滩上一条铁轨与公路平行，时有火车驶过，这就是从乌鲁木齐直达喀什噶尔的南疆铁路。

喀什距阿克苏五百公里，阿克苏距库尔勒又五百公里，故阿克苏处于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半中腰。阿克苏是上海知青聚集的地方，现在属于上海对口支援城市，街头常有冠名“上海”的店铺、酒家、商行等。阿克苏意为维语的“白水”，SU 的读音在维语里就是“水”，阿克苏附近的温宿之 SU 其实也是“水”的意思。温宿县有座“天山神木园”，为南疆一处神奇的自然景观，1999 年开发为旅游区。这颗“沙漠明珠”离阿克苏有一百多公里，来回一趟约两个小时车程。

所谓神木园是座占地六百余亩的天然林地，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在四周光秃秃的山峦间那么超凡脱俗，鹤立鸡群。神木园的形成有赖天山的雪水，融化的雪水经过地下暗河流到这里，在低洼的山谷汇成水源，滋润和养育着这片神奇的园林。走进神木园，扑面一股清凉湿润的气息，与周边干燥炎热的环境判若春夏。神木园入口处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封疆大吏题的“神木园”，字体下面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画家张汀教授 1995 年赞誉神木园的文字。

神木园里有六十多株千年以上的古木，其中不少树龄都在一千五百年左右。仅仅沿着已开发的三分之一部分走一圈儿，大概就需一个小时。在一株巨大苍劲的古树旁边立着一块木牌，上书“黄山归来不看岳，神木园归来不看树”。桂林阳朔县有株千年古树，号称“独木成林”，伸展开来的树冠足有篮球场大。为支撑宽阔粗大的枝干，同时提供足够的养分，古树的一条条树枝便向下又长出一排排枝条，与大地相接，然后又分别长成粗壮的树干，看上去就像一片枝叶交错的树林。神木园有不少类似树木，一株大树往往有若干同根同源的伙伴，形成形态各异、布局不同的“独木成林”景象，并被赋予种种美好意境，如生死相依、合家团圆、民族团结等。

古木苍然，枝干遒劲，还形成生动逼真的形象，如龙头、马面等。一处如大写字母“A”的树干，被阿克苏电视台选作台标，A 是阿克苏的第一个字母。有株白杨高达百米，前些年被一场大风刮断，余枝仍有三十多米。白杨是西北特有树种，身材如模特般挺然秀拔，以适应多风、劲风的环境。茅盾的《白杨礼赞》是现代文学的名篇，曾入选中学课本，说的就是这种高大挺拔的植物。王洛宾的一首歌曲，就取名《高高的白杨》。

神木园有眼汩汩清泉，泉水可直接饮用，清凉甜润，为矿物质丰富的天然矿泉水。园内绿草繁盛，野趣浓郁，阵阵清香，沁人心脾。据说神木园刚刚开放时，走一遭下来，腿脚都能被湿漉漉的林草打湿。

按照历史传说，千年前有位穆斯林将军率领部队与佛教徒的军队决战，结果全军覆没。战后，残余士兵把将军及其阵亡将士埋葬在这里，并一直为他们守墓。现在，神木园的山坡上还有一片墓地，远处山峰依稀可见三个坟头（上去可见七个），据说就是这位将军的陵墓。



访古龟兹

古代龟兹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疆域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城邦之一，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汉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唐代的“安西大都护府”均驻节龟兹。中原的迁客骚人也曾在这里飞扬其思绪，挥洒其笔墨，留下许多美妙动人的诗赋，使后人对五彩缤纷的西域文明生发无尽遐想。盛唐诗人岑参的佳句就是代表：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龟兹国的都城在今天库车县境内，位于阿克苏到库尔勒之间。此间最著名的历史遗迹是柯孜尔千佛洞，与敦煌、云冈、洛阳的佛教遗迹并称中国四大佛教石窟。这里的石窟开凿于3世纪，衰落于9世纪，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石窟。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柯孜尔千佛洞在龟兹国境内，最盛时达到一千多洞窟，一万多僧众。历史上与玄奘齐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就生活在龟兹。他的父亲是印度的王公贵族，母亲是龟兹国国王的妹妹，一位长公主。佛经里最为流传的那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经文，就出自鸠摩罗什的译笔。

新疆诗人刘亮程的长篇小说《凿空》，虚构了一个龟兹县——显然指库车，其中也写到佛窟及其研究所。这部难得一见的佳作，不仅生动、传神地刻画了当今南疆的生活百态，堪当“一部打开新疆真实生活的书”，而且对现代化、现代性进行了富有哲理的反思，读来即妙趣横生，又启迪心扉，令人时时心思凝重。小说里有位临摹龟兹壁画的研究人员王加，后来痴迷于研究坎土曼——新疆的常用农具。他发现，在伊斯兰教兴盛后，佛教壁画依然能够保存下来，就在于人们手中的这种工具：

那些坎土曼挽救了佛窟壁画。为什么？因为人的行为被工具限制，而不是理智。龟兹壁画没有被完全毁坏，是因为那时人们手中的工具是坎土曼。坎土曼尽自己所能挖毁了几乎所有的佛头佛身和佛塔。但面对数以千计的佛窟和里面的壁画，坎土曼停住了。让坎土曼停住的是人的理智吗？不是。在壁画上随处可见的月牙形挖痕，都是坎土曼留下的。多少坎土曼曾经砍向佛窟壁画，那时人的狂热像洪水一样，谁能阻挡？坎土曼。只有坎土曼。人手中的工具让人不能去做一些事情，一些事情由此没有去做。

现在，阿不旦人手里的工具依旧是坎土曼，而另一些人则操纵着能把山铲平的挖掘机推土机，能从地球深处打出石油的钻探机。万能的工具使他们没有不能去做的事情。谁能让他们停住。人的理智吗？不知道。

车出拜城，沿着山路迤逦而行，就到柯孜尔千佛洞。千佛洞位于今天拜城县的柯孜尔乡，北依天山余脉，南枕渭干河清流，迎面一尊鸠摩

罗什雕像。千佛洞属自治区文物局,有研究所及研究人员七十余人,按导游小姐说法,所长是“省级干部”。导游毕业于大学日语专业,来此参观的日本游客较多。1980年代初,一位日本佛教徒看到千佛洞破败情景,回去化缘三百万人民币,全部捐来,用于修缮、保护千佛洞。

由于千佛洞位于丝绸之路,保留较多印度佛教的印记,同时也吸取中原、西域及西方诸多文化元素。比如,弥勒佛并不是内地的大肚子,而是小细腰。再如,飞天形象有男有女,而非敦煌壁画那些一律长衣飘飘、姿态翩翩的天使。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以及一系列惨烈的宗教战争,千佛洞也遭到巨大破坏,在四大佛教遗迹里保存得最差。特别是清末民初,一批批列强的文化强盗络绎不绝地疯狂攫取,这里的文物和壁画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被勒柯克盗往柏林博物馆的柯孜尔壁画,就有百分之四十毁于二战炮火。在一间洞窟里,还可以清晰看到壁画被切割的痕迹。目前已经开放的洞窟里,常见各种洋文的笔迹,有个俄文年代居然是1953年。而现在参观时,游人身上的小包都得存在外面,不能带在身上,以免不小心碰上狭小洞壁的文物。

一间洞窟里摆着一尊自画像,作者是现代东北画家和教授韩乐然,1946年曾经来此考察,搜集资料,临摹壁画。他留学国外时,得知柯孜尔千佛洞,亲临观看,大为惊叹,视为国之瑰宝。于是,先后两次到千佛洞,第二次还带来几位学生。可惜,返程时飞机失事,一应资料全部丧失。

遥想当年,万千僧众讲经说法,无数信徒礼佛拜佛,寺院巍峨,金碧辉煌,壁画栩栩,五彩斑斓,该是何等壮观的景象。而一场场腥风血雨的战乱,将这一切化为废墟。在暴力冲突中,讲究慈悲为怀与逆来顺受的佛教自然不是对手。由此想到现代人尊奉的历史进化论,慨叹文明未必总能战胜野蛮,相反,历史倒是屡屡发生野蛮毁灭文明的悲剧,如游牧民族对中原文化的破坏、欧洲列强对拉丁美洲文明的摧毁等。当然,历史无法假设,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当慨叹佛教文化未能在西域延续之际,又想到正因如此,今天才能欣赏那么优美的歌舞,品尝那么鲜美的烤羊肉、手抓饭。不管怎样,现代人的意识已被历史进化论所浸润,连侃侃而谈“欲望乃一切痛苦之源”等佛教思想的导游,下来之后也在说没有欲望,人类怎么进步云云。

离开柯孜尔千佛洞,直驱库尔勒。途中有段山路崎岖颠簸,为南疆此行最糟糕的路段。在这段路的旁边,正在修建一条从库车翻越天山

直抵北疆独山子的高等级公路——独库公路。随着山道蜿蜒，可以看到施工路段时而有穿行山谷的高桥，时而有打通山梁的隧道。等这条路修通后，去天山深处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天鹅湖就方便多了。而这该是下趟北疆漫游的内容了，届时也许还将顺时针绕行：从天鹅湖到伊犁草原，再北上塔城、阿勒泰及喀纳斯湖，然后下到克拉玛依、石河子……

从博湖到天山

十天前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今天又从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整整十日，行程万里。返程途中，先到塔里木的最大淡水湖泊——博斯腾湖，感受心旷神怡，再登天山之巅，领略惊心动魄，一日之内，乍喜乍惊。

博斯腾湖简称博湖，原属焉耆县一个乡，由于其特殊地位，后被辟为博湖县。博斯腾湖在库尔勒市东北，途中路过铁门关。铁门关为库尔勒市的“一线天”，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史上许多南征北战的铁骑由此而过，如今则是南来北往的通途。

对博斯腾湖神往已久，如果说此次南疆之行犹如一串项链，那么博湖就是耀眼夺目的明珠。早就听说博湖的壮阔与秀美，亲临之后更为其浩渺迷人而惊叹。仅仅从入口到主要景区之一的白鹭洲，就跑出几十公里的车程。一路奔驰，有道令人特别惊奇的景观，一边为一眼望不到湖水的郁郁葱葱的芦苇荡，一边为干涸枯寂的戈壁荒原，生与死、静与动、轻灵与沉重竟如此鲜明地构成对峙。博湖的来水为开都河，也就是《西游记》里沙和尚“兴妖作怪”的地方。开都河流出博斯腾湖就是孔雀河，最后汇入塔里木河。“所以说，孔雀河与开都河本是一条以博斯腾湖为调节器的河流”（杨镰）。

白鹭洲是片戏水游泳的沙滩，沙滩上支着一排排凉廊，游人麇集，熙来攘往。站在这里眺望博湖，烟波缥缈，水域辽阔。岸边细沙绵绵，水清见底，入水一百米左右只到膝部，二百米左右才到腰部，三百米左右也不过到胸部，如想畅游，就不得不前往纵深。一般说来，美好的地名要么是历史上的景象，要么是一种心愿与寄托。没想到白鹭洲现在还有白鹭，在水里，在岸边，看到它们优雅从容的身影，轻盈地、舒缓地飞来飞去。在一处芦苇荡里，不小心惊起一只白鹭，从眼前飞起、滑翔、落在不远处的坡上，好一幅李清照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意境。今日，天气晴朗，长空万里，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

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游泳出来，在沙滩凉棚里品尝哈密瓜、烤馕，怎能不生今夕何夕之慨。

离开博湖，踏上归程，穿越天山，返回乌市（乌鲁木齐）。从南疆到北疆需翻越天山，而路有三条，分为东线、中线与西线。东线是来时走的314国道，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一路坦途。西线是正在建设的独库公路，即从独山子到库车，途中经过巴音布鲁克草原和美丽的天鹅湖。中线是过去南北疆的主要通道，需要翻越海拔四千二百多米的胜利达坂，曲折高峻，奇险无比，加之路况不好，通常不走此线。但为了尽情领略天山的奇崛俊美，回程决定走险路翻越天山。

从和静县进入天山，景色逐渐幽深。和静是清代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东归的主要落脚点。那次东归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也是一曲爱国的感人壮歌。这支远在异乡伏尔加河畔的蒙古部落，不堪忍受沙皇的奴役，不远万里，举族东归，一路历经磨难，辗转拼杀，屡挫屡奋，矢志不移，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回家回家，东归东归。最后，终于回到故国，被乾隆皇帝安置在新疆最大的牧场——天山深处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如今，和静每年还举行“东归节”，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出和静不远，有著名的军台——巴伦台，附近是蒙古人的巴伦台黄庙，沿途还可见旗幡飘动的敖包。

天山深处，风景秀丽，一路绿草如茵，牛羊满坡。公路沿着层层山谷盘旋，南疆铁路忽左忽右一直平行相伴。沿途一条天山雪水清绿透亮，一路飞珠溅玉。有时河谷宽阔，树木葱茏，有时峡谷逼仄，急流冲荡。大家以为这种风光美景会一路相伴，悠然自得，直到乌鲁木齐。谁料，不久就在胜利达坂上，体验一番惊心动魄的路程和提心吊胆的感觉。

胜利达坂是座名副其实的险峰，其惊险随着高度不断增加。当公路围着山腰盘旋而上时，路边的峭壁越来越陡，山势越来越险，天空也越来越阴，一路喧闹的车厢也不由屏息宁静。道路狭窄，一米开外就是深渊，路面尽是碎石，坑坑洼洼，车行上面，左摇右摆，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一次，为与迎面开来的大车错车，还不得不倒行一段，以使两车能在一处稍微宽余的地方勉强交错。爬到山顶，有处人工开凿的豁口，人称“老虎口”。老虎口上竖着一块牌子，上书“胜利达坂”，海拔四千多少多少米。下车留影，寒气凛冽，天空飘着零星雪霰。下山时，大家都尽量不看身边的陡峭悬崖，紧张得连空气都仿佛凝固。已经行车几十万里、一向艺高胆大的兄弟，事后想起也觉后怕。后来，翻阅谢彬

的《新疆游记》，发现其中一段描写天山险途，不禁深有同感：

> 一百七十五里，皆在山峡中行，为汉车师通焉耆唯一孔道，今犹绾击天山南北咽喉。盘旋曲折，险邃莫名。峭壁悬崖，迤逦夹峙，亭午子夜，方见日月。……更石壁陡峭，高插云霄；中通一线，仅容双轨。石径荦确，车如簸箕……旅行经此，视为畏途。

从胜利达坂下来，可以看见群山上袒露的一号冰川，白雪皑皑，晶莹剔透。再往下走，就进入天山北麓的后峡，沿途依然时见峡谷高耸，峭壁陡立，不过有胜利达坂的险峻在前，后峡的恐怖情形就不觉得惊悚了。而就在这奇峰峭岭之上，天山的美丽才尽情绽放。层层山峦千姿百态，秀拔挺立，山坡绿草茸茸，青松苍苍，牛羊点点。路上遇到一群群牛羊，见到车辆，互相簇拥，半天让不出路来。

遗憾的是，后峡有座水泥厂，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车过厂区，尘沙弥漫，浓烟翻滚，峡谷的清流也成为奔腾的浊流，顺势而下，而下面不远就是乌鲁木齐的著名风景区——白杨沟。过去每到夏季，人们都来白杨沟避暑消夏。这里有青松翠柏，有绿草野花，有山鹰翱翔，有清流飞溅，可以野炊，可以游玩。而如今一条清流成为浊流，意趣当不如前。

白杨沟外又是另一番田园风光，沃野百里，一望无际，成熟的小麦一片金黄，其他作物青绿茂盛，生意盎然，如果不是远方挺立的雪山，恍惚置身中原。此时，夕阳西下，晚霞映天，乌鲁木齐已经遥遥在望。

故乡水，日夜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行随身带着两部书——旧中国谢彬的《新疆游记》和新中国杨镰的《发现西部》，边行边读，且读且行，两相映照，相得益彰。一方面实境丰富着文字，另一方面文字也充实着实境。此刻再听那首名曲《新疆好》，心境自然又不一样，感触显然愈加丰满：

我们新疆好地方
天山南北好牧场
戈壁沙滩变良田
积雪融化灌农庄

麦穗金黄稻花香



风吹草低见牛羊
葡萄瓜果甜又甜
煤铁金银遍地藏

弹起你的冬不拉
跳起舞来唱起歌
各族人民大团结
歌颂领袖毛泽东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路行来，无限风光，瑰丽文化，惹人心醉，每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感喟。除此之外，思虑最多的还是水。水是生命之源，水是文明之本。只要有水，再荒凉的地方也有蓊蓊郁郁的绿洲，再枯寂的地方也显蓬蓬勃勃的活力，和田一则古老谚语说：“有水有树，就有人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水资源问题日益严重。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先生说，本世纪中期，亚洲将有十亿人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库尔勒西郊立有一块巨型标语牌，上面写着八个触目惊心的字：“渴望绿洲，远离沙漠。”这些美好愿望都离不开水，而为塔里木盆地提供生命活水的主要源泉是塔里木河。所以，塔里木河是南疆的生命和灵魂，西域史地专家杨镰说：“塔里木的环境问题，关键就是塔里木河的问题。”

如何治理塔里木河的问题，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塔里木河的水资源问题，看来是西部大开发的一篇大文章。事实上，有关方面已经并正在做这篇文章，前述塔里木河流域治理工程就是一段鲜活而实在的文字。相信这篇文章还将继续做下去，凭借各方有识之士的热情推动和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早晚会做完做好。因为，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所言：

> 塔里木河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找到了这把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便打开了。

2007 年 8 月初稿于南疆
2010 年 8 月修改于清华

伊犁信步

乌孙公主《悲愁歌》

新疆古称西域，伊犁又在新疆西域，也位于新疆西北部。新疆有四百多条河流，大多源于高山融雪，故有两个特点：一是湍急，二是清冽。这些内流河中，有条发自天山，西向注入巴尔喀什湖的大河——伊犁河，而河谷一带统属伊犁地区。

河谷形如 V 字，开口朝向苏联，如今的哈萨克斯坦，V 的两道为天山山脉，伊犁河即来源于 V 字顶点，在两列山脉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奔向当年李白降生的地方。作为天山化育的一方沃土，伊犁河谷气候湿润，水草丰美，既是富饶的粮仓，又是有名的牧场。新疆素有“歌舞之乡”、“瓜果之乡”等美名，而瓜果中除了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伊犁的苹果库尔勒的梨同样香飘万里。新疆最大的少数民族属维吾尔族，其次便是哈萨克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定为副省级行政单位。维吾尔人以农耕为业，哈萨克人以游牧为生。如同所有游牧民族，马与歌也是哈萨克人的标志，他们唱道：当你降生时，歌声为你打开世界的门户；当你死亡时，歌声伴你进入坟墓。哈萨克人纵马飞奔以享受生命的自由，引吭高歌以领略精神的酣畅。西域自古出名马，伊犁更是天马的故乡，汉代即以汗血马著称。

汉代凿空西域，伊犁一带居住着乌孙部落。乌孙与匈奴宿有仇怨，武帝为对付匈奴，采纳张骞建议，以和亲政策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为此，武帝两次将宗室公主嫁与乌孙王，第一位称“乌孙公主”，第二位称“解忧公主”。乌孙公主是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有《悲愁歌》一诗传世。当时，乌孙尚处于原始部落阶段，乌孙王又老迈昏花，公主嫁去的心情可想而知。后来乌孙王又让孙子娶公主

为妻，这种祖孙共妻习俗，是早期群婚现象的遗留，来自中原的刘细君苦不堪言。《悲愁歌》正是她思乡恋土、悲苦无告心情的绝望写照：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美人泪，英雄泪

从乌鲁木齐到伊犁有一千多公里，过去坐车至少得两三天，而如今一天即可到达。一路上，除去城镇和绿洲，尽是一马平川的戈壁滩，荒凉愁闷，昏昏欲睡，仿佛大自然为了让你更强烈感受伊犁河谷的美姿丽容，故意加大对比反差似的。第一天、第二天不免犯困，第三天翻越屏蔽河谷的山脉时，景致一点点鲜亮起来，绿色越来越浓，空气越来越爽。不知什么时候，峰回路转，眼前跳出一片翩若惊鸿的湖泊，卧在峰峦起伏的天山深处，湖水澄碧，雪岭倒映，云雾变幻，乍阴乍晴——这就是有名的赛里木湖了。曾被王震收留的艾青有诗赞曰："你宝石兰的湖水/一见便教人心神荡……"。新疆诗人周涛在散文《伊犁秋天的札记》里，对她的诗意吟咏更是过目难忘，尤其移步换形、层层推进、似乎漫不经心、最后陡然引出赛里木湖的笔法，简直妙不可言，就像赛里木湖闯入眼帘的感受：

应该让思想的水散漫成湖，特别是当你处在人生的秋天。

让溪流聚集起来、让河水交汇起来，让雨水或雪水贮蓄起来，根据地形自然的状态，造成一个非人工的海子。那就是湖。

湖不是海——它没有那么伟大；

湖也不是水库——它要柔和自然得多；

一般说来，它躺在那儿，有一种女性的味道。这除了因为它美，还因为它使周围变得潮湿了一些，滋润了一些；更因为它使天空也变了，变得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蓝；使近处的山呈黛色，阴坡的

松树幽静，使远处的山白发肃然，如老翁之守处女洗浴。

一般来说，它躺在那儿。

它不像山那样远远地跑过来迎接你，而是躺在那儿，等着你突然发现它。它喜欢静静地微笑着看你吃惊。

一般来说，这就是赛里木湖。

赛里木湖——多美的名字！

你是伟大的海洋在撤离时留给伊犁河谷的一滴巨大的泪珠。汪汪的，闪闪的，既像美人腮边泪又像英雄颊上泪，妩媚而又刚健……

这段文字不仅展现了赛里木湖的妩媚柔情，深山老林突遇佳人的惊羡心绪，而且炉火纯青，如入化境。一开始，似乎只是随着作者散步式的思绪轻飏荡漾，目接心迎，悠来荡去，直到赛里木湖一下子出现在眼前，才豁然大悟，原来前面都只在渲染，铺垫，都只是为了美丽的赛里木湖跃然而出。那种如诗如画的意境——不管是自然的意境，还是文字的意境，大概只有贺敬之《桂林山水歌》可以媲美：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赛里木湖是中国最大的高山冷水湖，名列国家级风景名胜，素有瀚海明珠之美誉。当地人称三台海子，因为位于三台这个地方，而海子是湖泊的意思。前往伊犁的这条路，自古属于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成吉思汗大军飞奔而去的风尘依然历历在目。一路行来，有一台、二台、三台、四台等地名，台就是当年的驿站、兵站。

进入伊犁前，需要翻越一条地势险要的峡谷——果子沟。峡谷险峰高耸，怪石林立，道路蜿蜒曲折，车行其间，不免心惊肉跳。好在沟内景致宜人，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淙淙清泉，一路流响，当年流放伊犁的林则徐，曾引他人的话说“如入万花谷中”。

锡伯族传奇

连日折腾，终于来到伊犁河谷，心境恰似《桃花源记》描写的豁然开朗，仿佛进入世外桃源一般。眼前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

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同样是在《伊犁秋天的札记》里,周涛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伊犁的秋景,一派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的缤纷绚烂:

> 秋天的一切表情中,精髓便是:凝神。
>
> 这时的每一棵树,都是一棵站在秋光里的黄金树,在如仪的告别式上端庄肃立。它们与落日和谐,与朝日也和谐;它们站立的姿势高雅优美,你若细细端详,便可发现那是一种人类无法模仿的高贵姿态,令人惊羡。它们此时正丰富灿烂得恰到好处,浑身披满了待落的美羽,就像一群缤纷的伞兵准备跳伞,商量、耳语,很快就将行动……

王蒙当年流落新疆,多数时光都在伊犁度过,他对此地风土人情的留恋,都凝聚在他的伊犁系列小说中了。伊犁首府伊宁市,带有鲜明的俄罗斯文化色彩,少数民族姑娘衣着艳丽,美若云霞。距伊宁市不远,有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老家在东北,清代属满洲八旗,后来被派往伊犁戍边屯田,西迁之日便成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锡伯人长得与蒙古人相似,以农为主,也善骑射,农闲时喜欢打猎捕鱼,我们去的一户锡伯人家,就用现打的鱼招待客人。

锡伯族曾是英雄的马背民族,热爱生活,热爱边疆,热爱歌唱。据锡伯族民歌改编的《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是一首情真意切、旋律优美的佳作,欢歌起舞的旋律就像奔流而下的伊犁河水,又似草原上万马奔腾的情景。锡伯族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第一次去察布查尔县认祖归宗,唱起这首歌来,曾让多少锡伯族老人涕泗交流。锡伯族也有一句广为流传富含哲理的民谚:没有劳动的生活,是盗窃的生活;没有歌声的生活,是野蛮的生活。

这里最让人感念不已的,还是这样一个故事或传说:当年,锡伯族奉旨西迁,路上遭遇流行病,丁壮死伤甚夥,到达目的地时,伊犁将军按花名册清点将士,发现应声回答的竟然多是女人。原来,他们的男人都已死在远戍边关的路途中,她们是抱着怀里的孩子代为答到的。此情此景,怎不让人感慨,让人感动。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惠远城，将军府

伊犁最有名的地方，当属霍城县的惠远城。此城为清代伊犁将军府驻地，曾为新疆军政中心。新疆于1884年正式建省，首府在迪化，即今天的乌鲁木齐。此前，天上南北统归伊犁将军管辖，当年林则徐由于禁烟而流放新疆，目的地即在惠远城。记得有首诗里写道：

惠远城
将军府
一片平芜
可记得
这里曾流放过
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
把守虎门的一头猛虎
……

今天的霍城县城里，还保留着惠远城的一座城楼，巍然如仪，肃穆庄严，一棵枝干遒劲、相貌苍然的古树矗立其旁，好似忠勇的卫士，默默地守护着主人，看护着家园。不远处，伊犁河谷遥遥在望，满山遍野，绿色欲滴，冰清玉洁的天山蜿蜒伸展，丽日蓝天下的河谷令人陶醉。草深齐腰的高山牧场，风过处，如大海波涛，层层叠叠，涌向天际，马“游”草中，恰似一叶扁舟。

当今“美文”貌似像“美女”一般泛滥，而在我看来，当得起美文而无愧作者寥寥可数，如张承志、周涛、韩少功。他们有清词，有丽句，有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浩荡诗情，有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幽远意境。站在伊犁河边，眺望皑皑白雪映衬的草原牧场，不由想起周涛散文《过河》，写的是一匹顽劣的马和一位哈萨克老妇人的故事。他的散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是否包括这一篇不清楚，在电视台文艺节目里，倒是不时看到配乐兼配画面的《过河》朗诵。

一次，周涛骑马出行，傍晚时分，来到伊犁河谷的一条小河边。没想到，这匹赳赳孔武的坐骑，死活也不敢过河，无论使用什么招数，软硬兼施，黔驴技穷，依然畏水如虎，“仿佛面前横陈的不是一条可爱的小河，而是一道死亡的界限和无底的深渊”。

无奈之下，他只好走进附近一座哈萨克毡房，求人帮忙。不料，毡房里只有一位老太太，卧在床上，似有重病，抬起眼皮，目光像风沙天的昏黄落日，没有神采，身躯枯瘦衰老，连自己站起来都很困难似的，垂暮之年，枯坐僵卧，谁知哪一刻便灵魂离开躯壳。他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说明或示意来意，谁知老太太居然让他扶起自己，要去驯服患有恐水症的顽劣坐骑。起初，他怎么也不相信，而等他把老太太扶上马背，就全信了：

那瘦小的身躯刚刚落鞍，那马的脊背竟猛然往下一沉，仿佛骑上来一个百十公斤重的壮汉，原来的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顽劣劲儿全不见了，它立得威武挺直，目光集中，它完全懂得骑在背上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如士兵遇上强有力的统帅那样（这马不愚蠢，倒是灵性大得过分了）。它当然还是不想过河，使劲想扭回头，可是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控住了它，它欲转不能，它四蹄朝后挪蹭的劲儿突然被火烧似地转化为前进的力，踏踏地跃进河中，水花劈开，在它胸前分别朝两边溅射，铁蹄踏过河底的卵石发出沉重有力的声响，它勇猛地一用力，最后一步竟跃上河岸，湿漉漉地站定。

我把老太太扶下马，又把她从独木桥上扶回对岸。然后在她的视线里牵马挥手告别（我不敢当她的面上马）。她很弱，在河对岸吃力地站着，久久目送我。

此事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冬天的巩乃斯草原，而天山，正在老人的身后矗立，闪闪发着光。

学院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篆字，上书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平生最喜欢的一首诗。这位“七绝圣手”的其他诗作，也时时吟诵，尤其《从军行》（七首）：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

只有置身西域广袤的天地，放眼天辽地阔的图景，才能感悟如此雄奇意境，寥廓气象，才能理解张承志、周涛诗文里的大诗大美，慷慨悲凉。

待凭口舌巩河山

伊犁在近代以《伊犁条约》著称。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众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伊犁条约》便是其中之一。不过，这个条约有所不同，甚至可谓风雨飘摇的清廷取得的一次外交胜利。当时，沙皇俄国乘新疆战乱，出兵侵踞伊犁。面对危机四伏的局势，朝廷内部展开激烈争论。全力经营北洋海军的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移“塞防”之饷以助“海防”。在他看来，“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与李鸿章针锋相对的左宗棠力主进兵新疆，收复失地，密奏力陈利害：“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况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不可不预为绸缪者此也。”左宗棠与李鸿章的这一争论，便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塞防”“海防”之争。最后朝廷采纳左宗棠的主张，命他率军出关，平定天山南北。左大人壮怀激烈，出征前专门打制了一口棺材，一路抬着随行，以示视死如归，不破楼兰终不还。清兵进疆后，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叛军土崩瓦解，敌酋服毒自杀。前后不过一年，真是用兵如神，痛快淋漓！

局势既定，俄人自当撤兵了。可叹弱国无外交，可恨强权即真理。起初，他们扬言是替中国“代为收复”伊犁，权且“派兵驻守”，现在又以“先议通商”为由赖着不走。为此，清廷不得不派崇厚前往俄国谈判。崇厚是个软弱无能的家伙，被人连欺带吓，竟签下一个不亚于《巴黎和约》的东西。消息传回，舆论哗然，一致要求改约。朝廷迫于压力，也拒绝批准条约，将崇厚革职拿问，定为斩监候。接着，又派一人重开谈判，

此人凭借非凡的外交才干，硬是从如狼似虎的列强手中争回已经丧失的主权，取得清季外交的一次绝无仅有的胜利。此人，就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

曾纪泽时任英法大臣，即驻英法两国大使，上任时二十一岁。崇厚一事发生后，朝廷派他兼充出使俄国大臣，“将崇厚所定约章再行商议”。鉴于中国一再遭受列强侵凌而无能为力的现实，曾纪泽的使命可谓难于上青天，用他受命后在一封公函中的话说，“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总理衙门也深知此事不易，在给他的密电中交代：如果对方不还伊犁，“大可允缓”，只要能办到把崇厚所订之约“两作罢论”，即中俄双方对这个条约都不予承认，就算成功。曾纪泽却希望力保国土完整，向朝廷直陈己见：“宜办到通商稍予推广，伊犁全境归还，乃可真为了结。”而若办到这一步，艰难困苦丝毫不亚于左宗棠收复新疆。他在送别同僚归国的诗中，豪迈坦言“待凭口舌巩河山”！

谈判中，曾纪泽面对强蛮霸道的对手，酌情据理，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表现出折冲尊俎的外交才干。当俄国要求偿付兵费，像无赖似的威胁说：如果中国认为双方并未交火，故无索费之理，则俄国“正欲一战，以补糜费”。曾纪泽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答道：开战则“胜负难分，中国获胜，则俄亦需偿我兵费”。这么说也是有实力作后盾，他曾分析：“西陲一带，左相手握重兵，取伊犁或犹可期得手。”最后签订的条约，便是《伊犁条约》。虽然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从当时情况看已算了不起的胜利。沙皇俄国从东北和西北一共侵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约占现有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中《伊犁条约》以及随后的几个附加议定书，共割占7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四个北京市。

曾纪泽的言行举止深受曾国藩影响。曾国藩对子女教育极其严格，绝不允许他们染上公子哥习气。他在给儿子的信中一再谆谆告诫：“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银钱田产，最易长娇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后来的毛泽东、蒋介石等均受这位曾文正公的影响，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据说就源于曾国藩的湘军。

本节文字，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出版，钱锺书作序，书名的英译用杨宪益代拟的“From East to West”，可谓言简意赅。

西域丛书

拜西部大开发之赐，1999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推出一套大型系列丛书——《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由北京大学考古系系主任宿白教授担任总主编。丛书包括三大部分：外国探险考察者的著述、中国历代关于西域的著述和中国当代考察者的著述。时隔十年，新中国六十年之际，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第二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在第一版基础上新增 20 余种，计划达到 30 种。这套丛书装订精美，先声夺人，价格也不菲。丛书主编杨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域问题专家，1968 年以北京知青身份，来到新疆伊吾军马场，从此与西部结下不解之缘，数十年孜孜矻矻，专注于西域史地研究。2007 年笔者漫游南疆时，随身带着两本书，一是民国闻人谢彬的《新疆游记》，一是杨镰的《发现西部》。杨镰父亲杨晦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一级教授，五四时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毛泽东、罗章龙等同学，共同受业于新闻巨子邵飘萍，也算新闻界前辈。

杨镰主编的这套西域丛书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英国中亚考古学家斯坦因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都是著称于世的名作。新出的几种里，我对几位中国人的著述尤感兴趣，谢彬的《发现西部》已经拜读，无愧新疆百科全书之誉，与此类似的林竞及其《亲历西北》也是皇皇之作。林竞与谢彬同在日本留学，谢彬受民国政府委派考察新疆时，他曾作为助手随行，后来也受命考察西部，历时八个月，行程十万里，故友人赞曰“足下万里路，胸中八月潮”。其间，逐日记述所见所闻所感，即日记体的《亲历西北》。从下面列举的若干日记题目，也可大概了解林竞的行程与见闻：

巨匪卢占魁之残暴
凄惨可怖之鼠疫与在劫难逃之思想
人民畏兵如虎
基督教堂兼大地主



不可忽视之基督势力(握有教育权、经济权、司法权)
未终餐而饭菜已冻冰
捐税如毛之甘肃境内
大风彻夜 被面竟积沙土马粪寸许
兰州本地人无洗浴习惯
新闻成为历史
土民过奴隶生活 土司制度应裁撤 土司强弱大相悬殊
十余岁男女因穷裸露其体
嘉峪关以西米饭不售
边患愈西而愈烈
北京到迪化(即乌鲁木齐)共行七千八百四十二里

诸如此类的考察活动及记述表明,民国初年已将“开发西北”作为国家战略,那一代人的眼光与作为同样令人钦佩。林竟就曾看到西北乃“国之安危所系”,开发西部“具有牵动世界之意义”,故“相率投荒,共作千秋万世之业”。当年的西部还很落后,除了兵荒马乱,兵匪横行,瘟疫、饥荒、灾害、恶劣气候、破败的交通等更是随时相伴,“在逐日记载中,我们见识了鼠疫、地震、风灾、雹灾,连牛虻、草鳖也感同深受”(杨镰)。其情其景,让人不由想到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及其名作《中国的西北角》,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

面临列强环伺的危局,当年不少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西部,林竟与谢彬就是先驱。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言行,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重视西部陆疆的战略地位。而他们的许多真切、细致的文字,对国人认识西部、了解西部、关注西部,均利在当下,功在千秋。借用杨镰在本书代序《智者西行》的概括,“林竟《亲历西北》有全景观照,有丰富细节,全部出于实地探索者之手”,如:

雹灾之可畏

西北大陆,气候最忽易剧变。夏秋之际,往往天际清明,忽焉阴云四起,现紫黄色,雷声殷殷,冰雹随降,大者如拳如卵,小则如豆如杏,蔽空而来,恍若天崩,顷刻之间,厚可数尺,少亦数寸,生物当者,献能存活,鸟兽奔避不及,死亡盈野。

至于其中对宗教问题、民族关系等大关节的观察与思考,不仅细致入微,令人叹服,而且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值得三思:“伟哉我国,真

如海洋之量，无所不包也。”通过这些文字，可以进一步体会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近代一百多年的西部方略、新中国的边疆战略等一以贯之的历史逻辑。



国之根本

中国是大陆国家，西部为国之根本。汉唐以来一直将经略西域列入国家战略，康乾时代更奠定了今天新疆的格局。近代李鸿章与左宗棠曾有“海防”与“塞防”之争，风雨飘摇的大清国还是毅然决然支持塞防，出兵新疆，平定叛乱，一举挫败英俄等列强妄想霸占、肢解新疆的图谋，从而为一百多年来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提供了首屈一指的保障。因为，失去新疆则西部板荡，而西部板荡则中原危殆，李鸿章等洋务派委实短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更以一代伟人的雄才大略和人民领袖的博大胸襟，为新疆以及各民族地区的和平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包括设立生产建设兵团、推动支边青年运动、大规模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等，特别是消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废除愚昧野蛮的宗教制度、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依靠人民等，无不使新疆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进入近代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民族团结，社会安宁，“我们新疆好地方”、“翻身农奴把歌唱”、“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等，均为生动写照。当时，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以西部为重，如“大三线”建设。

总之，西部陆疆事关重大，事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和长治久安，同时也是中国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基石。具体说来，西部的意义在于：第一，地域辽阔，战略地位异常突出；第二，资源丰富，特别是水资源、油气资源、矿产资源等，更是未来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命脉所系；第三，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各种矛盾冲突在美国纵容的三股势力下，势必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峻。对此，一切有识之士不能不高度重视，不能不深长思之。



走马河西

车出兰州，进入河西。

河西走廊自古为东西交通孔道，东去是咸阳、西安等八百里秦川，越过潼关便可逐鹿中原，定鼎天下；一路西行则进入南北丝路环绕的美丽新疆，然后经过中亚抵达欧洲。如果说中原是汉家王朝争雄称霸的禁脔，那么西域则是东西南北各路文明交汇的熔炉。按照地缘政治理论，据中亚者遏欧亚，遏欧亚者控天下。

河西走廊曾是返乡途中来来往往的必经通道，古有丝绸之路，今有陇海铁路，沿途风光节物早印在心扉，融入骨髓。可惜已有许久没有乘车“走西口”了，今年暑假本打算坐车重走陇海线，赶上旅游旺季，居然没有买上车票，不得不无奈地飞回北京。此次在兰州开会，有机会再走河西、重温历史、饱览河山，心情自然欣喜。

一路行来，沿途尽是文化悠久、历史绚烂的地名——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关、敦煌、阳关……或金戈铁马，或诗情画意，无不源远流长，意境幽远。看着地名，心里禁不住会蹦出一串串诗句：“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匈奴歌谣）；“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王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武威）。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

凌晨六点，车到酒泉。天色还一片漆黑，头顶星河灿烂，周边寒气逼人。先去酒泉宾馆稍事休息，然后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作为河西屈指可数的五星级酒店，酒泉宾馆的早餐给人留下难忘印象。尤其令人心旷神怡的是，餐厅一直在轻轻播放古曲《阳关三叠》，一咏三叹，沁人心脾：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宾馆庭院杨柳依依，池水悠悠，一尊青铜雕塑——古代酒器“爵”伫立其间，基座刻着李白的“饮酒歌”：“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酒泉是汉武帝设立的河西四郡之一，与同样有名的两关即玉门关和阳关一起，用以镇守西域，抵御匈奴——“列四郡，据两关”。酒泉得名，还流传着一个动人传说。当年，少年将军霍去病大败匈奴，武帝特赐御酒犒赏。霍去病不忍独享，下令将酒全部倒入清泉，让全军将士一起痛饮，从此有了酒泉这个飘逸醇香的地名。不管事实如何，霍去病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却是永载史册。最可敬佩的是汉武帝赐他一座豪宅时，他直言谢绝，留下一句千古绝对：“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细细想来，这岂止是一句豪言壮语，实际上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而这才是它魅力永存的根源。少年霍去病就用这么一句言简意赅、痛快淋漓的军人话语，表达了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苦苦追问的人生意义，用短暂的二十三岁年华演绎了一曲轰轰烈烈、气吞山河的“英雄交响曲”。如今，大大小小的白领小资觉得人生在世了无意趣，对比霍去病便知所谓东西之辩、古今之别是何等无谓与无聊了。

前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途中，见到一片胡杨林，色彩饱满，满目灿然，雄赳赳，气昂昂，排列成阵，犹如军姿严整的远古铁骑。胡杨是西域特有树种，素有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美誉。中国人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广袤沉毅的西域，就该有霍去病那样英风飒飒的尕娃子、小伙子——这里永远没有小白脸、小男生，就该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万古豪情。民国年间这里又出了一位少年将军马仲英，纵横西域，叱咤一时，民间至今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当代西部作家红柯，还以他为原型创作了荡气回肠的获奖作品《西去的骑手》。其实，类似这样的英雄好汉何尝不是西域的民风世俗和历史文化所熏染造就的呢？

酒泉一带，天空晴朗，万里无云，仿佛不染一丝一毫尘埃。选择这里作为中国最早的航空航天基地，想来也有“能见度”的原因。基地距酒泉近三百公里，原为内蒙古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所以虽然偏处戈壁深处，环境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贫瘠荒凉，许多地方颇有水草丰美之

概。基地中心所在的东风场区，更是林木茂盛，街市俨然。城外一条“黑河”，浩浩汤汤，气势不凡。河水来自祁连山的融化雪水，下游注入历史上有名的居延海。西郊还有一片官兵开凿的湖水，水面宽阔，一眼望不到边，在耀眼的阳光下波光点点，为干燥的戈壁涂抹了一缕温润。

基地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训练实验基地，属于高度戒备和保密部门。若非特殊安排，也不可能成行。即使如此，沿途还是不断接受各种检查，门禁森严。有次查验身份证，厦大黄星民教授随手拿出护照，结果差点儿没有放行。因为根据这里的规定，凡持有护照、记者证者一律禁止入内。后来，他拿出身份证依然无效，如果不是基地同行出面，看来就只能留在检查站“翘首以待”了。

基地建于1958年，明年将迎来五十周年大庆。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凯旋回国，兵团机关随即受命开赴酒泉，组建国防科工委的酒泉基地，这就是今天依然称为第二十基地的原因。二十兵团原属华北野战军序列，即聂荣臻元帅部属，而酒泉基地以及新中国一系列国防工程都是聂帅一手挂帅。所以，在这里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迎面就是聂帅的纪念碑，下面埋葬着他的一半骨灰，另一半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组建第二十基地的兵团司令员孙继先将军，属于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为1950年代共和国第一批授衔的中将，他的墓碑在聂帅的右侧。

陪同参观的基地广播电视局局长，是1979年老兵，现为团职军官。据说，为了保密，当地不通网络，日常信息主要靠广播或电视，他们的电视台每天都有自办新闻节目，另外还有一份内部报刊。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参观了基地博物馆、航天员训练中心——问天阁、卫星发射塔等。基地博物馆的许多图片、实物等展示着我国高科技国防工程的艰辛历程，从最初在一无所有的戈壁滩上搭建简易的设施，到今天“神六”的呼啸冲天，几代邓稼先似的科研人员、几代“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官兵，将泪水、汗水、血水抛洒在这片洋溢着英武和忠勇之气的土地。而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的那句“我愿以身许国”，更成为霍去病名言的当代回响。

问天阁是一排弯曲延展的两层小楼，专供航天员休整、训练、生活之用，包括各种不同功能的房间，门口都挂着牌子，如健身室、桑拿室、心理训练室等。一楼有间大房子是航天员出发前中央首长送行、记者报道的地方。二楼有间航天员宿舍，内分三间单独的小屋，分别由三位航天员使用，现在房屋锁闭，不对外人开放。三间小屋的外面是公用客

厅,摆着沙发、电视、电话等,客厅门上有航天员出发前留下的签名笔迹及日期,这个传统还是来自苏联。

卫星发射基地的核心自然是发射塔,距东风场区有一二十公里,矗立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远远就能清晰望见。发射塔有两座,一座大,一座小,小的发射卫星和导弹,大的发射载人飞船,杨利伟即由此升空。大的发射塔有近百米之高,巍峨挺拔,好似神话传说中的巨人,而游人则如巨人脚下的小矮人。这里的发射成功率达到百分之百,附近标语牌上有“一丝不苟”、“分秒不差”等醒目字样,可谓霍去病骑兵军“箭无虚发”、“百发百中”的现代版吧。

傍晚返程,又领略了一番戈壁落日的壮观图景。先是一轮金灿灿的夕阳贴在无遮无拦的地平线,将西天映得壮丽辉煌,一派“长河落日圆”的雄浑气象。然而“好景不长”,不过几分钟光景,夕阳就迅速沉入地下。随后不久,便见满天星斗,闪闪烁烁,同样浩瀚壮观。凝神仰望长空,想起清华学子邓稼先以及几代默默无闻的基地官兵,舒婷那首《献给我的同代人》不由涌上心头:

他们在天上
愿为一颗星
他们在地上
愿为一盏灯
不怕显得多么渺小
只要尽其可能
唯因不被承认
才格外勇敢真诚
即使像眼泪一样跌碎
敏感的大地处处
仍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
走入禁区,也许——
就在那里牺牲
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

2007 年 10 月于兰州



放歌陕北　寄情延安

除了“我爱北京天安门”，陕北与延安应算中国最有名望、最受瞩目的地方了。正如一位常住中国的老外所言，中国有两个地方非去不可：一是北京，因为她是中国的心脏；一是延安，因为她是民族精神的根底。

陕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号称“天下第一陵”的黄帝陵就坐落于延安市的黄陵县桥山，被海外侨胞誉为“东方麦加”。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一说，就是因为轩辕黄帝生于农历二月二。自唐代建庙祀典后，这里一直是历朝历代举行国家大祭之处。事实上，祭祀黄陵不仅是旧中国的盛事(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就是借祭拜之机脱离陕北和中共)，而且也是新中国一年一度的大典。而古城延安则自来雄镇边塞，龙盘虎踞，宋代名相范仲淹的一曲《渔家傲》使这一古代“延州”名扬千秋：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1935 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48 年毛主席、党中央东渡黄河，前往河北省西柏坡，其间十三年又使延安成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革命圣地，人民共和国的朝阳就从这片黄土高原冉冉升起，恰似那幅象征性的画面：1942 年某日，陕北农民李有源眺望着万山丛中一轮磅礴涌出的红日，禁不住纵情高歌“东方红，太阳升”。

同“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一样，我对陕北、对延安的感情

同样丝丝不断、缕缕不绝，怀有故土家园一般的依恋。且不说风云历史和英雄传说，单是马克思所谓“音乐的耳朵”，从小到大就在陕北民歌的熏陶下一点点形成。2008 年春，随高校研修班终于来到延安，驻足宝塔山，徘徊延河畔，其情其景仿佛三十多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

红日、
白雪、
蓝天……
乘东风
飞来报春的群雁。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
启程，
飞翔到
宝塔山头，
落脚在
延河两岸。

这首激励了一代“中国青年”的配乐诗朗诵，当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出时，用的配乐就是那首诗情画意满乾坤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时，自己也是知青，每当聆听这些作品及音乐，都不由得对遥远的陕北和延安浮想联翩，悠然神往。特别是陕西省歌唱家贠恩凤演唱的《延安儿女想念毛主席》——“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土窑洞的灯火映红了天”，更是令人不胜感念，怀想不已，至今仍觉心潮激荡。后来，成为一介学生娃子，每次暑期探家往返陕西，更有去国还乡之情，为了八百里秀美秦川和五千年历史风烟，也为了动人的英雄传奇和美丽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从北京到延安有列车直达，中间经停西安，全程约需 16 小时。这条铁路动工于 1974 年(《理想之歌》同年问世)，竣工于 1991 年，将陕北与外界彻底打通，也为陕北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大动脉。一般印象里，陕北似乎总与欠发达等形象连在一起。其实，由于油气资源的开发，这里已成为西安之外的陕西首富之区。按照延安政协副主席郭先生的说法，西安的房价还是被延安人抬起来的。不管是不是，中国大陆第一口油井确实出自延安，时间为 1905 年。这座油井至今矗立

于延长县的石油希望小学，前有一块卧碑，上书“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为大庆石油会战的总指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清华校友康世恩的手笔。另外，汉语的“石油”一词，最早也同延安有关。宋人沈括曾来此考察，并在《梦溪笔谈》里写下“延境内有石油”，第一次为“石油”命名。

我们晚上乘车，翌日中午到达延安。也许心里惦记着，凌晨四时就醒了。从卧铺上爬起来，坐到窗边，凝望着黑黢黢的原野，想象着陕北的蜿蜒山川。见对面坐着睡眼蒙眬的列车员，便轻声问道：“到哪儿了？”摇头不语，睡态欲堕。随着天色一点点发亮，沟沟壑壑的秦川一层层闪现。已是早春二月，山坡上、田野间，不时见一株株、一片片梨花绽放，灿灿如雪，皎皎似月。默然望着、想着，一缕信天游歌声不禁又从心底飘然而起。

对圣地陕北和延安，人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和感悟。在我心目中，这里最鲜明的印象总与音乐和歌声牵牵相连，招之即来，挥之不去。“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二月里来》、《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等自然是脍炙人口，融入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长卷。“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凯丰填词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也以恢弘激扬之势令人荡气回肠——“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朝鲜国际主义战士郑律成谱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奏响时代强音，而且成为人民军队的永恒心声：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
听！我们的歌声多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着最后的胜利
向着全国的解放

说起来，这首铁流滚滚、一往无前的军歌，还是自己的启蒙音乐，小时候父亲一高兴就喜欢哼唱。作为在陕北参军的“一野”老兵和在“革命队伍”扫盲的战士，虽然父亲未必懂得音乐及其美感，但人民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已将每一跳荡的音符汇进他的血液，融入他的生命。而且，通过血亲关系，那种精神感召及英雄主义气质又传至后代，构成一

脉人民、祖国、毛泽东、共产党的精神丝线与生命主题。此次延安之行，又何尝不是寻访老人家的足迹。想当年，毛主席曾以诗一般的语言动情地说过，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事业，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这些缅怀的话里自然包括长眠于此的父亲战友。

傍晚，落下一阵淅淅沥沥的春雨，漫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雅洁的庭园，呼吸西北高原健爽的空气，倍觉亲切，心旷神怡。路边草坪上每隔十余米，都埋有低矮的音响，隐隐约约传出幽幽乐声，美妙轻飏，似有若无，细细辨认多为经典作品，如歌剧《刘胡兰》。想起 1975 年，“文革”后期恢复演出《黄河大合唱》，第一次听到这部音乐经典，那种震撼之感恰似黄河之水天上来，咆哮万里走东海。《黄河大合唱》词曲作者光未然和冼星海的创作灵感，就来自陕北的黄河壶口瀑布——“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为了这次“解冻”演出，冼星海夫人钱韵，还写下一段动情的“回延安”：

> 延安！多么庄严美丽的古城，我们朝盼夜想的革命的母亲啊！毛主席在这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这里的天是碧蓝蓝的，地是金灿灿的，红光满面的青年，吃着香喷喷的小米，伴着清粼粼的延河，学习革命的真理，研讨解放的道路。到处是歌声，到处是笑声，自己动手，开荒种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忆星海》)

其实，陕北与音乐的关联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说不定，远古周原上的《诗经》就铸就了这种文化基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听起来无不一咏三叹，韵味悠长，宛若当年青春男女心思绵延，一往情深。

陕北有句家喻户晓的老话，“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意思是，陕北米脂的女人是天下最出色的美人，陕北绥德的男人是天下最英俊的后生。也有说英雄吕布出自绥德，而美女貂蝉来自米脂。不管怎样，米脂女子与绥德小伙或者说整个陕北人，确实以相貌超群、品质出色而闻名，而且颇有异域风情。之所以如此的一个原因，在于陕北与关中都是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内地汉人交汇融合的“熔炉”，“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李白)，人种“融合”优势不言而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毗邻的枣园，相当于延安时期的“中南海”。在枣园参观时遇到一位讲解员，虽是地道的本地人，但眼珠子却跟“洋人”一模一样，瓦蓝瓦蓝的，而且眼

睫毛很长，就像时尚女子的假睫毛。好奇之下，还忍不住问了句："睫毛是真的吗？"回答是的。

游牧民族，能歌善舞。古代的那些口头吟唱虽然早已消散于历史的虚空，但从一些断章残篇中，不难依稀感受那些或仰天长啸或痛彻心扉的生命悸动。如匈奴民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再如，北朝时期敕勒族的《敕勒川》：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经过"融合"的人种出类拔萃，经过"融合"的文化元气淋漓。以音乐为例，陕北民歌（亦称延安民歌）与西北民歌、西南民歌一同构成中国最有艺术魅力的三大区域，中国最美的音乐多半出自这里。据统计，仅流传的陕北民歌就不下五千首。此外，陕北的安塞腰鼓，素称铿锵豪迈、气势磅礴、惊天动地、摄人魂魄，颇似游牧民族挥刀跃马，万骑奔腾。"新边塞诗派"的代表、新疆诗人周涛，曾传神地书写了这种壮观场景：

饮马长江从来是一句诱人的口号
游牧者的劳动是战争，追逐水草是天性
奴役人如同役使畜牲
发起一次战争像围猎一支兽群
但是南方却用一个宫女就解了围
用一曲幽怨的琵琶引去遍野铁骑

根据延安大学专治陕北民歌的学者考证，所谓陕北民歌居然多为江南小调。看来幽怨的琵琶不仅引去遍野铁骑，而且引来文化的"融合"品种。

以高亢嘹亮为特征的陕北民歌，既带有游牧民族气息悠长、放歌大漠的豪迈与激越，又融入华夏文明长歌当哭、含蓄深沉的悠远与蕴藉，

《三十里铺》、《兰花花》、《赶牲灵》、《走西口》等均为典范。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即走西口、闯关东和下南洋。无论哪种迁徙，都饱含血泪、辛酸和绵绵牵挂。特别是《走西口》等陕北民歌，更是抒发了酸心酸鼻的满怀悲楚和一腔思恋：

送哥送到大路口
妹妹不丢你的手
临别最后一句话
妹妹等你到白头

记得周涛在一篇散文里写到一位陕北的民间歌手，能够一气唱出许多这类“酸曲”。酸曲者，酸心之曲也。陕北民歌之翘楚的《三十里铺》更是凄美忧伤，痛断心肠，蕴涵着海枯石烂的无限深情和生死寄托：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子爱上一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随着谢子长、刘志丹在陕北创建红色根据地，特别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主席、党中央进驻延安，陕北民歌也开始飞出一串串红色音符，在抒写个人心曲之际又多了黄钟大吕的时代心声，在如泣如诉之外又开出明朗健爽的艺术新风。《翻身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高楼万丈平地起》、《东方红》等，无不一扫往日的忧伤与凄凉，流露了受苦人翻身解放的喜悦与欢畅。同时，在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引领下，音乐家、艺术家也大量借鉴陕北民歌精华，谱写了一系列优美动听的作品，《南泥湾》、《白毛女》等都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名作。

革命时期，陕北的扭秧歌逐渐形成一大风气。在陕北，秧歌原有悠久历史，源于鬼神祭祀的原始歌舞，本名“阳歌”，是“阳间”人世唱给“阴间”鬼神的。“陕北秧歌自古以来就是一项祀神的民俗活动，传统秧歌队多属神会组织……过去每年闹秧歌前，先要在神会会长（主持或会首）率领下进行‘谒庙’，祈求神灵保佑，消灾免难，岁岁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

经过革命风云的洗礼，传统秧歌也开始具有明快、清朗的内容。抗战期间，“鲁艺”秧歌队特别活跃，他们改编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

识字》、《拥军花鼓》等都是新秧歌的代表作。像《拥军花鼓》里广为流传的唱段：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上猪羊出（哇）了门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
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

鲁艺秧歌队的“伞头”——类似乐团指挥，是后来著名的作曲家刘炽——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以及《新疆好》等名曲的作者。据他回忆，《拥军花鼓》的副歌本来是“海来梅翠花，黑不溜溜花/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当初秧歌队一唱到这里，群众便前仰后合，乐不可支。起初，大家还以为是表演精彩，才引起笑声与骚动。后来发现不太对头，人们笑得有些诡异。他们问为什么，群众又笑而不答。最后，秧歌队找到一位民间的秧歌老把势，才知道原来“黑不溜溜花”是句粗话，指“男女下身部分”。从此，这句副歌才改为“海来梅翠花，海哩海棠花”。其实，诸如此类的荤段子也正显露着陕北民歌的原始野性，即西北人所谓“骚情”。甚至古代民歌里，都时时流露着这种本乎天然、发乎至性的骚情，如北朝民歌《地驱乐歌》里的“胸上雪，任君咬”以及：

侧侧力力，念君无极。
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摩将郎须，看郎颜色。
郎不念女。不可与力。

2007年，有部颇受关注的著述《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展现了延安时代的社会全景与历史风貌，其中一节专谈秧歌，作者朱鸿召博士开宗明义就写道：

> 秧歌，是20世纪中叶中国革命红色文化、行为艺术的时尚标志。
>
> 扭秧歌，是永远令人神往的。跻身革命群众的歌舞乱阵，和着震天动地的锣鼓节拍，不断有节奏地扭动着个体身躯，气喘咻咻，浑身发热，彼此召唤，相互感染，一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亢奋的革命集体情绪就在队伍里被迅速激发起来，热血沸腾，宠辱皆忘，如

痴如醉，如癫如狂。这是延安后期中国革命的歌舞，是以延安“鲁艺”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意识形态，对民间传统秧歌舞的现代化开采开发，而创造出的中国现代革命红色文化。

这种红色文化，包括陕北民歌的传统建国后进一步发扬光大，高亢嘹亮与欢愉明朗的风格日趋鲜明，以至各类作品都不同程度感染此风，如吕其明的管弦乐名作《红旗颂》、被“四人帮”责难的电影《创业》插曲《青天一顶星星亮》等。至于一系列原属陕北民歌的新作更如万里放歌，扶摇直上，包括《延安儿女想念毛主席》。这些作品渐渐抽空世俗欲望和人间烟火，留下一片精神世界的雨后晴空，清新纯净，阳光灿烂，与已经远逝的精神岁月丝丝相扣而与日益逼近的物欲时代格格不入。

随着改革开放与时代变迁，陕北民歌从宏大的社会层面回落个体的生活世界。1985 年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人生》，有一首美不胜收的插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歌曲不仅成为《兰花花》、《走西口》等现代回响，由陕西省歌唱家冯健雪演唱后一时风靡，而且还与同时期的《长江之歌》等一起进入经典序列：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
煮了钱钱下了米
大路上搂柴瞭一瞭你

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子照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扇的门单扇扇开
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为了此次延安之行，将延安大学校友、英年早逝的人民文学家路遥的茅盾文学奖作品、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重读一遍。当读到最后一页时，夜已深，人已静，而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无限思绪仿佛化作陕北高原悠悠飘荡的信天游……

2008 年春于延安

滇 桂 行



龟兔赛跑

又到桂林，评全国人大新闻奖。评委会有两位主任，一位是原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早餐同桌，叙起校友系友之谊，还获赠一本《与年轻记者谈成才》。书是他为新华社记者写的文章、做的报告，翻阅几篇，颇有启发，就像《敬宜笔记》，浓缩着其新闻人生的精华，如：

> 我以为年轻记者要想尽快成才，除了打好理论功底、提高业务素养、转变采访作风之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分心”。
>
> 同样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同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到新闻单位以后，最初三年的业务水平也不相上下；三五年之后，差异开始显现出来；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究其原因，有一点非常明显：进步较慢的记者常常“分心”；进步较快的记者则很少“分心”。在新闻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到“不分心”或“少分心”的人，成才的几率就会高一些；对待工作三心二意，经常“分心”的人，即使“聪明绝顶”，也难成正果。

这个道理恰似“龟兔赛跑”，兔子太聪明，最后反而落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乌龟不分心，一步一个脚印，结果笨足先登。荀子说得好：“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久闻南总作风严谨，乃至大会小会从不信口开河，而是一一写出文稿，“照本宣科”，这次大会的总结发言，也是如此。当然，讲的话确有内容有水平有高度，像范总一样。讲话围绕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全部内涵。比

较而言，党的领导不可动摇，依法治国毋庸置疑，唯独人民当家作主还需用心落实。南总讲话，就是围绕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展开的。

还见到同为评委的傅旭同志，现为《人民日报》澳门记者站站长。晚上秉烛夜读，她打来电话，希望过来一叙。后来道歉，本来应该自己主动，反倒让人家找上门，实在有失礼数。不过，当时正被一本好书吸引，浑然忘我，未及它顾。书是何海明的《部长与国家》，一部鲁迅文学奖作品，书写大庆精神大庆人，包括指挥大庆会战的石油部长、独臂将军余秋里及其后任、清华校友康世恩，两人都曾做到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后因“渤二”事件受到处分。现在看来，这个处分有失公允，因为所谓官僚主义的“渤二”事件，后来证实纯属一起无法抗拒的自然灾难。

雅庄宾馆

坐在红河学院的“雅庄宾馆”，准备下午的学术报告。红河学院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唯一的高等学校，2003 年升为本科，计划再升大学，英文校名已用 University，有学生万余，全国招生。学院一位老师正在清华做访问学者，听说来桂林评奖，故邀“讲学”，还抱歉说学院底子不厚，虽将报告列入最高规格的“红河论坛”，但只能略致薄酬。当时回道，能为西部略尽绵薄，乃是自己的荣幸，也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从昆明到红河，走高速公路四个小时。目前只通汽车，火车正修，机场还在规划，过去没有高速公路，去昆明需要两天。红河学院地处州府所在地蒙自的郊区，一派田园风光，四野静谧，空气清新，还时时闻到一缕淡淡的炊烟，让人想到陶渊明“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真是名副其实的“雅庄”。蒙自有座正修建的“歌剧院”，现代而典雅，颇有意大利歌剧院的气势。红河学院的“音乐楼”同样现代而典雅，为音乐专业师生教学、训练和演出的场所，其中包括音乐厅。音乐楼边一方池塘，名字古色古香——有鸣塘。

来的路上，途经玉溪，见到一处“聂耳音乐公园”，这位中国贝多芬的家乡就在此地。音乐公园平坦开阔，花树茂盛，绿水相伴，一派天光云影，聂耳铜像矗立其间，远远在望。铜像正面是朱德的手书“人民的音乐家”，侧面有郭沫若的题词，记述聂耳的艺术生涯，篇末暗示其死因蹊跷。如果真是倭寇下的毒手，那么共和国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也算对这位人民音乐家的永恒纪念。同样，另一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也是英年早逝，并以抗日救亡的经典乐章永垂史册。

边城蒙自

红河是一个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有红河流过。原来州府所在地个旧是著名“锡都”，如今所在地蒙自曾是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最初落脚的地方，故有联大校史纪念馆、闻一多故居等。参观闻一多故居时，还看到一篇他的文章“帝国主义的清华”，发表于《清华周刊》1921 年。自己今年指导的一位学生论文，研究的就是《清华周刊》。这里除了闻名天下的哈尼梯田，还是西南边陲的要冲，蒙自城重兵驻守。虽然未通民航，却早有军用机场，训练战机有时呼啸飞过。不过，和平年代，红河四境宛若世外桃源，天清气朗，景物秀美，处处好风光。

蒙自堪称人类宜居城市，居家过日子很舒适，无喧嚣，无壅堵，无尾气，白日则绿荫鲜花错落，夜晚则幽径灯影明灭。这里还是全国文明卫生城市，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无论下榻郊区的红河学院“雅庄宾馆”，还是入住市中心的五星酒店，总有一种旷古的宁静、安谧，不似大都市即使深更半夜，也难免隐隐的喧嚣躁动，令人心慌意乱。蒙自建筑布局也体现了这种雅静气质，时尚而不张扬，精致而不小气。大概由于军事需要，没有多少高层建筑，一眼望去，视野开阔，街道、民居、广场、湖泊、树木等尽收眼底。由清华建筑系设计的州政府大楼气势磅礴，巍峨峥嵘，前面一大片广场宏伟开阔，上有音乐喷泉，曲觞流水，两旁分列哈尼博物馆和图书馆，人们晚上喜欢来此散步、纳凉。VOA 曾经报道此事，说西南一个尚未解决温饱的地方，居然盖了一个比白宫还气派的办公楼。不过当地人提起来还挺自豪的，再说也没用国家财政多少钱，主要是红河卷烟厂的节余利税。

享誉四方的特色食品“过桥米线”，即出自蒙自。当地人爱吃米线犹如兰州人爱吃牛肉拉面，早点往往都是一碗米线。不过，那种碗已不能称为碗，而是盆，比当年河南人吃羊肉烩面用的海碗还大不少。学院派的开车师傅，原在蒙自部队服役，籍贯山东，退伍后留在当地。听他说，有些曾在这里驻防的空军官兵，常常忍不住千里迢迢飞回蒙自，品尝米线。我也爱吃过桥米线，在教工食堂，几乎每次必点一碗米线，也算与蒙自的一种缘分吧。

从哈尼梯田到建水人家

前天去元阳县看哈尼梯田，感受了一番奇妙的自然景观；昨天到建水县，又领略了一种浓郁的人文蕴涵。哈尼梯田，天下闻名。其独特之处一是壮观，哀劳山间，红河水畔，往往数万亩错落分布，依山傍岭，层层叠叠。二是色彩斑斓，四季变幻，犹如神话般神奇，鬼斧神工胜似现代派艺术。三是灌溉水源不是来自山下，而是来自山上，当地有句谚语："山有多高，水有多高。"事实上，哈尼梯田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部分，体现着哈尼人的智慧与人生观。在他们栖息的这片土地上，从山下到山上依次呈现不同的区位功能：山谷的河水经过蒸发，水气上浮，形成云雾；雾气到达山顶，凝结之后形成降水，被山上的森林吸收；然后由上而下，先流到山腰的村寨，再下灌到梯田，最后又注入红河。如此循环，构成山顶森林、山腰人家与梯田、山脚河流的四级有机生态。所以，梯田只是其中一部分，整个这片"国家湿地保护公园"才是全貌，听说这里正在申请联合国遗产保护项目。在山上去了一处哈尼族村寨，参观了一座哈尼历史博物馆。哈尼人是古代羌族后裔，隋唐时期迁徙红河流域。

蒙自出来，走高速公路往南一小时，可到达中越边境的河口，向北一小时就是建水。昨天不巧，来建水路上遇到事故，高速公路关闭，同时过去的老路也被车辆堵死。不得已，只好干等，等到中午，先去品尝农家饭菜，路通之后，又去途中"燕子洞"游览。谁想到，出来后再次遭遇高速公路封闭，绕道老路，没走多远，即见高速路已经畅通，重新回去，有所不甘，一路前行，再无高速公路入口。所以，用北京的土话说真是"点儿背"。问题在于这种阴错阳差，到达建水已是傍晚，而从六点到十点的四个小时，感受领略的东西比四天还多。

建水古称临安，城里有条"临安路"，路边一座古宅四合院的墙上题有"梦游临安城，情系古人家"。由于杭州既享有天下苏杭的美名，又"强占"古代临安的雅号，于是西部人高风亮节将自己的临安改为建水。边塞诗人周涛有名作《这是一片偏心的版图》：述说孕育华夏的长河巨川无不发源西部，流入东南，造就了江南的丰沛富庶，而将贫瘠干涸留给广袤的大西北。若论历史，这里的临安已有一千二百多年，为滇南文化古镇，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多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东

朝阳门建于朱元璋时代，形如天安门，比天安门大 38 岁，至今保存完整。站在城门，俯瞰城内，小巷纵横，古屋毗连，有塔矗立号崇文。在古代的“南蛮”聚集地，建水素以中原的儒家与汉家文化著称。一座供奉至圣先师的“文庙”，岁有七八百年，地有百十余亩，庙里建筑宏丽壮伟，肃穆静美，号称曲阜第二。文庙前一大爿荷塘，荷叶簇拥，满目青葱。文庙里安放着一种特殊香料，楼宇顶部不见一丝蛛网，非常干净，研究者多方探究，未得其妙。

由于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建水出了 111 名文武进士，城里一条路就叫“翰林街”。翰林街曾上过《焦点访谈》，说是拆除古建筑，打造假古董，为此一些干部还受到处分。当地人说，其实情况并非报道里说的那么简单，现在百姓也开始受益于当时政府的措施。穿行曲折的街巷，见到一处民居，听说是电影《周渔的火车》的外景地。除了《周渔的火车》，还有《花腰新娘》等影片也是在红河拍摄的。路上有卖缅桂花的，别一枝在胸前，清香四溢。经典影片《山间铃响马帮来》插曲，好像就叫“缅桂花开十里香”。晚上，在一家“临安茶苑”，欣赏了当地的民族歌舞，演员俊俏，服饰绚丽，演出充满滇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气息，淳朴自然，率真动人。有一首民歌的意境和曲调，颇似电影《阿诗玛》的“一朵鲜花鲜又鲜”。

建水附近的“燕子洞”，为亚洲最大的溶洞，洞体高大宽阔，长宽数十米。洞口燕子翻飞，密密麻麻，最多时达二十万之巨，所以免不了有空降的点点鸟矢。溶洞上面的嶙峋隙缝布满燕窝，每年的八月八日是这里的燕窝节，许多高手攀缘绝壁，爬到几十米高的洞顶掏燕窝。景区的游览项目之一，就是观赏彝族小伙徒手攀爬洞壁，没有任何保护装置，轻巧熟练如猿猱，看着惊心动魄。好在溶洞下面是条几米深的河水，万一失手，还不至于粉身碎骨。当地政府推动旅游业的一句口号是“燕归古镇，斯文人家”，倒是传神地表达了建水县的精华。下榻处也颇为斯文，宾馆叫“华清”，房间称“西厢”。宾馆建筑与房间布置，均似清代风格。由于“涉外”，楼下还有酒吧，散发着一种“前所未闻”的咖啡香气，令人迷醉。

石林阿诗玛

滇桂之行，历时八日，除了评奖，都在昆明东南的红河自治州逡巡游弋。虽然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但同样听到、感到寻常百姓乐天知命

的生活情景，愈发服膺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感悟。或曰：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红河的风土人情颇似湘西，人们能歌善舞，热爱生活，连说话都跟唱歌似的，听起来悠扬婉转，拖腔带调，有滋有味，不似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虽然免不了有“混混儿”，但多数基层干部还是勤勉努力，以千百年的世俗人伦和新中国的道德意识尽职尽责。县乡两级注重培养锻炼大学生，他们朝气蓬勃，富有活力，进步也快。有位才貌双全、毕业于音乐学院的女生，到乡镇后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不久就提拔为县文体局副局长。吴毅教授的新作《小镇喧嚣》，以谨严的研究和生动的记述提供了当下基层的一个鲜活样本。

红河与昆明之间，就是因阿诗玛的美丽传说而蜚声世界的石林。阿诗玛为撒尼人的骄傲，而撒尼人属于彝族众多支系的一支。在石林，巧遇一位撒尼导游，一身阿诗玛装束，小巧玲珑，伶俐可爱。这里导游众多，常年保持五百多人，为了维护正常秩序，导游都自觉排队等候顾客，万一哪位导游没有被顾客看中，就得重新排队。所以，遇到阿诗玛导游不能不说是巧遇。小阿诗玛问，听说过阿诗玛吗？这问题听起来就像知道太阳月亮吗？当年，一部《阿诗玛》使多少人泪飞如雨，肝肠寸断，觉得天下之真善美尽在其中矣，其情其景就像今人为泰坦尼克一把鼻涕一把泪。阿诗玛的心上人是“阿黑”，撒尼人把花花公子叫“阿白”（今人貌似更喜欢“小白脸”），又丑又蠢的富家子弟是“阿支”。《阿诗玛》音乐取自彝族歌舞，在红河一带也广为流传，风格相似，听起来熟悉而亲切：“撒尼人勤劳而坚强，高山上放牛又放羊……”专治国际政治与战略的学长张文木教授擅写格言，其中谈及歌唱的一条说道：“别老是一天到晚总是爱啊爱。要知道，真爱情历来都是给英雄，而不是给无病呻吟者的。”不知这番高论是不是有《阿诗玛》的启发，反正阿诗玛的爱情确实给了英雄阿黑，而非有钱有势、无病呻吟的阿支。如今金钱社会已经颠覆此类人生逻辑，这样美的音乐、这样纯的艺术几乎绝迹，至少杨丽坤那样美丽淳朴的演员已难寻觅。何况，那个年代的艺术家诚心响应号召，放下身段，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心灵的圣殿供奉的不是名利，而是人民，精神境界自然不同。

2009 年 5 月 25 日



附录

新闻传播学基础阅读书目(100种)

▲ 学生自修参考,旨在丰富文化知识与专业知识

▲ 遴选标准侧重基础性、权威性、广泛性、趣味性

▲ 一般不收各科各门的教材和高精尖的学术专著

专业类(50种)

1.《新闻文存》,徐宝璜等,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

简介:中国新闻学经典多收录其中,包括1919年问世的新闻学开山之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当代新闻学著述以《甘惜分自选集》为典范。

2.《范长江新闻文集》,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简介:以范长江命名的新闻奖,是中国记者的最高荣誉。读读他的新闻作品,特别是《中国的西北角》就明白了。参阅邹韬奋《经历》、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萧乾《人生采访》、徐铸成《报海旧闻》等。

3.《西行漫记》,[美]斯诺,三联书店,1979。

简介:不朽的中国新闻经典。参阅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

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美]索尔兹伯里,解放军出版社,1986。

简介:作为《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作者以七旬高龄重走长征路,写下这部百读不厌的故事,同时实现了自己当年追慕斯诺的青春理想。参阅王树增《长征》、张正隆《枪杆子:1949》,以及《天下风云一报人:索尔兹伯里采访回忆录》等。

5.《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美]彼得·兰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简介：岁月峥嵘的中国革命史，也成就许多富有冒险意识和专业精神的美国记者及其光荣与梦想。除了著名的三S，即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还有一些曾被历史埋没、被人们忽略的人物，他们的记者生涯同样有声有色，人生故事同样有滋有味。本书即讲述了这样一些故事和人生，同时展现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和时代。参阅张功臣的博士论文《外国记者与中国革命》、《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等。

6.《穆青传》，张严平，新华出版社，2005。

简介：文笔流丽，叙事生动，感情丰富，激情饱满，折射着一代中国新闻人的心灵史。参阅吴冷西《忆毛主席》、袁晞《社论穿起来的历史》与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

7.《燕山夜话》，邓拓，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简介：作为人民日报社最为著名、最有才干的总编辑，邓拓的学问与文采浓缩于这部传世之作。参阅《范敬宜文集·敬宜笔记》、《梁衡文集·人杰鬼雄》，以及郭梅尼《挥笔写人生——郭梅尼人物通讯选》、徐泓《大人物 小人物》等。

8.《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加莱亚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简介：一篇拉美记者写的深度报道，一部读来令人窒息的名作。2009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此书，一时引起热议。参阅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两部杰作：西班牙神父卡萨斯的《西印度毁灭述略》和西班牙士兵卡斯蒂略的《征服新西班牙信使》。

9.《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奥]茨威格，三联书店，1986。

简介：类似新闻特写的名著，勾勒了历史上几个至关重要的瞬间。文笔高妙，情节诱人。参阅美国名记者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

10.《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俄]阿尔谢尼耶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简介：随着十九世纪的殖民扩张，形形色色的探险活动盛极一时。这个过程中，也涌现了不少颇有科学价值和阅读兴味的作品，《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就是流传甚广的一部。它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等作品并为经典，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曾以此拍摄了轰动一时的影片《德尔苏·乌扎拉》。

11.《混沌：开创新科学》，[美]格雷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简介：作为《纽约时报》原科学版的记者，本书作者 James Gleick

由于此书而一举成名。后来又写了《费曼传》和《牛顿传》,同样获得好评。本书不仅使读者兴味盎然地漫游于科学前沿,获得许多有趣有益的知识,而且可以学习一流记者如何将如此深奥、偏僻的话题,写得如此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12.《巴黎烧了吗?》,[美]科林斯、[法]拉皮埃尔,董乐山译,译林出版社,2002。

简介:新闻报道写得犹如惊险小说,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而且,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令人叹服。参阅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同样生动而立体地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美国社会政治图景。同类佳作还有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约翰·皮尔格选编的《别对我撒谎:23 篇震撼世界的新闻调查报道》等。

13.《净语良言——与青年记者谈新闻写作》,刘其中,新华出版社,2003。

简介:一位老记者专为青年同行写的关于如何写好新闻的著作,其中引述了数百条新闻和特稿,分析其成败优劣,并探讨改进方法。对提高新闻写作水平,本书提供了许多净语良言。参阅威廉·布隆代尔的《〈华尔街日报〉如何讲故事》(华夏出版社)、丁法章《新闻评论教程》等。

14.《对外传播学初探》,段连城,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简介:外宣方面的佳作,材料生动,写法活泼。作者段连城 1940 年代毕业于斯诺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曾任国家外文局局长。参阅韬奋新闻奖得主马胜荣的《描述世界:国际新闻采访与写作》、黎信的《英语对外新闻报道》等。

15.《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美]孔飞力,上海三联书店,1999。

简介:孔飞力是费正清之后美国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叫魂》不仅引人入胜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状态和心态,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统中国的传播网络。另外,史景迁《王氏之死》、林耀华《金翼》、黄树民《林村的故事》等,在叙事及其方法论意味上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作为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的参考。

16.《百年中国新闻人》,李彬、涂鸣华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简介:借鉴《光荣与梦想》的一部新闻史话,既有《史记》人物列传式的浓墨重彩,又有《世说新语》人物素描式的传神勾勒。参阅胡正荣、

李煜主编《社会透镜：新中国媒介变迁六十年(1949—2009)》。

17.《中国电视史》,郭镇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简介：严谨而洒脱,厚实而轻灵,虽属学术著作(系博士论文),读来却津津有味。作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

18.《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三联书店,2003。

简介：一个从未学过新闻干过电视的人,一个刚到中央电视台还把蒙太奇当作某个外国人名的人,却创下一系列出色的电视新闻业绩。作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名牌栏目的总指挥,本书作者对其中的一系列专业问题做了系统论述。参阅李大同《冰点故事》以及长篇小说《新闻界》和《深喉》等。

19.《中国应用电视学》,集体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简介：会集中国电视领域的专家,代表中国电视研究和实践的最高水平。参阅张颂主编的《中国播音学》、吴郁的《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20.《全球新闻传播史》,李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了解世界新闻传播的入门之作,既注重体系的完整统一,又追求叙述的流畅有趣。

21.《美国新闻史》,[美]埃默里等,新华出版社。

简介：一部论述美国新闻事业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互动的力著,1980年代初译介中国,一直影响不衰,主要译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审校者为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

22.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Melvin Mencher,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美国新闻学经典教材,读通本书,也就弄懂美国及西方新闻学的所有堂奥。参阅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及其“续集”、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高钢《新闻报道教程——新闻采访写作的方法与技术》。

23.《新闻学核心》,李希光,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简介：熔新闻理论与新闻采写于一炉,合高头讲章与通俗读物于一体,无论对理解新闻还是对采写报道,均有启发和裨益。参阅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经典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范红主译,新华出版社2007。

24.《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李彬、常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5.《报纸编辑学教程》,郑兴东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简介：新闻编辑的所有专业知识尽在其中。参阅蔡雯的《现代新

闻编辑学》。

26.《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蔡雯,新华出版社,2001。

简介:新闻传播学科第一部入选全国百篇博士论文的著述。

27.《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李彬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中国新闻的名篇佳作汇于一书,风光无限,气象万千。参阅李彬、李漫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拓展读本》。

28.《论出版自由》,[英]弥尔顿,商务印书馆,1958。

简介:西方的一切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均由此发端。

29.《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张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

简介:眼界开阔,内容翔实,立论公允,观点平实。参阅孙旭陪主编《华夏传播论》。

30.《报刊的四种理论》,[美]施拉姆等,新华出版社,1980。

简介:问世于冷战时期的美国新闻学经典,虽然隐含政治偏见,却也不无参考价值。参阅哈钦斯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31.《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

简介: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新闻新秩序,进行了不懈努力和奋斗。这份驰名世界的研究报告,就是这些努力与奋斗的一座里程碑。

32.《新闻:政治的幻象》,[美]班尼特,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简介:名为新闻,实则政治。作为政治传播学经典之作,本书对美国新闻事业与社会政治的复杂关系做了深入透辟的论述。

33.《作为话语的新闻》,梵·迪克,华夏出版社,2003。

简介: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新闻,颇有启发。参阅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

34.《关于电视》,[法]布尔迪厄,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简介:当代思想大家谈论电视的演讲,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参阅徐葆耕《电影讲稿》、吴迪《中西风马牛》、书云《西藏一年》等。

35.《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王君超,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36.《理解大众文化》,[美]约翰·费斯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7.《东方学》,[美]萨义德,三联书店,1999。

简介:当代传播研究与媒介研究的必读书。参阅作者的《报道伊

斯兰》。

38.《麦克卢汉：媒介与信使》,[加]马尔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麦克卢汉及其理论向以玄奥诡异著称,这部通俗传记或有助于理解其人其说。参阅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

39.《组织传播》,[美]米勒,华夏出版社,2000。

40.《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美] 丹尼尔·贝尔,商务印书馆,1984。

简介：所谓后工业社会亦即信息社会,美国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的这部名作第一次对此进行论述,影响广泛。

41.《人类传播理论》,[美]李特约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著译俱佳的传播学基础理论著作。参阅祝建华翻译的麦奎尔等名著《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与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华夏出版社)。

42.《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法]马特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简介：作者为国际知名的批判传播学者,本书是其代表作之一,内容广博,思想宏富。

43.《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美]施拉姆,华夏出版社,1991。

简介：作为美国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作者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这份研究报告,一向被视为发展传播学的里程碑。

44.《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罗杰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简介：作者为美国传播学名家,以创新扩散理论著称。作为普及性读物,本书以史话体笔调描绘了美国传播学发生发展的历程。读来既轻松有趣,又能把握传播学的来龙去脉及其经典理论的生成背景。参阅 S. Lowery 等《大众传播研究的里程碑》。

45.《传播政治经济学》,[加]莫斯可,华夏出版社,2000。

简介：传播学批判学派属于国际传播学界的前沿领域,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又是批判学派的一大分支,而本书即对这一分支做了详尽论述。参阅美国批判学派先驱赫伯特·席勒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

46.《大众文化与传媒》,陆扬、王毅,上海三联书店,2000。

简介:对批判学派的另一分支即文化研究,做了取精用弘的描述和提纲挈领的阐释,深入浅出,条分缕析。参阅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与《西方文论讲稿续编》、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等。

47.《新媒介与创新思维》,熊澄宇编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简介:十余位西方思想家、科学家对新媒介及其社会历史蕴涵的深入分析与精彩解读。

48.《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对中国网络媒体发生、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做了系统梳理,观点平实,材料生动,论述深入。

49.《娱乐至死》,[美]波兹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作为麦克卢汉亲炙弟子,开创媒介生态学的尼尔·波兹曼却与乃师背道而驰。这对师徒的传播观,对深刻认识电子媒介及其历史意味提供了独特的思路与理论。参阅其《童年的消逝》。

50.《富媒体 穷民主》,[美]麦克切斯尼,新华出版社,2004。

简介:新一代批判学者的力著,对了解全球化时代的大众传播颇有启发。参阅贝戈蒂克安的经典著作《媒体垄断》、哈克特和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等。

博通类(50种)

1.《共产党宣言》:眼界阔大、思想深邃、感情诚挚、文辞壮美,一曲大气磅礴的政治抒情诗和哲理诗,精髓可用马克思《致燕妮》一诗的名句概括:“让整个诗的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出现!”

2.《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思想的要义在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和独立自主。另外,他的一些新闻作品,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为新华社起草的各种文稿,也堪称新闻作品的典范,如消息《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广播稿《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评论《别了,司徒雷登》等。参阅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等。

3.《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参阅学术自传《三松堂自序》与何柄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4.《古诗源》沈德潜:华夏文明精华多在其中,参阅当代诗人周涛

才思纵横的《读〈古诗源〉记》。近体诗词鉴赏评品以王国维《人间词话》、钱锺书《宋诗选注》和沈祖棻《宋词赏析》等向称佳作。

5.《中国史纲》张荫麟：著者张荫麟(1905—1942)，清华才子，由于英年早逝，遂使本书成为"史家之绝唱"或"未完成交响曲"。"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王家范)。参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也是举重若轻，娓娓道来。

6.《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国学大师的专题演讲，不仅明白如话地揭示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而且提示了一种认识历史与社会的思路——"同情之理解"。参阅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玛雅《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等。

7.《美的历程》李泽厚：中华精神世界的一次美的巡礼，美的历程。参阅徐调孚的《中国文学名著讲话》。

8.《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独特而有趣的史学名著，参阅其自传、同样独特而有趣的《黄河青山》。

9.《蒋梦麟自传：西潮与新潮》蒋梦麟：一代文化人的传世之作，以平易隽永的笔触勾画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历史画卷，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启人心智，意味深长。参阅蒋廷黻、郭廷以、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及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10.《伟大的中国革命》费正清：作者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汉学家，主编剑桥中国史丛书影响广泛，厥功甚伟。译者刘尊棋是名记者，曾任 *CHINA DAILY* 首任总编辑。参阅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一南《苦难辉煌》等。

11.《中国的现代化》罗兹曼主编：鸦片战争以来，现代化一直是国人的梦想。如何实现这一梦想、如何看待这一梦想，自然成为学界普遍关心的课题。本书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综合性著作，对洞察这一"历史宿命"不无启发。参阅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记实》等。

12.《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相蓝欣：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由于作者非同寻常的功夫和功力(如熟练运用多国语言的能力)，不仅给人

展现了真切而多维的历史视野，而且以小见大，使人对一系列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产生深切洞明的体认。参阅美国汉学家柯文的名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13.《维新旧梦录》朱维铮、龙应台编：适合大学生阅读的一部近代史"原典"，既有代表性文本，又有权威性点评。参阅钟书河的《走向世界》、陈平原等《图像晚清》、茅海建《苦命天子》等。

14.《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东方出版社）：包括一系列"另类"文字，如《中共50年》（王明）、《我的回忆》（张国焘）、《苦笑录》（陈公博）等。

15.《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撰述：海外学人唐德刚的著述别具一格，《晚清七十年》、《胡适口述自传》、《袁氏当国》等均为典范。参阅溥仪《我的前半生》。

16.《乡土中国》费孝通：社会学的名家名作，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意味隽永，不愧经典。

17.《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了解国情与民情的一部佳作，参阅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潘绥铭《生存与体验》、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组织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等。

18.《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国际政治波诡云谲，大国外交纵横捭阖。作为清华校友和新中国的外交家，作者酣畅淋漓地书写这个领域的神奇与魅力。参阅钱其琛《外交十记》、尼克松《领导人》、基辛格《大外交》等。

19.《中国政治》汤森等：名为中国政治，实为当代中国政治，涉及有关制度、运作及利弊。两位美国学者对此展开全面描述与讨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论证翔实，观点平和。参阅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强世功《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王绍光《民主四讲》。

20.《呼兰河传》萧红：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部现代作家的优秀作品，充满对家园、对生活、对父老乡亲的无限眷恋与深情礼赞。参阅沈从文《边城》、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白轮船》等。

21.《白鹿原》陈忠实："新时期"最流行的一部长篇小说，有声有色地复活了从晚清到新中国的历史沧桑与心路历程。张承志《心灵史》、路遥《平凡的世界》、韩少功《马桥词典》、格非《人面桃花》、张炜《古船》、董立勃《白豆》、范稳《水乳大地》、铁凝《笨花》等，也为同时期的上

乘之作。

22.《北大文学讲堂》温儒敏等编："15 次讲课实录，15 个经典话题"——名家荟萃，名师云集。一方面，可以赏心悦目地领略五四以来名家名篇的恒久魅力；一方面，可以举一反三地获得诸多的思想启迪与知识启蒙。参阅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名作《天安门》。

23.《西方哲学史》罗素：作为哲学家，作者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4.《理想的冲突》宾克莱：可与《西方哲学史》媲美的一部续集，罗素写到 20 世纪初，宾克莱接着写到 20 世纪末。参阅 BBC 播出的哲学家系列访谈《思想家》(麦基编)。

25.《万物简史》比尔·布莱森：内容广博，趣味盎然，参阅伽莫夫《从一到无穷大》、霍金《时间简史》、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等、侯歌"酷科学丛书"。

26.《西方政治思想史》麦克里兰：全书以西方 2500 年来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及其思想为主题，包罗广泛，蔚为大观，思想锐利，笔法轻盈，"一部见解与写法都与众不同的政治思想史"。参阅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文明的冲突》。

27.《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与《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斯塔夫里阿诺斯：史家的功底、哲人的眼光与文人的才气，构成这部全球通史的基调。参阅威尔斯《世界史纲》(费孝通等译)，一部以文采见长的世界历史。另外，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自 2000 年在美国问世以来，以其恢弘的体系和生动的叙事也成为畅销的世界史读物。

28.《第三帝国的兴亡》夏伊勒：有关二战的出色研究，恰如芭芭拉·塔奇曼《八月炮火》是有关一战的优秀著作。作者夏伊勒为美国名记者，二战期间曾驻柏林，其《柏林日记》亦为传世之作。

29.《光荣与梦想》曼彻斯特：纯以故事的形式展现二十世纪美国的社会面貌及其精神变迁，虽然中文版看上去皇皇四大本，但读起来却只嫌其短而不嫌其长。作者也是一位美国名记者，2004 年去世。

30.《堂吉诃德》塞万提斯，杨绛译：西班牙人说，第一次读了会笑，第二次读了会哭，第三次读了会思。事实上，在一切杰出记者的身上无不具有唐吉诃德的精神——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

31.《悲惨世界》雨果：一流记者都如人道主义作家雨果，无不对世事、人生及百姓身家性命保持敏感与同情。参阅加缪《鼠疫》。

32.《幻灭》巴尔扎克，傅雷译：西方新闻界一出活灵活现的闹剧，参阅马克·吐温《竞选州长》——幽默诙谐有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名著。

33.《德里纳河上的桥》安德里奇：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民族史诗，作者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参阅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34.《百年孤独》马尔克斯：拉美爆炸文学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参阅其古典风格的名著《霍乱时期的爱情》(又译《爱在瘟疫流行时》)。

35.《好兵帅克历险记》哈谢克：一部图(插图)文并茂的世界名著，妙趣横生，令人捧腹。

36.《经济学原理》曼昆：哈佛大学名教授专为大学生写的经济学入门教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37.《以自由看待发展》阿马蒂亚·森：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森享有“经济学良心”的美誉，用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话说：“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参阅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等。

38.《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二卷：清流般明澈的思想，神话般迷人的意境，春风般轻盈的文笔。参阅宗白华《美学散步》、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

39.《文明与野蛮》路威：人类学的入门经典，破解“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佳作。译者吕叔湘为语言学家，《现代汉语词典》首任主编。参阅江晓原《云雨》。

40.《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徐葆耕：一部深得读者喜爱的西方文学读物。

41.《社会性动物》阿伦森：既通俗又权威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参阅《性心理学》(潘光旦佳译)、《动机与人格》(马斯洛)等。

42.《熵：一种新的世界观》里夫金等：哲人的厚重与记者的轻灵有机融合，使这部著作不仅深刻，而且生动。参阅卡森的名著《寂静的春天》。

43.《现代社会学理论》沃特斯：社会学入门著作，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参阅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和《社会的麦当劳化》。

44.《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本尼迪克特：既是了解日本的一部入门书，也是一部社会学名著。

45.《白银资本》弗兰克：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纵横捭阖、新意迭出的名家名作。

46.《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伯格：如果只想大略了解而不打算深究所谓后现代问题，那么可以读读这部趣书。如果想深入一步，那么再读读杰姆逊的北京大学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等。

47.《傅雷家书》傅雷：打动无数读者的人生教科书。另外，《傅译传记五种》以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同样体现着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精神气质。参阅傅译《人生五大问题》、巴金试译《六人》等，也属此类书中上品。

48.《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多尔蒂，阎学通译：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的经典著作。

49.《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巴尔赞：借用一位美国大学校长的评价："这是一部绝妙的好书。雅克·巴尔赞的渊博无可匹敌。无人能像他一样对五百年的历史辑古钩沉，洞察入微，而行文又如此清楚、优雅、流畅。"

50.《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科兹等：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不在于外部力量或底层民众，而在于上层把握既得利益的"精英"——这是专门研究苏联的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新闻记者的结论，即所谓"来自上层的革命"。参阅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

百年校庆
于清华园



后　　记

2007年春末，笔者参加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一次研讨会，住在虎踞龙盘的钟山脚下。此情此景，颇似《兰亭集序》的意境：暮春之初，会于山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会议期间，老友新朋把谈甚欢。一日，与北京某出版社编辑闲聊，话题集中在拟议中的新闻传播类图书。不知不觉谈及三个选题，包括修订再版甘惜分先生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和本书所属的一套学术随笔。

关于学术随笔丛书，当时我的想法是，眼下不少出版社都开始属意新闻传播类图书，都想邀集各路知名学者加盟。然而，“成名成家”的人士早已诸务缠身，分心乏术，恐怕难有更多的精力投入新的、专业著述的“系统工程”。不过，他们手头或许有些现成的未刊文字，与严谨规范的专著相比，多为随意率性之作，风花雪月之属。这些文稿虽无“宏大叙事”之淹博，却有“私人叙事”之轻灵；虽不像一江春水向东流，浩浩汤汤，一气呵成，却不乏万顷波光、闪闪烁烁的思想火花。总之，应该更能体现学者的治学旨趣与人生境界，更带有鲜活的灵感与深沉的意绪，对读者来说也许更有阅读的兴味。新闻传播的高头讲章已是汗牛充栋，读者也面临“审美疲劳”，如果能够出版一批清新活泼之作，说不定会收到别样的效果。

由于这个机缘，回京后就开始考虑这个选题。好在自己2001年任教清华以来，环境清幽，心境恬淡，于教书、读书、著书之余，确有一些零零散散、不登大雅的随兴之作，日积月累，渐成规模，总数不下50万言。如今，借机整理，去粗取精，编为一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也。

其中，除个别篇目曾公开发表，其余多属未刊稿，如游记、演说、序跋、书信、杂感等文类。看上去东鳞西爪，犹如音乐的无主题变奏，其实又无不围绕平时所关注的两个方面，一是新闻传播的学子与学问，一是与此相关的社会与人生，故谓“新闻与社会的交响”。另外，之所以称为“交响”，也是由于自己于音乐略有所好，乃至本书每个板块的小标题也都隐含音乐的意味。当然，援琴鸣弦发清商的背后，往往涉及关系重大的文化政治，借用舒曼称道肖邦的名言，可谓“隐藏在花丛里的大炮”吧。

如今，《新闻与社会的交响》终于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付梓，笔者感到不胜荣幸。一方面，这家大学出版社的清誉令人欣赏，包括多部拙著有幸在此出版；一方面，如前所述，本书所有篇什都是在清华园完成的，都是由此间的环境、机缘和灵感触发的。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感谢好友格非先生拨冗赐序，他的文采风流为水木清华平添了一道景观。感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季萌同志帮助清理和编辑散乱的原始文稿，从而为本书提供了雏形。作为受业于北大和清华两所名校的高才生，她的才干令人信服。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新华社记者姜琳和美国普利茅斯大学博士生何小菲，以及我指导的博士生、南开大学教师吴风也都为本书付出心血，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拙编的一应问题自当由作者承担，也希望读者朋友有以教我。

2008 年国庆节



跋

拙编修订再版，适逢百年校庆，新增的开篇话《十载道情》，即专门为此而作——既了却一桩心愿，也向年轻的清华及其新闻学院致意。

后皇嘉树，生南国兮。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喜庆时刻而不由酸心的是，院长范敬宜已于半年前溘然长逝，不能如原先祈盼的那样共度百年华诞，也是他从王大中校长手中接过院长聘书的第十个年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他平生激赏的龚定盦的名句，如今追怀，怎不怅然。

各路学子对拙编第一版的认可，使笔者惴惴之际稍觉心安，也激励自己增益删削，遂有这个第二版。新版主要扩充了约一倍的篇幅，除《十载道情》、《骊歌声咽》等新增内容，补充较多谈学论道的杂俎文字，而这些内容基本也是同青年学子交流的。

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自选集的序言里，对所选作品写下一段言近旨远的告白，不妨说也表达了自己此时此刻的相似心意，借花献佛引述于下，多余的话就不说了：

>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乃是一种思想的风格，而不是任何一套系统的理论模式……与其说它们是“论文”，不如说它们是“散文”。“论文”是一篇学术作品，点缀着许多脚注；散文则相反，它既是文学性的，也是思想性的、学术性的。“论文”于知识有所增益，它希望自己在未来学术著作的脚注中占据一席之地；“散文”的目的则是促使我们思想，改变我们对文中讨论的作品之外的文学作品进行思想的方式。“论文”可以很枯燥，但仍然可以很有价值；“散文”则应该给人乐趣——一种较高层次的乐趣：思想的乐

趣。……如果这本书中的散文能给读者带来乐趣，我会十分高兴；但假如这本书不能给你带来乐趣的话，那么，就请把它放到书架上，让它至少可以起到一个作用：隔开比邻而居的两本书，使它们不致拌起嘴来。（《他山的石头记》）

李 彬

2011 仲春

附识：承蒙清华新闻学院博士后黄卫星副教授、博士生马学清和关琮严悉心校阅，遂使拙编更臻完善，特致谢忱！

